

Development Economics

# 发展经济学

谭崇台 主编

山西经济出版社

F=061.3  
8

主 编 谭崇台  
副主编 郭熙保 庄子银  
山西经济出版社

# 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Economics

098961



## 发展经济学

谭崇台 主编

出 版	山西经济出版社 太原市建设南路 15 号 030012 0351 - 4922102 <a href="http://www.sxep.com.cn">http://www.sxep.com.cn</a> E-mail:sxep@sx.cei.gov.cn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铁三局印刷厂
版次·印次	2000 年 3 月第 1 版 200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印张	850 × 1168 1/18 印张:28.5
字数·印数	688 千字 0001 ~ 3 000 册
书 号	ISBN 7 - 80636 - 432 - 3/F·427
定 价	50.00 元

责任编辑:张惠君  
助理责编:李慧平

复审:郝建军

终审:赵建廷

## 说 明

本书初版原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10月出版。问世后，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鼓励，如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前任所长波金斯（Perkins, D. H.）教授来信说：“这本书内容充实，覆盖面广，是一本标准教科书。”原书由许多学校采用，行销很广，被九次重印，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但原书写成已过10年，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有了不少新的变化，一些新理论、新概念陆续出现在发展经济学中。常常有读者给我们来信希望对原著进行增补修订。

为此，我们重新组织人力，参阅了10年来新的文献资料，收集了下迄1998年的统计数据，在原有的理论框架上，增加了新的内容，修改了一些不恰当之处。

这本新版书仍是集体努力的成果，由谭崇台提出增订的设想，经过讨论后，分工撰写。第一、三、十二、十六章由谭崇台执笔，第五、六、七、十一章由郭熙保执笔，第二、四、八章由庄子银执笔，第九、十章由邹薇执笔，第十三章由冯金华执笔，第十四章由孙宁执笔，第十五章由文建东执笔。最后，由谭崇台通读、修改、定稿。

韩中英同志对书稿的校阅做了不少具体的工作，书稿的完成体现了她的一份辛劳。本增订版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谭崇台

1999年11月于珞珈山



# 目 录

说 明	1
<b>第一章 概论</b>	1
第一节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1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的经济发展思想	14
第三节 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和演变	25
<b>第二章 经济增长理论</b>	35
第一节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式	35
第二节 新古典增长模式	44
第三节 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模式	52
第四节 新增长理论的兴起和发展	56
第五节 新增长理论与知识经济的出现	71
第六节 经济增长的数量、结构和影响因素分析	82
第七节 经济增长的阶段与经济增长的限度	93
<b>第三章 论证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思路</b>	98
第一节 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思路	99
第二节 经济发展的新古典主义思路	103
第三节 经济发展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	108
第四节 经济发展的激进主义思路	109
第五节 对四种基本思路的评论	115
<b>第四章 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b>	121
第一节 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121
第二节 资本形成的基本理论	124

第三节	资本来源与投资效率	141
第四节	资源配置和投资准则	145
<b>第五章</b>	<b>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b>	152
第一节	人力资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152
第二节	人口与经济发展	154
第三节	就业与经济发展	160
第四节	教育与经济发展	171
第五节	人力资源发展战略与政策思路	179
<b>第六章</b>	<b>工业化、农业进步与经济发展</b>	184
第一节	工业化及其发展阶段	184
第二节	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	190
第三节	农业的发展	197
<b>第七章</b>	<b>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b>	217
第一节	刘易斯模式	217
第二节	拉尼斯—费模式	223
第三节	乔根森模式	235
第四节	托达罗模式	243
<b>第八章</b>	<b>经济发展中的优先次序</b>	252
第一节	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	252
第二节	部门发展优先次序	265
第三节	地区发展优先次序	270
<b>第九章</b>	<b>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b>	278
第一节	新贸易理论与新贸易政策的发展	278
第二节	关于贸易与经济发展的一般争论	280
第三节	发展经济学家对传统的对外贸易理论的评价	284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的新国际贸易理论	290
第五节	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发展战略和策略	304
<b>第十章</b>	<b>国外资源与经济发展</b>	323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利用国外资源的一般理论	323
第二节	利用国外资源的利弊分析	334
第三节	利用国外资源的战略与策略	337

<b>第十一章</b>	<b>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与经济发展</b> .....	344
第一节	税收政策.....	344
第二节	政府支出.....	359
✓ 第三节	金融制度与政策.....	366
第四节	通货膨胀.....	375
<b>第十二章</b>	<b>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干预与市场调节</b> .....	382
第一节	罗森斯坦-罗丹、拉尔和约翰逊的论证.....	383
第二节	60年代中期以后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对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关系的 基本观点和更深层次的分析.....	388
✓ 第三节	90年代以来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进一步思考.....	395
<b>第十三章</b>	<b>社会项目评估</b> .....	401
第一节	社会项目评估的历史发展.....	401
第二节	社会项目评估的理论基础.....	403
第三节	社会项目评估的基本结构.....	406
第四节	项目的投入和产出.....	408
第五节	成本和收益的度量.....	410
第六节	社会贴现率.....	416
第七节	分配权数.....	421
第八节	项目评估在发展中国家的应用.....	424
<b>第十四章</b>	<b>可持续发展</b> .....	428
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	428
第二节	资源利用和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	434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	444
<b>第十五章</b>	<b>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现实</b> .....	450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与成就.....	450
第二节	典型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457
第三节	亚洲经济奇迹与金融危机及其启示.....	464
<b>第十六章</b>	<b>论有关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重要问题</b> .....	470
第一节	怎样对待西方发展经济学.....	470
第二节	是否存在着1945年以前的发展经济学.....	475
第三节	凯恩斯理论在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中居于什么地位.....	477 ✓

第四节 怎样看待“新古典主义的复兴” .....	486
第五节 发展经济学是否已陷入贫困、停滞甚至走向衰亡 .....	487
主要英汉人名对照表 .....	490
参考文献 .....	494

# 第一章 概 论

## 第一节 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发展经济学 (Development Economics 或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西方经济学体系中逐渐形成的一门新兴学科。它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

由于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一般以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去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 还往往以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去规范今日的发展中国家, 从而在分析中不免联系发达国家的经济如何增长和如何发展。于是, 有人认为, 西方发展经济学既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 又研究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 只不过是发达国家侧重维持 (maintain)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而对发展中国家则侧重加快 (accelerate) 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但按照一般的看法, 发展中国家有其特点, 它们既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现在, 也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过去。西方发展经济学也有其特点, 它是随着发展中国家的出现而出现的, 它的研究对象 (至少是主要研究对象) 应当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

### 一、发展中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亚非拉美三洲广大地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纷纷在政治上走向独立, 在经济上各自选择不同的道路和方式谋求发展, 从而在世界上出现了众多的发展中国家 (Developing Countries), 也叫做欠发达国家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LDC) 或第三世界国家。

为数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各自有其相异之点。在历史的传统、国土的大小、人口的多寡、收入水平的高低、产业结构的状况、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秉赋、公营部门和私营部门的比重、对外部经济和政治势力的依赖程度、国内体制和政治结构的权力分配等方

面，它们都互不相同，而且差别往往很大。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发展中国家原有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基本相似的，经济上所显示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烙印大致相同，所处的国际环境无多大差异，特别是低发展或不发达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处境，因此，发展中国家又必然有共同特点。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 (Lewis, W. A.) 在他就任美国经济学会主席的演讲中说：“发展经济学研究人均产出低于 1980 年美元价值 2 000 元的国家的经济结构和经济行为。”<sup>①</sup> 刘易斯提出的数量限定虽有高度的概括性，但过于笼统。世界银行把发展中国家划分为低收入国家 (Low Income Countries) 和中等收入国家 (Middle Income Countries)，使之与发达国家和高收入石油出口国相区别，划分的标准逐年变动。以该行发表的《1998 年世界发展报告》为例，低收入国家指 1997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350 美元 ~ 1 230 美元之间者，中等收入国家指 1997 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 1 230 美元 ~ 4 520 美元之间者<sup>②</sup>。世界银行对发展中国家这一范畴的规定，虽然比刘易斯较为明确，较为细致，但仍然是一种数量的规定。要认识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还必须从质的规定性作出考察。

从质的方面去限定发展中国家，曾有这样的定义：“发展中国家是这样一种国家，它的人民正在开始利用可获得的资源，以实现产品和劳务人均生产的持久增长。一般地说，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能够较大程度地提高实际收入水平，而且正在做到这一点的国家。”<sup>③</sup> 这个定义既笼统又抽象，而且只从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可能性方面去观察发展中国家，更是不全面的，也是不恰当的。比较完整地描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性质的发展经济学家是托达罗 (Todaro, M. P.)，他说：“……本来已经说明，为什么把亚非拉美一批多种多样的国家过分概括有时是危险的。但是，如果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经济特征，我们就可以在颇为相似的框架中去观察它们。”<sup>④</sup> 照托达罗看来，发展中国家具有如下所述共同经济特征。

#### (一) 低下的生活水平

一般地说，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民，无论和自己国内少数富裕阶层相比，还是和发达国家的大多数人民相比，他们的生活水平都是低下的。低下的生活水平，不仅表现在数量上，而且表现在质量上，诸如普遍贫困、收入低下、住房短缺、健康不良、教育落后、婴儿死亡率高、预期寿命和工作年限短等。托达罗根据大量的统计资料，对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水平状况作了进一步的归纳：国民收入水平相对低下面且在许多国家中增长缓慢；人均收入水平低下而且在许多国家中增长缓慢；收入分配呈高度偏态，占人口 20% 的高收入阶层得到的收入高于占人口 20% 的下层人民的倍数 1960 年为 30，1991 年底为 61。由于前三种状况的存在，第三世界的大量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的境地，在 90

① 刘易斯. 发展理论的状况. 美国经济评论, 1984. 3

② 1998 年世界发展报告. 英文版. 191

③ 麦克格罗-希尔. 简明现代经济学辞典. 英文版. 1983. 99

④ 托达罗. 经济发展. 英文第 5 版. 1994. 38

年代初，大约有 12.5 亿人。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中很大一部分健康欠佳，营养不良，身患弱症，婴儿死亡率高于发达国家 10 倍；识字率低，辍学率高，教育设施和课程设置不完善也不合需要。

## （二）低下的生产率水平

生产率的高低决定于几种重要因素。首先是投入要素，如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补充和配合。提高储蓄水平以扩大物质资本的积累并通过教育和训练以促进人力资本的开发，就可以提高生产率。但储蓄水平不易提高，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匮乏，正是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困难所在。其次，管理技能的改进有助于生产率的提高，而发展中国家缺少的正是合格的管理人才。再次，生产率提高还有赖各种体制诸如土地占有、税收系统、信贷结构等方面的改革，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这种改革往往是旷日持久的。还有，劳动者对工作、纪律和权威的态度，是否有自我完善以及创新的愿望和能力与生产率的升降也有密切关系，而处于低发展阶段国家中的人民如何改进劳动态度和提高工作积极性又正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最后，人们从事劳动和工作时所表现出的效率，必受身心健康状态的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低下生活水平使人们的身体和精神受到损害，从而约束了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的可能性。

总之，托达罗认为，低下生活水平和低下生产率的相互影响不断加强，从而使发展中国家陷于不发达状态而不能自拔。

## （三）高人口增长率和高赡养负担

目前，世界总人口大约 3/4 以上居住在发展中国家，1/4 居住在发达国家。两类国家的出生率悬殊很大，发展中国家高达 30‰~40‰，发达国家仅为 10‰~15‰，又由于发展中国家过去较高的死亡率已逐渐减少，结果，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比发达国家高 3 倍，前者为 2.0%，后者为 0.5%。15 岁以下的儿童和 65 岁以上的老人在社会中属于非生产性的成员，生活上要由劳动力（即 15 岁~64 岁的人）来抚养，成为经济上的“赡养负担”（dependency burden）。相对地说，发达国家中 65 岁以上的老人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比发展中国家要大一些。但把儿童和老人总计起来，发达国家的赡养负担约为人口的 1/3，而发展中国家的赡养负担达到人口的 45%。

高人口增长率和高赡养负担比（即儿童和老人人数与劳动力人数之比），妨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加深了它们的停滞和贫困。

## （四）较严重的劳动力不得其用的现象

劳动力不得其用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指劳动者的实际工作时间少于他们能够工作的时间，或者劳动者形式上在全日工作，但生产率很低，即使减少劳动时间也对总产出几乎没有影响；二是公开失业，指劳动力有工作能力也有工作意愿，却无工作机会。

据估计，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劳动力中，公开失业者约占 10%~15%，而 15 岁~24 岁的青少年失业率却高达 30% 左右。如果把就业不足和公开失业合计，发展中国家城乡劳动力中差不多有 35% 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

由于人口增长很快，但经济不发达使工作空位增加很慢，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不得其

用的状况难以缓解。不少的发展中国家还有乡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的问题，更加剧了那些国家城市的公开失业和就业不足，其中青少年不得其用的状况更为严重。

#### (五) 对农业生产和初级产品的高度依赖

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劳动在农村。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发展中国家为 65%，发达国家低于 27%。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发展中国家为 62%，发达国家仅为 7%。农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发展中国家为 20%，发达国家为 3%。1979 年，亚非两洲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分别为 70% 和 54%，北美洲的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仅为 5%，但北美洲农业劳动力以美元价值表示的平均生产率为亚非两洲的 35 倍。可见，农业在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中占很大比重，而农业生产率却很低下。农业生产率之所以很低下，原因是人多地少、技术原始、组织落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不足。这些制约因素将继续起着重要作用，因此，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还需要作出很大的努力。

由于工业落后、服务业不发达，发展中国家主要依赖初级产品的出口以取得外汇。1992 年，初级产品占亚洲以外的发展中国家出口总额的 70%。而且，除了少数富有石油和宝贵的矿产资源的国家外，一般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初级产品主要是食物和原料。初级产品出口换汇在外汇收入中一般占 60%~75%。

尽管发展中国家在过去 20 多年中出口额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低于发达国家出口额增长速度。即使在最好的年份，非石油输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例也在下降。1950 年，它们的出口在世界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为 33%，以后逐年下降，到 1991 年只占 22%。同时，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出口额，在它们的出口总额中所占比例也在下降。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依赖发达国家的市场。

如上所述，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关系中，受着国外势力的控制和支配，国外势力严重地影响了它们的社会经济福利，使它们处于脆弱的地位。

在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五个共同特点之后，托达罗作出结论：“成功地实现社会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发展中国家自己制定适宜的战略，还需要改变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使之较为切合穷国的需要。”<sup>①</sup>90 年代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很快，它们当中个别的人均 GNP 已超过 10 000 美元，而且在分配公平、群众参与等方面也大有改善，但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托达罗列举的五点仍然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 二、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经济增长 (economic growth) 和经济发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这两个概念有无区别，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各有看法。有的把这两个概念并列起来<sup>②</sup>，有的在似乎应当用“发展”一词的地方却使用了“增长”一词<sup>③</sup>，有的则在指出它们的某些区别时，又说

① 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英文第 3 版，1985，43

② 阿德尔曼，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学说，英文版，1961

③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英文版，1962



这两个词可以交换使用，例如雷诺兹（Reynolds, L. G.）认为，“除了已计算出来的增长和与之相联系的结构变化外，人们还可以给‘发展’一个特殊的意义：它表示在增长导向下经济和政治体制的系统变化。然而，历史资料表明（传统定义的）经济增长和体制变化是紧密联系的。某些最低限度的政治—经济组织结构也许是增长加速的‘先决条件’。但体制现代化也可以看成是持久增长的伴生物或附属产品，两者都来源于朝气蓬勃的政治领导……由于这些理由，我们把增长和发展视为可以互相替代使用的两个名词”<sup>①</sup>。

但是，多数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还是主张应当对这两个概念的内涵加以区别。例如赫立克（Herrick, B.）和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 C. P.）说：“‘增长’和‘发展’在经济论著中有时作为同义词使用，尽管偶尔这样使用是可以接受的，却会引起混乱，这两个词可能具有不同意义，这在一般使用中是隐含的，而在以下说明中就明显了，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指和以前相比产出的种类有所不同以及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增长意味着以更多的投入或更高的效率去获得更多的产出。发展的含义则不只这些，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量分布的变化。假如以人类的‘增长’和‘发展’作比喻，增长包含诸如身高和体重之类总量的变化，发展则包含诸如体质协调、学习能力或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之类机能的变化。”<sup>②</sup>

又例如，波金斯（Perkins, D. H.）等人说：“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有时可以替代使用，但二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区别。经济增长指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总值的总量或人均量的上升……经济发展则具有较多的含义。”<sup>③</sup>他们指出，经济发展除意味着人均收入上升外，还意味着经济结构的根本变化，结构变化中有两种变化最为重要：一是国民生产中农业的份额缩小和工业的份额扩大；另一是农村人口百分比的减少和城市人口百分比的增加。此外，处在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家一般要经过人口增长先加速然后减速的历程，从而引起年龄结构急剧变化，其消费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人们不再把他们的全部收入用来购买必需品，转而购买耐用消费品，再进而在消闲品和服务方面花费越来越多。他们还认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是大多数人民能否参与发展的过程，他们不仅参与利益的生产，还参与利益的享受。如果经济增长只有利于少数富裕阶层，那就没有经济发展。

又例如，哈根（Hagen, E. E.）明确指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含义。他说：“经济增长指一国的人均生产（国内生产总值）或人均收入（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两种指标的差异在于收入中有一部分可能流出国外。经济发展一词有两重意义。它用来指低收入国家中的经济增长加上物质利益分配的改善，也就是最低收入家庭的营养、卫生和教育条件的改善，婴儿死亡率的降低以及生活变得较为体面……它也用来指增长的综合效应，即计划的与非计划的效应以及有益、有害或中性的效应。指产品种

① 雷诺兹. 经济发展的理想与现实. 英文版. 1977. 4~5

② 赫立克, 金德尔伯格. 经济发展. 英文第4版. 1983. 21~22

③ 吉里斯, 波金斯等. 发展经济学. 英文第2版. 1987. 7

类、生产方法、就业格局、人口增长率、对外贸易以及城市化等方面的变化。”<sup>①</sup>

再例如，小朱维卡斯也认为应当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两个名词之间作出区别，他说：“经济学家一般用经济增长一词指一国在一时期中产品和劳务的实际产出的增长，或者更恰当地说，人均实际产出的增长……经济发展是一个含义广泛的词，一些经济学家把它定义为增长伴随着变化——经济结构的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政治结构的变化。”<sup>②</sup>

综观上述各家之言，我们认为，应当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这两个概念加以区别。经济增长仅仅指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1季度、1年、3年、5年、10年等）包括产品和劳务在内的产出（output）的增长。经济发展则意味着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产业比重、分配状况、消费模式、社会福利、文教卫生、群众参与等在内的变化。可见，经济增长的内涵较狭，是一个偏重于数量的概念，而经济发展的内涵较广，则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

经济增长是手段，经济发展是目的。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基础，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一般而言，没有经济增长是不可能经济发展的，但有经济增长不一定有经济发展。如果由于制度上的原因，产出增长的结果是长期两极分化，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产出有快速的增长，但产出中相当大一部分无补于国计民生，而是国民经济的虚耗；为了片面追求快速的产出增长，不顾及广大人民的福利，不考虑所付出的社会代价。这几种情况的出现，都表明增长和发展并非一致，有增长而无发展，或者说，出现了“无发展的增长”<sup>③</sup>。

前面说过，一般而言，没有增长是不可能发展的，正如赫立克和金德尔伯格所说：“很难想象没有增长的发展。功能的变化总是自然而然地包含规模的变化。一国的经济除非能够生产超过它生存所需要的东西，否则作为发展标志的产出构成的变化是不可能出现的。总之，虽然我们可以描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现象，我们却认为发展过程几乎必然依赖于某种程度的同时发生的经济增长。”<sup>④</sup>

衡量经济增长，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即GNP的总量或人均量为尺度。但人们已逐渐认识到GNP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尺度有其不足之处：

（1）GNP不能说明产出中的产品和劳务的种类，也不能说明由于使用这些产品和劳务而获得的福利的大小，更不能说明增长过程中由于环境污染、城市化和人口膨胀所付出的社会代价。

① 哈根. 发展经济学. 英文版. 1983. 9

② 小朱维卡斯. 经济发展导论. 英文版. 1979. 8~9

③ 1966年，克劳尔（Clower, R.）以《无发展的增长》（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为题发表了他对利比亚经济研究的论著。他注意到利比亚当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外国公司拥有产权的初级产品出口的增长，但由于缺少结构变革，其他经济部门未能出现补充性增长，又由于缺少制度变革，未能把实际收入的得益分润到人口的各个阶层。

④ 赫立克, 金德尔伯格. 经济发展. 英文第4版. 1983. 22

(2) 大量未通过市场的产品和劳务在 GNP 中得不到反映。

(3) GNP 不能反映收入的分配状况。

(4) 各国的 GNP 一般是以各国货币按照汇率用美元计算的，而固定汇率往往定值过高或定值过低，如汇率浮动，只好用一年的平均值计算。无论哪一种情况，各国的 GNP 都难以作出真实的比较。

(5) 各国的相对物价结构差异很大，从而以美元折算的 GNP 在各国的实际购买力也差异很大，把 GNP 作国际比较，不易反映各国的实际生活水平<sup>①</sup>。

(6) 有些国家计算产值的方法不同，造成了用 GNP 作国际比较的另一重困难。例如，按照前苏联模式计划管理的国家一般用工农业生产总值衡量，要估算这些国家的劳务价值就很不容易。这些国家是用毛值而非附加价值计算产值的，不免有重复计算之弊。长期以来，利息和地租不计算为产值，虽然现在已开始计算，但并不能反映要素的稀缺价值。

(7) 由于缺乏数据收集和运用处理的专门技能以及进行不偏不倚抽样调查的资金不足，加上人为的弄虚作假，不少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资料往往不大可靠，从而，GNP 不能表示经济增长的真实情况。

尽管 GNP 作为衡量经济增长的尺度有种种缺点，但仍有一个很大优点：它能够把国民经济的全部活动概括在极为简明的统计数字之中，从而可以成为表明各国经济增长的通用指标。由于具有这一优点，GNP 到现在仍然是经济增长的基本量度。有些统计学家为了弥补 GNP 的不足之处，采用了一些校正办法，例如，用“均等加权”（equal weights）指数或“贫困加权”（poverty weighted）指数来校正因 GNP 不能反映收入分配而出现的偏差。

衡量经济发展比衡量经济增长困难得多。一般认为，发展的中心意义是社会和个人的福利增进，因此，表明发展至少应包括五个方面的指标：基本必需品的消费量、收入和分配的均等程度、识字率、健康水平和就业状况。显然，这五个方面的统计数字是不能简单而随意地相加成一种统一指标的。但是，采用加权的办法，把它们合成为一种具有综合意义的指标，在统计学上却是正确而可行的。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有哈根，还有尼维阿罗斯基（Niewiaroski, N. H.），此外，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United Nations Research Institut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UNRISD）也提出了 16 个指标，三家的指标大同小异，现对比如表 1.1。

从表中可以看出，三家选用的指标项目中只有两项（人均报纸发行量和人均能源消费量）是相同的，其余的则是近似，但是，都把卫生、营养和教育作为重要的福利指标。

---

<sup>①</sup> 克拉维斯，赫斯顿，萨默茨。100 多个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学杂志，1978. 5

表 1.1 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

项 目	哈 根	尼维阿 罗斯基	联合国社 会发展研 究 所
耐用品—服装—住房：			
人均机动车数	×	×	
人均收音机数	×	×	
人均纤维消费量		×	
每个房间人数			×
交通—设施：			
人均电话机数	×	×	
人均报纸发行量	×	×	×
人均能源消费量	×	×	× <sup>a</sup>
基本工业产品：			
人均钢消费量		×	×
人均水泥消费量		×	
卫生与营养：			
人均医生数	×	×	
预期寿命			×
蛋白消费量		×	× <sup>b</sup>
教育：			
识字率	×	×	
小学入学率	×		× <sup>c</sup>
高小入学率		×	× <sup>c</sup>
职业学校入学率			×
就业：			
农业和服务部门以外的劳动力百分比	×		
农业中进行经济活动的人口百分比		×	× <sup>d</sup>
公用事业中进行经济活动的人口百分比			×
经济活动中工资和薪水收入者百分比			×
其他：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	×		
国民生产总值中制造业所占份额			×
男性农业劳动者的人均农产品量			×
人均出口量		×	× <sup>e</sup>
城市人口百分比	× <sup>f</sup>		× <sup>g</sup>

资料来源：小朱维卡斯，经济发展导论，英文版，1979，22~23

a—电力及其他能源分列

b—动物蛋白

c—小学和中学入学率合并计算

d—成年男工

e—对外贸易

f—1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g—2万以上人口的城市

衡量经济发展的综合指标，除上述三种外，还有阿德尔曼 (Adelman, I.) 和莫里斯 (Morris, C. T.) 的 41 个变量体系，其中不少项目具有社会的或政治的性质<sup>①</sup>；哈比逊 (Harbison, F. H.)、玛鲁尼克 (Maruhnck, J.) 和雷斯尼克 (Resnick, J. R.) 的 41 个变量体系，强调人力资本的发展<sup>②</sup>。

引起人们很大兴趣的是 1977 年由莫里斯 (Morris, M. D.) 提出的“实际生活质量指数” (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 PQLI)，它也是一个衡量一国人民经济福利和生活水平的综合指标，由识字率、预期寿命指数、婴儿死亡率三项构成。以瑞典水平为基准的综合指数，识字率是与一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人民生活水平和教育发展程度的反映；预期寿命指数由营养、公共卫生、收入和一般环境等指数综合而来；婴儿死亡率则反映饮用水的净化程度、居住的环境条件、母亲的健康状况等。设置这一指数的目的，是为了克服 GNP 这类指标本身的局限性，更好地比较和反映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例如，1974 年，瑞典的人均 GNP 为 7 240 美元，美国的人均 GNP 为 6 670 美元，前苏联的人均 GNP 为 2 660 美元。如果采用实际生活质量指数，则瑞典、美国和前苏联的指数分别为 100、96 和 94。根据 M. D. 莫里斯的原著<sup>③</sup>，把有关国家的实际生活质量指数列表如 1.2。

表 1.2 人均 GNP、健康卫生与识字率统计和实际生活质量  
(根据选定国家和地区最近数据)

地区与国别	人均 GNP (1974 年) (美元)	预期寿命 指数	婴儿死亡率 (%)	识字率 (%)	PQLI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尼日尔	120	39	200	5	14
肯尼亚	200	50	119	20~25	40
加 纳	430	44	156	25	31
赞比亚	520	44	160	15~20	28
安哥拉	710	38	203	10~15	15
北非和近东地区：					
也门人民共和国	220	45	152	10	27
埃 及	280	52	98	26	46
摩洛哥	430	53	130	21	40

① 阿德尔曼，莫里斯。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一种数量分析。英文版，1967

② 哈比逊，玛鲁尼克，雷斯尼克。现代化和发展的数量分析。英文版，1967

③ 莫里斯。实际生活质量指数。见：塞沃尔主编。美国和世界发展：1977 年议程。英文版，1977。147~154

续表

地区与国别	人均 GNP (1974 年) (美元)	预期寿命 指数	婴儿死亡率 (%)	识字率 (%)	PQLI
土耳其	750	57	119	51	54
沙特阿拉伯	2870	45	152	15	29
东南亚地区:					
斯里兰卡	130	68	45	81	83
印度	140	50	139	34	41
马来西亚	680	59	75	41	59
拉美—加勒比海地区:					
海地	170	50	150	10	31
玻利维亚	280	47	108	40	45
古巴	640	70	29	78	86
哥斯达黎加	840	69	45	89	87
委内瑞拉	1970	65	54	82	80
发达国家:					
瑞典	7240	75	9	99	100
美国	6670	71	17	99	96
前苏联	2660	70	28	100	94

实际生活质量指数简单明了,着重点是产出(即福利的直接量度)而不是投入(即诸如人均医生数、摄取的热量单位或入学时期等间接量度),因此不少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它可以作为 GNP 的补充以衡量经济发展,但也有人认为它还是有一些缺点:指数内涵过于狭窄,如就业、住房、收入以及社会和政治参预等重要指标都不包括在内;指数概念不够清楚,识字率似乎与物质生活质量无直接联系,而与环境卫生有重大关系的发病率又未得到反映;三个指标含义的轻重不同,却未得到适当加权;指数不能表现各个阶层的卫生健康的实际状况;等等。

总之,从上述几种衡量经济发展的非单一指标可以看出,这些综合指标有其优点。主要有二:①其中有许多项目都比产值和收入更能直接反映福利水平的高低,而福利的增进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②各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选择一套适当的发展指标,并给予适当的加权。但是,综合指标又有其局限性。主要是:一些指标的现有数据是不精确的;一些指标的概念是值得推敲的。

另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联系经济发展的目标来考虑经济发展的量度。他们考虑到,在经济发展中,工业的发展和农业的发展似乎不易兼顾,生产率的提高和就业量的提高也似乎势难两全,特别在较穷的国家更是如此。于是,他们提出,发展的目标应当是首

先保证基本需要，即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意改进卫生、营养和教育条件以直接对人力资源产生积极作用。同时，要注意采用减少浪费和改进现有技术效率的简易方法去提高生产率，而不要一味追求技术的迅猛变化。这种主张现称为“基本需要思路”（the Basic Needs Approach）或“基本需要战略”（the Basic Needs Strategy），按照国际劳工局（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ILO）局长布兰查德（Blanchard, Francis）的定义：

“（基本需要）是一个社会应当为最贫穷阶层规定的最低生活标准，满足基本需要意味着满足各个家庭对衣、食、住个人消费的最低需要，意味着可以获得清洁饮水、下水道卫生设施、运输、保健以及教育等方面必不可少的服务，意味着使一个能够工作并愿意工作的人得到适当报酬的工作，还意味着应当满足更具有质的规定性的需要：健康的、人道的和令人满意的环境以及对足以影响人民生活、生计和个人自由的决策的广泛参与。”<sup>①</sup>

主张基本需要战略的经济学者认为，不应有过多的、不恰当的结构变化和技术变化以及资本支出，应当以较好的基础设施（如防止水土流失、建立并改良小型灌溉系统、修筑道路桥梁等）来提高农业产出，还应当尽量利用本国和本地的资源和技术能力。必须满足的基本需要就是适当的衣食住条件、教育与卫生、基本人权、作为手段也作为目的的就业以及就业质量的改进，应当实现“伴随着分配的增长”，而不要等待“增长后再慢慢渗透”。

还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基本需要思路虽然重视基本福利，也着重考虑了穷国的特殊情况，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改革还是必要的，从这点出发，他们提出了所谓的“统一思路”（the United Approach），其中心思想是：在制订发展计划时，必须包括所有的投入——不只是资本、劳动和资源，还有科学研究、教育和营养，从而在相互作用的发展系统中的每一阶段，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的质量都得到改进<sup>②</sup>。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 HDI）以表示发展水平的高低。该指数综合了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以成人识字率表示）以及物质生活质量中的人均国民生产等指标，以后，每年都发表当年的《人类发展报告》。如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每年都有侧重点一样，1998年的《人类发展报告》突出了消费水平和结构对人类发展指数的影响。在这份报告中，把世界174个国家和地区分为三类：高度人类发展（high human development）、中度人类发展（medium human development）和低度人类发展（low human development）。

从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就三类发展水平选出部分国家和地区列表如1.3。

“人类发展指数”内涵比较丰富，统计方法比较细微，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有些发展经济学家指出：“像其他有关指数一样，人类发展指数有些主观随意，且反映了编制者的政治倾向。”<sup>③</sup>

① 国际劳工局. 就业、增长和基本需要：一个全球性问题. 英文版. 1977. 7

② 希金斯 B, 希金斯 J D. 一颗小行星的经济发展. 英文版. 1979. 170

③ 吉里斯, 波金斯等. 发展经济学. 第4版.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78

表 1.3 人类发展指数 (1998 年)

国家	预期 寿命 (1995 年)	成人识 字率(%) (1995 年)	总就业 人数比 (%) (1995 年)	实际人 均 GDP (以美元 计购买 力评价) (1995 年)	调整后的 实际人均 GDP(以 美元计购 买力评价) (1995 年)	预期生 命指数	教育 指数	GDP 指数	人类发 展指数 (HDI)
----	----------------------	--------------------------	-------------------------------	---	--	------------	----------	-----------	---------------------

高度人类发展

加拿大	79.1	99	100	21916	6230.98	0.9008	0.9933	0.987	0.960
美 国	76.4	99	96	26977	6259.29	0.8562	0.9800	0.922	0.943
法 国	78.0	99	89	21176	6229.37	0.8948	0.9567	0.987	0.946
日 本	79.9	99	78	21930	6231.00	0.9142	0.9200	0.987	0.940
瑞 典	78.4	99	82	19297	6223.42	0.8895	0.9333	0.986	0.936
英 国	76.8	99	86	19302	6223.44	0.8640	0.9467	0.986	0.932
澳大利亚	78.2	99	79	19632	6224.81	0.8860	0.9223	0.986	0.932
瑞 士	78.2	99	76	24881	6254.05	0.8870	0.9133	0.991	0.930
德 国	76.4	99	81	20370	6227.27	0.8572	0.9300	0.986	0.926
中国香港	79.0	92.2	67	22950	6232.88	0.9007	0.8379	0.987	0.909
新加坡	77.1	91.1	68	22604	6232.28	0.8687	0.8325	0.987	0.896
智 利	75.1	95.2	73	9930	6115.55	0.8355	0.8765	0.968	0.893
韩 国	71.7	98	83	11594	6139.72	0.7790	0.9298	0.972	0.894
委内瑞拉	72.3	91.1	67	8090	6081.66	0.7885	0.8290	0.963	0.860
波 兰	71.1	99	79	5442	5441.57	0.7683	0.9233	0.860	0.851
哥伦比亚	70.3	91.3	69	6347	6027.80	0.7557	0.8389	0.954	0.850
泰 国	69.5	93.8	55	7742	6073.72	0.7423	0.8098	0.962	0.838
巴 西	66.6	83.3	72	5928	5928.15	0.693	0.795	0.938	0.809

中度人类发展

保加利亚	71.2	98	66	4604	4604.4	0.7692	0.8733	0.725	0.789
------	------	----	----	------	--------	--------	--------	-------	-------



续表

国家	预期寿命 (1995年)	成人识字率(%) (1995年)	总就业人数比 (%) (1995年)	实际人均GDP (以美元计购买力评价) (1995年)	调整后的实际人均GDP(以美元计购买力评价) (1995年)	预期生命指数	教育指数	GDP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HDI)
沙特阿拉伯	70	63	57	8516	6090.51	0.7608	0.6093	0.964	0.778
俄罗斯	65.5	99	78	4531	4530.9	0.6745	0.92	0.713	0.769
突尼斯	68.7	66.7	69	5261	5260.75	0.729	0.6736	0.831	0.744
古巴	75.7	95.7	66	3100	3100	0.8448	0.8592	0.483	0.729
秘鲁	67.7	88.7	79	3940	3939.71	0.7117	0.8567	0.618	0.729
南非	64.1	81.8	81	4334	4334	0.6518	0.8169	0.682	0.717
斯里兰卡	72.5	90.2	67	3408	3408	0.7915	0.8252	0.533	0.716
印尼	64	83.8	62	3971	3970.96	0.6492	0.7661	0.623	0.679
菲律宾	67.4	94.6	80	2762	2762.09	0.7068	0.897	0.429	0.677
乌克兰	68.5	98	76	2361	2361.36	0.7247	0.9067	0.364	0.665
中国	69.2	81.5	64	2935	2934.93	0.7362	0.757	0.456	0.65
埃及	69.8	51.4	69	3829	3828.6	0.6637	0.5726	0.6	0.612

## 低度人类发展

加纳	57	64.5	44	2032	2032.45	0.5333	0.5755	0.311	0.473
肯尼亚	53.8	78.1	52	1488	1437.73	0.4805	0.6928	0.215	0.463
巴基斯坦	62.8	37.8	41	2209	2209.13	0.6295	0.3887	0.34	0.453
印度	61.6	52	55	1422	1421.99	0.6098	0.529	0.213	0.451
尼日利亚	51.4	57.1	49	1270	1269.8	0.4403	0.5457	0.188	0.391
孟加拉国	56.9	38.1	37	1282	1381.9	0.531	0.376	0.206	0.361
科特迪瓦	51.8	40.1	38	1731	1731.34	0.4472	0.3929	0.263	0.368
坦桑尼亚	50.6	67.8	33	636	636.18	0.4265	0.5615	0.086	0.358
埃塞俄比亚	48.7	35.5	20	455	454.85	0.395	0.3025	0.057	0.252

## 第二节 西方经济学说史中的经济发展思想

在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之前，西方经济学说史中已经发现有丰富的经济发展思想，经济发展思想是和资本主义同步出现的。奴隶制度和封建制度之下，生产力水平低下而又提高缓慢，在凝固的、静止的社会经济中，增长和发展不可能成为人们注意的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与成长，西方经济学家开始并越来越重视生产力水平如何提高、社会财富如何增进、国民经济如何改善等问题，这些问题归结到一点，就是生产日益社会化过程中的经济发展问题。他们或者积极地论证经济如何发展，或者消极地解释经济如何不发展，前一类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是亚当·斯密，后一类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是马尔萨斯。

### 一、重商主义

从15世纪末开始，西欧的封建社会趋于瓦解，自然经济衰落，商品经济兴起，在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关系开始萌芽和成长。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商业资本发挥了突出的作用。重商主义从商业资本的运动出发，提出了他们的财富观和增长观。

重商主义者的财富概念是极其狭隘的，在他们的心目中，金银货币成了社会财富的惟一代表。正如马克思所说，他们“坚持交换价值的坚实的、可以捉摸的和闪闪发光的形式，坚持它同一切特殊商品对立的一般商品的形式”。或如亚当·斯密所说：照重商主义者的说法，“财富与货币，无论从哪一点看来，都是同义语”<sup>①</sup>。

重商主义者把金银货币等同于社会财富的观点，决定了他们对国内商业和国外贸易的看法。他们认为，国内商业既不能从国外带回金银货币，也不能把金银货币带出国外。国内商业的盛衰可以间接影响国外贸易的状况，但决不能使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或贫困。他们对国外贸易的重要性则十分强调，把它置于理论和政策建议的中心地位。照他们看来，对外贸易是社会财富的惟一源泉，只有在对外贸易中保证做到商品输出大于商品输入，才能有更多的金银货币流入国内，从而才能不断地增加一国的国民财富，才能实现一国的经济增长，用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术语来说，重商主义者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增长的发动机”（the engine of growth）<sup>②</sup>。

因此，当代经济发展理论中以产出增长为发展物质动力的基本思想，在重商主义中是不见丝毫痕迹的。对这一点，一个西方经济学家说得比较中肯：“重商主义是集中于供给的经济学家……重商主义尽管全神贯注于供给，却不能生产它。”<sup>③</sup>应当指出的是，

<sup>①</sup>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商务印书馆，1972，2

<sup>②</sup> 罗伯逊（Roberston, D. H.）于1937年在他的著作《国际贸易的未来》第一次使用了这一术语，以后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广泛沿用。该文载于《国际贸易论丛》，1949年。

<sup>③</sup> 杜拉克，走向下一阶段的经济学，经济学译丛，1981（11）：65

重商主义倡导的保护幼年工业、限制输入、鼓励输出等政策措施，尽管在当时有其具体目的，却深深地影响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并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中得到再现。

## 二、威廉·配第

威廉·配第被称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事实上，他也是由重商主义向古典学派过渡时期的经济学家，在他的著作中也存在着不少重商主义的观点，例如，他十分重视商业和对外贸易，认为人口稀疏是贫困的真正原因，主张国家应合理地干预经济生活，等等。但是，配第在他的著作中，提出了一些有关经济增长的思想，如他认为：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财富的增长；财富的物质形式是劳动产品，价值形式是纯收入，财富的大小主要决定于劳动者人数的多少，因而，人口稀少是贫困的原因，增加人口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源泉是土地和劳动两个因素，“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国家应干预经济活动，利用税收政策来调节经济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配第关于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产业比重变动的看法。他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经济的发展，从事农业的人数比起从事工业的人数将相对地减少，从事工业的人数比起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又将相对地减少。

这一命题后来得到了费雪（Fisher, I.）的肯定，又得到克拉克（Clark, Colin）的进一步肯定，在发展经济学中称为“配第一克拉克命题”（Petty - Clark Thesis）或“配第一克拉克法则”（Petty - Clark Law），有时也叫做 Q “费雪—克拉克命题”（Fisher - Clark Thesis）。这个法则或命题正确地反映了社会经济进步过程中“产业软化”（softening of industries）的实际情况。

## 三、重农学派

重农学派尖锐批评重商主义者对社会财富及其来源的看法。重农学派认为，金银货币并非国民的真正财富，因为金银货币既不能提供消费，又不能不断再生产财富，货币的职能不过是作为流通手段，货币如果脱离流通过程，不和其他财富相交换，就甚至不能促进国家财富的经常再生产。重农学派也否认对外贸易是社会财富的源泉，因为照他们看来，对外贸易不过是以一定价值的产品去交换另一种相等价值的产品，交换双方无损失，也不得益。

重农学派认为，经济增长的惟一源泉是农业，社会财富就是从土地上生产出来的农产品，社会财富的增加可以保证人口的增长，人口和社会财富的增长反过来又使农业发达，商业兴旺，工业繁荣，又进一步促使社会财富不断地增长。这种循环周流、生生不息的经济增长观点，是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源头。

在当代经济发展理论中受到十分重视和普遍应用的投入—产出法（它可以显示各个部门的投入和产出以及社会总投入和产出，也可以显示影响发展过程的重要因素），显然是从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提出的经济表中吸取了思想营养。

#### 四、亚当·斯密

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亚当·斯密无疑是把经济增长问题作为论证中心、作为分析的总题目的第一位经济学家。他的巨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包括了社会学、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几个方面。在政治经济学部分，他从实际分工的交换、经济的基本结构关系，一直分析到国家经济职能和租税的准则。但是，正如书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论证的焦点始终是经济增长问题，始终是什么因素促成国民财富的增加或减少。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在斯密的巨著中系统阐述的理论就是发展经济学。例如，迈耶（Meier, G. M.）说：“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又是最新的经济学的一个分支。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开始，古典经济学家们就试图发现经济进步的根源并分析经济变化的长期过程。正如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刘易斯提醒我们的那样，亚当·斯密所谓的‘富裕的自然增进’，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发展经济学’。”<sup>①</sup>

斯密论证经济增长问题的思想是这样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宏观问题，它表现在社会财富或国民财富的增长上，因此，国民财富的性质和来源必须得到说明；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专业分工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是人口和资本的增加引起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数的增加，因此，人口、分工、资本必须重点分析；在一个封闭经济中，国民财富的增长要受到资源与技术条件的限制，但通过对外贸易可以利用外部条件促进增长，因此，研究经济增长问题必须研究经济政策；经济增长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长期看，一国的经济增长可能有多种前景，因此，不仅要注意增长现状，还应当研究增长的结果。

斯密所谓的“财富”，明显地具有“收入”或现代经济学通用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含义。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斯密最先提出了区别于总量生产概念的按人平均的产量的概念。他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这类产物或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来的物品，对消费者人数，或者有着大的比例，或者有着小的比例，所以一国国民所需要的一切必需品和便利品供给情况的好坏，视这一比例大小而定。”<sup>②</sup>这几句话，把按人平均生产总值的概念说得再明确不过了。斯密还进一步分析了影响按人平均生产总值的两个因素。他说：“无论就哪一国国民说，这一比例都要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究竟成什么比例。”<sup>③</sup>但是，斯密对国民财富涵义的限定不是划一的，有时指一国生产性劳动的年产物，有时指一国年产物减去维持资本费用后的纯收入，有时又指一国年生产的商品总量。

斯密认为，国民财富的增长决定于劳动生产率和从事劳动的人数，劳动者人数的增

① 迈耶，西尔斯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英文版。1984。1

②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1

③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1

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都会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显然，这两个条件都涉及人口的变动——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变动。人口数量的增加会引起劳动者数量的增加，从而会引起国民财富的增长，这一道理是自明的。值得注意的是，照斯密的看法，即使在生产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人数增加，特别在一个劳动现场中人数高度密集，必将引起分工，而分工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斯密还分析了教育对开发智力、提高人口质量的作用。他指出，一般人民所受的教育愈多，愈不受狂热和迷信影响，愈可以提高精神文明，更知礼节，更守秩序，更有利于“国泰民安”，从而为国民财富的增长提供更好的环境。斯密特别强调普通教育的效果，而且主张，为了普及初等教育，国家应当收费低廉，务使一个普通劳动者也负担得起，<sup>①</sup>同时，应当对人们必须受初等教育作出强制性的规定。斯密不仅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强调职前的普及初等教育，还特别指出职后教育的特殊意义。他说，由于分工越来越细，人们将在变得越来越单调的劳作中，消磨其智力，如不辅以职后教育和在职训练，劳动者的智力将趋于下降，而这是有害于国民经济增长的。

如果说，斯密论证人口增长对劳动数量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还只是着眼于经济的自然增长，那么，他还进一步从经济增长必须伴随着各个生产要素的适当配合的思路出发，分析了资本积累的增加对劳动数量增加和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起的作用。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以下的论点：首先，交换引起了分工，而交换的实现，仰赖于在某个地方储有各色各样的货物，足以维持生产者生活，并提供原材料和工具供其使用，从而需要一定的资财蓄积；其次，斯密认为，从事物的本性看，资财的蓄积，也必须在分工之前，预蓄的资财越丰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越细密，而分工越细密，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最后，斯密认为，生产技术得以进步，也必须预先有充分的资本积累。总之，斯密十分强调资本积累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最有影响的一章（第二篇的第三章：《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里），斯密对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作了极其明确的表述，他说：“增加一国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价值，只有两个方法，一为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一为增进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很明显，要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目，必先增加资本，增加维持生产性劳动者的基金。要增加同数受雇劳动者的生产力，惟有增加那些便利劳动、缩减劳动的机械和工具，或者把它们改良……无论怎样，都有增加资本的必要。要改良机器，少不了增加资本；要改良工作的分配，亦少不了增加资本。”<sup>①</sup>

斯密认为，对外贸易的出发点是从从事贸易双方的国家在某些特定商品的生产上各自占有绝对优势。他说：“在某些特定商品的生产上，某一国占有那么大的自然优势，以致全世界都认为，跟这种优势作斗争是枉然的……至于一国比另一国优越的地位，是固有的，或是后来获得的，在这方面，无关重要。只要甲国有此优势，乙国无此优势，乙国向甲国购买，总是比自己制造有利。”<sup>②</sup>

①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 商务印书馆, 1972. 315~316

②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下卷. 商务印书馆, 1972. 29~30

斯密从三个方面分析了对外贸易何以有利于经济增长。第一，从分工原理推论出：正如国内各生产部门内部和外部之间存在着专业分工，而分工的发展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一样，国际上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存在着专业分工，这种国际分工通过自由贸易也能促进各国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第二，在斯密看来，对外贸易可以使剩余产品实现其价值，从而鼓励人们去提高劳动生产力，努力增加其产量。结果，社会的真实财富与收入将有所增长。他说：“经营对外贸易的任何地方之间，毫不例外地都可从中得到两种不同的利益。那就是，输出他们所不需要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剩余部分，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物品。通过以剩余物品换取其他物品来满足他们一部分的需要并增加他们的享受，这种贸易使剩余产品有了价值。”<sup>①</sup>第三，斯密认为，对外贸易不仅促进生产，还增进消费者的利益，从而有利于国民经济的增长。他是在评论重商主义时提出这一论点的。在他看来，有一个自明的原理：消费是一切生产惟一的目的，而在重商主义影响之下，消费者的利益，几乎都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被牺牲了。他说：“对于凡是与本国产物和制造品竞争的一切外国商品，在输入时加以限制，就显然是为着生产者的利益而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了。为了前者的利益，后者不得不支付此种独占所增加的价格。”<sup>②</sup>基于这些认识，斯密成为贸易自由的热心鼓吹者和贸易限制的坚定反对者。他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曾就重商主义限制贸易的各种措施，逐条加以反驳，指出了它们有害于国民经济增长的种种弊端。

“自由放任”是斯密所主张的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他认为，要增加一国的财富，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给人们的经济活动以完全的、充分的自由。斯密的这种政策建议，无疑是植根于他的分工思想。在他看来，作为“人类所共有”、“人类所特有”的交换倾向而引起专业分工，只要社会政治开明，政府不加以干预，就会大大促进生产，加速经济增长，并造成普及到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的情况。斯密所主张的自由放任政策，还有一种论据：个人支配的资本，只要政府不加以干涉，就可以找到最有利的用途，从而就整个社会而言，资本也会得到最合理的配置。斯密说：“由于每个人都努力把他的资本尽可能用来支付国内产业，都努力管理国内产业，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高程度，他就必然竭力使社会的年收入尽量增大起来。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sup>③</sup>

斯密认为，经济增长的进程可能最后出现三种结果，即进步状态、退步状态和静止状态。进步状态的经济特征是：国民财富快速增长，从而劳动工资高，资本利润也高。斯密以当时的北美为例，说明处于进步状态的经济。退步状态的经济特征是：国民财富萎缩，从而劳动工资低，而资本利润高。斯密以当时的孟加拉为例说明处于退步状态的

①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下卷. 商务印书馆, 1972. 19

②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下卷. 商务印书馆, 1972. 227

③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下卷. 商务印书馆, 1972. 27

经济。静止状态经济的特征是：国民财富停滞不增，从而劳动工资低，资本利润也低。斯密以当时的中国为例，说明处于静止状态的经济。在斯密看来，增长的过程是一个不稳定的动态过程，从均衡状态开始，任何一个向上或向下的移动力量，都会引起连锁反应，循环变动。这种循环变动有没有限度呢？斯密的看法是，自然的上限是静止状态。

由上而对斯密的经济增长思想的概括，可以看出，他的中心论点是：什么是经济增长最基本的决定因素。斯密从处于发展中阶段的英国实际出发而提出的这一中心论点，为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纳克斯（Nurkse, R.）、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 P. A.）和罗斯托（Rostow, W. W.）等人特别强调资本积累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想法播下思想种子。在分析资本的作用时，斯密还说资本应该包括“所有居民的有用能力”。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他们习用的人力资本概念的起源。

## 五、李嘉图

人们熟知，李嘉图的经济理论不同于斯密的经济理论之处，在于他把研究重点从生产转向分配。尽管如此，李嘉图所探究的分配问题却是从历史进程的角度去观察的：各个生产要素的收益，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绝对量和相对量两方面发生变化，这就必然与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联系。从而李嘉图在十分强调分配问题的重要性时，又不得不重视生产在实际价值上的增减。他说：“我们集中注意力研究的重大问题是谷物、劳动力和有实际价值的商品。”在这个意义上，正如马克思所说，李嘉图“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句话的含义是，李嘉图是从生产的变动中去观察分配问题的。他甚至把社会发展单纯地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序言中，一开头就明白地说出：“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中，全部土地产品在地租、利润和工资名义下分配给各个阶级的比例是极不相同的，这主要取决于土壤的实际肥力、资本积累和人口状况以及农业上运用的技术、智巧和工具。”<sup>①</sup>可见，李嘉图的理论决未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问题，相反，是对它作过多方面分析的。这可以概括为下述几点。

关于国民财富的增加。李嘉图认为，国民财富的增加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是用更多的收入来维持生产性劳动——这不仅可以增加产品的数量，还可以增加其价值；另一种是不增加任何劳动数量，而使等量劳动的生产效率增大——这会增加产品的数量，但不会增加其价值。在第一种情况下，国家不仅变得更富足，而且其财富的价值也会增加。这种财富的增值是由于节约，并将这种节约的收入用于再生产而得到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可以不必减少支出，也不必增加被使用的生产性劳动的数量，但用等量劳动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产品，财富将会增加，而其价值却不会增加。可见，李嘉图对经济增长的看法和斯密基本一致。他们都认为：经济增长表现为社会财富的增长，也都认为，社会财富的增长取决于劳动数量的扩大和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但李嘉图特别强调社会财富的物质形式和价值形式的区别。

关于报酬渐减规律对经济增长的约束作用。李嘉图认为，由于土地数量有限而质量

<sup>①</sup>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3

有异，农业生产的报酬是渐减的，而这将会对国民经济增长起约束作用。他说，生产技术的进步，可能抵消或延缓报酬的渐减，这种情况在工业生产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就农业而言，技术的进步只能短期地、间歇地提高生产。但在长期中不能扭转报酬渐减的趋势。生产发展的长期趋势是：工业生产的报酬渐增，农业生产的报酬渐减。那么，把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总计起来，是报酬渐增趋势还是报酬渐减趋势占上风呢？李嘉图的回答是：在所有的土地都被耕种之后，农业的报酬渐减趋势，将压倒工业的报酬渐增趋势。结果，从某一个历史阶段起，经济增长将逐渐放慢，而且越来越慢。

关于资本积累、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和斯密一样，李嘉图认为，资本积累的扩大是使国民财富增长的根本原因。当人口对生活资料产生压力时，补救的方法不是减少人口，就是迅速地累积资本。在一切肥沃土地都已投入耕种的富庶国家中，迅速累积资本的补救办法，不会有很多好处，也不大实际可行，因为这种办法如果一直推行下去，会使所有的阶级陷于同样的贫困状态中。而在由于有肥沃土地尚未投入耕种，因而还有丰富的生产资料的贫穷国家中，迅速扩大资本积累是惟一安全而有效的补救办法，因为这种办法将提高社会各阶级的生活水平。

关于国内经济政策和对外贸易政策与经济增长。尽管所处的时代有所不同，但李嘉图和斯密一样，在国内经济政策方面，主张实行自由放任。在对外贸易政策方面，主张实行贸易自由。在他看来，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是违反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例如，只有给资本流动以最大的自由，不作任何干涉，资本才可以按照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作出配置。又例如，工资也像其他契约一样，应当由市场上公平而自由的竞争决定，而决不当用立法机关的干涉加以管制。关于对外贸易自由问题，李嘉图不仅以影响深远的比较成本说分析了对外贸易的基础，还根据自己的理论体系多方面论证贸易自由给一国带来的利益。首先，他认为不受干涉的贸易自由，不仅使一国，而且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最有利于本国的配置，从而有利于整个世界。其次，根据他力图证明的“工资不跌落，利润率就决不会提高”的理论，他认为，对外贸易扩大，劳动者的食物和必需品就可以按较低的价格送上市场，从而使劳动的自然价格下降，使工资持久地跌落。于是，利润率将相对提高，利润率的提高有利于资本积累的扩大，从而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

关于经济增长的前景。李嘉图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资本积累的扩大，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因此，除非技术有所进步，经济增长将逐渐减速，最后转为经济停滞，社会将进入静止状态。如果和斯密对经济增长前景的看法相比较，可以看出，斯密所谓的静止状态的形成，取决于各种因素如地理环境、自然资源、人口状况等，斯密在以当时的中国作为静止状态社会的例证时，又把中国的财富已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作为一种理由，而突出了制度因素，斯密对所在的英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持乐观态度。李嘉图则把报酬渐减规律视为约束经济增长的自然法则，从而得出利润率必然下降，经济增长必然停滞、社会静止状态必然出现的结论。总的说来，他的调子是悲观的、忧郁的。

当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们，按照他们的理解，认为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



表的英国古典学派的经济思想有其不足之处，例如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典学派未能预见非殖民化的进程、国际贸易总量和格局的变化等。古典学派还低估了技术进步的影响，夸大了“报酬渐减规律”的作用。另一方面他们又十分肯定古典学派经济思想对他们的启示，在他们看来，古典学派提出过的有关经济发展的八个问题，仍然是当代发展经济学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是：①决定人口增长的因素和人口增长与粮食供应的比例；②在一个增长的经济中，作为城市粮食供给来源地和工业产品市场的农业部门的地位；③部门间贸易条件的重要性和贸易条件趋于对农业有利从而窒息工业发展的可能性；④制约生产要素相对价格和国民收入职能分配的长期趋势的力量；⑤利润转化为投资对资本积累的决定性作用；⑥资本如何在各个部门间作到最优配置；⑦国际贸易对国内经济增长的贡献；⑧经济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 六、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已为人所熟知，这里不需赘述。但应当指出两点：第一，马尔萨斯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看法有两个层次。首先，他与亚当·斯密一样，认为增长的人口是经济繁荣的一种表现或结果。他说：“增长的人口是一国幸福和繁荣的最确定的可能表现；但实际人口也许仅仅是过去了的幸福的表现。”<sup>①</sup>其次，继续增长的人口是经济发展的重大约束条件。第二，按照马歇尔（Marshall, A.）的解释，马尔萨斯所说的生活资料以算术比率增加的真意，是指农业生产的报酬渐减现象，马歇尔说：“他说到生产能以算术比例增加，就成为习惯了，许多作家认为他着重这句话的本身，其实这不过是他说明他认为任何有理性的人都能要求他承认的极端之一个简捷的方法而已。如以现代的话来说，他的意思就是：他的论断中所始终采用的报酬递减倾向，在英国的生产物加倍之后，就开始充分发挥作用了。加倍的劳动也许会产生加倍的生产物，但四倍的劳动不会使生产物增加三倍，八倍的劳动不会使生产物增加四倍。”<sup>②</sup>

马尔萨斯还提出了由于消费不足而引起经济停滞的理论。

## 七、约·斯·穆勒

穆勒的经济理论是斯密和李嘉图的学说以及萨伊与马尔萨斯、西尼尔等人的学说的系统综合，但是，他对经济增长问题，作了一些特殊论证。在他的代表作1848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应用》的第四章和第五章中，他集中分析了经济增长对投入要素价格的影响。他把人口增长、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逐个地作为变化条件来观察对投入要素价格升降所起的作用，这是当代经济发展理论常用的分析方法。

穆勒也探索了静止状态的问题，但他所谓的静止状态具有不同的含义。照他看来，当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把经济增长推向高水平阶段时，由于人口增长的约束，经济出现了静止状态。因此，他的静止状态的概念含有乐观的、欢快的色彩，这可能是由于19

① 罗宾斯. 经济思想史中的经济发展理论. 英文版. 1986. 24

②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 上卷. 商务印书馆, 1983. 199

世纪中叶英国经济一度有持续增长的缘故。在上述著作第四章中，穆勒明白地指出，一个高发展水平的静止状态，比任何其他状态令人高兴。他还提出一种观点：为了追求发展，人们互相倾轧，纸醉金迷，是不符合“道德规范和政治哲学”的，这种观点同当代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反增长论”的一些看法相似。

## 八、“静态的插曲”

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从19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一段长时期中，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几乎在西方经济思潮的主流中完全消失了，如他们当中一个人所说：“经济思潮的主流出现了一种明显的转变，即由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把经济进步视为由累积力量形成的动态模式的看法，转变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既定资源的静态配置的特别关心。”<sup>①</sup>这种情况的出现，被称为“静态的插曲”（the Static Interlude）。

如何划定这一时期的上限和下限？有人主张，上自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应用》出版的1848年，下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sup>②</sup>。也有人主张，上自杰文斯（Jevons, W. S.）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的1871年，下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sup>③</sup>。

这一“插曲”的出现，其原因据说是：在这一长时期中，只有日本是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和迅速发展的惟一非西方国家，但日本的增长和发展状况还没有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体系的框架中作出分析研究；亚非两洲的广大地区还处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地位，谈不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拉美国家虽然政治上是独立的，但经济上还是西欧和美国的附属国，也不可能出现现代经济增长；英、法、德、美几个已臻发达的国家的经济成功已得到保证，如现代经济增长的实现、实际工资大大超过了糊口水平并继续上升、技术进步和资源开发超过了人口增长速度，等等，从而不再恐惧古典学派经济学家预言的静止状态的到来，转而注意周期波动、分配不均、市场垄断和市场失误以及这些国家之间的贸易与货币关系等短期问题。

在这一时期中，价值理论、分配理论和资源配置理论，在经济思潮中成为主流。经济行为被看成为取舍抉择之间的推理活动，价格是最优的取舍抉择系数，因为它反映着商品之间的交换比率，消费者谋求最大的满足，生产者谋求最低的成本。经济学家研究的是理性的经济行为，分析的中心点是各种可能的最优安排，而不是一国经济如何在不断扩大的范围中取得不断变化的最优结果。是特定的生产行业定向“均衡”位置的运动，而不是整个经济的总产出的运动。经济学家的目标是如何“绷紧”（tightenup）经济和如何避免低效率，而不是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如何实现经济发展。

但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在这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理论从主流经济学消失了

① 迈耶. 摆脱贫困——真正重要的经济学. 英文版. 1984. 125~126

② 如刘易斯在1955年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的导言中说：“此类书籍之所以似属必要，是因为增长理论再一次引起了全世界的兴趣，是因为差不多一百年在这门学科方面没有发表过全面的论文。在这一长期间隔中，最后一本伟大著作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见该书第5页）。又如雷诺兹，见他的著作《经济发展的理想与现实》，1977年英文版，第一篇，第二节。

③ 迈耶. 摆脱贫困——真正重要的经济学. 英文版. 1984. 125~127

的一整个世纪之中，有两位经济学家是例外，他们是马歇尔和熊彼得（Schumpeter, J. A.）。

马歇尔的学说是西方经济学的第二次系统综合，从而对经济发展问题不免有所论述。他不只注意到现实资源的配置，还注意到资本积累的来源和劳动的数量与质量。他还认为工业方面的报酬渐增趋势会压倒农业方面的报酬渐减趋势，从而不会出现对经济增长的障碍。马歇尔十分强调通过教育以开发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他认为，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是否明智，不能单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有利的。他形象地说：“依靠这个手段（指教育投资——引者注），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因为，像白塞麦的主要发明那样的一种新思想所能增加英国的生产力，等于十万人的劳动那样多。”<sup>①</sup>马歇尔对经济发展理论影响最大的是对发展过程的基本看法：经济发展是渐进的、和谐的和经济利益逐步分润到社会整体的过程。这一看法成为新古典学派经济发展理论的重要观点。

熊彼得把经济发展看成是对现存经济关系的格局（即他所谓的静态的循环周流）的一种突破。突破力量来自企业家的“创新”。“创新”的间歇出现引起经济的周期波动，也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发展。他认为“创新”是一种“内在的因素”，从而经济发展也是来自内部自身创造的一种变动。可见，他比较强调发展的内因作用。应当指出：熊彼得的经济发展理论是以具有发达金融体系的工业化国家而不是以金融市场不完善的发展中国家为背景的。

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在提到马歇尔和熊彼得两人时，也把马克思作为不属于他们所谓的主流经济学体系的“持不同意见者”（dissenter）而提到了他对经济发展理论的贡献。我们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包含着丰富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马克思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论证，表明了他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一般看法。他对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积累问题的考察，不仅剖析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规律，也有助于对其他社会经济形态经济增长过程的理解。例如，马克思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再生产运动从社会总产品开始，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规律性也必须以社会总产品为出发点。又例如，社会再生产的正常运行要求社会总产品的正常实现，即产品不仅在价值形式上得到补偿，而且也在物质形式上得到补偿。这一条件，社会主义的社会再生产如要正常运行，也必须得到满足。我们知道，经济增长还涉及资源配置问题。马克思在分析级差地租时，曾以资本投入量的追加来观察超额生产率的变化，从而求得资本投入的经济界限。这种分析方法，也可以用来说明一切稀缺资源的配置和利用的经济界限。由此可见，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更好地认识它的广度和深度。

必须指出，在西方经济学说史中，观点和方法与主流经济学颇不相同的是历史学

<sup>①</sup>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233

派，它是 19 世纪 40 年代在德国产生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属于这个学派的德国经济学家的理论中包含有不少值得注意的经济发展思想。19 世纪上半叶的德国，比起英法两国，经济上是相对落后的，它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德国的国情和国际环境出发，以李斯特（List, F.）为代表的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提出了以下的一些看法：①古典经济学和以后英、法经济学家的理论，具有“世界主义”的根本缺陷，它们不注意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与之相反，李斯特主张的经济学是“国民经济学”，它所研究的是一个国家如何根据国内外的条件和形势去改进其经济状况。②十分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性。李斯特说：“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教导的，并不只是交换价值怎样由个人来生产，怎样在个人之间进行分配，怎样被个人所消费……作为一个政治家，此外还首先应当并且必须懂得，怎样才能激发、增长并保护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他还须懂得这种生产力在怎样的情况下就会趋于衰退，处于睡眠状态或被完全摧毁；怎样依靠了国家的生产力，就可以在完善的方式下来利用国家资源，从而争取国家的生存、独立、繁荣、权力、文化与远大前途。”③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一般都提出各自的经济发展阶段论，如李斯特认为国家都必须经过原始未开化时期、畜牧时期、农业时期、农工业时期和农工商时期。罗雪尔（Roscher, W. G.）认为国民经济要经过四个发展阶段，即幼年期、青年期（开花期）、成年期（成熟期）和老年期（衰老期）。施穆勒（Schmoller, Gustav Von）把社会经济过程分为六个阶段，即种族或马克公社、村落经济、庄园经济、都市经济、领域经济和国民经济。④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一般反对自由放任政策，而主张国家干预和实行保护政策，如李斯特就明确指出：“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惟一方法。”⑤但李斯特又注意到实行保护制度要有步骤，认为不能完全排除国外竞争，以免与世界经济完全脱离而出现锁国状态。

综上所述，自资本主义萌芽和成长以来，随着社会化大生产日益开展，已有 5 个世纪之久，不同派别的西方经济学家们，曾根据他们所处的国内外环境，或比较深刻地或比较浮面地观察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并在各自的学说中，或比较系统地或比较零碎地阐述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尽管把这些思想汇总起来，还远不能形成一门学科，而且其中不少论点或由于科学性不足而站不住脚，或由于历史条件不同面已过时。但是，也应当看到，有不少论点并非谬误，至今还切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而且对当代发展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形成发生了影响。例如，通过利润再投资而实现资本积累和扩大生产，是著名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的“无限剩余的劳动供给”二元结构发展模式的基本论点，据刘易斯自称，他的这个论点是亚当·斯密以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思想的“再生和发展”。又例如，以写成《人力资本》而驰名的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 G. S.）认为早期的斯密、穆勒和马歇尔对人力投资作出了重要而有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并把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中讲的一句话：“所有资本中最有价值的是对

① 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商务印书馆, 1983. 298

② 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商务印书馆, 1983. 298

人本身的投资”，作为他的著作第一编的题下名言<sup>①</sup>。再例如，马尔萨斯把人口增长视为经济增长的重大约束条件的思想，对当代经济发展理论中的“增长限制理论”有很深的影响<sup>②</sup>。

### 第三节 发展经济学的兴起和演变

#### 一、发展经济学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由于战后经济重建问题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促使了三种早期关于发展问题著作的发表，即斯塔利（Staley, E.）的《世界经济发展》、曼德尔鲍姆（Mandelbaum, K.）的《落后地区的工业化》和罗森斯坦-罗丹的《东南欧工业化问题》。

斯塔利认为，战后世界许多地区必将急需经济的快速发展。他探究了其他地区的发展对先进工业国可能产生的经济影响，特别是以发展为目的的投资和生产、消费和贸易等变化的影响。

曼德尔鲍姆提出了人口过多而又落后的东欧和东南欧地区工业化的数量模式。他认为，这一地区经济不发达，其原因是缺少工业化。工业化的缺少迫使日益增多的人口进入城市和农村生产力极低的行业。人口压力、贫困和工业薄弱，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种恶性循环决不局限于东南欧一隅，也出现在其他欧洲国家，而在亚洲最为明显。人口稠密而工业化不足的落后国家的常见经济病像是“大规模的农村伪装失业”。使就业不能扩大的是需求不足和资本稀缺。克服这些障碍，国家的干预是必要的。国家通过重新分配的措施，可以提高“必要的消费”从而减轻贫困，也可以建立一种强迫国家储蓄的体制以支持较高速度的资本形成。

罗森斯坦-罗丹自认为他在1943年那篇论文中提出了四点创见<sup>③</sup>。第一点是论证了“过剩农业人口”，即伪装失业的问题，过剩农业人口的存在，虽然是经济上的一个弱点，但也可能成为推动发展的力量。第二点是提出了“货币性外在经济（pecuniary external economy）”的概念。这种外在经济能带来规模经济即递增收益。为了获得这种收益，必须在几个互为补充的工业部门同时实行有计划的工业化。第三点是强调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在消费品工业建立之前必须大规模地筹集大量的、不可分割的社会分摊资本，即建立起基础设施，而单靠私人市场的积极性是不能及时地做到这一点的。社会分摊资本通常在总投资中占30%~35%，它的产生必须通过倡议、计划或规划等步骤。第四点是强调了“技术性外在经济”（technological external economy）的作用。“在奴隶制

① 贝克尔，人力资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5

② 卡恩，世界经济发展——1979年及以后的展望，英文版，1979，367

③ 迈耶，西尔斯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英文版，1984，208~209

下，奴隶主不得不在奴隶的训练上投资，因为技术上的长进能使奴隶主获利。奴隶制废除后，受过训练的工人可以和不必承担训练费用的其他雇主订合同，任何人对工人训练投资都将冒不能得到提高了的生产率所带来利益的风险。”<sup>①</sup>因此，在竞争性的市场条件下，工人的教育和训练会低于最适度水平，而不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训练、在职训练和人力资本形成为基础的，因此工业化的进程不能仰赖市场机制，而必须依靠计划安排。总之，在1943年的论文中，罗森斯坦-罗丹的结论是：“在一个国家内或国家之间，市场机制并没有实现‘最适度’，因为市场机制依赖于一些不现实的假设，如生产函数是线性齐次，不存在递增收益或规模经济或集团经济，不存在最小量或限度等。”<sup>②</sup>

可以看出，在1943年~1947年期间发表的上述三种著作，虽然开始涉及了经济发展问题，但论证还很不系统、很不全面，还远远没有形成发展经济学。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学家居里（Currie, L.）的回忆，他在1949年率领一个世界银行国别考察代表团去哥伦比亚时，他还不知道发展经济学这个名词。他说：“这样一种代表团是没有先例的，也确实还没有发展经济学这一称呼。我简直认为，那不过是把各种分支经济学应用到一个特定国家的实例，从而我就招募了一组财政学、外汇、运输、农业等方面的专家。”<sup>③</sup>

1950年前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殖民地体系迅速瓦解，形成了发展中国家。摆在这些国家面前的迫切问题是：如何谋求经济发展？什么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什么是限制经济发展的因素？如何制定发扬这些动力、排除这些因素的政策？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可能是非常简单的。正如一个发展经济学家所说，政治独立可以立法，而经济独立则不能，民族主义可以强化加速经济改造的要求，但其进程却不能凭一厢情愿<sup>④</sup>。发展中国家要求经济学家们对它们面临的迫切问题作出专业性的解答。

西方经济学界对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经济曾经作过研究，但他们的立场是维护西方国家的利益。他们把世界看成是静止的，认为殖民地经济的主要目标是稳定。他们的理论往往是辩护性的，企图开脱殖民体系对不发达情况所承担的责任，即使后来也主张殖民地不能不有一点技术进步，也不过是怕殖民地因过于落后而引起动乱，从而有丧失投资和进入市场机会与失去原料来源地的危险。有些以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为己任的西方经济学家，往往鄙视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例如，在西方经济学界堪称一代宗师的凯恩斯，在战后一次重要国际经济会议——布雷顿森林会议中，认为被邀请的21个发展中国家“显然作不出什么贡献而不过充斥会场而已”。而且由于这些国家的参加，会议变成了“一所多年来结集在一起的最大猴舍”<sup>⑤</sup>。

鄙视和蔑视发展中国家的态度毕竟阻挡不了它们经济上逐渐有所进步。因此，越来

---

① 迈耶，西尔斯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英文版。1984。209

② 迈耶，西尔斯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英文版。1984。209

③ 居里。发展的障碍。英文版。30~31

④ 迈耶，西尔斯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英文版。1984。6

⑤ 莫格里奇主编。凯恩斯全集。第26卷。英文版。1980。42

越多的西方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发生了兴趣，他们以习用的理论为骨架，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变动，一时，发展经济学成为热门而进入大学经济系的课程表。对这种情况，美国一位发展经济学家说得比较清楚：“以1945年~1960年这段时期为高峰的非殖民化运动重新激发了对发展经济学的兴趣。许许多多的新的独立国家和拉丁美洲比较古老的国家发现它们自己处于以追求国民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形势之下。富国出于人道主义的关心、出口鼓励的利益以及大国势力的角逐，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发生了兴趣……国内和国际代理人期待经济学家们作出政策分析。由于不发达国家缺少经济学家，感受到这种冲击的是欧洲和北美。对于经济学家来说，这不仅使之高兴，也使之为难，因为他们差不多已好几代没有认真考虑过经济发展问题。这样，数以百计的迄今还只是国内问题专家的经济学者改弦更张，以发展经济学家的名义而出现，成千的比他们前辈对政策问题更为敏感的人为了把自己训练成为‘第二代’发展问题专家而拥入大学和研究院的课堂。”<sup>①</sup>

50年代和60年代中相继出现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的倾向性不是一致的。有的显露出殖民经济学的痕迹，有的比较客观地进行实证性的分析，有的偏于论证经济发展过程的矛盾冲突，有的侧重说明经济发展过程的平稳和谐，有的注意观察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的统一；有的着重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利益的差异。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发展经济学家，从民族利害关系出发分析问题，是他们的理论的明显倾向性。由此种种差异，形成了发展经济学中的不同流派。

总之，发展经济学是世界历史一个特定阶段（殖民体系瓦解，出现了发展中国家）中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新经济学科。

## 二、发展经济学的演变

发展经济学的演变，明显地分为三个阶段，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6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为第二阶段，80年代以后为第三阶段。

### （一）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特点

在第一阶段，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经济的问题，曾有三种主要看法：①强调物质资本积累的重要性与必要性；②强调工业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③强调计划化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由于对这三方面十分强调，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论点，后来被称为“唯资本论”或“资本第一主义”（Capital Fundamentalism）、“唯工业化论”或“工业化第一主义”（Industrialization Fundamentalism）和“唯计划论”或“计划第一主义”（Planning Fundamentalism）。

在形成发展中国家的初期，一般重视物质资本的积累、工业化和计划化，是很自然的。

首先，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说，生产投入要素有三：自然条件、劳动力和资本。所谓

<sup>①</sup> 雷诺兹：经济发展的理想和现实，英文版，1977，34

的资本，指以机器、设备或可投资金为主的物质资本。自然资源的丰歉，会给经济增长造成有利的或不利的条件，但并不能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的作用，历史经验已证明如此。劳动力是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充裕的投入要素，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因此，物质资本的多寡及其形成的快慢，是发展中国家促进或束缚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物质资本的匮乏，发展中国家在总供给和总需求两个方面，都存在着“恶性循环”，以致国民经济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而不能自拔。为此，必须在投资努力上“大推进”，求得“平衡增长”。这一时期，一个著名的经济模式，为“唯资本论”（或“资本第一主义”）提供了论证基础，即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Harrod - Domar Growth Model）。这个模式从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出发，认为为了维持某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必须以投资的扩大提高有效需求，但是，在一个时期足以维持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将不足以保证下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因为，前一时期由于投资扩大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将在下一时期提供比前一时期更多的产出，从而，为了维持下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就必须进一步扩大投资以增加有效需求。这样，由于投资率年复一年地扩大，产出将年复一年地增长，反过来，要使产出年复一年地增长，投资必须年复一年地扩大，由此，哈罗德—多马模式得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其次，谋求工业化是新起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遍愿望，也体现了经济上摆脱依附、实现独立的民族感情。人们把工业化看成减少进口、减轻外汇约束并积极地扩大外汇储备以增加进一步促进工业生产所需的生产资料和进一步提高国内生活水平所需的消费品和劳务的必由之路。人们也把工业化看成是吸收农业剩余劳动力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惟一途径。为发展中国家实行工业化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提供理论根据的是有名的刘易斯二元结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认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工业资本积累和扩大的源泉，并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无限剩余劳动供给等概念。

再次，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计划化的重要根据是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不完全性。持不同论点的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无论在结构上还是在功能上都是不完全的，产品和生产要素的市场缺少良好的组织，市场信息不能及时而正确地反映产品、劳务和资源的真实成本，由此引起了在可供选择的投资项目上社会评估与私人评估的歧异。如果政府不干预，不对国民经济实行计划化，就会使现存的资源和未来的资源得不到有效的配置，不能符合长期的最大利益。不难看出，强调计划化，强调国家干预，也是强调资本积累和强调工业化逻辑上的必然推论，因为加速资本积累和调节工业布局和进程，不能寄希望于私营部门的自发活动，而要依赖国家和公营部门的干预、调节和计划安排。在一些特殊理论中，如大推进论、平衡增长论，甚至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式，也都包含着计划化和国家干预的思想。同时，50年代中，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著名的荷兰经济学家廷伯根（Tinbergen, J.）对经济规划的数理研究和经济分析，无疑对计划化思想和主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廷伯根认为，经济计划和经济政策可以用一种把正确的经济理论和来自实践的经验数据结合起来的形式表现出来。计划的主体应当以一种理论结构模式为基础，它应当含有数量指标和量化的政策工具，其基本形式为一套方程或把重要变



量和理论框架连接起来的一系列技术的、行为的或制度的约束条件。

如果把上述三个侧重点综合起来，这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具有下述的一些特点。

### 1. 结构主义的影响

结构主义者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具有结构上的特点，如刚性、滞后、短缺、过剩、低供求弹性等。这些特点规定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也不同于十八九世纪处于发展中阶段的西方国家当时的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使价格机制和市场调节的均衡作用不可能实现，相反，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却是非均衡现象，即某些市场中求过于供，某些市场中又供过于求。结构的特殊性也使经济增长的利益不易普及到广大的人群，从而造成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因此，结构主义者认为，应当以动态的观点，从互相联系的因果关系中，去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不应当完全寄希望于市场调节，而应当发挥国家干预的作用，进行结构改革，有计划地对资本积累和工业建设作出安排。

### 2. 反单一经济学传统的倾向

在发展经济学兴起之前，西方经济学虽然已发生了所谓的“凯恩斯革命”，但新古典主义的潮流并未退去。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自认为他们的理论是无所不包的体系，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准则，因而主张只存在单一经济学（*monoeconomics*）。50年代的发展经济学家强烈地反对这种看法。例如，提出大推进理论的罗森斯坦-罗丹就指出：不可分性、互补性、外在经济和经济规模等概念，比起对发达工业国家，更切合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传统的、统一的理论已远远背离发展中国家的现实。为此，当时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凯恩斯“突破”新古典主义的充分就业均衡模式而建立起非充分就业均衡模式的作法，表示十分欣赏。因为，第一，凯恩斯摆脱了传统的、统一的理论的束缚，为发展经济学家作出了榜样；第二，尽管凯恩斯学说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的，但其宏观分析模式可以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而且凯恩斯学说特别关注就业问题，从而启发了发展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不得其用的现象的深入探索。

3. 自认为经济发展理论是“宏大的理论”（*grand theory*），这些理论连同以此为根据的政策建议，可以适用于一切发展中国家

例如，以《非共产党宣言》为副标题的《经济增长阶段论》的作者罗斯托，曾不讳言地把他提出的理论说成是体现了归纳现代史的方法，足以代替马克思的五种社会形态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条件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和大规模高消费阶段（在以后的著作中又加上了第六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所谓“起飞”，按照罗斯托的解释，意味着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工业高度发达的社会的一个突破，为了实现这个突破，需要每年把国民收入的10%以上用于储蓄和投资。罗斯托的理论曾喧嚣一时，被一些人视为经济发展过程的一般理论。其他，如贫困恶性循环论、大推进论、平衡增长论，一些人也对它们抱同样看法。

### 4. 内向发展战略倾向

50年代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一般不支持比较成本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理由是，比较成本理论是静态理论，所关心的是来自贸易的直接的静态利益，不重视国内工业化所产生的间接的动态利益，没有注意到工业化可以提高人们的技能，并促进经济各个部分的联结，从而形成外在经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还从发展模式推论出保护政策的必要性。例如，刘易斯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式是以劳动市场扭曲概念为基础的，从而引申出一种论点：由于农业中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其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甚至为负数，现代化工业部门雇佣这些剩余劳动力时，所付出的工资就高于其社会机会成本，因此，现代化工业部门应当受到适当的保护。还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如纳克斯提出一种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情况已完全不同于19世纪，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国际贸易不再具有“增长的发动机”的功能，而只有立足于国内工农业平衡增长的进口替代政策中，才能找到另外一种“增长的发动机”。由于50年代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政策贬低对外贸易对国民经济的能动作用，有人说，它们含有“出口悲观主义”（export pessimism）的色彩。

#### 5. 反新古典主义的基调

50年代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一般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静态的，只适用于既定资源的配置，而经济发展问题是动态的问题，它涉及的问题主要是通过储蓄率和投资率的逐渐增长，而得到可投资资源（investible resources）供给的逐渐增长。也就是说，它涉及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摆脱贫困、转为富裕。而新古典经济学是不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的。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思路是通过边际调节和市场修补以达到经济均衡，而边际调节和市场修补是不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从贫困的陷阱中脱身出来，走上增长和发展的道路的。另一方面，新古典主义所假设的经济体系是具有韧性的，它可以按照价格的变化而作出灵活的反应，但这种假设不切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中国家存在着结构刚性，一是社会的刚性（sociological rigidities），如采用传统方法进行生产的小农对经济刺激具有无理性和无反应性；二是技术的刚性（technological rigidities），即在现代工业部门中技术上缺少要素之间（如资本和劳动之间）互相替代的灵活性。

#### （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的演变

60年代初期，特别是60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经济出现了和第一阶段经济发展理论所设想的结果不相一致的情况。按照那些理论而作出决策的发展中国家并未达到预期的经济目标，奉行国内工业化和进口替代政策、实行经济计划化和政府多方干预的结果是经济上遭遇着种种困难。进口替代经过较为宽松的初始阶段之后，便出现了国际支付差的赤字和国内通货膨胀，外汇的短缺和国内市场狭小使进口替代由耐用消费品转向资本品的预想成为泡影。与此相反，那些经济比较开放、注意发挥市场作用、执行出口导向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却在经济上取得比较快速的进步。这类发展中国家，一般地说，至少稳步地扩大了初级产品的出口，从而增加了外汇储备。而带头转向出口鼓励的东南亚几个国家和地区，更在扩大劳动密集制造品出口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并带来了经济的普遍繁荣。以东南亚地区而言，尽管要素禀赋和出口产品范围在几个国家中颇为相似，经济较为外向的国家如马来西亚和泰国，在60年代中期，就比经济较为内向的緬

甸和当时的印尼，取得了较大的经济成就。和“出口悲观主义”相反，世界贸易额以空前的速度不断增长，从而也提高了对发展中国家各类出口产品（包括初级产品和劳动密集制造的制品）的需求。

而对这些情况，发展经济学家不得不对 50 年代以来的理论和政策重新评价，在许多方面作出重大修正和转变。

### 1. 对经济计划化的得与失重新评估

不少的发展中国家曾相继地实行计划化，作为发展计划制订的方法，宏观经济模式、部门经济模式、以投入—产出矩阵为基础的跨部门模式以及线性规划模式风行一时。然而，经济计划化的结果却令人失望。计划工作实际存在着许多缺点。例如，过于重视宏观模式和宏观计划而相对忽视项目评估、刺激与反馈以及群众参与等微观考虑；过于重视数量指标而相对忽视难以量化但意义重大的因素；过于重视计划的制订而相对忽视计划的执行；过于重视城市的发展而相对忽视乡村的建设；等等。

### 2. 重新对市场作用做出评估

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家偏重于强调发展中国家市场的不完全性，轻视价格—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采取集中的、周密的计划管理就可以使国民经济顺利地、合理地运转。60 年代以后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上述看法是有片而性的。他们说，价格—市场具有三大优点：一是有助于有效地配置资源并提供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二是一种有效的管理工具，可用来完成政策目标并避免直接控制下出现的低效率和腐化；三是可以提供广泛的信息而花费不高。如果不发挥价格—市场机制的作用，夸大价格扭曲和市场失误，必将出现“政策引致的扭曲”（policy-inducing distortions）和“非市场失误”（nonmarket failures）。但是，他们在强调价格—市场机制的同时，又着重指出，他们并非主张政府必须接受自由放任的原则，而是主张政府应当培育、增进、加强和利用价格—市场机制，政府不要完全依赖全面的、细节的管理控制，而可以通过价格变动来执行政策，可以为发展生产、增加输出和扩大国内市场提供价格和收入刺激。价格变动包括外汇率、利息率、关税、租税和补贴。补贴和租税的配合特别有利于诱导厂商，使它们按照社会机会成本去估定投入品的价值，开辟外在经济的效益和引进新的生产技术。各个发展中国家政策上的差异，引起了发展程度的差异。一个国家之所以穷，并不是由于贫困恶性循环，而是由于糟糕的政策。一个国家之所以不能利用外在经济，并不是由于外在条件不好，而是由于政策不当。

### 3. 对农业的偏见得到了纠正

在这方面，诺贝尔奖获得者舒尔茨（Schultz, T. W.）作出了较全面的论证。他认为，在 50 年代的经济理论影响之下，农业成为“糟糕经济学的很大牺牲品”。工业化被推崇到损害农业的地步，结果，农业被榨取了，伪装失业的概念被接受了，农民对刺激的反应力被忽视了。要发挥农业的作用，必须给农民提供经济机会，必须扩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必须认识农业研究的经济价值。他认为，低收入国家的农民具有很大的能力去改变他们利用土地、劳动和经济机会的方法。虽然低收入国家的大多数农民缺乏受教育的机会，但他们现有的成就显示了他们的学习能力，例如他们在采用粮食高产品种

上取得了成功。他们把农业研究和追加资本转变为粮食增产的能力是明显的、巨大的。

#### 4. 对外贸易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重新受到强调

60年代后，西方经济学家中要求发展中国家必须重视对外贸易的呼声越来越高，集中代表这种新倾向的是西方著名经济学家哈伯勒（Haberler, G.）的一句名言：“我是从国际贸易学说论证发展问题的。”<sup>①</sup>哈伯勒认为，把经济学分为“双重经济学”（Duoconomics）的作法是不恰当的，实际上，存在的只有“单一经济学”，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不过是“增长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单一经济学就广义而言即是包括国际经济理论和政策在内的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强调的价格—市场机制，不仅最有利地调节了国内经济，也最有利地调节了国际经济，因此，国内自由竞争，国外自由放任，应当是统一的经济原则。发展经济学在初始阶段所具有的片面强调集中管理、轻视自由市场功能、贬低对外贸易作用等偏见，是对大萧条的认识有误和自由主义衰退的结果。和哈伯勒的看法相近似的人们还批评了早期发展经济学家的一些概念和说法，如伪装失业、贸易条件恶化的长期趋势、有害的示范效应和贸易悲观主义等，还特别抨击了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他们指出，这种战略必将造成政府引致的种种价格扭曲：利息率过低、非熟练劳动力工资过高、农产品价格过低和外汇定值过高等，从而既不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又不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他们还把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成就归功于新古典主义国际经济理论在实践中得到了贯彻。

#### 5. 社会项目评估的理论与方法的兴起

在这方面作出努力的主要人物是芝加哥大学的哈伯格（Harberger, A. C.）。他根据实用福利经济学的三个基本假设，建立了社会项目评估的理论框架。这三个假设是：竞争的需求价格量度出各个边际单位对需求者带来的利益；竞争的供给价格量度出每个边际单位给供给者带来的机会成本；把所有的利益和成本总和起来就可以量度出整个社会的利益和成本。哈伯格通过对扭曲和外在经济或不经济的校正，提出了解决如何量度外汇、资本和劳动的机会成本以及如何计算社会贴现率的方法。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在基本思路、问题论证以及政策建议等方面，都有显著不同之处。归结到一点，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比较注意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的特点，突破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统一体系，提出了不少特殊理论。第二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则在许多问题的分析中，恢复了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并扩大了新古典主义的应用，无论在计划化的批评上、市场作用的重估上、农业重要性的强调上、国际贸易的再认识上，还是在社会项目评估的研究上，都可以看出新古典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深刻影响。这种情况的出现，被人们称为“新古典主义的复兴”（the Neoclassical Resurgence）。

#### （三）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的演变

如前所述，新古典经济学是一种“竞争均衡”（competitive equilibrium）经济学，其重要特点是“无制度的”（institution free），或者说是明显地提到政府或国家的作用的。

<sup>①</sup> 迈耶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续篇，英文版，1987，51

它假设的前提条件是商品、要素、保险和资本市场是无障碍地自由流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特别是对跨越时间、空间和自然条件的交易决策，是以充分相信交易对手将充分履行其义务为出发点的，合约将得到遵守，或者说强制遵守合约力量的机制是不言而喻存在的。

在这种思路引导之下的“新古典主义复兴”时期（60年代中期以后至70年代）中，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认识到国家的作用已超过了新古典经济学家限定的范围——维持法律秩序和强制合约的履行，因为外在经济和报酬渐增的普遍存在，出现了市场失灵，加上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使保险和资本的流动性减少，使市场增加了不完全性。于是，政府和制度的作用受到了强调。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的生产如果委之于私人，则由于“搭便车现象”，私人将减少产出而损害社会福利。一个以促进社会福利为宗旨而又有充分信息的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干预去纠正市场失灵并提供公共产品，而且政府干预还可以促进分配的公平。由此，一些经济学家提出许多有关收入和财富的最佳税率、进口关税，以及对商品的投入、产出和基本要素征税的理论。但是，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并不按照这些理论的建议行事，而且在一些情况下干预的力度和规模都很大，造成的结果又并非理想，于是，比起市场失灵来，政府干预究竟有效一些或更糟一些有不同的说法。

发展经济学家们开始注意到公共政策和私人“院外”势力以及利益集团的相互关系，以之分析不同的国家何以产生不同的发展绩效。起初，这类分析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情况为对象的，后来，很快就转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而且显示更为贴切。关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进入了第三阶段——新古典政治经济学阶段，或者说，新古典政治发展经济学代替了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新古典政治发展经济学关注的焦点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非经济因素，即制度、历史、法律、意识形态等。其代表性的理论有：财权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寻租理论、新历史经济理论等。代表人物为科斯（Coase, R.）、布坎南（Buchanan, J. M.）、诺斯（North, D.）、克鲁格（Krueger, A.）、塔洛克（Tullock, G.）等。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是由柯兰德（Colander, D.）命名的。他认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的区别在于“前者假定国家远不是一种外生力量，至少部分地是一种内生力量，它所制定的政策反映了社会中的既得利益。”<sup>①</sup>斯里尼瓦桑（Srinivasan, T. N.）指出：“这种国家观点并不特别新异，它可以溯及马克思。但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且有趣之处是将标准的个人最优化工具应用到院外势力和利益集团。其结果，马基（Magee, S.）所使用的把政治舞台中竞争性集团对再分配的影响形象化的概念“看不见的脚”，替代了亚当·斯密使用过的引导自利的个人实现社会利益的概念“看不见的手”<sup>②</sup>。

① 柯兰德.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 英文版. 1984. 2

② 迈耶. 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英文第6版. 1995. 563

斯里尼瓦桑还为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作出如下的概括：

“早期发展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是：具有所需的信息、知识和政策工具，完全为社会利益行动的仁慈的国家，能够以最优化的方式纠正市场失误，从而可以沿着持续而快速的道路前进。这种观点证明是过于乐观而且脱离实践。事实上，国家是受院外势力和利益集团控制，而它们关心的不是增长，而是再分配。国家干预，从最好方面说，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并纳入社会所需的渠道的意愿，从最坏方面说，会由于种种扭曲面造成的不小损失以致把资源大量地从生产引向‘寻租’。”<sup>①</sup>

---

<sup>①</sup> 迈耶，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英文第6版，1995，565

## 第二章 经济增长理论

经济增长可以长期持续吗？如果可以，是什么决定长期增长率？哪一种经济增长最快？以及，政府可以使用什么政策来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些问题曾经是、现在是、并且以后仍将是经济增长理论关注的焦点。

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增长理论历经兴衰，出现了三次大的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哈罗德—多马模式的产生和发展；第二次高潮是新古典增长模式的产生和发展；第三次高潮是近期的新增长理论的产生和发展。40年代末以哈罗德—多马模式为代表的资本积累论在经济思想史上带来了动态理论的复兴，也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模式的基本框架。60年代中期，索罗（Solow, R.）、斯旺（Swan, T.）、丹尼森（Denison, E.）等人提出的技术进步论为外生经济增长理论构造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论框架，为论证经济增长的机制，阐释各国经济增长水平的差距提出了一些独到见解。但是，这些模式无法摆脱一个内在矛盾，即长期增长必然离不开收益递增，而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式的稳定均衡却是以收益递减律为基本前提的，因此，它们充其量只是在十分有限的时间限度内，舍象掉收益递增的生产函数形式，或者只允许极少量的收益递增因素发挥与要素收益递减相抵消的作用，建立起收益递减或收益不变的均衡增长模式，难以就人类漫长的经济增长史给出一致的、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其结果是，这一理论不可避免地在60年代末衰落了，并在此后的一二十年时间内几乎销声匿迹。

引起人们极大关注的是，在80年代中期，以罗默（Romer, P.）、卢卡斯（Lucas, R.）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发表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重新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和问题的兴趣，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的研究潮流。

### 第一节 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式

40年代末，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Harrod, R.）和美国经济学家多马（Domar,

E.)，根据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的思想，把凯恩斯理论动态化和长期化，差不多在同时，分别推演出极为相似的长期经济增长理论，人们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式”。这一经济增长模式的提出不但带来了动态理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复归，而且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框架。

## 一、哈罗德经济增长模式

哈罗德在《关于动态理论的一篇论文》（1939年）和《动态经济学导论》（1948年）一书中，以及此后发表的一系列相关的论著中，提出并完善了一个动态的经济增长模式——哈罗德模式。

### （一）哈罗德模式的理论基础

哈罗德模式是对凯恩斯《就业、利息与货币的一般理论》一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1938年，哈罗德将《关于动态理论的一篇论文》的初稿送给凯恩斯，并在附信中写道：“我认为，我关于动态理论的重新表述……是对我的著作的一个重大改进……我在很多地方暗示了形成一个简单的增长规律的可能性，并且我将证实这种断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般就业理论的思想，但我认为它使我们前进了一步。”<sup>①</sup>在1939年正式发表的文章中，哈罗德指出，除了斯密和李嘉图的“动态理论”之外，尔后直至马歇尔、凯恩斯，动态理论“消失了”。凯恩斯的伟大贡献是创立了宏观经济体系，但是这一体系是一种“宏观—静态经济学”，其根本缺陷是以未来的不确定性和人们心理预期的反复无常为依据来论证经济的“稳定”，忽视了经济增长问题，即缺少长期和动态化的分析。哈罗德意识到，按照凯恩斯的学说，为了维持某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必须以投资规模的扩大来提高有效需求，但是，从长期看，在一个时期足以维持充分就业的有效需求，终不足以保证下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因此，前一时期由于投资扩大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将在下一时期提供比前一时期较多的产出，因而为了维持下一时期的充分就业，就必须扩大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这样，由于投资年复一年地扩大，产出将年复一年地增长，反过来，要产出年复一年地增长，投资必须年复一年地扩大。由此可见，哈罗德模式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学说的核心——投资决定论或收入决定论，但它又是凯恩斯理论的发展。凯恩斯理论关注的是短期的经济稳定问题，哈罗德模式关心的是长期的经济增长问题。

### （二）哈罗德模式的基本假定

（1）假定储蓄  $S$  与国民收入  $Y$  呈一种简单的比例函数： $S = sY$ ，这里  $s$  为平均和边际储蓄倾向。

（2）假定劳动力以不变的外生比率  $n$  增长，且  $n = \dot{L}/L$ 。

（3）假定没有技术进步，并对资本存量  $K$  不进行折旧。

上述假定对哈罗德模式并不是必要，其目的仅仅是为了简单化。

（4）在哈罗德模式中，假定生产函数具有固定系数的性质，生产一单位的产出  $Y$

<sup>①</sup> 伊特韦尔等主编，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644



需要劳动  $L$  和资本  $K$  惟一给定, 即:

$$Y = \min\left[\frac{K}{v}, \frac{L}{u}\right]$$

其中乘数  $u$  是劳动对总产出的比率, 或者说, 生产如何给定的产出都需要  $L/u$  单位的劳动。假如一切劳动力都充分就业, 不管资本存量是多少, 则可以得到的最大产出是  $L/u$ 。这就意味着, 在劳动/产出不变的假定下, 收入或产出的增长率  $\dot{Y}/Y$  不能持久地超过劳动力的增长率  $n$ 。如在一开始劳动力都充分就业, 则这个假定就意味着, 在没有技术进步时, 国民收入和产出的最大增长率是由劳动力增长率外生决定的。 $v$  是不变的资本—产出比, 即  $v = K/Y$ 。进一步地扩展哈罗德的假定, 视平均的和边际的资本—产出比 (incremental capital-output ratio, ICOR) 是一致的, 即  $v = \Delta K/\Delta Y$ 。

### (三) 哈罗德模式的基本方程式

根据凯恩斯的收入决定论, 有投资  $I$  等于储蓄  $S$ , 即:

$$I = S$$

由前面的假定资本存量不存在折旧可知, 资本存量的增量  $\Delta K = I$ , 从而:

$$\Delta K = I = S \quad (1)$$

两边同时除以  $\Delta Y$ , 可得:

$$\Delta K/\Delta Y = v = S/\Delta Y = sY/\Delta Y$$

令  $G = \Delta Y/Y$ , 则可以得到哈罗德的基本方程式:

$$G = s/v \quad (2)$$

由此可见, 哈罗德模式表现了单一的稀缺要素资本存量和单一的同质产出之间的动态关系, 即一个时期的投资或资本形成是下一时期的产出增长源泉, 投资创造了未来生产增长的能力, 增长的生产能力反过来又促进产出或收入的增长, 从而为进一步扩大资本形成开辟源泉。总之, 哈罗德模式的中心点是, 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由 (1) 可知, 资本的增长率为:

$$\Delta K/K = S/K = sY/K = s/v$$

由此可见, 国民收入  $Y$  和资本存量  $K$  都必须以同样的不变速率  $s/v$  增长。

### (四) 均衡或有保证的增长路径

均衡的或有保证的增长路径, 要求储蓄 (占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为  $s$ ) 连续地为投资所吸收。也就是在什么样的增长率上, 厂商才能选择均衡增长所要求的等于国民收入的百分比  $s$  的投资量? 为回答这一问题, 哈罗德提出有保证增长率的概念, 即:

$$G_w = s_f/v_r$$

其中  $G_w$  代表有保证的增长率,  $s_f$  为意愿的充分就业下的储蓄率,  $v_r$  为追求利润极大化的企业家认为是理想的边际资本—产出比。哈罗德认为, 由于产出每提高一单位将导致  $v_r$  个追加单位的投资, 所以, 若产出按国民收入的  $s_f/v_r$  百分率提高, 将要求一个相当于  $v_r$  乘以  $s_f/v_r$  的均衡投资, 它精确地等于国民收入的  $s_f$  百分率。哈罗德举例说, 可用一个占国民收入 10% 的  $s_f$  和等于 4 的  $v_r$ , 去产生一个等于 2.5% 的有保证的增长率。

关于有保证增长率的定义，哈罗德作过多次说明。在其 1939 年的文章中，他指出有保证的增长率是“这样一种增长率，如果它出现，将使所有的人都确信他们生产了既不过多也不过少的正确数量。”<sup>①</sup> 在 1948 年的《动态经济学导论》一书中，哈罗德把有保证的增长率定义为：“全面的增长率，如果它被实现，将使企业家达到这样一种精神状态，即他们准备继续同样的增长。”<sup>②</sup> 只是在 1952 年的《动态理论的补充》中，哈罗德才得出一个与有保证增长率的代数公式相一致的行为假定：“令有代表性的企业家在每一个订货场合总是重复他在上一个同样时期中的订货量，那么，如果他认为其既有的存量将要不足，他将追加一个相当于不足的订货量，如果他认为其现存存量将要过剩，他将减少一个相当于过剩的订货量。”<sup>③</sup> 根据这一假定，经济一旦实现了有保证的增长率，它将使这一增长率保持下去。

#### (五) 长期均衡增长的条件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中表明了如何能够实现充分就业，但他并没有想去探究为使一个经济能够在充分就业水平上连续地生产所必须满足的长期条件。哈罗德的 analysis 表明，长期充分就业必须满足两个基本条件：

(1) 经济必须在每一年使投资等于充分就业的储蓄。即经济的实际增长率必须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

$$G_A = s_f/v_r$$

其中  $G_A$  为任何时间内实际的储蓄率和实际的资本—产出比决定的实际增长率。这一条件的含义是，均衡增长将使充分就业的储蓄连续地被投资。如表 2.1 所示。假定充分就业储蓄率为 12%，所要求的资本—产出比为 4，因而有保证的增长率精确等于 3%。实际国民收入在第一年是 100，最初的资本存量与所要求的完全一致，即是实际国民收入的 4 倍。

表 2.1 按照有保证比率的增长

$$s_f = 12\%, v_r = 4$$

时间	资本存量 $K = K_{-1} + I_{-1}$	国民收入 $Y$	理想资本 $v_r \cdot Y$	投资 $I = s_f Y$
第一年	400.00	100.00	400.00	12.00
第二年	412.00	103.00	412.00	12.36
第三年	424.36	106.09	424.36	12.73

(2) 为保持连续的充分就业，产出的增长必须等于实际劳动的增长率加上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即自然增长率。如果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为  $a$ ，则自然增长率为  $n + a$ 。因

① 伊特韦尔等主编，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645

② 伊特韦尔等主编，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645

③ 伊特韦尔等主编，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645

而，如果要有连续的充分就业增长，必须有：

$$G_A = G_W = n + a$$

如果(3)式满足，这就是罗宾逊夫人所说的“黄金时代”——“这样说明它只代表一种在任何实际经济中都不可能达到的神话般的境况”<sup>①</sup>。

## (六) 哈罗德问题

### 1. 第一个哈罗德问题

哈罗德模式中充分就业的长期增长要求  $G_A = G_W = n + a$ 。如果这一条件满足，经济将以  $n + a = s/v = s_f/v_r$  的不变比率增长。如果由于巧合，实际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而它本身又等于自然增长率，那么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就会发生。但是没有理由相信这三者会相等。因为  $s$ 、 $v$  和  $n + a$  都是独立决定的。储蓄倾向  $s$  由经济中的厂商和居民户的偏好决定；自然增长率对于经济制度而言是外生性的，它取决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等生物学的因素，以及经济当中的技术进步状况；资本—产出比是一个技术性的假定。因此，哈罗德模式中的长期增长均衡地实现只是一种偶然的现象。这一结论可用第一个哈罗德问题来总结。

**第一个哈罗德问题：**虽然在哈罗德模式中充分就业的长期均衡增长是可能的，但由于有保证增长率与自然增长率之间必要的等量关系难以独立地决定，因此这种长期均衡只有在“偶然的乐观情况”<sup>②</sup>下才会实现。

如果有保证的增长率超过自然增长率，即  $G_W > n + a$ ，储蓄和投资率超过了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允许的限制，因为经济不可能比自然增长率连续地更快地增长，均衡增长必定是无法实现的。经济一定会从有保证的增长率往下向自然增长率偏离，并且其偏离的程度将大于它向上偏离的程度，结果经济就会陷入显著的萧条之中。如果有保证的增长率低于自然增长率，即  $G_W < n + a$ ，产出将趋向于往上向自然增长率偏离，结果经济将享有一个反复不断地走向繁荣状态的倾向。

50年代产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曾认为可以通过适当的利率来克服有保证增长率的这种不稳定性，实现自然增长率与有保证增长率之间的均等。如果有保证增长率过高，以至于过度储蓄导致了衰退局面，一个充分地提高  $v$  的利率将使它降到自然率上。反之，如果较高的利率充分地减低  $v$ ，从一个不充足的有保证的增长率中产生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将被消除。如果实际利率与  $v$  按照这种有益的方式作出反应，那么有保证的增长率就始终与自然增长率相等。对于这一结论，哈罗德在《关于动态理论的第二篇论文》(1960年)中指出，按照新古典增长模式的方式利用利率，去实现自然增长率与有保证增长率的相等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保证增长率在实际利率位于它的最优水平时，一般地不等于自然增长率。据此，哈罗德建议，如果政府要避免自然增长率与有保证增长率二者之间的差异，就必须执行长久的财政赤字或盈余，即要进行持久的政府干预。

① Robinson J.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3rd ed. Macmillan, 1969. 99 ~ 100

② Hahn F, Matthews R.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 Survey*. *Economic Journal*, 1964

## 2. 第二个哈罗德问题

均衡增长要求实际的增长率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即  $G_A = G_W$ 。然而哈罗德指出，实际的增长率并不是总等于有保证的增长率，实际上两者时时发生偏差，而且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增长率的偏离，不仅本身不能将自身矫正，而且还会产生更大的偏离，从这种意义上看，有保证的增长率基本上是不稳定的。这即是所谓的“不稳定原理”。哈罗德举例说，如  $s$  为 10%， $v_r$  为 4，假定实际增长率比有保证的增长率快 0.1%，即是 2.6%，而不是 2.5%。那么伴随 2.6% 的产出增长，加速器原理将要求  $4 \times 2.6\%$  的国民收入被追加到资本存量上，从而事前投资为国民收入的 10.4%。这样，由于事前储蓄被限制在 10% 的水平上，实际增长率超过有保证的增长率 0.1% 便导致事前投资超过事前储蓄 0.4%。根据《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中的经济原理，任何事前投资超过事前储蓄，都将与国民收入的进一步扩张相结合。因此，如果实际增长率超过有保证的增长率，实际增长率的趋势会不断提高。因为只要实际增长率从 2.6% 提高到 3%，所需要的投资将进一步增长到占国民收入的 12% ( $4 \times 3\%$ )，从而超过 10% 的储蓄一个更大的量。相反，如果实际增长率低于 2.5% 的有保证的增长率，则事前投资将低于 10% 的事前储蓄，这将引起增长率的衰退。所以，任何超过有保证路径的增长率，都将诱发一个连续的加速增长，而任何低于有保证路径的增长率都将导致增长的连续地减速。这一内容被归结为第二个哈罗德问题。

**第二个哈罗德问题：**在哈罗德模式中，实际增长率与有保证增长率的偏离，不但不能自行纠正，而且就其效应是累积的。

这第二个哈罗德问题被索罗认为具有“刃锋”性质。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一文中，索罗指出：“哈罗德—多马思路所特有的权威性结论和性质……甚至在长期，经济体系充其量也只能平衡于均衡增长的刃锋上。”<sup>①</sup>对此，哈罗德抱怨说：“我根本没有写过（或说过）任何话可以证明这种对我的观点的描述是正当的。”我不喜欢“刃锋”这种说法……因为它是完全不现实的，甚至有些荒谬。”而实际上，他更喜欢把经济体系比作“置于草坡上的一个球”，“它可能要用脚踢一脚才运动，但一旦运动之后，它就可能跑得很远，特别在山坡很陡峭的情形下，较之在平地上用同样的力量踢一脚跑得更远，它可能跑完全程一直到山脚。”<sup>②</sup>这是对不稳定原理的一个精彩的描述。哈罗德不稳定性原理表明，在宏观经济水平上，实际增长率对有保证增长率以下的任何偶然偏离，都将导致生产能力过剩，由此将使得增长、投资并进而使有效需求缩减，而这又导致更大的生产能力过剩。所以，宏观经济等于过剩资本的反应，将与消除过剩所要求的方向相反，其结果是经济在宏观水平上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

## 二、多马经济增长模式

多马在 1946 年发表的《资本扩张、增长率和就业》以及 1947 年发表的《扩张和就

<sup>①</sup> Solow R.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 1956. 65

<sup>②</sup> Harrod R. Economic Dynamics. Macmillan, 1973. 32 ~ 33

业》两文中，独立地提出了一个增长模式，因其主要结论类似于哈罗德模式的基本方程式，人们常常把这两个模式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式。

### (一) 多马模式

多马模式的理论基础也是源于凯恩斯理论。多马开宗明义地指出，他的模式“是以凯恩斯和汉森两位当代经济学家的著作为根据的”。但他认为，“标准的凯恩斯主义体系没有提供推知均衡增长率的工具。增长在那里是完全不存在的，因为它与生产能力的变化没有联系”。“凯恩斯关于就业是国民收入（和工资单位）的函数的这个假定，在短斯内是正确的……但在一个长达几年的较长时期内，就会造成严重的错误。”由此，多马通过强调投资的双重性而把凯恩斯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投资不只如凯恩斯理论所言是创造收入的工具，而且投资也能增加生产能力。具体表现为：

(1) 投资通过凯恩斯的乘数过程决定收入的实际水平。

(2) 由于投资增加了资本存量的规模而增加了收入的最高潜在水平，即生产能力。

运用类似于哈罗德—多马模式的推导过程，令  $Y$  为收入或产量的实际水平； $\dot{Y}$  为国民收入或产量的最高潜在水平； $1/\alpha$  为投资乘数； $I$  为投资的流量； $\sigma$  为“投资效率”或“投资的潜在社会平均生产率”。多马定义为：

$$\sigma = \frac{\dot{Y}}{I}$$

因此  $\sigma$  指的是已知投资水平下生产潜在能力的变化率。多马假定  $\sigma$  是一个常数，所以：

$$\dot{Y} = \sigma I$$

这是对经济供给方面的综合描述。

在需求方面，任何时点上的收入的实际水平决定于一般的简单的乘数过程，即：

$$Y = \frac{1}{\alpha} I$$

或用收入的变化率：

$$\dot{Y} = \frac{1}{\alpha} \dot{I}$$

$\dot{Y}$  为收入增量， $\dot{I}$  为投资增量。

假定经济最初处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即供给等于需求，则  $\dot{Y} = Y$ 。多马的目的是要发现保持  $\dot{Y} = Y$  的投资增长率，由此可得：

$$I\sigma = \frac{1}{\alpha} \dot{I}$$

或，

$$\frac{\dot{I}}{I} = \alpha\sigma \quad (4)$$

方程 (4) 表示，当  $\sigma$  和  $\alpha$  都假定为常数时，则投资增长率为一个不变的比例  $\alpha\sigma$ 。这一方程非常类似于哈罗德模式的基本方程式。并且，如果均衡得以保持，则其他主要宏观变量如资本增长率、产出增长率或国民收入增长率都必然按这一比率增长。

## (二) 哈罗德模式和多马模式的相似性和差异性

由于哈罗德和多马有关经济增长模式主要结论的相似性，人们常常把这两个模式合称为哈罗德—多马模式。对哈罗德而言，均衡增长必须使  $G_A = s/v_r$ ，稍作变换，令  $i/I = s/v_r$ 。多马模式的动态均衡要求  $i/I = \alpha\sigma$ ，从而  $s/v_r = \alpha\sigma$ ，因  $\sigma$  是每单位投资产出的潜在增加，而  $v_r$  是生产额外 1 单位产出所要求的新投资单位数，从而有  $\sigma = 1/v_r$ ，又因  $s = 1/\alpha$ ，则哈罗德模式和多马模式在形式上是等同的。

但是，两个模式之间不是没有不同点。对于哈罗德而言，长期均衡要求有保证的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但多马却表明， $\alpha\sigma$  对他而言就是均衡增长率，这种增长率将保证充分就业的实现，而与自然增长率无关。多马断定  $\sigma$  一般来说要低于投资的绝对最高潜在的平均生产力  $\bar{\sigma}$ 。对此，哈罗德认为多马对于  $\sigma$  的定义似乎包含着有保证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的混合因素， $\alpha\sigma$  实际上是相当于他的自然增长率，只是由于劳动力增长的约束使  $\sigma$  不同于  $\bar{\sigma}$ 。他的看法是：“假如劳动力等非常充足，则经济就能按  $\alpha\bar{\sigma}$  增长，这实际上就是我的‘有保证’率；但劳动力等缺乏，把潜在增长压缩到  $\alpha\sigma$ ，这就是我的‘自然’率。”<sup>①</sup>

归结起来，哈罗德模式和多马模式还是有着许多共同点：

(1) 两个模式的理论基础都是凯恩斯的理论，而且都把凯恩斯的理论长期化和动态化了。

(2) 两个模式都产生了长期均衡增长条件，经济必须以不变的比率增长。

(3) 两个模式都预见到了长期充分就业均衡增长的困难。在哈罗德模式中，一方面，经济中缺乏确保有保证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相等的机制；另一方面存在有保证增长率的不稳定性。在多马的模式中，由于投资不足的倾向，投资的增长率一般不能等于  $\alpha\sigma$ 。

(4) 两个模式都同样假定了不变的资本—产出比，因而两个模式都面临同样的“刃锋”问题，遭到后来经济学家的批评。

(5) 两个模式都把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和周期波动视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特征，强调政府干预对经济均衡增长的重要性。诚如哈罗德指出：“我深信，那种认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有保证的均衡增长率若不加以管理或干预便不稳定的理论，是牢固地站得住脚的；我深信这是对经济周期的基本解释。”<sup>②</sup>

## 三、哈罗德—多马模式的经济含义及其贡献

哈罗德和多马在重新唤起人们对增长和长期积累问题的兴趣方面起了开创性的作用，并且，可以肯定的是，它奠定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的框架。正是因为哈罗德对动态增长理论的复兴及其贡献，诺贝尔奖金委员会主席阿塞尔·林德贝克 (Lindbeck, A.) 指出：“如果他活得更长一点儿的话，他也将位于荣获诺贝尔奖金的经济学家们的行

① Harrod R. Domar and Dynamic Economics. Economic Journal, 1959: 456

② 哈罗德. 动态经济学. 商务印书馆, 1981. 54 ~ 55

列。”<sup>①</sup>

(1) 哈罗德—多马模式在凯恩斯理论的基础上,把这一理论动态化和长期化,提出了一个经济增长理论,这是对古典增长理论思想的复兴。这种复兴重新唤起了人们对长期经济增长问题和增长理论的兴趣,开创了新的动态的经济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

(2) 哈罗德—多马模式突出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在模式中,由于假定不变的资本—产出比,从而经济增长惟一地决定于储蓄率,也就是资本积累率。从而为经济增长找到了一种似乎是合理的持久动力和源泉。

(3) 哈罗德—多马模式强调了经济的不稳定性的“内生性”。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经济特征就是其经济增长的周期性,而且这种不稳定的周期波动具有“累积”效应。为了消除这种周期波动,这一模式强调,必须进行永久性的政府干预。

(4) 哈罗德—多马模式标志着当代经济发展理论的产生。在当代发展经济学诞生和成长初期,哈罗德—多马模式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的普遍重视和赞扬。不少人认为这个模式与其说适合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如说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个模式不仅消极地显示了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要害——资本的匮乏阻碍了经济的增长,更积极地指明,只要有持续的资本形成,就会有持续的经济增长。

#### 四、哈罗德—多马模式的缺陷

无可否认,哈罗德—多马模式开拓了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但是,这一理论模式却存在不少的缺陷,遭到以索罗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批评。

(1) 资本—产出比不变的假定是不合理的。这一假定意味着生产要素,即资本和劳动的不可替代性。索罗指出:“有保证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之间的矛盾根本是取决于这一决定性的假定,即生产是在固定比例之下进行的……如果这一假定不存在的话,不稳定的刃锋概念似乎也随之不存在。”<sup>②</sup>

(2) 哈罗德—多马模式过分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把经济增长源泉推向一个“唯资本积累”的程度,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哈罗德虽然强调了“中性”的技术进步,如哈罗德在《动态经济学导论》中指出:“我把中性进步定义为在不变的利率下不干扰资本系数值的进步”,而且“被定义为中性的发明潮流,在利率不变的假定下将使国民总产值在(广义)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分配不变。”<sup>③</sup>可见,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3) 哈罗德—多马模式的刚性假定、及其均衡增长的不稳定性要求持久的政府干预。这一结论带有浓厚的凯恩斯经济学的色彩,忽视生产要素的可调整性,忽视了市场

① 伊特韦尔等主编,新帕尔格雷夫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641

② Solow R.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65

③ Harrod R. Towards a Dynamic Economics; Some Recent Developments of Theory and Their Applications to Policy. Macmillan, 1948. 28

机制的作用。

(4) 哈罗德—多马模式的长期均衡增长路径具有“刃锋”性质，这一缺陷遭到索罗的尖锐批评。

## 第二节 新古典增长模式

虽然哈罗德—多马模式在重新唤起人们对增长和长期积累问题的兴趣方面起了开创性的作用，但是，由于哈罗德—多马模式假定的致命缺陷产生的“刃锋均衡”特征，导致人们对这一模式的兴趣的减退。

索罗和斯旺在 1956 年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一个经济增长模式，修正了哈罗德—多马模式，克服了令人难堪的“刃锋均衡”问题。因两个模式的经济含义一致，世人合称为索罗—斯旺模式。此后，大量的经济学家卷入对新古典增长模式的研究，如丹尼森 (Denison, E.)、肯德里克 (Kendrick, J.)、卡斯 (Cass, D.) 以及库普曼斯 (Koopmans, T.) 等人从理论和实证方面，不断修正并扩展索罗—斯旺模式使之日益精细化，在五六十年代形成蔚为大观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大潮。

### 一、索罗—斯旺模式

1956 年索罗在《对经济增长理论的一个贡献》一文中在对哈罗德—多马模式批评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新古典特征的新古典增长模式，同年，斯旺在《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一文中也提出了相似的模式，两者合称为“索罗—斯旺模式”。

#### (一) 基本假定

索罗—斯旺模式的核心是其新古典生产函数，如果忽略技术变化，则有：

$$Y = F(K, L)$$

其中  $Y$  是产出， $K$  和  $L$  分别是资本和劳动。具体地，这一函数满足如下性质：

(1) 对所有  $K > 0$ ,  $L > 0$ ,  $F(\cdot)$  关于每一投入具有正的和递减的边际产品：

$$\partial F / \partial K > 0, \partial^2 F / \partial K^2 < 0$$

$$\partial F / \partial L > 0, \partial^2 F / \partial L^2 < 0$$

(2)  $F(\cdot)$  具有规模不变收益：

$$F(\lambda K, \lambda L) = \lambda F(K, L), \lambda > 0$$

(3)  $F(\cdot)$  满足 Inada 条件，即：

$$\lim_{K \rightarrow 0} F_K = \lim_{L \rightarrow 0} F_L = \infty$$

$$\lim_{K \rightarrow \infty} F_K = \lim_{L \rightarrow \infty} F_L = 0$$

#### (二) 索罗—斯旺模式的基本方程式

假定经济关于时间是连续的(以下时间标记省略)。初始的资本和劳动水平给定，且劳动以不变的增长率增长，即：



$$\dot{L} = nL$$

产出在消费和投资之间划分。产出被用于投资的份额  $s$ , 是外生的和不变的。用于投资的一单位的产出取得一单位的新资本。假定既有的资本以  $\delta$  比率折旧, 由此可获得资本积累的动态方程:

$$\dot{K} = sY - \delta K \quad (5)$$

假定人均资本(资本—劳动比)为  $k = K/L$ , 由上面的假定可知人均产出:

$$F(K, L)/L = F(K/L, 1) = F(k, 1) = f(k)$$

对人均资本求导:

$$\dot{k} = \left( \frac{\dot{K}}{L} \right) = \frac{\dot{K}L - \dot{L}K}{L^2} = \frac{\dot{K}}{L} - nk \quad (6)$$

在(5)式的两边除以  $L$ , 得:

$$\dot{K}/L = sY/L - \delta K/L = sf(k) - \delta k \quad (7)$$

由(6)和(7)式可得索罗—斯旺模式的基本方程式为:

$$\dot{k} = sf(k) - (n + \delta)k \quad (8)$$

这一非线性方程只依赖于  $k$ 。这一基本方程说明, 资本—劳动比的变化率是由每一工人的储蓄(和投资)量与劳动力增长时为保持资本—劳动比不变所要求的投资量的差值所决定的。如果每一工人的储蓄量大于投资量, 则资本存量将比劳动力增长得更快, 资本—劳动比就会随之提高。而当每一工人的储蓄恰好和增长着的投资量保持一致时, 资本—劳动比的变化率将等于零, 资本—劳动比将保持在不变的水平  $k^*$  上。此时, 经济处于稳定状态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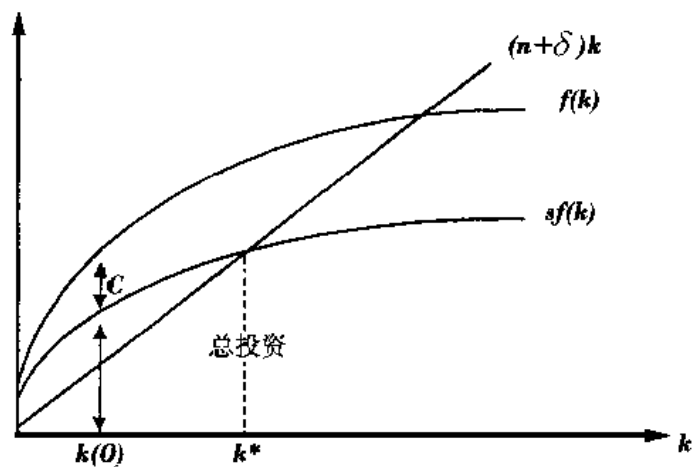


图 2.1 索罗—斯旺模式的均衡解

图 2.1 显示了方程 (8) 的运作。上面的曲线是生产函数  $f(k)$ ,  $sf(k)$  项除了正的乘子  $s$  外类似于生产函数。值得注意的是,  $sf(k)$  曲线从原点出发具有正斜率, 并且随  $k$  的增加变得更加平坦。 $(n + \delta)k$  项是从原点出发具有正斜率  $(n + \delta)$  的直线。考虑一个初始人均资本存量  $k(0) > 0$  的经济, 图 2.1 显示, 人均总投资等于  $sf(k)$  曲线在该

点的高度，人均消费等于曲线  $sf(k)$  与  $f(k)$  在该点的垂直距离。

总投资  $sf(k)$  与生产函数  $f(k)$  成比例。人均消费等于  $f(k)$  与  $sf(k)$  曲线之间的垂直距离。 $k$  的有效折旧由从原点出发的直线  $(n+\delta)k$  给出。 $k$  的变化由  $sf(k)$  与直线  $(n+\delta)k$  之间的垂直距离给出。稳定状态的资本水平  $k^*$  取决于曲线  $sf(k)$  与直线  $(n+\delta)k$  的交点。

图 2.2 给出了索罗—斯旺模式中  $k$  的相位图。在相位图中， $\dot{k}$  是  $k$  的函数。如果初始的  $k$  小于  $k^*$ ，实际投资超过稳定状态资本水平，因此  $\dot{k}$  为正值，即  $k$  是上升的。如果  $k$  大于  $k^*$ ， $\dot{k}$  为负值， $k$  减少。最后，如果  $k$  等于  $k^*$ ， $\dot{k}$  为零。因此，不管  $k$  的初始值如何，它总收敛于  $k^*$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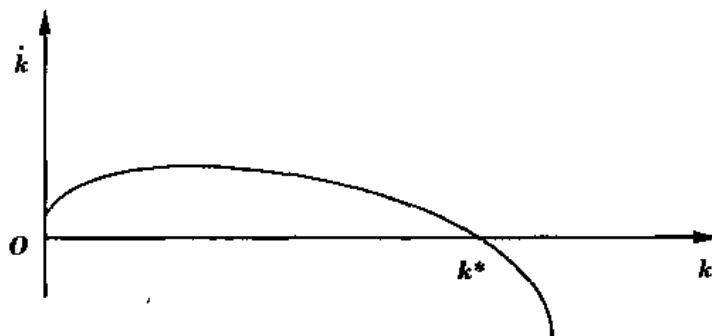


图 2.2 索罗—斯旺模式中的  $k$  的相位图

### (三) 平衡增长

索罗—斯旺模式意味着，不管经济的初始位置如何，该经济总会收敛于一条平衡增长路径。平衡增长路径是这样一种状态，经济中的每一变量都以常数率增长。在索罗—斯旺模式中，对应 (8) 式<sup>①</sup> 的  $\dot{k}=0$  的稳定状态是图 2.1 中  $sf(k)$  与  $(n+\delta)k$  的交点，即  $k^*$  满足如下均衡增长条件：

$$sf(k^*) = (n+\delta)k^*$$

由上式可知，索罗—斯旺模式的均衡增长条件与哈罗德—多马模式的恒等式是等价的。惟一不同之处在于，新古典增长模式中使用了以  $k$  为变量的一次齐次生产函数，从而均衡增长条件总可通过  $k$  值的调整得到满足，进而避免了哈罗德—多马模式中的“刃锋均衡”特征。

因为在稳定状态中  $k$  是常数，相应地，在  $y^* = f(k^*)$ ， $c^* = (1-s)f(k^*)$  值下， $y$  和  $c$  也是常数。因此，在索罗—斯旺模式中，人均  $k$ 、 $y$  和  $c$  在稳定状态中不会增长。这就意味着稳定状态中变量  $K$ 、 $Y$  和  $C$  以不变的外生的人口或劳动力的增长率  $n$

<sup>①</sup> 可以证明在稳定状态中  $k$  必定是常数。在方程 (8) 两边除以  $k$  得到  $\dot{k}/k = sf(k)/k - (n+\delta)$ 。左边是常数。根据定义，在稳定状态中，因为  $s$ 、 $n$  和  $\delta$  都是常数，可得  $f(k)/k$  必定在稳定状态中也是常数，其关于时间的导数是  $- [f(k) - kf'(k)]/k^2$ 。方括号中的项是劳动的正的边际产品。因此，只要  $k$  是有限的，在稳定状态中， $\dot{k}/k$  必为零。

增长, 即:

$$\dot{k}/k = \dot{K}/K - \dot{L}/L; \dot{y}/y = \dot{Y}/Y - \dot{L}/L; \dot{c}/c = \dot{C}/C - \dot{L}/L$$

在均衡增长条件下, 可知产出均衡增长率即是外生给定的人口或劳动力的自然增长率, 即:

$$g = \dot{K}/K = \dot{Y}/Y = \dot{C}/C = n \quad (9)$$

这是索罗—斯旺模式的一个重要缺陷。(9) 式暗示, 在一个人口增长为零的经济中, 增长率会趋于零, 这是一个非常“令人不愉快的结果”。为了克服这一缺陷, 索罗 1957 年在《技术变化和总量生产函数》一文中引入外生的技术变化, 以解释可能的人均收入的长期增长。

#### (四) 储蓄率变化对产出的影响

提高  $s$  使实际的投资线上移, 并且引起  $k^*$  上升。如图 2.3 所示,  $k$  并不立即跳向新的  $k^*$ 。一开始,  $k$  等于旧的  $k^*$ 。在这一水平, 实际投资超过均衡投资——比确保  $k$  不变的更多资源被用于投资——由此  $\dot{k}$  为正值。从而  $k$  开始上升, 并连续上升到到达新的  $k^*$ , 在此点它保持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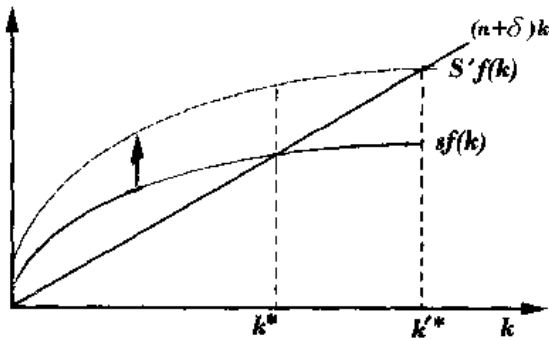


图 2.3 扩展的索罗—斯旺模式的均衡解 (A)

人均产出为  $f(k)$ , 当  $k$  不变时, 人均产出增长为零。当  $k$  增加时, 人均产出增长, 因此其增长率超过零。当  $k$  达到新的  $k^*$ , 增长率回到零。因此, 储蓄率的持久增加只会导致人均产出增长率的暂时上升: 对一时间点而言,  $k$  会上升, 但它最终上升到把所有的额外储蓄都用来维持更高的  $k$  水平的点上。用数学语言可以更清楚地明确这一点。对人均产出函数求关于  $s$  的导数:

$$\frac{\partial y^*}{\partial s} = f'(k^*) \frac{\partial k^* (s, n, \delta)}{\partial s}$$

因为  $k^*$  是根据  $\dot{k} = 0$  条件而来, 因此,  $k^*$  满足:

$$sf[k^*(s, n, \delta)] = (n + \delta)k^*(s, n, \delta)$$

由此可得:

$$sf'(k^*) \frac{\partial k^*}{\partial s} + f(k^*) = (n + \delta) \frac{\partial k^*}{\partial s}$$

调整可得:

$$\frac{\partial k^*}{\partial s} = \frac{f(k^*)}{(n + \delta) - sf'(k^*)}$$

把这一结果代人 (4) 可得:

$$\frac{\partial y^*}{\partial s} = \frac{f'(k^*) f(k^*)}{(n + \delta) - sf'(k^*)}$$

进一步可得：

$$\frac{\partial y^*}{\partial s} \frac{s}{y^*} = \frac{k^* f'(k^*) / f(k^*)}{1 - [k^* f'(k^*) / f(k^*)]}$$

定义  $\alpha(k) = k^* f'(k^*) / f(k^*)$  是产出对  $k$  的弹性，则有：

$$\frac{\partial y^*}{\partial s} \frac{s}{y^*} = \frac{\alpha}{1 - \alpha}$$

在大多数国家，收入对资本的份额是 1/3，如果把这一数字看做是资本产出弹性的估计，可得产出对储蓄率的长期弹性是 1/2。因此，10% 的储蓄率的增加只会导致长期产出 5% 的增加，由此，显著的储蓄率变化只对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产出水平有温和的影响。如果资本产出弹性更小，则这一影响更小。根据生产函数的新古典性质，资本的边际产出最终趋于零，则储蓄率的长期增加对产出的影响最终也趋近于零。

归结起来，储蓄率的变化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长效应：它改变平衡增长路径，并由此改变在这一时间点的人均产出水平，但它不会影响平衡增长路径上的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实际上，在索罗—斯旺模式中所有的其他变量的变化也只有水平效应。

### (五) 资本积累的黄金法则

对一个给定的生产函数和给定的  $n$  和  $\delta$  值，对每一储蓄率  $s$ ，存在一个唯一的稳定状态值  $k^* > 0$ 。这一关系记为  $k^*(s)$  且  $dk^*(s)/ds > 0$ 。稳定状态的人均消费水平是  $c^* = (1-s)f[k^*(s)]$ 。因  $sf(k^*) = (n+\delta)k^*$ ，由此，可重写  $c^*$ ：

$$c^* = f[k^*(s)] - (n+\delta)k^*(s) \quad (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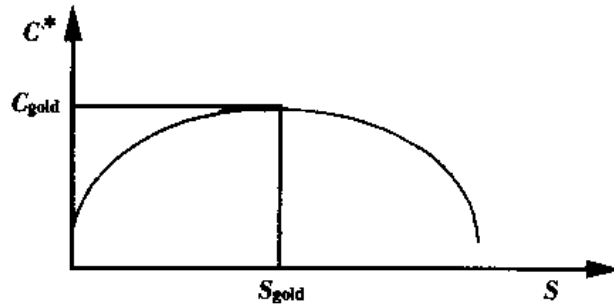


图 2.4 资本积累的黄金法则

图 2.4 显示了方程 (10) 暗含的  $c^*$  和  $s$  之间的关系。对较低的  $s$  水平， $c^*$  是  $s$  的递增函数，对较高的  $s$  值，它则是  $s$  的递减函数。当其导数为零时，即  $[f'(k^*) - (n+\delta)] dk^*/ds = 0$  时， $c^*$  取得最大值。因  $dk^*/ds > 0$ ，则括号中项为零。如果用  $k_{\text{gold}}$  表示对应最大  $c^*$  的  $k$  的稳定状态值，则  $k_{\text{gold}}$  取决于：

$$f'(k_{\text{gold}}) = n + \delta \quad (11)$$

相应的储蓄率记为  $S_{\text{gold}}$ ，相应的稳定状态人均消费水平为：

$$c_{\text{gold}} = f(k_{\text{gold}}) - (n + \delta)k_{\text{gold}}$$

方程 (11) 中的条件就是费尔普斯 (Phelps, E.) 定义的资本积累的黄金法则

(golden rul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sup>①</sup>：在所有的平衡增长路径上，能达到并保持最大值的人均消费的资本边际产出等于外生的劳动生产率和折旧率之和。这一黄金法则意味着：“每一代人（为其后辈）把收入的一部分用来储蓄，而这部分收入正是这一代人要其前辈为之储蓄的。”<sup>②</sup>这一黄金法则的命名源自圣经行为的“黄金法则”：“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sup>③</sup>

#### （六）索罗—斯旺增长模式和哈罗德的难题

前章的分析表明，哈罗德模式包括两个基本难题：

（1）没有任何理由确保有保证的增长率  $s/v$  将会等于自然增长率  $n$ ，没有任何机制能够实现这一等式。

（2）有保证的增长率一旦和企业家预期模式结合在一起时，它在本质上是不稳定的。

索罗—斯旺增长模式是怎样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索罗—斯旺增长模式的平衡增长（不考虑折旧）意味着：

$$sf(k) = nk$$

在这一模式的两边除以  $k$ ，则：

$$sf(k)/k = n$$

从而有：

$$sF(K)/L \cdot L/K = n$$

根据资本—产出比的定义， $F(K)/K = 1/V$ ，从而：

$$s/v = n$$

这就意味着有保证的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经济稳定地趋向平衡增长的轨道。这意味着在索罗—斯旺增长模式中，“有保证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的基本对立”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了。原因是，在哈罗德模式中， $s$ 、 $v$  和  $n$  都是固定的常数，而在索罗—斯旺模式中，资本—产出比是可变的，因而经济可以调整到那种能确保有保证的增长率等于自然增长率的特定的资本—产出比上。图 2.5 说明了这一点。

现在考察任何一条从原点到每一人均生产函数的直线如  $OA$  的斜率。直线  $OA$  的斜率由下式决定：

$$OA \text{ 的斜率} = AB/OB = y/k = Y/L \cdot L/K = Y/K$$

然而， $Y/K$  是资本—产出比的倒数，即任何从原点出发与每一人均生产函数相交的直线，在该点的资本—产出比给定的条件下，该直线的斜率必定等于  $1/v$ 。对斜率为  $n/s$  的直线  $OD$ ，在给定资本—产出比为  $k^*$  的条件下， $OD$  的斜率必定也等于  $1/v$ 。因而总有： $n/s = 1/v$ ，即  $s/v = n$ 。这意味着哈罗德难题到此已被解决了。对每一人均生产函数上的每一点，均相应有一个不同的资本—产出比，并且该模式的调整机制保证，

① Phelps E. Golden Rules of Economic Growth. Norton, 1966

② Phelps E. Golden Rules of Economic Growth. Norton, 1966. 5

③ Phelps E. Golden Rules of Economic Growth. Norton, 1966. 5

最终可获得相称的资本—劳动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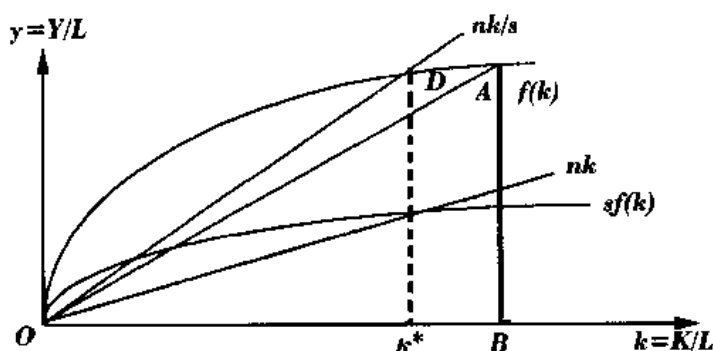


图 2.5 扩展的索罗—斯旺模式的均衡解 (B)

第二个哈罗德问题则完全被索罗模式回避掉了。哈罗德的不稳定性问题产生于他的投资函数与一种暗含的预期形成机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即允许在储蓄和投资计划之间的累积性背离。索罗模式完全不可能遭到这种扭曲信息的破坏。在索罗模式中不存在任何投资函数，同时企业家预期也没有任何作用。索罗指出，一旦放弃固定的资本—产出比假定，“刃锋均衡”就会消失。但斯蒂格力茨和宇泽弘文认为情况并非如此，他们认为：“索罗模式之所以是稳定的，而哈罗德模式之所以是不稳定的。其原因并不是因为索罗考虑到资本替代劳动的可能性，而是由于动态的调整和总产出的决定作出了不同的假定……哈罗德模式中，产出的变化取决于有关企业家行为和预期形成的特殊假定。”<sup>①</sup>

哈罗德—多马模式中的不稳定性问题之所以会在索罗—斯旺增长模式中消失，是因为索罗—斯旺增长模式中不存在一个独立的投资函数。正如印籍经济学家森 (Sen, A.) 所言：“尽管以索罗—斯旺的生产函数替代了不变的资本—产出比的假定，但是，一旦引进一个独立的投资函数，哈罗德的不稳定性会立即在索罗—斯旺模式中再现。”<sup>②</sup>

### (七) 扩展的索罗—斯旺模式

在前面的模式中，假定技术水平长期不变，结果在长期中，所有的人均变量都是常数。因而在缺乏技术进步时，递减的要素收益必定使经济处于零增长的稳定状态。索罗等人意识到这一问题，把基本模式扩展到包括技术的长期变化。这些技术进步使经济挣脱了递减的收益的约束，并使经济产生长期的增长。

#### 1. 技术进步

某些技术进步可能是偶然的产物，但大部分技术进步却是利润极大化的主体的一种有意识的投资产物。此处，我们只考虑外生的技术进步，在新增长理论中将详尽考察内生的技术进步。何谓技术进步，索罗指出，是“生产函数任意一种形式变动的简称”，“经济的加速和减速、劳动力教育质量的改进、各种各样移动生产函数的因素都可归人

① Stiglitz J, Uzawa H, eds. Readings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M. I. T. Press, 1969

② Sen A. Growth Economics. Penguin, Harmondsworth, 1970

‘技术变化’之中”<sup>①</sup>。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外生的技术进步引入增长模式。技术进步可分为节约资本型技术进步、节约劳动型技术进步和中性技术进步。这三种定义分别源自希克斯、哈罗德和索罗。

(1) 希克斯中性 (Hicks neutral) 技术进步。希克斯指出, 对给定的资本—产出比, 如果其边际产出的比率保持不变, 那么这一技术进步就是希克斯中性的<sup>②</sup>。这一定义意味着总量生产函数的向上移动, 因此, 希克斯中性的生产函数可写为:  $Y = F(K, L, t) = T(t) F(K, L)$ , 其中  $T(t)$  是技术进步指数, 且  $\dot{T}(t) \geq 0$ 。

(2) 哈罗德中性技术进步。哈罗德指出, 对给定的资本—产出比, 如果相对投入份额  $KF_K/LF_L$  仍保持不变, 则这一技术进步就是哈罗德中性的<sup>③</sup>。宇泽弘文 1961 年证明<sup>④</sup>, 这一定义的生产函数可表达为:  $Y = F[K, LA(t)]$ 。其中  $A(t)$  是技术进步指数, 且  $\dot{A}(t) \geq 0$ 。因为它以提高劳动存量的方式提高产出, 这种形式的技术进步又称为节约劳动或劳动扩大 (labor augmenting) 型技术进步。

(3) 索罗中性技术进步。索罗指出, 对给定的资本—产出比, 如果相对投入份额  $KF_L/LF_K$  仍保持不变, 则这一技术进步就是索罗中性的。其生产函数形式为:  $Y = F[KB(t), L]$ 。其中  $B(t)$  是技术进步指数, 且  $\dot{B}(t) \geq 0$ 。因为它以提高资本存量的方式提高产出, 这种形式的技术进步又称为节约资本或资本扩大 (capital augmenting) 型技术进步。

## 2. 劳动扩大型技术进步的索罗—斯旺模式

假定生产函数具有劳动扩大型技术进步, 即生产函数采取如下形式:

$$Y = F[K, LA(t)]$$

其中  $AL$  是有效劳动,  $A$  以常数率增长, 即

$$\dot{A}(t) = \lambda A(t)$$

同样地, 可知资本积累方程为:

$$\dot{K} = sF[K, LA(t)] - \delta K$$

运用与前面模式同样的推导, 可得基本方程为:

$$\dot{k} = sF[k, A(t)] - (n + \delta)k \quad (12)$$

这一结果与 (8) 式的惟一差别是人均产出依赖于技术进步水平  $A(t)$ 。

在 (12) 式的两边除以  $k$ , 可得增长率为:

$$g_k = sF[k, A(t)]/k - (n + \delta) \quad (13)$$

惟一的差别是, 对既定的  $k$ , 因  $A$  以  $\lambda$  比率增长, 资本的平均产品随时间递增。

根据定义稳定增长率  $g^*$  是常数。(13) 还意味资本的平均产品  $F[k, A(t)]/k$  在稳定状态中也是常数。因为不变的规模收益, 资本的平均产品等于  $F[1, A(t)]/$

① Solow R.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7. 8

② Hicks J. The Theory of Wages. Macmillan, 1942

③ Harrod R. Toward a Dynamic Economics. Macmillan, 1932

④ Uzawa H. Neutral Inventions and the Stability of Growth Equilibrium.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1. 2

$k$ ], 并且当且仅当  $k$  和  $A$  以同样的比率增长, 即  $g^* = \lambda$  时是常数。

人均产出为:

$$y = F[k, A(t)] = kF[1, A(t)/k]$$

因为在稳定状态中  $k$  和  $A$  以同样的比率  $\lambda$  增长,  $y$  的稳定状态增长率等于  $\lambda$ 。从而, 因  $c = (1-s)y$ , 则  $c$  的稳定状态增长率也等于  $\lambda$ 。

因为在稳定状态中  $k$  和  $A$  以同样的比率  $\lambda$  增长, 可令  $k \equiv k/A(t) = k/[L \cdot A(t)]$ , 变量  $L \equiv L \cdot A(t)$  是有效劳动量, 变量  $k$  是每单位有效劳动的资本数量, 则每单位有效劳动的产出数量  $y \equiv Y/[L \cdot A(t)]$  为:

$$y = F(k, 1) = f(k)$$

从而可得变量  $k$  的动态方程为:

$$g_k = sf(k)/k - (\lambda + n + \delta)$$

因为  $k$  的稳定状态增长率为零, 稳定状态值  $k^*$  满足条件:

$$sf(k^*) = (\lambda + n + \delta) \cdot k^*$$

在稳定状态中, 变量  $k$ 、 $y$ 、 $c$  是常数。由此稳定状态中人均变量  $k$ 、 $y$ 、 $c$  以外生的技术进步率  $\lambda$  增长。相应地水平变量  $K$ 、 $Y$ 、 $C$  在稳定状态中以比率  $n + \lambda$  即是人口增长和技术进步之和增长。

在扩展的索罗—斯旺模式中, 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和劳动要素的投入, 还取决于技术变化因素。运用增长会计方法, 索罗根据美国 1909 年~1949 年的统计数据发现, 这期间美国的产出水平增长了 1 倍, 其中只有 12.5% 源于资本和劳动投入的贡献, 而 87.5% 的“增长剩余”都归因于技术变化。这一发现极富挑战性, 批评了经济增长理论中对资本积累作用的过分重视, 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的思想。由此, 如果引起技术进步的源泉被确定, 则政府政策的内含将是非常深远的。然而, 人们又看到, 在索罗—斯旺增长模式中, 长期人均增长率完全依赖于外生的技术进步率。而对什么是技术进步, 以及技术进步的源泉一无所知, 技术进步本身被假定为外生决定的、偶然的、不费成本的资源, 因而, 索罗—斯旺增长模式在引入外生技术变化后仍无法摆脱令人不满意的状况, 索罗—斯旺增长模式被戏称为“解释一切却不能解释长期增长”<sup>①</sup>的模式。

### 第三节 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模式

索罗—斯旺模式提出后, 受到一个著名的经济学理论家集团的批评, 这个集团由于和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院有联系而被统称为“剑桥学派”。代表性的人物有 D.G. 钱珀努恩 (Champerowne, D. G.)、卡恩、N. 卡尔多 (Kaldor, N.)、L. 帕西内蒂 (Pasinetti, L.)、琼·罗宾逊和斯拉法等人, 他们以凯恩斯的正统自居, 坚持李嘉图—马克思的分

<sup>①</sup> Barro R, Sala-I-Martin X. Economic Growth. McGraw-Hill, Inc. 1995. 11



析方法，围绕资本的含义提出了一些增长模式与索罗为代表的增长模式抗衡。这一理论模式的重要特征是区分资本家和工人的储蓄倾向或出于不同类型收入的储蓄倾向。代表性的模式有卡尔多模式和帕西内蒂模式。

## 一、卡尔多模式

卡尔多模式的关键是其对资本家和工人的储蓄倾向的区分。具体地可考察下列方程：

$$Y \equiv W + P \quad (14)$$

$$S_w = s_w W \quad (15)$$

$$S_p = s_p P \quad (16)$$

方程(14)表示收入 $Y$ 恒等于工资 $W$ 和利润 $P$ 。方程(15)和(16)表示工资中的储蓄 $S_w$ 和利润中的储蓄 $S_p$ 分别比例于工资和利润。这样， $s_w$ 、 $s_p$ 则是出自工资和利润的不变平均(和边际)储蓄倾向，假定 $s_w < s_p$ 。

总储蓄 $S$ 由下式给出：

$$S = s_w W + s_p P$$

或可写为：

$$S = s_w (Y - P) + s_p P \quad (17)$$

整理可得：

$$S = (s_p - s_w) P + s_w Y$$

动态均衡要求 $I = S$ ，这意味着：

$$I = S = (s_p - s_w) P + s_w Y$$

用 $Y$ 除方程的两边可得：

$$\frac{P}{Y} = \frac{1}{s_p - s_w} \cdot \frac{I}{Y} - \frac{s_w}{s_p - s_w}$$

用 $K$ 去除同一方程，可以得到：

$$\frac{P}{K} = \frac{1}{s_p - s_w} \cdot \frac{I}{K} - \frac{s_w}{s_p - s_w} \cdot \frac{Y}{K}$$

其中 $P/Y$ 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 $P/K$ 是利润率。在动态均衡中，它们与出自工资和利润的储蓄倾向相关。在特殊的“李嘉图的古典储蓄函数”的情形下，假定出自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为零，则方程可简化为：

$$\frac{P}{K} = \frac{1}{s_p} \cdot \frac{I}{K} \quad (18)$$

现在， $I/K$ 是资本存量的增长率，并且在充分就业的稳定增长情况下，它将等于自然增长率 $n$ 。利用自然增长率是外生给定的这一假定，方程(18)指出，平衡增长状态中的利润率是由出自利润收入中的储蓄倾向决定的。这样，资本家作为一个整体来说，根据他们的投资和个人消费支出的程度决定自己的利润。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是自己命运

的主人。

卡尔多的储蓄理论为剑桥学派摆脱第一个哈罗德问题提供了一条出路。在哈罗德模式中，充分就业的稳定状态增长要求  $s/v = n$ 。所谓的第一个哈罗德问题产生于  $s$ 、 $v$  和  $n$  都是独立决定的常数这一假定。索罗模式是通过把资本—产出比作为一个变量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卡尔多的方法意味着总的平均储蓄倾向不再是一个常数。以  $Y$  除方程 (17) 可得：

$$S/Y = s = (s_p - s_w) P/Y + s_w$$

显然，在一定限度内，将存在一个利润对收入之比  $P/Y$  能够保证总的平均储蓄倾向恰好能符合要求，使  $s/v$  等于  $n$ 。而且，卡尔多还反复指出，有许多理由可以相信适当的  $P/Y$  值事实上将会产生：“‘有保证’的增长率和‘自然’增长率并不是彼此独立的；如果总利润是易变的话，前者将通过随之而来的  $P/Y$  的变化而使其自身调整到等于后者”。<sup>①</sup>

卡尔多模式提供了一个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分析，强调了收入分配对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性。并且这一模式因其简洁性而具有相当的吸引力。但是这一模式也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其中帕西内蒂模式就是在修正卡尔多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 二、帕西内蒂模式

帕西内蒂模式最初想要修正卡尔多模式的缺陷，但却发展出一个极其一般化的模式。帕西内蒂指出，在任何类型的社会中，当任何个人储蓄他的一部分收入时，必须承认这是他所拥有的，要不然他根本就不会储蓄。把一个社会明确地分为资本家和工人来从事活动时，显然，总利润中的某些部分必须作为工人过去储蓄的结果归他们所有。由此帕西内蒂重新系统地阐述了卡尔多模式。

### (一) 基本假定

(1) 技术。假定产出是由资本和劳动生产的，其生产函数具有良好的新古典性质和不变的规模报酬：

$$Y = F(K, L)$$

其人均产出为：

$$y = f(k)$$

为方便起见，假定资本不折旧，并且不存在任何技术进步。

(2) 资本所有权。假定社会上存在两个不同的阶级：资本家和工人。这两个集团都拥有资本，从而总资本就是两个集团的资本和：

$$K \equiv K_C + K_W$$

其中  $K_C$ 、 $K_W$  分别是资本家和工人的资本。在方程的两边除以  $L$ ，可得：

$$k \equiv k_C + k_W$$

<sup>①</sup> Kaldor N. Alternative Theories of Distribution. I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55. 83 ~ 100

(3) 劳动。假定劳动力以一个外生不变的比例率  $n$  增长, 即:

$$\dot{L}/L = n$$

(4) 竞争。假定经济是一个完全竞争经济, 利润率  $r$  等于资本的边际产出, 工资率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出, 即:

$$\begin{aligned} r &= f'(k) \\ w &= f(k) - kf'(k) \end{aligned}$$

(5) 储蓄。假定两个阶级各自把其收入储蓄一个不变的比例  $s_c$ 、 $s_w$ 。资本家的总收入是总利润  $P$  中归其所有的  $P_C$ , 则资本家的总储蓄等于:

$$S_C = s_c P_C$$

进一步地可写成:

$$S_C = s_c f'(k) K_C \quad (19)$$

工人的总收入等于工资  $W$  和总利润中归其所有的部分  $P_W$  之和, 从而工人储蓄为:

$$S_W = s_w (W + P_W)$$

从而总收入  $Y \equiv W + P_C + P_W$ , 进而有  $S_W = s_w [Y - f'(k) K_C]$ , 调整可得:

$$S_W = s_w L [y - f'(k) k_c] \quad (20)$$

## (二) 基本方程和平衡增长

给定  $k_c = K_C/L$ , 可得:

$$\frac{\dot{k}_c}{k_c} = \frac{\dot{K}_C}{K_C} - \frac{\dot{L}}{L}$$

假定不存在资本折旧, 可得:

$$\frac{\dot{k}_c}{k_c} = \frac{s_c f'(k) K_C}{K_C} - \frac{\dot{L}}{L}$$

从而可得描述资本家的资本对劳动比在整个时期进展的基本方程为:

$$\dot{k}_c = s_c [f'(k) - n] k_c \quad (21)$$

给定  $k_w = K_W/L$ , 可得:

$$\frac{\dot{k}_w}{k_w} = \frac{\dot{K}_W}{K_W} - \frac{\dot{L}}{L}$$

工人的资本变化率必须等于工人的储蓄, 可得:

$$\frac{\dot{k}_w}{k_w} = \frac{s_w L [y - f'(k) k_c]}{K_W} - n$$

从而可得描述工人的资本对劳动比在整个时期进展的基本方程为:

$$\dot{k}_w = s_w [f(k) - kf'(k)] - nk_w \quad (22)$$

方程 (21)、(22) 构成两个阶级经济的一对基本方程。进一步考察平衡增长结构。在平衡增长条件下,  $\dot{k}_c = \dot{k}_w = 0$ , 从而有:

$$\begin{aligned} s_c [f'(k^*) - n] k_c^* &= 0 \\ s_w [f(k^*) - k_c^* f'(k^*)] - nk_w^* &= 0 \end{aligned} \quad (23)$$

由 (23) 可得：

$$r = n/s_c \quad (24)$$

方程 (24) 证明平衡增长的利润率只是劳动力增长率与资本家的储蓄倾向之比。这个结论在形式上类似于卡尔多在工资收入的储蓄倾向等于零假定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但这里并没有作这一假定。这也就是帕西内蒂的著名定理：

在平衡增长的路径上，利润率只取决于劳动力的增长率和资本家的储蓄倾向，并且独立于工人的储蓄倾向。

新剑桥学派经济增长模式把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说明了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变化趋势以及收入分配关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基本结论是：

第一，在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有利于资本家而不利于工人。经济增长中收入分配的趋势是，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大，工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越来越小。

第二，经济增长加剧了收入分配的比例失调，收入分配的失调反过来又影响了经济增长，引起了经济的不稳定。

第三，要实现经济的稳定均衡增长，必须调节资本家和工人两个阶级的储蓄率。

## 第四节 新增长理论的兴起和发展

在 80 年代中期，以罗默 (Romer, P.)、卢卡斯 (Lucas, R.) 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探讨了长期增长的可能前景，重新引起了人们对经济增长理论和问题的兴趣，掀起了一股“新增长理论”的研究潮流。新增长理论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全力解决经济科学中一个重要且令人困惑的主题：增长的根本原因。新增长理论的出现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向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这一融合的显著特点是，强调经济增长不是外部力量（如外生技术变化），而是经济体系的内部力量（如内生技术变化）作用的产物，重视对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资、研究和开发、收益递增、劳动分工和专业化、边干边学、开放经济和垄断化等新问题的研究，重新阐释了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的广泛的跨国差异，为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幅全新的图景。这一理论自 80 年代产生以来，迅速成为理论关注的焦点，对世界经济增长，尤其对发展中经济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 一、新增长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思想渊源

#### (一) 新增长理论的基本内涵

新增长理论的“新”在于其区别新古典增长理论而言，它将经济增长的源泉完全内生生化，由此，这一理论又被称之为内生增长理论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这一理论的基本内涵表现为两个方面。

##### 1. 新增长理论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修正和发展

在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假定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工资率和资本—产出比将会趋同，由此，如果不存在外生的技术变化，经济就会收敛于一个人均水平不变的稳定状态。从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就会面临一个令人不快的结果：除非有正的人口增长率或外生给定的技术变化，否则一国经济就会进入零增长。为了摆脱这种尴尬局面，新古典增长理论只有将增长托付给一个自己也无法把握的东西：外生的技术变化。

与此相对照，80年代兴起的新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引入经济增长模式，提出了要素收益递增假定，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了全面的修正和发展。这一修正和发展带来了一幅全新的增长图景：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率可能随时间变化而单调递增。随着资本存量的增加，投资率和资本收益率可以递增而不是递减。不同国家的人均产出水平不必趋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可能持续缓慢甚至无增长。尤为突出的是，在新增长理论中，赋予了技术一个完全内生化的解释，技术不再是外生的、人类无法控制的东西，它是人类出于自利而进行投资的产物。对技术的这一解释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政府不再是无所作为的实体，它可以通过支持教育、刺激资本积累、保护知识产权、补贴研究和开发、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等政策促进增长。

## 2. 古典经济学是新增长理论的思想渊源

新增长理论并没有割断与过去经济学的联系，事实上，自亚当·斯密以来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200多年的发展，为新增长理论产生提供了大量养分。正是某些伟大经济学家的丰富知识和洞见激发了新一代经济学家探索经济发展新机制的努力，孕育了新的增长理论。

收益递增是新增长理论的核心，但收益递增的基本思想却至少与斯密的制针厂的故事一样古老。斯密在被人们称为“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的斯密定理中最早提出了关于收益递增的洞见，这一命题被美国经济学家艾林·杨（Young, A.）被誉为“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概括”<sup>①</sup>。在此之前，马歇尔引入了关于内在经济与外在经济之间富有成果的分，这一区分有两个好处：首先，它防止了或应该纠正了收益递增必定导向垄断的趋势的理论倾向；其次，它简化了收益递增情形下生产商品的价格的决定方式的分析。这一努力提供了一个与竞争性均衡一致的解，但是杨指出：“从内部经济与外部经济的区分来考察产业进步过程的性质必然是片面的，这些过程的某些方面得到了阐述，而由于某种原因，与其他问题相关的某些重要方面却是不清的……试图从单个企业的成本及其提供的产品的价格中来研究收益递增是徒劳无益的。”<sup>②</sup>

1928年，艾林·杨在其经典文献《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中，以斯密定理为主题，在协调收益递增与竞争性均衡方面作了最为突出的尝试。其基本思想为：

(1) 产业间的不断分工和专业化是收益递增实现过程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杨强调，不断的产业分化曾经是并仍将是与生产增长相联系的典型的变化类型。由于生活设

① Young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omic Journal*, 1928. 12

② Young A.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omic Journal*, 1928. 12

施的日益复杂化，中间产品以及制造某种制定产品或某组产品的产业的分化则走得更远，如我们常见的早期印刷商的继承者，在今天就不仅是拥有自己的专业化设施的印刷者，而且包括木浆的生产者、各种纸张的生产者、油墨及不同配料的生产者、字模金属和字模的生产者、制作插图和掌握制版技术的产业集团、印刷业所需的各种专业化工具和机器的制造商……总而言之，在大部分工业领域中，在原材料生产者和最终产品消费者之间所插入的专业化企业的网络越来越复杂。

随着产业间劳动分工的扩大，有代表性企业与相应的产业一样，会丧失其身份和地位，它的内部经济被后续者分解为更高专业化企业的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并且由新的经济所补充。这种分解是对产业最终产品市场增长所创造的新形势的调整，由此，产业间的劳动分工就形成了一个递增收益的机制。因为这种变化不仅可以充分发挥资本化的生产方式的优点，而且可以发挥并不依赖于生产性技术变化的某些自身的优点：首先，可以实行更高层次的管理专业化；其次，可以促进产业经营更合理的地理分布；再次，杨强调，产业间劳动分工的最大优点是可以更充实地实现资本化或迂回（roundabout）生产方式的经济。值得注意的是，杨指出，通过观察单个企业或特定产业的规模是无法弄清楚收益递增的机制的，必须把产业经营看做是相互联系的整体。因为单个企业的产出一般占一个产业总产出相对较小的份额，从而，单个企业通过迂回的生产方法所达到的经济程度是有限的，但当某种迂回方法的优点扩展到整个产业的产出时，这种迂回的生产方式就变得可行和经济了。

(2) 收益递增取决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并且现代形式劳动分工的主要经济是资本化的或以迂回的生产方式使用劳动的经济。一般认为，斯密说明了分工会导致发明，即工人从事某专门化的日常操作会逐步发现完成同一结果的更好的方法。但杨指出，这忽视了分工的要点，分工是使一组复杂的过程转化为相继完成的简单过程，且至少有某些过程会导致机器的使用，而机器的使用及间接生产过程的采用又导致劳动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这意味着，经济发展过程就是在初始生产要素和最终消费之间插入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的生产工具、半成品、知识的专业化部门，使分工越来越深化的过程。但杨强调，资本化过程不但是投入的增加及技术的进步，而且是生产组织方式的演进。

(3) 劳动分工取决于市场范围，市场范围又取决于劳动分工。一方面，劳动分工、产业的效率的重要决定因素是市场规模，但什么构成大市场？杨指出，这既不是单纯的面积或人口，也不是购买力，即吸收大量年产出的能力。用一种更具有包容性的观点来看，市场不是作为某种产业产品的输出口，因此它是外在于该产业，相反，它是整个产品的输出口。市场规模是由生产数量定义并决定的，更进一步地，市场概念是与贸易联系在一起的生产性活动的总和，因此它也必须是一种平衡，即不同的生产活动必须是成比例的。正是根据这个广义的市场概念，杨把斯密定理译解为“劳动分工一般地取决于劳动分工”。但这不是同义反复，而是有深刻的经济含义。它意味着，不断战胜走向经济均衡的力量反作用，在现代经济体系中，比我们通常所想象的更为普遍和根深蒂固，不仅来自外部的新的或偶然的因素，而且作为产品生产方法的永久性特征的因素不断地变化。在生产组织上任一重要进步，不论它是基于狭义或技术意义上的一个发明，

还是涉及科学进步在产业上的新应用，都会改变产业活动的条件，并对产业结构的其他方面发生反应，而这些反应会产生更加不稳定的效应。由此，变化（即劳动分工）就成为累积性的，并以累积的方式自我繁殖。

另一方面，市场规模取决于劳动分工。杨指出，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离开劳动分工的演进来谈市场供求是无助于研究收益递增的更广泛的方面。最简单的方法是，当交易商品是在收益递增条件下竞争性生产时，并且当每一商品的需求是有弹性时，可从研究商品的相互需求（reciprocal demand）的运作来开始。具体地讲，一种商品的供给有少量的增加，就会伴随着与这种商品相交换的其他商品的需求增加，因此，可假定需求的每一增加必然引起供给的增加。从而，某一产业的增长率是以其他产业的增长率为条件的，但是，由于不同产品的需求和供给弹性是不同的，某些产业将比其他产业增长更快。因此，甚至在人口不变、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没有新发现时，扩张过程也不会有太大的限制，结果，进步就是不受障碍的、无摩擦的，并且收益递增的实现是累进的和持续的。

归结起来，杨指出，不论人们追求的是经济利益或是非经济利益，除了从新知识的获取中求得进步外，经济进步的可能性就孕育在上述条件之中。

杨关于收益递增、经济进步和劳动分工关系的经典思想本应突破收益递减的均衡状态的禁锢，开创一门能使经济学家探讨收益递增的经济学，并为导致产量增加的长期经济增长留下余地。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杨的精辟文章之后，经济学界竟对这个问题长期保持沉默，并完全拜倒在正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脚下。80年代初，罗默重新发掘了古典经济学家，尤其是杨关于递增收益的经典思想，并运用动态模式证明了“收益递增可能会导致无约束的增长，外部性可能会允许竞争性均衡存在”的观点，重新激发了人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兴趣。

## （二）新增长理论的基本思想

新增长理论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已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目前，这一理论还处于发展和完善之中，新的文献、新的观点不断涌现，尚未形成一个非常完整和规范的理论体系。为了对这一正处于“变化”中的理论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我们根据这一领域文献的主题及其相关的经济含义，把新增长理论的内容划分成五条大的研究思路：①知识外溢和边干边学内生增长思路；②内生技术变化增长思路；③线性技术内生增长思路；④开放经济中的内生增长思路；⑤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内生增长思路。这五条思路的基本思想可用一个简单的“AK”模式来概括。

新增长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知识、人力资本等内生技术变化因素的引入，其结果是资本收益率可以不变或递增，人均产出可以无限增长，并且增长率在长期可能单调递增。为了理解这一点，可考虑一个只有物质资本且储蓄率变化对产出的效应依赖资本份额的索罗模式。在索罗模式中，令  $\alpha$  是资本份额，则产出对储蓄率的长期弹性是  $\alpha/1 - \alpha$ 。如果资本份额为中值，则这一弹性不大。在索罗模式的均衡中，中值资本的份额意味  $sf(k)$ （ $s$  为储蓄率， $k$  为人均资本）相当弯曲，因此  $s$  的增加对  $k$  没有很大影响。但是，如果资本的份额趋于 1，则  $sf(k)$  就接近线性，因此  $s$  的较小的增加就会引致  $k$

的较大增加。资本份额的增加还会提高  $k$  对  $f(k)$  的效应。结果,在这种情形中,产出对储蓄率的长期弹性较大。在极端的情形,资本的份额为 1,则  $s$  的变化对产出增长率具有持久的影响,因此这一影响导致产出水平无限增长。进一步,上述基本思想可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内生增长的“AK”模式来表述。

(1) 技术。AK 内生增长模式的主要性质是不存在资本的递减收益,其没有递减收益的简化生产函数是 AK 函数:

$$Y = AK \quad (25)$$

其中,  $A$  是反映技术水平的正常数,  $Y$  是产出。表面看来,假定不存在递减收益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视  $K$  为包括人力资本、知识、公共基础设施等在内的广义资本概念,则这一思想就非常合理。

由 (25) 可得人均产出为:

$$y = Ak$$

进一步可得资本平均和边际产品都为常数  $A > 0$ , 即:

$$f(k)/k = \partial f(k)/\partial k = A > 0$$

对稻田条件 (inada condition)  $\lim_{k \rightarrow \infty} f'(k) = 0$  的违背是产生内生增长的关键因素。令  $\delta$  为折旧率,则由利润最大化条件可得资本的边际产品等于租金价格,即:

$$r = A - \delta$$

令  $s$  为折旧率,  $n$  为不变人口增长率,则积累方程为:

$$\dot{k} = sf(k) - (n + \delta)k,$$

把  $f(k)/k = A$  代入 (19) 可得:

$$g_k = sA - (n + \delta),$$

由上可知,  $sf(k)/k$  的曲线是在  $sA$  水平上的水平线,因此  $g_k$  就是水平线  $sA$  与  $n + \delta$  之间的垂直距离。在  $sA > n + \delta$  的情形,因为这两条直线是平行的,则  $g_k$  是一个正常数。特别地,增长率与人均资本无关,换句话说,人均资本总是以稳定状态增长率  $g_k = sA - (n + \delta)$  增长。

(2) 消费者行为。假定无限生命的消费者具有如下极大化问题

$$\max \int_0^{\infty} e^{-(\rho-n)t} \left[ \frac{c^{1-\theta} - 1}{1-\theta} \right] dt$$

$$s. t. \dot{a} = (r-n)a + w - c$$

其中  $\rho$  是时间偏好率,  $\theta > 0$ ,  $a$  是人均资产,  $r$  是利率,  $w$  是工资率。定义一个汉密尔顿函数:

$$H = \frac{c^{1-\theta} - 1}{1-\theta} + \lambda [(r-n)a + w - c]$$

解得最优化条件为:

$$g_c = \dot{c}/c = (1/\theta)(r - \rho)$$

(3) 均衡。把  $r = A - \delta$  代入上式可得:

$$g_c = \dot{c}/c = (1/\theta)(A - \delta - \rho) \quad (26)$$



因为  $y = Ak$ , 可得  $g_y = g_c = g_k$ , 即所有的三个变量都以同样的增长率  $(1/\theta)(r - \rho)$  增长。

与新古典增长模式不同的是, (26) 的人均增长率取决于模式的参数行为, 诸如储蓄意愿和资本的生产率等。例如, 较低的  $\rho$ 、 $\theta$  值会提高储蓄意愿, 进而意味着较高的人均增长率, 提高技术水平  $A$ , 可以提高资本边际和平均产出, 进而提高增长率和储蓄率。相似地, 如果技术水平  $A$  一次性地提高(或有效地消除政府扭曲提高  $A$ ), 那么长期增长率较高。此外, 改变折旧率也对人均增长率具有持久效应。

与新古典增长模式不同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  $AK$  模式不会出现“趋同”(convergence), 即对所有的人均收入水平有  $\partial g_y / \partial y = 0$ 。考虑一组参数结构(即  $s$ 、 $A$ 、 $n$  和  $\delta$ ) 相似的国家, 其经济的惟一差别即是人均初始资本存量  $k(0)$ , 进而  $y(0)$  和  $c(0)$  的差别。但不管初始条件如何, 所有经济都以同样的人均速度增长, 其结果是  $k(0)$  越大者, 人均收入越高, 反之亦然。

由此可见,  $AK$  模式尽管粗略, 但由于其消除了递减收益, 因而它既可预见长期的内生增长, 又可预见人均收入的跨国差异, 抓住了内生增长模式的本质特征。

## 二、新增长理论的产生及其理论基础

新增长理论在新古典增长理论沉寂一二十年后, 在 80 年代脱颖而出并迅速扩大其影响是有其根源的。

### (一) 新增长理论的出现是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疏漏和缺陷的直接反应

新古典增长模式由于其简单明了, 一直是经济学家对于长期增长的大量直觉认识的基础。在人均投资收益率和人均产出增长率是人均资本存量的递减函数的假定下, 新古典增长模式预见,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各国的工资率和资本—产出比将会趋同, 初始条件或当前的扰动(储蓄倾向或政府政策的变化)对于产出和消费水平都没有长期影响, 在没有外生给定的技术变化下, 人均产出应收敛于一个人均水平不变的稳定状态值。

但是, 自工业革命以来 200 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却显示: 产出增长已超过人口增长; 在长期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增长路径; 国家和地区的增长率与各种经济、社会和政治变量密切相关。面对这种理论和现实的矛盾, 新古典增长理论缺乏解释能力, 陷入了困境之中。但另一方面却激发了大批经济学家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

(二) 有关经济实证和理论研究的两组新的数据资料对新古典增长理论提出了挑战, 直接推动了对全新的增长理论的研究

麦迪逊(Maddison, A.) 1982 年在《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一书中, 总结了自己的长期研究成果, 建立起多个发达国家一个多世纪的几套可比数据。赫斯顿(Heston, A.) 和萨默斯(Summers, R.) 1988 年在《130 个国家 1950 年~1985 年间的实际产出和价格水平的一组新的国际比较》一书中, 以及 1991 年在《宾州大学世界图表集 5: 1950 年~1988 年间的一组扩展的国际比较》一文中, 收集了 130 个国家(其中 121 个市场经济国家和 9 个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民收入账户的数据资料。由于这些数据资料对各国相对价格的差异作了调整, 因而有可能对人均收入水平作比以前更有意义的比较分析。许多

经济学家运用这两组数据资料，得出了与新古典增长理论相悖的结论。

(1) 生产率或人均 GNP 的增长率的长期趋势递增而非递减。麦迪逊运用每人时 GDP 作为度量指标，测定了自 1700 年以来曾居于领先地位的三个国家，荷兰（1700 年 ~ 1785 年）、英国（1785 年 ~ 1820 年、1820 年 ~ 1890 年）和美国（1890 年 ~ 1979 年）在领先期间的生产增长率分别为 -0.7、0.5、1.4 和 2.2<sup>①</sup>。事实说明，生产率的增长率是递增的，生产率的增长率从 18 世纪荷兰的零增长，单调地递增到自 1890 年以来美国的 2.2% 的年增长率。

(2) 为什么新古典增长模式预见的趋同现象并没有发生？为什么穷国在经济增长方面一般未赶上富国？各种统计数据显示，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已令人难以置信。同世界银行称之为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从爱尔兰到瑞士）1980 年的人均收入平均值 10 000 美元相比，印度、海地分别仅有 240 美元、270 美元，生活水平竟有 40 倍的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并没有遏止的迹象，近年来的统计显示，这一差距已扩大到 60 倍。同时，在相当的一段时间里，实际人均 GNP 增长率的跨国差异一直很大。如 1960 年 ~ 1980 年，印度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 1.4%，埃及为 3.4%，韩国为 7.0%，日本为 7.1%，美国为 2.3%，工业化国家平均为 3.6%<sup>②</sup>。一般而言，最穷的国家经济增长率最低，最富的国家次之，中等收入国家的增长率最高。

(3) 为什么长期数据显示出储蓄率和增长率之间存在相关性？按照新古典增长模式，储蓄倾向一次性的增加虽然会提高每一工人的产出和每一工人所使用的资本水平，但不会使长期经济增长率产生任何变化。因而，对这种相关性的惟一解释是：技术进步率变化导致储蓄率和增长率都发生了变化。但长期数据显示的相关程度和重要性却意味着存在其他可能性：储蓄率的变化可能导致增长率变化，或者政府政策的变化可能导致储蓄率和增长率都发生变化。运用巴罗（Barro, R.）在《国家各部门的经济增长》收集的补充数据对赫斯顿和萨默斯的数据作更深入的考察，证实还有其他重要的相关性：如果其他条件相同，则较高的私人或公共部门投资率，较低的政府消费开支份额，较高的入学率，较强的政治稳定性和较低的生育率，都会导致较快的增长率。

(4) 为什么资本并不像新古典增长模式预见的那样从富国流向穷国？按照新古典增长模式的假设，递减的报酬率暗含资本的边际产品在穷国比较高。因此，如果资本品的贸易是自由的竞争性的，则新投资将只会出现在穷国，并且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两国间的资本—劳动比、进而工资和资本收益均等为止。实际情形如何呢？卢卡斯在《为什么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一文中，运用赫斯顿和萨默斯的研究资料推知美国的人均产值大约是印度的 15 倍，假设两国的生产具有柯布—道格拉斯收益不变技术，按照这一技术，投资品应很快从美国和其他富国流向印度和其他穷国。事实上，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资本远不及新古典增长模式所预见的水平，更有甚者，在 80 年代出现了大量的资本反向流动。

① Maddison A.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② Lucas 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7

(三) 60年代以来有关知识外溢、边干边学和人力资本的理论化和动态化的研究为新增长理论的产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1962年阿罗(Arrow, K.)发表了《边干边学的经济含义》一文,旨在提出一个知识变化的理论。阿罗的这篇独创性论文是使技术进步成为增长模式的内生因素的最初尝试,并成为80年代许多内生增长理论的思想源头。

在这篇论文中,阿罗的重要贡献是提出了“边干边学”的概念。首先,边干边学是经验的产品,只发生于解决问题的尝试中,由此它只发生于解决这些问题的相关生产活动中。其次,重复大体相同问题的边干边学受递减收益约束。对任何既定的刺激,存在一个均衡反应型式,学习者趋于重复其行为,因此,为了取得递增的绩效,刺激必须不断增加而不是单纯重复。再次,经验具有递增的生产力。随着经验知识的积累,单位产品成本随生产总量递减,这一结论源自飞机制造工程师怀特(Wright, T.)的经验研究。怀特发现,美国空军飞机生产中的劳动时数耗费是其以前生产的飞机总数的递减函数,更精确地说,生产既定型号的第N架战机的劳动需要量是其生产过飞机总数N的立方根。这一关系称之为“学习曲线”(learning curve)或“进步比率”(progress ratio)。

在阿罗模式中,有两个基本假定:其一,边干边学或知识是投资的副产品,提高一个厂商的资本存量会导致其知识存量相应增加。其二,知识是公共产品,具有“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这一假定意味着,每一厂商的技术变化是整个经济中的边干边学并进而是经济的总资本存量的函数。因此,任一给定厂商的生产力是全行业积累的总投资的递增函数,随着投资和生产的进行,新知识将被发现,并由此形成递增收益。

概言之,在阿罗模式中,知识水平本身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具有递增边际生产力。在知识水平不变的前提下,社会经济整体中的每一个厂商具有规模不变收益,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倍增会引起产出的倍增。然而,在扩大资本投入的同时,知识水平也随之变化,因而作为一个整体,经济就具有递增收益,而且,由于知识是公共的,所以收益递增是外在于厂商的。正是外在于厂商的收益递增特点决定了竞争性均衡的存在,从而递增收益与边际生产率分配理论就能很好结合:资本和劳动按边际产品支付报酬,而知识(学习)在市场中没有补偿,其结果是知识(严格地讲是新资本)的私人边际产品小于其社会边际产品。

宇泽弘文(Uzawa, H.)1965年在《经济增长总量模式中的最优技术变化》一文中,运用两部门模式结构,描述了一个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都能生产的最优增长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线性产出的人力资本会导致无限增长。

宇泽模式的重要贡献是为解释内生技术变化提供了一个可能的尝试,这种尝试后来成为卢卡斯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以及罗默内生技术变化模式的重要理论基础。宇泽模式的基本思路是:技术变化源于专门生产思想的教育部门,假定社会配置一定的资源到教育部门,则会产生新知识(人力资本),而新知识会提高生产率并被其他部门零成本获取,进而提高生产部门的产出。因而,在宇泽模式中,无须外在的“增长发动机”,仅由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就能导致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四) 舒尔茨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这是一个古老的概念，斯密把工人的技能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基本源泉，并大胆将全体国民后天获取的有用能力，全都视为资本的一部分。马歇尔对人的健康、精力和技能的重要经济意义的强调，预见了我们现在所讨论的人力资本问题。他对知识的论述更是如此，他认为知识是我们最强有力的生产动力……把知识分成公众和私人财产……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重要性正在增加；在某些方面它比对物质东西进行这样的划分更为重要。

然而，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Shultz, T.）的贡献分不开。1961年舒尔茨在《人力资本投资》一文中指出，同质资本的简单化假设对资本理论是一个灾难，并首次区分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把增长余值（growth residual）归功于人力资本投资：通过对人力资本投资，人的质量能够得到不断改进，并由此提高劳动的生产率。在《穷人的经济学》中，舒尔茨强调“改进穷人的福利的关键因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而是提高人口质量，提高知识水平”，突出了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

1968年舒尔茨在《制度和不断增长的人的经济价值》一文中，扩展了他对人力资本所作过的纯经济分析，把人力资本积累、人的经济价值上升与制度联系起来，明确指出：人的经济价值的增长对于制度，尤其是对于政治和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在这种适应新要求的过程中存在的制度滞后现象，就会导致一系列重大的社会问题，经济增长理论应该解决这些问题。舒尔茨无限憧憬地认为，“但愿费雪（Fisher, I.）那个无所不包的资本含义能够和康蒙斯（Commons, J.）为其提供的法律依据结合起来，那么经济学理论就会无懈可击了”<sup>①</sup>。

因此，舒尔茨的任务就是在经济增长研究中明确引入当时尚未形成很大影响的科斯（Coase, R.）等人关于制度变化的社会选择研究。他批评了经济增长理论盛行的两种观点：一是“制度不变论”，二是“制度外生论”。舒尔茨指出，应把各种资源配置制度、产生人力资本的制度（教育和培训）、技术创新制度以及自由竞争制度等都当做经济的内生变量，而这些变量会影响经济增长，同时它们也随经济增长的变化而变化。

据此，舒尔茨设计了一个经济增长理论研究步骤：首先，要运用经济分析界定制度的经济价值及其决定因素，他设定制度可以提供某种特殊服务（如分担风险、公共品），而社会对这些服务都有需求，因此应用供求法则可以确定制度服务的经济价值；其次，把上述供求方法放进一个均衡框架内，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会遭到不均衡的困扰，这样就会改变人们对制度服务的需求，从而引起对长期成本收益衡量上的不平衡，进而带来制度变化；最后，持续存在人的经济价值的上升，是各种制度的经济职能不均衡的主要源泉。因为人的经济价值上升改变了经济增长以资本积累或以土地为主要因素的历史，在制度方面造成意义深远的紧张压力，决定了各种制度发展。这些创新提高了人力投资的收益率，进一步促进了人的经济价值上升，形成一个以资本为核心，经济增长与制度创新互为作用的循环。应该说，这一观点为内生经济增长的一般均衡分析提出了一个大

---

<sup>①</sup> 舒尔茨. 论人力资本投资.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2. 28

纲。可惜的是，这个大纲还比较粗略、抽象，没有转化为规范的理论模式。

1986年舒尔茨提交给耶鲁经济增长第25届年会的论文《为实现收益递增进行的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无疑是新增长理论迅速发展的一个直接动因。在该文中，舒尔茨重新提出杨1928年的经典论文，并将它大大发挥了一通。他认为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到索罗增长模式都是误导，存在两个严重缺陷：一是忽略增长过程中出现的不均衡性质及特点，二是忽略了企业家在处理这些不均衡性质时所作的贡献，结果经济分析完全封闭在收益递减的均衡状态之中，因而迟迟不能建立一个能够分析导致收益递增期间各种变化的增长理论。因此，舒尔茨强调，经济增长应该源自专业化、劳动分工和递增收益，尤其强调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递增收益的一个重要源泉，指出那些排除了这种人力资本的增长理论（它也排除了企业家对增长的贡献）是很不恰当的。舒尔茨拓展了斯密“制针厂的故事”，强调分工的好处主要在于加速知识积累方面，而不是在物质设备的使用方面，指出，由于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收益递增可以突破经济增长的任何限制，并且人力资本具有的外部性可以允许竞争性均衡的存在。由此，舒尔茨建立了两个重要观点：其一，一般均衡分析可以并且应该用来研究包含人力资本和递增收益在内的经济增长；其二，专业化、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收益递增和经济增长必定结伴而行。这就使得80年代产生的新增长理论更迅速、稳健地发展起来。

（五）七八十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发明与创新、人力资本以及交易费用等微观经济理论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更为规范地讨论知识的进步及其与市场的联系，从而为新增长理论的出现提供了准备

所有这些都说明，有必要建立一种新的增长模式。诚如卢卡斯在《论经济发展的机制》一文中指出：“像印度这样的国家，政府能否采取什么措施使其经济增长如同印尼、埃及一样快呢？如果能，应采取什么措施呢？如果不能，其根本原因何在呢？这些问题太引人入胜了，足令我们抛开其他问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发展机制或经济发展理论，以提供某种理论框架来考察经济现实，并判断什么能带来经济增长机会，什么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sup>①</sup>。

### 三、新增长理论简评

80年代新增长理论的出现，突破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重新唤起了人们对长期经济增长的兴趣，在学术界掀起了新增长理论研究的思潮。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强调经济增长是经济体系内部力量，尤其是内生技术变化的产物，它的出现是发展经济学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新增长理论重视知识或专业化人力资本的递增收益、外溢效应及其在国际贸易中产生的动态边干边学效应，而这些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含义和政策含义。

#### （一）新增长理论的经济含义及其贡献

（1）新增长理论是与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共同生长的。以科斯（Coase, R.）等人为

<sup>①</sup> Lucas 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7

代表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出现标志着发展经济学第三个阶段——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来临。新增长理论就是在这一背景中出现并成为这一时代一个重要内容的新理论，它受到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深刻影响。

首先，在对早期文献的总结与反思中强调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尼古拉斯·克拉夫茨（Crafts, N.）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增长经济学家的指南》中指出：“在1760年~1830年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中，不能仅关注于人力和物质资本投资的作用，更重要的应考察英国经济增长的‘社会能力’（Social Capability）（即制度和政策选择对总要素生产率的影响）”<sup>①</sup>。罗默在《内生增长的起源》一文中强调应重视私人研究的税收补贴，研究合营企业免于反托拉斯法约束，跨国企业活动，政府收入的效应，贸易政策和创新之间的反馈，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私人企业与大学之间的联系，选择公共资助的研究领域的机制，以及明显的政府导向的技术政策，成本和收益等制度安排和政策的生长效应，而最重要的则应关注“在类似菲律宾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什么是获取世界其余国家所有的知识的最佳制度安排？”<sup>②</sup> 总而言之，新增长理论是以思想（idea）为基础的，因此，人们得有完全不同的机构安排、确定价格的系统等，以使思想得到一种具有效率的配置。

其次，强调劳动分工制度的作用。在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内生增长思路中，博兰德—杨构建了一个用劳动分工的自发演进来解释经济增长的动态模式。在这个模式中，一开始人们生产经验不多，生产率低，付不起交易费用，他们就会选择自给自足。通过在实践中学习，生产率提高，可以支付交易费用，他们就会选择水平高一点的分工和专业化，而这会通过专业化学习加速学习速度，从而可进一步支付更高的交易费用，这个正反馈将使劳动分工自发演进。当演进在初级阶段，经济增长率低；当分工演进到一定水平，经济会起飞，增长率增加；当分工的潜力被耗尽时，增长率又会下降。这一理论证明，人均收入增长，贸易依存度的增大，市场扩大，内生比较利益的增加，专业贸易部门的扩大和其他结构变化都是分工内生演进的不同侧面。

最后，强调经济增长与经济史的一致性。罗默在解释现代美国经济的兴起时指出，显然，不仅规模效应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且像英国地理勘查，私立大学，大的跨国公司，以及专业化的研究实验室等新制度也非常重要。进而罗默强调，当新增长理论框架与源于经济史的事实和逻辑结合起来，经济学家就能对产业增长如何运作及它为什么首先出现于美国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马丁·魏兹曼（Weitzman, M.）在《杂交的增长理论》一文中指出，新增长理论打开了“余值”这个黑箱，然而这个开启了的黑箱中又包含了另一个黑箱，即新知识的生产函数——新思想——被简单地视作“研究努力”的外生决定的函数。要开启这个黑箱，新增长理论就必须与经济史结合，换句话说，“历史至关重要”（history matter）。

（2）新增长理论的重要突破是把技术内生生化。新古典增长理论只考虑两个生产要素

① Crafts N.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A Guided Tour for Growth Economis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5

② Romer P. The Origins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994

——资本和劳动。而罗默及其同行加上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和技术，这样，经济科学就和信息时代结合起来了。新增长理论对技术（或知识）的论述使得这一理论脱颖而出。

首先，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就如资本一样是一个生产要素，它是“内生的”，源于厂商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的努力，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或许是随机出现的，但技术（或知识）的全面增加是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比例的。与此相反，新古典增长理论却认为技术是“外生的”，是某种如此随机的、偶然的東西，就像甘露一样，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其次，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或技术）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这解释了为什么发达国家能够保持强劲的增长率而不会碰到新古典增长理论所预测的这些国家的投资报酬递减的情况，以及各国经济增长率的趋异现象。

再次，新增长理论认为，存在一个投资刺激知识积累，而知识积累反过来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这意味着，投资的持续增加可以持续地提高一国的长期增长率，而这是传统理论所不能接受的。

最后，新增长理论认为，知识发现或技术创新需要某种垄断权力。在传统的经济理论中，“完全竞争”是准则，垄断权力是一种严重的犯规。但罗默等新增长理论家则认为，垄断权力是有用的，甚至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导致厂商从事技术研究（新知识发现）的各种刺激，因为如果不让那些产生新思想的人对他们的思想拥有某些垄断权力的话，那任何人就都不愿意把他们自己的资源用到生产新思想上。假若一家厂商通过专利途径拥有对某一新思想的垄断权力，那就会厂商遍布整个经济的刺激，使得其他厂商要么垮下去，要么进行他们自己的探索发现。罗默进而强调，许多种类的探索发现必须同垄断权力联系在一起。

(3) 新增长理论将知识和人力资本因素引入经济增长模式，认为专业化的知识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可以产生递增的收益并使其他投入要素的收益增加，从而总的规模收益递增，这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关于要素收益递减或不变的假定，说明了经济增长持续的和永久的源泉和动力。在大卫·李嘉图定律中，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源与一种单一、固定的资源相结合，例如，越来越多的农业劳动力被安排到一块一英亩的土地里劳动，新增的产出将减少。如果1个劳动力生产100个卷心菜，那2个劳动力可能生产200个卷心菜，但3个劳动力可能只生产250个卷心菜，而10个或20个劳动力可能只会自行其事，结果是践踏卷心菜。通过加上第三种资源——技术，罗默及其同行否定了李嘉图定律。罗默等人并没有在一英亩土地上增加更多的劳动力，只增加了技术——新的种子、更具肥力的肥料、更有效力的农药、尽量好的灌溉方法，由此收益不但没有减少，而且会保持上升的势头。这是由于思想（知识）生产对第一个单位而言是有巨大的成本的，而此后每个追加的单位基本上为零成本。

(4) 新增长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它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水平，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率和收入水平就高，反之亦然。由此可见，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中各国的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

主要原因是由于各国在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积累方面存在巨大差异。进一步地，由于知识和人力资本积累可以产生递增收益，因而资本丰裕的发达国家的资本利润不是呈递减趋势而是保持不变或有所提高，这就不仅吸引了发达国家已输出的资本回流，而且吸引了大量发展中国家的资本，从而引起了国际资本的倒流。这就解释了国际金融领域出现的“资本反向流动”现象。

(5) 新增长理论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Spillover effect)。他们指出国际贸易的新原则应当从“比较成本优势”或“资源优势”原理转变为“技术或人力资本优势”原则，强调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世界贸易总量，而且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参加贸易的各国的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得到提高，产生“外溢效应”。而且，值得一提的是，在新增长理论家们看来，国际贸易不再是一方受益一方受损的“零和对策”(zero-sum game)，而是双方获益的“正和对策”(positive-sum game)。就世界上总体资源使用效率来看，北方向南方的技术转让并不是一件坏事，而且生产从发达国家向不发达国家转移为发达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有利于新产品的开发活动。就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可以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形成一种“赶超效应”(catch-up effect)。但是，作者们强调，技术从富国流向穷国决不是自发进行的，而是有赖于提高跨国公司的作用及这些国家对技术转移的反应。

(6) 新增长理论强调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亚当·斯密关于专业化促进分工、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思想具有基本意义。马歇尔关于递增收益趋势的思想也可与之媲美，但令人不解的是，在艾林·杨的经典论文《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发表之后，经济学界竟对这个问题长期保持沉默。

80年代新增长理论的兴起，不但复活了人们对长期增长和递增收益的兴趣，而且把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经济思想向前推动了一步。罗默在亚当·斯密的制针厂的古老故事中发现了某种不同的东西。罗默认为，对在10个工人中进行制针的生产任务的分工可以使劳动和原材料的利用更有效率，但真正重要的是，这样做也可以使各种思想的利用更有效率。与每个工人生产每根针不同的是，10个人能够分享单一的设计，进行单一的生产，即是说，进行多次复制(copy)。这是对基于规模经济的劳动分工的研究，罗默证明，这种源于规模经济的递增收益可能会导致无约束的增长。博兰德—杨建立了一个描述基于专业化经济的劳动分工模式，这个模式的基本点是使用了一个不同于以往的生产函数，以往的生产函数只描述产出与投入结构之间的技术关系，而此处的生产函数描述了生产率与专业化水平的关系，即技术与经济组织结构之间的关系。其基本思想是：劳动分工虽能带来递增收益，但却受交易成本的限制，从而把制度变迁与劳动分工演进结合起来。换句话说，就是“劳动分工取决于劳动分工的水平”。这就是说，如果交易效率提高，均衡的分工水平会上升，而这反过来会扩大交易规模，进而又提高交易效率，交易效率的提高又会进一步提高均衡的分工水平。这是一个不可逆的增长过程。这种以微观生产函数为出发点，基于专业化经济的内生劳动分工研究无疑是探讨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的一种有希望的途径。



(7) 新增长理论确认了政策对增长的重要影响,其理论和实证研究总结出一套维持长期增长的政策,如支持教育、刺激对物质资本的投资、保护知识产权、支持研究与开发工作、实行有利于新思想形成并在世界范围内传递的贸易政策,以及避免政府对市场的扭曲等。虽然强调政府政策的作用,但新增长理论家却不是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罗默认为,政策制定者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周期上,忙于进行“微调”和寻求操纵“软着陆”的方法是不对的,罗默坚持主张政府应着力于能促进发展新技术的各种政策。罗伯特·巴罗更是强调政府支出是“增长的催化剂”。就这种意义而言,新增长理论家们认为,各国长期以来的公共政策的着重点可能是放错了地方。自大萧条至今的这一段时期里,国家经济政策的很大一部分是用来处理经济周期的。当我们处在衰退时期时,政府总试图使经济上升,但在繁荣时期里政府又得试图去扼制已变成问题的通货膨胀。新增长理论则认为支撑经济周期有另一种进程,那就是探索与创新过程。正是这个进程使长期的生活水平提高。形象地说,如果你想把它当成一个图像来看的话,那就会看到经济增长是一条长期上升的趋势线,而经济周期则是围绕着这条线的小小的波纹线,而且决定我们在长期内能登多高的是这条线的斜率而不是这些小小的波纹线。因此,如果我们希望增长的话,我们就得把自己托付给探索发现的进程,正如罗默强调指出的:“如果我们不能持续地发现新思想的话,那确实会限制增长。是思想(整个探索发现的进程)导致增长的”。

## (二) 对新增长理论的批评和展望

80年代中期,新增长理论的产生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提出了许多深刻洞见,在国际经济理论界和各国实践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问题远没有全部解决。正如尼古拉斯·斯特恩(Stem, N.)在总结经济增长理论半个世纪的发展时指出:这些理论要么各成体系,要么将它们全部综合在一起,仍然没有使我们对经济增长中的技术进步机制有深刻的理解。这一理论还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之中,不少经济学家对这一新理论提出了批评。

(1) 新增长理论仍无法解决总量生产函数的问题。新增长理论工作的核心在于修改新古典增长模式使用的生产函数。例如,在新古典生产函数中加入知识或人力资本的因素,放松新古典生产函数对递增规模收益的限制等。从某种意义上,新增长理论是以新古典增长模式的总量分析框架为基础的,因而新古典总量生产函数存在的问题,就转移到新增长理论上。更有甚者,资本总量已存在严重的问题,而人力资本比资本更模糊,可测性更差,因此,人力资本的总量可加性问题可能更为严重。

(2) 新增长理论并没有在生产理论上取得突破。生产理论基本假设的变化是增长理论取得突破的关键。50年代索罗的贡献在于他在生产理论上对哈罗德假设的修正,索罗用资本和劳动可以完全替代的假设,替换了哈罗德模式中要素替代刚性的隐含条件,从而为满足哈罗德的均衡增长条件奠定了基础。然而,新增长理论仍然是以固定要素替代弹性(CES)生产函数和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就这种意义而言,新增长理论与索罗模式并没有本质区别,这一点在线性内生增长模式中反映得最为明显。近年来,虽然有人试图在这方面有所发展,但结果却难以令人满意。

(3) 索罗指出新增长理论只是某种非常简单的东西,即是放弃“资本”收益递减的思想。这一阶段的复兴可算之为一般多马模式的回归,惟一不同的是增加了繁杂的铃声和哨子。这些铃声和哨子包括允许资本和劳动之间以及各种形式资本之间的替代性,允许递减收益的缺失,采纳无穷上限的跨时最优化的框架,以及引入市场中垄断竞争等方面的内容。进一步地,索罗指出:“内生增长理论过分富于想象,他们通常只是以徒劳无益的方式加入某种有利的假定,然后,他们就伸出手指,取出加入的梅子,并由此认为已证明了某种东西。”<sup>①</sup>

(4) 罗伯特·巴罗在《经济增长杂志》序言中从两个方面对新增长理论提出了批评。首先,巴罗指出,尽管新增长理论在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但各国和地区近期经验研究却无法从新理论中获取多少灵感。相反,它却从扩展的包括政府政策、人力资本积累、生育选择和技术传递等内容的新古典框架吸取了更多的灵感。特别地,新古典模式中的有条件趋同(conditional convergence)的基本思想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有力支持。其次,巴罗认为,基本的技术变化理论对理解整体世界——尤其是处于技术前沿的经济——为什么可以在长期取得增长至关重要,但这些理论与各种经济间的相对增长率的决定毫无关联。“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内生增长理论的一个持久的贡献即是它所激发的经验研究却说明了新古典增长模式的解释力。”<sup>②</sup>

(5) 新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打开了索罗“余值”的“黑箱”,给出了技术变化一个内生的解释,但这一理论在强调人力资本和技术知识的同时,忽略了制度要素。虽然在近期这种状况有所改变,但距离构建一个规范制度内生化的动态经济增长模式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6) 新增长理论是一个数学味道很浓的理论,尤其在近年的文献中,数学技巧的运用越来越多,方程组越来越复杂。关于这一点,连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罗默也意识到:“如果我们少花一些时间来解方程组,多花一些时间来精确地定义我们用词的真正含义,那么在那些领域(新增长理论)中的学术研究和政策讨论会更加富于成果。”<sup>③</sup>循着这一思路,印度经济学家巴述(Basu, K.)进一步指出:“我非常赞同罗默关于方程式和数学的应用的方法论的观点。尽管我相信数学对于一个经济学家是一个重要工具,我同样认识到,许多经济学家把数学复杂性本身视为了一个目的。正是因此,当一个经济学家说:‘我尽量使我的模式尽可能地简单’时,通常的事实是,他或她是尽其可能地把模式复杂化了。这是大可不必的,因为经济学需要一种直觉的逻辑技能,这种技能是本质的,并且提供了极大的智力挑战。”<sup>④</sup>

诚然,新增长理论还很不规范,还存在不少局限,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一新理论对

① Solow R. Perspectives on Growth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4

② Barro R. Institutions and Growth, an Introductory Essay.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6. 6

③ Romer P. Two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Using Ideas and Producing Ideas.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2

④ Basu K. Comment on TWO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USING IDEAS AND PRODUCING.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2

人们重新认识长期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了不少深刻看法，已在并仍将在经济理论和各国经济实践中产生深远的影响。正如新增长理论家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所言：“我们不敢说已完全明了技术进步的决定因素，但我们相信，我们所描述的新的规范模式有助于我们达到这个目的。新增长理论已在包容现实性方面——如引入不完全竞争、不完全占有、国际依存和规模收益递增等内容——的正确方向上迈出了一大步，并且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方面对理解一个经济将在各种知识中如何投资相当重要。我们相信经济学这个特定领域的知识，像经济学的其他大多数知识一样，将会迅速且持续地得到积累。”<sup>①</sup>

## 第五节 新增长理论与知识经济的出现

80年代以来的高科技革命，尤其是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改变了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模式。据联合国经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OECD）报告，在近十多年来，该组织成员国的高技术产品在制造业中的份额翻了一倍，达到20%~25%。知识、技术密集部门，如教育、通讯、信息等产业的迅速发展，知识和技术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从本世纪初的5%~20%提高到现在的70%~80%，预计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建成后将高达90%。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世界经济正处在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转变的时代，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的强大生命力将支配21世纪的世界经济，并将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新增长理论在80年代的兴起和知识经济在本世纪末出现不是偶然的。新增长理论的兴起进一步推动了知识内生化的过程，促进了知识这种能带来递增收益的生产要素在经济中的运用。新增长理论强调专业化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和永久的源泉和动力；强调知识的生产不仅是边干边学的生产经验的累积，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理论强调内生知识、内生技术的重要性，即知识的积累和技术进步是源于厂商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努力的产物。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或许是随机出现的，但技术（或知识）的全面增加是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比例的。因此，新增长理论所强调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经济增长的方式孕育、促进了知识经济的来临，并构成知识经济的核心内涵。

### 一、知识、技术在经济中的应用和知识经济的出现

古典经济学家关注于经济增长的动态过程，也非常重视知识和技术等要素在经济增长中的应用。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强调了专业化知识和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首次把工人技能的增强视为经济进步和经济福利增长的基本源泉，并首次论证了人力资本投资和劳动者技能对个人收入和工资结构的影响。通过对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分析，斯密把经济增长和制度创新、技术创新紧紧地联系在一

<sup>①</sup> Grossman G, Helpman E. Endogenous Innovation in the Theory of Growth.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4

起，他指出，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决于两个条件：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从事劳动人数的多寡。而“劳动生产力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间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sup>①</sup>进一步地，斯密把分工、专业化和技术变化联系起来，指出：“用在今日分工最细密的各种制造业上的机械，有很大部分原是普通工人的发明。他们从事最单纯的操作，当然会去想发明比较简单的操作方法。”<sup>②</sup>这一分析表明，斯密已经意识到现代意义的生产经验的累积、边干边学式的专业化知识积累对技术创新的重要作用，并表明技术变化是内在且持续的。这种内在的、持续的专业化知识和技术的积累，能带来递增收益，进而构成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

在斯密之后，李嘉图意识到制造业领域的技术进步对递减收益的抑制作用。克拉克尽管看到技术进步也曾带来局部的和暂时的劳动力流离失所的痛苦，但他坚信，从全局和长远的观点来看，技术进步带来了巨大的好处。克拉克甚至认为，在他所处的时代，劳动者的所有生产力都是过去岁月中技术进步的结果，而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则工资阶层的未来就没有希望。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收入，它也如资本积累一样促使劳动力和资本的“向上”流动。作为一个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对知识和技术的论述很有启发意义。马歇尔认为，知识是我们最有利的生产力，而且强调把知识分成公众和私人财产是非常重要的，其重要性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对物质的东西进行这种划分更为重要，并且这种重要性在不断增加。透过对人的健康、精力和技能的重要经济意义的强调，马歇尔预见了我们今天讨论的人力资本问题。

1928年阿林·杨《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一文的发表把斯密对专业化分工、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的思想大大推进了一步。他集中于论述间接的和迂回的生产方法的增长和各行业中的分工（或者说专业化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长期影响，视每一生产的重新组合为一个新的发明和科学的进步在工业中的新的应用。从而把专业化分工、技术创新视为一个完全内生的、自我演进的过程，它们具有递增的生产力，进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遗憾的是，由于知识和技术进步导致递增收益与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均衡分析的冲突，这种对知识和技术作用的强调最终被淹没了。

在本世纪五六十年代，以索罗模式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开始重新思考经济长期增长的可能性。他们发现，如果没有某种外生因素的引入，以新古典生产函数为核心的新古典增长模式最终无法避免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在对增长剩余的计量中，他们发现传统的要素资本和劳动只能解释很少一部分增长，很大一部分增长剩余得不到解释，由此他们引入一个外生的技术进步因素。据估测，现代美国经济增长有3/4源于这种性质的技术进步。不难发现，这一增长理论把对技术进步的作用推向一个顶峰，技术进步成为远比物质资本和劳动力更为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然而，这一理论对知识的生产一无所知。我们想象一下，如果这个外生的技术进步来源被切断，经济终究难逃零增长的稳定均衡状态，从而经济的长期增长仍是无法解释的现象。

---

①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5

②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商务印书馆，1972，10

为了避免这种“不愉快的结果”，许多经济学家作出了努力。尤其阿罗和宇泽弘文的努力具有重要意义。他们首次给出了知识和技术进步的来源，并强调这种源于无意识生产经验积累或有意识的教育投资的内生化知识是经济增长的持续和永久的源泉。并且这种结论是建立在最优化的规范分析之上的，而且这些分析框架成为后来的新增长理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此后，舒尔茨和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理论的贡献把知识和技术内生化的过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从而在理论上，知识经济化和经济知识化不再是一个分离的过程，而是一个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的一体化的过程。

最有突破意义的是，在 80 年代中期，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在对新古典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组以“内生技术变化”为核心的论文，重新探讨了长期增长的源泉，构筑了一种新的增长理论。这一理论的重要突破是把技术内生化。新古典增长理论只考虑两个生产要素：资本和劳动。而罗默及其同行加上了第三个要素——知识和技术，并且知识和技术是比资本、劳动等更重要的生产要素。首先，知识就如资本一样是一个生产要素，它是“内生的”，源于厂商利润极大化的投资决策的努力，因此，尽管某些特定的技术突破（或知识的出现）或许是随机出现的，但技术（或知识）的全面增加是与人们为其贡献的资源成比例的。其次，知识（或技术）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再次，存在一个投资刺激知识积累，而知识积累反过来促进投资的良性循环。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的经济增长理论鼓励新知识的积累以及知识在经济中的广泛运用，它的出现无疑是大大加速了 80 年代兴起的高技术革命的步伐，确立了经济增长全面依赖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的观念，构筑了知识经济的理论基础，从而孕育并促进了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

## 二、知识经济及其内涵

知识经济的形成以及这一概念的提出，源于人类对知识在经济乃至社会生活当中的作用的认识的深化。16 世纪 ~ 17 世纪，英国的弗兰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此后许多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马歇尔、熊彼得和马克思等都对知识的作用作出重要的论述。60 年代 ~ 70 年代，丹尼斯·贝尔提出了“后工业化社会”的概念。1970 年，美国的托弗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提出“后工业经济”的范畴。1982 年，美国的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提出“信息经济”的概念。具有突破意义的是，80 年代中期产生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全面确立了知识经济化和经济知识化的一体化观念，孕育了知识经济的理论基础，促进了知识经济的形成。此后，“高技术经济”、“数字经济”的概念先后出现，1996 年 OECD 提出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首次正式使用了“知识经济”这一概念。并把知识经济界定为“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这一概念及其思想正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并正在孕育一次知识经济研究的浪潮。

### （一）知识的划分

知识经济概念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知识：①知道是什么的知识（know-what）；②知道为什么的知识（know-why）；③知道怎么做的知识（know-how）；④知道是谁的知识

(know-who)。

知识的概念比信息的概念广泛得多，信息仅限于“知道是什么”和“知道为什么”。前者是关于事实方面的知识；后者是关于自然规律和原理的知识，这种知识是大部分工业部门产品或生产程序科技进步的基础。这种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通常是在研究所或大学等专门机构内组织的。为了获取这类知识，企业需要与这些机构相互沟通，或者通过招聘科技专业人才，或者直接与研究机构保持关系或联合开发。

“知道怎么做”指的是做某事的技巧和能力。企业家评估一个新产品的销售市场或人事部主任挑选雇员或组织雇员培训使用的都是这方面的知识。这是在一个企业内部形成并享有的知识形式的典型，企业若想分享和借鉴这种知识，必须建立工业网络。“知道是谁”是指关于谁知道什么和知道怎样做的信息，就是建立可以与专家接触和有效使用他们的知识的特殊社会关系。在现代经济中，研究机构和研究专家的专业化分工细致，研究高度分散。对于企业管理者和现代组织者来说，运用这种知识非常重要，对现代企业家而言，仅考虑投资、设备等传统生产要素远远不够，获取新知识、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培训高水平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则更为重要。“知道是什么”和“知道为什么”是明确的知识，可以通过阅读材料或教材、参加专业会议或查询数据库获得，可以信息化。“知道怎么做”和“知道是谁”属于比较隐含的知识，难以量化和信息化。

## (二) 知识经济的内涵

概而言之，知识经济是知识经济化和经济知识化的一体化的过程。如何把握其内涵呢？

(1) 知识经济区别于物质经济。在物质经济中，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的投入，或者是依赖于我们一无所知的外生的技术进步。而在知识经济中，经济增长源于新思想的不断发现。诚如罗默先生所言，如果我们不能不断地发现新思想的话，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障碍。就这个意义而言，知识经济就是以思想 (idea) 为基础的经济。

(2) 经济的知识化过程。知识是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经济密切依赖于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根据新增长理论的研究结果，由于知识产品的特性（部分竞争性、部分排他性），知识作为一种资本化的生产要素（或称之为知识资本）不仅可以扩大传统生产要素的生产能力，而且可以提供调整生产要素、创造革新产品和改进生产工艺的能力。也就是说，知识要素具有递增的边际生产率。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递增性抵消甚至压倒了传统生产要素的递减的边际生产率，使整个经济具有递增的规模收益，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发展。

(3) 知识经济化过程。首先，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是一个内生化的过程。知识的发现不再是一个偶然、意外的收获。它是经济主体出于利润最大化的目的，而采取的有意识的投资行为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经济主体必须承担风险，当然也分享或功带来的高额垄断利润。其次，知识经济化过程是知识及其产品的产业化过程。随着知识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信息、科研、设计、创意、咨询、策划等知识活动将不断产业化，形成经济中的核心产业：知识产业。

(4) 知识经济的基础产业是信息技术产业。知识经济最突出的现象是信息技术的应用。25年前,世界仅有5万台电脑,而如今已增加到1.4亿台,全世界因特网的使用者约7000万人,预计2001年将达3亿。近年来,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的带动下,在全球GDP中,已有2/3以上的产值与信息产业有关。据美国商务部1998年4月15日报告,在过去5年里,信息技术产业为美国创造了1500万个新的就业机会,美国经济增长的1/4以上归于信息技术。

(5) 知识的网络化过程。知识经济即是思想、信息与技术不断生产、扩散和使用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企业和这个国家的经济成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依赖于收集和使用的知识的效率,因此知识的网络化至关重要。不同于传统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的单向创新模式,知识经济当中的创新过程是一个相互作用的网络化过程。研究、开发潜在的市场、发明或设计构思、设计与试验、完善设计与生产、销售各个阶段交互作用交互影响,而且研究所、大学、企业研究部门、政府研究部门将相互合作,跨越部门、跨越国界。

(6) 知识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知识经济使人类从开发有限的、可耗尽的自然资源,转向开发可持续的人类自身的智力资源。这种资源的积累具有累积效应,并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持续和永久的动力和源泉。

无可否认的是,初现的端倪知识经济和即将来临的知识经济时代必将对整个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不论是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生产组织结构,还是社会结构都将进行深化和升级。而且这种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还将引导人们的生活消费方式、思维方式向知识型、智能型的方向转化。而且,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知识经济来临步伐的加快,它对我们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会日趋广泛。因此,加强对知识经济的研究,以迎接知识经济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就愈显意义重大。

### 三、知识、技术能力与国际竞争力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国际竞争力是一国生产、组织、管理、营销和科学技术实力在市场上的集中体现和综合指标。国际竞争力究竟缘何而来?早在十八九世纪,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就以劳动投入和劳动生产率为基础,构造了成本优势的国际比较理论。在他们看来,国际贸易的基础是国际分工与专业化,而国际分工只不过是国内分工与专业化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一个自然延展,因此,在国内市场上劳动成本低、劳动生产率高、有价格优势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也是有潜在或实际竞争力的产业;在国内市场上劳动成本高、劳动生产率低、无价格优势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上也相对地缺乏竞争力。19世纪末进入工业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以来,以赫克歇尔、俄林等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把国际贸易与区际贸易结合起来,进一步探讨了各国成本优势的来源。他们继续沿用了古典主义的两商品、两要素、两国家的“二维”假定,认为一国之所以在某类商品方面拥有比较优势,乃是因为生产该商品所需的主要要素(资本或劳动)在该国更为丰裕一些。因此,各国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重心应该放在最密集地使用该国最丰裕的生产要素的那些部门,这无疑地使得先验的、前定的自然资源状况在国际

竞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发达国家居于“中心”、发展中国家居于“外围”的国际贸易格局和国际竞争力态势也具有了某种不可逆转的意义。

进入 20 世纪末以来，国际市场竞争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批新兴工业化经济国家迅速兴起，素以产业立国的日本国际竞争力下滑，而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再度增强，并且至今保持着不衰的势头。表面上看，这种竞争力的逆转是令人费解的，然而从理论上讲，就长期增长和国际贸易的源泉而言，这种逆转决不是偶然的。随着国际贸易在广度和深度上的空前延展，传统的“二维”假定归于破产。人们日益清楚地认识到，在经济增长中，劳动、资本、自然资源等要素在生产过程中都服从收益递减规律，在长期，它们不可能充当经济增长与国际竞争的源泉或基础。相反地，人力资本积累和内生技术创新则不仅自身具有收益递增趋势，而且它们还能抵消甚至超出其他要素的收益递减趋势，以保证一个企业、一个产业在长期呈现出收益递增的发展势头。在这样的背景下，一国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它能否不断地对人本身进行投资，即促进人的知识化；能否不断地对研究与开发活动、对技术积累和无形资产进行投资，即促进生产的知识化；以及能否不断地对高科技产业进行投资，提高传统产业的高科技含量，即促进经济的知识化。可以说，知识的积累及其在人、技术和制度上的凝结与体现，成了一国国际竞争力的根本源泉。

一国国际竞争力的变化伴随着技术创新而生，并且日益作为技术积累的结果而生。技术的积累包括对一国特有的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的累积性获取，因而不仅是一个生产过程，而且是一个与个人、组织的学习和知识的积累相联系的过程。过去 40 多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产能力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并且产业重心由传统劳动密集型部门转向了资本密集型部门，甚至正在向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部门转变，在国际竞争中逐渐由简单技术和低工资生产的“价格敏感型”产品向以高新技术和高工资生产的“绩效敏感型”产品过渡。但是在生产能力提高的同时，技术水平的状况却远远不能令人满意，这究竟是因为什么呢？

我们认为，关键原因在于生产能力与技术能力没有得到明确的区分。生产能力是在给定效率水平和给定投入组合下用于生产工业品的资源，包括设备（体现在资本中的技术）、劳动技能（操作和管理诀窍及经验）、产品和投入的技术要求、组织体系等。而技术能力是采用和模仿外国技术在生产中融合为技术管理所需的新的、特殊的资源，并把新获得的技术投入生产性使用的能力，技术能力包括技能、知识、经验、制度结构与产业间的联系效应等。前者关注的是经济发展的静态效率状况，而后者关注的是经济发展的动态过程，旨在提高生产能力的政策措施并不必然带来技术能力的提高。我国同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样，认为经济发展的核心政策应集中于激励生产能力的积累和促进对外贸易，知识技术的动态变化则被认为是产业发展与贸易政策的一个或多或少是自动的副产品。事实上，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低技术资本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主要建立在比较成本基础上的阶段，生产能力与技术能力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到了发展高技术产业，竞争力转而建立在知识、技术基础上的阶段，生产能力与技术能力就越来越不一致了。提高技术能力不应该作为副产品，它本身就应该是一个政策目标；对技术发展的认识也不



应该局限于技术本身的运作层面，而要深入到作为技术的基础的知识的生产层面上去。

传统上，技术的发展被视为是一个水平扩散的两阶段过程，先是在发达国家中，一个新技术被发现和创造出来，并被初步地商业化，体现到其生产能力上；然后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地吸收和利用这些技术，提高其生产能力。事实上，技术发展所包含的不只是获取机器、产品设计、工艺及相关的诀窍，它还包括为了适应特定的情形，获得更好的绩效而进行的持续的知识的积累过程。我们把技术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首先是采用阶段，技术被采用并结合到生产过程中去。然后是后采用阶段，技术的采用者通过生产过程中的学习，不仅提高原始技术的效率，而且调整技术以适应投入产出市场上特殊的变化。接下来是技术学习阶段，伴随着前两个阶段，在采用新技术的企业和国家中会发生一个知识和技能不断累积的过程。开始时，企业必须积累关于现行技术的知识，以便能在预期的绩效水平上运作新技术，随后企业需要积累更深层次的知识、技能和经验，以便更多地发现和引入更新的技术。随着知识的积累，这个阶段可能会融入或者说渐渐转入技术创新阶段。

由上述分析可知，与知识的生产和积累相关联的技术发展，从不同方面影响着决定一国国际竞争力的许多绩效变量。诸如在新的生产能力上投资的效率（包括投入组合的效率和所采用的技术的效率）、既有企业和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产品性能和设计的竞争力、与供给商和消费者之间前向与后向联系的强度、向更为密集的生产方式转化的能力，以及随着发展中国家趋近国际技术边界，成功地进入新产品市场的能力等。一般地，一国经济若是停滞于第一、二阶段，则技术存量往往较小，且技术知识增进的速度很慢，这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发生的事情；若一国经济进入了第三阶段，则技术存量就会迅速增大，技术知识的积累也会加速，这是在一些高绩效的新兴工业经济中出现的现象；若一国经济已经进入了第四阶段，则技术存量迅速膨胀，技术知识也呈指数式增加，这是当今发达国家经济中发生的事情。显然，每个国家都希望迈向技术发展的较后阶段，但并非都能如愿。那么，是什么因素在影响着或者制约着一国获取知识和积累技术的能力，进而制约国际竞争力呢？

(1) 资源的投入量。知识与技术不同于其他生产要素之处在于它们不是天生具备的禀赋，积累知识与技术需要大量的投入。由于知识的生产、专业化、技术化、市场化等全部过程都异常复杂，充满着摸索与试错，因而需要投入的资源量是相当大的。尤其是重大的科学突破和技术创新，要求进行无数次的设计、构造和试验，并进行试用、试运转、破坏性测试等活动，对此所需的投入往往超出许多企业乃至政府的承受能力。

(2) 企业的作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企业似乎仅仅是一个生产单位，它们与积累知识与技术是无关系的，这是造成知识与技术存量不足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在知识与技术具有专有性、累积性，并且部分地带有隐含性的情形下，大多数的技术学习和技术改进都是发生在企业中的。即使在发达国家，研究与开发（R&D）活动也只是冰山之一角，只是少数大企业进行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开发活动的一种典型形式，而大多数中小企业的技术活动是融合到其产品设计、质量控制、产品组织和工业工程活动之中的。大量分析表明，一国的知识和技术水平与企业用于人力资本积累、R&D 等活动的投资是

显著正相关的。

(3) 隐含知识 (tacit knowledge) 的存量。技术中通常包含两类知识, 一类是有形的、明显的、规范的知识, 它体现在技术的细节性说明中; 另一类是无形的、隐含的、不规范的知识, 它多少是“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 是体现在人和制度中的关于如何运用和积累技术的“经验之谈”。许多发展中国家单纯注重前一种知识, 把有限的资源用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 但却不在运用技术的过程中积累经验, 结果重复引进, 引进的技术落伍、不适宜或不得其用的现象时有发生, 始终难以形成本国专有的技术。这是造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知识与技术水平的差距不是缩小而是扩大的重要原因。

(4) 外部性、获利能力 (appropriability) 与不确定性。在知识与技术的积累中存在显著的外部性。大量的知识、技能、技术诀窍等都是企业内部通过对 R&D 和培训的投资而形成的, 但是这种投资与公共教育一样, 是对一个经济的总知识库和总技术库所作的贡献, 企业通常不可能得到投资的全部收益。由于企业技术活动的私人获利不充分、不确定, 所以在自由市场条件下, 企业的技术投资往往是不足的。在不同国家, 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把技术投资的外部性内在化, 减少企业获利的风险与不确定性, 成为影响其知识存量与技术能力的重要因素。

(5) 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知识与技术的积累通常是渐进的。在专业化与隐含知识日益重要的情况下, 个人和企业都不可能同时涉猎不同的技术和知识领域, 也不可能轻松地转入一个全新的技术领域。相反地, 它们会沿着特定的轨迹前进, 在这些轨迹中, 过去的技术学习和经验积累对于技术发展的方向、速度起着重要作用。技术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至少有三点意义: 一是说明企业间、国家间技术效益上的差距不仅源自不同的要素禀赋或进入壁垒, 而且源自已经积累的知识和技术存量上的差距; 二是说明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 三是说明知识与技术积累的速度和构成不仅影响短期竞争效率, 而且影响长期比较优势。

#### 四、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

过去两个多世纪中, 提高国际竞争力可以说始终是各国努力的方向。纵观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技术轨迹, 可以看到, 发达国家中知识和技术的积累与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是通过诱致性机制来实现的。这包括基于减轻本国相对要素稀缺的成本诱导而带来的要素节省型技术发展; 基于不同企业、部门间的不平衡性, 通过对具有高联系效应的部门持续投资的诱导而带来的技术变迁、技术积累的机会以及体现在前向汲取 (upstream extraction) 过程与后向加工 (downstream processing) 过程中的竞争力; 基于对具有多种潜在用途的核心技术知识的累积性掌握和开发而带来的技术变迁。依循这种技术轨迹的国家的共同特征是, 其知识与技术的积累是渐进的、缓慢的, 国际竞争力也是在一次次技术创新中经过漫长的历程而得到提高的。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 全球知识存量迅速膨胀的今天, 要构造以知识为基础的国际竞争力, 就必须创造出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制度基础, 从各个不同层而上塑造出 R&D、知识积累、技术创新的运作机制。

##### (一) 激励机制

知识积累与技术创新就其本质而言不是一般的市场现象，而是一种制度现象。如果市场制度是完全竞争的，则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的外部性都可以被内在化，私人从事这类活动的动力是由市场运作中的利益导向来保证的。然而完全竞争生产制度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创新活动的外部性使得对这类活动的私人供给不充分。只有当现行制度安排能有效地将这些外部性内在化，使知识与技术创新的私人成本收益与社会成本收益趋于一致时，对知识、技术的投资才能达到社会最优水平，而这又需要建立起一套有效的激励机制。

一方面是对知识积累的激励。知识最为重要的特征在于其使用权的完全可扩散性、收益权的不可排他性和价值的不可估价性，作为公共品和免费品的知识更是不能给其所有人带来任何经济利益。为此，需要借助制度安排，把人们所知的东西变成一种在法律上受保护的使用权，即浓缩成可以传递的信号、信息；同时还要通过保护专利、版权、商业诀窍、商业秘密的特殊法律安排，界定和维护知识产权，赋予拥有新知识的所有人排他地使用其知识并从中获利的权力，克服由知识外溢和搭便车问题等造成的知识投资的不足，引导社会将最优数量的投资投入到社会所需要的新知识的积累活动中去。

另一方面是对技术积累的激励。技术创新带有公共品性质，其典型特征是初始生产的固定成本庞大、复制和分销的边际成本很低、非排他性的所有十分普遍。因此，即使是竞争性市场都难以把资源配置到具有这类性质的活动中去。要克服知识与技术创新活动方面的市场失败，解决私人从事这类活动的获利性问题，使创新活动成为内在的持续的过程，需要设计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其一是补助安排，即以公共融通的资金对于竞争产生的项目予以奖励或研究资助，并对其他从事科学研究与发明的私人和组织予以补贴，鼓励私人公开他们的研究发现和技术成果。其二是协约安排，即政府直接参与技术创新活动，必要时与私人部门签订协约，以保证技术创新的供给不必课以太高的价格。其三是产权安排，即从法律上界定知识产权并保证其运作，同时营造出一个市场运行环境，至少在一定时期内允许创新企业保留垄断地位，使创新者能够从使用其成果的其他人那里收取费用，弥补其创新成本。

## （二）扩散机制

知识与技术的内生积累与外生扩散往往被简单地视为两个前后相继的过程，其实它们之间存在互为作用、互为催化的反馈关系。新知识新技术的广为采用可以促进技术改进的加快，而这反过来又促进了技术扩散范围的拓宽，直到新技术占领市场为止，这是一个向上螺旋的良性循环。但是有时也会出现恶性循环，即早期未能把新知识新技术市场化，会使其丧失进一步改进的机会，反过来又阻碍其扩散。要促进知识技术扩散中的良性循环，同样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安排。

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组织体系。在知识技术的扩散中，使用者要承担至少三项成本，即评价技术信息以确保其真实有效的成本，获取体现着新知识新技术的专门化的材料和设备的成本，以及获取专门化设施、辅助产品和劳务以确保技术运行的成本。这三类成本都具有随着技术扩散范围的扩大而下降的特点。然而旨在促进知识积累和技术创新而对知识产权施加的有力保护，却可能提高人们获得被保护的新技术的成本，限制技

术扩散的范围。为此，政府在积累知识与技术创新的同时，也要协调好技术扩散的组织体系，包括建立专门的技术市场，协调企业间的契约安排，促进大公司的各部门间有管理的技术转移等。新知识新技术扩散的不可逆性、动态性和成本递减特征意味着，初始的知识和技术优势或劣势，能够扩散、积累成与其他知识技术相比更大的优势或劣势。一种新的生产技术、产品设计，如果没有组织好其扩散，则它可能被“闭锁”（locked in）；而如果组织好其扩散，则它可能在竞争与市场化进程中得到“开锁”（locked out）。

另一方面，要建立知识与技术扩散中的吸收和模仿机制。知识与技术的扩散不仅仅是一个水平扩展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垂直的知识深化与技术改进的过程。只有当每个企业通过模仿、逆向技术工程等形式把接受的新技术化为己有时，整个产业乃至整个经济的技术实力才会提高。为此政府不仅要对基础研究进行资助和补贴，而且要对企业内部的应用性研究、开发性研究活动和技术改造活动提供减免税或补贴等优惠，以降低企业的模仿成本。尽管政府的各种补贴可能会强化创新性企业的垄断地位，降低技术扩散的初始速度，但是就长期而言，这些补贴会更广泛地扩散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扩大知识与技术扩散的最终规模。

### （三）风险机制

对知识、技术的投资是高风险的投资，将新知识、新技术融入现实生产中更是要承担相当大的风险，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在知识积累、技术创新与扩散过程中规避和防范风险显得尤为重要。因此需要运用各种政策和制度安排，促进风险投资，支持高技术产业化。这包括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培养具有经营、金融、企业管理、科研、技术等方面知识且具有预测、处理和承受风险能力的人才；通过资金注入政策、税收减免政策、优惠信贷政策、风险补偿政策等提高风险投资的回报率，把更多社会资金吸引到高技术产业中来；加快产权、股票等市场的发育，促进风险投资业的发展，为高技术产业融通资金、分散风险。在充分考虑到知识与技术的创新者的风险的同时，还要看到知识与新技术的接受者也是有风险的，在技术市场不健全、相应的法规不完善的情况下，这种风险更为突出。因为在市场上交易和分享的只是接受其中规范化的知识，但是这些体现在论文、专利、蓝图和其他形式规范化知识中的信息还不足以使技术进入使用，或者不能保证技术的使用达到预期效果。技术水平越高，其技术知识的专业化和个性化程度越高，对于隐含知识的需要越是呈指数式增长。隐含知识原则上也是可以交易和分享的，但途径往往十分狭窄。因此政府需要制定更明晰可操作的法律来规范知识与技术的交易，有组织地举行示范会、博览会、个人引介、专家咨询、技术交流等活动，以便使隐含的技术知识为技术接受者所接受，降低知识与技术在扩散、应用过程中的风险。

### （四）学习机制

技术变迁不同于技术学习。前者包括把新技术融合到企业的生产能力中去的各种方式。由于大的新技术项目所需的投入都可以用市场机制来获取，因此使用技术的企业扮演的是一个消极的角色。后者指的是强化企业技术进步的能力的任何过程。随着工业生产中知识技术密集度的上升，企业技术进步所需的无形资源不再被视为产生企业生产能力的资源的一个边际，它们在数量上、性质上都变得越来越重要了，建立内生的学习与

人力资本积累机制显得日益重要。

(1) 要建立企业中“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或“边用边学”(learning by using)机制。内生技术创新与内生的学习过程是紧密联系的。研究表明,技术创新尽管受那些重大的科学突破的推动,但是在长期,技术是沿着与其扩散相关的轨迹逐步演进的。新产品或新生产工艺的最初形态往往存在许多设计上或制造上的缺陷,技术的不断完善是通过大量小改进的累积来实现的,而这些小改进又是生产者、使用者不断学习和积累人力资本的结果。人力资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积累,但尤为重要的是,在实际生产中,在使用者、制造商和商品销售者之间往复的交叉作用中得到的技术培训、专门知识和经验的积累、信息的反馈等,就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发展而生的内在的“边干边学”或“边用边学”机制。

(2) 要由政府出面建立公共的教育与“边培训边学习”(learning by training)机制。学习具有显著的外部性和公共品特征,并且投资于学习的预期收益不确定、不稳定、期限长,在技术日益复杂化的情形下,评判学习的预期收益更加困难。因此,企业对于学习的投资往往是不足的,而政府用以促进技术积累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对各个层次的教育、学习予以大量投入。通常地,对于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完成义务教育,培养出能识字的劳动力就足够了;对于资本密集型教育,需要的是受到一定技术训练的专门的劳动力;对于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产业,需要的则是高级的技术人才与管理人才。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公共教育、培训对人们基本素养、技能的培养,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类教育的经济收益主要不在于公开发布了多少信息,而在于供给了多少具有解决问题能力、熟知现代科学研究方法与工具、参与国内外专家交流网络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等专门人才,显然这对于知识的累积与技术的创新恰恰是至关重要的。

(3) 要建立产学研结合的技术学习机制。以公开出版为目的的科学研究与以盈利为目的的技术开发之间是互相作用与反馈的。技术为科学家提出了科学解释的挑战,科学家的工作也提出了技术挑战,引发着在产业领域中把新的科学发现投入新的应用;另一方面,科学研究需要的物力人力的投入日益庞大,设备日益标准化复杂化,研究成果的体现与转移方式日益多样化,这笔巨大的、不可分的沉淀成本可能连大公司的金融能力都难以承担,因而联合产学研各界的科研、开发和人力资本积累等活动,成为促进技术学习的一个重要方面。

#### (五) 引进机制

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水平上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距离。这显然是一种劣势,直接影响着国际竞争力和经济增长潜力;但这也包含着一种“后进的优势”(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即发展中国家可以从知识、技术的国际传播、转移、模仿和应用中,享受国际知识技术总存量的外部性。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 R&D 活动都以公共部门为主,它们不是十分关注生产部门对技术的使用性的需求,而是大量重复投资于开发那些在发达国家已经开发出来了的技术,结果相当大数量的发达国家的新知识新技术却没有被发展中国家获取。

一方面要建立引进新技术的机制。“后进的优势”不是自动的,它需要对引进和使

用新技术进行投资才能体现出来。发展中国家接触、引进外国知识技术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购买新设备、对外直接投资、技术贸易许可、使用业主所有的技术、吸引技术人才由国外回国、从事 R&D 及逆向技术工程等活动，此外还可以通过复制品、外国公开刊物、商贸会、数据库、外国出口商、与外国居民的非正式联系、本地的教育培训等多种方式获取国外新知识新技术。不同经济在不同阶段上所采用的引进技术的方式会有不同的侧重，但有一点尤为值得重视，那就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曾经有大量“人才外流”（brain drain），他们在国外接受了系统的高层次的教育训练，具有较高的知识结构和技術修养，吸引这些人才回国形成“人才回流”（brain redrain），对于把握国际新技术动态，成功地引进新技术作用极大。韩国、我国台湾省都充分利用了“人才回流”，加快国内技术人员的培训，不仅保证了已经引进的技术的运作，而且还积累了大量的隐含技术知识，使得技术引进者更能区分哪些技术是适宜的和有发展潜力的，从而在引进其他相关的类似的技术时更有主动性和谈判能力。这个过程可以说是“学会引进”（learning to borrow）的机制。

另一方面要建立吸收、使用新技术的制度环境。引进技术不是终结，而只是一个开端。新技术必须经过调整以适应本国情况，在整个经济中扩散、使用，直至最后被新的更好的技术替代，显然获取技术不是一个一次性的过程，而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过程。在整个过程中，政府要创造一个激励体系，突出企业作为创新主体的地位，鼓励企业提高效率，改善绩效，参与国际竞争。企业越是参与竞争，越是要跟踪新知识新技术；而企业越是改进技术，越有出口竞争力，从外商那里得到的新设计、新信息、技术帮助、技术培训和管埋经验越多。同时还要营造吸收和使用新技术的制度框架或制度基础设施，这不仅包括通过各种公办、民办或合办的高等院校、研究所和其他机构，提供技术信息、生产建议、技术咨询、技术辅导等公共服务，促进新技术更广泛地采用和扩散；而且包括通过各种正规与非正规的教育、职业培训等活动提高劳动投入的知识水平与技术素养，形成一个技术人力资本基础。这些制度基础对于吸引外资、引进外国技术和开发本国技术，直至形成国际竞争力都是十分关键的。

## 第六节 经济增长的数量、结构和影响因素分析

50年代至60年代，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增长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向更深入、更实证化的方向发展，即由一般的经济增长理论或模式研究转向具体的经验统计论证、国别分类研究和详细的因素分析。这期间的代表性理论，主要有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的数量与结构的分析和索罗、丹尼森（Denison, E.）、肯德里克（Kendrick, J.W.）等人关于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

## 一、经济增长的数量与结构分析

库兹涅茨早年从事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方面的研究，50年代末以后，他发表了一系列论著，利用统计方法对100多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构成进行了历史的分析比较，考察了这些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生产率、经济结构等经济变量在经济增长中的变化趋势、特点及其关系，据此总结出有规律性的结论来揭示经济增长的全过程。

### （一）经济增长的含义与指标

库兹涅茨根据他的经验统计分析给经济增长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定义为给居民提供种类日益繁多的经济产品的能力长期上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是建立在先进技术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识的相应调整基础上的。”<sup>①</sup>这个定义有三层含义：

第一，经济增长是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提高，即增加国民生产总值能力的提高。

第二，经济增长是以技术进步为基础和源泉的。

第三，经济增长是以制度（政治与法律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和思想意识的不断调整为必要条件的。

这一定义规定了经济增长的内容、基础和条件，不仅包含量的因素，而且包含质的因素，尤其是把制度、思想意识等社会条件的改变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方面，这已很接近“经济发展”的定义。

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库兹涅茨根据其国民收入核算理论，将经济增长的衡量指标规定为国民收入的增长，包括国民生产总值、国内生产总值、国民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均国民收入等指标体系。之后，各国普遍采用国民收入指标体系来度量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也一度使用这个指标来度量经济发展。

### （二）经济增长的特征

库兹涅茨根据英、法、美等14个国家近百年的经济增长统计分析总结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六大特征：

（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人口呈加速增长的趋势，但人均产值的增长率要高于人口增长率。

（2）由于技术进步的推动，生产率不断提高。

（3）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结构的转变率很高。经济增长不断改变着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消费结构、收入分配结构和就业结构等，它使农业过剩人口转向城市和工业，小业主转向大企业，从而促成了农业向非农业、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转变反过来又推动了经济更快地增长。

（4）经济增长伴随着社会结构与意识形态的迅速改变。经济增长使过去僵化的社会结构变得比较灵活，使传统的思想观念转变为增长、工业化、城市化、国际化等新意识。

（5）经济增长不是一国的独特现象，而是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扩大，成为各国追求的

<sup>①</sup> 库兹涅茨，现代经济的增长：发现和反映。见：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2辑，商务印书馆，1981

目标。

(6) 经济增长在世界范围内是不平衡的，因而世界经济增长受到限制。

### (三) 经济增长的结构和源泉

库兹涅茨根据统计资料对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作了分类研究，结果发现：①14个国家近50年来，总产值的年增长率为3%，人口年增长率1%，人均总产值年增长率为1.98%；②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劳动力数量趋于上升，但人均工时投入量却以年均0.3%的速度下降；③总资本存量年均增长率为2.54%，人均资本存量的年均增长率为1.52%。

经过大量计算和分析，库兹涅茨得出一个结论：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的结构中，25%归因于生产资源投入量的增长，75%归因于投入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效率）的提高。因此，经济增长主要是靠生产效率的提高（而不是资源投入数量的增加）推动的，而生产效率的提高又是由技术不断进步引起的。所以，科学技术进步是现代经济增长的“源泉”<sup>①</sup>。

### (四) 经济增长过程收入分配的变化

库兹涅茨在对14个国家经济增长过程收入分配的分析中，得出了收入分配结构在现代经济增长中的变化趋势：①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在经过长期的稳定和略有上升的变化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出现下降趋势。②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上升。原因是劳动的相对价格提高了，而这又是由于教育的发达改善了劳动力质量、提高了劳动效率的结果。③个人和居民户的收入分配差距日益缩小并趋于平等。库兹涅茨根据统计资料分析得出一个收入分配变化的规律性：假定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之前是平等的，那么，在经济开始增长的初始阶段，收入分配出现不平等。不平等表现为全社会收入分配不均，甚至每个人的收入都没有增加；但随着经济继续增长，收入分配不均的状况逐渐缓解，当经济增长达到一定水平、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各部门劳动生产率和收益差别缩小后，收入分配才从先有利于高收入阶层、再有利于中等收入阶层、最后有利于低收入阶层，依次变得较为平等。这种情况被称为“库兹涅茨效应”（Kuznets effect）。

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过程中收入分配变化的理论是于1955年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等》<sup>②</sup>一文中提出的，但他考察的是发达国家的情况，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未作详细论证，也没有画出图形。直到1963年后，他才进一步对此作了分析。之后，阿德尔曼（Adelman, I.）和莫里斯（Morris, C.T.）于1973年运用库兹涅茨的方法，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阶段以及收入分配的变化作了考察<sup>③</sup>。阿德尔曼等人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分为5%的高收入阶层、20%的中等收入阶层和60%的低收入阶层三类，然后发现：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当狭小的工业部门开始扩张

① 库兹涅茨. 现代经济增长. 英文版. 1966. 826

② 库兹涅茨. 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均等. 美国经济评论, 1955. 3

③ 阿德尔曼, 莫里斯.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 英文版. 1973. 178 ~ 183



时，农业人口的收入分配明显出现不均等。尤其是当外资企业引入后，收入分配不均等更加恶化。总的来说，60%的低收入者和20%的中等收入者的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都显著下降，只有5%的富人的收入比重明显上升。经济发展达到较高阶段后，高收入的5%人口的收入分配基本维持原状，而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开始上升。资料表明，最穷的60%人口的收入比重在经济增长初期绝对下降，随后，由于政府在教育、就业机会等方面对他们的帮助，他们的收入份额有所增加，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二元结构趋于消失时，他们的收入比重才较大幅度地上升。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变化也呈一条“倒U型”曲线。人们据此将上述情况命名为“倒U曲线”(inverted U-shaped curve)或“库兹涅茨曲线”(Kuznets curve)。

1974年后，阿鲁瓦利亚和钱纳里等人又考察了60年代和70年代初66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情况，也得到了—条“倒U型曲线”<sup>①</sup>：

阿鲁瓦利亚等人的研究表明：大约有3/10的低收入国家、3/15的中等收入国家和3/20的高收入国家存在着严重的收入不均等情况。可见，收入不均等的分布顺序是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所以，经济发展水平越低，收入分配越不平等，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收入分配越趋于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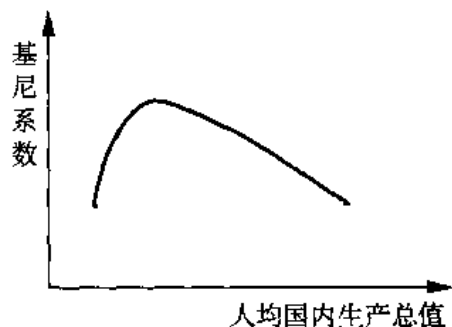


图 2.6 基尼系数

收入分配在经济增长初期出现不均等的主要原因是部门间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收入差异很大，财产收入比重较大，而且国家和私人资本家都把利润用于再投资，以解决此时的资本积累不足问题。收入分配由不均转向均等化的原因是：①随着经济增长，工农业、工商业和服务业等产业结构发生了转变，使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与收入差异缩小。②劳动力结构发生了变化。收入差别较大的个体劳动在总劳动中的比例缩小，蓝领工人人数减少而白领工人人数增加，从而使低收入阶

层人数减少。③财产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比重降低。④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因素发生了变化，如收入均等化措施的实施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推行等。

库兹涅茨的上述理论、分析方法和结论，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也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因而被广泛运用于西方发展经济学中。

## 二、经济增长因素分析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是研究影响经济增长的源泉、因素，并度量它们所起作用的大小，以寻求促进经济加速增长的途径与方法的一种理论。这一分析起源于50年代至60年代一些美国经济学家对“为什么美国的经济增长率低于日本、西欧国家”问题的研究，它是在索罗的领导下，由丹尼森、肯德里克等人完成的。这一理论主要包括经济增

<sup>①</sup> 阿鲁瓦利亚，不均等、贫困和发展，发展经济学杂志，1976，12

长核算方法、全部要素生产率分析、部分要素生产率分析（又称经济增长因素分类分析）以及经济增长因素的国际比较等内容。

### （一）经济增长的核算方法

经济增长的核算方法（The Growth Accounting Approach, The Growth Accounting）是指研究经济增长与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计量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所作贡献大小的分析方法体系。

### （二）劳动和劳动生产率分析法

这种方法渊源于古典经济学。在斯密那里，产出（ $Q$ ）的大小主要取决于劳动投入量的大小（ $L$ ）和劳动生产率（ $Q/L$ ）的高低。因此，产出水平等于劳动力总数与平均劳动生产率之积：

$$Q_t = \left(\frac{Q}{L}\right)_t \cdot L_t$$

对上式求全微分：

$$dQ = \frac{\partial Q}{\partial (Q/L)} \cdot d(Q/L) + \frac{\partial Q}{\partial L} dL$$

$$dQ = Ld(Q/L) + \frac{Q}{L}dL$$

两边同除以  $Q$  得：

$$\frac{dQ}{Q} = \frac{d(Q/L)}{Q/L} + \frac{dL}{L}$$

或，

$$\frac{\dot{Q}}{Q} = \frac{\dot{L}}{L} + \left(\frac{\dot{Q}}{Q} \cdot \frac{\dot{L}}{L}\right)$$

$\dot{Q}/Q$  代表产出增长率， $\dot{L}/L$  为劳动增长率， $\dot{Q}$  为产出增量， $\dot{L}$  为劳动增量。

### （三）资本和资本—产出比分析法

这一方法源自哈罗德—多马模式。该模式认为，经济增长率等于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

$$G = \frac{s}{C}$$

这个公式表明：在  $C$  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率主要决定于资本存量（或投资）的大小。

### （四）总量生产函数分析法

1956年，索罗提出了总量生产函数分析方法。若以  $Q$  代表产出， $K$  代表资本， $L$  代表劳动，则产出水平为：

$$Q = f(K, L)$$

$$\frac{\dot{Q}}{Q} = \omega_K \frac{\dot{K}}{K} + \omega_L \frac{\dot{L}}{L}$$

意为生产增长率（ $\dot{Q}/Q$ ）等于资本、劳动的投入增长率（ $\dot{K}/K$ ， $\dot{L}/L$ ）与资本、劳动各自的产出弹性之积的和（参见本章第二节）。

1957年，索罗又修正了上式，考虑了技术进步（ $\dot{A}/A$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上式改为：

$$Q = A(t) f(K, L)$$

$$\frac{\dot{Q}}{Q} = \frac{\dot{A}}{A} + \omega_K \frac{\dot{K}}{K} + \omega_L \frac{\dot{L}}{L} \quad (27)$$

这就是在技术进步（中性技术）条件下按总量生产函数分析得出的计量经济增长率的公式。

#### （五）增长的“余值”分析法

传统的经济增长因素核算方法通常认为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推动的，因而在分析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大小时，用索罗—斯旺模式来计量。比如，要计量资本对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可以用经济增长率减去劳动所作贡献的份额求得：

$$\omega_K \frac{\dot{K}}{K} = \frac{\dot{Q}}{Q} - \omega_L \frac{\dot{L}}{L}$$

同理可得：

$$\omega_L \frac{\dot{L}}{L} = \frac{\dot{Q}}{Q} - \omega_K \frac{\dot{K}}{K}$$

例如，一国的年经济增长率是5%，已知资本投入的贡献份额是3%（占60%），那么劳动投入贡献的大小就是2%（占40%）。

但是，这种计量方法在50年代后期以后被证明已经不足以完全说明经济增长的源泉了。1957年，索罗在他的研究中发现，除要素投入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对经济增长起着更大的作用，索罗称之为“技术变化”。他还认为，这种技术是中性技术。这种技术变化可以独立地抽象出来，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单独因素，但严格地说它是体现在资本存量（机器设备，主要是新机器中）和劳动素质中的，并且主要体现在资本存量之中。索罗依据他的总量生产函数，认为技术变化是通过使生产函数发生变动来发挥作用的，这一作用的大小可以用总量生产函数公式的变形来求得，即：

$$\frac{\dot{A}}{A} = \frac{\dot{Q}}{Q} - \omega_K \frac{\dot{K}}{K} - \omega_L \frac{\dot{L}}{L}$$

但在实际计量中，索罗又认为技术变化主要是体现在资本存量中的，因而他列出的计量技术变化作用大小的公式是：

$$\frac{\dot{A}}{A} = \frac{\dot{Q}}{Q} - \omega_K \frac{\dot{K}}{K}$$

或，

$$\frac{\Delta A}{A} = \frac{\Delta Q}{Q} - \omega_K \frac{\Delta K}{K} \textcircled{1}$$

索罗指出，他的分析是要为人们研究经济增长问题提供一种新的“基本方法”，这

① 索罗·技术变化和总量生产函数，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57. 8: 312~320

种方法可以“将人均产出的增长中由技术进步引起的部分同由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变动引起的部分区分开来”。毫无疑问，索罗的这一方法的确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它启发人们认识到：在经济增长中，除了要要素投入增加所作的贡献外，还有更大的一部分增长率需要用其他因素的变化（如技术进步）来解释。

循着索罗的思路，丹尼森等人又进行了多年坚持不懈地探索。丹尼森在1962年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面临的选择》一书中，明确指出：在美国的经济增长中，除去要素投入增加的贡献外，还有更大一部分增长率无法用要素投入本身解释，他称之为“我们尚不知道的因素”（the coefficient of our ignorance）或“我们尚不知道的度量”（the measurement of our ignorance）。1967年，丹尼森又研究了9个工业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发现经济增长中有近2/3来自要素投入增加以外的因素，他称之为“余值增长”（the residual growth）。之后，肯德里克、索罗、乔根森（Jorgenson, D.）等人又进一步研究了余值增长，并且认为：在一定的技术进步条件下，余值增长一般有三种发生方式：

第一种：向上移动生产函数。即通过资本和劳动投入的增加、技术进步来使总量生产函数“向上移动”（反映在增长要素变化与增长率关系的坐标上）。索罗等人一致认为，技术进步是向上移动生产函数的最主要的动力。

第二种：增加资本投入量。但索罗等人认为，这种资本投入不是一般的纯数量投入，而是体现着技术进步的新机器设备等的资本存量增加，表现为资本的产出弹性不断增大。

第三种：增加劳动投入量。但这也不是单纯数量型的劳动投入增加，而是“质量改善了的劳动”的增加，表现为劳动的产出弹性增大。丹尼森认为它也体现着技术进步，主要是教育对劳动质量的提高。

在这三种方式中，他们认为都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中余值增长加速，但第一种方法的作用最大，因为它的技术进步因素最显著；后两种方法的作用次之，因为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增长是有限制的，即  $\omega_K + \omega_L \leq 1$ 。而在后两种方法中，第二种方法的作用相对较小，第三种方法的作用相对较大。

那么应当怎样计量余值增长呢？人们一般采用索罗的公式来计量，即：

$$\frac{\dot{Q}}{Q} = \omega_K \frac{\dot{K}}{K} + \omega_L \frac{\dot{L}}{L} + \frac{\dot{A}}{A}$$

因此，

$$\omega_K \frac{\dot{K}}{K} = \frac{\dot{Q}}{Q} - \omega_L \frac{\dot{L}}{L} - \frac{\dot{A}}{A}$$

$$\omega_L \frac{\dot{L}}{L} = \frac{\dot{Q}}{Q} - \omega_K \frac{\dot{K}}{K} - \frac{\dot{A}}{A}$$

所以，

$$\frac{\dot{A}}{A} = \frac{\dot{Q}}{Q} - \omega_K \frac{\dot{K}}{K} - \omega_L \frac{\dot{L}}{L}$$

但这一公式中  $\dot{A}/A$  代表的是技术进步，而技术进步的含义有多种解释，此外，在

计算与统计中也有许多麻烦。因此，为了更方便地计量经济增长和余值的增长，汉弗莱（Humphrey, D.B.）根据索罗等人的理论和模式，提出了一种简便的计量公式。其中产出增长的公式为：

$$Q_t = T (W_0 L_t + i_0 K_t) \quad (28)$$

$Q_t$  代表计算期的产量； $T$  代表影响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的因素，包括技术进步、新技术的扩散程度、资源配置改善、规模经济效益和管理水平等； $W_0$  表示基期的实际工资率； $L_t$  表示劳动投入量； $i_0$  表示基期的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率、利息率、地租率等； $K_t$  表示资本投入量； $(W_0 L_t + i_0 K_t)$  是按基期生产率计量的计算期的劳动和资本投入量的产出量，它乘以  $T$  所得数值就是总产量。这个公式说明，产量是要素投入量增加和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果。

将 (28) 稍作变换，可得出计量余值增长的公式：

$$T = \frac{Q_t}{(W_0 L_t + i_0 K_t)} \quad (29)$$

利用这个公式，可以很方便地计算出要素生产率即技术进步等因素对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大小。

### 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索罗 1957 年的研究打破了“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的新见解。这一新见解及其新方法启发了后人对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的巨大作用的研究，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技术进步的重要性。

#### (一) 技术进步的含义

在经济增长理论的文献中，对“技术进步”一词的解释有多种，各种解释之间存在着一些细微的差别。

索罗的定义：技术进步是“生产函数任意一种形式移动的简称”，“经济的加速和减速、劳动力教育质量的改进、各种各样的移动生产函数的因素都可以归入技术进步之中”。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索罗关于技术进步的含义比较宽泛，即影响生产函数移动的一切因素都包含着技术进步，其中主要是体现在新的资本存量中的技术成果、教育和劳动力质量的改善等。而且，技术进步是指中性技术的应用。

肯德里克的定义：肯德里克在 1961 年出版的《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趋势》一书中，把除去要素投入增长后的经济增长部分称做“尚未解释的余值增长”（the unexplained residual growth），并把它归结为“要素生产率的增长”（growth in factor productivity）。在要素生产率中，主要内容是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扩散程度、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经济等。可见，肯德里克所说的要素生产率实质上就是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包括技术的发明和应用、管理水平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生产成本的降低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很明显，这个定义的范围较小，内容较具体一些。

· 丹尼森的定义：丹尼森在分析经济增长的源泉时，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 2 大

类、23个项目。第一大类是要素投入总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主要是劳动投入因素（包括就业、工时、健康与营养、劳动者年龄与性别构成、受教育程度等）、资本投入因素（存货、厂房、设备、国际资产转移等）、土地投入因素3小类；第二大类是单位投入的生产率或效率，其中主要是知识进步（knowledge advance）、资源配置改善、规模经济、资源流动等。而在知识进步中，主要包括技术进步、管理、技术知识的扩散和技术发明应用时间的缩短等。可以看出，丹尼森将技术进步因素分散在了几乎每一项增长要素之中，也就是说几乎每一个增长要素中都包含有技术进步；但他又单列出一项“知识进步”，并认为这个知识进步所作的贡献无法用数据直接计量，只能用“余值增长”来体现。这表明他实际上是用“知识进步”来代替独立的技术进步因素。这样，丹尼森的技术进步的含义就更加明确、具体，范围更小，因而在他的研究中，单项的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所作贡献的比重相对缩小了。

技术进步含义的不同或定义上的差别，造成了分析方法的差异，因而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中，许多人对技术进步贡献大小的值的测算也就不一。

## （二）技术进步的形式

根据各人研究方法的不同和对技术进步定义的差别，技术进步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形式：

（1）中性技术。即在不改变资本—劳动配合比率（或资本与劳动的边际替代率）的条件下引起总量生产函数向上移动（表现为产出增长）的技术。通常用总量生产函数公式来表示和计量。

（2）体现在资本存量中的技术，即技术进步体现在更现代化的先进机器设备之中。这个问题在索罗的总量生产函数理论中已有所反映。1960年，索罗在《投资与技术进步》一书中指出，技术进步主要体现在资本存量的质量改善上，这种体现着技术进步的技术进步称之为“有效的资本存量”（the effective capital stock）。1964年，纳尔逊（Nelson, R.）发表了《总量生产函数和中介区域的增长估测》<sup>①</sup>一文，详细研究了体现在资本存量中的技术进步问题，并提出了一个计量体现着技术进步的“有效资本存量增长率”的公式：

$$\frac{\Delta J}{J} = \frac{\Delta K}{K} + \lambda_K - \lambda_K \Delta \bar{A}$$

式中  $J$  代表有效资本存量， $\Delta J/J$  代表有效资本存量的增长率， $\Delta K/K$  为资本存量的增长率， $\lambda_K$  为按不变比率计算的体现在新机器质量中的技术进步， $\Delta \bar{A}$  为资本的年龄（使用寿命）变化， $\lambda_K \Delta \bar{A}$  为资本存量的平均年龄的变化。

据此，可求出体现在资本中的技术进步（ $r_o$ ）为：

$$r_o = rT' + \alpha r_K + \alpha \lambda_K - \alpha \lambda_K \Delta \bar{A} + \beta r_L$$

式中  $r$  是资本生命周期技术变化的增长率， $T'$  是全部生产率指数（不包括技术进步的影响）， $\alpha$ 、 $\beta$  是系数。

<sup>①</sup> 纳尔逊，总量生产函数和中介区域的增长估测，美国经济评论，1964，9

(3) 体现在劳动质量中的技术进步。即技术进步体现为劳动力质量的改善。这个问题由丹尼森在 1964 年作了详细研究<sup>①</sup>。他认为，经济增长中“未被解释的增长”部分即“余值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引起劳动质量改善带来的，他称之为“劳动效率”（the efficiency of labour）。计算“劳动效率”增长率（ $\Delta qL/qL$ ）的公式是：

$$\frac{\Delta(qL)}{(qL)} = \frac{\Delta L}{L} + \lambda_L - \lambda_L \Delta \bar{E}$$

$q$  代表新工人的生产效率的改进， $\Delta L/L$  为劳动的增长率， $\lambda_L$  为劳动的平均效率的年改善率， $\Delta \bar{E}$  是劳动力平均年龄的变化。

据此得出计量体现在劳动质量中的技术进步的公式为：

$$r_o = r_T^* + \alpha r_K + \alpha \lambda_K - \alpha \lambda_K \Delta \bar{A} + \beta r_L + \beta \lambda_L - \beta \lambda_L \Delta \bar{E}$$

$r_T^*$  是全部生产率（或独立于要素投入增加的技术进步）的增长率。

### (三) 对经济增长中技术进步作用大小的测算

因为技术进步的定義、计量方法与公式不同，各人对技术进步所起作用大小的测算值也就不同。索罗的结论是：在 1909 年～1949 年间，美国的人均产出年增长率中，有 12.5% 归因于人均资本占有量的增加，87.5% 归因于技术进步；肯德里克的结论是：1889 年～1957 年间，美国私人经济增长率为 3.5%，其中要素投入增长为 1.7%（占 48%），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进步）为 1.8%（占 52%）。

## 四、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 (一) 全部要素生产率分析

全部要素生产率是指总产出量与全部生产要素投入量之比，即所有投入要素的生产率之和。全部要素生产率分析就是把总产量的增长率分解为各个投入要素的生产率进行单项分析。这一理论是由库兹涅茨、索罗、肯德里克等人提出的，其中肯德里克的分析较有代表性。肯德里克是索罗的学生，他在索罗的领导下，对美国的经济增长作了全部要素生产率分析，并出版了《美国生产率发展趋势》（1961 年）等书。

肯德里克将生产中的投入要素分为劳动和资本（包括土地在内）两项，再把劳动和资本的生产性服务的报酬分为工资和资本收益（包括利润、利息和地租），然后将产量与投入要素量之比定义为“要素生产率”，其中，产量与全部投入要素量之比称为“全部要素生产率”，产量与部分要素（如劳动投入量）之比称为“部分要素生产率”。作此规定之后，肯德里克研究了 1889 年～1957 年间美国私人经济增长过程中全部要素的生产率。他把总产量的增长率分解为投入要素的增加率和要素生产率（表现为单位投入要素的边际产出量）的增加率两大部分，并通过计算来确定二者在经济增长中各占的比重，以重点考察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结果表明：这期间美国私人经济增长率是 3.5%，其中 1.7% 归因于资本和劳动投入量的增加，其余 1.8% 是要素生产率提高的结果。1971 年，肯德里克又分析了 1948 年～1966 年美国私人经济增长率，计

<sup>①</sup> 丹尼森，体现问题的不重要性，美国经济评论，1964，3

算出这期间经济增长率是4%，其中1.5%归因于要素投入量增加，2.5%归因于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说明要素生产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逐年增大。

这一分析证明：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来自技术进步。因此，技术进步在现代经济增长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

## （二）经济增长因素的分类分析

在索罗、肯德里克研究经济增长因素的同时，60年代初，丹尼森受美国经济发展委员会委托，对美国1909年~1929年、1929年~1957年、1929年~1969年的经济增长作了分析估算。丹尼森把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两大类七小类：①生产要素投入总量的增加。其中包括四小类内容：就业人数与工时、就业者的年龄与性别构成、就业者的受教育年限、资本存量的大小；②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生产率）。包括资源配置改善、规模经济、知识进步。

作此分类后，丹尼森估算了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1929年~1969年间美国国民收入年均增长率为3.33%，其中：由要素投入总量增加带来的增长率为1.81%，占总增长率的54.4%，由单位投入量的产量增加带来的增长率为1.52%，占总增长率的45.6%。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中，资源配置改善因素是0.29%，占总增长率的8.7%，规模经济因素是0.36%，占总增长率的10.8%，知识进步因素是0.92%，占总增长率的27.6%。1948年~1969年，知识进步因素对总增长率的贡献又上升到30.9%。1983年，丹尼森又对美国1948年~1981年的经济增长作了分析，结果发现：这期间经济的年增长率是3.2%，其中要素投入量增长率为1.1%，对总增长率的贡献是34%；而全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2.1%，对总增长的贡献是66%。在这中间，教育因素的贡献占19%，知识进步因素的贡献占47%<sup>①</sup>。由此可见，在两大类因素中，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总增长率的贡献已大大超过要素投入量增加所作的贡献；而在七类因素中，知识进步因素的贡献最大、自身增长最快，其次是教育因素。

根据上述分析，丹尼森得出一个结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有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两大类，其中，单位投入量的产出量即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知识进步（技术、管理及其应用）则是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最重要的因素。因此，要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必须大力发展教育，开发新技术，提高管理水平。

## 五、经济增长的国际比较

为了探寻美国为什么比日本和西欧一些国家经济增长率低的原因，丹尼森等人又对美国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作了国别比较。比较结果是：1950年~1962年间，美国与西欧的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这两大类因素在经济增长中所作的贡献是不同的。从总增长率看，要素投入量增加带来的增长率同要素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增长率的比例，美国

<sup>①</sup> 丹尼森，美国生产率增长的中断，经济学杂志，1983，3



为60%:40%，西欧为40%:60%，表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各国生产率提高快于美国；从劳动投入看，西欧劳动人口多，劳动力数量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而美国劳动力受教育程度高，劳动力教育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从资本投入看，美国的资本增加对经济增长所作贡献要大于西欧。日本经济学家森久雄也将丹尼森的模式用于日本，认为日本的要素投入量和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都大于美国、西欧，而在日本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量增加和生产率提高所作贡献最大。丹尼森根据上述比较结果得出结论说：美国在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落后于西欧、日本的原因是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同时，促使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在美国已经耗竭，而在西欧尚未耗尽。但总的来说，美国经济增长并不缓慢。

经济增长因素分析对经济增长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各国实际经济增长的推进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一，它突破了“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这一长期在经济增长理论中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把技术进步因素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认为技术进步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因素。

其二，它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大小，使经济增长理论更加实证化、数据化，为各国政府分析经济增长问题、制定促进经济增长的战略与政策提供了依据和方法。

其三，它为人们提供了一套分析和计量各种经济增长因素对经济增长所作贡献大小的理论与方法，使我们能够借助简便的公式、数据来考察经济增长问题，分析阻碍或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来促进经济迅速增长。

其四，它所提供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可以运用于发展经济学，帮助人们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

## 第七节 经济增长的阶段与经济增长的限度

在索罗等人对经济增长进行因素分析和国别比较的同时，罗斯托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研究了经济增长的历史，把经济增长的过程划分为六个阶段，并探讨了各个阶段的条件、特征、经济政策、增长的动力、出现的问题以及发展前景。米香（Mishan, E. J.）、梅多斯（Meadows, D. H.）等人则根据西方国家经历了高速增长之后出现的人口膨胀、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问题，对过去的经济增长及其理论进行反思，探讨了经济增长是否有价值、是否有限制等问题，并对应提出了“反增长”和“零增长”理论。

### 一、经济增长的阶段划分

1960年，罗斯托出版了《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他吸收了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发展阶段划分法、熊彼得的“创新”学说、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哈罗德—多马模式等理论和方法，从世界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把人类社会发展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

会、为起飞创造前提阶段、起飞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大规模高消费<sup>①</sup>阶段，1971年又补充了第六个阶段即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在六个阶段中，第三、六阶段是社会发展的两次“突变”，也是最有意义的阶段。应当指出的一点是，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理论是用历史的和动态的方法来研究各个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阶段和问题，因而严格地说，这是一种经济发展的理论。

经济增长阶段论中有关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 （一）经济起飞的条件、标志和起飞阶段的特征

罗斯托认为，起飞是一个社会的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时期，是近代社会生活中的大分水岭。所谓“起飞阶段”，是指一种产业革命，它直接关系到生产方法的剧烈变革。从经济角度讲，起飞意味着工业化的开始或经济发展的开端，是一国经济从停滞落后向增长发达过渡的重要转折点。但是，一国经济要实现起飞，必须具有三个互相关联的条件：

第一，要有较高的资本积累率。经济起飞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因此必须大规模地增加储蓄，提高资本积累率和生产性投资率，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占到10%以上<sup>②</sup>，以便为经济增长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由此可见，资本积累是经济起飞和增长的必要条件。

第二，要建立起能带动整个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在起飞阶段，需要发展的产业很多，但资金十分有限，要实现起飞，就应当采用“部门不平衡发展”战略，将有限的资金用于发展具有联系效应的主要产业，建立起“主导产业部门”，通过主导部门的发展带动整个经济增长。

第三，要进行制度的、社会的、政治的变革。经济起飞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体制）、社会结构、政治法律制度及意识形态，因而必须进行这方面的改革，使之能适应经济起飞的要求并促进起飞顺利实现。

罗斯托进而认为，判断经济是否起飞的主要标志，是技术的“创新”和应用程度。而起飞阶段的重要特征，是一国开始实行工业化发展战略，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

### （二）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罗斯托认为，经济增长几个阶段出现依次更替的原因，主要是“主导部门”的不断更替和“人类欲望”的不断更替，前者是客观原因，后者是主观原因。因为“主导部门”是经济增长中起主要作用的先导部门，它采用了新技术，本身有很高的增长率，并且能对其他产业部门产生重大影响，因而它的优先发展能够带动其他各部门的发展，进而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

形成主导部门的条件是，这个部门必须在国民经济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必须拥有

---

<sup>①</sup> 罗斯托的原文为“the age of high mass consumption”，旧译为高额群众性消费阶段”。我们认为“mass consumption”与“mass production”（大规模生产）是两个对应词。把“high mass consumption”译为“大规模高消费阶段”似乎恰当一些。

<sup>②</sup> 罗斯托认为，起飞阶段的经济增长率应达到3%以上，假定资本—产出比为3:1，则储蓄率须达到10%以上。

雄厚的资金，必须有技术创新和迅速应用新技术的能力，必须能够通过自身的发展对其他产业部门起到带动作用。罗斯托认为，主导部门的带动作用不仅表现在自身能够高速增长，而且能够把这种增长“扩散”到其他部门去，对其他部门产生决定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有三种形式：

(1) 规模经济影响：主导部门的建立可以形成规模经济。在内部，可以降低生产和销售成本；在外部，可以把新开发的地区和新的产品纳入商业市场，扩大市场的范围，形成对主导部门产品的有效需求。如铁路业作为主导部门，既降低了运输成本，又将广大的地区纳入了商业市场。

(2) 产生新产业和扩大出口部门的影响：主导部门的建立，为新的产业和部门的建立创造了先决条件，有利于新产业和部门的发展；主导部门的发展可以扩大出口，换取外汇，从而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国外资源。

(3) 带动影响：主导部门的发展可以带动“现代基础工业部门”（modern basic industrial sectors）的发展，从而为国民经济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如铁路业的发展带动了采掘、钢铁、动力、机械工业等现代工业的发展，这些部门、产业的发展又促进了整个经济发展<sup>①</sup>。

罗斯托认为，主导部门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根据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条件不断演变的。在历史上，起飞前阶段的主导部门是食品、饮料、烟草、水泥等部门，在起飞阶段是纺织工业，经济持续增长阶段是重工业和制造业，大规模高消费阶段是汽车工业，追求生活质量阶段是服务业和城建等部门。正是主导部门的这种不断更替，推动了经济增长和阶段变迁。

罗斯托还认为，促使主导部门不断更替的原因，除了人的欲望不断变化外，主要是技术的不断创新和新技术的不断采用，因此，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 （三）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与政策

罗斯托认为，经济增长和阶段更替并非一个纯自然的过程，而是需要一定的条件，且这些条件是通过相应的措施与政策来创造的。比如，在起飞阶段，国家就应当采取一系列政策来创造起飞必需的三个条件，这些政策包括：①防止消费早熟以为起飞积累资金；②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③严格控制人口出生率；④发展出口创汇生产部门，为进口机器设备积蓄外汇；⑤推广新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隐蔽性失业；⑥防止人才和资本外流；⑦动员国内资金，提高储蓄率并引进外资；⑧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管理，等等。罗斯托认为，这些政策尤其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初期使用。

### （四）经济增长的限制与对策

经济增长是靠技术创新和主导部门发展来推动的，但随着“创新浪潮”的渐退和旧主导部门的衰落，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使经济增长出现“减速趋势”。这一情况在向成熟推进阶段的后期表现尤为明显，表明经济增长已受到了限制；另一方面，当经济增长进入大规模高消费阶段后，汽车和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得到普及，这些工业的高速

<sup>①</sup> 罗斯托. 经济增长的阶段. 英文版. 1960. 55 ~ 56

增长虽然大大推动了经济增长、经济结构转变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但同时也产生了环境污染、精神危机、种族歧视等严重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大大限制了经济增长的速度。为此，罗斯托主张在新的增长阶段要特别重视环境污染、城市建设、服务业以及黑人的充分公民权利等问题，采取有力的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罗斯托提出经济增长阶段论，目的是为了用经济史的标准来划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以此对抗并否定马克思用生产方式作为标准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理论，其书名的副标题《非共产党宣言》就已证实了他的用心。但罗斯托的学说中有些分析方法和论点是值得注意的：他用经济标准来划分经济增长的阶段，考察了经济增长的历史过程，预测了经济增长的前景；他指出了各发展阶段的特点、条件，提出了应采取的政策措施；他说明了促进经济增长的原因、动力，尤其是论述了经济起飞阶段的重要性，强调了主导部门带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资本积累的重要性，等等。这些观点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 二、经济增长的限度

60年代末期，正当西方国家沉溺于高速经济增长之中时，高速增长的恶果已开始显露，其中最显著的问题是高经济增长率伴随着高人口增长率，同时，高经济增长率带来了环境严重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浪费和耗竭、人的精神危机加重等等。针对这些问题，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价值产生了怀疑，发出了“经济增长可取吗？”的疑问；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经济增长的限度》的报告，发出了“经济增长有限度”的警告。

### （一）“反增长”论

1967年，米香出版了《经济增长的代价》一书，联系社会福利来考察经济增长的后果，认为物质财富的享受不是人类快乐的惟一源泉和目标，人类还需要有闲暇、文化娱乐、美丽的自然风光、幽静整洁的环境等等，但经济增长却片面追求国民生产总值指标的增加，忽视了社会福利指标，使人类的居住环境、生存条件、社会福利遭到了破坏，从而为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代价。这一代价使人们的生活质量大大下降，每个人的生活都毫无选择地受到损害。由此他得出结论，认为单纯的经济增长不能使人们享受美好生活，反而造成了生活质量下降，因而这种经济增长是不值得的、令人怀疑的。这种观点被称为“反增长”论或“增长价值怀疑”论。

### （二）“零增长”论

米香提出“反增长”论之后，1968年，由30多位西方学者组成的“罗马俱乐部”专门开会讨论了人类目前的处境与发展前景问题，并委托梅多斯将讨论情况整理成书，以《增长的极限》为名于1972年出版。与此同时，福雷斯特（Forrester, J. W.）也在1971年出版了《世界动态学》一书，共同提出了“经济增长有限”理论。

这些理论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有人口增长、粮食供给、资本投资、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五大因素，它们的共同特点都是按指数增长，即按一定百分比递增。如用 $P$ 代

表某增长因素基期的数量， $r$  代表每一期的增长率， $A$  代表第  $n$  年的该因素的数量，则指数增长的计算公式为：

$$A = P (1 + r)^n$$

梅多斯等人认为，表现指数增长的最好形式是“倍增时间”（doubling time），即某因素增长一倍需要的时间，其简便算法是 70 除以该因素的年增长率。

梅多斯等人将五大因素联接为一个“反馈环路”，综合考察了这五大因素，并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了数据运算，建立起一个“世界模型”。得出的结论是：1970 年后，人口和工业将保持指数增长，但资源（尤其是非再生性资源）储量有限并日趋枯竭，逐渐成为增长的约束条件，从而使工业增长速度减慢。与此同时，环境污染也将严重阻碍经济增长，人口虽然也在增长，但由于食物的短缺和医疗卫生条件恶化，死亡率将上升，使人口也停止增长。这样，在 2100 年之前，世界体系就将面临崩溃。因此，这个模型被称为“世界末日模型”。

为了避免“世界末日”的来临，梅多斯等人提出，应采取全球性的措施来改善人类目前的处境，主要是：到 1975 年停止人口增长；1980 年停止工业资本增长；工业品的单位物质消耗降到 1970 年的 1/4；经济增长的重点由生产物质产品转向服务设施；污染降到 1970 年的 1/4；增加粮食生产，提高人均食物量；延长工业资本寿命；等等。总之，使主要的增长因素实现“零值”增长，因而这种理论被称为“零增长”或“增长的限度”理论。

### 第三章 论证经济发展问题的 基本思路

在本书第一章第三节中，我们已就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以来 50 年的演变作了概述，并指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影响转而扩大和加深——所谓的“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已形成了第二阶段的发展经济学的特点，而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又成为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线索。但是，也应当看到，在 50 年的演变过程中，发展经济学自始至终包含着几种不同的基本思路，它们各立门户，各持己见，并且互相攻讦，在不同时期，各有消长，在不同的领域，各有影响。据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的意见，论证经济发展问题有三种不同的基本思路，即新古典主义、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基本思路的种类划分虽大致不存异议，但对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的思路归属往往有不同看法。例如，缪尔达尔（Myrdal, Gunnar）一般被认为是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但也有人如迈耶把他划入激进主义行列。又如普雷维什（Prebisch, Raul）和辛格（Singer, Hans）究竟是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还是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也并无统一的意见。甚至人们公认为典型结构分析的刘易斯无限供给剩余劳动模式，也有人说它是“新古典范例的产物”<sup>①</sup>。

人物应归属何派之所以出现不同意见，原因有二：一是对几种基本思路的主要内容的认识尚有分歧，二是对各个发展经济学家的主要论点的判定不尽一致。此外，有些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似乎不局限于一种思路，从而在不同的文献中划归不同的派别，也各自有其根据。

我们准备就三种基本思路的概念、原理、政策等各方面作出比较全面的介绍，在此基础上，对一些有影响、有代表性的发展经济学家的论点进行比较完整的剖析，确定他们的主要观点，把他们归属到应当归属的学派之中。

---

<sup>①</sup> 约托波洛斯，纽金特，发展经济学，英文版，1976，11

## 第一节 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思路

在经济发展问题的几种基本思路中，结构主义思路（the Structuralist Approach）的渊源较近。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和作为激进主义思路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西方发展经济学兴起之前，就已存在，发展经济学家把这两种理论演绎到第三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形成了经济发展问题的新古典主义思路（the Neoclassical Approach）和激进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思路（the Radical or Neomarxist Approach）。而结构主义则是在西方发展经济学兴起之时，一批发展经济学家加以采用，并对第一阶段经济发展理论有很大影响的一种思路。

按照一般意见，属于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主要是罗森斯坦—罗丹、纳克斯、普雷维什、辛格和缪尔达尔。他们都是五六十年代有很大影响的发展经济学家，号称“发展经济学的先驱”。

结构主义经济发展思路含有下述的观点。

### 一、对当代发展经济学兴起时西方流行的两种主要经济思潮的不同看法

当代发展经济学兴起之时，统治西方国家讲台和论坛的是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对发展中国家是不适用的，因为它的理论不切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理论核心是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而发展中国家，一般地说，商品经济不发达，价格体系还处于萌芽状态，市场分散而破碎，远未形成体系。市场是不完全的，人们不可能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说那样，在经济行为中作出合乎逻辑的精明选择。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把经济变动看成是边际的、增量的调节，而发展中国家所需要的是大规模的经济变化和重大的经济结构的改进，或者说，所需要的是通过结构改造而实现的“经济宽化”（widening of the economy），而不是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所说那样，通过资源配置而实现的“经济绷紧”（tightening-up of the economy）。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虽然欣赏凯恩斯突破了新古典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界一统天下的局面，使“单一经济学”分解为“双经济学”，同时，凯恩斯对就业问题的关心也使发展经济学家更为密切注意劳动力不得其用的问题，但是他们认为凯恩斯经济学从根本上说并不切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因为，照他们看来，凯恩斯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条件出发，把萧条时期的劳动力失业和资本闲置归因于储蓄过多，而发展中国家贫困和失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却是储蓄不足。而且，凯恩斯观察到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是周期性的失业，而周期性的失业并非普遍存在于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典型的失业。发展中国家长期存在的劳动力过剩的状况，不仅表现为持久性的失业，还表现为广泛的就业不足、伪装的就业和低生产率的就业。许多就业不足者本来愿意得到

更长的工作时间，然而能得到的却是一种较短劳动时间的工作。伪装就业者看起来是就业的，但对产出的增加贡献甚少，甚至并无贡献。还有许多人可称为“有工作做的穷人”（the working poor），他们长时间劳动，但生产率很低，从而得到的是贫困线下的收入水平。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上述就业不足情况的出现和持久存在，是由于储蓄不足、资本短缺。从而凯恩斯提出的增加有效需求的对策是不可能在中国奏效的。发展中国家的任务是动员更多的储蓄以增加投资，它们短缺的不是投资支出，而是储蓄积累，是实际资源的可利用程度。此外，凯恩斯的分析是一种短期分析，他所考察的经济过程基于一系列静态的假定条件，如凯恩斯自己所说：“我们认为既定的是：现有劳动力的数量和熟练程度、现有设备的质量和数量、现有技术、竞争程度、消费者的趣味和习惯、各种强度的劳动和监督与组织活动的负效用，以及包括除了以上举出的变数以外各种势力在内的社会结构。”<sup>①</sup>显然，凯恩斯的这种短期的、静态的分析是和长期的、动态的发展过程不相适应的。

## 二、强调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非均衡状态

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特别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刚性。在缺乏弹性的条件下，价格的相对变动对资源重新配置的推动作用很小，供给与需求向均衡交叉点的运动不能自动进行，从而市场不能结清、缺口无法填平。总之，发展中国家经济中普遍存在的不是自我均衡的体系，而是持续的不均衡状态。他们还强调部门间的结构上的差异，认为尽管各个部门都会谋求利润的最大化和效用的最大化，但是对刺激的反应快慢和反应机制，各个部门是有所不同的。例如，比起其他部门，农业对刺激的反应就有差异。因此，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一般倾向于把经济分解为几个构成部分，去剖析经济发展的进程，以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助于对经济发展的真实面目的确切理解。

结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缪尔达尔沿着这一思路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由于结构刚性，由经济增长而提高的国民收入，不可能自然地、自动地、均等地普及到各个地区和各个阶层，以缩小地区间或阶层间的贫富差距。相反，经济的不均衡必然伴随着分配不均，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例如，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并不一定减少城乡差异。因为，由于结构刚性，这种流动可能只对农村中比较适应城市生活的人最富吸引力，其结果首先是农村的人才流失，使农村已经很低的收入水平进一步降低，同时，人口流动造成的外在不经济虽然恶化了城市生活，却不削弱对人口流动的刺激，从而这种无助于经济发展的城乡人口流动会继续下去。这一状况的发生，正是经济不均衡的一种表现形式。经济发展的结果，既然不能带来普遍富裕，反而加剧贫富悬殊，经济发展的过程，就不会是利益和谐的过程，而会是利益冲突的过程。总之，不是均衡而是冲突，不是平顺而是曲折，不是“扩散效应”（spreading effect）而是“回波效应”（backwash effect），这才是经济发展固有的特点。“发展过程是个不平衡的过程，如果听其自然，则现存的

<sup>①</sup> 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 英文版. 1936. 245



差别和不均衡现象将不会消失，反而会加剧。”<sup>①</sup>结构的差异、经济的不均衡、利害的冲突，不仅表现在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之中，还反映在国际经济运行机制之内。在现有的国际经济格局下，市场力量自由活动的结果，必将产生不均衡的效应，使发展中国家蒙受损失。如缪尔达尔所说：“市场力量趋向于累积地加剧国际的不平等，在一方为工业国而另一方为不发达国的两类国家间自由贸易的十分正常的结果，就是后一类国家走向贫困和停滞的累积过程的开始。”<sup>②</sup>其所以如此，也是因为“回波效应”（表现为扩大富国与贫国的差距）的力量，超过了“扩散效应”（表现为把富国的繁荣引向贫国）的力量。如缪尔达尔所说：“和国际贸易均衡理论的推断相反，市场力量的作用不会导致生产要素的报酬和收入的平等。如果听其自然，经济发展就会是这样一种循环的、累积的因果关系的过程：它使已有很好自然秉赋的人们再得照顾，使碰巧生活在落后地区人们的努力受到挫折。一个国家越穷，其他地区经济扩展的回波效应的支配力越强大。”<sup>③</sup>缪尔达尔所说的回波效应包括从工业国进口廉价商品对本地手工业和小规模工业的破坏、发展中国家的熟练劳动力的外流、外国投资的有害影响、对生产出口初级产品的飞地经济（enclave economy）<sup>④</sup>的偏重等等。缪尔达尔还就出口初级产品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不良后果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一方面，初级产品的出口市场需求弹性很小，需求量增加缓慢；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快速，大多数人口过着糊口水平的生活，普通劳动力的供给一般过剩而非稀缺。因此，出口产品生产部门的任何技术改进所促成的成本下降和价格低廉，不过是使进口国家得益，而发展中国家的工资和单位产品的收益并不增长。

普雷维什和辛格重视从结构差异关注出口初级产品在发展中国家与出口制造品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条件问题。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的恶化是一种历史趋势，而且这种趋势在将来还会继续下去。普雷维什把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归因于初级产品和制造品因生产率提高而得到的利益在穷国与富国的分配上有所差异。制造业的技术进步一般快于初级产品产业的技术进步，从而制造品价格的下降速度快于初级产品价格下降速度。按照经济学的原则，制造品与初级产品的相对价格本来应该朝着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转化，但是，情况刚刚相反，发达国家的制造品因生产率提高而得到的利益不表现为价格的下降，却表现为发达国家的利润和工资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生产率提高虽然缓慢，但任何提高而得到的结果是价格的下降，得益者是进口初级产品的发达国家。其所以如此，也是因为社会经济结构的差异，发达国家的强有力的工会组织和垄断企业吸收了生产率提高而来的利益，增加了工资和利润，而发展中国家的工人缺少组织，企业的垄断性较低，工人之间的竞争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使生产率提高的效果化为价格的下降。辛格认为，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国力大小不平等，

① 约托波洛斯，纽金特。发展经济学。英文版。1976。17

② 缪尔达尔。富国与穷国。英文版。1957。228

③ 缪尔达尔。发展与不发展。英文版。1956。9-10

④ “飞地”原意为“一国境内的外国领土”。

外国投资的利益分配必然偏于投资国家。投入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出口生产部门的外国资本，事实上是在替投资国家建立“飞地”或“前哨”，和发展中国家的其他经济部门很少联系。而且，外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所得利润和利息，一般不转化为扩大当地投资，而是回流到输出资本的国家，至于发展中国家因出口增长而诱致的投资所需的机器设备，又往往无法在国内生产而只好从发达国家进口。总之，无论在金融力量，讨价还价力量、销售、加工和分配的控制力量等哪一方面，发达国家都处于优势地位，以至于在发展中国家的外国投资的得益，不归于发展中国家，而归于输出资本的发达国家。如辛格所说，后者作为买主和卖主得到的是“两个世界最好的东西”，而前者得到是“两个世界最坏的东西”。普雷维什根据上述分析，提出了世界“经济星座”（economic constellation）中存在着“中心”（center）和“外围”（periphery）的格局。“中心”指富裕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它们组织起国际经济体系为它们的利益服务。“外围”指通过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而与“中心”发生联系的参差多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贸易条件和外国投资都不利于发展中国家而有利于发达国家，现有的国际经济体系事实上起着把收入从外围吸引到中心的作用。普雷维什认为，这些情况的出现，其根本原因是中心与外围在结构上的不平衡，或者说，两者之间具有“不对称”（asymmetry）的关系。因此，外围国家必须建立起新的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中心点是把资源配置在满足国内消费的工业生产方面，即是实行进口替代的工业化。

### 三、发展了结构分析的方法论

钱纳里在1975年撰文说：“在过去25年中，结构分析的方法论已从一套直觉的假设发展为具有不断增长的经验效力和分析严密性的多种模式。”<sup>①</sup>演进可归纳为三个阶段：①提出假设；②经验测试；③建立较为完整的模式。有两个结构主义概念可以说明这种演进过程：一是二元经济的概念，另一是作为平衡增长理论基础的需求互补性的概念。前一概念曾有多种表述方式，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刘易斯提出的一种。刘易斯就发展中经济的结构提出三个基本假设：①技术可分为使用资本的技术（由资本主义部门采用）和不使用资本的技术（由维持最低生活部门采用）；②在常规工资（conventional wage）下劳动供给是有弹性的；③储蓄基本上由非工资收入者提供。提出需求互补性和平衡增长概念的纳克斯和罗森斯坦-罗丹，也提出了一套结构假设：①恩格尔法则可以推向一般化的形式；②出口商品需求的价格弹性是有限的；③基础设施和基本工业的规模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刘易斯和纳克斯等的两套结构假设，都经受了经验测试。人口的加速增长证实了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的存在，从而劳动供给的弹性很大。威斯科夫（Weisskoff, R.）等人的经济计量测试证实了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弹性小于1，从而恩格尔法则可以推向一般化形式的假设是站得住脚的。二元经济概念和平衡增长概念，都在第三阶段中进一步完善了理论并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模式。由于根据的是个别国家的统计资料，模式有转向国别化的趋势。

<sup>①</sup> 钱纳里. 发展政策的结构主义思路. 美国经济评论: 论文及记录汇编, 1975. 7

## 四、提出了结构主义观点的政策建议

就国内政策而言，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应该从发展中国家收入结构的特点制定重视分配的政策。在他们看来，传统理论把收入分解为工资收入和非工资收入的方法是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的。在不少的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的工资收入者已属于中等收入阶层，而最贫困的阶层则是小农、无地农民和城市的个体劳动者，他们的收入不决定于工资，而决定于能得到多少土地和资本以及一些非经济因素。结构主义者要求制定重视分配的政策，但并不主张对现有财产的重新分配，而主张对收入增量的重新分配。就国外政策而言，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由于结构刚性，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经济政策要受到国内资源配置的限制，钱纳里等人提出的“两缺口”模式中，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必须平衡即体现了这种思想。前面提到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也显然是这种思想的逻辑结论。60年代以后，一些发展中国家从进口替代转为出口鼓励，表明了国内生产结构的转变，建立了大量出口制造品的工业基地，从而使政策措施的转变成为可能，这也符合结构主义思路。

## 第二节 经济发展的新古典主义思路

西方经济发展思想史曾从19世纪中叶前后起出现了差不多100年的“静态的插曲”，它的含义是，由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把经济进步视为由累积力量形成的动态模式，转变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对既定资源的静态配置特别关心，从产出的增长转而重视产出与就业量的波动和收入的分配。

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这种情况的出现意味着经济发展思潮的静止或停顿，而认为它表现出经济发展理论的纵深发展，因为经济发展的结果必然深化人们对发展目标的认识，而发展目标至少具有三重内容，即产出量、就业量和国民收入的分配。他们还注意到50年代和60年代的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尽管有快速的增长，但广大人民并未摆脱贫困；尽管采用了教育、人口流动、工业化等结构调整机制，但二元结构、收入分配不均以及其他种种失衡现象并未减轻。这些情况的出现，从反面说明了新古典主义思路是正确的。因此，他们认为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促进了经济发展思潮而不是使其静止不前。

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有鲍尔（Bauer, Peter）、瓦伊纳（Viner, Jacob）、哈伯勒、舒尔茨、明特（Myint, Hla）、巴拉沙（Balassa, Bela）等人。

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含有下述的主要内容。

### 一、对发展过程的基本看法

首先，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过程。新古典学派创始人马歇尔吸取了

达尔文和斯宾塞的进化论思想，把经济看成是具有进化的、有机的性质的体系。“‘进步’或‘进化’，无论是工业的或是社会的，都不只是增加或减少，而是有机的增长。”<sup>①</sup>“经济学家的目标应当在于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力学。”<sup>②</sup>经济生物学的观点自然导致了经济发展过程是渐进而持续的结论。马歇尔说：“‘自然不能飞跃’这句格言，对经济发展特别适合。”<sup>③</sup>对巨大的、迅猛的技术创新，新古典主义者如何作出解释呢？他们认为，创造发明和新技术的采用也是渐进的和连续的。技术进步来自知识的逐渐进步和传播，那些看起来似乎是急剧变化的生产技术，事实上是众多以往发明家的集体努力的结果，是连续发明过程达到的最高点，一种新技术不过是连接另一套“发明锁链”的一个环节，而且，发明引进到经济体系中的方式一般也是平稳的、连续的。

其次，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和谐的、累积的过程，经济发展的结果会一般地使所有收入阶层受益。在他们看来，经济体系有一种自然走向充分就业的强有力的趋势。由于货币因素、战争以及新生产技术的引进，暂时的失业是可能的，但长期的均衡失业是不可能的。经济发展会提高劳动力作为一个整体的实际工资，尽管节约劳动的机器的引进可能暂时在某一行业引起劳动需求的减少，但是，该行业的产品价格将降低，从而刺激需求的增长并进而刺激对从事该行业的劳动力的需求增长，同时，技术进步又会使整个社会总生产提高，从而总收入也随之提高。总之，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结果是劳动需求的一般提高，其结果，使劳动阶层得到利益。新古典主义者不同意古典经济学家如李嘉图的观点：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将出现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他们坚持说，劳动阶层以外的其他主要阶层的收入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增加。外在经济是新古典主义者在论证经济发展过程和谐性时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概念。外在经济和内在经济不同，后者指单个厂商在既定资源与效率条件下扩大生产规模而得到的经济效果，而前者指厂商所属行业或对它提供原材料或中间产品的行业由于经济发展而得到的经济效果。或者说，内在经济产生的原因是，随着厂商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进了较为复杂的机器设备，改进了营销和研究的组织，以及强化了劳动和管理的专业分工等等。而外在经济“决定于种类相近的生产的总量，而有些——尤其是与知识发展和艺术的进步有关的那些经济——主要决定于整个文明世界的总量。”<sup>④</sup>或者说，外在经济是“由于相关的工业部门的发达而产生的，这些部门互相帮助，也许集中在同一地方，但无论如何，它们都利用轮船、火车、电报、印刷机等所提供的近代交通通讯便利。像这种来源所产生的各种经济，是任何生产部门都可获得的，而不是完全依靠它自己的发达……”<sup>⑤</sup>

再次，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值得乐观的，认为经济的持续不断发展是可能的，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利益会自动地、逐步地分润到社会全体。随着经济的发展会出现纵向的“涓流效应”（trickling down effect）和横向的“扩散效应”，这两种效应会自然而然地促使经

① 庇古主编，马歇尔回忆录，英文版，1925，317

②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18

③ 马歇尔，工业和贸易，英文版，1919，6

④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279

⑤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商务印书馆，1983，327

济发展的利益得到普及，自然而然地形成“帕累托最优状态”（Pareto optimality），即使有人有得，有人有失，得失总是相当的。我们已经知道，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的前景持悲观态度。李嘉图把肥沃土地的稀缺看成是经济发展的重大约束条件。生产的改进只能暂时缓解这种困难，而无法扭转其长期趋势。从长期趋势看，由于土地的供给是固定的，随着劳动和资本的增加，国民产品的增量与劳动及资本的增量之比是逐渐减小的。李嘉图当时还以英国为例，认为在不远的将来会出现“静止状态”。对古典学派的这种看法，新古典主义者大持异议。马歇尔断然说：“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使人相信，我们已接近静止状态……”<sup>①</sup>新古典主义者相信，人类的能力能够克服物质环境对经济增长施加的限制，技术进步和劳动力质量的增进会形成报酬渐增的历史趋势。用马歇尔的话来说：“自然在生产上所起的作用表现出报酬递减的倾向，而人类所起的作用则表现出报酬递增的倾向。报酬递增律可说明如下：劳动和资本的增加，一般导致组织的改进，而组织的改进增大劳动和资本的使用效率。”<sup>②</sup>

## 二、对经济发展运行机制的基本看法

从渐进的、连续的发展观出发，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自然认为：经济的发展是以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均衡状态是稳定的，价格机制是一切调节的原动力，从而也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机制，因此，用静态的局部均衡方法就足以分析经济发展问题。

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的注意中心点，是个人作为决策者所表现的刺激—反应机制，他们密切地观察个人在如何为利益所驱使、又如何为成本所约束的条件下，在替代物之间作出选择以获得最大的福利。经济环境中如果存在着现实的替代选择，那就意味着至少在边际上存在着在产品与劳务之间、各种生产要素之间替代的可能性。而替代的存在又意味着高度弹性的存在。因此，新古典主义的发展经济理论明显地或暗含地认为供给弹性、需求的价格弹性以及要素的替代弹性都较高，弹性既然较高，那么，价格的变动必然较快地引起产品的供给数量与需求数量以及生产产品的要素配合比例的相应变化。可见，价格机制在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家的心目中处于何等重要的地位。为此，鲍尔曾明确地说过，发展问题的分析不应当是“无价格的”（priceless）<sup>③</sup>。

他们还认为，上述的刺激—反应机制是无处不存在的。国民经济各个部门都在这种机制中运行而无任何自然的差异。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行为的原理原则，可以同样地用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行为；解释发展中国家农业经济行为的原则，也可以同样地用来解释采矿业、建筑业以及家庭服务的经济行为。资本所有者把资本投放到收益率最高的部门或行业，而不断投放的结果，报酬递减律将使收益率下降到和其他部门或行业收益率一致而均衡的水平。工人会向工资最高、工作条件最好的地区或部门流动，结果消除了原来的工资差异。土地也是首先在地租最高的部门或行业中使用，报酬递减律最终

①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 上卷. 商务印书馆, 1983. 239

②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 上卷. 商务印书馆, 1983. 328

③ 迈耶. 摆脱贫困——真正重要的经济学. 英文版. 1984. 133

也使土地所有者的报酬达到均衡一致的水平，如此等等。由此可见，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看成是适合于任何经济行为的一般原理，同时也认为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增长理论并无实质上的差异。哈伯勒说：“在我看来，发展经济学和发展政策应当看成是一般的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的组成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增长理论和增长政策的组成部分。我认为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称之为‘单一经济学’是正确的，也就是说，无论对发展中国家，还是对发达国家，同样的经济学原理都是适用的。”<sup>①</sup>

新古典主义十分强调市场—价格机制对资源良好配置的均衡作用，在市场—价格机制中，“高”的价格吸引更多供给而抑制需求，“低”的价格鼓励更多需求而抑制供给。只有均衡价格，使供给和需求达到平衡，使需求价格和供给价格一致。在这样的认识下，竞争自然受到赞许和肯定，而垄断和控制则受到批评和怀疑。如果发展中国家出现私人垄断，就应该有强制性的规章规定：随着产量增加、规模经济的出现而必须降低价格。发展中国家政府的作用必须严格限制在提供必不可少的服务、在经济体系内限定产权以减少外在影响、并宣传和传播关于现有经济机会的信息之内。政府的这些行动将创造刺激，刺激又会鼓励投资者的竞争，使经济活动取得更高的价值。

总之，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把经济发展分解为基本经济活动，这些基本经济活动是价格导向的、竞争性的。在其中，公私垄断都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他们相信，不受干涉的市场体系必将对社会作出有益的自动调节。

### 三、资本积累理论

新古典主义者虽然强调短期，但在资本积累理论中却表现出对长期十分关心。他们不赞同古典学派关于在既定技术水平下劳动和资本在生产中保持固定比例的假设，而认为劳动和资本是可以互相替代的，也就是说，资本的增加并不必然有劳动力的增加。当资本存量对比人口有所增长时，国民收入和人均收入都会增长，但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认为，在既定的技术状况下，随着积累的增加，资本的边际效率将逐渐下降。

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看来，利息率和收入水平决定储蓄率。技术水平和人口水平既定，利息率决定投资流量，而人口的增长和技术的进步将刺激投资需求。由于技术进步的发生被认为是颇有规律的，储蓄率就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如果技术进步刺激了投资机会的增长，对资本品的需求将随之增长，从而利息率和储蓄率将提高。另一方面，投资率增长将使资本品的相对价格提高，因为资本品的生产要素的供给是有一定限制的。于是，较高的利息率和较高的资本品价格将起着一种“定量配给”的作用，把投资限制在收益最高的项目。但这些投资项目一旦建成投产之后，资本品的相对价格将下降，利息率也将下降。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收益较低的项目也会有利可图。这一循环继续下去，利息率将会下降到人们不愿储蓄的水平，资本积累将告中止，社会经济将进入静止状态。这种资本积累过程意味着单位劳动的资本量的增加，称为“资本深

<sup>①</sup> 迈耶，发展经济学的先驱，续集，英文版，1987，53

化”(capital - deepening), 对比之下, 资本积累的增加与劳动力的增加保持相同的比例时, 称为“资本宽化”(capital - widening)。

#### 四、国际贸易理论

新古典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一样, 仍然以静态方法研究国际贸易问题。

他们对比较成本学说作出了推演, 提出了资源赋有理论, 认为各国根据各自不同的资源赋有条件, 出口的是使用低廉生产要素比例大的商品, 进口的是使用昂贵生产要素比例大的商品。这样的国际专业分工可以使整个世界经济的资源得到最佳的配置, 从而在世界范围内增加了某些商品的产出, 而并不减少别的商品产出。可以看出, 在这种理论基础之上, 新古典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一样, 强调国际贸易的利益是增加实际国民收入, 国民收入的增长使储蓄也有所增长, 从而提高国内资本形成率。

但是, 他们却不像古典主义者那样毫无保留地认为自由贸易是一切国家的最好政策, 而在几个问题上表现出比较持重的态度, 如注意到“幼年工业”的特殊地位, 考虑到利用租税以改进贸易条件, 认识到技术变化可能恶化贸易条件而降低一国的实际收入以及自由贸易或许会降低某一特定生产要素的收入等。尽管如此, 新古典主义者一般地还是赞许自由贸易政策。他们的信念一般地还是“自由贸易, 和诚实无欺一样, 仍然是最好的政策”。<sup>①</sup>

新古典主义者还认为, 尽管资本在国际间流动, 但并不会造成严重的支付差困难和失业问题, 因为支付差机制中存在着自我均衡的力量。一个国家在借贷关系上一般经历五个阶段: 首先, 在发展初期, 可能是净长期资本输入国, 净利息和红利支付额少于净长期资本净输入量, 支付差调节机制运行的结果, 这个国家将在经常账项上出现赤字, 从而是个年轻的债务国。随后, 当利息和红利支出达到并超过净资本输入时, 这个国家进入第二阶段, 经常账项仍是赤字。再后, 这个国家开始偿还债务并转而向别国贷款, 长期资本输出超过长期资本输入, 于是这个国家从净长期资本输入国转变为净长期资本输出国, 但利息和红利支出仍然超过利息和红利收入, 从而它还是一个净国际债务国, 一个成熟的债务国, 这是第三阶段。然后, 这个国家开始有净利息和红利收入, 但其数额少于净长期资本输出, 于是, 这个国家成为年轻的债权国, 即使把净利息和红利收入除外, 经常账项也有盈余, 这是第四阶段。最后, 这个国家的净利息和红利收入超过净长期资本输出。如果把净利息和红利收入除外, 经常账项将呈现赤字, 如果把净利息和红利收入合计, 经常账项将有盈余。这个国家成为成熟的债权国, 这是第五阶段。

新古典主义者相信: 如果对外贸易自由化, 穷国和富国都会得益; 富国向穷国投资, 借方和贷方同样有利; 富国向穷国传播管理和技术, 双方都会有好处。因此, 他们认为不是南北冲突, 而是自由化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维持, 才能使双方都分享利益。

<sup>①</sup> 埃奇沃思. 政治经济学论文集. 英文版. 1925. 17

### 第三节 经济发展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

70年代,在新古典主义复兴思潮的推动之下,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发展战略上改弦更张,实行了以充分利用市场—价格机制为中心的对外开放政策,其中一部分国家和地区并由此而取得显著的绩效。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过去20年中,经济学家们根据客观现实中出现的问题,对有关经济发展的理论作出了不同于新古典主义的思考,其特点如下所述。

(1)如前所述,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中,曾经把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归同于资本积累或技术进步,或把资本范畴扩大到人力资本和社会知识的积累。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则认为,与其说高储蓄率、高教育程度或活跃的技术创新是经济增长和随之而出现的经济发展的原因,不如说它们是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表征或结果。从根本上说,除非现行经济组织或制度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发展是不会产生,更不可能是持续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倾向于把制度看成是外生的、既定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则认为制度是内生的,发展所最需要的(特别在初始阶段)是努力推动它的制度变迁。“例如,一个国家怎样才能有一个乐于并有能力推动经济增长的政府?在现时缺乏有效运作市场的国家中能否建立起这样的市场来?或者,在正常情况下,由市场执行的功能是否应该由国家来取代?增长是否要以一个完全发达的金融体系作为必要前提?或者一个国家在不具备该体系的某些部分时,能否发展经济?土地改革对于发展经济是否必不可少?如果是这样的话,需要什么样的土地改革?这些制度的问题和其他许多类似的问题,在发展过程中居于中心地位。”<sup>①</sup>总之,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十分强调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如他们所说,“制度确实重要”(Institutions do matter)。

(2)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指出,新古典主义有一个基本假定,即存在着私有制和零交易成本,这就意味着人们运用他们拥有的资源的权利是排他性的、可转让的,资源可以毫无成本地达到最优配置。但是,现实的世界是正交易成本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政治、法律等制度结构对于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的影响就非常显著,人们的经济活动总是在一定制度、组织与行为准则下进行的。因此要提高经济行为的绩效,就不能单纯依靠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核心:市场—价格机制,而必须在不同的制度结构中作出比较和选择,根据交易成本、产权、契约的规定,实现经济的最大绩效。

(3)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指出,新古典主义者自认为自己的体系是一个稳定的、完全竞争的均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每个人都拥有完全信息和完全竞争能力,而又总是被动地接受既定制度和既定政策的支配。但是,如果由于制度有所变迁而得到的边际收益和维持制度不变而得到的边际收益不相等,则这个完全竞争的均衡体系是一个不稳定的体系。而且,组织成本(organizational cost)的存在是合理的假定,市场中完全竞争就

<sup>①</sup> 吉里斯,波金斯等.第4版.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16



有向不完全竞争演化的趋势。在完全竞争的边际上，保护竞争均衡的力量往往不大，而追求垄断的力量往往不小，因此，虽然竞争均衡显示着帕累托最优，但现实社会却难以实现这种均衡。因此，新古典模式是纯粹抽象而缺少实际意义的模式。

(4) 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在指出新古典完全竞争模式缺少现实性的同时，又特别注意到在市场经济中拥有垄断权力的集团或个人可以凭借所掌握的权力攫取特殊利益或租金，他们所进行的活动给他们带来了利益，却给社会造成损失，因此是“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directly unproductive profit-seeking, DUP)。于是，在市场经济中，如果出现这种“寻利”或“寻租”(rent-seeking)活动，那么，决不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人们从事自身和社会利益相一致的活动，还有一只“看不见的脚”(invisible foot)在市场中肆意践踏，使“看不见的手”无法发挥预期的作用。寻租现象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但发达国家中，由于市场比较完善，信息比较对称，法制比较完善，寻租行为受到较大程度的制约，而发展中国家中，由于市场很不完善，信息很不对称，法制很不健全，寻租行为往往为害很烈，成为经济健康发展的重大障碍。

综上，成为第三阶段发展经济学指导思想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有两个特点：

第一，它是新古典主义复兴思潮的反动。它批评新古典经济学把政治、法律、制度等视为经济运行的既定因素或外生变量，而重新强调经济发展决不可能是纯经济现象，相反，它受着政治、法律、制度等因素的深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诞生意味着“向古典经济学的复归”(the return to classical economics)。

第二，它又是新古典经济学思路的延续和发展，因为，在分析问题的过程中，它既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范畴(如效率、均衡、最优化等)，又使用了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如成本—收益分析、均衡分析等)。

## 第四节 经济发展的激进主义思路

持激进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有如下的一些特点。

(1) 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批评，比结构主义更为尖锐，更为彻底。按照激进主义观点，新古典经济学脱离历史，脱离实际，运用纯粹逻辑，从概念到概念，从而其理论体系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例如，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所说的资源最优配置的基础是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而事实上并不存在着这样一种机制，所谓的资源最优配置不过是主观臆想。新古典主义的理论无视历史的变化，把工业资本主义看成是永恒不变的自然现象，而且对国际间讨价还价的能力、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及一般“公正”等问题，往往略而不论。按照激进主义思路，新古典主义的这些观点，正表明它回避了经济发展中最引人注目和最重要的方面。

(2) 超越了结构主义者缪尔达尔、普雷维什、辛格等人单纯从不平等力量去观察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如缪尔达尔所说的累积的、体现着回波效应的国际不平等

关系，普雷维什所说的中心—外围关系)，而进一步根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从历史与现状去认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支配—依附”（dominance—dependence）关系，因此，激进主义者的经济发展理论被称为“依附论”（Dependency Theory），而他们自己被称为“依附论者”（Dependencistas）。

（3）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一般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和理论的影响，因此，他们自称也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所受的马克思主义影响，在程度上有所不同。有的比较明显地采用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发展中国家国内的阶级关系和国际环境中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势力，去分析支配—依附关系。有的特别重视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对支配—依附关系，既作实证又作规范的分析。有的侧重对传统的比较成本学说的批判，提出不平等交换理论以解释支配—依附关系。

持激进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有巴兰（Baran, Paul）、阿明（Amin, Samir）、弗兰克（Frank, Andre Gunder）、卡尔多索（Cardoso, Fernando H.）、桑克尔（Sunkel, Osvaldo）、桑托斯（Santos, M.）、伊曼纽尔（Emmanuel, A.）等人，他们的主要论点分述如下。

## 一、巴兰的理论

巴兰认为，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是不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的，落后国家不过是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不可分割的物资供应地区而已。而不发达国家经济之所以难以增长和发展，一方面，因为市场是狭小的，高收入阶层虽有大量的储蓄，却不扩大投资，或者只从事垄断性的企业或缺少外在经济效果的生产，从而无助于公众福利的提高，也无助于刺激整个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因为由封建地主、产业特权阶层和新兴资产阶级的联合和勾结而形成的政府是缺少远见的，看不到建设基础设施的重要性。巴兰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势力……落后的地区总是高度发达资本主义西方国家不可分离的腹地。”<sup>①</sup>

## 二、弗兰克的理论

弗兰克认为，在国际关系中，无论哪一方而——贸易、投资或技术，主要的受益者不是发展中国家，而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达国家控制了先进技术，垄断了发展研究，又是跨国公司母公司的所在地，从而具有强大的支配力量。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进行工业化，仍然不得不依靠发达国家的优势力量，仍然不得不作为外围而受中心的剥削。外围因受跨国资本主义影响而形成的外在依附地位是它难于发展的原因。发展中国家的不发展不归因于前资本主义的传统或制度，而归因于资本主义。外围现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并不反映一种“初始的”（original）不发达状态，而是由国际的历史过程形成的，这种历史过程也是今日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在处于依附地位的外围国家不发展

<sup>①</sup> 巴兰，增长政治经济学，英文版，1957，11~12

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过程。全球体系是一种牺牲一部分利益而让另一部分发展起来的体系。外围的不发展和中心的发展是同时并存而又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推动力量是谋求资本的利润动机，它存在于资本主义商人和资本主义银行家发挥作用的帝国主义阶段，而今天则由跨国公司的行动表现出来。弗兰克说：“资本主义（国别的和世界的）在过去产生了不发达，而在今天仍然在产生不发达。”<sup>①</sup>在他看来，不发达（under development）并不单纯是非发达（nondevelopment），而是不发达国家依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所造成的一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形式。通过把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改变为包括输出初级产品、输入制造品和依附性工业化在内的“外向型”结构，外国资本使不发达国家产生的剩余转移到发达国家。

### 三、阿明的理论

阿明认为，世界资本主义由中心和外围两个部分组成。外围地区的资本主义关系是由外部引进的，但它的构成却和中心有很大的差异，因为在外围地区支配经济结构的是输出部门，而输出部门又是按照国外市场的需要而形成并受其制约的。外围地区的经济没有任何“自我的内在动力”（internal dynamism of their own）<sup>②</sup>。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在”（absentee）资产阶级的支配下，外围国家不过是中心国家的附庸。中心的发展造成了外围的不发展，并使外围依附于中心。阿明还深入分析了“不平等交换”问题。他说，所谓“不平等交换”是指交换的产品中工资的差异大于生产率的差异。外围国家中受国际资本支配的部门所采用的生产技术和中心国家同类部门是大致相近的，从而生产率水平也是相差有限的，但是外围国家的工资水平却比中心国家低得很多，结果，出现了不平等交换。外部不平等交换是随着内部不平等交换而出现的，为了保持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尽管有了现代技术，外围国家的低水平工资还必须维持不变。因此，阿明认为，不平等交换的存在，意味着阶级斗争问题必须从世界范围来加以考虑。

### 四、桑克爾的理论

桑克爾认为，不发达国家内部的结构瓶颈（bottleneck）起着“依附机制”（mechanisms of dependence）的作用。在这方面，桑克爾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几个问题：农业的停滞、出口商品的高度集中、工业化的高外汇占用率以及不断增长的财政赤字。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国外融资。桑克爾说：“就是在这一方面——获取外汇具有压倒一切的、不可逆转的必要性，最后合成为依附状况的存在，这就是依附机制的关键点。”<sup>③</sup>桑克爾还认为，和国际两极分化平行发展的是依附国家的国内殖民主义和国内两极分化。他说：“不发达—发达的全球体系在一个时期演进的结果，已经引起了表现为地理上的两种巨大的两极分化。第一，世界各国之间的两极分化，一方是发达的、工业

① 弗兰克，资本主义与拉美的不发达，英文版，1967，11

② 阿明，不平等发展：论外国资本主义的社会构成，英文版，1976，179

③ 桑克爾，拉美国家发展政策与外部依附，社会经济研究，1969，10

化的、先进的、中心北方（Central Northern）国家，另一方是不发达的、贫穷的、依附的、外围南方（Peripheral Southern）国家。第二，国内的两极分化，一方是先进的和现代化的群体、地区和活动，另一方是落后的、原始的、边际的和依附的群体、地区和活动。这两种结构之间的主要差异在于发达结构由于它的内生的增长能力而成为支配结构，而不发达结构由于它的动力具有诱导性质而成为依附结构。”<sup>①</sup>桑克尔和其他依附论者还争论说，中心以多种方式去剥削外围，例如，使后者的生产结构偏向原料供给，以外围资本进行搜刮，挫败自主的民族经济的发展等等。中心—外围的贸易特点是不平等交换。不平等交换指外围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也指在投资、技术转移、租税以及和跨国公司等方面不平等的讨价还价力量。跨国公司吮吸发展中国家本来可以用来作国内发展资金的经济剩余，外围资本造成东道国的经济扭曲和政治扭曲。经济扭曲表现在：跨国公司使用加重东道国失业的不适宜的资本密集型技术；跨国公司使东道国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跨国公司改变东道国的消费趣味并促成具有发达国家特点的“消费主义”（Consumerism）；跨国公司把在东道国的研究工作和企业决策集中统一起来，从而使得子公司和附属机构不能和东道国的本国经济融为一体。政治扭曲表现在：跨国公司把母公司在所在国家的法律、政治以及对外政策的影响带进东道国；跨国公司还可以削弱东道国政府控制经济的能力，并操纵国际金融贸易体系以满足它们的需要而损害东道国的当局。

## 五、卡尔多索的理论

卡尔多索认为，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结果，是在这些国家内形成一种内在的分裂，并把这些国家经济中最“先进的”部分和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连接起来。依附国家的落后社会经济部门是分离的部门，但又是先进部门的从属部门，只起着“内在殖民地”（internal colonies）的作用。两种部门的差距将继续扩大，结果产生了一种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所不能想象的新型二元主义。这种结构的“二元性”（duality）表现出同一统一体的内在分化。它是资本主义扩展的直接结果，反过来又为资本主义扩展效劳。它有助于把工资维持在低水平，又在“现代化”部门消除了政治压力，因为在这种部门的人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比较而言要好一些。卡尔多索关于发展中国家内部两极分化的论证是以新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为基础的。他着重指出，由于社会经济剥削机制的存在，工人阶级从属于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又从属于帝国主义中心。依附的不发达结构内部的现代化支配集团，一方面从事与发达结构相联系的活动，一方面从对落后的、边际的、依附群体的内部剥削去获得高额收入。无论在经济上、文化上或社会上，现代化支配集团与发达结构的关系，比与自己国家的边际化人口（marginlized population）的关系，要紧密得多。经济的权势自然产生政治的影响。支配国家可以对依附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外围的利益集团可以和依附国家的高阶层结成政治联盟。于是，某些阶级的跨国一体化（transnational integration）造成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分裂。发展中国家的内部两极分化和阶级冲突反映出国际的两极分化和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卡尔多索说：

<sup>①</sup> 桑克尔，跨国资本主义与拉美的国家分裂，社会经济研究，1973，3

“经济权力表现为社会支配。一个阶级或一个经济集团，努力通过政治过程，建立起可以任由它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整个社会的一套制度，或至少建立起可以保证符合自己利益与目标的经济政策的联盟。”<sup>①</sup>他还说：“我们设想外在力量和内在力量之间的关系会形成一种复合体，这种复合体的结构联系不基于外在的剥削和压制，而植根于本国支配阶级和国际支配阶级的利益的一致，同时，在另一方面，又受到本国受支配集团和阶级的挑战。”<sup>②</sup>

## 六、桑托斯的理论

桑托斯认为，依附有几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建立在贸易和对自然资源的剥削基础上的“殖民依附”（colonial dependency）；第二种形式是“金融—工业依附”（financial—industrial dependency），这种依附的特征是支配国使依附国的经济结构适应于它的需要；第三种形式，是“技术—工业依附”（technological—industrial dependency），这种依附是以跨国公司为基础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中进行投资，使其国内市场适应于自己。除了国际原因外，每一种形式的依附都是与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结构相联系的，这种内部结构本身也是依附的一部分。例如，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结构、收入不均等、富有阶级的炫耀性消费、智力上的依赖性、只想寻求外部帮助的陋习以及崇洋媚外，等等。这表明，依附绝不仅是一种外生现象，而且是一种内生的现象，有其内在的根源。因此，根除依附的惟一办法是改变发展中国家的内部结构，并使其适应于外部国际结构。<sup>③</sup>

## 七、伊曼纽尔的理论

伊曼纽尔根据依附理论，论证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是一种不平等交换。他认为，由于穷国的工资较低，利润率较低，决定了穷国的贸易条件不利，因而在与工资高、利润高、贸易条件有利的富国进行商品交换时，是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受到富国的剥削和掠夺。他指出：即使其他条件都相同，单是工资的不平等就可以成为不平等交换的原因。为了说明他的观点，他列出了一种两个国家贸易的模型：一个是中心国家（C），一个是外围国家（P），假定两国的出口产品价格都是以加成定价即在单位劳动成本上加上利润百分比（ $r$ ）确定的，那么，中心与外围的产品价格分别为：

$$P_C = W_C \left( \frac{L}{O} \right)_C (1 + r_C)$$

$$P_P = W_P \left( \frac{L}{O} \right)_P (1 + r_P)$$

式中  $P_C$ 、 $P_P$  分别代表中心和外围的产品价格， $W_C$ 、 $W_P$  分别代表中心与外围的工

① 卡尔多索，拉美的依附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左翼评论，1972，7

② 卡尔多索，法勒托，拉美的依附和发展，英文版，1979，19

③ 桑托斯，依附的结构，美国经济评论：论文和记录汇编，1970，5

资率， $r_c$ 、 $r_p$  分别代表中心与外围的利润率， $\left(\frac{L}{O}\right)$  为单位产出的劳动成本。

现在假定，由于制度上的原因， $W_C > W_P$ ，两国的加成或利润率 (mark-up or rate of profit) 相等。伊曼纽尔认为，由于外围的工资低，贸易条件不利，或者，即使外围与中心的工资相比有所提高，只要外围的利润率较低，贸易条件也会不利于外围，从而外围在与中心的国际贸易中仍处于不平等交换。据此伊曼纽尔认为，要消除国际贸易中交换的不平等，必须使外围国家提高自己的工资水平<sup>①</sup>。

综上所述，各个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在论证时各有侧重，但他们对不发达的性质和不发达的根源，都有比较一致的观点。他们认为，不能从表象去把不发达单纯看成一种落后状态或一种自然现象，而应认识到，它是世界资本主义发展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世界资本主义积累过程的一个方面，也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不发达现象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存在着支配的中心—受支配的外围关系和不平等交换的关系。处于外围的、受支配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始终是处于中心的、支配地位的发达国家的从属，不能自我地、独立地决定本身的经济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在不平等的交换关系中，中心国家从外围国家取得了大量的剩余，从而得到不断的发展，而外围国家由于剩余的源源流出，从而不能跳出持久贫困的陷阱。发达与不发达不过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两个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侧面。

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根据他们各自对支配—依附关系的理论分析，得出了下述的一些政策推论：

(1) 他们一般不同意以普雷维什为代表的中心—外围论者的说法：中心与外围的差异主要是中心拥有发达的制造工业，因此，一旦外围进行工业化，生产率的增长将逐渐加速，国民经济将不断发展，中心与外围的差距将趋于缩小。而持依附论的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则认为，受支配的外围工业化的结果将是经济上依附性和“附属化”(Subsidiarization) 的加深。而且那些主张把发达国家的贸易金融政策自由化的建议即使被采用了，也无助于改变中心—外围模式的支配—依附关系。要使依附状况颠倒过来，就必须改变内部生产结构，改变制度和秩序。

(2) 依附论者当中，有人认为，除非整个世界改造成为国际社会主义体系，否则外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发展。只有铺平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出现了具有新意识形态目标的新社会群体，自主的发展才有可能。有人认为，在外围国家内部必须进行由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挫败那些按照外国经济利益需要而行事的“企业的”和“官僚的”资产阶级集团的野心。换言之，革命和社会主义是发展的必要条件。

(3) 特别注意中心与外围力量不平等的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外围通过坚定的政策措施，实行地区经济一体化，订立国际商品协定，发展本国技术，就可以把中心的不利影响缩小到最低限度。

(4) 还有的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则主张一种和国际体系“脱钩”(delinking) 的

<sup>①</sup> 伊曼纽尔. 不平等交换：贸易中的帝国主义研究. 英文版. 1972. 78

政策，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不能只停留在内向的进口替代政策，而应当走向“集体的自力更生”。阿明说：“不发达国家只要继续和世界市场结合在一起，它就始终处于无助的地位。”<sup>①</sup>阿明主张一种由三个互相依赖的部分组成的新发展战略：其一，选择以依赖本国资源原则为基础的自力更生发展道路。其二，优先考虑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和经济一体化。其三，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以提高原料的价格，控制自然资源，保证第三世界的制造品能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并加速技术转让。

(5) 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都不很赞同国际经济新秩序。认为它不过转移了目标，而且即使能建立起这种所谓新秩序，也不能导致外围国家的自主发展。还有不少的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争辩说，国际经济新秩序只会使不平等交换关系永远保持下去。

## 第五节 对四种基本思路的评论

从前四节的叙述可以看出，在思想的渊源，在对市场—价格机制和国际经济格局的评估，在对国家作用的想法等等方面，经济发展问题的四种基本思路都是颇有歧义的。从本书以后有关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分析和政策建议的各章中，可以认清这些歧义的痕迹，并进一步对四种基本思路有所了解。

如何评论这四种基本思路呢？在叙述每种思路的主要观点时，都可看到他们各自立论中已夹杂着互相的批评。以下，我们就每一种思路介绍一些有影响的发展经济学家的评论意见。

### 一、迈耶和鲍德温对新古典主义思路的评论

迈耶和鲍德温 (Baldwin, R. E.) 指出，和一切经济理论一样，新古典理论是否能够充分解释经济发展过程，决定于它对经济活动的重要因果变量的观察是否正确。新古典主义学者在建立切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时，一般假定种种条件的存在，如政治稳定，人民有坚定的“发展意愿”，储蓄习惯牢固而不易改变，人们的趣味不变，受过训练的劳动力和管理技能有充分供给，个人竞争普遍存在，要素在国内具有高度流动性以及经济知识能在国内和国际间迅速流动和传播等等。新古典主义学者从替代关系中去观察人口的数量变动、资本存量、自然资源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在这些方面，新古典主义学者对更好了解经济发展的原因和过程，无疑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发展思路，却具有明显的缺陷而应当受到批评。

(1) 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发展思路贬低了不可量度的、非经济因素的变化发展的重要性，例如政治稳定的程度，人民对发展的态度的变化等等。尽管马歇尔承认，由于没有把这些因素的变化发展充分论证，他的理论分析存在着局限性，但是持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仍未重视这一问题。

<sup>①</sup> 阿明. 世界规模的积累. 英文版. 1975. 131

(2) 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发展思路假定,促成发展的力量是依照一种渐进的、连续的方式而发挥作用的。这就暗含着存在一种具有高度确定性、人们可以作出仔细的和合乎理性的计算的经济环境,从而,价格体系成为一种决定既为当前需要、又为未来需要而进行生产的国民经济的重要机制。在价格体系中,特别是利息率被看成是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然而,如果推动发展的力量不是依照连续的、渐进的方式,而是依照不连续的、非渐进的方式发挥作用,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基本假设就不能成立,整个推论也因之站不住脚。在现实的经济中,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到如此程度,以致利息率不再是投资者作决策的重要因素。

(3) 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发展思路,又把经济发展看成是一个和谐的、利益会普及到各个部门的过程,这种看法是把经济发展过程看成是一个渐进的、连续的过程的逻辑推论,同样不符合经济现实。

(4) 新古典主义的经济论证总是从充分就业条件下出发的,对国内情况如此,对国际贸易的运行也是如此。而充分就业又是一个空洞的假设。当充分就业不存在,而政府既不愿意也不可能按照金本位的“规则”行事时,新古典主义经济学者对国际支付差调节机制的分析也就失去意义。而且,如果经济变化呈现的图象是动态的、不连续的而又多变的,新古典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也不过是纸上谈兵,不切实际<sup>①</sup>。

## 二、钱纳里对经济发展的结构主义思路的评论

钱纳里的评论,可以概括为三点:

(1) 结构主义思路的出现,正好弥补新古典主义思路的不足。新古典主义强调必须尽可能除去对市场功能的种种障碍,但现实的经济生活中,这种或那种障碍总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市场的“不完全性”总是存在的,从而新古典主义愿望中的尽可能除去对市场功能的种种障碍,不过是把现实世界化为抽象模式。因此,必须把这种“不完全性”结合到模式之中,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就有可能处理内在和外在的不均衡现象,并进而提出较为实际可行的建议。这就是结构主义思路的一个出发点。在不少文献中,有人把根据这种考虑而提出的政策建议和新古典主义模式相比,列为“次优”(second best),这种说法是容易引起误解的。较为精确的说法应当是,新古典主义模式过于抽象和简单,而“最优”(first best)的政策建议是可望而不可求的。由此,应当更注意去增进新古典主义模式的现实性,而不应当完全抛弃它们,以避免结构主义的公式也出现同样过分简单化的弊病。

(2) 结构主义学者由于极度轻视或无视市场调节的优点,他们的政策建议一般过分强调了发展中国家有限的管理机构的作用。但是,正如赫尔希曼(Hirschman, A. O.)着重指出的那样,这正是发展中国家从事经济发展所受的各种限制中的一种主要限制,应当考虑到的是不要追求对发展政策作过多的微调。比起一项较容易实行的简单规划所造成的低配置效率,执行一套复杂政策所带来的困难,付出的代价也许还要大得多。

<sup>①</sup> 迈耶,鲍德温. 经济发展:理论、历史政策. 英文版. 1976. 65-85



(3) 应当承认, 由于世界经济的变化,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 遭遇了更多的困难。事实上, 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严重经济结构不均衡的状态之中。尽管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比较着重考虑有关分配的发展政策, 他们也应当认识到, 除非同样重视对外贸易和资本流动等问题, 否则解决分配问题的政策也是难以贯彻的<sup>①</sup>。

### 三、洛尔对经济发展的激进主义思路的评论

洛尔 (Lall, S.) 的评论, 可以概括为三点:

(1) 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所提出的依附国家不发达的特点, 并不只是依附国家惟独具有的特点。那些特点在“非依附”国家也存在。恰当地说, 那些特点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特点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general), 并不必然是依附资本主义 (dependent capitalism) 的特点。因此, 激进主义的分析不能说明那些特点与不发达之间的因果关系。

(2) 任何自称为不发达理论的依附概念, 应当符合两条标准: 其一是, 必须限定依附国家的特点不能也为非依附国家所共有; 其二是, 必须证明那些特点对依附国家发展的历程和格局有不利的影 响。如果不符合第一条标准, 则整个概念体系是有缺陷的。如果不符合第二条标准, 则整个理论就不是解释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理论, 或者说, 不是解释“拉美不发达的理论” (theory of Latin American underdevelopment), 而不过是一套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指标, 无助于了解拉美或其他地区不发达的动态。洛尔还进一步分析了依附经济共有的主要特点, 并提出了找出这些特点的方法, 即“筛选出现代资本主义影响欠发达国家的一些显著特点, 并把它们纳入独特的依附范畴之内”。

(3) 激进主义的依附理论, 倾向于把不发达和依附看成一种循环关系, 而未能剖析其因果关系, 因此, 激进主义的文献给人们一种印象: 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 是因为它们处于依附地位, 而它们之所以处于依附地位, 是因为它们具有不发达的特点。<sup>②</sup>

从上面的述评, 我们可以认识到, 作为经济发展问题的三种当代基本思路是各有其特点的: 新古典主义思路强调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 主张完全竞争, 反对国家干预, 确认发展过程中社会团体之间、穷国与富国之间利益的一致性; 结构主义思路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 主张国家的干预和管理, 否认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平稳、和谐的状态; 激进主义思路强调穷国与富国之间的不平等地位和利益冲突, 主张打破支配—依附的旧格局, 倡导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和地区的一体化。50年来, 西方发展经济学对各种问题的观察、研究、分析和论证, 始终明显地表现出持不同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各自的特点。在发展经济学兴起之日, 虽然凯恩斯理论已经给新古典主义以强大冲击, 但新古典主义在西方基本经济理论体系中仍占据有利地位。因此, 从开始, 新古典主义就对西方发展经济学具有深刻的影响, 尽管在五六十年代, 结构主义曾一度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占据上

<sup>①</sup> 钱纳里. 发展政策的结构主义思路. 美国经济评论: 论文及会议记录汇编, 1975. 5

<sup>②</sup> 洛尔. 依附是一个分析不发达的有用概念吗. 世界发展, 1975. 2 (11)

风,但60年代中期以后,新古典主义凭借它的成套而有力的分析工具、细腻而富于逻辑性的实证分析以及对经济运行机制的比较深刻的观察,又恢复并扩大了它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号称“新古典主义的复兴”。激进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一直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尖锐对立,并对后者的脱离实际和为国际经济旧秩序过于维护作出了并非过分的批评,但是,激进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立论有简单化的缺点,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由此看来,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把新古典主义思路认作是发展经济学的主流,是不无道理的。例如,一位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非常清楚地说道:“发展经济学的主要格局是以古典—新古典学派对世界的看法为基础的”<sup>①</sup>。他还说道,新古典学派的“思想形成了正统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贯穿这门学科基本体系的一条红线”<sup>②</sup>。

#### 四、迈耶对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的评论

迈耶(Meier, G. M.)认为新政治经济学或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的特点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的政治观为基础的更为形式化的思路。持这种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企图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选择概念去分析深刻影响经济市场的政治市场,他们把论证的中心放在政策决定上,认为官员和管理者对政策目标和手段的选择是根据理性的自利原则,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最大化、最小化和最优化的行为准则,从而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可以应用在政治偏好函数、政治资源和政治约束条件之中去解释政府行为。

迈耶说,这种思路不同于通常的线性分析(linear-type analysis)。如下图所示,线性分析认为经济学家依据福利经济学的原则考虑公众利益向政策决定者提供预测和处方。

政策决定者根据这些预测和处方去选择政策、执行政策并取得政策效果,政策决定者也就是“理性捍卫者”(platonian guardians)。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视野大大超越了这种线性思路,他们考虑到影响政策决定者作出政策选择的其他力量。这些力量可分为“社会中心”(society-centered)和“国家中心”(state-centered)两类。重视前一类力量,就把政府看成是消极的、被动的;重视后一类力量,就把政府看成是积极的、主动的。在迈耶看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重视图3.1中所示的以I.A.和II.A.为基础的政策决定,而重视以I.B.和I.C.,II.B.和II.C.为基础的政策决定。因为I.A.表示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或依附理论所强调的阶级力量,II.A.表示致力于国民福利的仁慈政府的技术治国思路,而I.B.表示多元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所强调的利益集团,I.C.表示党派和选民,II.B.表示官僚政治力量,II.C.表示代表国家利益的力量。可见,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是依据理性选择去强调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政策决定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总之,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不再像新古典经济学家那样把政府视为为公众利益而行善的理性捍卫者,同时,又和新古典经济学家相似,排斥激进主义经济学家的阶级分析,依据公共选择之类多元主义理论并坚持理性选择原则去考察政策决定和政府行为。因此,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指责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政府权力过分扩张而在经济上造成种种负而影响,如寻

① 纽金特.发展经济学中当前争论的问题.见:80年代的经济论争.英文版.1979.268

② 纽金特.发展经济学中当前争论的问题.见:80年代的经济论争.英文版.1979.268

租行为、直接非生产性寻利活动、国有企业特殊照顾、政治化的信贷配给、类似发达国家“院外集团”的利益组合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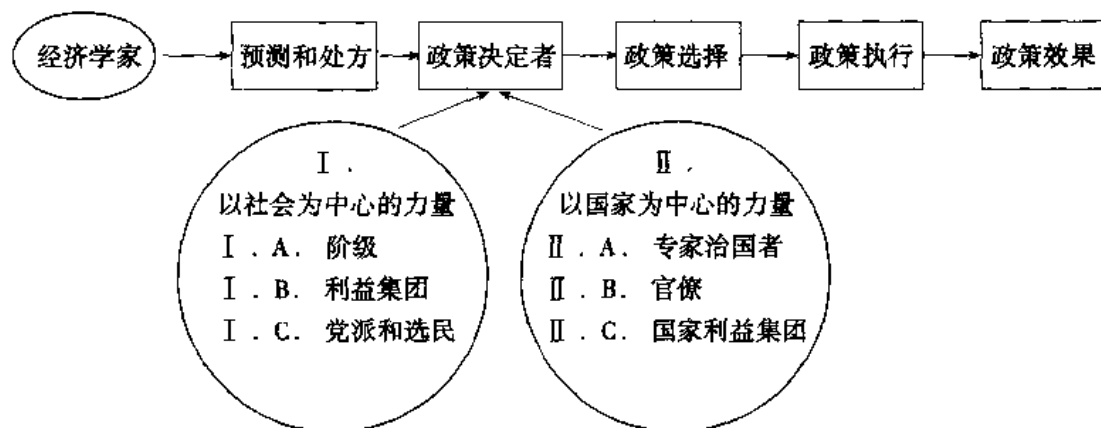


图 3.1 政策形成过程

迈耶对新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经济发展思路提出了如下的批评意见：①以理性选择原则来规范政府行为未免失之简单化，政府行为中也包含利他主义，而且在政府行为分析中要始终保持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固有精神：重视历史、制度、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②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对政府失灵往往是事后（*ex post*）分析，而非事前（*ex ante*）分析，又未能做到把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结合起来进行分析。③没有突出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上稳定的重要性。经验证明，政治的不稳定性严重地阻碍了经济发展。迈耶说：“对民主而言，市场是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④没有强调政策变革需要“政治企业家精神”（*political entrepreneurship*），迈耶认为发展中国家所缺少的正是这种精神。⑤没有把政治进程的了解和经济建议的提出结合起来，仅仅把经济建议看成一种技术性的活动。

迈耶结论道：为了更好地了解经济发展取得不同绩效的原因并由此确定政策变革，必须把新老古典经济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必须超越形式上的理性选择模型的限制，把传统古典经济学所强调的非经济因素及其相关的重要概念重新正确定位。

迈耶用图 3.2 阐明了他的设想。

迈耶说，我们所需要的是理解制度变迁的性质以及它对发展绩效的影响，因此，应当更关注市场、产权、契约形成、信息问题、组织变化和刺激。这些来自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可以充实新老政治经济学。由这种对实际政策决定过程较为广泛的视野出发，经济学家可以更好地提出纠正非市场失灵和克服政策革新阻力的建议。人们所希望的是下一代发展经济学家能更多地理解那些较为政治化、含有积极理性、需要制度变迁而且不易导向技术分析的问题。如果用上面的象限图来说明，发展政策决定的分析将由第四象限向第一象限移动，从而有较强的力量去对付发展的挑战<sup>①</sup>。

① 迈耶. 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英文版. 1995. 579 ~ 5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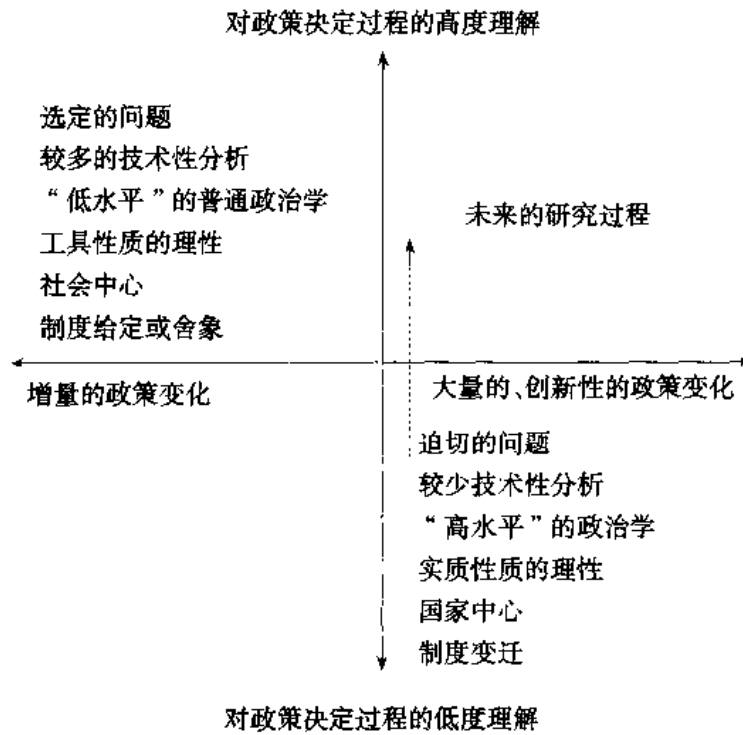


图 3.2 不同的政策状况

## 第四章 资本形成与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是由多种要素推动的。在经济分析中，通常将各种要素划分为土地、劳动和资本。囿于同质 (homogeneous) 资本的简单化假设，所谓资本，这里指以机器、设备为主的物质资本 (physical capital)，并且各种形式的异质资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转换成同质的资本存量。在发展中资本、土地的丰歉会给经济增长造成有利或不利的影 响，是重要的而非决定性的增长要素；劳动力是一般发展中国家的比较充裕的投入要素，当然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因此，资本存量的多寡，特别是资本形成的快慢，在许多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心目中，往往是促进或限制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这种看法在发展经济学的第一阶段最为流行，已形成一种“唯资本论” (capital fundamentalism) 的观点。

### 第一节 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资本是一种稀缺的生产性资源，是人们从事生产活动的投入要素之一。从类型上讲，资本一般分为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三种形式，西方发展经济学所讲的资本，主要是前两种形式，而本章所涉及的则是物质资本。所谓物质资本，是指长期存在的生产物资形式，如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交通运输设施等。物质资本是投资过程的结果，它代表着本期的生产能力，并同其他互补性生产要素结构代表未来时期的生产能力。

资本的重要来源是储蓄，即一国在一定时期内的国民收入减去消费后的余额。从再生产的角度来看，国民收入减去消费后的储蓄又称为“资本积累”。而根据国民收入均衡公式  $S = I$  来看，假定既定的储蓄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那么储蓄就等于投资，从而投资过程就是资本积累过程。在发展经济学中，人们通常综合地考察储蓄、投资和资本积累过程。并结合投资标准、投资效益、技术进步等因素来分析储蓄如何转化为资本品生产的投资，投资又如何形成成为一定的资本形式，产生一定的生产能力，因而将此过程称之为“资本形成” (capital formation)。应当强调的是，这里的资本形成，主要是指储

蓄或资本积累中扣除旧资本更新后的“净投资”或“净资本形成”，因为只有净资本形成才对经济增长发生作用。但是，由于资本更新可能引起“资本深化”（capital deepening），即新资本的生产率提高或资本—劳动配合比率增大（劳动投入减少），因而人们在分析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时，通常使用“总资本形成（gross capital formation）”概念。鉴于此，资本形成与资本积累两个概念可以通用。

本书第二章已经指出，在西方经济学中，对资本积累作用的强调由来已久。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就曾认为，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资本积累量的大小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關鍵。这一思想在凯恩斯主义的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在哈罗德—多马模式中， $G = s/C$ ，其中资本—产出比  $C$ （代表投资效率）被假定为不变，因而，储蓄率  $s$  就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率惟一因素。在这个模式中，因为储蓄可以全部转化为投资，所以，储蓄率就是投资率或资本积累率。由此可见，在哈罗德—多马模式中，资本积累的作用被提高到了十分突出的地位——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中惟一的决定性因素。哈罗德—多马模式是用来分析发达国家的长期的、动态的经济增长过程的理论，但它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宏观的、动态的、长期的方法）、考察的经济增长的要害（资本、劳动、人口等）以及结论和含义等内容，同样适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

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是从经济史的角度来描述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条件、机制、政策等，由于他使用的是历史的、长期的、动态的和宏观的方法，考察的是不发达国家如何发展为发达国家的过程，并涉及到人口增长、资本积累、经济结构变化、制度和思想意识的变革、贫困的消除与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等内容，因而这也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发展理论。尤其是“起飞”理论，以不发达国家为考察对象，以经济落后为分析起点，侧重研究不发达国家如何摆脱经济落后，实现经济“起飞”，进入初始的经济发展阶段，因而是名符其实的发展经济学。在“起飞”理论中，罗斯托认为，一国要顺利实现经济“起飞”，即初始的（低级阶段的）经济发展，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投资率即资本积累率（或储蓄率）达到10%以上，二是建立起能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主导部门体系，三是必须伴随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变革。在这三个条件中，资本积累率达到10%以上是基本的、先决的条件。由此可见，罗斯托把资本积累率的提高看做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前提，并认为这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具有历史必然性的普遍规律。

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依据哈罗德—多马模式和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约束条件和决定性因素，从而形成了过分强调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的“唯资本论”。

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工业化、计划化理论中，也体现着“唯资本论”的思想。工业化理论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也就是农业中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不断转移，直至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的过程。与此同时，工业部门的扩张，主要通过实行保护主义政策建立发展民族经济所需要的“幼稚产业（infant industries）”和“进口替代”工业来实现。问题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须以城市工业部

门的扩张和对劳动力需求的扩大为前提，而工业生产的扩张则需要有不断的资本积累；而“幼稚产业”和“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更是需要大量的资本积累。因此，资本积累是实现工业化、城市化的关键。再从计划化理论来看，一个工程项目的建成，一个新产业部门的形成，都需要有足够的投资量作后盾，从而发展计划的实施也是以一定的资本积累为基础的。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的现实，进一步推动了计划化理论的发展。

上述观点在刘易斯的著作中反映得最为明显。早在1954年，刘易斯就提出，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资本形成率的提高，他说：“经济发展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由原先储蓄和投资还不到国民收入的4%~5%转变为自愿的储蓄达到国民收入12%~15%以上这个过程。它之所以成为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是迅速的资本积累（包括运用资本的知识和技术）。如果不能说明储蓄相对于国民收入增长的原因，也就不能说明任何‘工业’革命。”<sup>①</sup>1961年，费景汉和拉尼斯（Ranis, G.）在进一步论证刘易斯的人口流动模式并提出费—拉尼斯模式时，也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后，农业生产率提高并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农民将剩余的农产品出售给工业部门，得到相应的收入，再将这些收入存入银行形成储蓄。这时，工业部门从农民手中（或从银行）借入这些储蓄，将它转化为工业投资，这就促进了资本形成，为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即工业化）创造了条件。”<sup>②</sup>

因此，尽管在20世纪，发达国家中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下降，但在发展中国家，资本积累却被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或约束条件。原因是：其一，在发展中国家，资本的定义要比一般研究定义宽泛；其二，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均资本存量差异巨大；其三，资本深化对总产量有很大影响。而且，资本积累也被视作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惟一出路。

为了用实际材料进一步证实这些观点正确与否，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利用索罗、丹尼森等人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方法，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诸因素进行了类似的研究，测算了各种投入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小。这一研究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函数研究”，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麦迪逊（Maddison, A.）、布鲁顿（Bruton, H.）、罗宾逊（Robinson, S.）、哈根（Hagen, E.）、兰普曼（Lampman, R.）、纳迪里（Nadiri, M.）等。

麦迪逊在1970年出版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和政策》一书中，考察了1950年~1965年间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麦迪逊使用的是传统分析方法，不同的是他考虑了卫生和教育的改进对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因而他把劳动投入看做是人力资源，并称之为“有效劳动供给”（effective labour supply）。据此，麦迪逊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人力资源、资本和资源配置效率三大类。麦迪逊的分析说明<sup>③</sup>：在1950年~1965年间，这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5.55%，其中人力资源

① 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阿加瓦拉，辛格编，不发达经济学，英文版，1973，416

② 费景汉，拉尼斯，经济发展理论，美国经济评论，1961，9：533~565

③ 麦迪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和政策，英文版，1970，53

(劳动力)平均增长率为1.9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35%；资本平均增长率为3.0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55%；资源配置效率的平均增长率0.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10%。将这一情况与丹尼森等人的研究成果作一比较，可以得到一个结论：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资源配置效率的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达国家要大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以技术进步为核心的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相对较小，而资本投入的增加是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

1971年，纳迪里在《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国际研究》一书中，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分为四大类：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全部要素生产率、资源流动对全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其中劳动投入又分解为就业增长、卫生与营养的改善、教育状况三小类，表明劳动投入包含着人力资本的因素。在此分类基础上，纳迪里研究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时期一些国家经济增长中各类要素的相对贡献，其中所选的国家有很多是发展中国家并与麦迪逊研究所选的国家相同。纳迪里的研究表明：除日本和以色列外，所考察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中，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是要素（资本和劳动）投入量的增加，其中主要是劳动投入量的增加。相比之下，全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要明显小于要素投入量增加所作的贡献。这一研究结果与麦迪逊的结论显然有所不同，即纳迪里将资本和劳动合并为要素投入来同全部要素的生产率进行比较，并且明显降低了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比重。但这两个研究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即后一研究支持了前一研究的结论，都认为：要素生产率（或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小于发达国家，而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因此，这两个研究的共同结论是：资本形成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

纳迪里、麦迪逊等人的实证研究进一步肯定了“唯资本论”关于资本积累是经济发展的关键和主要约束条件的观点，使这种理论成为发展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得到了托达罗、瑟尔沃尔、哈根、吉里斯和波金斯等发展经济学家的赞同。这一论点，后来因技术进步要素的引入受到冲击，但是，在90年代，阿温·杨（Young, Alwyn）在对东亚经济的考察中重新确认了资本积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sup>①</sup>。

## 第二节 资本形成的基本理论

50年代初，发展经济学主要集中于探讨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和摆脱贫困的出路问题。这些理论的重要结论之一，就是认为，经济增长停滞不前、人均收入水平低下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而经济增长停滞、收入水平低的根源在于缺乏资本和投资。因

---

<sup>①</sup> Young Alwyn.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NICs: a contrarian view.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ight annual congress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Helsinki, 1993. 8: 26~29



此，资本稀缺是经济发展的阻碍或约束条件，而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增长，必须大量积累资本，大幅度提高投资率。这些理论，从揭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方面，论证了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的观点。

## 一、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

1953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罗格纳·纳克斯（Nurkse, Ragnar）出版了《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一书，系统地考察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探讨了贫困的根源和摆脱贫困的途径，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理论，形成了早期发展经济学的资本形成理论的雏形，在《市场规模和投资引诱》一文中纳克斯进一步完善了这一理论。

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特征是经济发展停滞不前，人均收入水平低、生活贫困。之所以存在长期的贫困，不是因为这些国家国内资源不足，而是因为这些国家的经济存在着一个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并使穷国维持贫困状态的“多种力量的循环集”（a circular constellation of forces）。举一个例子，一个穷人没有足够的食物，由于处于饥饿状态，他的身体可能很虚弱；由于体质弱，他的工作能力就低，这意味着他穷，反过来又意味着他没有足够的食物，如此反复不已。对于一个国家而言，纳克斯得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一国穷是因为它穷”（A country is poor because it is poor），而在这个多种力量的循环集中，最重要的障碍是经济落后国家资本积累的循环集。资本的供给受储蓄能力和愿望所左右，资本的需求则受投资刺激支配，这两方面的原因使资本形成陷入两个难解的“贫困恶性循环”之中：

从供给方面看，资本形成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经济不发达，人均收入水平过低。低收入意味着人们将绝大部分收入用于生活消费，而很少用于储蓄，从而导致储蓄水平低、储蓄能力小；低储蓄能力导致资本稀缺、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使生产规模难以扩大，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引起低经济增长率，低增长率又造成了新一轮低收入。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从需求方面看，资本形成也存在着一个恶性循环：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人均收入低，生活贫困。低收入意味着低消费和低购买力；低购买力引起投资引诱不足；投资引诱不足导致资本形成不足；资本形成不足造成生产规模狭小、生产率难以提高；低生产率又导致低产出和低收入水平。如此周而复始，形成一个“低收入——低购买力——投资引诱不足——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的恶性循环。

纳克斯指出，人们一般注意资本供给方面形成的恶性循环的严重性，而实际上，资本需求方面导致的恶性循环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表现为投资引诱受市场规模的限制。这个命题实际上是斯密的著名论点：“分工受市场规模的限制”的一个发展。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由于人均收入低，社会购买力和消费水平也低，因而市场容量狭小。这样，即使有了储蓄，也会缺乏投资引诱，因为市场容量有限，商品不易销售出去，企业不愿贸然进行大量投资。例如，在一个绝大部分人

穷得穿不起皮鞋的国家，创建一家现代制鞋厂的商业建议可能令人疑惑不解，因为鞋的市场太小。如果将上述两个循环联系起来看，那么，即使有投资引诱，却缺乏储蓄用于投资；即使有储蓄，却又缺乏投资引诱来消化储蓄。因此，这两个循环形成一个牢固的死圈，很难打破，从而发展中国家必然会处在长期的经济停滞和贫穷的困境之中。

纳克斯认为，产生这两个恶性循环的共同的原因是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过低。资本形成不足是两者的关键，它一方面造成低水平的储蓄，另一方面造成低水平的需求。“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是一种用结构主义方法来探讨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要说明：资本缺乏是产生“贫困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资本形成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因此，要打破“贫困恶性循环”，必须大规模地增加储蓄，扩大投资，促进资本形成。应采取平衡增长，即在许多的、广泛的行业中同步地投入资本。因为假若市场狭小，单一行业生产的产品没有市场，相反，各行业同时投资会形成相互需求，扩大市场容量，反过来又保证投资成功。他说，一个广大范围的产品生产就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因此投资要“全线进攻”，而不是分散。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贫困这一重要特征，并初步探讨了产生贫困的根源和摆脱贫困的途径，但是，它过分强调了储蓄的作用和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因而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认为：

(1) 纳克斯混淆了具有绝对意义的储蓄水平（绝对储蓄量）和具有相对意义的储蓄率（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率）两个不同的概念。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储蓄率而不是储蓄水平（绝对量）。即使储蓄水平很高而储蓄率很低，经济也无法增长，而在储蓄水平并不很高（与别国相比）但储蓄率很高的情况下，经济有可能增长。

(2) 认为穷国缺乏储蓄能力的观点不符合事实。实际上，一些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储蓄能力并不低，它们具有很大的潜在储蓄能力，并且很多国家还具有非常时期迅速集中大量资金的潜能。

(3) 认为储蓄水平提高、投资增加就能促进经济增长、打破贫困恶性循环的观点过于简单、乐观。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阶层缺乏储蓄能力，而高收入阶层虽有储蓄能力，却会因投资环境不良、社会结构缺乏弹性或政策措施不当而不愿多储蓄，或者将富余的收入投资到国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初期，既因收入低而缺少投资资金，又因消费行为受发达国家消费的“示范效应”的影响，产生不顾自己收入水平限制而盲目仿效别人的“高消费”行为，造成“消费早熟”或“消费超前”。这样，过多的消费就会严重影响储蓄，造成储蓄水平更低。另一方面，即使有了足够的储蓄和资本形成，经济增长也会受到其他配合条件的限制。比如，发展中国家缺乏熟练劳动力和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在这种条件下，投资的资本得不到有效的劳动力、管理、技术等要素的配合，也就无法正常发生效应。为此刘易斯指出，一国储蓄率低不是因为穷，而是因为企业家阶级不壮大。

(4) 忽视了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的作用。纳克斯视个人储蓄为储蓄的惟一来源，这就忽视了企业储蓄（利润再投资等）和政府储蓄（税收、借债等）的存在及其作用，而在事实上，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是构成储蓄的主要成分。

(5) 所谓市场容量狭小的观点有很大片面性。哈根指出,发展中国家可以采用现代生产方法来生产低收入人民常用的商品,并且,这些商品作稍稍改进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大的销售量,因此,市场容量并不存在问题,不会阻碍投资引诱<sup>①</sup>;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中,市场容量也无须大到足以把全部工业品都吸收尽的地步,只要市场需求能大到吸收一定量的工业品,使扩大投资、改进技术有利可图,则投资引诱就可扩大,经济就能增长。

## 二、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

纳克斯指出“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后,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Nelson, R. R.)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sup>②</sup>,利用数学模型分别考察了不发达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的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并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的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须进行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才能冲出“陷阱”,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强调资本稀缺对经济增长的障碍,说明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其结论与“贫困恶性循环”理论是一致的。

### (一) 人均资本、人口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

#### 1. 人均资本的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

纳尔逊认为,资本形成由两部分组成:储蓄和新耕地的开垦,因此,资本的增长( $dK$ )为储蓄创造的资本增加( $dK'$ )与土地增加( $dR$ )之和,即:

$$dK = dK' + dR$$

其中  $K$  是资本,  $K'$  是由储蓄产生的资本,  $R$  是土地。假设土地因素忽略不计,资本都是由储蓄创造的,全部储蓄都用于投资,那么,人均资本增量( $dK'/P$ )是与人均收入( $O/P$ )相关的,可以用公式(1)表示:

$$\frac{dK'}{P} = \begin{cases} b[(\frac{O}{P} - X)], \frac{O}{P} > (\frac{O}{P})' \\ -C, \frac{O}{P} \leq (\frac{O}{P})' \end{cases} \quad (1)$$

式中,  $P$  表示总人口,  $O$  表示总产量或总收入,  $-C$ ,  $X$ ,  $b$ ,  $(O/P)'$  都是常数。其意义可借助图 4.1 来说明。

在图 4.1 中,横轴代表人均收入,纵轴代表人均资本增量,  $dK'/P$  为人均资本增长

① 哈根. 论社会变革理论: 经济增长如何开始? 英文版, 1962. 42~43

② “低水平均衡陷阱”的思想是莱宾斯坦(Leibenstein, H.)于1954年提出的,但莱宾斯坦当时的模式存在数学上的矛盾。1956年,纳尔逊在《美国经济评论》12月号上发表文章,系统地论证和表述了这一理论。1960年纳尔逊又用这个模式考察了日本等国的情况。纳尔逊提出这一理论后,1957年莱宾斯坦出版了《经济落后和经济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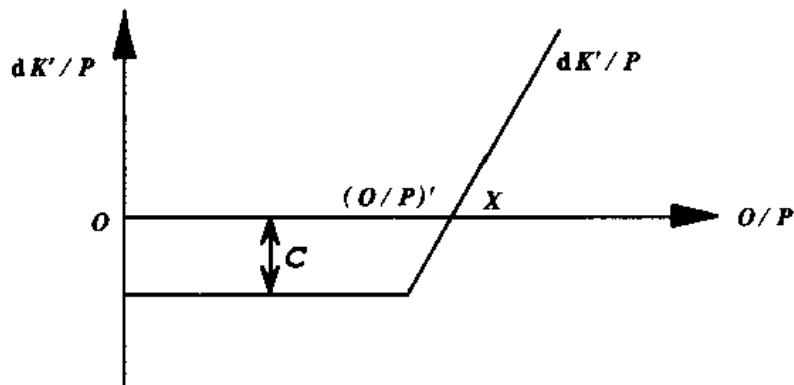


图 4.1 人均资本的变化

曲线。当人均收入小于或等于  $(O/P)'$  水平时，为负投资（负储蓄），假定为常数  $C$ ，表明人均资本增长与人均收入无关。人均收入大于  $(O/P)'$  水平时，人均资本增长率曲线随人均收入上升而增加的（这里假设该曲线为直线，其斜率为  $b$ ），表明人均资本增长是人均收入的增函数，即随人均收入增加而增加。 $X$  表示人均资本增长为零时的人均收入。

人均资本增长与人均收入之间的这种关系的经济意义可解释如下。当人均收入小于或等于  $(O/P)'$  水平时，人们的消费将超过他们的收入，从而，整个经济存在负储蓄和负投资（图 4.1 中负储蓄为  $C$ ）。当人均收入达到某个水平  $X$  时，人们的收入刚好等于其消费，或者说，人均收入刚好维持人口生存，没有储蓄，也没有负储蓄，因而人均资本增长为零。若人均收入超过这一水平  $X$  时，人们的收入将大于消费，储蓄产生了，并且随人均收入增加而增加。这时，人均资本大于零且随人均收入增长而增长。由此可见，资本形成是受人均收入水平制约的。

## 2. 人口的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

当人均收入开始增长时，由于收入增加使营养、医疗卫生条件等得到改善，人口死亡率下降，从而人口增长加快。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限度后，人口增长率达到最大值。人口增长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公式 (2) 表示：

$$\frac{dP}{P} = \begin{cases} [(O/P) - S], & (O/P) < (O/P)'' \\ dP^*/P, & (O/P) \geq (O/P)'' \end{cases} \quad (2)$$

式中， $dP/P$  代表人口增长率。 $S$  是维持最低生计的人均收入水平，当人均收入水平低于  $S$  时，死亡率将超过出生率，人口增长率为负。这个公式可用图 4.2 来说明。

图 4.2 中，横轴代表人均收入，纵轴代表人口增长率。当人均收入等于  $S$  时，人口增长率为零，即人口出生率刚好等于人口死亡率。当人均收入小于  $S$  时，人口增长率为负数，表明一个社会收入是如此之低，以至于不能维持现有人口的生存，使得人口死亡率超过人口出生率。当人均收入大于  $S$  时，人口增长率为正数，并随人均收入增长而上升。但是，当人均收入增加到  $(O/P)''$  时，人口增长率达到最大，这意味着人口死亡率下降到最低程度。在这种情况下，人均收入的增加不会引起人口增长率的进一步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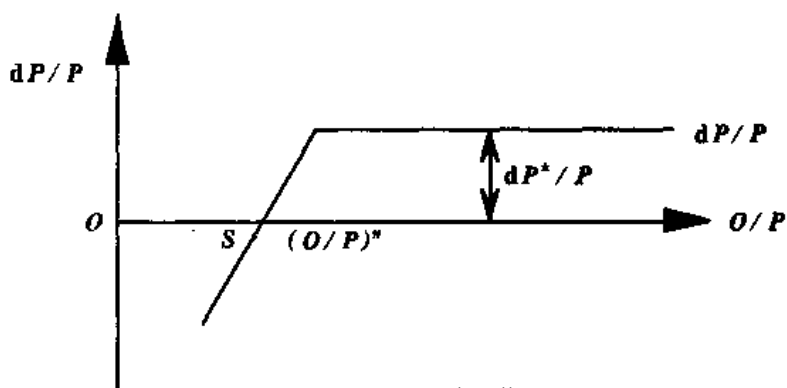


图 4.2 人口的变化

升。

### 3. 国民收入的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

纳尔逊假定国民收入是要素投入的线性齐次函数，并假设技术和社会结构不变。 $O = Tf(K, L)$ ，其中  $K$  是资本， $L$  是劳动力， $T$  是总生产率指数，于是，国民收入增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可用图 4.3 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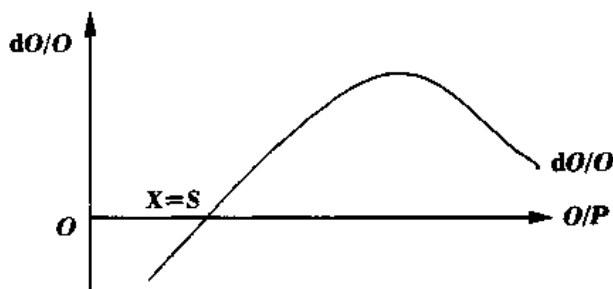


图 4.3 国民收入增长的变化

在图 4.3 中， $dO/O$  为国民收入增长曲线。在  $X = S$  的点上，人口处于静止状态（如图 4.2 中的  $S$  点所示），由储蓄创造的人均资本增长为零（如图 4.1 中的  $X$  点所示），由于劳动和资本都没有增加，所以，国民收入增长为零。在人均收入超过  $X = S$  这一点之后，由于人口和资本都在增加，根据生产函数，国民收入相应地增加。但是，当人均收入增加到某一个水平时，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最大。如果人均收入继续增加，以致超过这一水平，国民收入增长开始呈下降趋势。这是因为，按照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在技术、自然资源和土地不变的假定下，资本和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不断下降。

#### （二）低水平均衡陷阱

把图 4.2 和图 4.3 结合在一起，就可以描述低水平均衡陷阱状态。在图 4.4 中，横轴表示人均收入，纵轴表示国民收入增长率和人口增长率， $dO/O$  为国民收入增长曲线， $dP/P$  为人口增长曲线。人均收入位于维持生计点（ $S = X$ ）和  $Oa$  之间的任何水平，都将引起比国民收入更快的人口增长，从而使人均收入进一步降低，直到人口增长

率下降到等于国民收入增长率为止，如图 4.4 中的  $X=S$  点所示，在这一点上，人口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增长率都为零。纳尔逊把这种状态称为“低水平均衡陷阱”，其意义是，只要人均收入处在很低的水平上（如小于  $Oa$ ），国民收入的增长就会被更快的人口增长所抵消，使人均收入退回到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并且是固定不变的。从图 4.4 中还可看到，当人均收入大于  $Oa$  时，国民收入的增长将超过人口的增长，从而人均收入相应增加，直到两条曲线再次相交于  $Oa$  为止。在这一点上，人口增长和国民收入增长达到新的均衡，新的静态均衡又形成了。但这不是低水平的均衡，而是高水平的均衡。如果其他条件都不变，这种均衡也是稳定的。由上可见，低水平均衡陷阱是由低下的人均收入或过快的人口增长造成的。若要冲出这个陷阱，人均收入就必须大幅度地、迅猛地增加，以超过  $Oa$ ，或者使  $dO/O$ 、 $dP/P$  发生有利的转变。这一认识产生了“大推进”和“临界最小努力”的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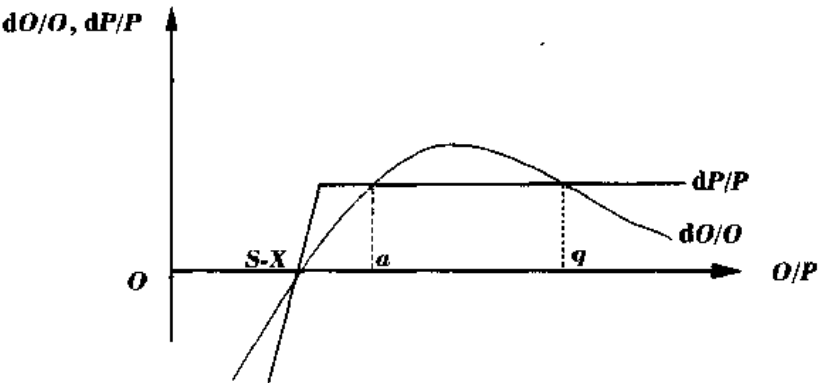


图 4.4 低水平均衡陷阱

“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的意义在于：第一，它说明了发展中国家经济贫穷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过低，导致储蓄能力过低、投资最小和资本形成不足；而人均收入低的原因又在于资本形成不足。由此可见，资本稀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和关键所在。第二，它提出了全面地、大规模地投资，以大幅度提高资本形成率、实现经济增长的要求。所以，这一理论成为“大推进”和“临界最小努力”理论的重要依据。第三，“低水平均衡陷阱”意识到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增长的障碍。但是，这一理论过分片面地夸大了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因此，同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一样，受到了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的批评。更重要的是，这一理论忽视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三、莱宾斯坦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

1957 年，美国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提出了经济发展的“临界最小努力”理论，以进一步扩展和概括低水平均衡陷阱模式。这一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是因为人均收入过低，资本形成不足，形成了一个“低水平均衡陷阱”和“贫困的恶性循

环”。要走出这种困境，就必须要有有一个临界最小努力。所谓临界最小努力，就是通过大规模投资，使投资水平或投资率大到足以达到国民收入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的水平，并且在这一阶段，人均收入进一步提高将不会导致“降低收入力量”的作用超过“提高收入力量”的作用，从而产生一个“临界最小努力”，以巨大的投资力量“大力推动”经济走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的泥潭，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

莱宾斯坦认为，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水平低，长期处在“低水平均衡陷阱”之中。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经济中的内在刺激力量过小，低下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它们无论怎样增加投资，资本形成都小于经济迅速发展所需要的临界最小数量，因而最终又会滑入低收入均衡的陷阱，无法打破这种稳定的均衡。那么为什么人均收入不能大幅度提高、低收入均衡陷阱难以冲破呢？莱宾斯坦认为，这是因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存在着提高收入的力量（income raising forces）和压低收入的力量（income depressing forces）两组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努力。提高收入的力量是由上期的收入水平及其投资水平决定的，压低收入的力量是由下一期投资的规模以及人口增长的速度决定的。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当压低收入的力量大于提高收入的力量时，人均收入的增长被人口的过快增长等负力所抵消，并退回到原来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中去；只有当提高收入的力量大于压低收入的力量时，人均收入才会大幅度提高，并打破低收入的稳定均衡，实现高收入的稳定均衡。可以用图 4.5 来说明这一理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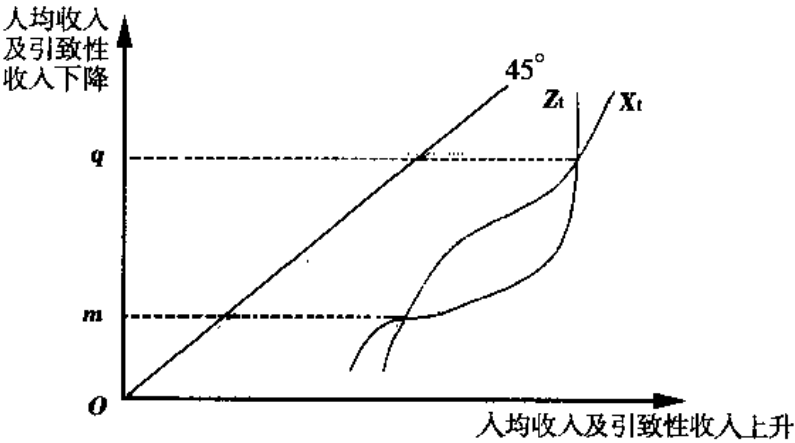


图 4.5 临界最小努力

图中横轴代表可提高收入增长的力量，纵轴代表可压低收入增长的力量， $Z_t$  为提高收入的力量增长曲线，它由与 45 度线的水平距离度量； $X_t$  为压低收入的力量增长曲线，它由与 45 度线的垂直距离度量；45 度线用来测定人均收入的引致性（induced）增长或下降。人均收入  $m$  点为惟一的静态均衡点，这时，提高收入的力量曲线  $Z_t$  与压低收入的力量曲线  $X_t$  相交，达到了两种力量的稳定均衡，但这是一种低收入水平的均衡。如果人均收入在  $m$  和  $q$  之间，这时压低收入的力量大于提高收入的力量（ $X_t > Z_t$ ），两组对立力量作用的结果，使人均收入滑回到  $m$  点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之中。这是一个难以摆脱的困难。怎样才能冲出“低水平均衡陷阱”呢？莱宾斯坦认为，这需要在

初始阶段大规模地投资，形成一个“临界最小努力”，使提高收入的力量大于压低收入的力量。如图所示，如果初期的投资能大到产生足够的提高收入的刺激力量，把人均收入猛烈提高到  $Oq$  水平之上，则这时的提高收入的力量大于压低收入的力量，其结果会使人均收入大幅度增长，从而挣脱“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经济发展。同时，由于提高收入的力量和压低收入的力量在高水平上达到了新的稳定均衡，进而经济可以实现长期、稳定的增长。

莱宾斯坦还指出，要实现“临界最小努力”，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激发群众的经济增长动机，改变传统观念以鼓励人们敢冒风险、善于追求利润，创造适宜的投资盈利环境，培育经济增长的气氛，培养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群体，大力开发和运用新技术，等等。他还认为，实现“临界最小努力”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必要：①发展中国家企业和投资规模狭小，并且生产要素、技术等存在着不可分性，由此决定了其生产效率低下。而保持一个最低限度的投资，可以克服这种不可分性，扩大企业的生产规模，获得内在经济效益；与此同时，大规模地在各个产业部门全面投资，可以克服单个产业独立存在时产生的外在不经济，使各个产业部门同时获得外在经济效益。这样，企业和各产业部门都可以按照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原则从事生产，使经济效益大大提高，生产迅速发展。②发展中国家人口压力很大，农村劳动力大量过剩，因而发展农业关系重大。只有在农业中投入足够的资本，提高农业生产率，大幅度增加粮食的供给，才能为众多的入口、尤其是向城市迁移的农村过剩人口提供充足的农产品，以支持经济发展。要增加农业产出，就必须大量投资于农业。③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在于人们受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束缚，这些非经济的因素阻碍着经济迅速增长。为此，实行大规模投资，迅猛地提高经济增长率，有助于克服这些因素的不利影响，有助于人们形成商品与市场观念，激发利润动机和谋利欲望，增加冒险意愿，增强献身于发展科学技术与文化教育事业的责任感等等，从而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环境。

“临界最小努力”理论探讨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原因，强调了资本形成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指出了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途径。这些观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认识自己的经济现状，寻找发展的突破口，制定适宜的政策措施，具有很大的启发。但也存在着一些缺陷。

(1) 它所描述的人均收入、人口、储蓄与投资的增长之间的函数关系过于悲观和严格。哈根依据西欧一些国家人口、人均收入增长的历史材料说明：在西欧，收入增长引致的人口增长并没有阻碍人均收入的增长；而在人均收入增长之前，人口就出现了迅速增长的趋势，表明人口增长要先于人均收入增长，而不是莱宾斯坦所说的那样是人均收入增长在前、人口增长在后、人口增长阻碍了人均收入增长。哈根认为，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迅速的主要原因不在于人均收入的提高，而在于技术进步、公共卫生和医疗等条件的改善以及健康水平的提高，使死亡率下降，出生率上升。而且，当今世界大多数发



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都要快于人口增长速度<sup>①</sup>。投资也不仅仅是由储蓄决定的，投资主要还受到收入分配、投资环境、经济与政治体制、投资效率等因素的影响。

(2) 它夸大了资本形成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忽视了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莱宾斯坦同纳克斯等人一样，认为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在于人均收入水平太低，导致储蓄与资本形成不足，因而得出了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的结论。但在实际上，除资本形成外，经济发展还有其他一些决定因素。在社会、政治、制度方面，一个国家的历史背景、社会制度、政治体制、思想文化、传统行为方式等等非经济因素，对经济发展也产生着事实上的影响；在经济方面，技术进步、教育、人力资本、管理水平等因素也会对经济发展的水平和速度产生决定性作用。

(3) 经济增长并不是一定需要有一个“临界最小努力”，较小量的资本投资也可以实现渐进的经济增长。瑟尔瓦尔借用的纳尔逊的“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中的图示说明了这个观点<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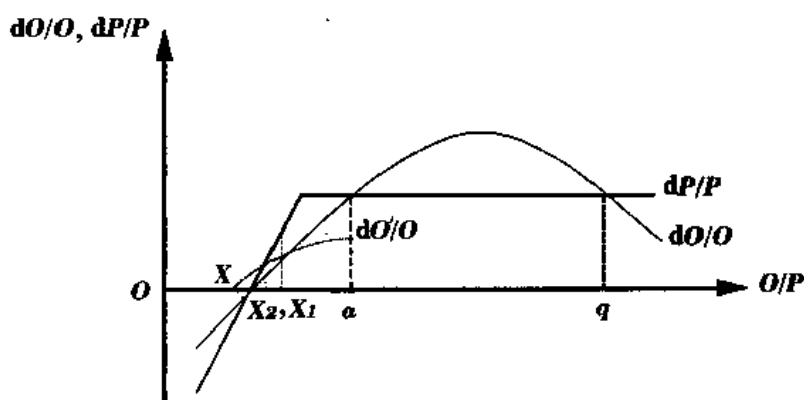


图 4.6 扩展的临界最小努力

假定经济发展初期有一个较小量的投资，使人均收入由维持生存水平的  $OX$  提高到  $OX_1$  水平。在这点上，纳尔逊、莱宾斯坦等人认为，由于人口增长快于国民收入增长，人均收入会退回到  $OX$  的低水平均衡中去。然而，如果在这个模型中加入时间因素，那么，当人均收入由  $OX$  提高到  $OX_1$  时，有理由认为资本存量的质量和劳动力的素质、工作技能等得到了提高，因此， $OX_1$  的人均收入水平虽有可能被人口增长抵消一部分，但不至于完全退回到  $OX$  水平，而很可能退到  $OX$  与  $OX_1$  之间，如  $OX_2$  的水平。在人均收入从  $OX$  到  $OX_2$  的区域间，国民收入也将持续提高，用  $dO'/O$  曲线表示。一旦  $OX_2$  成为国民收入增长和人口增长的新均衡点，随之而来的事件就将重复，由此，人均收入就完全可以通过一系列增长步骤进而达到  $Oa$  水平，从而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实现经济发展。由此可见，没有“临界最小努力”，只是通过上述“棘轮”（ratchet）机制，也可以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

① 哈根，人口和经济增长，美国经济评论，1959，7

② 瑟尔瓦尔，增长和发展：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特别考察，英文版，1983

#### 四、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

40年代初，罗森斯坦-罗丹受东欧工业托拉斯（Eastern European Industrial Trust）之托，为其制订一个能吸收1 0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工业化计划。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 P.N.）在《经济学杂志》6~9月号上，以《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为题，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在这篇文章中，罗森斯坦-罗丹阐述了自己关于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经济发展的观点，并提出“大推进”理论（the “big push” theory）的雏形。此后在《略论“大推进”理论》<sup>①</sup>一文中，系统地阐述了“大推进”理论。

罗森斯坦-罗丹认为，欠发达国家为了加速发展应在投资中采取“大推进”，不是小规模、渐进的，而是大规模地一次到位。他认为欠发达国家农村有个特殊现象，即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这是欠发达国家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可能有两种选择：一是劳动向资本运送，但这种方式可能性较小，代价较大；二是资本向劳动运送，以吸收劳动，即实现工业化，这比较可行，且代价较小，是正常的选择。所以，发展计划的关键是以充分投资去动员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以进行工业化。所谓“工业化”，是指在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中日益相对少地使用劳动而多使用资本，“是以快于富裕地区的发展速度提高经济停滞地区的收入，从而使世界各个地区的收入分配较为均等的惟一方法。”<sup>②</sup>罗森斯坦-罗丹指出，在工业化过程中应当注意三点：①为了取得工业企业最优规模，工业化的区域必须有充分的广度，不能过于狭小；②单个企业或行业风险比较大，相反，多企业、多行业同时出现可以相互补充，减少风险；③个别企业或行业对实际的社会效益计算不精确，因此需要大规模的计划安排。

罗森斯坦-罗丹进一步分析，增长理论一般就是投资理论，一个最小规模的投资是顺利发展的必要条件，要促成一国得到自我维持的增长（self-sustaining growth），有点像促使飞机起飞（take-off），即必须有一个临界（critical）的地面速度。同样地，分散的、小规模投资不能给国民经济带来充足的冲力，低下的投资规模或速度不能形成发展氛围，总之，需要一个“大推进”，即大规模的全面的投资，这就是大推进理论的要点。也只有大推进才能冲破经济贫穷落后和停滞的困境与束缚，“推进”整个工业部门全面、迅猛地发展，从而迅速实现工业化，达到经济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收入水平提高并且均等化的目标。

那么，实现工业化为什么要在各个工业部门全面地、大规模地进行投资呢？罗森斯坦-罗丹认为，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中存在着某种“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ies）和外在经济（external economy），由此决定了其投资不可能是平衡的，而必须是“大规模跃进”（sizable jumps）式的。这种不可分性表现为：第一，在生产函数中存在的不可分性，特别是社会分摊资本（social overhead capital），即资本的集聚性（lumpiness of capital）

① 艾利斯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圣马丁出版社，1966，第三章

② 罗森斯坦-罗丹，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经济学杂志，1943，6~9：202~211

的供给中的不可分性；第二，存在需求（即需求互补性）的不可分性；第三，存在储蓄供给的不可分性。

社会分摊资本供给中的不可分性是基本的，如果它不存在，其他的不可分性就不会出现。社会分摊资本的服务具有间接的生产性，其最重要的产品就是在其他产业中被创造出来的投资机会，它包括交通运输、通讯、水坝与电站、学校、医院等发展经济所必须的基本条件与设施方面的投资，它们构成整个经济的框架或基础结构和分摊成本。它的建设的一次性投资巨大，可变成本低下，并且各投资互相联系、互为依存条件，缺一不可，必须同时建成才能发挥作用。社会分摊资本概括起来具有四种不可分性特征：①它在时间上是不可分的（即不可逆的），它必须先于其他直接生产性投资；②它的设备具有较高的最低限度的耐久性；③它有较长的建设时期；④不可削减的社会分摊资本的组合。例如，要建成一个水力发电站，不仅需要修筑水库或修整河道以建筑水坝，而且需要建设发电站的建筑、购买发电机器设备、修筑运输原材料和机器设备的公路、安装通讯设施、建造工作人员及附近居民的生活服务设施等等，这样，这项工程一开始就需要有大规模的投资预算，而且这些投资缺一不可。比如投资建设水坝，没有发电设备或必要的通讯设施，即使电站建成了也不能投入使用。要修建一条由蒙特利尔到墨西哥城的通讯线路，光购买通讯器材还不行，还必须铺设电缆、修建中继站等。修筑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亦是如此。因此，基础设施必须有一个最小规模的大宗投资才能建成，并且要有相应的附属设施才能投入使用、形成生产能力。否则，如果投资量过小，成工程不配套，即使项目建成也无法产生效用，只会造成半途而废甚至浪费。

市场需求具有不可分性。这种不可分性产生于投资决策的独立性的高风险，即投资者无法确定他的投资项目是否能找到产品销售市场。罗森斯坦-罗丹用一个封闭型经济的模式来说明市场需求的不可分性。他认为，亚当·斯密著名的劳动分工和专业化可以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中，市场需求占有重要的地位。如果没有充分的市场，产品卖不出去，经济增长就会受阻，并反过来影响到分工和专业化的扩大。这一原理也可以用来说明投资：如果投资只集中于一个工业部门或行业，那么，即使这个部门建成了，它也是一个孤零零的独立部门，因为别的工业部门没有建立，它与其他部门没有相互联系，从而它的产品只有被本部门工人购买而没有其他消费者，造成市场狭小和需求不足，最终，这项投资将无法产生效益而告失败。罗森斯坦-罗丹举了一个制鞋厂的例子来说明市场需求的不可分性。他首先假定存在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现在把100个农村剩余劳动力聘用到鞋厂就业，则不仅这100个人的工资收入会增加，生产得到改善，而且制鞋厂的生产规模也会扩大。他写道：“如果这些新雇佣的工人把他们的全部增加的收入花在购买他们生产的鞋子上，这个制鞋厂将找到一个市场并获得成功。然而事实上，他们并不是把全部的增加收入都用在鞋子上。不存在这种方式的开辟增加市场的简单化做法。找不到市场的风险会降低投资刺激，因而这个制鞋厂的投资项目很可能被放弃。”<sup>①</sup>但他又分析道，如果不是仅投资于一个部门，而是全面投资于多个工业部门，建

① 罗森斯坦-罗丹，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经济学杂志，1943，6-9：202-211

立起一个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工业部门体系，那么市场需求问题就会解决。因为一旦工业部门体系建立起来，各部门间会产生相互依赖性，并对各方面的产品产生相互需求，这样，各工业部门之间的相互购买活动，就会形成一个充分的又有保证的国内市场，从而使各个部门都能找到市场，得到充分的发展。仍以制鞋厂为例：如果在投资建设制鞋厂的同时，大量投资建造起纺织厂、服装厂、食品厂、机械厂等工业体系，那么，制鞋厂的工人除将自己的一部分收入用来买鞋之外，还会把剩余的收入用来购买服装、食品等。与此同时，其他工厂的工人也会把剩余的一部分收入用来买鞋子。这样，制鞋厂就不仅在本厂工人中，而且在其他厂工人中找到了市场，获得了充足的有效需求，因而能够成功地发展。其他工厂的情况也是如此。最终，各个工业部门找到了充足而有保证的市场，使多样化的商品都有有效需求，从而使国民经济实现了迅速发展。

由此得出结论，“要求有一个最低限度的投资量，以便生产出大量的‘工资品’，使工人把其额外收入用在这些工资品的消费上。除非其他投资同时进行，否则许多单个投资项目就会因风险太大而无法进行。动员足够的投资以供给最小量的资本，这是欠发达国家必须克服的第一个障碍。先前提到的创造最小量的社会分摊资本是必须克服的第二个障碍。如果第一个对‘工资品’投资的最小量为2 000万美元，则对最小量的社会分摊资本投资就是6 000万~8 000万美元。这样总投资的最小量应达到8 000万~1亿美元，即要求有一个大推进。”<sup>①</sup>

储蓄也具有不可分性。高水平的最小投资量要求高水平的储蓄量，这样的储蓄水平在欠发达国家是难以达到的。储蓄是投资的来源即资本的供给。同投资一样，储蓄的增长也不是平稳进行的，而是跳跃性的、阶段性的。因为储蓄不是随国民收入的增长同比例不断增长的。储蓄是国民收入中扣除消费后的剩余部分，在国民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为了维持生存，大部分收入被用于消费。因此，在国民收入增长达到某一高水平之前，要相对地减少消费、增加储蓄是很困难的，从而使储蓄处在缓慢增长的低水平阶段。只有国民收入的增长达到并超过某一限度后，收入的大幅度增加使储蓄急剧上升并达到一定的高水平阶段，才能为大规模的投资积累足够的资本。所以，每一阶段的投资规模 and 经济发展水平必须大到足以保证国民收入的增长达到一定限度，使储蓄能够充分地迅猛增加，为下一期更大规模的资本形成准备足够的资本来源。否则，如果投资规模过小，国民收入增长幅度不够大，就会出现储蓄不足，使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大规模投资受到“储蓄缺口”的障碍。

除了“不可分性”外，罗森斯坦—罗丹还特别强调了“大推进”式的投资对厂商和社会获得“外在经济”的重要作用。在这里，外在经济主要是大规模投资对有关厂商盈利的影响。他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重要表现之一是企业规模狭小，缺乏规模经济效益，尤其是缺乏正常的“外在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厂商和社会的“获利能力”（profitability）很低，经济是很难迅速增长的。而如果实现全面的、大规模的投资，可以大幅度提高工业生产规模，从而产生外在经济。外在经济的产生不仅使一个企业本身获

<sup>①</sup> 艾利斯编. 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 圣马丁出版社, 1966. 第三章

得成本降低的好处，而且还会把“外在经济”的好处分享给其他企业或整个社会。因为，厂商之间、行业之间存在着互相联系与依存的关系，一个行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会促成一些厂商共同使用的交通运输、道路、货栈、通讯、信息、保安、原料供给、产品销售等设施和服务部门的建立，这些设施将给各个厂商乃至全社会各个部门的生产活动带来种种便利，从而降低其生产或销售成本。这样，不仅某一个企业增加了获利能力，而且提高了整个工业部门、行业甚至“社会的获利能力”(social profitability)。外在经济常常作为支持工业化的论据，国家和国际投资从一开始就集中于产生新的投资机会的“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让我们修建铁路、道路、运河、水电站，之后其他行业就会自动建立起来。”<sup>①</sup>例如，投资建造一个大规模的钢铁厂，需要同时投资修建道路、矿山、炼铁厂、轧钢厂，并需要建设通讯设施、服务设施，建立学校以培训熟练工人等等。一旦这个钢厂建成，则不仅钢厂会获得规模经济(内在的与外在的)效益，也会使其他工厂分享外在经济效益。如选煤厂、炼铁厂、机械厂会利用钢厂所建立的公路、通讯、学校等基础设施来发展自己的生产，并且还可能雇佣钢厂培训出来的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工人和技术人员。这样一来，整个钢铁业的生产、销售成本就会下降，从而提高其获利能力，并且整个社会也可能从中受益，使社会获利能力提高。据此，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假如曾经有一个整体的、同步的大推进，那么经济史的进程可能就大不一样了。”<sup>②</sup>

“大推进”理论强调了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中心和目标，说明了大规模的资本形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对于人们认识落后的农业国的经济现状，找出其摆脱贫穷落后的道路，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是，这种理论过分强调了工业化和资本形成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成为一种典型的“唯工业化论”或“唯资本论”，这一点受到许多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批评。

(1) 社会分摊资本并非都是不可分的。例如，电站可以不建成大型的而建成小型的，道路可以分段建筑，电报电话系统可以建成小范围的或小继式的，等等，使他们先发挥作用，一待积累到足够的资本时，再继续修建或造成大型的。这样，就不必实行“大推进”式的全面投资。

(2) 全面地大规模投资受到现有资源的限制。一些学者认为，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并不是富裕，而是不足。因此，由于经济增长的资源以及资本品的数量十分有限，大量投资的战略难以推行。即使实施大规模投资，也会因后续资源缺乏半途而废。

(3) 全面发展工业受到生产的配合要素稀缺的约束。经济增长不仅仅靠资本形成来推动，还需要有熟练劳动力、技术、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及其管理才能等因素的配合。一个大项目建成后，没有相应的工人、技术人员和企业家，它是不能发挥生产能力、生产出产品的，其结果只会成为一个象征经济发展的“纪念物”，造成巨大的浪费，反而

① 罗森斯坦-罗丹，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经济学杂志，1943. 6-9: 202-211

② 艾利斯编，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圣马丁出版社，1966. 第三章

使经济发展受阻。一些学者指出，发展中国家虽然劳动力剩余，但熟练劳动力、技术人员、高级管理人才却严重缺乏，因而全面投资所建成的项目或者难以产生效益，或者生产效率低下，实际产出达不到设计生产能力，形成浪费。

(4) “大推进”式的投资将大量资本集中于工业部门，忽视了农业等部门的发展。而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忽视农业、教育、卫生、外贸等部门的发展，会使农业生产率下降，农业生产萎缩，农产品缺乏，或者使劳动力素质下降，或者使经济更加封闭，从而反过来限制了工业的发展，堵塞了经济发展的道路。

(5)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证明了“大推进”理论并不切合实际，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历史证实，没有一个国家是从“大推进”式的全面投资开始发展的，而是在各部门发展不平衡、投资率不相等的情况下进行投资、生产的；截至目前，也没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靠“大推进”式的全面投资来实现的。因此，“大推进”理论的实际可行性是值得怀疑的。就连罗森斯坦-罗丹本人对此也不敢持乐观态度。1943年，他在制定东欧和东南欧国家1000万人的就业计划时，估算出每增加一人就业需要300英镑~350英镑投资，1000万人就需要有30亿~35亿英镑的投资，才能实施这个工业化方案。这意味着这些国家在10年计划期内必须每年拿出18%以上的国民收入来进行储蓄和投资<sup>①</sup>，这在当时是不可能达到的。

## 五、缪尔达尔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

1957年，缪尔达尔出版了《富国与穷国》一书，尔后，又于1968年出版了《亚洲的戏剧：一些国家的贫困问题研究》。在这两本书中，缪尔达尔考察了一些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贫穷、制度落后等问题，提出了“循环积累因果关系”（circular and cumulative causation）理论<sup>②</sup>，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缓慢增长的困境。这一理论可用来说明各个地区之间持久存在的各种发展指数的差异，包括人均收入、工业化和贸易增长率、就业增长率和失业水平。缪尔达尔认为在发展过程中经济和非经济的力量都会导致不平等的现象，经济发展过程中由非均衡趋向静态均衡的假说是错误的，因而应以动态的循环积累因果假说来取代静态均衡的假说，并据此解释跨国间、地区间持久而日益扩大的发展水平的差异。

缪尔达尔是一个制度经济学派的重要代表，他采用制度的、整体的、动态的方法来研究经济发展理论。他尤其反对新古典主义的静态均衡分析方法，认为经济发展的过程不是利益和谐的过程，而是利益冲突的过程；不是均衡，而是冲突和曲折的非均衡过程：首先产生“起始的变化”，然后产生“第二级强化运动”，最后出现“上升或下降”的结果，这个结果反过来又影响起始的变化。依据这种方法，缪尔达尔认为，社会经济

<sup>①</sup> 缪尔达尔，增长和发展：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特别考察，英文版，1983，189

<sup>②</sup>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论是缪尔达尔1944年在《美国的两难处境：黑人问题和现代民主》一书中提出的，中心是说明美国黑人贫困问题。1957年后，缪尔达尔在《富国与穷国》和《亚洲的戏剧》等中发展了这一理论，并用它来说明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

制度的演进是由于技术进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传统等多种经济和非经济因素共同造成的，而不像新古典主义所说的那样是单一的或少数几个经济因素决定的。因此，经济学的任务，就是探讨促成社会经济过程发展的各种因素及其运行方式。据此他指出：经济发展不应是单纯的产出增长，而应包括整个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发展，其中主要有产出与收入、生产条件、生活水平、对待工作与生活的态度、制度、政策六大因素。在论述产出与收入的关系及其增长问题时，缪尔达尔认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并呈现出一种“循环累积”的发展态势：一个因素发生变化，会引起另一个因素发生相应变化，产生“第二级变化”，强化原先的因素，导致经济发展过程沿原先因素的发展方向发展。因此，这种发展关系不是均衡的、守恒的，而是一种“累积性的循环”。假设在一个国家中，各地区初始发展水平相同，由于一个外部冲击，使某一地区发展进程比另一地区迅速，它造成了一种不平等的状态。经济和非经济力量的作用使有利地区的累积扩张以牺牲其他地区为代价，导致后者状况恶化并发展滞缓，由此导致不平等状况进一步强化。在欠发达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很低，导致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低下，营养不良，医疗卫生状况恶化，健康受损，教育水平低下，从而使人口的质量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困难；劳动力素质不高又导致劳动生产率难以提高。最终，低产出又导致低收入，低收入进一步强化了经济贫困，使发展中国家总是陷入低收入与贫穷的累积性循环困境之中。由此可见，收入水平过低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还存在制度等方面的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缪尔达尔认为“市场力量倾向于累积地加剧国际间的不平等，在一方为工业国而另一方为不发达国家的两类国家间自由贸易的十分正常的结果，就是后一类国家走向贫困和停滞的累积过程的开始。”<sup>①</sup>与主流经济学观点不同的是，缪尔达尔强调，和国际贸易均衡理论的推断相反，市场力量的作用不会导致生产要素的报酬和收入的平等。如果听其自然，经济发展过程就会是这样一种循环、累积的因果关系的过程：“对于每个拥有的人他将给予，从而他将富有；但对于一个没有的人，甚至他所拥有的也将被拿走。”（源于圣经）

那么，产生低收入的原因是什么呢？怎样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水平呢？缪尔达尔认为，产生低收入的原因有社会、经济、政治和制度等许多方面，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资本稀缺，资本形成不足，以及收入分配制度上的不平等。为此，他主张通过权力关系、土地关系、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实现收入平等，增加穷人的消费，以提高投资引诱，同时增加储蓄以促进资本形成，使生产率和产出水平大幅度提高，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缪尔达尔指出，人均收入的提高有助于克服“低收入的循环累积因果运动”，因为，收入增加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营养、卫生条件、健康、教育等状况得到改善，从而使人口和劳动力的素质提高，进而引起劳动生产率、人的劳动积极性的提高，最终导致产出水平和人均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均收入的提高又会对下一期

<sup>①</sup> 缪尔达尔，富国与穷国，英文版，1957，228

收入产生更大的累积性效应。这是一个正的“循环累积因果运动”。

“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论用制度的、动态的、演进的方法，从另一种角度，研究了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指出了收入水平低下、资本形成不足对经济发展的障碍；同时，它主张通过实行制度上的变革（如收入平等、土地改革等）和增加投资来改革收入与产出之间的不良循环。但应指出的一点是，缪尔达尔强调主要通过制度上的一系列改革来提高资本形成和收入增长，并且主张采用“地区不平衡发展”战略，即通过发达地区的优先发展，再利用其“扩散效应”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因此，这一理论成为发展经济学中“不平衡发展”理论的依据之一。

## 六、对“唯资本论”的批评

在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唯资本论”的同时，另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这种理论提出了批评。

(1) 他们对“唯资本论”的理论基础哈罗德—多马模式在发展中国家的适用性产生了怀疑，并提出了批评：①这一模式过分强调了储蓄或资本形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把资本说成是惟一的决定性因素，过分夸大了资本形成的作用，这不仅忽视了其他投入要素尤其是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而且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了不良影响，造成了片面追求高储蓄、高投资，忽视技术进步、教育、农业的发展和现有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以及生产效率的提高等问题。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发展中国家没有良好的投资环境，那么国内和国外的投资者可能将投资流向国外，因而储蓄的增加不一定导致资本形成的扩大。③投资的增加不一定导致生产能力的提高。如果投资集中在高资本—产出比的部门（如铁路），而资本折旧大量发生在低资本—产出比的部门（如纺织业），则资本存量很难迅速增加，从而生产能力难以提高。④即使生产能力提高，也不一定增加产出。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效率低下，生产能力闲置严重；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缺乏熟练劳动力和管理人才，使扩大的资本存量得不到相应的要素配合，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单纯增加资本只会形成投资效率低下、生产能力浪费。

(2) 10%以上的投资率并不一定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起飞”的充分条件。历史统计资料表明，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储蓄率和净投资率早已超过10%，但仍没有实现“起飞”。有些国家投资率甚至比发达国家“起飞”阶段的投资率还高，但由于缺少其他条件，或因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率低下，尤其是缺乏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因而迟迟不能实现“起飞”。所以，资本形成的高低并不能惟一地决定经济是否发展。

(3) 60年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因素研究结果证明：在大多数国家，资本形成并不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惟一决定性因素，甚至不是主要因素。希克斯（Hicks, J.）认为，在发达国家，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主要是技术进步，而资本积累则是一个次要的因素，这一由丹尼森等人验证的结论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纳迪里的研究也证实：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中，资本投入增加所作的贡献要小于劳动投入增加所作的贡献，因而资本形成虽重要，但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金德尔伯格明确指出：



“资本形成固然必要，却不能说明经济发展。第一，发展过程不同于经济增长的观念模式，也不总是平稳的或连续的。为了说明这种情况，我们必须超出简单的增长模式……第二，所发生的增长率要高于仅仅根据资本形成所能说明的增长率。第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并非伴随有较高的资本形成率。此外，资本形成还受到贫困、贷款禁忌、投资偏好、哄抬地价、商品囤积、通货膨胀、挥霍浪费、资本输出、政府政策等多方因素的影响，因而不能单靠资本形成来促进经济增长。”由此他得出结论：“经济增长要求并部分地依靠资本投入”，但“资本形成并不是经济发展过程惟一组成部分”<sup>①</sup>。

(4)“唯资本论”忽视了农业、教育、卫生和营养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唯资本论”是工业化理论的同义语，片面地强调资本的作用和工业化，势必忽视农业的发展，使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粮食问题长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同时，也就看不到农业对经济发展所做的重要贡献；另一方面，早期发展经济学中的“资本”一般指物质资本，不包括人力资本，这样，片面强调资本形成，使发展中国家把注意力仅仅放在物的方面，而忽视对教育、卫生、营养、人口流动等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舒尔茨等因此提出了用人力资本理论来补充物质资本理论的不足，并且强调，丹尼森等要把经济增长中扣除要素投入增加后的“余值增长”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而他则认为，余值增长应当归因于人力资本的增进，即教育、卫生、营养等方面投资的增加。

总的来说，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发展经济学不再坚持“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惟一决定因素”的观点，而是认为：资本形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或约束条件之一，并且强调，人力资本的增进、技术水平的提高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 第三节 资本来源与投资效率

资本形成理论不仅说明了资本稀缺对经济发展的约束和大规模投资对于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恶性循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性，而且还涉及储蓄、投资标准、投资效率、技术引进、利用外资等许多方面的内容。这是因为，要提高资本形成率，必须寻找资本的来源；要使投资项目顺利地建成并形成生产能力，必须制订和使用适当的投资标准，以引进适宜的技术、实现生产要素与资本的合理配置和理想组合；要使投资项目发挥应有的效率，生产达到设计生产能力，必须善于经营，根据利润最大、成本最小的原则去扩大生产；最后，要得到充足的储蓄和资本形成，当国内资金和资源有限时，还应当积极地引进外资。

#### 一、储蓄的一般理论

在发展经济学中，资本的来源是储蓄，储蓄可以转化为投资，从而转化为机器设备、厂房、交通工具、基础设施等物质资本，产生资本形成。因此，探讨储蓄的发生，

<sup>①</sup> 赫立克，金德尔伯格，经济发展，英文第4版，1983，156

寻求资本来源的扩大，是资本形成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储蓄是一国在一定时期内（如一年）国民收入中扣除消费后的剩余，是放弃现期消费的结果。用公式来表述就是：

$$Y = \text{工资} + \text{利润} + \text{利息} + \text{地租}$$

从供给一方看：

$$Y_s = \text{消费} + \text{储蓄} = C + S$$

从需求一方看：

$$Y_d = \text{消费} + \text{投资} = C + I$$

当国民收入处于均衡状态时：

$$Y_s = Y_d$$

$$C + S = C + I$$

即：

$$I = S$$

$$S = Y - C$$

假定国民经济中有家庭、企业、政府三个部门，那么，一国的国内总储蓄来自家庭储蓄（ $S_h$ ）加企业储蓄（即利润， $S_b$ ）再加政府储蓄（主要是税收收入， $S_g$ ）三部分，即：

$$S = S_h + S_b + S_g$$

所以，国内储蓄来源于家庭、企业和政府。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最重要的并不是储蓄的绝对量，而是其相对量，即储蓄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或储蓄率（ $s$ ，或  $s = S/Y$ ）。

从一个国家来看，储蓄能力取决于储蓄倾向，而储蓄倾向又决定于多种因素，比如：国民收入水平、收入分配状况、传统习俗、价值观念、宗教信条、对未来经济形势的估测以及存款利息率，等等。对于私人储蓄来说，储蓄水平主要取决于个人或家庭收入水平的高低、社会收入分配的平等状况、存款利率的高低，以及观念和习俗的改变等。一般来说，个人收入水平高，用于消费后的收入剩余就多，从而储蓄就多。因此，要提高个人储蓄，就要先提高个人可支配收入；一个社会收入分配状况也会影响储蓄水平。一些学者（如库兹涅茨、刘易斯）认为，储蓄主要来自富人，因而在经济发展初期可以采用扩大收入差别的办法来增加富人的收入和储蓄。但另一些学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会扩大贫富差别，加剧贫困，并且使社会消费不足，产生投资引诱减弱的后果。因此他们主张采取收入均等化政策，先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和全社会的消费能力，增加投资引诱，待生产扩大、全社会的收入水平提高后，储蓄自然会增加。一些学者还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商品货币观念淡，思想保守，宗教意识浓厚，缺乏储蓄、投资和盈利动机，比如，信奉伊斯兰教的人认为存钱收取利息是一种剥削行为，不宜取，因而宁可把货币储藏起来，也不愿储蓄。在这种情况下，应当教育人们树立商品经济观念，改变传统习俗，鼓励他们多收入、多储蓄。最后，储蓄存款利率是调节储蓄量的杠杆。为了多争取储蓄来源，可以通过提高储蓄存款利率的办法，来鼓励人们少消费、多储蓄，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积累资本。

企业储蓄来自利润，利润可以转化为投资。但投资可以分为总投资和净投资等形式，总投资中包含着资本折旧和重置资本（如购买新机器来替换旧机器的投资），余下的便是净投资，净投资是资本形成的主要来源。而如果重置的资本设备比报废的资本设备更具生产力的话，折旧费、重置投资也就成为资本形成的重要来源之一。由此可见，扩大企业生产，提高企业获利能力，增加企业利润并将利润用来进行再投资，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刘易斯的理论中，这种企业利润的增加和利润的再投资对于经济发展甚至具有决定性的意义<sup>①</sup>。

政府储蓄主要来自税收。税收收入减去政府的经常性支出就是政府储蓄，政府储蓄可以转化为政府投资，从而产生资本形成。因此，提高税率、增加税收都可以扩大政府储蓄，形成政府投资。但除此之外，政府还可以通过赤字财政政策、发行债券、多印发钞票和通货膨胀等手段来增加政府的收入和储蓄，提高政府储蓄创造的资本形成率。这些手段曾一度被有些学者所推崇，并较成功地运用于一些发展中国家为经济发展筹措资本。但这些措施逐渐暴露出弊病，产生了不良后果，故而有些学者坚决反对实行这些手段，尤其反对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政策。

## 二、资本形成的特殊来源

除了上述资本的一般来源外，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还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与特点，发掘了资本形成的特殊来源，提出了增加储蓄的特殊方法和途径。

### （一）刘易斯的储蓄理论

刘易斯在论述其经济发展模式时认为，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种“二元经济结构”，经济发展的任务就是改变二元经济结构，将农村过剩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去，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是资本形成率低，储蓄不足。而储蓄不足不是纳克斯等人所说的那样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太穷，而是因为“他们的资本主义部门太小”。“如果他们有了较大的资本主义部门，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就会增大，储蓄和投资也就比较大了。”<sup>②</sup>因此，储蓄的主要来源是资本家的利润，要增加储蓄，就应当大力发展资本主义部门，提高资本家的利润，增大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

那么怎样才能增大资本家的利润呢？刘易斯指出：应当通过有利于储蓄者阶级的收入分配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的政策来实现。他认为，储蓄的增加并不是简单地让整个社会厉行节约。储蓄的增长来自收入占国民收入40%的那10%的人，即发展中国家的富人，他们的收入水平高，储蓄能力强，形成了一个“储蓄者阶级”（savers' class）。但储蓄的增长并非取决于储蓄阶级少消费或节俭，而在于他们的收入水平的提高。因此应当使收入分配有利于储蓄者阶级，通过提高他们的收入来增加储蓄、提高储蓄能力。刘易斯指出：“储蓄相对于国民收入的增加是因为储蓄者的收入相对于国民收入有了增加。

<sup>①</sup> 刘易斯. 发展计划. 英文版. 1966. 120~121

<sup>②</sup> 刘易斯. 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 见: 阿加瓦拉, 辛格编. 不发达经济学. 英文版. 1973. 419

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就是收入分配发生了有利于储蓄者阶级的变化。”<sup>①</sup>

刘易斯强调指出，储蓄的主要来源是资本家的利润，而资本家是主要的储蓄者。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各阶层的经济行为具有以下特点：地主将地租收入主要用于购买土地和进行奢侈性消费，很少用来储蓄；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不高，“不稳定的生活，以及对待土地与牲畜的非商业态度，使他们几无储蓄，所以他们的纯资本形成在国民收入中占很少一部分”；而工业部门的大部分工人由于工资收入很低，仅够养家糊口，基本没有储蓄，工人中少数中产阶级即使有储蓄，也只是作为延期的消费<sup>②</sup>。所以，只有资本家是主要的储蓄者和投资者。刘易斯特别强调和重视经济发展中（尤其是初期）资本家的作用，认为资本家是一个负有历史使命感的阶级，他们信奉的哲学有三条，即“节制消费、尽可能多地生产和愿意从事生产性投资”。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生产性投资基本上是资本家阶级的特征”。而在“以后的阶段里，节约和生产性投资会扩大到全社会各阶级”<sup>③</sup>。由此可见，资本家的利润增加、再投资和储蓄能力的增强是经济发展初期资本积累的核心和关键。

刘易斯还特别强调农村剩余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对于增加资本主义“剩余”和资本家利润的作用，认为它是资本家利润增长的源泉。他说：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国民收入几乎都是由农业部门的收入组成的。抽象掉人口的增长并假定劳动的边际产品为零，在整个经济扩张过程中，农业部门的收入一直不变，因为根据定义，不必减少农业部门的产出，劳动力就可以从农业部门转向正在扩大的资本主义部门。因此，这个过程就增加了资本主义的剩余和资本家雇主的收入，总之，增加了利润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sup>④</sup>刘易斯这个模式的含义是：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零，他们受工业部门工资收入高于农业收入的吸引，转移到工业部门去，但农业部门的产出和收入保持不变。这样，工业部门的产出和收入保持不变，工业部门工作的工资也不变。工业部门可以在实际工资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得到迅速扩大，从而资本家的利润可以大幅度增长。若把增加的利润用于再投资，工业生产就会进一步扩大。这个过程一直进行下去，直至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相等。至此，也就实现了工业化。为此刘易斯总结道：“这个模式实际上是说，只要在不变的实际工资上获得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只要任何一部分利润都投资于生产能力，利润相对于国民收入而言就会一直增长，资本形成也会相对于国民收入而增加。”<sup>⑤</sup>他还认为：这一解释同样适用于技术进步引起的变化，“因为按照这个模式，技术发明的收益都属于剩余并可用于进一步的资本积累。”<sup>⑥</sup>

① 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阿加瓦拉，辛格编，不发达经济学，英文版，1973，417

②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英文版，1955，227～228

③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英文版，1955，232～233

④ 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阿加瓦拉，辛格编，不发达经济学，英文版，1973，418

⑤ 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阿加瓦拉，辛格编，不发达经济学，英文版，1973，418，419

⑥ 刘易斯，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见：阿加瓦拉，辛格编，不发达经济学，英文版，1973，418，419

刘易斯还指出,不仅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可以创造资本主义剩余,增加资本形成,而且,未向城市转移的一部分剩余劳动力也能创造资本(农业资本)。比如,利用他们来修筑道路、修建灌溉水渠等等,可以在不占用其他资本(如农业机械、资金)和稀缺的土地、不减少消费品(农产品)生产的情况下,创造出农业资本。

刘易斯的模式说明了资本形成对于经济发展(即工业化)的决定作用,说明了利润投资、剩余劳动力创造的剩余(价值)是资本形成的源泉,但这个模式没有说明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后农业生产率的变化情况和初始的工业部门扩张所需要的资金来源(即扩大工业生产所需要的资本设备和支付增加的工人的工资的来源),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后来,费景汉和拉尼斯提出了他们的模式,发展了刘易斯模式,认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和农业收入的增加,是增加资本形式的主要来源,是工业化发展的动力。

除了上述储蓄是资本形成的来源外,刘易斯还主张采用扩大信贷、实行通货膨胀、政府发行债券等方法来积累资本。他认为,扩大信贷可以像利润再投资一样增加产量和就业,而通货膨胀则会对社会各阶级的收入再分配产生影响,使收入分配发生有利于增加资本家阶级的变化。他也承认通货膨胀方法有局限性,但他认为这不要紧,因为“通货膨胀的过程并不会无止境地继续下去;当自愿储蓄增加到与膨胀的投资水平相等时,通货膨胀就会结束。”<sup>①</sup>

## (二)库兹涅茨等人的储蓄理论

库兹涅茨等人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描述经济增长的特征时指出,在经济增长初始阶段,收入分配将出现不平等。因此,发展中国家可以利用不平等的收入分配来为经济增长筹措资金。因为收入分配不均等有利于高收入阶层,而高收入阶层是主要的储蓄者,提高他们的收入,可以增加其储蓄能力,提高储蓄率,促进资本形成,从而推动经济发展。

## (三)钱纳里等人的储蓄理论

1996年,钱纳里和斯特劳特(Strout, Alan)发表了《外援与经济发展》一文,提出了解决经济发展中资本缺乏问题的一种新途径,即当国内储蓄不足时,可以利用外资引进来增加国内储蓄,增加资本形成。这种理论被称为“两缺口”模式(参见本书第十章)。

# 第四节 资源配置和投资准则

## 一、投资准则

传统的微观经济理论认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当每一单位生产要素的利用都达到了边际产量等于其价格的那一点时,资源就达到了最优配置;当所有用途中的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都相等时,社会产出(福利)就达到了最大。这就是资源配置的所谓“边际

<sup>①</sup> 刘易斯. 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 见:阿加瓦拉,辛格编,不发达经济学,英文版,1973, 418, 419

定律”。在以下的意义上它意味着“效率”：即一个社会的商品和服务的总产出不可能通过资源在各种活动间的再分配而增加，因为，在现有的各种活动中，每一种生产要素都具有了同等的生产力。因此，在静态分析中，资源配置“效率”意味着国民产值的最大化，而当生产要素在它们的不同用途中的边际产量都相等时，就达到了这一点。

如果边际定律的运用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那么，发展中国家资源配置的“问题”是什么呢？它们为什么要寻找另外的准则来决定资源的配置呢？一个很好的理由是：传统微观理论的假设既不符合实际，也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愿望。我们可以指出运用边际定律的两个主要障碍。第一个障碍是：边际定律是一个静态准则，正如我们在前面已说过的，决不能认定发展中国家的目标是，或者应该是使现期的产出、消费或福利水平达到最大化。第二，传统静态理论忽视了许多可能影响资源最优配置的因素。当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基本结构不均衡和市场极不完善时，就不能假定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反映生产的社会成本和社会利益。只有市场价格和社会成本、社会利益不偏离，或市场价格被校正到反映社会价值，边际定律的运用才能导致资源的社会最优配置。

有种种因素可能导致商品和生产要素的市场价格同社会评价偏离。首先，如果某些项目存在外部经济和报酬递增效益，其社会价值就超过它们的私人价值。其次，如果产品市场并不存在普遍的完全竞争，价格就不反映这些产品的社会评价，必须设法把市场价格调整到社会最佳点。同样，如果要素市场不存在普遍的完全竞争，要素价格就不反映它们对于社会的机会成本，要素的利用即便达到边际产量等于其价格的状态，也不形成社会最优状态。闲置的资源，例如劳动，可能被估价过高；稀缺的资源，例如资本和外汇，可能被估价过低，因此，市场价格必须校正，直到能反映这些资源的社会价值。第三，静态分析忽视产品和要素价格的未来结构，而后者则是由现期的项目选择所形成的。现期最优资源配置可能并不导致未来的最优资源配置。克服这一困难的惟一方法是采取所谓资源配置规划方法，这种方法突出地考虑了一种活动对其他活动的影响，也适当地考虑了时间因素。最后，边际定律的运用只有在假定收入分配是“最优的”，而且不受规划决策的影响时，才能导致最优资源配置。如果一种新的资源配置格局改变了收入分配，产出可能增加，但由于收入利益分配的“不合适”变化，福利反而可能减少。如果避免进行效用的个人间比较，要具体说明这一点就需要明确表明社会目标。

由于上述原因，近年来，对于怎样根据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障碍以及它们的愿望确定最适当的资源配置准则，一直存在着争论。所提出的各种不同准则反映了人们对于发展中国家应该努力争取什么东西最大化的问题有不同观点，反映人们在现期和未来的产出和消费间有广泛的将资本看做主要的稀缺资源的观点。但是，由于认识到外汇同样也是稀缺资源，人们越来越注意到资源配置决策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在讨论社会成本—利得分析方法之前，我们先讨论一下历史上曾被提出的较重要的思想和准则。在此应再次强调指出，所讨论的投资准则只涉及投资的格局，即选择什么项目，而不涉及技术的选择。这不是说项目选择可以与技术选择无关，而是说，在概念上绝不能把这两种选择混淆起来。

## 二、最小资本—产出率准则

从亚当·斯密以来，长期的传统是强调资本在增长过程中的战略作用。早期的投资准则理论强调要求每单位产出使用最少的资本：即所谓最小资本—产出率准则（或者，有时也被称为“最高周转额”准则）。根据这个准则，资源配置过程的目标是 $I/\Delta O$ 的最小化和 $\Delta O/I$ 的最大化，其中， $I/\Delta O$ 是增量资本—产出率， $\Delta O/I$ 是资本生产率。这一准则会受到许多反对，它具有前面讨论过的静态准则的缺陷。除了在计量资本—产出率时会遇到困难之外，这一准则忽视了时间因素的重要性。资本—产出率等于一个会计期（通常是1年）的投资额除以这一投资所产生的产出流量。但是，既然项目的寿命是不同的，所以，很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向两个寿命期不同的项目投放数额相等的资金，其中一个具有较高资本—产出率的项目在它的寿命期内生产的总产出远远大于另一个资本—产出率较低但寿命较短的项目在寿命期内生产的总产出。用选择资本与寿命期产出量比率最小的项目的方法，有可能克服资本—产出率准则的这个缺陷；但是，这样做必须十分谨慎，因为，未来产出的现值是该产出的时间特征的函数。由于折现，会产生这样的问题：即使一个20年的项目生产的总产出大于一个10年的项目，如果20年项目的大部分产出产生于这一项目的寿命期的后期，它的总产出的现值也可能小于寿命期较短的项目的较低总产出的现值。况且，即使项目的寿命是大体上相同的，年资本—产出率存在差别也仍然可能无法为决策提供一个合理的基础。有些项目的生产要素合作效率较大，可能比其他项目的资本生产力更高（资本—产出率更低），但是，可能无法保证这些合作生产要素未来的供给是有弹性的。这样，现在具有最低资本—产出率的项目，可能由于需要与资本共同发挥作用的其他要素的供给刚性，而在未来变得具有非常高的资本—产出率。同样，如果技术变化很快，在短期具有最低资本—产出率的项目，在长期可能并没有最低的资本—产出率。在资本不可分割的情况下，使用这个准则还可能导致采取资本密集型技术，这意味着稀缺的资本必须集中于较窄的活动领域，而与经济平衡以及出口分散化的愿望相矛盾。资本密集型技术还可能导致更多的城乡失业，造成违背人们意愿的经济和社会后果。此外关于怎样计量产出流量，是以市场价格还是以调整到能衡量商品和生产要素的社会评价的价格来计量，还没有明确的一致意见。

## 三、社会边际产量准则

由于希望从社会的角度来计量成本和利得，人们创造了社会边际产量的概念，并用 $\Delta O$ 来表示社会的增加价值的变化。

假定商品的市场价格和社会价格不偏离，并且，劳动的社会成本为零，资源配置的社会边际产量准则得出的结论与最小资本—产出率准则的结论是相同的。图4.7可以说明这一点。图中的生产函数曲线1、2、3表示用劳动和资本的不同组合所生产的不断提高的“社会产量”水平。资本—产出率最小要求产出一资本率最大。对于一笔固定的资本额 $OA$ ，当社会处于其最高产量曲线之上时，产出一资本率最大。社会可以达到更高的产出水平，直到劳动的边际产量为零，即直到生产函数曲线（或等产量曲线）的斜率

为水平线为止。当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零时，劳动的社会（机会）成本也等于零。这样，当劳动的机会成本为零时，社会边际产量达到最大，资本—产出率达到最小。 $OZ$  表示这一最优资本—劳动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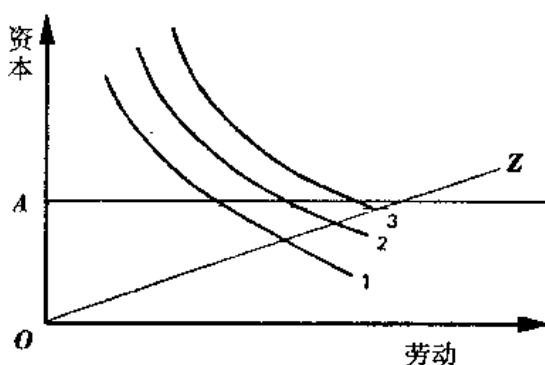


图 4.7 社会边际产量

但是，这完全是静态分析。它没有注意到现在的项目选择对储蓄、投资、增长，以及对未来消费水平的影响。有人主张，为未来打算的社会在进行项目选择时应采取更为动态的投资准则。卡伦逊（Galenson）和莱宾斯坦（Leibenstein）在 1955 年的一篇论文中论证了这一方法。<sup>①</sup>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主张，发展中国家应争取经济增长和未来福利的最大化，并依此来进行资源配置。在增长模型中，则是求一定时期的资本积累最大值，而对于资源配置，卡伦逊—莱宾斯坦准则则是“边际人均再投资额”的最大化。

#### 四、边际人均再投资额准则

卡伦逊和莱宾斯坦观点的基础是，资源配置应该达到“整个时期，或未来某一时间上的人均产出或平均收入”最大化。这就要求使现期的可投资剩余达到最大，向增加的每一单位劳动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本，因为，人均占有资本量是人均产出的主要决定因素。这意味着更高的资本密集性。因为，如果发展目标是使未来某一时点上的人均总产出最大，就应该把投资资源配置得能向未来的每个工人提供尽可能多的追加资本。卡伦逊和莱宾斯坦称这种配置原则为边际人均再投资额准则，其目标是使投资资源配置达到所有用途上的边际人均再投资额都相等。决定边际人均再投资额大小的有 7 个基本因素：①平均每一工人的总生产率；②平均每一工人所消费的工资品量；③资本更新和维修支出；④与资本积累无关的工人技能和效率的提高；⑤死亡率的下降；⑥人口出生率的下降；⑦再投资的方向。

卡伦逊—莱宾斯坦方法的立意是考虑到项目对资本积累率的影响，即考虑到项目选择对收人在储蓄者和消费者间的分配的影响。这一方法的经济基础是，相信人均产出水平主要取决于资本—劳动率，平均每一工人的资本占有量必然主要取决于产生于原来投资的利润（超过工资的剩余）的水平。

这一观点与刘易斯的主张非常一致，即发展中国家的储蓄和投资率取决于资本家剩余的大小。无疑，采用边际人均再投资额准则意味着选择资本相对密集的项目，这种项目使劳动的使用和支付的工资为最小，从而为未来的再投资留下尽可能最大的剩余。为了用更多的投资来提高未来的人均产出水平，将牺牲现期的就业和产出水平。

<sup>①</sup> Galenson W, Leibenstein H. Investment criteria, productiv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5. 8



边际人均<sup>①</sup>再投资额定义为：

$$r = \frac{p - \alpha\omega}{k}$$

其中， $p$ 是得自投资的（净）产出（增加价值）； $e$ 是与投资相联系的工人人数； $\omega$ 是实际工资； $k$ 是投资成本。 $r$ 也是增长率，因为，假设所有的工资都被消费掉，所有的利润都用于再投资，再投资公式等于增长公式  $s/C$ ，其中  $s$ 是储蓄率， $C$ 是增加资本一产出率，即：

$$r = \frac{p - \alpha\omega}{k} = \left(\frac{p}{k}\right) \left(1 - \frac{\alpha\omega}{p}\right) = s/C$$

其中， $s = (p - \alpha\omega) / p$ ， $C = k/p$ 。

只有牺牲现期消费产品和就业水平，增长率才能达到最大，因此，边际人均再投资额准则忽视现期消费和福利，为获得未来的更大产出和消费而集中生产生产资料。显然，它从静态边际准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卡伦逊和莱宾斯坦提出的准则受到人们的批评，原因是它导致过分的资本密集和牺牲了现期就业。但是，有许多问题是需要讨论的。第一，使用卡伦逊—莱宾斯坦准则所达到的剩余最大的那一点，是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工资的那一点，在这一意义上，这一准则与新古典的静态的私人厂商最优化准则没有什么不同。卡伦逊—莱宾斯坦准则之所以明显地比早期的投资准则会导致更高的资本密集性，是因为前者把市场工资当做劳动成本，而其他准则却暗含着影子工资等于零的假设。但是，如果市场工资很低，采用卡伦逊—莱宾斯坦准则也会导致在发展中国家选择相对劳动密集的项目。把卡伦逊—莱宾斯坦准则解释为以资本—劳动率最大为目标是不正确的，虽然卡伦逊和莱宾斯坦说过要使“平均每一工人占有的资本量”最大，为这种解释提供了可乘之机，但他们的本意是说要使平均每个未来工人的剩余为最大。第二，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准则并不像其他投资准则那样极端化。第三，可以证明：如果生产的资本密集性和工资率是正相关的，就业和储蓄之间的矛盾就完全可以消除。第四，若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储蓄倾向的差别不大，上述矛盾就会很小。采取适当的税收和补贴政策，这种矛盾也会变小。在关于技术选择的第九章，我们将进一步详细讨论后三点及其他一些问题。

卡伦逊和莱宾斯坦的分析有助于强调项目选择、收入分配和储蓄率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们的准确结论是建立在储蓄和投资仅仅是收入分配的函数而不涉及其他方面这样的假定之上的。假设储蓄也依赖于收入总水平（如果充裕生产要素劳动的利用还没有达到边际产量等于机会成本的程度，收入总水平就不会达到最高）。如果这样，简单地只为了达到总剩余最大化目标，就可能是不明智的，还必须考虑总产出水平。如果总储蓄不仅是收入分配的函数，而且也是总收入的函数，正确的选择应当是在资本密集项目（以实现最大剩余）与节约资本的项目（以实现总产出最大）之间找出折衷的道路。

而且，是否仅仅因为现期消费少于未来消费，它的边际效用更高，就不应该考虑社

<sup>①</sup> 注意：这里的人均不是指平均每单位现有劳动力的再投资，而是指平均每单位未来的劳动力的再投资。

会可能对现期消费评价更高这一事实呢？如果仍须考虑这一事实，就需要有一种投资准则，既反映项目对消费者福利的直接贡献，也反映通过现期投资产生储蓄，形成增加的资本存量从而有可能产生未来的福利，解决现期消费和未来消费的相对评价问题。因而进行项目选择，必须规定一个社会可接受的时间界限，在这一界限内，未来福利的所得必须抵偿现期福利的所失。如果这一时间界限超过未来福利所得抵偿现期福利所失的实际时间长度，人们就可能赞成资本密集项目而牺牲某些现期消费。但是，如果未来福利所得抵偿现期消费所失的时间超过可接受的时间界限，人们就应该赞成相对劳动密集的项目。不用说，这一方法依赖于时间界限的选择，因而是非常任意性的，但是，如果能达到某种民主的一致性，这种方法在解决现期消费和未来消费之间的不可避免的矛盾上，会比前面所讨论过的投资准则更有效。前面所讨论的投资准则，在其基本形式上忽视了现期福利和未来福利间的替换关系。

## 五、边际增长贡献准则

爱克斯坦 (Eckstein) 试图调和传统的静态社会边际产量准则和“动态的”卡伦逊—莱宾斯坦准则，提出了边际增长贡献准则的方法<sup>①</sup>。这种准则既反映一个项目对消费者福利的直接贡献，也反映由这一项目产生的储蓄进行再投资而形成了增加的资本存量，从而有可能作出的间接贡献。这一准则是以未来消费流量的现值最大化为基础的：

$$B^* = \sum_{t=0}^T \frac{(1-\alpha)^t}{(1+r)^t} B_t + \sum_{t=0}^{\infty} \frac{(1-\alpha_r)^t}{(1+r)^t} B_{rt} \quad (3)$$

其中， $\alpha$  是该项目净利得中为未来再投资而储蓄的净利得份额； $B_t$  是再投资储蓄可创造的净利得（为了求得它，必须知道资本的边际产量）； $\alpha_r$  是再投资储蓄提供资金的项目的产出中将用于进一步再投资的份额（不断投资以至无穷，所以是  $\sum_{t=0}^{\infty}$ ）。 $T$  是项目的寿命期。

方程 (3) 的第一部分是该项目对消费的直接贡献。第二部分是该项目的再投资储蓄所提高的资本积累率有可能创造的累积未来利得。这表示 (3) 作为投资资本比例，提出了社会边际产量的计算方法，这与卡伦逊和莱宾斯坦关于项目选择不应孤立地考虑项目对于储蓄和未来产出水平的影响的基本观点是相一致的。

## 六、社会福利函数

如果发展中国家对于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的项目、改善收入分配的项目及增加现期和未来消费的项目都感兴趣，这些利益怎样加总？产生这些利益的不同组合的不同项目怎样进行比较？解决这一困难的一个方法是构造一个所谓社会福利函数。在这一函数中，所有的目标先进行加权，然后变换成共同的计算单位。假设  $B_1$ 、 $B_2$ 、和  $B_3$  表示用

<sup>①</sup> Eckstein O. Investment Criteria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temporal Welfare Econom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7. 2

不同单位计算的不同目标的利得水平；假定计划者认为： $w_1$ 个单位的  $B_1$  与  $w_2$  个单位的  $B_2$  以及  $w_3$  个单位的  $B_3$  等价，则总利得是：

$$B = w_1 B_1 + w_2 B_2 + w_3 B_3 \quad (4)$$

可以选择这些利得中的一个作为共同的计算单位（或通约标准），总利得就可以用这一单位来表示。例如，假定以  $B_1$  的单位表示总利得。可以用  $w_1$  去除每一项， $B_2$  和  $B_3$  的新权数表示与一个单位的  $B_1$  等价的  $B_2$  和  $B_3$  的量，则方程（4）变为：

$$B = B_1 + \frac{w_2 B_2}{w_1} + \frac{w_3 B_3}{w_1}$$

对于几种不同的利得，我们有：

$$B = \sum_{i=1}^n K_i B_i$$

其中， $k_i$  表示社会愿意用一种利得替代另一种利得的比率的权数（ $k_1 = 1$ ； $k_2 = w_2/w_1$ ，……）。根据发展政策目标的变化，这些权数也随时可以改变。

我们来举例说明。假设每一单位的消费（ $B_1$ ）值增加 10 倍单位的就业（ $B_2$ ），5 倍的基尼系数减少 1%（ $B_3$ ）。如果我们把消费当做通约标准，则：

$$B = B_1 + \frac{1}{10} B_2 + \frac{1}{5} B_3$$

这样，一个产生 100 单位消费，增加 20 单位工作，减少 1% 基尼系数的项目将产生利得：

$$B = 100 + \frac{20}{10} + \frac{1}{5} = 102.2$$

假设加于各种不同利得上的权数是确定的，生产以不同单位计算的不同组合的利得的各种项目就可以进行比较了。

用社会福利函数进行项目评估，如果某种稀缺资源要配置得使社会利益最大，则以共同的计算单位计量且经过适当折现的各种利得的总和，还须用投入该项目的这种稀缺资源，例如资本或外汇的比率来表示。

在概念上，社会福利函数与社会产品概念是很相似的，它的优点在于，假设一个目标或利得相对于另一个目标或利得的价值是确定的，则每一个目标和每一种意愿都可以包括进去，不同的利得就都可以进行计量比较了。

## 第五章 人力资源与经济发展

早期西方经济发展理论十分强调物质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而忽视了人力资源的重要性。60年代中期以来，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转而注意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甚至有人把它看做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Schultz, T. W.）断言：“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生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决定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sup>①</sup>英国经济学家哈比森（Harbison, F. H.）也表述了同样的观点。他说：“人力资源……是国民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被动的生产要素；人是积累资本，开发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并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主动力量。显而易见，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人民的技能和知识，就不能发展任何别的东西。”<sup>②</sup>

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源问题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从数量上说，大量的人力资源处于不得其用（underutilization）的状况；从质量上说，大量的劳动者素质很差。本章将围绕着这两个问题进行阐述。但为了更好地认识人力资源问题，有必要首先论述一下人力资源的概念和内容，以及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 第一节 人力资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 一、人力资源的概念

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亦称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是指包含在人体内的一种生产能力。如果这种能力没有发挥出来，这就是潜在的劳动生产力；如果发挥出来了，它就变成了现实的劳动生产力。

不可否认，人的生产能力有一部分是天生就的（innate），如歌唱家有一个天生的

---

<sup>①</sup> 舒尔茨. 人的投资：人口质量经济学. 英文版. 1981.4

<sup>②</sup> 哈比森. 作为国民财富的人力资源. 英文版. 1973.3

好嗓子，因此，人与人的才干和生产能力是有差别的。但是，根据大数法则，这些能力和才能的分布在群体之间、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大致上是相等的，人与人之间能力上的差别相互抵消了，我们几乎不能说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比另一个国家或民族更聪明。古典经济学家和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家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来理解人力资源的。他们把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假定成同质的、无差别的、而且是无限丰富的。然后，把注意力放在物质资本的积累上，得出了物质资本决定经济发展的结论。

强调人力资源或人力资本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不同意上述认为劳动同质而突出物质资本的观点。舒尔茨说：“这种劳动概念在古典阶段就不正确，而现在，其错误就更加明显。用算人头的办法来计算那些能够并且想要干活的人数，并且把这样一种计算看做是衡量一种经济要素数量的尺度，这种做法并不比那种靠计算各式各样机器总数来确定这些机器作为一种资本存量或是生产服务流量的经济重要性更有意义。”<sup>①</sup>

既然人的先天生产能力平均起来大致相等，那么，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人口质量和劳动生产技能的差别就是后天造成的。后天的生产能力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这些渠道包括：①医疗保健和营养，它影响一个人的寿命、力量强度、耐久力和精力；②教育和训练，包括正规、非正规学校教育和在职训练，它提高一个人的生产技能。通过这些渠道获得生产能力必须支付一定的成本，包括直接的支出及因接受教育和训练而放弃的收入。因为这些成本与提高人的生产能力有关，所以被叫做人力投资。人力投资越多，人力资源存量就越大，就像物质投资越多，物质资本存量越大一样。

## 二、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从各个不同侧面考察了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1) 关于外资利用。在40年代~5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物质资本决定论的指导下，大量吸收外国资本，以求经济迅速发展。然而，二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实践并未产生预想的效果。与此相对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遭受严重破坏的西欧和日本，在利用外资方面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样地利用外资何以在不同的地方产生了如此不同的效果？据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看法，其原因是由于人力资源存在着巨大差异。西欧和日本在战争中物质资本损失严重，工厂设备、铁路枢纽、桥梁、港口遭到严重破坏，许多城市也毁灭于战火之中，然而，这些国家具有较高文化教育水平和生产技能的人民尽管遭受了严重的伤亡，但并没有被消灭。因此，这些国家的资本吸收能力很高，一旦有大量的物质资本可供利用，经济就很快被推向前进。

发展中国家由于教育十分落后，识字率很低，劳动者的生产技术水平和水平极为低下。因此，这些国家的人力资源质量差，资本吸收能力低。在这种人力资源的约束下，大量地引进外国资本，并不能较快地提高经济效率。

40年代~50年代利用外资的经验和教训使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日益认识到人力资源

<sup>①</sup> 舒尔茨：人力资本投资，见：郭熙保主编，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293

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现在，一般的意见是，要促进经济更快地增长，仅仅增加物质资本投资是不行的；必须在增加物质资本投资的同时扩大人力资源的投资，使两种投资平衡地增长。

(2) 关于余值增长率。20世纪在50年代~60年代，西方有些经济学家为了说明各国经济增长率的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系统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一致的结论是：国民收入增长率大于国民资源的增长率，这两者的差额被叫做余值增长率。例如，美国经济学家索罗门·法布里坎特（Fabricant, Solomon）在1959年估算出，美国在1889年~1957年间，国内私人经济总产出年平均增长率为3.5%，而全部投入增长率为1.7%，余值增长率为1.8个百分点。在1919年~1957年间，前者增长率为3.1%，后者为1%，余值增长率是2.1个百分点。美国另一位经济学家丹尼森对经济增长来源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在1967年对美、英、西北欧九国1950年~1962年的统计资料作了研究，发现每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增长率都大于其劳动和资本的增长率。

如果其他情况不变，产出应与投入同比例地增长，增加1%的投入应该只增加1%的产量。而且，如果考虑到报酬递减的因素，产出的增长应慢于投入的增长。那么，是什么因素导致经济增长快于投入增长呢？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主要因素有两个，一是规模报酬递增规律的作用，一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后一因素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因素。据舒尔茨估计，美国1929年~1959年的余值增长率大约是3/5，其中教育的收益可能占这个余值的3/10~1/2。丹尼森计算出，教育、医疗卫生、知识的增进等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在一起，占余值增长率的60%以上。

(3) 关于教育水平与收入水平的关系。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收益率进行了经验研究，结论是一个人所受的教育年限与他所获得的收入成正比关系。这就是说，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比只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在收入上要高得多，而中学毕业的劳动者的收入要比小学毕业的劳动者的收入高得多。而在同一年龄组内，文盲的收入水平是最低的。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收入水平基本上反映了劳动生产率水平，这样，从教育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中又一次看到人力资源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根据上述三方面的研究，现在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人力资源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研究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发展的现状和问题，并针对性地提出人力资源发展战略与政策，是非常必要的。

## 第二节 人口与经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着。人口的过快增长对人力资源数量的利用和质量的改进都产生了巨大的压力。

### 一、人口增长的现状与前景

公元初年到1750年，世界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还不到0.05%，1750年~1850年，人

口增长率为 0.5%，甚至在 1900 年 ~ 1950 年间，世界人口年增长率平均也只有 0.8%。而从 1950 年以来的几十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猛增到接近 2%。其结果，世界人口增长异常迅速。公元初年，世界人口约为 2.5 亿，到 1750 年增长到 7.28 亿，直到 20 世纪初的 1900 年，世界人口也只有 16 亿。1950 年上升为 25 亿，到 1980 年，人口迅速增长到 44 亿，而 1987 年又突破 50 亿大关，27 年时间人口增长一倍。到 1997 年，世界人口进一步增加到 58 亿，1999 年 10 月，世界人口就达到了 60 亿，12 年时间，世界人口又增加了 10 亿。

表 5.1 世界人口及其变化情况

	总人口 (百万)		人口增长率 (%)		劳动力增长率 (%)	
	1980	1997	1980 ~ 1990	1990 ~ 1997	1980 ~ 1990	1990 ~ 1997
低收入国家	1384	2048	2.4	2.1	2.3	2.3
中低收入国家	1794	2285	1.6	1.2	2.1	1.3
中高收入国家	423	571	1.9	1.5	2.5	1.9
中、低收入国家	3600	4903	2.0	1.6	2.2	1.8
其中：中国	981	1227	1.5	1.1	2.2	1.1
除中国外其他中、低收入国家	2619	3676	2.0		2.2	
高收入国家	825	926	0.7	0.7	1.2	0.9
全世界	4427	5829	1.7	1.5	2.0	1.6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1998/1999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表 3

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性增长的结果，在世界总人口中，85% 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增长率远远高于世界人口增长率。在 1960 年 ~ 1979 年，世界年平均人口增长率约为 1.9%，而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平均每年为 2.3%，与之相比，发达国家只有 0.9%。按地区划分，拉丁美洲人口增长最快，在这一时期，年人口增长率为 2.6%，其次是非洲和亚洲，分别为 2.3% 和 1.9%。80 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减缓。从表 5.1 中看到，1980 年 ~ 1990 年间，世界人口平均年增 1.7%；1990 年 ~ 1997 年又进一步下降到 1.5%。但是，低收入国家人口增长率仍然很高，1980 年 ~ 1990 年间，人口增长率平均高达 2.4%，1990 年 ~ 1997 年也仍然为 2.1%；而高收入国家保持 0.7% 的低速增长。中国为世界和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中国人口从 1980 年 ~ 1990 年的 1.5% 下降到 1990 年 ~ 1997 年的 1.1%。撇开中国，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就要高得多，每年的增长率保持在 2% 左右。

迅速的人口增长具有强大的惯性。即使发展中国家政府普遍采取严厉措施控制人口增长，人口增长的势头也会持续几十年之久。这是因为：①社会、经济和道德的力量长

期地支配着人们的生育观念，在短期这种观念是不可能发生根本性改变的。②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少年儿童占总人口的比重相当大。即使人们的生育观有所转变，未来的父母亲只生两个孩子，以维持人口简单再生产规模，人口增长也要持续到两代人之后才能减慢下来。

由此，世界人口的增长趋势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到2000年，世界人口将肯定超过60亿，到2025年增加到80亿，到2040年，继续增加到100亿。这些增加的人口90%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其中一半以上集中在亚洲。

## 二、人口转变

人口增长率等于人口出生率减去人口死亡率。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在1960年~1979年间平均年人口出生率为3.4%，人口死亡率为1.1%，因此，人口增长率为2.3%。

西方学者按照出生率与死亡率的变动关系，把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图5.1描述了这种人口变化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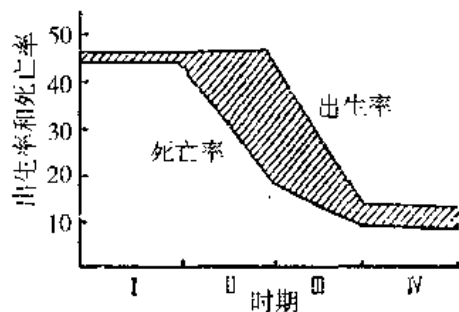


图 5.1 人口转变

第一阶段，出生率与死亡率都很高，因而人口增长非常缓慢。这个阶段基本上反映了19世纪以前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变动情况。这个时期的人口再生产没有受到人为的控制，出生率接近生物学上的最大量。但这一时期因饥荒、瘟疫和战争，死亡率也很高。

第二阶段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在这一时期，由于经济迅速发展和医疗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人民的健康和营养状况大大改善，这就使人口死亡率大幅度地下降，与此同时，人的预期寿命也延长了1/3。但是，这一时期的出生率并没有伴随着死亡率而下降，这是因为生育观念落后于时代的发展。结果，高出生率与下降的死亡率之间的差距在扩大，人口增长率急剧上升。

第三阶段大致上反映了20世纪初到50年代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情况。这一时期死亡率仍然在下降，但下降的速率放慢。由于城市化、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妇女的文化水平和社会经济活动参加率的提高，避孕技术的进步，出生率开始呈下降的趋势，并且下降幅度要大于死亡率下降幅度。因此，这一阶段的人口增长率逐渐降低。

第四阶段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率下降步伐明显趋缓，死亡率这时因趋于极限而难以下降。这样，低出生率伴随着低死亡率，人口变动逐渐趋于稳定，且增长率趋向于零。

西方经济学家把上述人口变动的四个阶段叫做人口转变（demographic transition）。当今发达国家已接近完成了这种转变，即开始进入了人口转变的最后阶段。但发展中国家目前还处在人口转变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说，还处在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的阶段，所



以，人口增长异常迅速。不过，近 20 年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发展中国家正向第三个阶段中期迈进，而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正在朝第三个阶段后期迈进。

### 三、生育的微观经济分析

从上述的人口转变理论中可知，在现阶段，发达国家的人口死亡率很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死亡率也并不很高，这两类国家的平均人口死亡率都在 1.0% 左右。因此，两种类型的国家在人口增长率上的差别基本上是出生率不同的结果。这就促使人们重视对出生率差别的研究。西方经济学家运用微观经济学中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来说明家庭的生育决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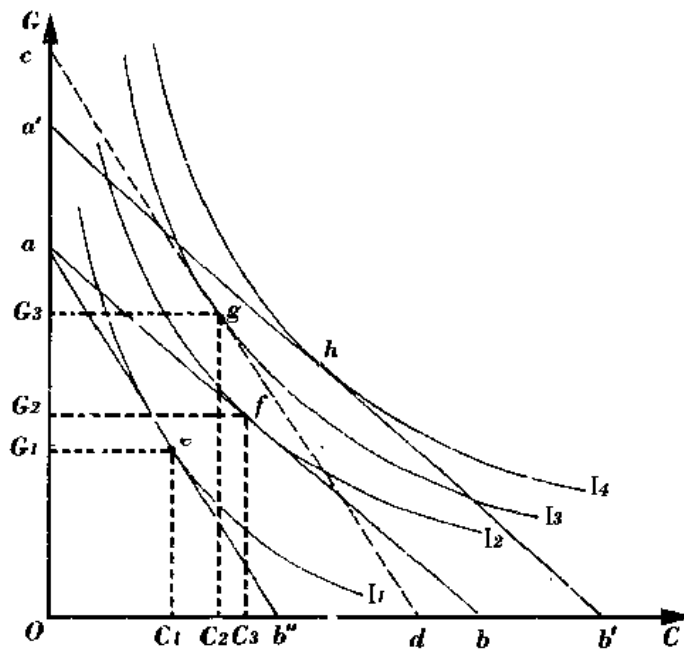


图 5.2 生育的微观经济分析

在图 5.2 中，横轴  $OC$  表示一个家庭需要子女的数量，纵轴  $OG$  表示该家庭对商品总量的需要。 $I_1$ 、 $I_2$ 、 $I_3$ 、 $I_4$  为四条无差异曲线，每条无差异曲线表示一个家庭选择任何一种商品和子女的组合所获得的满足感是相同的。离原点越远的无差异曲线，表示的满足越大。一个家庭对商品和子女的最大购买能力由预算线  $ab$  来表示。 $ab$  的斜率表示商品和子女的数量比例或价格比例<sup>①</sup>。当家庭收入增加而价格不变时，预算线向右上方移动，表示可拥有的子女数与能够购买的商品数增加了。当家庭收入不变而价格变动时，预算线将依具体变动情况而向外向内旋转。例如，在收入不变条件下，如果商品价格不变而子女价格上升了，那么，预算线  $ab$  就要向内旋转，表示一定的收入只能拥有

<sup>①</sup> 例如， $Oa/Ob = M/P_g \div M/P_c = P_c/P_g$ 。在这里， $M$  表示一定货币收入， $P_c$ 、 $P_g$  分别表示子女和商品的相对价格。

更少的子女。

所谓的子女“价格”是指父母养育子女所花费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之和减去子女为父母亲带来的预期收入之后的差额，即养育子女的净成本或净价格。为父母亲带来的预期收入包括子女在未成年之前为家里劳动带来的收入和父母亲年老后子女所支付的赡养费用。直接成本是指抚养子女所花费的一切开支，包括衣食、上学等支出。机会成本是指父母亲在抚养和照料子女时所放弃的挣钱机会。如果母亲不养子女而把这些照顾时间用来工作，她将会得到一笔额外的收入。

从图 5.2 中可以看到，这个家庭在预算线  $ab$  的约束下，选择  $C_3$  个子女和  $G_2$  个单位商品是最优的消费行为，这个商品—子女组合由预算线  $ab$  与无差异曲线  $I_2$  的切点  $f$  来表示。就生育决策来说，这个家庭拥有  $C_3$  个子女是最佳的生育行为。

家庭收入的上升能使家庭通过消费更多的商品和生育更多的子女而获得更大的满足。在图 5.2 中，预算线由  $ab$  移到  $a'b'$ ，与一条更高的无差异曲线  $I_4$  相切于  $h$  点，显然， $h$  点代表的商品与子女的组合要大于  $f$  点所代表的组合。但是，这里需要指出，收入的增加引起对子女需求的增加，必须具备一系列前提条件，即子女的价格不变（预算线斜率不变），父母的生育观不变（即无差异曲线的形状不变）。实际上，一般说来，收入的增加同时也会使子女“价格”上升，父母的生育观也会发生变化，以子女的质量来代替子女的数量。因此，收入的增加引起子女需求的增加是一个不大现实的假设。

子女“价格”即净成本的上升将会引起家庭用商品代替子女。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子女相对“价格”的上升必然导致对子女需求的下降。在图 5.2 中，由于子女“价格”上升，一定的收入只能拥有更少的子女，预算线  $ab$  围绕着  $a$  点旋转到  $ab'$ ，与一条较低的无差异曲线  $I_1$  相切于  $e$ ，决定了最优组合为  $OG_1$  数量的商品和  $OC_1$  数量的子女。显然， $OC_1 < OC_3$ 。

最后，假设妇女就业机会增加了。于是，家庭收入和子女“价格”就会同时上升。这时，预算线  $ab$  就会向下旋转而同时又向外移动到虚线  $cd$ 。它与无差异曲线  $I_3$  相切于  $g$  点，决定最优的子女需求量为  $OC_2$ ，最优的商品需求量为  $OG_3$ ，显然， $OG_3 > OG_2$ ， $OC_2 < OC_3$ ，这就是说，由于妇女就业机会增加使养育子女的成本增加，家庭对子女的需求将减少，同时对商品的需求将增加。这种情况是比较符合现实的。

以上对家庭生育决策作了微观经济分析。这种分析可以用来解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差别问题。

发达国家出生率是很低的，这是由于这些国家中养育孩子的成本很大。首先，发达国家高度竞争的环境迫使父母亲为了让子女找到一个好工作而不惜对他们进行智力投资。其次，在发达国家中，妇女教育水平和就业机会很高，这就增加了在家里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第三，发达国家的父母亲年老后一般不需要子女赡养，同时子女一般在上学年齡是没有为家庭挣钱的机会的，这就增加了养育子女的净成本。除了成本高之外，发达国家的生育观也随经济进步而发生了变化，反映在图形上是无差异曲线形状发生变化。发达国家医疗卫生技术发达，营养丰富，儿童死亡率很低，这就解除了为保证得到一定数目的子女而多生一些之忧虑。结果，家庭对孩子数量的偏好和需求就减少了。此

外，在发达国家中，“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传统观念已不存在，“及时行乐”的观念越来越强，父母亲不愿为哺养孩子而劳神费时，从而减少了对孩子的偏好。

与此相反，在发展中国家，出生率很高的原因是养育子女的成本低廉。由于教育落后，对子女智力投资很少，妇女受教育和参加工作的机会很少，子女从小就可以帮助家庭创造收入，父母年老后因无养老金不得不依靠成年子女赡养。此外，由于死亡率下降是近二三十年的事，人们的传统生育观点还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

上述分析同样适用于具有鲜明二元结构特征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乡村。在现代化的城市地区，生育率较低，是因为城市居民养育子女成本较大，对子女的偏好较小；在落后的乡村地区，生育率较高，是因为农民养育子女的成本较低，对子女的偏好较大。这一点说明了发展中国家人口问题的焦点何以在农村。

#### 四、人口迅速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于人口增长是否有碍于经济发展，不能一概而论。早在18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把人口增长看做是经济增长两个主要因素之一。他的观点是，人口增加使劳动力数量增加，而劳动力增加使劳动分工变得越来越细，从而导致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但是，在19世纪初，英国人口学家和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观点则与斯密的观点针锋相对。他认为，由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人口增长将会导致人均粮食生产量下降，粮食短缺将会变得越来越严重，经济增长不得不停滞下来。

其实，人口增长是有利子还是有害于经济增长，这要视具体情况和环境而定。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人口增长对经济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压力，因为那时世界各国人口密度并不大，未开垦的土地资源还比较丰富。因此，就在几十年以前，人口增长并没有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障碍，也没有哪个国家政府去推行人口控制政策，人为地限制人口的增长；相反，倒还有不少国家采取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

50年代以后，由于世界处在相对和平的环境中，没有发生过世界大战，再加上医疗卫生事业的巨大进步，死亡率大大下降了，出生率并没有相应下降，因此人口急剧增加，使得人均占有耕地面积和自然资源迅速减少。在这种形势下，人口增长对经济造成的压力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因而受到社会各界和各国领导人的高度关注。可见，人口的迅速增长对经济发展不是在任何时期都是不利的。只是到了现在，世界人口密度越来越大，地球不可再生资源变得越来越少，人类居住环境越来越恶劣时，人口增加才变成一个问题。当然，这里所说的入口问题主要是指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因为如前所述，当今世界人口激增，主要是由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引起的，而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却很低，有的发达国家的人口甚至出现零增长和负增长。当然，发达国家也有人口问题，但它们是人口老龄化问题。即使在发展中国家，人口的迅速增长也不是经济贫困落后的根本原因。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过去几十年中人口增长是相当快的，但它们的经济增长却非常迅速，如亚洲“四小龙”就是突出的实例。但是，不可否认，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过快对经济发展造成了重要的障碍。高速人口增长不仅对食品供给产生压力，而且还强化了对储蓄、外汇储备和人力资源的发展的约束力。人口

迅速增加需要更多的粮食和消费品，需要更大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这就减少了原本可以用于生产性投资的资本积累。由于人口增长太快，国内粮食生产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需要，只得从国外进口大量的粮食。这就需要耗费大量的外汇，而这些外汇本来是可以用来购买外国资本品，以提高国内经济生产能力的。

人口膨胀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人力资源问题变得更加难以消除。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问题表现在非熟练劳动力大量过剩，熟练劳动力极为短缺，从而给经济发展造成极大障碍。

在当今世界上，失业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更加突出、更加严重。毫无疑问，过快的人口增长是造成发展中国家严重失业和就业不足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农村生育率特别高，这就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增长迅速。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农村经济停滞不前，土地资源有限，这些迅速增加的劳动力变成了越来越多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剩余劳动力为了寻找新的就业机会纷纷流入城市。但城市工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占的比重很小，并且大都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因而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相当有限。于是流入城市的农村剩余劳动者最终大都变成了城市的公开失业者和就业不足者。

人口迅速增长不仅导致人力资源闲置，同时也降低了人力资源质量。这一点可以从发展中国家的赡养率（dependency ratio）来说明<sup>①</sup>。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发展中国家的年龄结构变得年轻化，15岁以下的儿童占总人口的一半左右，而在发达国家只占1/4。人口年轻化必然带来高赡养率。这无疑影响儿童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贫穷的家庭因子女多负担重而无力保证给儿童以充足的营养，致使他们的身体发育不好，体弱多病，严重地削弱了未来的劳动能力。更严重的是，由于负担过重，家庭无力供子女上学念书，接受更多的正规学校教育。从整个国家来说，由于财力有限，教育投资很少，很难为适龄儿童提供很多的教育机会。而且为了满足更多人的教育需求，有限的经费摊到每个学生头上就更少了，这就必然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教育数量的不足和教育质量的下降将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素质很差，从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障碍。

### 第三节 就业与经济发展

几十年来，折磨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个顽症就是人力资源的大规模闲置。由于这个顽症的严重性和重要性，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一般把就业问题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论题之一来研究。

---

<sup>①</sup> 赡养率指人口中受赡养者人数与赡养者人数的比例，具体地说它表示14岁以下，65岁以上的非劳动人口与15岁~64岁劳动人口的比例。

## 一、劳动力市场的特点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与当今工业化国家相比呈现出如下一些明显的特征。

### (一) 劳动力供给增长迅速

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数量增长迅速。5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为1.6%,60年代为1.8%,70年代为2.2%,80年代为2.2%,90年代开始下降,1990年~1997年,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年均增长率为1.8%。与此相对照,所有发达国家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60年代为1.2%,70年代为1.2%,80年代为1.2%,1990年~1997年为0.9%(见表5.1)。

如果比较一下发达国家工业化早期情况,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增长尤为突出。西欧、北美、日本19世纪劳动力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8%,是今天发展中国家的4/9。19世纪西方国家劳动力增长1倍约需90年时间,而今天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增长1倍只需35年时间。1970年,不发达国家全部劳动力为10亿,到1997年,增加到23亿,到2000年将增加到25亿,30年时间增加了1.5倍。

显而易见,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快速增长是由它们人口的高出生率和低死亡率造成的。低死亡率使得人均寿命延长,这就扩大了现有劳动力规模。而高出生率扩大了未来的劳动力队伍。50年代的高出生率必然导致70年代的劳动力高增长率,而70年代的高出生率必然引起90年代劳动力的迅猛增长。由于发展中国家人口出生率在近期很难降得很多,因此,劳动力增长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大规模增加已经远远超过了经济所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从而引起了人力资源的大量闲置。表5.2提供了1960年~1990年间发展中国家(不包括中国)的就业和失业状况。表5.2中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这个概念指一个劳动者实际工作的时间少于他能够并愿意工作的时间。因为这些人形式上在工作,所以把他们包括在就业之中;但实际上他们并未完全工作,因此他们又应该算做失业。这样,把他们从就业栏中减去,再加入到失业栏中,失业率就大大地上升了,如表5.2最后一行所示。

从表5.2中可以看到如下几点:第一,发展中国家的失业率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第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和失业都在增加,但失业增加快于就业的增加。例如,1960年~1973年,就业共增加了30%,年平均增长2.14%,而同期失业增加了48%,年平均增长为3.43%。第三,就业不足现象特别严重。在1973年,就业不足者大约为1.5亿。这样,把失业和就业不足加在一起,占总就业的比率高达29%。表5.2列出的1980年和1990年的数字是对未来估计的数字。现在看来,这些估计数字是过于乐观了。托达罗评论说:“由于债务问题和世界经济增长在80年代减缓,整个欠发达国家的失业都最少是1990年9000万估计数字的2倍。”<sup>①</sup>

<sup>①</sup> 托达罗. 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表 5.2 1960 年 ~ 1990 年发展中国家的就业与失业

	1960	1970	1973	1980	1990
就业 (百万)	507	617	658	773	991
失业 (百万)	36.4	48.8	54.1	65.6	88.7
失业率 (%)	6.7	7.4	7.6	7.8	8.2
失业加就业不足 (%)	25	27	29		

资料来源：萨布罗. 就业与失业 (1960~1990). 国际劳工评论, 1975 (6)

### (二) 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大

1990 年, 49 个低收入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比重为 69%, 57 个中等收入国家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比重为 27%,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是 58%; 与此同时, 26 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只有 5%<sup>①</sup>。由此可见,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 农业劳动力规模最大。当然, 随着经济发展, 农业劳动力逐渐向非农业部门转移, 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 使农业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相对规模和绝对规模趋于下降。因此, 农业劳动力的非农业转移和乡村人口的城市迁移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市场的一大特征。

### (三) 知识失业问题较为严重

发展中国家教育水平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离奇的关系。从表 5.3 中我们看到,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受教育越多, 失业率越高。例如, 印度 1989 年文盲的失业率是 2%, 受过小学教育的劳动者的失业率是 3%, 而具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劳动者失业率高达 9%, 更有甚者, 中学以上毕业生的失业率竟达到 12%! 这种情况与发达国家的情况刚好相反, 在那里, 文化程度越低, 失业率就越高。

怎样解释这种奇怪的现象呢? 一些学者通过观察发现, 那些文化程度最低的劳动者 (往往是农村来的迁移者) 因为经济条件很差, 承受不起长期不工作所带来的饥饿, 一来到城市就开始工作, 以便挣钱养家糊口, 不管报酬是如何低下, 工作性质是如何的恶劣, 他们都不得不接受。当然, 这些工作大多数是非正规部门工作, 而且常常是临时性的、就业不足的。这些就业不足的、报酬低下的劳动者按照定义并不包括在失业统计范围内。中学和大学毕业的劳动者期望找到一份体面的、报酬高的工作, 而对非正规部门的工作根本不考虑, 加上家庭经济状况较好, 他们通常经受得住在较长时间内寻找工作, 因此他们更容易被计入公开失业者的行列。例如, 在孟加拉国, 40% 有硕士学位的人被认为处于失业状态, 而在泰国,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期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在 20% ~ 35% 之间。在非洲, 这个问题现在也变得越来越严重。因此, “有人不无讽刺地说, 在穷国, 失业是一种奢侈。即是说, 失业通常已构成要花费时间和费用寻找工作

<sup>①</sup> 世界银行. 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220

的一部分，惟有那些条件相当优越的人才能享有这份‘殊荣’”<sup>①</sup>。至于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出现如此严重的知识失业问题，我们将在本章第四节中讨论。

表 5.3 一些发展中国家不同文化程度的失业率统计 (%)

国家	年份	文盲	小学	中学	中学以上
阿尔及利亚	1989	9.2	24.2	28.9	5.8
突尼斯	1989	11.2	20.4	17.4	5.2
加纳	1988	3.4	7.6	13.5	14.7
肯尼亚	1986	13.5	15.6	22.2	5.4
津巴布韦	1987	1.6	6.8	11.6	不详
马来西亚	1985	4.7	22.9	30.6	3.9
印度	1989	2.0	3.0	9.0	12.0
印度尼西亚	1985	0.6	1.5	7.5	5.3
斯里兰卡	1981	4.5	14.5	15.1	4.2
象牙海岸	1985	1.0	5.2	21.7	13.7

资料来源：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3年人类发展报告，38

#### (四) 自营职业所占比重较大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人们很难在正规部门（也称现代部门）中找到一个薪水和待遇较高的工作，因此，大部分劳动者不得不在农村和城市非正规部门（传统部门）自谋职业。从表 5.4 中看到，欠发达国家从事自营职业的百分比比发达国家要高得多。而且，发达国家自谋职业者包括很大一部分报酬很高的专业人士（如律师、医生、会计师等）和有限合伙人；但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自营职业者是街头小贩、个体商店、个体跑运输者、出租车司机、手工业者、小艺人、黄包车夫、家庭佣人、擦皮鞋者，等等。这些劳动者没有计算在失业范围内，但是，他们的工作和收入没有保障，生活朝不保夕，大多数人处于半失业状态。

## 二、失业的范围

发展中国家的失业情况与发达国家很不相同。①发达国家的失业一般局限于城市，农村基本上不存在失业问题，但发展中国家不仅城市失业问题严重，而且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②发达国家的失业一般是公开性的，而发展中国家的失业既有公开的，也有非公开的，而且非公开失业比公开失业更为严重；③发达国家的失业类型比较单一，而发展中国家的失业则呈现出多样性。

① 吉里斯，波金斯等，发展经济学，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18

表 5.4 一些国家自营职业占全部就业的比重 (%)

国 家	年 份	比 重	国 家	年 份	比 重
加纳	1984	68	印度	1981	31
巴基斯坦	1984	56	法国	1987	11
尼日利亚	1983	56	德国	1987	8
墨西哥	1981	48	美国	1987	8
菲律宾	1987	36	加拿大	1987	7

注：发达国家是指非农业部门劳动力自谋职业者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3年人类发展报告，表3-2

把公开失业和非公开失业加在一起统称为劳动不得其用。如果把公开的失业叫做狭义的失业，那么可以把劳动不得其用叫做广义的失业。研究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的学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广义失业进行了分类。在这方面，有两种分类值得注意。

一种分类是由克里希纳 (Krishna, R.) 作出的。他把公开失业定义为零工时零收入，而对非公开失业提出了四种计量标准，即时间标准、收入标准、意愿标准和生产率标准。时间标准，指劳动者在一年中劳动的天数或时数低于被定义为充分就业的天数或时数；收入标准，指劳动者在一年中获得的收入低于某种必要的最低额；意愿标准，指劳动者愿意工作的时间大于他目前工作的时间；生产率标准，指劳动者从目前就业中撤出来而不减少产出。总之，如果符合这四条标准中的任何一条，那么，这个劳动者就可以被归于非公开失业范畴<sup>①</sup>。

另一种分类是由爱德华兹 (Edwards, E. O.) 作出的。他对劳动不得其用即广义的失业作了具体的划分：

(1) 公开的失业 (open unemployment) ——这种失业包括自愿失业和非自愿失业。自愿失业是指能够胜任某项工作的人拒绝考虑这种工作而暂时处在闲置状态。非自愿失业者是指积极寻找工作但又无工可做的人。

(2) 就业不足 (underemployment) ——这类失业者是指那些实际工作的时间少于他们能够并愿意工作的时间的劳动者。例如，一个劳动者一天能够并愿意工作 8 小时，但由于工作机会的缺乏，实际上只工作 6 小时。

(3) 形式上在工作而实际上不得其用 (visibly active but underutilized) ——这类失业包括：①伪装的就业不足 (disguised underemployment)。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看起来全天在农场、工厂和政府部门工作，但实际上他们提供的服务只要很少的时间就能完成。②隐蔽失业 (hidden unemployment)。是指有些人因无工可做而选择非就业的活动。有些人受过一定教育后本来想参加工作，但因就业机会缺乏而被迫继续上学。有些妇女本来

<sup>①</sup> 托达罗，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241



愿意参加社会和经济活动，但因传统风俗习惯和道德因素，她们找不到工作机会而不得不围着灶台转。结果，教育和家务就成了“最后的雇主”（employers of last resort）。<sup>③</sup>过早地退休（prematurely retired）。这种现象在政府部门十分明显，并且有上升的趋势。在不少国家，尽管寿命在延长但退休年龄逐渐下降。这主要是为更多的年轻人创造就业和提升的机会。

(4) 健康受损（the impaired）——这是指在正常情况下本来可以做全日工作的劳动者，但因营养不良和卫生保健差而四肢乏力，以至于不能做全日工作。

(5) 无生产性（the unproductive）——指本来是有生产性的劳动者，但因补充性的物质资源不充分，生产率极低，生产出来的成果甚至还不能补偿他们的生活必需品<sup>④</sup>。

以上五种失业形式中最后四种可以全部归于非公开失业的范畴。与克里希纳相比，爱德华兹对非公开失业的分析更为具体，更为全面。

从以上两种对发展中国家失业标准的研究中，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失业范围要广泛得多，实际失业比统计表上反映的数字要严重得多。下面我们将分别论述非公开失业和公开失业。

### 三、伪装的失业

非公开失业中最重要的失业形式是伪装失业，通常也被叫做剩余劳动，它是指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或接近于零时的就业，即：如果从总就业中撤出一部分劳动者而不会使总产量减少，那么，被撤出来的劳动者就是伪装失业。

伪装失业或剩余劳动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和农村都存在。例如，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公有制部门中所存在的严重超员现象就是一种伪装失业的表现形式。一个企业本来只有100个工人可以完成的生产量却雇佣了300个工人，其中200个工人就属于伪装失业范畴。但从数量上看，伪装失业在农村最为严重。发展中国家大部分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然增长比城市要快得多；这些增加的农业人口中一部分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和迁移到城市地区，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由于城市部门较小，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有限，相当大一部分新增人口则必须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而在耕地面积难以扩展的情况下，这部分劳动力累积起来，变成了数量越来越大的剩余劳动。所以，农村既是剩余劳动的发源地，同时也是剩余劳动的吸收器。关于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详细讨论。

发展中国家的农村是否存在着伪装失业或剩余劳动，在发展经济学家中间曾引起了长期的争论。以刘易斯为代表的古典学派或结构学派坚持认为农村存在着无限丰富的剩余劳动，把他们转移到城市工业部门中去不会使农业总产量减少，因为这些剩余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实际上很小，几乎接近于零。但是与此相反，以舒尔茨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则否定农村有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伪装失业存在，认为传统社会的农民也是有理性的，他们对资源的配置是有效率的，在现有生产条件下，从农村撤出劳动力，农业总产量就

<sup>①</sup> 托达罗. 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9. 241 - 242

会减少。

后来有些学者通过区分就业人数与劳动时间而把两派观点调和起来了<sup>①</sup>。他们认为，两派观点之所以有分歧，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区分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和劳动时间的边际生产率。在工作日长度不变的条件下，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是正数，从而，撤出劳动将会减少农业总产出，这是与新古典学派的观点一致的。但另一方面，如果工作日长度是可变的，那么，因为撤出的劳动可以通过剩下的农民延长劳动时间来补偿，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就可能是零，从而，撤出劳动不会使总产量减少，这是与古典学派的观点一致的。这种关系可以用图 5.3 来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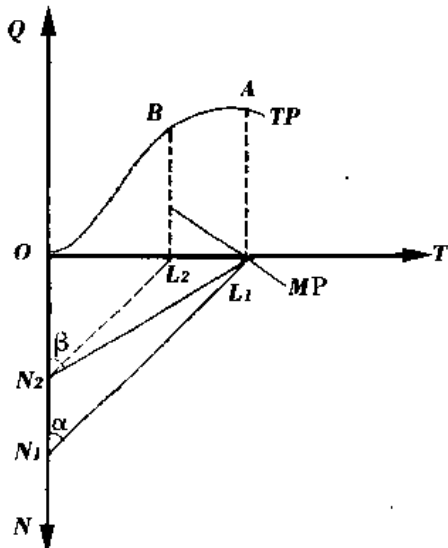


图 5.3 工作日长度与剩余劳动

在图 5.3 中，横轴  $OT$  表示工作日长度（以小时为单位），纵轴上半部  $OQ$  表示产量，下半部  $ON$  表示劳动人数。 $TP$  为总产品曲线， $MP$  为边际产品曲线。

假设某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农村的总劳动人口是  $ON_1$ ，一天工作的总劳动时间是  $OL_1$ 。于是，人均工时是  $OL_1/ON_1$ ，即  $\tan\alpha$ 。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一个小时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边际产品曲线  $MP$  与横轴相交），总产品达到最大（ $TP$  曲线上升到最高点  $A$ ）。

首先，我们假定从  $ON_1$  中撤出  $N_1N_2$  数量的劳动者，同时每个就业者的劳动时间（工作日长度）不变，即  $N_2L_2$  与  $N_1L_1$  的斜率相等。于是，总劳动时间从  $OL_1$  减少到  $OL_2$ ，总产品从  $AL_1$  减

到  $BL_2$ 。这就意味着，在工作日长度不变条件下，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是正数，因为撤出劳动后总产量减少了。

其次，假定从  $ON_1$  中撤出  $N_1N_2$  数量的劳动者，同时假定每个余下的劳动者的工作日长度增加  $h$  个小时（ $h = \tan\beta - \tan\alpha$ ），即  $N_1L_1$  线向上旋转到  $N_2L_1$ 。这样，撤出的劳动力所减少的劳动时间刚好被余下来的劳动者增加的劳动时间所补偿，总劳动时间仍然是  $OL_1$ ，从而总产量仍然是  $AL_1$ 。这就意味着，在工作日长度增加的情况下，撤出的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是零，因为总产量没有减少。

现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假设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农业总劳动人数是 1 亿，每人平均工作日长度是 6 小时，于是，该国一天的全部劳动时间为 6 亿小时。又假设 6 亿小时生产的是最大农业产量，若减少 1 个小时劳动将会减少产量；若增加 1 个小时劳动却不会

<sup>①</sup> 森 A. 就业、技术与发展。英文版，1975，第 3 章。在 1972 年的一篇题为《对无限劳动的思考》的文章中，亚瑟·刘易斯为他 50 年代提出的剩余劳动概念做了辩护。这些辩护实际上把这两种观点调和起来了。他说，他提出的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是指一个人（a man）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而不是指一个人时（a man hour）的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参阅本书第七章第一节。

增加产量。

假设从农业中抽出 1 000 万劳动者，如果余下的 9 000 万劳动者不增加工作日长度，那么，总劳动时间将减少到 5.4 亿小时，从而农业总产出将会减少。这就表明被撤出的 1 000 万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是正数，他们不是伪装失业者。这与新古典学派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如果余下的 9 000 万劳动者增加工作日长度，每天由 6 个小时增加到  $6\frac{2}{3}$  个小时，那么，总劳动时间仍然保持在 6 亿小时，从而总产出保持不变。这就意味着撤出的 1 000 万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是零，他们是伪装失业者。这与古典学派观点是一致的。

由此可见，伪装失业是否存在取决于工作日长度是否能够改变。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的争论可以归结为如何确定正常的工作日长度。这里需要指出，若要剩下的农民增加劳动时间，必须让这些农民获得更多的产品，这样一来，转移到非农业部门的剩余就会减少。此外，仅考虑劳动时间问题是片面的。实际上，当农民收入水平提高时，即使不延长劳动时间也能做到总产品量不减少，因为这些农民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强度和劳动责任心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现在，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农村的伪装失业是存在的，它反映在实际田间劳动时间低于农民所能够劳动的时间，即就业不足。这是因为，农村高出生率带来高劳动力增长率，而农村的土地和资本都有限，劳动吸收能力低，因此，只好 3 个人的活 5 个人干，3 个人的饭 5 个人吃。

不过，至今还有人伪装失业提出疑问。他们认为，伪装失业被夸大了，因为农业中被作为“伪装失业”的很大一部分是季节性失业。如果增加土地复种程度，一熟作物改种二熟或三熟作物，这种季节性失业就会大大减少。

#### 四、公开的失业

在发展中国家，如果说伪装失业并不限于农村，那么，公开的失业就只能在城市里发生，城市当然也有大量的非公开失业存在，但相比之下，城市的公开失业更为严重。

几十年来，为了急于摆脱贫穷，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即现代化信条的支配下，大力推进现代工业部门的发展。结果，现代化并未实现，而城市化过程却在迅速地发展着。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比重 1960 年为 22%，1993 年增加到 36%，2000 年将超过 40%；城市人口增长率，1960 年~1993 年是 3.8%，1993 年~2000 年下降到 3.5%，远远超过了总人口增长率。与此同时，工业化国家城市人口增长速度，1960 年~1993 年只有 1.4%，到 1993 年~2000 年进一步下降到 0.7%，其城市人口增长率与总人口增长率基本一致。可见，发展中国家城市化速度是相当快的。

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爆炸式增加带来的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就是较高的且持续上升的城市公开失业。表 5.2 所列的失业数字虽然是全国性的，但因非公开失业难以统计，这些数字基本上反映了城市的公开失业程度和变动趋势。在发展中国家一些特大城市，失业率比表 5.2 所列的数字高得多，远远超过了 10%，有的还高达 20%，比发达国家

大城市失业率一般要高出 1 倍。当然，发达国家在经济衰退时期城市失业率也很高，有时甚至达到两位数。但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一个明显的差别是，发达国家的城市高失业率是周期性的，到经济繁荣时期，失业率就会下降到较低。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高失业率是持续性的，即使在经济迅速增长时期也在不断上升。因此，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远比发达国家困难得多。

毫无疑问，与发达国家一样，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失业也是由城市地区劳动市场供求不平衡造成的，劳动供给超过了劳动需求，一部分劳动者就必然找不到工作而处于闲置状态。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的引致原因与发达国家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从供给方面看，发展中国家城市劳动力的增长不外乎来自于两个渠道，一是城市人口自然增长，一是乡村流入城市人口的增长。因为发展中国家城市人口出生率较低，人口自然增长率比较低，因此，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来自于农村的迁移者。

30 年代至 60 年代初，贫穷的国家还没有公开失业的官方统计，失业主要表现为土地上的就业不足或伪装失业。近几十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这些伪装失业者为了改善自身的贫困环境大规模地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地区寻找新的工作机会，这就大大地增加了城市就业的压力。

有两种因素促进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即推力因素和拉力因素。推力因素与乡村有限的工作机会和教育、运输、通讯的发展有关。如前所述，由于生育率高农村是剩余劳动的发源地，由于补充资源有限这些剩余劳动在农村很难找到新的工作机会。因此，这些劳动者流入城市的损失或机会成本是很小的甚至是零（即边际劳动生产率很低或是零），这就刺激了农村劳动者没有顾虑地到城里去寻找新的就业机会。此外，教育、通讯和运输的发展使农村青少年开阔了眼界，并且可较为便利地迁移到城市去，这无疑也是农村人口特别是年轻人口流入城市的一个刺激因素。可见，教育和通讯运输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经济发展，但却也助长了人口流动。

人口迁移背后的拉力因素是城市中较高的劳动报酬和优裕的生活条件。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工人的收入水平一般比农村农民的收入高出 2 倍 ~ 3 倍。这就强烈地引诱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尽管城市失业率很高，迁移者有可能在一定时期找不到工作。这是农村的伪装失业转到城市公开失业的主要原因。关于这一点，托达罗做了详细地分析。在本书第七章中，我们将对托达罗模式进行详细论述。

从需求方面说，城市的严重失业是由于城市工业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较低。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许多解释，其中有两派观点特别值得提及，一是古典学派的“要素比例固定说”，一是新古典学派的“要素价格扭曲说”。

古典学派认为，工业部门使用的是现代的资本密集型技术，这种技术的特点是刚性要素比例，不管要素价格如何变动，这种比例不会发生变化。因此，要增加劳动就业，不能靠调整要素价格，而只能依靠更大的资本投资。这种观点可以用图 5.4 来说明。

在图 5.4 中，横轴  $OL$  表示劳动，纵轴  $OK$  表示资本。 $q_1$ 、 $q_2$ 、 $q_3$  为三条等产量曲线，在这里，等产量曲线呈  $L$  形状，表示劳动与资本的比例是固定的。 $a$ 、 $b$ 、 $c$  三点

表示生产  $q_1$ 、 $q_2$ 、 $q_3$  三个不同产量所使用的三个数量不同而比例相同的劳动与资本的组合。把这三点连接起来，便成为一条生产扩张线  $OE$ ， $OE$  的斜率是不变的，表示生产的扩张只有在要素同比例增加时才有可能。图中的  $A_1B_1$  和  $A_2B_2$  为两条生产预算线，也叫等成本线，它们表示一定的货币支出所能买到的资本和劳动的组合。它们的斜率表示两种要素的价格比例<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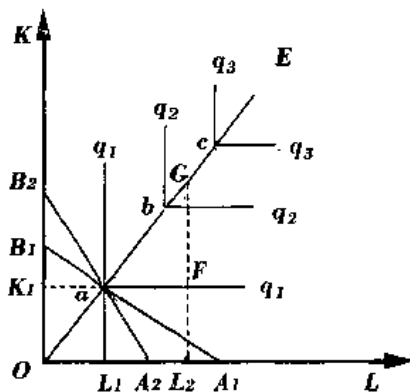


图 5.4 劳动与资本的固定比例

从图 5.4 中可知，生产  $q_1$  产量的要素组合是  $OK_1$  个单位资本和  $OL_1$  个单位劳动。不管要素价格如何变化，这个比例是不变的。例如，当劳动价格相对于资本价格，即  $w/r$  下降时，预算线  $A_2B_2$  就旋转到预算线  $A_1B_1$ ，但是，生产  $q_1$  产量的劳动仍然是  $OL_1$ ，资本仍然是  $OK_1$ 。这样，如果寻找工作的人大于  $OL_1$ ，譬如说是  $OL_2$ ，那么，在  $OK_1$  资本的条件下， $L_1L_2$  个单位劳动就处在闲置状态中。如果要让  $L_1L_2$  个单位失业者能够找到就业机会，资本就必须增加  $FG$  个单位。由此，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就业是由投资率或资本积累率决定的，失业是由于资本投资不足。

要素比例固定说遭到新古典学派的批评。这派经济学家坚持认为，现代工业技术不是刚性的，要素比例是可以改变的。失业问题主要是要素价格扭曲的缘故。这派的中心论点是：在要素市场上，存在着一套均衡价格，这套价格反映了各种要素的真正机会成本，从而能保证所有要素达到充分就业。因此，劳动者失业是由于要素市场的不完全性扭曲了要素价格，阻碍了要素的充分就业。例如，工会的压力，最低工资法，雇员的各种津贴，跨国公司的高工资政策等，都倾向于把工人的实际工资推到市场决定的均衡工资以上。而放宽折旧范围，低利率贷款，税收减免，汇率定值过高，负有效保护率等一系列鼓励投资的政策，却导致了资本的价格低于市场供求决定的均衡价格。

要素价格扭曲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鼓励现代工业部门使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因为资本相对于劳动更便宜。这样，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比劳动以更快的比例增加，从而使得城市工业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不断变小。新古典学派观点可以用图 5.5 来描述。

图 5.5 可以与图 5.4 对照起来看。在这里， $A_1B_1$  和  $A_2B_2$  为两条生产预算线， $q_1$ 、 $q_2$ 、 $q_3$  为三条等产量曲线。与图 5.4 不同，这里的等产量曲线不是 L 形状，而是凸向原点的圆滑的曲线，表示一定的产出可以用多种要素组合生产出来，也就是说，要素比例是可变的。与图 5.4 相比，这里有两条生产扩张线，表示每种产出水平可以用两种技

① 设货币总支出为  $Y$ ，资本价格为  $r$ ，劳动价格为  $w$ ，于是，对于  $A_1B_1$ ，有  $\frac{OB_1}{OA_1} = \frac{Y_1}{r_1} \div \frac{Y_1}{w_1} = \frac{w_1}{r_1}$ 。对于  $A_2B_2$ ，有  $\frac{OB_2}{OA_2} = \frac{Y_2}{r_2} \div \frac{Y_2}{w_2} = \frac{w_2}{r_2}$ 。

术生产出来。其中  $OE_1$  代表资本密集型技术， $OE_2$  代表劳动密集型技术。

从图 5.5 中可见，生产  $q_1$  产出有两种技术。首先假设预算线为  $A_1B_1$ ，于是，运用劳动密集型技术  $OE_2$  进行生产可以使成本达到最低，这时，最优要素组合是  $OK_2$  资本和  $OL_2$  劳动。现在假设资本相对于劳动价格下降了，预算线从  $A_1B_1$  旋转到  $A_2B_2$ 。结果，运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  $OE_1$  进行生产能使成本达到最低，这时的要素组合是  $OK_1$  资本和  $OL_1$  劳动。

新古典学派认为，发展中国家的高工资和低利率助长了工业部门倾向于运用资本密集型技术从事生产。这样，工业部门的劳动吸收率就较低，从而导致失业。假设某一时期的全部劳动供给是  $OL_2$ ，要素价格的扭曲引诱工业部门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

$OE_1$  来生产  $q_1$  产出，所吸收的劳动是  $OL_1$ 。结果， $L_1L_2$  数量的劳动就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要素价格关系理顺了，资本价格上升，劳动价格下降，那么，预算线从  $A_2B_2$  转到  $A_1B_1$ ，无需增加投资，工业部门就会自然而然地被引诱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  $OE_2$  生产  $q_1$  产出，从而使用的劳动就等于全部的劳动供给  $OL_2$ ，失业消失了。

古典学派和新古典学派关于工业部门就业创造能力的争论可以归结为要素替代弹性的分歧。所谓要素替代弹性是要素比例的相对变化对要素价格比例的相对变化的反应程度。要素替代弹性公式如下：

$$E_{LK} = \frac{\Delta (L/K)}{(L/K)} \div \frac{\Delta (P_K/P_L)}{(P_K/P_L)}$$

在这里， $E_{LK}$  表示劳动对资本的替代弹性， $L$ 、 $K$  分别表示劳动和资本量， $P_L$ 、 $P_K$  分别表示它们的价格： $\Delta (L/K)$  表示要素比例的增量， $\Delta (P_K/P_L)$  表示要素价格比例的增量。

例如，当工业部门资本的相对价格  $P_K/P_L$  上升 1%，而劳动—资本比率  $L/K$  上升 1.5% 时，要素替代弹性  $E_{LK}$  就是 1.5。当前者下降 5%，后者下降 3% 时，要素替代弹性就是 0.6。

古典学派坚持要素比例固定说实际上是把要素替代看成是完全无弹性的，即要素价格变化对要素比例毫无影响。而新古典学派坚持要素价格扭曲说是暗含地假定要素替代弹性很大。这两种观点都有些趋于极端。有关要素替代弹性的经验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制造业部门的要素替代弹性既不是零也不很大，而是在 0.5~1 之间。这就是说，如果工资相对于资本价格降低 10%，或者相对于工资，资本成本增加 10%，那么，就业将增加 5%~10%<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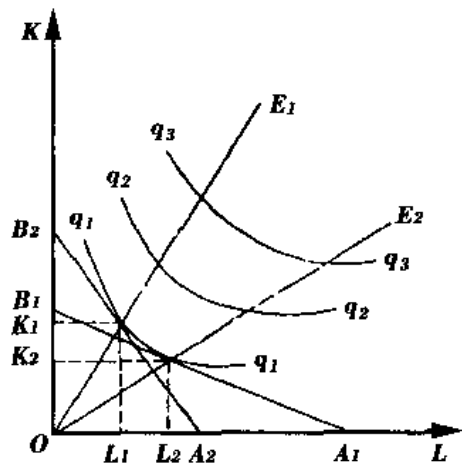


图 5.5 劳动与资本的替代关系

① 莫拉维兹，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就业含义，经济学杂志，1974，9

## 第四节 教育与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不仅人力资源大量闲置，而且人力资源素质也很低。大多数西方经济学家都认为，劳动者技术水平低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障碍。因此，增加对人的投资，提高劳动者素质，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战略目标。

对人的投资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体力投资，一是智力投资。体力投资主要包括营养和保健条件的改善，智力投资主要包括教育的发展。过去认为，对体力投资与对智力投资一样重要，但现在一些经验研究发现，营养和卫生条件的改善对生产率的影响远没有曾认为的那么大，而强调教育在人力资本形成中的重要性的呼声越来越高了。

### 一、教育的形式

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包括三种形式：①学校正规教育（formal education）。参加者一般是未开始参加工作的青少年，他们在学校正规教育机构中接受系统的教育。②非学校正规教育（nonformal education）。参加者往往是成年人，他们在非学校的正规教育机构中接受短期的、专门技术的训练。这种教育形式多种多样，如扫盲班和培训中心属于这一类。③非正规教育（informal education）。这是指在任何教育机构之外的一种学习方式。人们常常在家里、工作岗位上和社会中学习不少知识和技术，这种学习就属于非正规教育范围，它通常也被称为边干边学。狭义的教育只包括学校正规教育，这是发展中国家开发人的智力和技能的典型的教育形式。因此，这一节所论述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正规教育。

### 二、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的基本状况与问题

在过去几十年中，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大大地快于人口和经济的发展。从教育投资来说，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1960年为2.2%，1980年上升到3.9%，1995年又进一步上升到4.5%。其中低收入国家从1980年的3.4%上升到1995年的5.5%，增加了2.1个百分点；中等收入国家同期从4.1%上升到4.5%，只增加0.4个百分点。与此同时，高收入国家（发达国家）的教育支出在GNP中的比重却下降了，从1980年的5.6%降到1995年的5.5%<sup>①</sup>。从这些数字变化可以看出，发展中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在过去30多年中是大大地增加了，就增长幅度而言，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而且低收入国家的教育经费增加幅度最大。但是，尽管教育支出总额增加得较快，由于基数较低，加上人口增长较快，发展中国家对公共教育的支出人均数额仍然比较低，到90年代仍然只有30美元左右，而与此相对照，发达国家人均数是468美

<sup>①</sup> 1960年的数字来自《1993年人类发展报告》，其他年份资料来自《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

元，是发展中国家的 16 倍。这表明发展中国家虽然对教育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教育落后这一基本状况。

其次，从学校入学情况看，发展中国家的入学人数和入学率都大幅度增加了。表 5.5 提供了发展中国家过去 50 年以来各级学校在校学生人数的变化情况。

从表 5.5 中看到，发展中国家在 1950 年~1990 年间，在校学生人数增加是很快的。从总数来看，在校学生人数 40 年增加了 6.5 倍，平均每 10 年增加 1.63 倍，其中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增长最快，40 年间分别增加了 26.8 倍和 31 倍；而与此相比，初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只增加 4.5 倍。这样，高、中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相对增加得很快，占全部在校学生总数从 1950 年的 9% 上升到 1990 年的 33%。但是，尽管高、中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增长很快，在校学生人数在比例上仍然比较低，到 1990 年还只占全部在校学生人数的 1/3，这说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仍然处在初级水平上。实际上，到 90 年代中期，发展中国家初等教育已经基本上普及了，中等教育普及率平均为 50%，而高等学校入学率还不到 10%。

表 5.5 1950 年~1990 年发展中国家在校学生总人数 (百万)

	1950	1960	1970	1980	1990
初等教育	93	208	308	443	511
中等教育	8	18	81	156	222
高等教育	1	2	7	18	32
总 计	102	228	385	617	764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统计年鉴，1993 年以及以前相关年份。

发展中国家的主要教育问题之一就是辍学率非常高。在拉丁美洲，100 个学生中在完成小学教育之前就有 60 个中途退学，而有的国家小学辍学率高达 75%。在非洲和亚洲，小学中途辍学率分别为 54% 和 20%。中学的中途辍学情况也比较严重。在 1971 年，非洲的中学辍学率为 38.7%，拉丁美洲和亚洲为 18%，而与此同时，欧洲只有 11.4%。

发展中国家教育的另一个普遍问题是教育与实际严重脱节。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是，70% 的儿童生活在农村并在那儿上学，而且，由于中小学辍学率高和高等教育的不发达，大概有 80% 以上的入学者将会在农村度过一生。根据这一特点，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学教育应该与农村发展密切结合起来。但是，中小学教育很少向学生传授农村发展所需的知识、技能和思想。它们的目的是要为学生升学作准备，学习的主要内容是为升学打基础的。在发达国家中，中小学辍学率低，而且大部分人将升入更高级的学校继续读书，因而它们的中小学特别是小学把重点放在为升学打基础这一点上是恰当的。但是，把这种教育体制全盘搬到社会经济状况迥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则是不恰当的。



发展中国家除个别国家（如印度）以外，一般高等教育的比重很小，进入大学的学生比例还不到学生总数的5%，但是，大学教育也像中小学教育一样与经济发展实际需要严重脱节。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是按照发达国家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学科专业设置、教学内容、课程安排，都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而很少考虑到这种教育体制是否符合不发达国家自身的特点。大学教育的成就是按照国际学术标准而不是按照对国家发展的贡献来衡量的。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作进一步讨论。

教育与实际脱节还表现为学校里所学的课本知识不能适应职业市场的需求。很多国家城市的职业介绍所每天挤满了学数学、物理等专业的毕业生，而雇主所需的是工程技术专业毕业生。在这样的环境下，大学毕业生们最后不得不接受的工作与他们所受的教育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学物理的当秘书、学数学的开出租车之类事情在发展中国家比比皆是<sup>①</sup>。

### 三、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

60年代以后，教育成本—收益分析开始流行起来。成本—收益分析既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一个社会。首先，我们来讨论个人的收益与成本。

如果一个人通过教育提高了生产技能，从而增加了产出和收入，那么，这种增加的收入就是他的教育收益。一般说来，一个人受的教育越多，收益就越大。这种关系可以用年龄—收入曲线表示。

在图5.6中，横轴表示一个人的年龄，纵轴表示他的收入。从图5.6中看到：①受教育越多的人，年龄—收入曲线越高，反之则越低。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收入是最低的，大学毕业生的收入是最高的。②每条年龄—收入曲线都是先上升而后下降，到50岁左右，收入达到最大，这说明一个劳动者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收入水平。③图5.6还表明，文盲在年龄很小时就挣得收入，但起点收入很低。随着教育级别的提高，获得最初收入的年龄就不断变大，但起点收入也在增加。

年龄—收入曲线常常被家庭作为投资于子女教育的依据之一。如果教育成本不随教育级别的上升而与教育收益同比例地增加，那么，对这个家庭来说，尽可能地让孩子受更多的教育是有利的。当然，这里需要说明一下，一个人或一个家庭的教育决策不仅仅只考虑经济因素，还有很多社会的、文化的因素也必须考虑。但是，一般认为，经济因素是被考虑的主要因素。假如书读得越多，收入反而越少，那么，有谁还愿意去上大学呢？有的发展中国家一度出现过鄙视读书的反文化思潮，其根源就是一个大学教授的工资还不如一个普通工人的工资高这一脑体倒挂现象所引起的。这是对教育与收入之间正比关系的一个反证。

教育的收益是预期的，因此，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在估算教育收益时必须对某级教育的未来年份的收入进行贴现，然后把这种贴现值与该级教育成本进行比较。未来某一年的预期收入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sup>①</sup> 吉里斯，波金斯等，发展经济学，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247

$$V_0 = E_t / (1+r)^t$$

在这里， $V_0 = t$  年收入的贴现值， $E_t = t$  年的教育收入， $r =$  利率即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这个公式运用利率  $r$  把  $t$  年的教育收入贴现成为现值。如果要计算某级教育  $n$  年的全部预期收入贴现值，那么，只要把  $n$  年的所有预期收入贴现值相加起来便可得到，其公式为：

$$V = \sum_{t=1}^n \frac{E_t}{(1+r)^t}$$

由家庭负担的私人成本包括两个部分，即显性成本 (explicit costs) 和隐性成本 (implicit costs)。显性成本也叫做直接成本，它包括一个家庭对子女完成最终教育的全部实际货币支出，如学费、书费、交通食宿等开支都属于显性成本范畴。隐性成本是指学生在上学期间放弃的收入，如果他不上学而参加生产活动，本来可以获得一笔额外的收入，因此，隐性成本也叫做机会成本。显然，一个学生年龄越大，受的教育越多，放弃的收入就越大，隐性成本越大。但是，对于一个贫穷的农民孩子来说，即使上小学也有机会成本，因为农村孩子在年龄很小时就可以为家庭干活。这也说明了农村的学生中途辍学率较高的原因。

一个家庭预期他的子女在读书期间发生的一切成本，包括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也像收入一样必须贴现化为现值，然后与贴现收入比较。 $n$  年全部成本贴现公式为：

$$G = \sum_{t=1}^n \frac{C_{et} + C_{it}}{(1+r)^t} = \sum_{t=1}^n \frac{C_t}{(1+r)^t}$$

在这里， $C_{et}$  为  $t$  年的显性成本， $C_{it}$  为  $t$  年的隐性成本， $G$  为  $n$  年全部成本贴现值。

一个家庭是否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和投资多少，取决于贴现收入与贴现成本的关系。如果贴现收入大于贴现成本，投资就是有利的。反之，如果贴现成本大于贴现收入，投资就不值得进行。比较教育投资决策是否最优的一个常用方法，是计算内部收益率，它是指贴现成本之和与贴现收益之和相等时的贴现率。内部收益率可以通过下列方程求出：

$$\sum_{t=1}^n \frac{E_t}{(1+i)^t} = \sum_{t=1}^n \frac{C_t}{(1+i)^t}$$

或，

$$\sum_{t=1}^n \frac{E_t - C_t}{(1+i)^t} = 0$$

在这里， $i =$  内部收益率。

通过计算内部收益率，一个家庭可以把教育投资的收益率与其它投资收益率进行比较。如果教育投资内部收益率在所有各种投资中是最高的，这个家庭对教育的投资就是最优的；否则，对教育的投资是不合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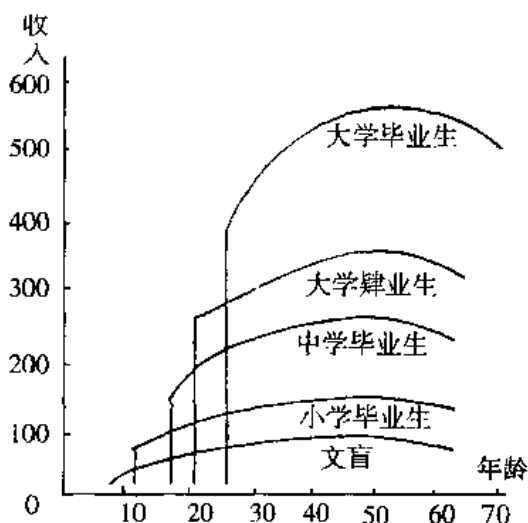


图 5.6 年龄—收入曲线

以上考察的私人成本—收益分析完全适用于社会成本—收益分析，只是一个国家考虑的预期收益和成本的角度与私人不一样，作出的最优教育投资决策与私人是不同的，而且可能是矛盾的。这在发展中国家常常是存在的，因为私人收益可能大于社会收益，而私人成本可能小于社会成本。关于这一点将在下面论述教育深化时作详细论述。

表 5.6 对不同收入组国家教育收益率的平均估计 (80 年代) (%)

	社会收益率			私人收益率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低收入国家	23.4	15.2	10.6	35.2	19.3	3.5
中低收入国家	18.2	13.4	11.4	29.9	18.7	18.9
中高收入国家	14.3	10.6	9.5	21.3	12.7	14.8
高收入国家	—	10.3	8.2	—	12.8	7.7
世界平均	20.0	13.5	10.7	30.7	17.7	19.0

资料来源：帕萨卡罗波洛斯. 教育的收益率：全新估计. 世界发展, 1994 (9)

西方一些学者对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教育投资的收益率进行了大量的经验比较研究。表 5.6 提供了教育收益率估计的一个实例。其他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第一，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投资收益率是高的，不仅高于发达国家，而且一般高于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因此，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教育投资是合算的。第二，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教育十分落后的国家，小学教育的投资收益率在各级教育中是最高的，而且在初级教育还没有普及的低收入国家，其初等教育收益率最高；但在完成了初等教育的国家，其初等教育收益率就难以确定了，因为没有更低的参照水平可与之比较。第三，在发展中国家，各级教育的私人教育收益率都大于社会教育收益率，但在发达国家，中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高于社会收益率，但高等教育的私人收益率却低于社会收益率。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政府对教育的补贴很大，尤其是对高等教育的补贴巨大；相反，发达国家一般中小学教育是免费的，而大学教育费用大部分是由受教育者自己和家庭负担的。第四，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收益趋向于递减，其基本原因是，接受某种等级学校教育的劳动者不再变得那么稀缺，因此在劳动力市场上只能获得竞争性的工资或较少的垄断差价。

#### 四、教育深化和知识失业

西方经济学家认为，像其他产品和服务一样，个人所受教育的年限和程度主要由供求决定。教育需求主要由收入和成本决定，教育供给在发展中国家往往由公共部门决定，由于社会公众的压力，政府在财力许可的情况下不得不努力满足这些需求。这样就比较容易出现教育深化 (educational deepening) 和知识失业 (educated unemployment) 问

题。

从上述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可知，公众对教育的需求决定于收入和成本。如果贴现收入大于贴现成本，对教育的需求就增加；反之，当贴现收入小于贴现成本时，对教育的需求就减少。

在发展中国家，有许多因素导致教育的私人收益远高于私人成本，从而刺激了公众对教育的无限需求。这一点可以结合图形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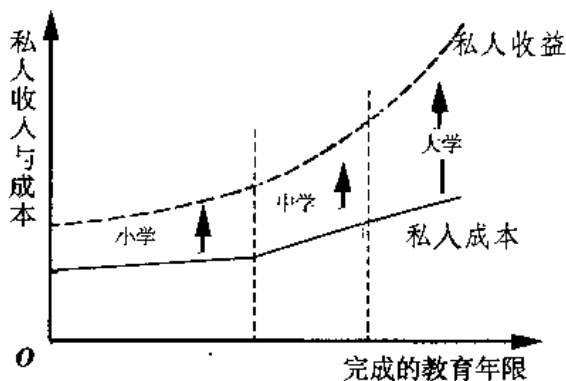


图 5.7 教育的私人收入与成本

图 5.7 表示私人收入与成本和完成的教育年限之间的关系。从图中可知，当一个学生完成越来越多的教育年限时，他的预期私人收益将比他支付的教育成本以更快的比例增长。这是因为，一个人受的教育越多，他未来挣得的报酬就越高，如上一节描述的年龄—收入曲线表示的那样。但另一方面，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大、中学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实行免费或近似于免费就学，因此，个人的教育支

出并不随教育年限的增加而增加多少。这样，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让他的孩子尽可能多地受教育是最优的决策。这就说明了在发展中国家，公众对教育的需求是无限的原因。

如上所述，教育的供给一般是被动地适应教育的需求。面临无限的教育需求，发展中国家政府在财力许可的范围内不得不提供尽可能多的教育机会。结果，发展中国家教育发展异常迅速。当然，教育的发展可以提高整个国家的劳动力素质，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进步。但是，教育数量的扩张必须与教育质量的提高结合起来，否则，教育投资效益就会下降。当今发展中国家教育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教育发展不快，而在于教育质量不高。这主要表现为辍学率高，教育脱离实际，智力外流，知识失业等方面。关于辍学率和教育与实际脱节问题前面已讲过，关于智力外流，将在下面讨论。在这里，我们将考察教育的深化和知识失业问题。

发展中国家不仅在城乡之间而且在城市地区间也普遍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城市的劳动力市场一般被分割为正规部门（称为现代部门）和非正规部门（传统部门）。所谓正规部门是指那些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比较高，工作比较稳定的大公司和政府部门；非正规部门是指工作没有保障，报酬低下且不稳定的一些个体小企业和做一些临时性工作的打工者。一般说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不考虑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他们都挤在正规部门寻找工作。但是，如第三节所说，正规部门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是十分有限的。这样，随着教育的迅猛发展，学校培养出来的知识劳动者人数就越来越大于现代部门提供的新的就业机会的数目，结果一部分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必定找不到工作。那么，谁最易失业呢？现代部门的雇主面对众多的各级学校毕业生的求职者，首先是招聘受过高等教育的毕业生，然后是考虑雇佣中学毕业生，最后才考虑小学毕业生的雇佣。由于求职

者多于就业机会，小学毕业生会首先被拒于工厂大门之外，其次是中学毕业生。

知识失业过程也是教育的深化过程。由于现代部门有限的就业机会，那些怀才不遇者只好屈身俯就，寻找低一级的工作；另一方面，雇主也倾向于雇佣文化程度更高的人从事原来由较低文化程度的人从事的工作。这样，原文盲能胜任的工作现在由小学毕业生代替了，原小学毕业生能胜任的工作现在由中学毕业生代替了，而原中学毕业的人能做的事情现在被大学毕业知识分子抢占了。这就意味着，相对于国民经济对人力的需要而言，出现了“教育过度”（overeducation）的情况。

发展中国家教育的“过度”发展导致了知识失业，但反过来，知识失业也助长了教育的进一步扩张。在教育发展初期，失业者主要由文盲组成。为了免遭失业，父母亲把自己的孩子送去上小学，于是，初等教育在扩大。但随着初等教育的扩展，小学毕业生的失业率逐渐上升。为了防止失业，那些读完小学的学生现在不得不进入中学继续读书。但是，扩张中等教育必须同时扩大初等教育，因为那些在现代部门几乎找不到工作的文盲现在必须接受最低限度的教育。待到中学毕业生难于找到工作时，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就增加了。政府只得扩张高等教育，但必须同时扩张中等、初等教育。可见，就业状况的每一次恶化就要求扩张一次正规教育。

由此得出一个似乎难以置信的结论：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这样一种情况：某级教育作为一个终点变得越是无利可图，这级教育的需求扩张得就越迅速，对政府扩大该级教育的投资所施加的压力就越大。

教育的过度发展与知识失业的相互作用必然造成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配置不当，教育投资效率低下。这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受过相当教育的知识劳动者处在闲置和半闲置状态中，这是人力资源的严重浪费。另一方面，教育过度发展耗费了国家的大量物质资源，如果把这些资源用于别的地方，可能产生大得多的效益。这种情况可以用图 5.8 来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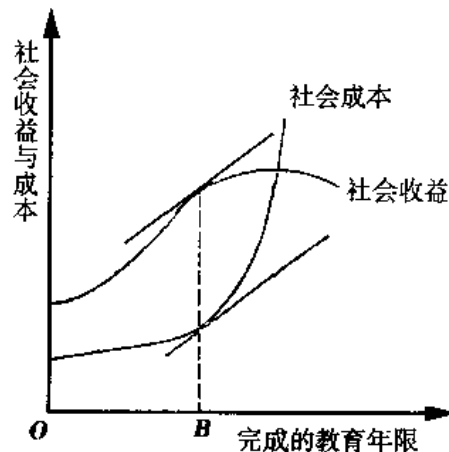


图 5.8 教育的社会收益与成本

在图 5.8 中，社会收益曲线最初上升得很快，后来上升得很慢（斜率最初递增，后来递减，这是边际社会收益变动情况），这反映了对初等教育的投资效益很高，小学后的教育投资效益逐步下降。另一方面，社会成本曲线在基础教育阶段上升得缓慢，在高等教育阶段上升得异常迅速。其原因是，一方面对高等教育投资耗费高，如修建校舍，购买设备、书籍等需花大量资金；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大学常常得到政府的大量补贴，包括对学生的生活补贴。

从图 5.8 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国家最优教育发展战略应该是为该国全体青少年提供  $OB$  年限的教育。超过  $OB$  年限，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社会收益，从而，增加教

育投资将产生负社会收益率。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迫于政治压力，提供的教育机会远远超过了 *OB* 教育数量，从而必然导致资源配置的浪费。

## 五、智力外流

所谓智力外流 (brain drain) 是指穷国的高级专门人才在国内完成学业后迁移到另外一个国家的一种国际移民活动。1962 年美国移民法放宽限制后，1962 年~1980 年间，世界上共有 50 万科技人员迁移到美国。其他西方国家也吸收了很多外国有技术专长的移民。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移民绝大多数来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亚洲，如韩国、印度、菲律宾和中国台湾等地，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也有几十万大学生到国外留学，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回国。

按照西方正统经济理论的说法，国际移民是一件好事。首先，从全球观点来看，当每个人在他的收入和劳动生产率达到最大的地方工作时，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将达到最大值。发展中国家的专业技术人员流到富国，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比在国内高，这就增加了全世界的福利。其次，从迁出国角度来看，它们也没有因技术专家迁出国外而遭受损失。在竞争的经济中，一个工人获得的收入与他的边际产品是相等的。一个移民迁到别国后，他减少了对迁出国的国民产出，但同时也放弃了相等数量的国民收入。两相抵消后，迁出国未遭受损失。而且，迁出国还可能增加很多利益。因为国外移民常常给国内亲属汇款，向国内某一机构赠款，这就增加了外汇收入。此外，这些移民与国内经常保持密切联系，促进了国际间的文化、经济、技术交流和合作，这对国内经济发展也是有利的。

对于上述观点，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批评。第一种论点的错误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可能增加，但从中得到好处的是迁入国，即发达国家，而发展中国家却丝毫没有得到利益。第二种论点的错误也很明显。首先，边际产品等于工资的最大利益原则是建立在个人支付他们全部的教育成本这一假设基础上的。但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教育成本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国家负担的，教育等级越高，国家负担的开支越大。当受过相当教育的人迁往外国时，迁出国就损失了它投入的人力资本，这些资本要是投入其他活动，本来可以生产更多的产出；或者说，这些被投入大量资本的人才如不迁出国外，将会大大增加国内产出。其次，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人才市场不是竞争性的，而是接近于买方垄断，主要由政府部门雇佣这些专门人才。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知识劳动者创造的边际产品就会超过他们获得的收入，结果，当这些专业技术人员流出国内时，损失的产出将大于节约的收入。最后，高级专门技术和管理技能具有溢出效应，可以增加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和非熟练工人的生产率。这些具有专门技术和管理才能的人迁移到外国，将会减少其他要素的生产率，从而减少国民产出。总之，在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看来，发展中国家的智力外流将对经济发展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控制人才外流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

发展经济学家对智力外流的分析还不止限于国际移民这个范围内。例如，托达罗认为，智力外流不仅仅减少了发展中国家关键性专门人才的供给，更严重的是，智力外流

还表现为国内科学家、医生、建筑师、工程师、大学教师眼光向外的倾向。他们不去思考和研究国内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而是把注意力转到国际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学术成就上。虽然他们的“身体”还在国内，但他们的“脑袋”已迁移到发达国家。托达罗把身体和脑袋都迁往国外的专门人才叫做“外在的”(external)智力外流，而把身体留在国内而脑袋迁往发达国家的专家学者称为“内在的”(internal)智力外流。

内在的智力外流在发展中国家甚至比外在的智力外流更普遍、更严重。例如，医生潜心研究尖端的心脏病，而把地方常见病作为次要专业；建筑师只热心于国家纪念碑和现代建筑的设计，而对低成本住房、学校的设计却漠不关心；工程师和科学家把主要精力放在最新的、最现代化的电子设备的研究上，而简易的机械工具、手工和力畜操作的农业机械，基本卫生设施和净水系统，劳动密集型机械加工等等适宜技术研究都在他们的兴趣之外；一些学院经济学家讲授和研究一些与本国经济发展完全无关的、复杂的数量经济模型，而贫困、失业、乡村发展、教育等发展中国家的重要经济问题被认为在理论上没有什么意义。在所有这些专业活动中，成就标准不是按照对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贡献来衡量，而是以国际社会同行们的赞誉作为依据。例如，发展中国家学者在国外某刊物上发表了论文、或是收到了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的邀请，常常被认为比找到一种解决国内技术和经济问题的办法更为重要。托达罗认为，内在的智力外流倾向已经渗透到发展中国家的全部的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虽然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难以量化，但是，内在的智力外流与外在的智力外流结合在一起毫无疑问是人力资源的巨大流失，加剧了亚非拉美国家和地区经济的不发展<sup>①</sup>。

## 第五节 人力资源发展战略与政策思路

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发展问题可以概括为人口增长过快，失业率太高和教育投资效率低下。因此，发展中国家人力资源发展战略目标应该是降低人口增长率，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教育投资效率。

### 一、降低人口增长率

在本章第二节已经证明，当今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迅速的根本原因是持续下降的死亡率和居高难下的出生率。人口死亡率的下降是经济进步的必然趋势，因此，要减慢人口增长速度的惟一途径就是降低人口出生率。

从第二节的生育微观经济分析中可知，生育率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一个家庭养育子女的成本：成本大，生育率就低；成本小，生育率就高。发展中国家出生率之所以高，主要是因为抚养子女的成本很低。因此，控制出生率的关键就是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刺激性措施和强制性措施，来提高抚养子女的成本。这些政策措施应主要包括：

<sup>①</sup> 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英文第2版·1981.329-321

(1) 实行特殊优惠政策, 扩大妇女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作为母亲和未来母亲, 妇女的教育对降低出生率至关重要。教育不仅增加参加社会和经济活动的机会, 而且还增加劳动报酬, 这就使得妇女在家里照料孩子的机会成本增加。此外, 政府应该为妇女寻找工作提供各种便利, 扫除限制妇女参加工作的一切陈规陋习。妇女就业率的提高, 无疑抬高了抚养子女的代价。

(2) 提高各级正规学校教育的个人学习费用, 特别是大学教育的私人费用。私人教育费用的增加直接提高了家庭抚养孩子的支出。在教育水平与就业机会、收入水平成正比的社会里, 父母亲愿意用子女的质量来代替子女的数量。

(3) 建立和完善老年社会保险制度。在发展中国家, 特别在落后的乡村, 父母亲拥有子女并主要拥有男孩的重要动机是为了老有所依, 老有所养。如果国家能为丧失劳动能力的老年人提供生活上的保障, 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那么毫无疑问, 生育率就会大大地降低。

(4) 建立一套计划生育的奖惩制度。国家直接干预家庭的生育决策。对少生子女的家庭在就学、就业上给予优先考虑, 在经济上给予适当的补贴。同时, 对那些拒绝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实行经济惩罚, 对超生的子女征税, 收取较高的学费。这些奖惩措施人为地调节养育子女的成本, 如能很好地贯彻实行, 可以收到较大的效果。

(5) 改善公共卫生医疗条件和儿童营养状况, 提高婴儿存活率。很多经验研究表明婴儿死亡率的下降与出生率的下降有直接的关系。这是因为一般家庭都有一个目标子女数, 在婴儿死亡率很高的情形下, 父母亲为了保证达到目标数目, 只得多生几胎以防不测。

## 二、增加就业机会

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十分严重, 这不仅表现为很高的公开失业率, 更重要的是, 非公开失业人数巨大。失业的根本原因是劳动市场的供给大于需求, 因此, 解决失业问题有两种思路, 一是减少劳动供给, 一是增加劳动需求。

从第三节分析中可知, 人口的迅速增长导致劳动力的急剧扩大。因此, 要减少巨大的劳动供给, 就必须降低人口增长率。有关人口出生率降低的措施都有助于劳动供给的减少。但是, 人口增长率的下降导致劳动力供给的下降, 有较长时间的滞后, 一般需要 15 年 ~ 20 年。这就意味着减少劳动供给的措施是一个长期战略, 在短期难以奏效。为了减少失业, 扩大劳动需求是最重要的就业战略。

在论述就业战略时, 发展经济学家一般认为, 以解决西方发达国家失业问题为中心的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和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不适用的。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的要旨是, 就业是由总需求决定的, 失业是由总需求不足造成的。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政府购买支出三部分组成。因此, 凯恩斯主义解决失业的处方是增加总需求, 办法是直接增加政府购买支出, 或者是通过降低利率和税收引诱更多的私人投资。这就是所谓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只要经济中存在着劳动失业和闲置资本, 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将会自动地迅速地对扩张的总需求作出反应。结果就业和国民收入增加, 失业减少乃至消除。凯恩斯主义就业理论和政策是建立在西方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在这种经济中, 商品、要



素和货币市场运行得相当顺畅,需求和供给反应非常灵敏。这些条件在发展中国家是不存在的。

(1)发展中国家的企业不可能对需求增加作出迅速的反应。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产出和就业扩张的障碍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方面的约束。资本、原材料、外汇、技术和管理人才的缺乏,商品、要素和货币市场极不完善,运输和通讯相当落后,进口导向的消费结构——这一切限制因素再加上其他结构和体制上的约束,使得总需求的扩张几乎不可能明显地增加产出和就业。实际上,在供给严重约束的条件下,即在总供给曲线毫无弹性时,通过赤字财政支出增加总需求,只会导致通货膨胀持续上升。这就是50年代~80年代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共同教训。

(2)即使政府扩大支出能增加就业,发展中国家的公开失业也不会减少,反而有可能增加。我们已说过,公开失业主要在城市地区发生。城市部门就业机会的扩大将会很快引诱农村的剩余劳动者流入城市,从而,劳动需求创造了更多的劳动供给。所以,扩大总需求的措施不可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

(3)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像发达国家那样依靠财政政策来影响总需求和就业。直接税收和政府支出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很小,要比发达国家小得多。因此,即使凯恩斯主义就业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有效,其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根本不可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失业问题。

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在解决失业问题上是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的。那么,根据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性特点制定出来的早期经济发展理论能不能作为解决发展中国家失业问题的政策依据呢?现在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也持否定看法。

50年代产生的一种流行的经济发展理论是刘易斯创立的无限劳动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模式。刘易斯模式假定农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而城市不存在失业。只要城市部门不断扩大资本积累,农村剩余劳动即伪装的失业者就会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部门就业。一旦农村剩余劳动完全被吸收到现代城市部门,整个经济就会出现平衡的增长,失业问题就消失了。以后,不少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刘易斯模式关于发展中国家城市部门不存在失业的假设是不现实的。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实践证明,发展中国家经济虽然增长不慢,但城市失业问题却反而越来越严重了。这是因为农村经济停滞不前使得日益增长的农村劳动力变成了剩余劳动即伪装的失业。这些剩余劳动者由于推力和拉力因素,纷纷流入城市寻找新的就业机会。但由于要素价格的扭曲和资本密集型技术偏向,城市现代部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能力十分有限,于是,伪装的失业日益变成了公开的失业。这种公开的失业由于城乡收入差距悬殊而变得越来越严重。

根据这些分析,现在多数发展经济学家比较一致地提出了全面的城乡就业战略,其内容是:

(1)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这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和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重要战略措施。发展农村经济可以有如下政策思路:①发展乡村工业,主要是能吸收大量劳动力的劳动使用型工业。国家要从资金、技术上为农村小型工业的发展提供帮助,同时阻止现代工业部门生产那些在农村地区同样能有效生产出来的产品,避免现代大工

业与农村小工业争原料和产品市场。②改变不利于农业部门的贸易条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产品价格被政府当局压得很低,而工业品价格却人为地抬得很高,此外,对农产品的出口征收重税和施加限制条件,而对工业品的进口实行关税保护,这一切措施都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③把现在集中在城市地区的公共服务和舒适的环境逐步向农村扩散。在农村,创建更多的学校、医院、道路、娱乐场所,无疑等于增加了农民的社会收入,从而减弱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动机。

(2)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城市的高工资收入是吸引农村剩余劳动流入城市的主要因素。按照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式(这个模式将在本书第七章中介绍),城乡名义收入差距越大,城市失业率就越高。只要城市工资上升得快于农村平均收入,乡村—城市人口流动就会持续下去,尽管城市失业水平还在上升。因此,缩小城乡收入水平差距的所有政策都有缓和人口流动的趋势。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取消或调整最低工资法、实行城市工资的最高限额和收入累进税制,等等。

(3)消除要素价格扭曲。在本章第三节中说过,在发展中国家,现代部门工人工资往往高于市场的均衡工资,这是由于最低工资法、工会的压力和跨国公司的高工资政策的示范效应。与此同时,现代部门投入资本的成本往往低于市场均衡水平。这是因为政府为了鼓励投资而实行的低利率和低汇率(按本国货币表示的外汇价格)政策所人为造成的。高昂的工资增加了资本家的劳动成本,便宜的资本降低了资本的使用成本,从而要素价格的这种扭曲促进了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采用,削弱了城市工业部门吸收劳动就业的能力。因此,消除要素价格的扭曲是增加就业机会的重要措施。政府应取消最低工资法,限制工会的权力,对外国公司工资收入征收调节税,以此来降低工资水平。同时,政府还应该取消对资本的优惠政策,提高贷款利率和外汇价格,从而增加资本的成本。这样,现代工业部门的厂商就会被引诱雇佣更多的劳动,使用更少的资本来生产一个既定的产出。

(4)选择适宜的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如上所述,理顺要素价格的关系能够刺激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的采用。但是,在要素比例相当刚性的部门中,价格的调整不可能有效地增加劳动就业。这就是说,在要素替代弹性很小时,依靠要素价格的调整是不能解决失业问题的。因此,要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必须直接地选择那些使用劳动多、资本少的技术进行生产。首先必须大力发展乡土技术研究和推广应用,逐渐减少对发达国家以资本密集型技术为特征的进口资本品的依赖。其次,从物资、技术和资金上大力支持创办和发展小型企业,这些企业一般都使用劳动密集型技术。这些企业包括乡村小工业,城市的小商业和服务业。

### 三、提高教育投资效率

在本章第四节中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教育的主要问题不是教育体制发展不足,而是教育投资效率不高,具体表现为辍学率高、教育脱离实际、知识失业和智力外流。根据这些分析,发展经济学家提出了以旨在提高投资效率为中心的教育发展战略与政策。

(1)调整教育体制的投资方向。长期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把教育投资的重点放在高等教育上。根据上述分析可知,高等教育的投资效益是很低的,一方面是因为出现了大量

的知识失业和智力外流;另一方面是因为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要低于中学特别是小学的投资收益率。因此,为了提高教育的投资效率,必须放慢高等教育的发展速度,加快中小学教育,特别是乡村小学教育的步伐。

(2)改变教育体制以外的各种刺激。发展中国家教育深化与知识失业的产生和教育体制以外的各种错误刺激有关。首先,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了对教育需求的持续增加,从而造成了对教育扩张的巨大压力。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助于缓和教育体制特别是大学教育扩张的速度和规模。其次,为了消除教育深化过程,政府和企业必须改变对劳动者的挑选方法,不按文凭而按实际情况来雇佣人员。

(3)减少对高等教育的补贴。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的过度发展是与政府对大学的大量补贴有直接关系的。这种补贴造成书读得越多,受教育者所花的开支就越小的畸形现象,这无疑是大学教育持续膨胀的重要原因。因此,为了大力发展中、小学教育,限制大学教育的发展速度,政府应该减少对大学生的各种补贴,相应地增加学费,并且让教育受益者本人承担较大比例的教育费用。而这笔费用现在通过国家贷款方式筹集,将来用受益者本人的收入偿还。这可能比由学生的家庭和亲友承担教育费用更加有效地抑制对大学教育的巨大需求。国家还可以用免去贷款偿还的引诱方式来鼓励一部分人到落后的农村去工作,这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利的。

(4)改革各级学校教育体制。发展中国家的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基本上是从西方发达国家移植过来的,严重地脱离了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这也是造成教育投资收益率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改革各级教育体制使之服务于本国的经济发展是人力资源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具体措施应该包括编写适合本国特点的教材和参考书,开设与农村经济发展有关的课程,创办和发展本地所需的技术学校和成人教育机构,按照对本国的贡献来衡量学术研究成就等。

(5)制止智力外流。发展中国家的外在智力外流是教育投资效率低下的又一表现。本国花费大量的资源培养出来的高级专门人才不为本国发展作出贡献,而为他国服务,这显然是流出国人力资源的巨大损失。制止人才外流对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重要的,但又是难于实现的。有的发展经济学家主张对外流的人才进行征税,以此来补偿迁出国的损失。有的发展经济学家提出更激进的主张是干脆不让科技人员出国。但是,这都不是制止智力外流的好办法。现在一般认为,为国内专门技术人员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尽量缩小穷国科技人员收入水平与富国的差距,将是留住人才的较好的战略措施。

以上我们对发展中国家人口、就业和教育的发展战略和政策思路分别作了论述。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这些战略和政策主张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例如,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仅能降低城市的公开失业率,而且还能抑制教育需求的无限扩大,缓和教育发展的压力。发展中小学教育不仅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同时也有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效果。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必须全面考虑人力资源问题,统筹制定综合的人力资源发展战略和政策,使人力资源发展与经济发展互相协调。

## 第六章 工业化、农业进步与 经济发展

当代所有发达国家都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而当代不发达国家几乎都是工业落后的国家。这一历史事实自然使人们把经济发展与工业化联系起来。但是，如何解释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工业化过程是否有普遍规律可循？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处在何等地位？应该如何发展？本章我们将讨论这些问题。

### 第一节 工业化及其发展阶段

什么叫做工业化？为什么要实现工业化？工业化一般要经历哪些阶段？许多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这些问题都作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研究。

#### 一、工业化的涵义

在经济学文献中，工业化（industrialization）有各种不同的解释。这里可以举出四种有代表性的定义。

早在 40 年代，张培刚教授把工业化定义为“一系列基要（strategical）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sup>①</sup>。他所说的基要生产函数是指在整个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的生产函数，亦即“联系效应”很大的生产函数，它的变化能引起并决定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据这位学者解释，他的定义较为广泛，因为它不仅包括工业部门的发展，而且还包括“工业化了的农业”的发展。但是，他又指出：“从已经工业化的各国的经验来看，这种基要生产函数的变化，最好是用交通运输、动力工业、机械工业、钢铁工业诸部门来说明。”<sup>②</sup>在 1991 年张培刚教授将工业化重新定义为：“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的生产

<sup>①</sup>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70

<sup>②</sup> 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上卷，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4，71

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sup>①</sup>从这个新定义中可以看出，张培刚教授给工业化定义增添了两个新观点：一是这种变化过程必须由低级到高级，是不断前进的，是动态的；另一方面，这种变化过程必须是突破性的、革命性的。例如，从手工劳动转到机器大生产。

印度经济学家撒克（Thaker, S. Y.）把工业化定义为脱离农业的结构转变，即农业在国民收入和就业中的份额下降，制造业和服务业份额上升<sup>②</sup>。这个定义与前一种定义显然不同，前一种定义并不认为工业化就一定是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变。如果某一个国家农业部门在经济发展中居于战略地位，那么，农业生产函数连续变化也可以叫做工业化。

关于工业化还有一种更为流行的定义就是：工业化指工业在国民收入和劳动人口中的份额连续上升的过程。这个定义在许多有关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著作中都能找到。1987年出版的一本权威性经济学辞典确切地表述了这个定义的内容：工业化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的基本特征是，“第一，来自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的国民收入份额一般上升……第二，从事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人口一般也表现为上升的趋势”<sup>③</sup>。这个定义与第二个定义的差别是，第二个定义强调非农业部门的不断扩大，而这个定义只着重于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连续上升。

还有一个定义是由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给出的，即工业化就是指制造业产值份额的增加过程，工业化水平用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来衡量<sup>④</sup>。这是所有工业化定义中界定范围最窄的一种定义，但使用得也比较流行。

以上四种工业化定义虽然有差异，但基本观点是一致的，即：工业化是一个长期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工业部门持续扩张，特别是制造业增长迅速，导致农业部门净产值和劳动力比重持续下降，而工业部门尤其是制造业部门比重持续上升，服务业部门的比重大体上保持不变，结果，工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渐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一国经济就实现了工业化。

这里顺便指出，一国实现了工业化，并不等于就是进入了发达阶段。在经济实现了工业化之后，农业部门的比重继续下降，但下降速度减缓，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变得很小；工业部门的比重转而趋于下降，这种下降是由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引起的，而社会基础设施部门的比重有可能保持不变甚或上升；当农业部门的相对规模变得很小（比如10%以下），而服务业部门相对规模变得很大（比如达到60%以上）时，一国经济就从工业化阶段进入了发达经济阶段。当今一些老牌工业化国家已经进入了这个阶段，现在有人把这个阶段称之为后工业化阶段。

---

① 张培刚. 发展经济学通论. 第1卷. 农业国工业化问题. 湖南出版社, 1991. 190~192

② 撒克. 工业化与经济发展. 英文版. 1985. 17

③ 撒克.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辞典. 第2卷. 英文版. 1987. 797

④ 钱纳里, 鲁宾逊, 赛尔奎因.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上海三联书店, 1989. 20

## 二、工业化的理论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最初年代里，工业化成为发展中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正如一位学者指出：“在全世界，工业化实际上已成为本世纪中叶一个使人着魔的字眼。”<sup>①</sup>工业化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魔力，是因为它得到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有力支持。

实现工业化的一个理论依据是恩格尔消费规律，这个规律表明：当人均收入很低时，总支出中用于食物和必需品的比例很高，而用于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比例很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提高，食物和必需品的消费支出比例下降，而舒适品和奢侈品的消费支出比例上升。食物和必需品基本上是农业部门或第一产业生产的，而奢侈品和舒适品基本上是工业和服务业即第二和第三产业生产的。需求引导生产。这样，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济结构必然发生变化，生产食物的农业部门相对变小，而生产工业品和服务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逐渐变大。为了生产更多的工业消费品，资本品工业必须以更快的速率增长。

以上是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的。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说，早期发展经济学家还提出了一些支持工业化的特殊理由。<sup>①</sup>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这个 50 年代中期提出的模式表明，在发展中国家，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把一部分劳动生产率很低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中去，整个社会生产力就会增加。<sup>②</sup>贸易条件恶化论。普雷维什和辛格在 50 年代各自独立地提出了一个相似的论点：在国际商品交换中，初级产品价格与工业品价格相比有长期下降的趋势。由于历史原因，在国际贸易中，工业出口品主要是由发达国家生产的，而发展中国家用以出口的商品主要是初级产品。这样，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长期处于受发达国家剥削的不利地位。为了摆脱贫困和受剥削的境地，发展中国家必须大力发展自己的工业，以代替进口的工业品。<sup>③</sup>联系效应论。赫尔希曼在 1958 年提出了一种发展战略：“不平衡增长战略”。这一战略是建立在“联系效应论”基础上的。赫尔希曼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有限，为了使有限的资本产生最优效果，这些国家必须把资本投入联系效应最大的部门上。根据投入—产出关系，他断言，工业部门特别是资本品工业部门的联系效应比农业部门的联系效应大得多。

库兹涅茨对各国部门结构的经验分析为工业化必要论提供了历史证据<sup>②</sup>。按照库兹涅茨的方法，经济增长与行业结构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一方面，使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对不同收入的国家进行分组，然后观察各组之间劳动力职业结构和国民收入在各个部门份额的差异。另一方面，对一组既定的国家较长一段的历史数据进行研究，考察这些国家在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发生的职业结构和部门收入结构的变化。前一种研究被叫做截面分析，后一种被称为剖面分析。

按照截面分析，库兹涅茨按人均收入把国家分为七组，最高收入国家为第一组，最低收入国家为第七组。然后计算每组国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在劳动力和国民收入中各

<sup>①</sup> 布赖斯，工业发展，英文版，1960

<sup>②</sup> 库兹涅茨，关于经济增长的六篇讲演，英文版，1959

自所占的相对份额。根据这些分类和计算，库兹涅茨得出如下结论：

(1) 当我们从高收入组移向低收入组时，农业部门在劳动力中的份额上升，而工业和服务业部门的份额下降。这就是说，在发达国家，农业部门在劳动力中所占的份额低，而工业和服务业部门所占份额高。而在不发达国家，情况刚好相反。

(2) 农业部门在国民产品中的份额与人均收入具有负相关，即在高收入国家份额低，在低收入国家份额高。工业和服务业部门在国民产品中的份额与人均收入具有正相关，即在第一组、第二组国家份额高，在第六组、第七组国家份额低。

(3) 各个部门在国民收入和劳动力中份额的差别范围在各组国家中也是不同的。农业部门的差别范围最宽，工业部门的差别范围较窄，而服务业部门最窄。以劳动力为例，农业部门在劳动力份额中的差别范围是 1:4，即从第一组国家 15% 以下到第七组国家的 60% 以上；工业部门不到 1:3，即从 40% 以上到 15% 左右；服务业部门只有 1:2 还弱，即从 45% 到 24% 左右。这一结论表明，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农业部门的相对比例对人均收入的上升最为敏感，即当人均收入持续上升时，农业部门的相对比例下降十分迅速。这一结论与以上两个结论一起充分地验证了恩格尔消费规律的有效性。

(4) 虽然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总劳动生产率上的差额甚大，但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差额更大，而非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的差额相对较小。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这一结论证实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所做的假设。如上所述，这种模式假定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将使总劳动生产率提高。

关于剖面分析，库兹涅茨选择了 15 个当今发达国家作为样本进行研究<sup>①</sup>。这些研究得出的结论如下：

(1) 在所有 15 个国家中，毫无例外地，农业部门在劳动力和国民产品中的份额下降了。除个别国家外，大多数国家工业部门在劳动力和国民产品中的份额上升，但收入份额上升的幅度大于劳动力份额增加的幅度。服务业部门在劳动力中的份额在所有国家都上升，但它在国民产品中的份额却没有显示这样一致的变化。14 个国家中有 6 个趋于下降，8 个趋于上升，而趋于下降的国家大多数是当今最发达国家。

(2) 虽然非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更大。在非农业部门中，14 个国家中有 12 个国家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大于服务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

### 三、工业化的发展阶段

工业化不仅是一个国家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变过程，而且也是工业部门内部结构的变化过程。一般认为，工业化发展过程正常地要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初级消费品工业如食品加工、纺织、烟草、家具等是主要工业部门，并且以比资本品工业如冶金、化学、机械、汽车等部门更快的速度发展。在第二阶段，资本品工业增长加

---

<sup>①</sup> 英国、法国、德国、荷兰、丹麦、挪威、瑞典、意大利、匈牙利、美国、加拿大、南非、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速进行，资本品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趋于上升，但这时消费品工业在产值和速度上仍然占主导地位。在第三阶段，资本品工业以比消费品工业更快的速度增长，并渐占优势。

为什么在正常情况下大多数国家的工业发展要依次经历这三个阶段呢？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此作了理论上和经验上的解释<sup>①</sup>。

在工业化初期，初级消费品工业之所以首先发展，是因为像食品加工和纺织之类的工业是满足人们最基本需要的部门。只有当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之后，人们才有可能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其他工业。当然，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出口原材料来进口工业消费品，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但是，如果大多数国家都靠进口消费品来满足国内基本需要，那么就没有消费品可进口。此外，即使一个国家能够从发达国家进口工业消费品，它也不能过分地依赖进口。因为，在国际贸易中，贸易条件往往不利于初级产品，所以靠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消费品的国家将会发生外汇短缺，而这种短缺会因为人口增长所带来的消费品需求扩大而日益严重。最后，该国不得不调整发展战略，建立自己的初级消费品工业，并同时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消费品工业在工业化初期首先发展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特有的要素构成。在最初阶段，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资本、技术和熟练劳动力十分稀缺，而非熟练劳动力极为丰富。在这种条件约束下，发展中国家不可能迅速地大规模地发展资本品工业，因为这类工业需要大量投资、技术和管理人才。相比之下，初级消费品工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的、有原料偏向的，只需较少的资本和技术，因而易于发展。

当工业化过程进行一段时间后，资本品工业必须加速发展。这是因为：第一，如果一个国家长期地只是发展消费品工业，它就永远也不可能处于科技和工业发展的前沿，因为资本品工业技术远高于初级消费品工业技术，同时，资本品工业的发展更能促进科学技术的进步。第二，消费品工业的扩张和质量提高只有在资本品工业不断发展的条件下才成为可能，消费品工业成本的下降和效率的提高也只有通过使用现代先进机器设备才是可行的。

工业化过程的三个阶段的理论得到了经验的支持。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Hoffman, W. G.）对各国工业化过程中消费品和资本品工业的相对地位变化作了统计分析<sup>②</sup>。得到的结论是，各国工业化无论开始于何时，一般具有相同的趋势，即在最初阶段，消费品工业占优势；在第二个阶段，资本品工业迅速发展，消费品工业优势地位渐趋下降；在第三个阶段，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达到平衡，而有资本品工业快于消费品工业增长的趋势。

霍夫曼的分析是以消费品工业和资本品工业的净产值相对份额的变化为基础的。他指出，在工业化第一个阶段，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之间的净产值比率在 6:1 和 4:1 之间，即  $5 (\pm 1.5) : 1$ 。这就是说，在 100 元工业净产值中，约有 84 元为消费品工业

① 撒克·工业化与经济发展·英文版·1985.67~77

② 霍夫曼·工业经济的增长·英文版·1958



净产值，约有 16 元为资本品工业净产值。他选择的国家包括两组：一组是 1890 年以前进入工业化第一阶段的，另一组是 1906 年 ~ 1948 年间进入工业化第一阶段的。前一组包括比利时、英国、法国和日本等国，后一组包括新西兰、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国。

在工业化的第二个阶段，霍夫曼计算的两种工业净产值比率在 1.6:1 和 3.2:1 之间，即  $2.5 (\pm 1) : 1$ 。这就是说，在总工业净产值中，消费品工业占 60% ~ 78%，而资本品工业占 22% ~ 40%。他选择的国家包括新西兰、巴西、智利、阿根廷、日本、丹麦、荷兰、匈牙利、加拿大、南非和澳大利亚 11 个 1890 年以后进入工业发展第二个阶段的国家。

在工业化的第三个阶段，霍夫曼选择了英国、法国、瑞典、丹麦、比利时、意大利、瑞士、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南非 12 个国家，时期是 1921 年 ~ 1952 年。霍夫曼计算的两种工业净产值比率在 0.6:1 到 1.5:1 之间，即  $1 (\pm 0.5) : 1$ ，换句话说，消费品工业净产值占总工业净产值的比例在 33% ~ 60% 之间，而资本品工业净产值所占比例在 40% ~ 67% 的范围内。平均起来，这个阶段的两种工业净产值是一半对一半。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钱纳里运用截面分析，对 50 年代具有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工业结构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sup>①</sup>。他把工业部门分为三类：投资及其相关产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与霍夫曼相比，钱纳里把中间产品单独分为一类，而在霍夫曼那里，中间产品或归于资本品或归于消费品。投资及其相关产品包括机械、运输设备、金属与非金属矿产品等，中间产品包括造纸、石油产品、橡胶、化学品、纺织等，消费品包括木制品、印刷、服装、皮革产品、食品、饮料和烟草等。这三类工业在全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随收入水平的不同而不同。如表 6.1 所示。

从表 6.1 中看到，从低收入（100 美元）移到中等收入（300 美元）再到高收入（600 美元）国家，投资品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产值比重逐渐增加，从 12% 增加到 23.6% 再上升到 34.5%；而消费品工业的产值比重则呈下降趋势，从 68.3% 下降到 54.1% 再下降到 42.9%。对于中间产品而言，其比重不受收入水平的明显影响。

表 6.1 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工业构成 (%)

工业类别	\$ 100 国家的比重	\$ 300 国家的比重	\$ 600 国家的比重
投资品	12.0	23.6	34.5
中间产品	19.7	22.3	22.6
消费品	68.3	54.1	42.9

资料来源：钱纳里，工业增长的型式，表 5

这也从另一角度证实了以上的理论解释。

钱纳里后来把工业部门分为早期工业、中期工业和晚期工业三类<sup>②</sup>。这一分类更加明确地表明了工业部门发展的时序性。早期工业包括食品、皮革、纺织等工业。在发展

① 钱纳里，工业增长的型式，美国经济评论，1960 (9)

② 钱纳里，泰勒，发展型式：国家间比较与长期比较，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1968 (11)

早期，这些部门发展迅速；后来发展速度减缓，在工业中的比重下降。中期工业包括非金属矿产品生产与加工，橡胶、木材加工和某些化学品。这些产品生产在发展中期增长较快，但只是稍快于总量 GNP 的增长。后期工业包括重工业和一些在技术上虽简单但其需求只是在后期扩张的工业如造纸与印刷业。重工业包括耐用资本品和耐用消费品。这些制造业部门在发展的晚期增长速度加快，大大超过 GNP 的增长速度，致使这些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渐占优势。但是，当经济发展到相当高水平时，这些工业发展速度开始下降，甚至低于 GNP 的增长。而其他一些新发明出来的产品和新兴工业将取代重工业而迅速发展起来，如电子工业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这些工业被称为是“后晚期”工业（“late late” industries）。

以上所说的工业化过程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一般趋势，因为它们在增长过程中面临着三个共同的因素，即消费者需求模式、规模经济和生产技术水平。但是，这并不是说，一切发展中国家都一定按照这个模式决定其工业化进程，因为各国的资源禀赋状况、国土面积、地理位置、历史条件、发展战略和开放程度不都是相同的。因此，要所有发展中国家遵循同一个工业化发展模式是不适当的。不过，研究工业化过程中结构的变化对于制定发展政策有参考意义。

## 第二节 工业化过程中的农业

如前所述，工业化意味着农业部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份额不断下降，这一特点很容易使人忽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事实上，在五六十年代，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在强调工业化时忽视了农业的发展。结果，农业长期处于萎缩和停滞状态，严重地阻碍了工业化的进程。从 60 年代中期以后，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和计划者从实践中逐渐地开始认识到农业对实现工业化是非常重要的。

### 一、发展中国家农业的停滞

50 年代，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是理论上不重视农业发展的一个典型例子。刘易斯模式只强调工业部门的扩张，而认为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过是为工业发展提供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此外，赫尔希曼的“不平衡增长论”和普雷维什的“贸易条件恶化论”也为重工轻农提供了理论依据。

这些发展理论在五六十年代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所采纳。在工业化就是一切的口号下，发展中国家把大量的人力和资本投资于制造业部门，而农业部门投资甚微。结果，工业总产值以每年 10% 以上的高速度增长，而农业却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如表 6.2 所示。

从表 6.2 中可以看到，在 1950 年 ~ 1985 年的 35 年间，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年增长率极低，任何一个 10 年都未达到 1%，而且，60 年代的

表 6.2 发展中国家各地区粮食和农业生产增长情况 (%)

	人均粮食生产的变化				人均农业生产的变化			
	1948/ 1953 ~ 1960	1960 ~ 1970	1970 ~ 1980	1980 ~ 1985	1948/ 1953 ~ 1960	1960 ~ 1970	1970 ~ 1980	1980 ~ 1985
拉丁美洲	0.4	0.6	0.9	0.3	0.2	0.0	0.7	0.4
远东 (不包括日本)	0.8	0.3	0.7	1.2	0.7	0.3	0.6	1.1
近东 (不包括以色列)	0.7	0.0	0.7	0.2	0.8	0.0	0.4	0.1
非洲 (不包括南非)	0.0	-0.7	-0.2	-0.4	0.3	-0.5	-1.4	-0.3
全部发展中国家	0.6	0.1	0.5	0.3	0.6	0.0	0.8	0.5
发达国家	1.1	0.9	1.3	1.5	1.0	0.6	1.2	1.3

资料来源：托达罗·经济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296

年增长率远低于 50 年代。60 年代的人均粮食生产每年仅增加 0.1%，而人均农业生产却完全停滞不前。这表明，在这 10 年间，就粮食消费水平而言，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几乎没有得到改善。如果考虑到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实际上，最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是下降的。70 年代情况略有好转，人均粮食生产的增长达到 0.5%，接近 50 年代的水平。这是由于这个时期发展中国家发生了“绿色革命”。但是，遗憾的是，到 80 年代，除了远东地区之外，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再次下降了。

表 6.2 也列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字。从表中看到，发达国家的人均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增长率远远高于不发达国家。而且，增长率呈上升趋势。到 80 年代，发达国家人均粮食生产和人均农业生产分别增加到 1.5% 和 1.3%，比全部发展中国家的增长率高好几倍。

从表 6.2 中还可以看到各个地区农业增长情况。在拉丁美洲，60 年代的人均粮食生产增长快于 50 年代，但也没有达到 1%，而且，农业生产在 60 年代完全没有增长；70 年代人均粮食和人均农业生产开始增长，但 80 年代又下降了。远东的情况比拉丁美洲好一些，但 60 年代人均粮食和农业生产增长比 50 年代低。不过，进入 80 年代，远东地区农业生产增长较快，人均粮食和农业生产增长分别达到 1.2% 和 1.1%。问题严重的是近东，60 年代的人均粮食和农业生产增长率是零，即整整 10 年间人均粮食和农产品没有任何增加；70 年代有所增长，但 80 年代又大幅度下降了。非洲是第三世界问题最严重的地区。60 年代以来，人均粮食和农产品产量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一直在减少，从表中看到，60 年代~80 年代的人均粮食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增长率都呈负数。因为粮食是穷人的主要消费品，这就表明非洲人民 30 年来生活状况在不断地恶化。据联合国粮农组织 (UNFAO) 统计，在大多数非洲国家，人均热量摄取量已经下降到最低营养标准以下，在 4.65 亿非洲人口中，1.5 亿多人由于食品供给不足而营养不良。

由于 50 年代 ~ 60 年代农业长期停滞，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抑制，人民生活水平未得到明显的提高。自 60 年代中期以来，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日渐认识到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农业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Hayami, Yujiro）和弗农·拉坦（Ruttan, Vernon W.）总结说：“关于农业和工业发展对国民经济增长的相对贡献的经济学说已经历了明显的转变。从早期‘唯工业化论’转到强调农业生产和生产率的增长对一般发展过程的意义。”<sup>①</sup>

## 二、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作用

农业部门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 60 年代以后的发展文献中已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关于农业的贡献被概括为四个方面：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sup>②</sup>。

### （一）产品贡献

工业化的速度是以农产品增长率为条件的。就农业原材料而言，这种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只有当农产品以一个适当的比率增加时，使用农产品作为原料的工业部门增长率才能提高。这就要求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生产持续地保持一定比例的扩张，否则，必须花费大量的稀缺外汇从外国进口所需的原料，这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代价太大了。

关于工业化和粮食之间的关系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研究结构转变的重要问题之一。现在公认的观点是，对于大多数国家来说，工业化严重地受粮食供给不足的制约。如果一个国家粮食供给的增长长期跟不上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工业化进程就不得不减慢下来。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指出，当今发展中国家对粮食需求是巨大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1）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粮食的边际和平均消费倾向要高得多。这样，在工业化初期，增加的收入中将会有很大一部分用于消费，很小一部分用于储蓄。同时，根据恩格尔消费规律，在低收入水平上，食物消费占家庭预算支出中很大一个比例。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的增加，消费需求的增加将会导致对粮食的需求在一段时期内迅速增加。这就是说，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在发展中国家要高得多。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估计，在 60 年代初，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印尼等 7 个亚洲国家人均收入每增加 1%，对粮食的需求就增加 0.89%，而美国是 0.15%，澳大利亚是 0.11%。这意味着这些发展中国家的粮食需求的平均收入弹性是美国的 6 倍，是澳大利亚的 8 倍。

（2）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人口增长率要高得多。在本书第五章中曾经指出，在发达国家，人口转变已进入了低死亡率低出生率阶段，因而人口增长缓慢。但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还处在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因而人口增长迅速。这样，即使

<sup>①</sup> 速水佑次郎，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英文修订版，1985

<sup>②</sup> 加塔克，英格森特，农业与经济发展，华夏出版社，1987

不考虑其他因素，仅就人口增长而言，发展中国家对粮食的需求比发达国家要大得多。现在，第三世界成亿的人口处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粮食生产赶不上人口的增长；从表 6.2 中已知，非洲地区在 60 年代~80 年代的人均粮食呈负数增长。

(3) 工业化以及伴随而来的城市化扩大了对粮食的需求。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人口稠密的国家，农业部门存在着大量的劳动生产率低到接近于零甚至负数的剩余劳动，这些剩余劳动不断地被工业部门的扩张所吸收。城市的工资水平远高于农村的生存收入。这样，随着这些来自农村的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对粮食的需求也必然增加。

(4) 随着农业生产率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对粮食的消费将会比收入以更大比例增加，因为发展中国家农民通常有一种自产自销的倾向，当粮食收成好时，增加的很大一部分将用于家庭的消费。

由于以上四个原因，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对粮食的需求是巨大的，而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呈递增的趋势。这就要求农业部门的生产持续增长，使得粮食供给增长大致上与日益扩大的需求相平衡。否则，食品价格就会上涨。食品价格的上升使实际工资下降，为了保护实际生活水平不下降，工人就要求增加工资，结果是消费品价格全面上涨，通货膨胀不可避免地产生。此外，由于发展中国家食品需求价格弹性很低，更加重了通货膨胀的程度。通货膨胀的加剧会带来公众的不满和社会的动荡，迫使政府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从而放慢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速度。

粮食短缺还将导致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由粮食短缺引起的通货膨胀降低了出口品的竞争力，提高了进口品的竞争力，从而造成外贸赤字扩大。而且，由于粮食短缺，政府不得不进口大量粮食以满足国内需求，从而外汇缺口扩大，这就不得不减少国内不能生产而又急需的资本品和原材料的进口，导致国内工业投资的下降和工业发展速度的减慢。

## (二) 市场贡献

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中，即使工业部门工人收入高于农民收入，由于农业部门规模巨大，最初，农村必然是国内工业品的主要市场。农民购买服装、家具、日用品及建筑材料等消费品和化肥、农药、农机及其他农业投入品，扩大了工业品的需求，刺激了工业生产的扩张，这样，农民作为工业品的需求者，对经济发展和工业化作出了贡献。因为这种贡献与商品交换联系在一起，所以被叫做市场贡献。另一方面，由于农民购买工业品必须在市场上销售农产品，农业的市场贡献还应包括出售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给非农业部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库兹涅茨把前者称为“生产过程的市场化”，把后者称为“农业净产品的市场化”。

农业生产的发展必然导致市场贡献的扩大。一方面，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农业技术进步的结果。如果是生物技术进步，化肥、农药和薄膜等农用工业品需求就会增加；如果是机械技术进步，农业机械设备等工业品的需求就会增加。可见，农业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对农用工业品需求的扩大和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农业生产的增长使农民收入增加，从而导致了工业消费品需求的增加和生产的扩张。从供给方面说，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农业市场剩余增加，从而为城市工业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商品粮和原料。

当然，任何一个经济都不是完全闭关自守的，它或多或少总是与外国经济保持一定的交易关系。但是，即使在开放经济中，农业部门的市场贡献也是存在的。首先，开放经济虽然弱化了国内工业与农业之间的交换关系，但这种关系始终是存在的。从理论上讲，国内生产的工业品或农产品可以在国外销售而不在国内销售。同样，国内需要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也可以从国外进口而不在国内购买。根据比较利益原则，在制造业方面占优势的国家可以通过出口制造品来进口粮食和其他农产品。反之，在农业方面占优势的国家可以通过出口食品和其他农产品来进口工业品，从而一国的工业和农业就不必保持紧密联系。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国际贸易决不是完全竞争性质的，它还要受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非经济因素限制。这就使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依赖国际贸易来满足本国的各种需要。

其次，一国的食品和其他工业品供给完全依赖进口需要担负巨大的风险，国际政治和经济局势稍有动荡就会给国内经济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因此，大部分国家都有意地选择一定程度的自给，而不是单纯按照比较利益原则来实行专业化生产。

综上所述，在当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交换关系是不可能取消的，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市场贡献始终是存在的。

### （三）要素贡献

农业的产品贡献来源于农业生产，即维持自身消费以外的生产剩余。农业的市场贡献来源于农业与其他部门的商品交换。这里将要讨论的农业的要素贡献是指农业资源的转移，即资本和劳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

工业化需要大量的资本投资。在工业化初期，工业部门比重很小，依靠工业部门自身的积累来筹措发展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规模巨大的农业部门必然是资本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农业曾为经济发展积累了巨额的资本。

把资本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一般有两种方法：一是依靠市场力量自动转移，二是依靠政权力量强制转移。如果依靠市场力量自动转移，那就必须具备三个条件：①农业必须向本部门以外出售部分产品，即必须有市场剩余；②农民必须是净储蓄者，即他们的消费必须少于他们的收入；③农民的储蓄必须超过他们在农业上的投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要满足这些条件，就必须给农民以适当的刺激，使他们增加市场剩余，愿意节制消费，并且情愿把他们的储蓄转为非农业投资<sup>①</sup>。

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加速工业化，政府宁愿用政权力量强迫农民把农业剩余转到工业部门用于投资，而不愿依靠企业家和投资者的联合决策，嫌这种转移速度太慢了。政府的干预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间接控制，如价格控制、间接税及汇率调整等，其目的在于改变工农产品贸易条件使其不利于农业；另一种方式是直接控制，这种方式包括对农民和地主的直接征税，对农产品强制性按低价收购，等等。

实践证明，政府强制性地转移农业剩余，其代价是高昂的。它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农业效率低下和生产停滞。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影响了工业的资本积

<sup>①</sup> 格里芬，农业变化的政治经济学，英文版，1979，102

累，因为它使资本积累的重要源泉逐渐枯竭。

农业对工业化的劳动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工业化初期不仅需要大规模资本投入，而且需要大量的劳动投入。在发展初期，城市人口比重很小，工业发展对劳动的不断增长的需求不可能由城市人口自然增长来满足。因此，随着城市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必须不断地流入城市来补充工业劳动供给的不足。

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业生产不能下降，而且必须增加，因为工业化对粮食需求增加了；二是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必须能胜任非农业的工作。第一个条件要求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第二个条件要求职业培训工作必须与工业发展相适应。

#### （四）外汇贡献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基础薄弱，科学技术落后，工业扩张所需的许多资本品和原材料必须从先进国家进口。这就需要有大量的外汇来源。由于在工业化初期，工业品出口能力很弱，而初级产品在国际贸易中具有相对优势，因此，农业部门在出口创汇方面将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扩大农业出口具有工业品出口所不及的潜在利益。①出口的农作物如咖啡、可可、棉花、橡胶等，可以在现有的作物体系内通过增加土地和劳动来扩大产量，而无需大量的资本投资。这对资本稀缺而劳动丰富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适当可行的出口战略。②工业品质量、品种差异很大，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工业化国家往往在竞争中占绝对优势，发展中国家难以与之抗衡。而农产品的质量在各国之间差异不大，发达国家在竞争中并没有多大的优势。而且，由于产品同一性，每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只占很小一个份额，因此，对单个出口者来说，增加农产品出口不会造成价格猛烈下跌。当然，如果许多国家同时增加出口量，农产品价格将会下降。③出口型的农业生产不受国内需求限制，因此，农业专业化生产容易形成，从而提高农业生产，促进农业的发展，改善农民和其他人的生活条件。

农业出口能为工业化提供外汇，同样，在粮食短缺的国家里，增加农业生产能节约大量的外汇。我们已指出，粮食短缺必须依靠进口来弥补。但由于进口的粮食被消费掉了，而进口资本品可以形成长期的生产能力，因此，用有限的外汇进口粮食的机会成本太大了。为了保证把稀缺外汇用在国内急需的而又不能制造的资本品进口上，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实行农产品进口替代战略是比较明智的。

一般认为，实行农产品进口替代有两个优点。一是由于农业技术相对于工业技术而言要容易掌握些，因此，实行农产品进口替代成功的可能性要大于工业品进口替代的可能性。二是农产品进口替代成本较小。在发展中国家，一般是资本稀缺而劳动力丰富，通过农产品进口替代而增加农业生产可以利用无限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这既解决了劳动力就业问题，同时也节省了大量资本。

当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农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的相对地位逐渐下降，从而农业部门的创汇能力相对减弱。同时，由于农产品的收入弹性低，工业代用品的不断出现，长期专门从事一种或几种经济作物的出口将会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从发展中国家

几十年的实践来看，专门出口一两种农作物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常常处于不利的地位。因此，这就要求一个国家对农业出口战略和发展战略作出通盘的长期考虑。

### 三、农业剩余的转移

以上从产品、市场、要素和外汇四个方面讨论了农业在工业化过程中的重要贡献。其实，这些贡献可以归结为一个贡献，即农业剩余的贡献。这里所说的农业剩余是指农产品剩余，即农业总产量与农民总消费量之间的差额。显然，没有农业剩余，就不可能购买工业品以扩大工业需求，不可能为工业扩张提供资本和劳动力，不可能有农产品出口。总之，没有农业剩余，就不可能有工业的发展，不可能有工业化。

农业剩余来自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这将在下一节中讨论。在这里，我们假设农业剩余始终存在，讨论一下农业剩余是怎样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城市非农业部门的。

通常的转移是通过价格调整来实现的。这里我们讨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改变贸易条件使其不利于农业。设  $P_a$  为农产品价格指数， $P_i$  为工业品价格指数，于是，贸易条件定义为  $P_a/P_i$ 。贸易条件的下降意味着农民在购买一个既定数量的工业品时必须在市场上销售更多的农作物。这样，农业剩余就通过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下降而转移到非农业部门中去了。降低贸易条件可以运用如下方法：对专供农民使用的工业品（如化肥）进行征税；国家通过价格控制使工业品价格上升得比农产品价格更快；或者允许工业品价格上升而使农产品价格固定不变。

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依靠降低农产品价格来调动农业剩余，付出的代价太高。因为这会使农民实际收入和生活状况恶化，积极性受挫，农业生产萎缩，从而使农业剩余的源泉枯竭。这种竭泽而渔的方法曾在有些国家实行过，但实践证明它不是调动农业剩余的好方法。

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赞成用价格刺激办法来转移农业剩余。通过价格机制调动的农业剩余被称为市场剩余。当贸易条件向有利于农业的方向变动时，市场剩余就会增加。这可以借助图 6.1 来说明。

在图 6.1 中，横轴计量工业品，纵轴计量农产品。 $I_1$ 、 $I_2$  为两条无差异曲线，表示农民对两种产品的不同偏好程度。 $AL$ 、 $AM$  为两条预算线，表示两种产品的不同贸易条件。 $PP$  为价格—消费曲线，表示农产品价格与农民对农产品的消费之间的关系。如果没有贸易，农民将把  $OA$  数量的农产品全部自己消费掉，这时农业剩余就等于零。如果农民需要工业品，他们就必须放弃一部分农产品与之交换，于是农业剩余便产生了。

现在，假设农民对两种产品的最初偏好用无差异曲线  $I_1$  来表示，最初的贸易条件用  $AL$  表示。 $I_1$  与  $AL$  相切，决定最优的消费组合是  $OB$  数量的农产品和  $OD$  数量的工业品。这时，市场剩余为  $AB$ 。现假设农产品价格相对上升了，即贸易条件改善了，于是预算线将向右上方旋转，从  $AL$  外转到  $AM$ ，表示一定量农产品能买到更多的工业品。 $AM$  与一条更高的无差异曲线  $I_2$  相切，决定最优消费组合是  $OC$  数量的农产品和  $OE$  数量的工业品。这时，市场剩余为  $AC$ 。显然， $AC > AB$ ，表明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上升使市场剩余增加了。一般说来，随着农产品价格的相对上升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农民愿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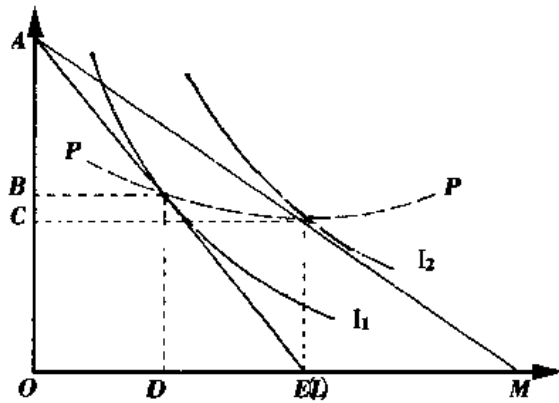


图 6.1 贸易条件与市场剩余

出售的农产品就越多，市场剩余就越大。但是，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只在一定限度内使市场剩余增加，超过这个限度，农民就有可能愿意消费更多的闲暇，劳动供给曲线就可能向后弯曲，引起价格—消费曲线在某一点之后向上倾斜<sup>①</sup>。

过去，有些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和发展经济学家坚持用降低农产品价格的办法调动农业剩余的依据之一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是无理性的，他们对价格刺激没有积极的正常的反应，或只作出反常的反应。这种观点已遭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反驳。有些学者所作的经验研究表明，几乎所有不发达国家的农民都对价格刺激有积极的正常反应：即当价格高时，供给的农产品就多，反之亦然。这些学者通常使用种植面积而不使用产量来检验农民对价格的敏感性。因为耕种面积的变化一般与产量变化一致，这种考察方法已被普遍接受<sup>②</sup>。

当然，价格政策不是调动农业剩余的惟一方法。实际上，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 and 货币政策也常常是转移农业剩余的手段。政府银行系统可以通过提高存款利率来吸引农民增加储蓄。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存款利率是相当低的，这就使得农民储蓄意愿极低。此外，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农业所得税很低，土地税占税收总额中一个很小的比例，通常不到 5%。因此，增加农业税特别是土地税还有充分的余地。

以上关于调动农业剩余的办法都是短期的措施。就长期而言，提高农业生产率，改善农民生产状况，即积极地发展农业生产，是调动农业剩余的根本性措施。

### 第三节 农业的发展

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农业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在工业化就是一切的 50 年代里，农业发展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在农业停滞的 60 年代里，农

① 加塔克，英格森特，农业与经济发展。见：格默尔编，发展经济学评述，英文版，1987，349

② 加塔克，发展经济学导论，英文第 2 版，1986，223

业的重要性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但这种认识还是被局限在为工业化提供剩余这个范围内。这个阶段“仍然被城市偏向（urban bias）所支配，因为资源配置给农业部门主要不是为了提高经济福利，而是由于它使用这些资源来支持城市工业增长。农村部门的发展得到拥护，但不是为了在那里生活和工作的人民。”<sup>①</sup>

到了70年代，在不少发展中国家，由于城乡发展极不平衡，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城市失业日益严重，穷人更加贫穷，那种以工业化为中心的发展理论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转折。70年代以前，经济发展的目标就是国民收入的增长，进入70年代后，改善穷人的生活状况，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公平地分配收入和财富与经济增长一起成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要达到这些目标，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因此，从70年代开始，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农业发展的认识又深入了一步。农业发展不仅仅是加速工业化的一种工具（为工业化提供剩余），而且本身也是目的（为穷人提供更多的就业和收入）。发展经济学家迈耶指出：“如果在过去发展的几十年中，农业发展具有工具价值（instrumental value），那么，在未来几十年里，它必须具有本身的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sup>②</sup>

随着对农业发展意义认识的逐步深化，关于农业发展的文献越来越多。农业发展理论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怎样转变传统农业？

## 一、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

在发达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已经消失，农业与其他部门一样现代化了。但在发展中国家，现代农业还只占农业部门的一个极小的比例，传统的、落后的农业仍然占支配地位。

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相比，具有许多不同的特征，但一般认为，技术停滞是传统农业的最基本特征。美国著名农业经济学家舒尔茨是这种看法的主要支持者。他在60年代中期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观点：传统农业虽然贫穷但有效率。这就是说，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虽然农业生产率低，但要素配置已达到最优状态，“依靠重新配置受传统农业束缚的农民所拥有的要素不会使农业生产有显著的增加”<sup>③</sup>。根据这个观点，舒尔茨断言，技术停滞是传统农业落后和贫困的主要原因。不在农业中引入现代技术就不能把传统农业转变成为现代农业。

按照舒尔茨的解释，所谓技术停滞是指在一个贫穷的农业社会里，农民世代都同样地耕作和生活。他们年复一年地耕种同样类型的土地，播种同样的作物，使用同样的生产要素和技术<sup>④</sup>。

传统农业的技术是原始的、简单的、落后的。那么，传统农业中农民为什么祖祖辈

① 迈耶编，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英文第4版，1984，439

② 迈耶编，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英文第4版，1984，431

③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31，29

④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31，29

辈都使用这种原始的农业技术而不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呢？印度发展经济学家加塔克对传统农业的技术停滞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sup>①</sup>。他把农业技术长期停滞的原因归纳为六个方面。

### （一）缺乏适宜的替代技术

传统农业的特点是劳动力充裕，资本稀缺，生产规模狭小，农民文化水平和技术水平低下。在这些条件下，西方现代农业技术是不适宜直接运用到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上的。当然，适合当地农业条件的生产技术不是完全没有发明出来。实际上，绝不是所有的技术创新都包含着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或者应用它们时需要很大的投资和很高的技术。例如，用高产良种代替传统品种，或引进以往从未种植过的新作物等技术，对发展中国家农业还是适用的。

### （二）农民对技术缺乏知识和了解

农民为什么不采用这些适宜技术呢？这是因为农民对这些技术缺乏了解。当然，传统农民文化水平低是一个重要因素。除此之外，技术信息传播不畅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发展中国家，大多数农业人口居住在离城市很远的偏僻地区。在这些地区，交通运输极为不便，邮电通讯设施严重缺乏，广播、电视、报纸、书籍等一切宣传媒介难以进入。此外，农民极度贫穷也是传播技术信息的重要障碍。农民无钱上学念书，负担不起到外地寻求新技术的培训费用，也买不起收音机和电视机、报刊书籍等传播技术信息和知识的媒介工具。

诚然，还有一种办法能使农民获得新的技术信息。这就是政府直接委派专家顾问到乡村去推广新技术。但这也存在许多困难。一是吸收和培训一定数量的农业技术人员是很难的。合格的技术人员和专家需要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又不愿意去乡村过艰苦的生活。二是向高度分散的小农传播信息的成本很高。他们大都住在边远的山区，交通极为不便，往返费用相当大。

### （三）承担风险的能力很低

根据上述理由就断言农民对适宜技术毫无所知也是错误的。实际上，现代很少有完全与世隔绝的农村社会，只是一些乡村比另一些更偏僻而已。农村与城市的联系始终是存在的，国家在推广技术方面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这样，有些适宜技术农民是知道的。不过，他们仍然不采用这些技术。这就促使人们去寻找其他原因。有些经济学家把这一行为归咎于农民的无知和无理性。但这个观点遭到加塔克的驳斥。他认为，农民不采用他们知道的适宜技术，不是由于他们无知，而是由于采用新技术要担当很大的风险。虽然传统技术的生产率不高，但它们的保险系数较大，因为传统农业技术是经过农民祖祖辈辈使用过和改进过的，重复使用熟练的技术比采用新的不熟练技术要有把握得多。例如，引进一个新作物品种，在具有管理经验的情况下，它的产量可能高于传统品种，但对于一个没有经验的农民来说，可能由于管理失误而只获得很低的产量，甚至颗粒无收。其次，如果引入一种新的农作物，其产量很高，但由于市场需求量陡然减少，

<sup>①</sup> 加塔克，英格森特．农业与经济发展．见：格默尔编．发展经济学评述．华夏出版社，1987

价格下跌，农民将遭受巨大损失。

按照西方经济理论，承担风险是企业经营的起码条件，利润就是承担风险的报酬。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与发达国家的农民是不同的，他们绝大多数都处在生存的边缘状态。因此，他们的目标不是寻求利润最大化，而是生存机会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最小化。他们知道，一旦采用新技术使农作物歉收，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就得饿肚子，甚至闹饥荒。所以，使用传统技术种植产量较低的作物比采用新技术种植产量可能较高的但又具较大风险的作物要保险些。

#### （四）投资资金缺乏

不是所有的新技术都有风险。例如，使用一种已被反复证明是有效率的良种是没有风险的。在这种情形下，农民是愿意采用新技术的。但是，他们十分贫穷，缺乏足够的资金来购买良种和化肥之类的新技术要素，致使他们无力采用新技术。当然，他们可以向金融机构和放款人要求贷款。但是，由于传统农民财产少，风险高，因而拖欠的可能性大，贷款者或不愿意或以极高的利率向农民贷款。这样，农民在金融市场上很难或不愿意获得信贷资金来扩大生产。资金市场的这些限制堵塞了传统农民的资金来源，因而阻碍了新技术的采用。

#### （五）现代投入品供给不足

假设农业部门存在着可以利用的新技术，农民了解并愿意采用新技术，通过储蓄或借款能够负担起它们的费用。即使这样，农民采用新技术仍然要受到物质投入如种子、化肥、农药及灌溉设施等供给瓶颈的限制。这些瓶颈可能是由于国内生产能力不足，或由于进口制约，或仅仅由于运输网不发达没有能力把这些农业生产资料及时运到农民手中。这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是常常存在的。

#### （六）传统制度的障碍

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传统的僵化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例如，在发展中国家，贫穷的农民几乎没有政治权力来影响国家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土地分配极不平等，大多数农民靠种一小块自有地和租种地主土地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租佃法对佃农增加生产通常很少提供刺激，有时以实物付租的佃农对大地主存在依附关系。在有些情况下，地主还充当佃农的债权人，对他们索取很高的利息。结果，佃农被沦为农奴地位，半封建地主通过高利贷和土地所有权对佃户实行双重剥削。此外，由于市场制度不完善，农民很少能直接进入商品市场，他们往往还要受中间商和经纪人很重的盘剥。这一切都减少和削弱了农民采用新技术的刺激。

技术停滞造成严重的后果。虽然传统农业技术是保险的，而且也是有效率的（要素配置达到最优），但是，这些技术具有生产率低的缺陷。用传统技术种植传统的作物品种与用现代技术种植改良的品种相比，单位产出要低得多，这说明传统农业的土地生产率很低。另一方面，由于农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在技术停滞的情况下，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像土地生产率一样低。很低的农业生产率必然导致很低的农业产量，使得农民的收入不是由边际生产率决定，而是由平均生产率决定。每个家庭成员共同分担一份工作，共同分享有限的生产成果，否则，他们中有人就会遭受饥饿的威胁。

综上所述，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是技术停滞，它产生的后果就是农业生产率低下和生活贫穷。因此，要改变传统农业，首要的是必须把新的技术进步引入农业生产体系中。

## 二、技术进步

### (一) 农业技术进步的涵义

所谓农业技术进步是指一个固定数量的农业资源能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或者说，一个既定数量的农产品只需要比以前更少的农业投入。图 6.2 描述了农业技术进步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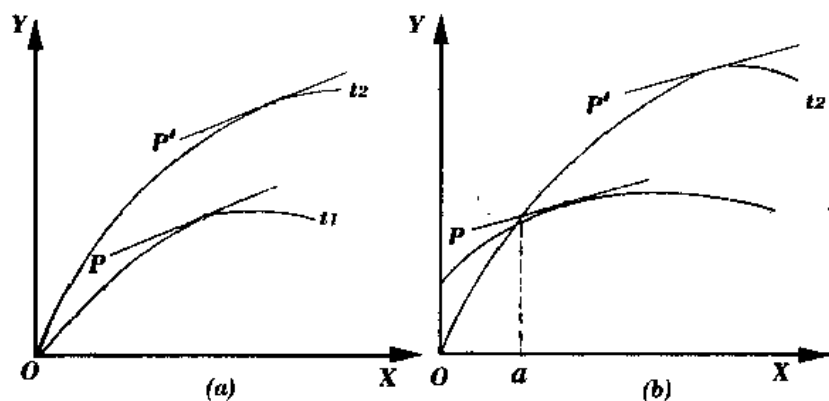


图 6.2 农业技术进步

在图 6.2 中，横轴  $OX$  代表一种可变农业投入，纵轴  $OY$  代表一种农产品产量。 $t_1$  和  $t_2$  为两条总产品曲线，表示产出  $Y$  对投入  $X$  的函数关系； $t_2$  位于  $t_1$  的上方 [图 6.2 (a) 从 0 开始，图 6.2 (b) 从  $a$  开始]，表示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既可以体现在固定投入中，也可以体现在可变投入中。假设  $X$  为化肥投入， $Y$  为小麦产出， $t_1$  表示使用传统小麦品种的总产量曲线， $t_2$  表示使用新型高产小麦品种的总产量曲线。在这里，技术进步体现在固定投入种子上，因为在每一个单位化肥投入上产量增加了 ( $t_2$  位于  $t_1$  的上方)。从图 6.2 中看到，新品种比老品种对化肥反应大。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①新品种的单位化肥产出高于老品种的单位化肥产出。在图 6.2 (a) 中，一开始  $t_2$  就高于  $t_1$ ，在图 6.2 (b) 中， $t_2$  在  $a$  点之后高于  $t_1$ 。②新品种的化肥使用率高于老品种的化肥使用率。这反映在  $P'$  与  $t_2$  的切点位于  $P$  与  $t_1$  的切点之后。在这里， $P$  与  $P'$  的斜率表示化肥对产出的价格比率。 $P$  与  $t_1$  相切表示最低成本均衡。 $P$  与  $P'$  相平行表示价格比率在两种技术中是相等的，这意味着化肥使用量的变化与价格变化无关，而纯粹是由种子对化肥的反应程度引起的。

技术进步也可以体现在可变投入上。假设小麦品种没有变化，但化肥的质量提高了，使产量增加了，这时， $t_1$  与  $t_2$  表示两种不同质量化肥的总产量曲线。

### (二) 农业技术进步的道路

在农业发展史上，技术进步基本上反映了农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在土地丰富而劳动稀缺的国家里，农业技术是按照代替劳动的方向发展的，被称为劳动节约型技术；另一方面，在土地稀缺而劳动丰富的经济中，农业技术是按照代替土地的方向发展的，因而被称为土地节约型技术。一般认为，劳动节约型技术是与机械技术相一致的，它被设计用来促进动力和机器对劳动的替代。这种技术同时也包含了土地对劳动的替代，因为通过机械化提高人均产出要求每人耕种更大面积的土地。机械技术进步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土地节约型技术是与化学和生物技术相一致的，它被发明出来促进劳动和其他投入对土地的替代。这种替代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化肥等投入提高土壤肥力来实现。生物技术进步导致土地生产率的提高。

当然，机械技术与生物技术不可能严格地区分开。实际上，不是所有的机械技术都是节约劳动的，只提高劳动生产率；也不是所有的生物技术都是劳动耗用型的，只提高土地生产率。例如，机耕被发明用来作为深耕的一种手段，从而增加了每单位面积产量；除草剂的使用代替了人工锄草，从而节约了劳动。由此可见，机械技术的发展可能是土地节约型的，而生物技术的进步可能是劳动节约型的。但是，农业发展实践表明，节约劳动的主要因素是机械化过程，节约土地的主要因素是生物革新。

### （三）诱导的技术与制度变革

如上所述，农业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决定了农业技术发展的道路。从这一历史事实中，日本农业经济学家速水佑次郎和美国农业经济学家拉坦在 70 年代初共同提出了一个所谓的诱导的技术与制度变革理论（theory of induced technical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这个理论在农业发展经济学中影响颇大，并且引起了争论。

该理论把农业技术的变化看成是由市场力量引导的。其中心论点是：要素供给的相对稀缺导致要素价格变化，要素价格的变化导致技术进步的变化，实现廉价的（丰富的）投入品对昂贵的（稀缺的）投入品的必要的替代。例如，在劳动力稀缺的经济中，劳动价格相对昂贵将会引起用机器代替劳动的技术变革趋势的出现；在土地稀缺的经济中，土地价格相对昂贵将会引诱用更多的劳动、化肥、良种等投入代替土地的技术变革倾向的发生。

诱导的技术变革模式可以用图 6.3 来说明。这个模式是与私人 and 公共研究机构的研究的资源配置过程相一致的。这就是说，当农业发展要求更多的机械技术时，研究的资源就被引导到机械技术的研究。反之，当生物技术被需要时，研究的资源被投入生物技术的研究。

图 6.3 (a) 表示机械技术发展过程。 $I_0^*$  代表零期的变革可能性曲线（innovation possibility curve），它是一系列较无弹性的单位等产量曲线的包络线，每条曲线对应着一种机械技术，越是往右的曲线机械化程度越高。假设零期的土地—劳动价格比率由  $BB$  线表示。于是，一种机械技术（譬如说收割机）被发明出来，由图 6.3 (a) 中的单位等产量曲线  $I_0$  表示。 $I_0$  与  $BB$  相切于  $P$  点，在这一点上，生产一单位产出所需的劳动和土地以及非人力动力配置达到最优状态（即成本最小）。一般地说，使人均耕种面积扩大的技术需要较高的畜力和机械力（如电力、发动机）。这意味着土地和动力之间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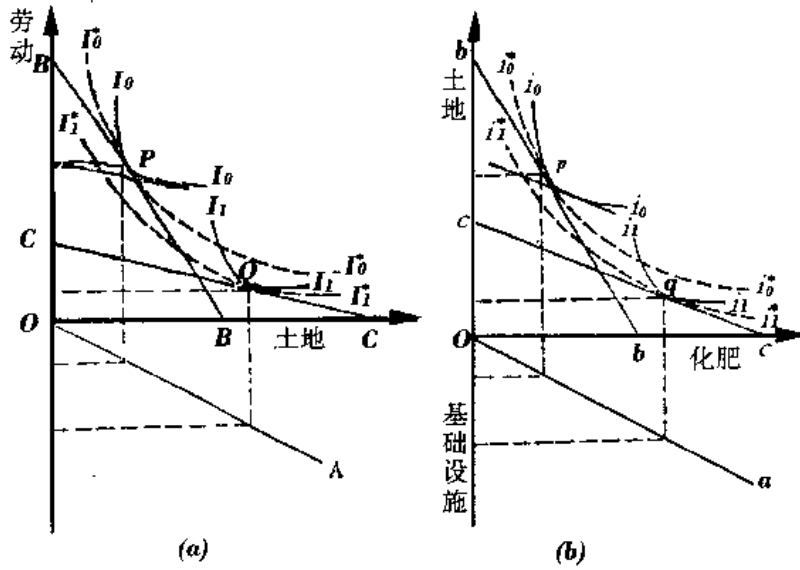


图 6.3 诱导的技术变革模式

互补关系，这一关系如图 6.3 (a) 中下半部的  $OA$  线所示。与劳动和土地最优配置相一致的动力投入由横轴和  $OA$  线的垂直距离来表示。这样，当劳动价格相对于土地和动力价格提高时，土地和动力一起被假定代替劳动。

在图 6.3 (a) 中， $I_1^*$  代表第一期的变革可能性曲线。它位于零期变革可能性曲线  $I_0^*$  下方，意味着第一期与零期相比，农业生产率提高了，生产一单位产出所需的资源减少了。假设农业发展从零期进行到第一期，劳动相对于土地变得更稀缺了，这可能是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转移到工业的速度大于人口增长率。结果，地租相对于工资率下降了。还假设动力价格相对于劳动工资率下降了，这可能是由于工业的发展使动力源的供给更加丰富和便宜。于是，土地—劳动价格比率从  $BB$  下降到  $CC$ ，导致一种新的机械技术（譬如说是康拜因）的发明和应用。这一新技术用单位等产量曲线  $I_1$  来表示。它与  $CC$  相切于  $Q$  点，决定了资源的最优配置。显然，与零期相比，生产一单位产出的劳动减少了，土地和动力增加了。这是劳动稀缺诱导的技术变化的结果。

生物技术进步过程由图 6.2 (b) 来表示。在这里， $i_0^*$  表示零期的变革可能性曲线，它是一系列较无弹性的单位等产量曲线的包络线，每条曲线对应着一种不同的生物技术，这里用作物品种代表。越是靠右的单位等产量曲线所表示的生物技术对化肥的反应越大。假设零期的化肥—土地价格比率是  $bb$ 。于是，一种作物品种（地方品种）被开发出来并投入使用，这种品种对化肥反应不大，由单位等产量曲线  $i_0$  所示。这时，最低成本的均衡在  $p$  点被决定了，生产一单位产出的土地、化肥和基础设施投入达到最优配置。一般说来，促进化肥代替土地的技术要求有较好的灌溉、排涝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因此，化肥与土地基础设施之间具有互补关系，这一关系由图 6.3 (b) 中下半部的  $oa$  线表示。这样，当作物品种对化肥反应很大时，化肥和基础设施共同代替土

地。

在图 6.3 (b) 中,  $i_1^*$  代表第一期变革可能性曲线, 它是第一期由作物品种表示的一系列无弹性单位等产量曲线的包络线。它位于  $i_0^*$  的下方, 表示农业生产率随时间变化而提高了。当土地变得相对稀缺时, 土地相对价格就会上升, 而化肥和基础设施价格因工业发展而相对下降。于是, 化肥—土地价格比率就从零期的  $bb$  下降到第一期的  $cc$ , 从而导致一种引进的新型高产且对化肥反应较大的作物品种的出现。这种新的生物技术由  $i_1$  表示。 $i_1$  与  $cc$  相切于  $q$ , 决定了资源的最优配置。显然, 与零期的地方品种相比, 第一期的新品种对化肥的反应要大得多 ( $q$  位于  $p$  的右边)。这是土地相对稀缺导致的结果。

速水佑次郎和拉坦指出, 诱导的技术变革是一个不均衡的动态过程。“在发展的动态过程中, 不平衡或不均衡的出现是引诱技术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制度中几个因素之间的不均衡造成瓶颈, 这些瓶颈把科学家、发明者、企业家和公共管理者的注意力集中在关于获得更有效的资源配置这些问题的解决上。”<sup>①</sup>

他们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其观点。在 19 世纪中叶, 美国农业中收割机的采用就是由种植与收割之间的劳动要求不平衡引起的。美国地多人少, 随着边界迅速地向西部推进, 农业劳动力越来越不足。在这样的条件下, 要想凭借人力在要求的短暂时间内把小麦作物抢收完是很困难的。于是, 科学家和发明者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收割机的研究上。但是, 一旦收割瓶颈被解决了, 耙草与扎捆又作为新的瓶颈出现了。于是, 自耙式收割机和扎捆机被发明出来了。之后, 收割的机械化还使脱粒成为瓶颈, 这又要求动力脱粒机的发明和采用。但通过这些技术变革的累积进行, 美国已成功地在农业生产上发展了机械技术, 促进了相对丰富的土地和资本对相对稀缺的劳动的替代。

在速水佑次郎和拉坦模式中, 制度变革也是相当重要的。就发展中国家而言, 诱导的技术变革受制度的阻碍。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缺乏适当的农业研究机构来促进技术变革的发生。因此, 必须进行制度改革来冲破这个瓶颈。速水佑次郎和拉坦认为, 组织和资助科学研究的主要责任必须由政府承担。这是因为: 第一, 发展中国家农业研究的预期商业收入太小且不确定, 因而不能吸引私人投资者。特别是, 私人部门不可能充分地满足自给农业的研究需要, 自给农业不得不依赖政府的公共研究来满足它的特殊要求。第二, 私人部门为了自身的利益, 主要偏重于资本密集型机械技术的研究, 而不愿从事土地和劳动密集型的生物技术的研究。这是因为机械技术比较容易受到专利法保护, 而生物技术是很难得到保护的, 例如高产良种很容易被别人偷偷地采用。但这种偏重于机械技术的研究显然不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由于地少人多, 加之资本不足, 这些国家农民需要的是土地和劳动密集型生物技术。由此可见, 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的研究需要由国家来承担。

诱导的技术与制度变革理论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传统, 它遭到结构学派经济学家的批评。美国经济学家贝克福特 (Beckford, G. L.) 指出, 速水佑次郎和拉坦的模式是在传

<sup>①</sup> 速水佑次郎, 拉坦, 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 英文修订版, 1985, 93



统厂商理论的一般框架里建立起来的资源配置模式。这个模式的关键就是存在一个与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相一致的竞争环境。这个竞争环境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是存在的,因而诱导的发展模式用来解释发达国家农业的发展是恰当的。但是,今天的不发达国家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与发达国家 19 世纪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是很不相同的。当今的不发达国家的市场制度是极不完善的,社会制度造成要素供给人为的刚性和资源使用形式的不灵活性。再者,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或多或少是开放的,这就使它们面临着外部的影响,从而破坏了要素秉赋和要素价格之间以及要素价格与技术变化之间的纯粹的联系。实际上,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技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发达国家引进的<sup>①</sup>。

#### (四)绿色革命

速水佑次郎和拉坦的诱导发展模式是以美国和日本的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美国土地丰饶而劳动力稀缺,因而农业发展遵循的是以节约劳动为特征的机械技术进步的道路。日本的资源条件刚好相反,土地稀缺而劳动力丰富,农业的发展走的是以节约土地为主的生物技术进步的途径。虽然采用的技术不同,但两国的农业发展都获得成功。

那么,从这些历史经验中抽象出来的诱导技术变革模式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呢?它适用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吗?贝克福特认为不适用,其理由是条件不同。但是,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中发生的“绿色革命”(Green Revolution)似乎证明了诱导的技术变革理论的有效性。“绿色革命”实际上就是一种生物技术变革,它的确反映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人多地少这个显著的特点。

60 年代后期,在墨西哥、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农业地区,大面积地推广和种植新型高产小麦和水稻品种,使粮食产量比过去大幅度增加了。这种以种子改良为中心、大规模提高土地生产率的活动被称为“绿色革命”。

绿色革命是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膨胀和农业停滞的巨大压力下发生的。由于大多数亚洲国家和一些拉美国家土地稀缺,通过扩大耕地面积来增加产出已是相当困难,因而,研究和发明提高土地生产率的生物技术就成为必要。于是,在 60 年代后期,一些新型的对化肥反应大的高产良种在墨西哥和菲律宾实验基地相继问世,并且以极快的速度在全世界适合生长的地区推广开来。例如,印度旁遮普地区,在最初引进高产小麦品种的 1966 年~1967 年度,种植高产小麦的面积占全部小麦播种面积的比例只有 3.6%,而到 1969 年~1970 年度,就猛增到 65.6%。巴基斯坦旁遮普的三个小麦产区,在 1969 年~1970 年度,73%的麦田播种的是墨西哥良种。

绿色革命具有一些显著的特征。首先,随着高产良种的大面积推广,化肥的施用量也迅速地增加。这说明高产良种对化肥的反应很大。其次,绿色革命技术是规模中性的,即无论是大农场还是小农场,新型高产良种的效率都是相等的。这一特点尤其重要,下而在讨论土地改革时,对此还要作进一步的考察。

绿色革命的发生给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带来重大影响。自 60 年代以来,

<sup>①</sup> 贝克福特,诱导的农业发展变革模式评论,见:艾切尔,斯塔茨编,第三世界的农业发展,英文版,1984.75

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口增长很快,农村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这些劳动者因在农村找不到新的工作机会而纷纷流入城市,从而导致了城市失业问题的严重性。60年代中后期,发展中国家引进新型高产良种以后,农业劳动投入需要量增加了,这是因为新型高产良种的生长需要更加精耕细作,在播种、育苗、栽种、除草、施肥、灌溉、排涝、杀虫、收割、脱粒、储藏和运输等整个一套生产工序上所需要的劳动比传统品种大好几倍。此外,由于新型高产良种生长期比传统品种生长期要短得多,原来一年种植一熟作物,现在普遍建立了两熟、三熟作物种植体系。这样,土地更加集约化使用,需要的劳动量就相应地增加了很多。最后,由于高产良种对化肥、农药和水分等需要量大,新良种的广泛使用产生了很大的联系效应。农业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和水利设施的兴修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由此可见,绿色革命的发生大大地缓和了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流动和失业问题。

绿色革命开始以后,在大面积地种植新型高产良种的国家和地区,粮食产量大幅度增加了。埃文逊(Evenson, R. E.)估计,在1974年~1975年作物年度,所有发展中国家大米的总供给大约比60年代中期以前把同样总资源用于传统品种的生产所达到的大米总供给要多12%<sup>①</sup>。仅在哥伦比亚,1966年~1974年,现代水稻品种种植面积从10%上升到99%,每公顷产量从3.1吨增加到5.4吨,总产量从60万吨增加到157万吨。

粮食生产的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是最有利的。因为穷人的粮食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远高于富人,所以,粮食供给增加和粮价低廉使穷人获得的利益大于富人。实际上,70年代粮食生产的增加大大缓和了已经发生绿色革命地区的饥荒程度。

绿色革命的发生还大大缓和了粮食价格上升的幅度。50年代~60年代,发展中国家人口剧增和工业化加速发展,对粮食需求急剧增加。但由于农业停滞,粮食供求缺口极为突出,粮食价格大幅度上涨,通货膨胀极为严重。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绿色革命带来的粮食增加不足以阻止粮食价格上涨趋势。但是,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绿色革命的发生,粮食价格将会上涨得更高。

绿色革命也产生了一些负作用。最重要的负作用是收入分配不均现象恶化了。虽然小农和佃农的绝对收入水平在农业产量增加时上升了,但上升的幅度大大低于大地主和大农场主收入上升的幅度。也就是说,小农和佃农的相对收入水平下降了,收入差距扩大了。这是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占有权极不平等,占人口极小部分的大地主占有了大部分耕地。佃农通过采用新良种而获得的额外收入大部分作为增加的地租倒入了地主的粮仓。此外,那些从事大规模生产的大农场主在资金、外汇、市场、税收和公共服务方面比小农占有绝对优势。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更优惠的银行贷款用于农业投资,可以从政府和研究机构中获得更多的新技术信息,可以垄断和操纵当地的农产品市场以获得垄断利润,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更多的外汇和补贴,从公共的基本建设如水利工程设施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因此,虽然有证据表明,新型高产良种在技术上是规模中性的,但大农场凭借自己的优越地位可以从绿色革命中获得比小农更大的利益。

另一方面,绿色革命的发生也导致了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的扩大。在土壤、气候、温

<sup>①</sup> 拉坦·绿色革命:七个结论·国际发展评论,1977(12)

度和地理位置适宜于种植高产良种的地区,农民收入水平较高;而不适宜的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很低。这种地区收入不平等现象不仅存在于一个国家不同的作物区,而且也存在于不同的发展中国家之间。显然,在没有受到绿色革命影响的地区,如非洲地区,饥荒问题是最严重的。

绿色革命也导致了土壤肥力的下降和环境污染。对化肥的过度依赖使得土壤肥力下降,而肥力下降使得产出的增加更依赖化肥的投入,化肥已成为土地生产率的强心剂。此外,化肥和农药的大量生产和施用还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农用薄膜的使用造成了白色污染,因为薄膜不易腐烂,长期存留在土壤中,形成永久性的污染源。

### 三、土地制度与土地改革

改造传统农业有赖于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这两者缺一不可。一种新技术被发明出来了,试验成功了,但它不一定能迅速地、顺利地大面积推广开来。绿色革命虽然在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生了,但不是所有条件适宜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都采用了新技术或充分地发挥了这种新技术的潜在效率。这是因为传统农业中农民缺乏必要的刺激,其主要原因在于不公平的土地占有制度。由此,改革现行的土地所有制就成为改造传统农业的必要条件。

#### (一) 土地占有形式与经济刺激

在落后国家中存在着多种多样的土地所有制。但就大土地所有制而言,主要有四种形式,它们的激励机制一般都比较差。

##### 1. 大庄园制

这种制度在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广泛地存在着。它的主要特点是,大庄园既是一个大地产,又是一个大农场,但庄园主一般不直接管理农场,而是把庄园委托给雇来的代理人,一般叫管家。庄园的耕作方式因地多人少,往往采取粗放型经营。庄园制是罗马帝国时代奴隶耕作的大农场的直接继承,带有农奴制性质。大庄园制对农业劳动者来说显然没有刺激。为庄园干活的人或为佃农,他们是作为徭役地租而为庄园主劳动的,因此无任何报酬;或为少地的小农,无地的外来穷苦移民,他们所得报酬极低。这些劳动者所作出的努力程度与他们的所得没有多大关系,当然没有生产积极性可言。不仅如此,大庄园主拥有土地财产是为了土地财产本身,因为土地财产是权势和地位的象征,而不是凭借对土地垄断权来增加农业生产,获得更大的利润。因此,在大庄园制下,土地所有者对改进和提高农业生产率的农业技术不大感兴趣。结果,这种土地制度的效率很低,农业生产率不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大农场,甚至还低于它们周围的小农场。

##### 2. 种植园制

这是一种带有殖民地性质的土地所有制形式。与庄园制一样,它既是大财产,也是大农场,但它一般是由外国资本家所有,且由外国专家管理,农业劳动力都是雇来的当地工人。农场上一般生产一种或几种经济作物,如橡胶、可可、咖啡、蔗糖或棉花等。农产品通常销往国外。种植园制在亚非拉各国特别是热带国家广泛存在。种植园比大庄园的生产率高,因为前者对现代农业技术的采用要高于后者。种植园主占有土地不是为了土地本

身,而是为了赚取尽可能大的利润,因而对采用新技术有一些刺激。但是,种植园使用雇佣劳动,这些工人无权参与管理,而只是在农场主的指挥下干一些被指派的工作。他们的工资水平由于没有其他就业机会而很低,与农作物生长的好坏。收成的多少,也没有多大关系。这样一来,农业工人对增加生产没有内在的动力。当然,农场主可以通过用机械代替劳动来减少监督成本,但机械化不可能完全代替雇佣工人的劳动。因此,就刺激而言,种植园制也是缺乏效率的。

### 3. 租佃制

这种占有形式在亚洲比较流行。它的特点是:占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地主占有土地,但自己不直接经营它们,也不雇佣管家和经理来管理,而是把它们分割成若干块出租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这些租地的农民就叫做佃农。佃农按照事先订好的契约向地主缴纳一定数量的货币地租或实物地租。有两种地租形式: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固定地租是指每公顷耕地的租金是不变的。分成地租是指将在租种的耕地上收获的农产品在地主和佃农之间根据订好的契约分成。这种租约形式使得地主和佃农的所得都取决于收成的好坏,即共同分担风险。租佃制一般经营规模较小,工作方式是劳动和土地集约型的。这里所说的租佃制是封建性质的,它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租佃制是完全不同的。就对农业生产者刺激而言,一般认为,租佃制比大庄园制和种植园制更大一些,因为佃农付出的努力一般是与获得的报酬有一定关系的。但是,租佃制仍然是缺乏刺激的。在封建半封建制度下,由于缺乏其他工作机会,农民只得靠种田为生。地主凭借对土地的占有而对佃农索取高额地租,地租率一般达到一半甚至一半以上。这就意味着佃农每年生产的成果一半或一半以上交给地主。这当然也抑制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采用新技术的动力。不过,有些学者认为,分成制不一定对农民刺激具有抑制作用。相反,在农业生产率低下的情况下,佃农与地主都愿意实行分成制,因为双方共同承担农业生产中的风险,且交易成本较低<sup>①</sup>。固定地租契约一般说来刺激要大一些,因为农民增加的产物都归自己所有和享用。但实际上,由于租佃期短,地主可以经常改变租金,因此,固定租金也是不固定的,经常变化的,对农民积极性的抑制仍然是很强的。

从以上分析中可知,无论是庄园制、种植园制还是租佃制,都是私有制,对农业生产者都缺乏刺激,因而农业生产率低下。

### 4. 公有制

私有制是无效率的,但公有制是否有效率呢?传统观点认为,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是抑制农民生产积极性和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根源。只要消灭了土地占有的不平等,农民的生产热情就会迸发出来。公有制是消灭土地占有不平等的最好途径。于是得出结论,土地公有制是最有刺激的制度。的确,土地公有制消灭了剥削的根源,从而为解放生产力,提高农民的生产自觉性和主动性提供了可能。但是,这种可能性不等于就是现实性。很多国家曾经采用过土地公有制。但农民的积极性并没有调动起来。最关键的问题是,公有制并不能保证农民的付出与其所得相对应。虽然消灭了剥削,但农民并没有从多劳中获

<sup>①</sup> 速水佑次郎,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英文修订版,1985,389~398

得更多的报酬。假设一个村庄有 50 户农民,实行集体经营,统一分配。在这种制度下,一个农民付出的努力所得的报酬只是他应得的 1/50,因此,他不会去努力工作。中国目前实行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就是为了解决土地集体所有制下缺乏刺激问题而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有效经营方式<sup>①</sup>。

## (二) 土地改革的目标与形式

当一个国家的土地制度严重地束缚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时,土地改革对于增加刺激和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与农业发展就变得必不可少。

土地改革的目标是多重的。其政治目标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巩固现有政权和消灭剥削制度;其社会目标是为了实现社会公正和平等;其经济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有刺激性的土地制度,解放生产力,加快现代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促进农业生产的持续快速的生长,以满足改善农民生活状况、促进工业化的要求。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土地改革的经济目标。

土地改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土地改革即指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即把一部分人(地主)占有的耕地转移给另一部分人(佃农和少地农民)所有。广义的土地改革不仅包括土地所有权的转移,而且还包括土地租佃契约的改变。从广义的角度来说,土地改革有以下四种形式。

### 1. 地租契约期限的限定

这种改革只涉及到租佃契约的法律规定,而不触动土地的占有关系。在租佃制下,地主凭借对土地的垄断可以随意地抬高地租或驱逐佃农。这样,佃农的生活难以得到保障,对改进农业技术、增加农业投入没有积极性。为了促进现代农业技术的采用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保障佃农的生活稳定是必要的。国家可以通过法律规定租佃契约签订的最短期限。譬如说不能短于 20 年,而且规定租约期限内,地主不得擅自毁约和增加地租。

### 2. 降低地租

这种改革也只涉及到租佃关系的法律规定,而不涉及土地占有关系的改变。但这种改革要比契约期限的改革激进一些,因为它不仅剥夺了地主随意撤佃的权力,而且还直接把地主的一部分收益转移给农民,使地主的福利减少。例如,中国台湾省在 50 年代初进行的土地改革措施是,规定地租不得高于 37.5%,大大低于原来的 50% 以上的租金率。

### 3. 土地有偿转移

这种形式的土地改革涉及到土地所有权的再分配,但失去土地的地主可以得到全部或部分补偿。政府可以通过一项改革法令,规定每个农户能够拥有最高限额的土地面积,迫使地主以政府规定的价格出售超过这个限额的所有土地。显然,这种土地改革比前两种租佃关系改革要激进得多。如果改革是彻底的、成功的,那么,这种改革将摧毁地主对土地的垄断权和土地占有的不平等。不过,这种改革只是涉及到财产所有权的再分配,而未触及或完全触及收入再分配。

### 4. 土地无偿剥夺

这是各种土地改革中最激进的形式。这种土地改革分为两类:一类是把大土地所有

<sup>①</sup> 郭熙保,《土地制度变革与农业发展》,见:《农业发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

者(地主、大庄园主和种植园主)的全部地产转移给以前的佃农和雇佣劳动者,但不给他们以任何的物质和货币补偿。这是小农对大农的剥夺,小私有制对大私有制的替代。另一类形式是把土地私人占有变为集体或国家所有。这种土地改革是被剥削阶级对剥削阶级的剥夺,是公有制对私有制的替代,是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转变。要进行这种土地改革,一般要求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前提条件。

### (三)土地改革的意义

土地改革即使是温和的形式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政权的力量、阶级结构、历史背景和外部环境等诸种因素。有鉴于此,一些国家的土地改革取得了成功,另一些国家的土地改革则没有取得成功。就成功的土地改革而言,无论何种形式,它都削弱了或者消除了大土地所有者对土地的垄断权。

土地改革无疑促进了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业新技术的采用。但是,土地改革还有其他重要意义。曾经有一个时期,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偏重于从经济增长的角度去看待经济发展,以后,经济发展的目标多元化了,不仅经济增长,而且就业增加、收入分配公平和贫困的消除都成为经济发展的目标。显然,土地改革对实现这些目标都起着积极作用。就收入分配而言,土地改革的意义是直接的,把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农民,这本身就是财富平等分配的一种形式。对于消除贫困,土地改革的作用也是很清楚的。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农业收入落后于工业收入,贫困主要集中在农村地区,而农村中的佃农和无地劳动者是贫困中的最贫困阶层,这些人获得一份土地,不言而喻,生活状况将会得到改善。从就业增加方面来说,土地改革也是有影响的。把大农场分割成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场,将会增加每单位土地面积的劳动投入,因为小农场主要依靠土地和劳动集约式经营来增加生产。

### (四)农场规模与效率

如前所说,土地改革提高了农民的生产刺激。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土地改革有可能使农场经营规模缩小。这是否就牺牲了规模效率呢?关于这个问题在学术界是有争论的。有一派观点认为,土地改革将引起农业生产效率下降。其理由是,土地改革从通常意义上说就是把大地产分成小地产,把大农场变成小农场。按照规模报酬递增原理,小农场与大农场相比,生产效率要低。具体地说,大农场具有如下优势:

第一,有些不可分的大型农业机械如联合收割机等,虽然能大大提高农业产出,但一次性投资太大。对小农场来说,大型机械利用不足,且每单位产出分摊成本较大;对大农场来说,机械能充分利用,且每单位产出分摊成本较小。

第二,有些现代农业技术虽然潜在效率很高,但投资大,风险也很大。小农场资本小,承担风险的能力弱;相反,大农场资本雄厚,承担风险的能力强。因此,大农场比小农场更容易、更迅速地采用现代农业技术。

第三,农业经营规模与管理技术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大农场能够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管理,而小农场则难以做到这一点。

第四,小农场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兴修水利基础设施,如修筑道路、桥梁等,但大型农业生产单位则可以并且愿意从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譬如,修一座水库,若下游的农田全部

或大部分属于一个大农场,那么,这个农场就会积极地从事水库的修建;但若下游的农田是由许多小农场耕种,那么,谁也不愿意投入资金和劳力来修建水库,因为谁也不能享有灌溉的所有利益,这就是经济学所说的外部效应<sup>①</sup>。

但是,也有许多西方学者否定了这个观点。他们认为,这个观点只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农业,而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农业,因为两种农业的条件是完全不同的。在传统农业中,小农场比大农场更有效率。其理由如下:

第一,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特别在亚洲各国,土地是相当稀缺的,而劳动是无限丰富的。在这样一种资源条件下,大农场显然没有使资源得到充分而有效的使用,因为它们倾向于用更少的劳动经营更多的土地。这样,一方面,土地的生产潜力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土地生产率低);另一方面,丰富的劳动没有得到充分的使用(存在着剩余劳动)。但小农场不同,它们倾向于用较多的劳动在较少的土地上实行集约化经营。结果,劳动得到生产性就业,土地生产率也很高。

第二,在传统农业中,由于劳动和土地是主要投入,而资本投入很少,所以就不存在一个最低限度的投资规模。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规模报酬是不变的,也就是说,随着企业规模扩大而使单位成本下降的趋势不会发生;反过来,随着企业规模缩小而使单位成本增加的现象也不会出现。如上所述,绿色革命对农场规模没有偏向,即生物技术变革是中性的。这条理由是直接对小农场无效率论点的驳斥。

第三,大农场和小农场在目标函数上是不同的。大农场的目标函数是利润最大化,而小农场的目标函数是产量最大化。这是因为,小农场的经济基础薄弱,而农业生产又具有很高的不确定性,一旦遇上灾荒年份全家都得饿肚子。因此,小农场必须遵从生存原则,尽可能生产更多的粮食以防不测。而大农场不同,他们基础雄厚,即使遇上灾年也不会发生饥荒,因此,大农场遵从效率原则,尽可能多地生产利润。按照西方正统理论,利润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就劳动来说,就是工资等于劳动边际生产率。一旦劳动边际生产率小于工资,利润就会减少,农场主就不会雇佣更多劳动力了。但产量最大化原则则不同,它所要求的是尽可能多地使用劳动,直到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为止。也就是说,只要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增加劳动投入就是合算的。由此可见,小农场比大农场在更大程度上能实现土地集约化经营,吸收更多的劳动力就业,生产出更多的农产品。

第四,小农场比大农场更能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农民家庭分到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时,他们懂得生产是为自己进行的,因而,家庭中每个成员都会自觉地、勤奋地劳动,一丝不苟地从事每一项农活。这无疑提高了土地耕种质量,增加土地的产出。但是,大农场的土地财产属于大地主所有,被雇佣的劳动者认为他们是为别人干活,干好干坏与己无关。在这种情形下,劳动者的生产自觉性和努力程度肯定要差得多,从而土地收获也肯定要差得多。

关于农场规模与效率之间的反向关系,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不仅从理论上来说明,而且还力图用事实来证明。他们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农业生产规模与生产效率的关系作

<sup>①</sup> 郭熙保. 农业发展论.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5. 288

了调查研究。例如,贝利(Berry, R. A.)和克莱恩(Cline, W. R.)对巴西、肯尼亚、墨西哥、印度、土耳其等 20 个国家的农业统计资料作了国家间的横向比较,对巴西、哥伦比亚、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度、马来西亚 6 个国家的农业统计资料分别作了时间序列分析。这些研究得出的结果一致表明小农场比大农场更有效率。这里仅列出印度一个抽样调查材料,如表 6.2 所示。从表 6.2 中可见,在印度 1 772 个样本农场中,农场规模与每公顷收入成反比关系,10.12 公顷以上的农场平均每公顷收入只有 855 卢比,而 2.02 公顷以下的农场平均每公顷收入达 1 821 卢比。

表 6.2 印度样本农场技术特性(1970 年~1971 年)

农场规模 (公顷)	平均农场 规模(公顷)	土地使用 强度	种 植 强 度	水浇地 比例(%)	每公顷收 入(卢比)	样 本 数(个)
0~2.02	1.19	94.3	1.38	46.4	1 821	621
2.02~6.07	3.76	93.1	1.26	45.3	1 500	734
6.07~10.12	7.89	90.8	1.15	35.3	1 911	248
10.12 以上	17.24	85.2	1.00	24.6	855	169

资料来源:贝利,克莱恩. 发展中国家的土地结构与生产率. 英文版. 1979. 149

小农场更有效率观点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例如,印度学者加塔克和英格森特指出,一概断言小农场更有效率有些勉强。固定资本的投入是新技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在利用固定资本方面,大农场成本较低,利润较高。此外,即使这个观点是正确的,它也要受两点限制:第一,它只适用于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初期。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和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逐渐转移,农业劳动将变为稀缺,机会成本增加,从而,小农场的优越性就会消失。第二,它只对技术停滞的传统农业适用。随着技术进步的发生,大农场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可以从技术变革中获得比小农场更大的利益<sup>①</sup>。

实际上,就技术和经济而言,大农场肯定比小农场更有效率,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不应该成为反对土地改革的理由。在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土地改革的确使农场规模变小了,但同时也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民生产刺激所带来的农业生产增加可能会大大地超过土地经营规模变小所造成的效率损失。从这方面来说,我们认为,土地改革是有利于农业发展的。中国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把农业集体经营制度转变为家庭生产责任制,大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率和农业生产的增长,虽然土地经营规模比原来变小了。

#### 四、政策支持

土地改革是促进农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因为它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是,只有土地改革还不能保证农业发展的顺利进行,这已经为许多进行了土地

<sup>①</sup> 加塔克,英格森特. 农业与经济发展. 华夏出版社, 1987. 141~142



改革而农业仍然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实。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还必须为技术进步和农业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

已经指出,传统农业的技术停滞是由六个因素造成的,即适宜技术的缺乏,对新技术的不了解,采用新技术的高风险,资金的短缺,农业投入供给的不足,社会和政治制度的不平等。要使技术进步和农业发展得以发生,必须解决这六个问题。土地改革只能解决社会制度的不平等,而其他问题必须依靠其他政策来解决。

### (一)价格政策

涉及到农业部门的价格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农产品之间的比价,二是工农产品比价,三是农业生产要素之间的比价。关于第一种价格比率与这里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可以略而不论。关于第三种价格比率在技术进步一节中已作过论述,诱导的技术变革模式就是建立在农业要素相对价格变化这一基础上的。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农产品与工业品的价格比率的变化与农业发展的关系。

在70年代以前的唯工业化时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取降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的政策。支持这种政策的理由是:①农业生产对价格变化没有多大反应;②较高的农产品价格的主要受益者是大地主和大农场主;③高农产品价格特别是高粮食价格对低收入者危害最大;④为了加速工业化,农业部门必须为工业部门扩张提供尽可能多的剩余。

在6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农业处于停滞状态,这不仅恶化了农民的生活状况,也影响了工业化进程。在这一严峻现实面前,不少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不得不对过去的价格政策及其理论依据提出怀疑,重新考察有利于农业发展的价格政策。他们批评说:以上四条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首先,对一些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与价格变化的关系所作的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对价格的反应是很敏感的。其次,高价格对地主和大农场主有利的观点在土地改革前是正确的,但通过土地再分配,土地占有的平均程度提高了,第二条理由也就不成立了。再次,高粮价使收入低的阶层受害最大,这一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但可以通过其他措施来解决。最后,农业为工业化提供资本积累这一观点表面看来没有错误,但是,调动农业剩余不应该用降低农业贸易条件的办法来实现,因为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做法,此观点在本章第二节中讨论农业剩余转移时就已经说明。实际上,在贸易条件有利于农业的条件下,转移到工业的农业剩余反而比贸易条件不利于农业时更多。

改善农业的贸易条件能够促进农业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因为农产品价格的上升是增加农业收入的重要源泉,农业收入的增加就会相应地增加农业生产投资。如上所述,高产作物品种需要投入更多的化肥、农药,需要更好的排灌条件,总之,高产作物要求更多的农业投资。农业收入的增加将使农民有能力积累更多的资金,从而更迅速更有效地采用新技术。

提高农产品价格确实是一件很棘手的事。在发展中国家中,城市一般居民的收入水平都较低,将近一半收入要用在食物消费上。另外,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衣着也是家庭支出中的大项。如果农产品价格提高幅度过小,对城市居民生活影响不很大,但达不到改善农业的目的;如果农产品价格提高幅度过大,农业收入将会有有一个大的增加,但又会造成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引起市民不满和社会不安定。城市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的压力很

大,而工资的大幅度上升将导致恶性的通货膨胀。在这个两难的处境中,政府可以采取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改善农业又不降低城市居民生活水平。这种做法是,政府通过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把农产品收购上来,然后按照提价前的不变价格把农产品销售给市民。购销价格倒挂所产生的亏空由政府财政给以补贴。这种政策的缺陷是增加了国家财政负担。如果补贴数额过大,时间太长,国家财政可能难以承受,而且还会导致投机倒把活动盛行。因此,这种价格支持政策不宜长期使用。

对于农业的长期价格政策最好是保持农业的相对价格不变。当农业丰收时,国家可以大量收购农产品以防止农产品相对价格下降;当农业歉收时,国家可以大量抛售农产品以阻止农产品价格上涨。这种政策要求国家建立储备基金。这曾在发达国家实行过,但发展中国家至今还没有实行这种稳定农产品价格的政策,这也许是农业停滞的缘故。

## (二)投资政策

50年代~60年代,工业化的魅力几乎把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积累全部吸引到工业特别是大型工业项目建设,农业成了被计划者遗忘的角落。这种重工轻农的投资战略无疑是导致农业停滞的重要因素。70年代以来,农业停滞的现实唤醒了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使他们开始注意农业投资的重要性。

农业基本建设包括水利设施、道路桥梁、邮电通讯、仓储运输等项目。显然,农业基本建设对农业发展是相当重要的。首先,它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率。新型高产良种不仅需要化肥,而且对水的要求也很严格,若水利设施齐全,新技术采用就会大大提高作物单产。其次,农业基本建设能够增加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农业生产严重依赖自然条件,遇上干旱洪涝,作物就会大幅度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当农业水利设施被充分地建立起来时,农业生产就可以旱涝保收,农业收成的不稳定性和采用新技术的风险就会大大减少。第三,农业基本建设有助于农业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的下降。道路桥梁等的建设将会减少运输成本,仓库的建设防止作物霉烂变质,减少了农产品的耗损,这也等于减少了农业生产成本。第四,农业基本建设能迅速地传播和推广市场信息及新技术知识。农村邮电通讯的发展和广播网的建立将使农民更容易获得农产品市场行情和新技术信息。

农业基本建设需要大量资金。显然,很少有私人投资者愿意和能够投资于这些项目,因为这些项目建设周期长,而且无利可图。另一方面,从农业基本建设中受益的农民也不愿意而且也不可能对这些项目进行投资。之所以不愿意,是因为投资收益不能内部化,投资者不能独享投资收益;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没有一个农民拿得出如此巨大资金投资于农田水利工程、道路桥梁、通讯广播等基本建设。由此可见,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资责任只有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承担比较合适。

当然,国家主要负责农业大型项目建设,如跨地区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邮电通讯广播设施、主要公路干线铁路港口码头等。一些小型的、耗资小的、受益面窄的地方性农业基本建设应由农民自己来从事,如小水库、小水渠、乡村道路、仓库、桥梁等。实际上,在农闲时,农村中存在着大量闲置劳动力,这些人可以组织起来从事一些花钱少的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农业基本建设。这是一条行之有效的投资途径,它既解决了农村劳动力闲置问题,又提高了农业生产能力。

从广义上说,对农业投资还应包括对农业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前面已经提到,农业生产资料供给不足是农业技术停滞的原因之一。在绿色革命发生以后,农民对化肥、农药、灌溉设备等农用工业品的需求大大增加了。如果这些生产要素供给不能满足需要,新技术的效率就不可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当然,国家不必直接投资于农用投入品工业,但为了扶植这些工业的发展,使这些投入品价格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国家必须对这些工业企业进行必要的财政补贴。

### (三) 信贷政策

为了促进新技术的采用,国家不仅向农业基本建设进行投资,而且还有必要向农民提供必要的金融支持。

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农村还不存在像城市那样现代的金融机构和资金市场。实际上,农村的信贷活动是带有浓厚封建性质的。农村的主要放款人是高利贷者,他们往往对借款人索取很高的利率,少则 30% ~ 40%,多则高达 100% ~ 200%。这样高的利率几乎不可能用生产性投资收益来偿还,因为没有一项投资的净利润率能比这种利率高。因此,农民很少从高利贷者手中借款投资于生产,用于购买化肥、杀虫药、水泵等生产资料。只是到了生活难以为继时,他们才不得不向高利贷者借钱以度过眼前生活难关。但是,一旦农民负债,灾祸就会降临。沉重的利息负担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使农民难以还清高利贷者的债务。这样,农民就永远不能从贫困中挣扎出来,更谈不上对农业进行投资了。

在发展中国家,如果土地改革未进行,地主通常也充当佃农的债权人。在农作物收割之前,农民常常无米下锅,不得不向他的东家借款借粮以解燃眉之急,而地主借机索取高利率。等庄稼收割后,佃户不仅向地主缴纳地租,还得支付欠款和利息。结果地主通过高利贷和土地所有权对佃农实行双重剥削。佃农在打下粮食后所剩无几,根本没有多少剩余用来购买农业生产资料,如良种、化肥等。

由此可见,现行农村的货币市场严重地阻碍了农业新技术的采用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如果政府不对农业投资给以帮助,农业发展就会受到严重抑制。政府对农民的金融支持,主要是在农村设立由国家管理的农业银行和信贷机构。这些组织的资金来源一般由国家财政拨款,但也有一部分可以来自农民储蓄。它们的主要职能是以低息贷款方式驱赶高利贷者,鼓励农民对农业进行投资,促进新的农业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

### (四) 研究、推广和教育

向传统农业注入新技术是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土地改革为农民采用新技术提供了刺激,改善农业贸易条件、向农业基本建设投资 and 建立农村发展银行则为农民采用新技术创造了客观条件。但是,采用新技术必须首先有新技术的存在,而且,这些新技术必须通过某种途径传播到农民中去。最后,农民必须具有接受新技术的意愿和能力。前面已指出,缺乏适宜技术,农民对新技术不了解,以及采用新技术的高风险等都是传统农业技术停滞的原因。因此,这里我们阐述一下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对新技术的研究、发明、推广和农民教育等问题的看法。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中,对农业新技术的研究、推广和应用等问题作了系统

的开创性的分析。他认为,农业增长的关键在于新技术的采用。但新技术必须首先发明出来,然后加以推广,最后由农民运用到农业生产实践中去。这三个环节是紧密相连的,少了其中一个环节,新技术就不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舒尔茨把新技术的研究和推广工作作为新技术的供给,把在农业实验站工作的研究人员和在农业推广站工作的技术人员作为新技术的供给者。没有新技术的发明和传播,新技术应用就无从谈起,因此,他把新技术的供给看做是农业增长的首要条件。但是,由于新技术的供给成本较大,而供给者能获得直接收益小,私人投资者一般不愿涉足这个行业。考虑到它的社会收益大于社会成本,政府和非盈利机构承担新技术供给的任务是必要的。

当一项新技术被发明出来,并且已有效地传播到农民中去的时候,农民是否愿意接受它呢?即使他们愿意接受它,他们有能力把它有效地运用到生产中去吗?这就是新技术的需求问题。作为新技术的需求者,农民对一项新技术的接受速度主要取决于它在实践中产生的利益是否显著。如果新技术的采用被证明确实比传统技术获利更大,农民将愿意采用它。当然,在确定新技术的获利性时还必须考虑到它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把新技术运用到生产中去的重要约束是农民掌握新技术的能力。即使一项新技术极为简单,农民也需要学习。舒尔茨说,学习新的知识和技能一般可以采取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从经验中学习。这是一种代价高昂的方法,因为它可能在试验了好多次以后才学会新技术知识。同时,它也是一种学会如何最好地使用现代技术的非常缓慢的方法。

第二种方法是通过在职培训。这种培训活动可以由销售新农业要素(如新的品种、高效化肥)的企业和农业推广站之类的政府机构来进行,或由农民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这种培训可以利用特殊的短期培训班和业余学校,可以组织起来到先进地区参观学习。在职培训是在短期内获得某项技术的基本方法。

第三种方法是正规教育。这在长期内是最有效、最常见的方法。舒尔茨把这种方法看成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他指出:“本书研究的中心论点是把人力资本作为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迅速的持续增长主要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的投资,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sup>①</sup>农民教育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农业技术进步主要取决于农民的文化教育水平和掌握新技术的能力。发达国家能够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新技术援助和现代物质投入品,但不能提供技术农民,他们必须由发展中国家自己来培养。在当今发达国家,农业发达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教育水平高,具有迅速地掌握农业技术的文化素质。相反,发展中国家农业的落后与那里农民几乎处于文盲状况是密不可分的。

对农民进行投资需要在农村创办基础学校和农业技术学校,这就要求政府在物质上、经费上和师资上给予大力支持。只有在国家重视农民教育的时候,农民的教育水平和技术水平才能迅速提高。

---

<sup>①</sup>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132~133

## 第七章 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

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在 50 年代 ~ 60 年代的唯工业化时期，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一般都肯定这种人口流动 (migration) 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认为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可以提高整个经济的总生产率，从而促进了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当时西方发展经济学家主要关心的是如何加速这种人口流动的趋势，或者说如何消除这种人口流动的障碍。

到了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其主要原因是人口流入城市的速度和规模远远大于城市工业部门对劳动力的吸收能力。因此，这一时期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对早期人口流动理论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不受节制的人口流动对经济发展是有害的，它没有刺激经济增长和资本积累，反而日益加剧了城乡经济的不平衡，恶化了城市严重失业问题。由此，他们不赞成加速人口流动的政策，主张控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以缓和城乡不平衡和城市失业问题。

在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关于乡—城人口流动 (rural - urban migration) 或劳动力转移 (labor transfer) 的讨论颇多。在这一章中，我们主要介绍四个著名的人口流动模式：刘易斯模式、拉尼斯—费模式、乔根森模式和托达罗模式。

### 第一节 刘易斯模式

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在 50 年代中期提出了第一个人口流动模式。这个模式的提出很快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的兴趣和争论。之后，在这个模式基础上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人口流动模式。

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非资本主义部门，另一个是以现代方法进行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资本主义部门。前者以现代农业部门为代表，后者以传统的工业部门为代表。刘易斯认为，经济发展依赖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需要农业部门提供丰富的廉价的劳动力。以下介绍刘易斯两部门经济发展模式是如何建立的。

## 一、无限的劳动供给

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题为《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sup>①</sup>，从这篇论文题目中就可以看出，无限的劳动供给是刘易斯模式建立的前提条件。

按照刘易斯的解释，无限的劳动供给是指现代工业部门在现行一个固定工资水平上能够得到它所需要的任何数量的劳动力。换句话说，在现有既定工资水平上，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具有完全的弹性。

那么，现行的工资水平为何是固定的？它又由什么决定？为什么在这个工资水平上劳动供给是无限的？

刘易斯认为，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传统的农业部门没有资本投入，土地也十分有限，而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劳动力十分丰富。根据边际生产率递减原理，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必然非常低，有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甚至低到零，即什么也不生产。在这种条件下，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当然也很低，一般只能够维持自己和家庭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刘易斯指出，正是这种生存收入决定了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限界。工业的工资水平不可能低于这个限界，但也不会比这个限界高很多，否则，流入城市的劳动力就会超过工业部门的就业创造能力，结果，迫使工资下降。

当然，在刘易斯看来，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不会完全等于农村的生存收入，而必须比后者稍高一些，他估计约高30%左右。这是因为，第一，城市生活费用比农村高，城市居民需要支付较高的水电、房租和交通费用。第二，农业劳动者习惯于乡村的那种散漫、自由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一旦迁入城市后，便置身于一个高节奏、受约束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心理上有些不适应，因此，有一部分收入应该弥补这种心理成本。第三，为了引诱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还必须有一部分额外的净收入作为刺激因素。最后，城市工业部门工会的力量也有可能使工资水平上升，但刘易斯又说，即使没有工会，工农收入差别仍然存在。

由上可见，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由传统农业部门的收入决定的，在略高于农村生存收入的不变工资水平上，农村劳动力就会流入城市寻找工作机会。由于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农业国，农业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比重很大，存在着极为丰富的劳动力，因此，只要现代工业部门扩大生产规模，它就可以按现行不变工资水平雇到所需的劳动力。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刘易斯把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看做是无限的。当然，一旦农村以低生产率为特征的剩余劳动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农业生产率由于劳动减少而提高了，农民的收入也相应地增加了。农民收入的增加必然要求工业部门提高工资，否则，农业劳动力就不会流入城市寻找工作。这时，劳动供给再也不是无限的，而是与资本一样成为稀缺要素，工资水平将随劳动供给增加而上升。

以上所说的无限劳动供给是仅就农业部门而言的。刘易斯认为，无限的劳动供给还应该包括城市非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者，如临时工、小商贩、家庭仆人等。刘易斯还指

<sup>①</sup> 刘易斯. 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 曼彻斯特学派经济和社会研究, 1954 (5): 139 - 191

出，发展中国家的妇女也是一支重要的劳动后备军，只要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有很多妇女将会加入就业的行列之中。但是，农业部门以外的劳动供给相对于农业部门数量较小，因此，刘易斯把农业部门作为工业劳动供给的源泉。

## 二、劳动力的转移过程

刘易斯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形来描述，如图 7.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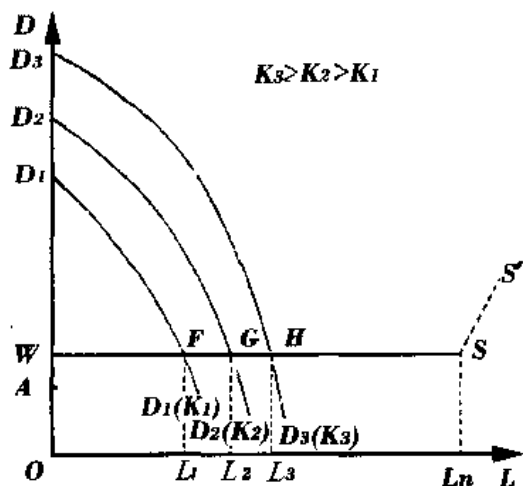


图 7.1 劳动力的转移过程

在图 7.1 中，横轴  $OL$  代表劳动，纵轴  $OD$  代表劳动的边际产品和工资。 $OA$  表示传统农业部门的生存收入， $OW$  表示现代工业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如上所述，在这个稍高于农村生存收入的工资水平上，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是无限的，因此，劳动供给曲线  $WS$  是一条平行于横轴的水平线（这里暂不考虑虚线  $SS'$ ）。

刘易斯假定工业部门只使用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资本是稀缺的，而劳动是丰富的。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可变比例规律，对于一笔固定资本额，就有一条特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劳动需求曲线）与之相对应。在图 7.1 中，假

设现代工业部门最初的资本量为  $K_1$ ，于是，对应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为  $D_1D_1(K_1)$ ，它向右下方倾斜，表示在既定的资本量下，随劳动投入的增加，劳动的边际产品递减。

根据刘易斯的观点，现代工业部门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利润最大化条件是边际生产率等于工资。在图 7.1 中，当资本为  $K_1$ ，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为  $D_1D_1(K_1)$  时，资本家将雇佣  $OL_1$  数量的劳动，因为只有在这个劳动量上，工资等于劳动的边际产品（如图 7.1 中的  $F$  点表示），利润才是最大的。在这一均衡状态中，现代工业部门所获得的总产量为  $OL_1FD_1$ ，其中  $OL_1FW$  为工人的工资， $WFD_1$  为资本家获得的利润。

劳动力是如何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的呢？刘易斯认为，工人的工资收入只够养家糊口，储蓄很少。因此，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然，资本家也要消费，因此，有一部分利润不能用做储蓄。但为分析简便，刘易斯假定资本家的利润全部被储蓄起来，以作投资之用。当资本家的利润被用于投资时，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传统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就更多了。

这个过程可以用图 7.1 来描述。在图 7.1 中，当最初资本为  $K_1$ ，雇佣的劳动为  $OL_1$  时，资本家的利润为  $WFD_1$ 。假设利润全部用做新资本投资，于是，资本量从  $K_1$  增加到  $K_2$ ，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曲线即劳动需求曲线也相应地从  $D_1D_1(K_1)$  外移到  $D_2D_2(K_2)$ ，它与劳动供给曲线  $WS$  相交于  $G$ ，决定了资本家雇佣的劳动量为  $OL_2$ 。 $OL_2 > OL_1$ ，这表明劳动就业随着工业部门扩张而增加了，增加的数量为  $L_1L_2$ 。这时，总产品

为  $OL_2GD_2$ ，其中归于劳动的份额为  $OL_2GW$ ，归于资本的份额为  $WGD_2$ 。显然， $WGD_2 > WFD_1$ ，这表明资本家的利润或剩余增加了。根据假定，资本家把  $WGD_2$  的剩余继续全部用于新资本投资，结果，资本存量又增加了，由  $K_2$  增加到  $K_3$ 。由于资本存量的增加，劳动者的生产效率也相应地提高，于是，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从  $D_2D_2 (K_2)$  向右移到  $D_3D_3 (K_3)$ 。它与一条水平的劳动供给曲线  $WS$  相交于  $H$ ，决定了劳动最优投入量为  $OL_3$ 。 $OL_3 > OL_2$ ，增加量为  $L_2L_3$ 。在新的均衡上，工业总产出为  $OL_3HD_3$ ，其中工资总额为  $OL_3HW$ ，利润总额为  $WHD_3$ 。 $WHD_3 > WGD_2$ ，表明资本家的利润增大了。这笔利润被假定再次全部投资于现代工业部门，于是，资本存量进一步增大，劳动生产率进一步提高，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个过程一直可以进行到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全部被工业部门吸收为止。

从以上劳动力转移过程的描述中可以看到，刘易斯把资本积累看成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转移的惟一动力。在这里，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没有单独作为一个因素。但是，刘易斯注意到了技术知识增进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意义。他认为资本积累即包含了技术进步，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在他的分析中，“生产资本的增长与技术知识的增长被看成是单一现象”<sup>①</sup>。

按照刘易斯的观点，当剩余劳动消失时，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就会提高，从而，农村劳动者的收入也会相应增加。这时，工业部门要想得到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就不得不提高工资水平，以与农业部门相竞争。在图 7.1 中，假设一个国家的剩余劳动总量为  $OL_n$ ，超过  $OL_n$ ，劳动供给曲线开始上升，如虚线  $SS'$  所示。

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无限的劳动供给阶段，如图 7.1 中的劳动供给曲线的水平部分所示。在这个阶段中，资本是稀缺的，劳动是丰富的，资本积累所产生的剩余全部归资本家所有。“当资本赶上了劳动供给时，经济就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如图 7.1 中上升的劳动供给曲线所示），古典经济学就不再适用了，我们就处在新古典经济学的世界里，在这里，所有的生产要素都是稀缺的，即是说，它们的供给是无弹性的。当资本积累进行时，工资不再不变，技术变革的利益不会完全归于利润，利润额不一定总是增加”<sup>②</sup>。刘易斯认为，当今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第一阶段。

在这里，刘易斯提到了“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他所说的古典经济学主要是指以斯密和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这一学说的特点是，劳动供给被认为是无限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且以维持工人生存为限，经济增长的利益全部归于资本家。他所说的新古典经济学是指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现代微观经济学。这一学说的特点是，包括劳动在内的所有要素都是稀缺的，工资水平是可变的，经济增长的利益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分配。很显然，属于结构主义理论的刘易斯模式含有古典经济学传统。

① 刘易斯，无限劳动供给下的经济发展，曼彻斯特学派经济和社会研究，1954（5）：153

② 刘易斯，再论无限劳动供给，曼彻斯特学派经济和社会研究，1958（5）：26



### 三、刘易斯模式的意义与缺陷

刘易斯模式的提出对发展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该模式的意义与特点至少有以下四点：

首先，这个模式强调了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的结构差异，把经济增长过程与工业化过程以及人口流动过程紧密结合在一起分析，这比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式更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为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分析发展中国家经济开辟了一个新的思路，即结构主义思路，正是结构主义思路分析使发展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际上，自刘易斯模式建立以来，形形色色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相继地出现了，它们或多或少都受到刘易斯模式的影响，包括那些反对刘易斯模式的模式在内。

其次，刘易斯模式把经济增长过程和劳动力转移（人口流动）过程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与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道路有一致之处，因而，它是建立在历史经验的基础上的，对当今发展中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是有参考意义的。虽然当今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与发达国家过去的情况不同，但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点在本书第六章中作过详细论述。

再次，刘易斯模式把工业化和城市化密切结合在一起。该模式所说的农业部门也就是农村部门，所说的工业部门也就是城市部门，即把劳动力的职业转换与人口的地域迁移看做是同一个过程，或者说是同步进行的。把工业化与城市化结合在一起分析可以避免城市化滞后和过度城市化问题。

最后，刘易斯模式把工业化与资本积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典型地反映了第一个阶段发展经济学强调工业化、资本积累的基本特点，因而，刘易斯模式一提出就成了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支柱之一。

但是，由于刘易斯模式假设过于简单，因此引来了很多批评。

(1)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指出，刘易斯所说的无限劳动供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存在的。无限的劳动供给意味着伪装的失业大量存在，劳动边际生产率在较大范围内是零或接近于零，否则，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后农业产出就会减少。他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传统农业部门虽然生产率低，但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不可能存在零值生产率的剩余劳动或伪装的失业<sup>①</sup>。

对于这个批评，刘易斯在 70 年代初作了反驳。他在两个方面作了辩解。第一，他所说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不是指一个人时 (a man hour) 的边际生产率，而是指一个人 (a man) 的边际生产率。当非资本主义部门特别是农业部门撤出一部分劳动力后，剩下的劳动力会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来保持总产出不变<sup>②</sup>。他说：“我认为，在农业、家仆、小商贩、手工业者或非资本主义劳动后备军中的其他部分，人时生产率不是零。但是，在现代有关就业不足方面的大量文献中，我没有看到有任何理由能改变我的信念：在印度或埃及等国中，撤出譬如说 10% 的非资本主义部门的非熟练劳动力，不会明显

① 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1987

② 关于劳动边际生产率的两种含义在本书第五章中作了论述。

地减少他们从中撤出的非资本主义部门的产出。”<sup>①</sup>第二，他的模式的建立并不依赖零值劳动边际生产率。它所需要的只是在现行工资水平上，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大于劳动需求。在发展中国家，由于资本主义工资大大地高于非资本主义的收入，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劳动供过于求的状况始终是存在的，因而他的模式是符合实际的。

关于刘易斯的第二点辩护，我们在第五章中已进行了讨论。关于他的第一点辩护，有的学者指出，即使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后，余下的农民通过延长劳动时间来保持总产出不变，仍然存在一个问题。要使余下的农民更加努力干活，就必须要有经济刺激，而这种刺激不外乎是收入和消费增加。但这样一来，工业的工资水平也会相应增加，从而利润减少，工业扩张放慢以至停止。由此可见，剩余劳动转移到工业部门决不是毫无代价的。

(2) 刘易斯模式只强调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这是刘易斯模式最易遭受指责的要害。刘易斯模式是建立在无限劳动供给这一基础上的。按照这个模式，只要存在着现行收入低于工业工资水平的劳动力，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就可以持续地进行下去，而不管农业是否发展。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指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农业中，必定有一部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大于零而小于他们获得的平均收入。按照刘易斯的定义和上述的第二点辩护，这一部分劳动力属于无限劳动供给之列，因为他们的收入低于工业工资。但是，在这部分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后，在农业生产率不变情况下，农业总产出必然减少。从而，提供给工业的粮食也相应减少，这就就会出现粮价上涨，工业工资水平相应地上涨，利润下降和工业扩张减速直至停止。

对于这个指责，刘易斯进行了反驳，认为批评者误解了他的理论观点。他在 1954 年以及后来一系列论文中都强调了农业发展对工业化的重要性。但是，批评刘易斯模式的人并没有注意刘易斯这方面的观点。不过，从刘易斯模式中很容易使人得出农业不重要的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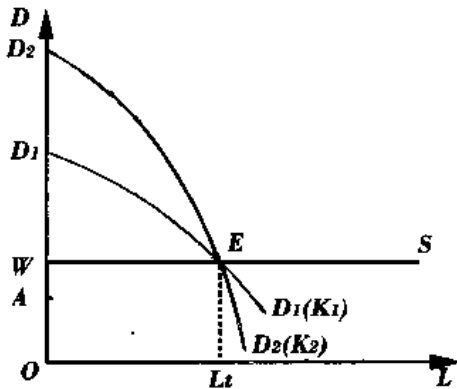


图 7.2 现代工业部门资本集约性图解

(3) 刘易斯的人口流动模式暗含地假定，现代工业部门的劳动与资本的比例始终是不变的。这就是说，资本积累率与就业创造率同比例增长，资本积累越大，就业机会就越多。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情况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资本家越来越倾向于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采用。结果，现代工业部门虽然扩大了，但就业机会却增加很少。这种情况可以用图 7.2 来说明。

在图 7.2 中，最初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为  $D_1D_1(K_1)$ ，它与劳动供给曲线  $WS$  相交于

① 刘易斯：对无限劳动的思考，见：马可编，国际经济学与发展，学术出版公司，1972.81-82

$E$ , 决定了现代工业部门的就业量为  $OL_1$ 。当资本家把利润投资于新的资本时, 资本存量增加了, 由  $K_1$  增到  $K_2$ 。但是, 由于资本家倾向于采用劳动节约型技术, 结果, 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并没有平行地向外移动, 而是变得更陡了, 如图 7.2 中的  $D_2D_2(K_2)$  所示。这样, 虽然资本增加了, 资本家利润也增加了, 但劳动就业没有任何增加, 仍然是  $OL_1$ 。

(4) 刘易斯模式假定农村存在着剩余劳动, 而城市不存在失业。有些批评者认为, 这个假定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不符。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中, 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 城市存在大量失业。这些失业者有的在非正规部门找一个临时性工作, 有的则完全处于闲置状态。关于城市失业问题, 刘易斯在 1979 年的论文中承认了。他指出: “城市不可能为农村的人口自然增长提供就业, 这里还不说妇女现在离家寻找有报酬的就业。所以, 失业增加了。”他说, 城市之所以不能为农村来的劳动者提供工作, 是因为农业停滞的缘故。不管政府为城市提供多少就业机会, 只要农业不发展, 城市失业问题就不可能解决<sup>①</sup>。在下面分析中, 可以看到, 这正是托达罗模式的基本观点。

(5) 刘易斯模式把不变的工资水平作为分析的基础。其理由是, 由于农村存在大量剩余劳动, 只要城市净工资水平 (扣除必要的补偿和引诱工资) 上升, 就会有更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寻找工作, 结果, 工资水平就会由于劳动供过于求而下降到原来位置上。这也是刘易斯假定城市不存在失业的理论依据。但是, 事实上, 城市存在着大量失业, 而且有不断上升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 城市工资水平不但没有下降反而增加了, 城乡实际收入差别一般在 2 倍 ~ 3 倍之间, 远远超过了刘易斯估计的 30% 这个差额。

## 第二节 拉尼斯—费模式

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 (Ranis, Gustav) 和美籍华人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汉 (Fei, J. H.) 在 1961 年首次合作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 指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式, 史称拉尼斯—费模式 (Ranis - Fei model) 或费—拉尼斯模式 (Fei - Ranis model), 后来他们继续合作, 对此模式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探讨<sup>②</sup>。该模式把刘易斯模式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因此, 通常被称之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 (Lewis - Ranis - Fei model)。

### 一、拉尼斯—费模式的基本结构

刘易斯模式只描述了现代工业部门的扩张过程, 没有描述农业部门的发展。拉尼斯—费模式与刘易斯模式的重大区别就是, 前者把工业部门和农业部门之间的发展关系清楚地表示出来了。拉尼斯—费模式的基本结构可以用图 7.3 来描述。

<sup>①</sup> 迈耶编, 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 英文版, 1984, 420

<sup>②</sup> 拉尼斯, 费景汉, 一个经济发展理论, 美国经济评论, 1961 (9): 533 - 5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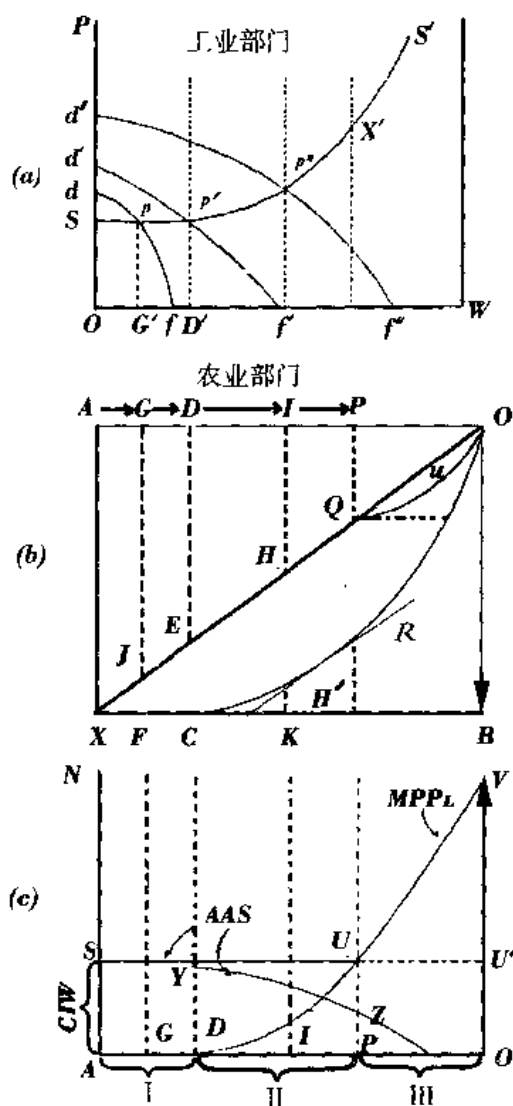


图 7.3 工业与农业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在农业停滞和人口增长过快的条件下，劳动力转移的转折点不可能达到。

图 7.3 (b) 和 7.3 (c) 代表农业部门。在图 7.2 (b) 中，原点位于右上角。横轴  $OA$  从右向左度量农业劳动力，纵轴  $OB$  从上至下度量农业总产出， $ORCX$  代表农业部门总物质生产率或总产出曲线。这条曲线被假定由两部分组成：上凹的  $ORC$ ，它表示随农业劳动力的增加，边际生产率渐减；水平的  $XC$ ，它表示劳动边际产品等于零。从图 7.3 (b) 中可以看到， $AD$  数量的农业劳动力不生产任何农产品，从农业总劳动人口中撤出来，总产量一点也不减少。拉尼斯和费景汉把这部分不生产农产品的劳动人口叫做“多余劳动力” (redundant labor force)。

假设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的总人口为  $OA$ ，并假设初期没有工业部门，全部人口都在农业部门就业，还假设全部农产品由农业劳动人口消费。于是，农业劳动者的平均收入等于  $AX/OA$ ，即  $OX$  线的斜率所示。拉尼斯和费景汉指出，只要农业部门存在着剩

图 7.3 (a) 代表工业部门，这是人们熟悉的刘易斯模式。在图 7.3 (a) 中，横轴  $OW$  量度工业劳动，纵轴  $OP$  量度工人的边际生产率和工资。边际生产率曲线即劳动需求曲线  $d'p'f'$  与水平的劳动供给曲线  $S_p$  相交于  $p$ ，决定工业部门的劳动就业为  $OG'$ 。从刘易斯模式讨论中可知，劳动边际生产率取决于资本存量，资本存量的增加将会使劳动边际生产率上升。但在拉尼斯—费模式中，除了资本积累外，工业创新的强度和偏向也影响劳动边际生产率。因此，当工业部门资本存量增加，创新强度大，劳动偏向高时，工人的边际生产率曲线将向右上方移动。在图 7.3 (a) 中，随着资本积累和创新的进步，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从  $d'p'f'$  移到  $d''p''f''$ ，进而移到  $d'''p'''f'''$ ，等等。

在图 7.3 (a) 中，劳动供给曲线由两部分构成：水平的  $S_p$  与上升的  $p'S'$ ， $p'$  为转折点。按照刘易斯的观点，一旦劳动供给曲线由水平的变为上升的，无限的劳动供给就终止了，劳动像资本一样变为稀缺要素，劳动力转移过程就告结束。拉尼斯和费景汉接受了这个观点，但他们认为，只有在农业生产率提高，劳动力转移速度高于人口增长速度时，这个转折点才能达到。这是拉尼斯和费景汉对刘易斯模式的重大发展。我们知道，刘易斯并没有论述农业增长、人口增长与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实

余劳动，他们的边际生产率低于平均收入，那么，假定农业劳动力获得的收入等于平均产品是合理的，因为如果有人低于这个水平，他就不能生存下去。拉尼斯和费景汉把这个收入水平叫做“不变制度工资”（constant institutional wage），因为它不是由市场力量而是由习惯和道德因素决定的，并且在剩余劳动全部消失之前始终是不变的。不变制度工资由图 7.3 (b) 中  $OX$  斜率表示，它等于农业人口的平均收入。

在总产品曲线上， $R$  表示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不变制度工资，即  $R$  点的切线与  $OX$  线平行。拉尼斯和费景汉把这一点以后的农业劳动力  $AP$  定义为“伪装的失业者”（the disguised unemployed），因为他们的边际生产率低于他们获得的不变制度工资。伪装的失业包括两个部分：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劳动力，即上述的多余劳动力 [如图 7.3 (b) 中的  $AD$  所示] 和边际生产率大于零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劳动力 [如图 7.3 (b) 中的  $DP$  所示]。拉尼斯和费景汉把多余的劳动看做是一个技术现象，它决定于生产函数；把伪装失业说成是一个经济概念，它决定于工资水平<sup>①</sup>。

伪装的失业，多余的劳动和不变制度工资等概念能够借助于图 7.3 (c) 更清楚地得到说明。在图 7.3 (c) 中，原点在右下方，横轴  $OA$  从右至左量度农业劳动力，纵轴  $AN$  从下至上量度农业平均产品和边际产品。 $VUDA$  表示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它由两部分组成，负斜率部分  $VUD$  和水平部分  $DA$ ，它与图 7.3 (b) 中的总生产率曲线是一致的。当农业劳动力逐渐增加时，边际生产率渐减，而总生产率以递减的速率增加；当农业劳动力增加到  $D$  点以后，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而总产品保持不变。

在图 7.3 (c) 中， $SU'$  为不变制度工资线，它与横轴的距离等于图 7.3 (b) 中  $OX$  的斜率，即农业平均产品。在这里，拉尼斯和费景汉把劳动力转移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区域，即图 7.3 (c) 中的  $AD$  所示，这一阶段劳动力都是多余的。第二个阶段是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不变制度工资的区域，这一阶段的农业劳动力为  $DP$ 。第一阶段的  $AD$  与第二阶段的  $DP$  加起来得到  $AP$ ，即为伪装的失业者。第三个阶段是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不变制度工资的区域，如图 7.3 (c) 中  $OP$  所示。

按照拉尼斯和费景汉假定，在第一、二两个阶段中，农民的收入由非市场因素决定，它等于制度工资  $AS$ 。不管劳动力在工农业之间如何配置，不管农业劳动力是否转移到工业部门，这个制度工资始终是不变的，所以，第一、二两个阶段的工资线是水平的，如  $SU$  所示。但是，在  $AP$  数量的伪装失业者都被工业部门吸收后，劳动力转移进入第三个阶段，这时，农业劳动者的收入就不再等于不变制度工资，而是等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如图 7.3 (c) 中上升的  $UV$  线所示。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一旦进入第三个阶段，农业部门就完全商业化了，工资水平就由市场力量决定而不是由制度决定。这样，图 7.3 (c) 中的  $SUV$  曲线就成了农业劳动对工业部门的供给价格曲线，它表明对每一工资水平从农业部门可以释放出来的劳动数量。例如，在  $AS$  水平上，可以释放出  $AP$  数量劳动力转到工业部门中去。

① 费景汉，拉尼斯，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英文版，1964，203

现在回到图 7.3 (b) 上来。可以看到, 当农业劳动者从农业中撤出时, 农产品剩余便产生了。拉尼斯和费景汉把农业总产品与农民消费之差叫做总农业剩余 (total agricultural surplus)。这部分剩余是提供给工业部门消费的。例如, 如果  $AG$  数量的劳动力被转移到工业部门, 那么,  $JF$  数量的总农业剩余出现了, 它表示总农业产出  $GF$  与农业部门自己消费的量  $GJ$  的差额。

只要农业生产率不变, 总农业剩余与转移的劳动量有密切关系。在第一、第二阶段中, 总农业剩余是由直线  $OX$  和总生产率曲线  $ORCX$  之间的垂直距离来表示, 如在  $F$  点, 总农业剩余为  $FJ$ , 在  $K$  点, 总农业剩余是  $HH'$ 。但是, 在第三个阶段, 按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工资高于不变制度工资, 所以, 提供给工业部门的总农业剩余稍微小于这个垂直距离, 如图 7.3 (b) 中  $OUQ$  与总产出曲线  $ORCX$  之间的距离所示。

平均农业剩余 (average agricultural surplus) 被定义为撤出的农业劳动力的人均总农业剩余。例如, 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到工业部门的总劳动力为  $AG$ , 总农业剩余为  $FJ$ , 平均农业剩余等于  $FJ/AG$ 。在图 7.3 (c) 中,  $SYO$  表示平均农业剩余曲线, 它表示在劳动转移的每一数量上可以得到的平均农业剩余。例如, 当劳动转移数量为  $AD$  时, 平均农业剩余是  $YD$ , 即等于  $EC/AD$ 。

平均农业剩余的变化规律是: 在第一个阶段, 由于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 撤定任何数量的劳动力, 不会减少农业总产出, 因此, 这一阶段的平均农业剩余等于制度工资  $AS$ , 在图 7.3 (c) 中, 它表示平均农业剩余曲线与不变制度工资线  $SY$  重合。这就好似劳动者自带口粮去参加工业建设, 这份口粮相当于他们在农村中消费的平均产品。一旦劳动转移进入第二个阶段, 平均农业剩余就低于不变制度工资, 即平均农业剩余曲线位于不变制度工资曲线下方。这是因为, 在第二个阶段, 劳动边际生产率为正数。当劳动力撤离农业部门时, 总产品就会减少, 如图 7.3 (b) 中下降的总产品曲线所示。由于剩下的农民的消费与以前一样多, 所以, 提供给工业部门的农业产品就不足以按制度工资来供养工业的劳动者。当劳动转移进入第三个阶段时, 农业像工业一样商业化了, 农民工资将由市场力量决定, 它等于劳动边际生产率。由于边际生产率高于不变制度工资 [如图 7.3 (c) 上升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  $UV$  所示], 所以, 农业劳动者现在消费的农产品高于制度工资。结果, 供工业部门工人消费的农产品就更少了, 平均农业剩余下降得比前一个阶段快。

在拉尼斯—费模式中, 农业剩余对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转移具有决定性意义, 因为它影响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 从而影响工业部门的扩张速度和劳动力转移速度。

在第一个阶段, 由于平均农业剩余等于不变制度工资, 因此农村多余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 不会产生粮食短缺问题, 从而不会影响工业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在图 7.3 (a) 中, 劳动供给曲线在第一个阶段是水平的, 它与横轴的距离  $OS$  即工资水平等于农业部门的制度工资  $AS$  [如图 7.3 (c) 所示]<sup>①</sup>。

<sup>①</sup> 拉尼斯—费模式假定两部门工资是相等的, 而刘易斯模式假定工业工资略高于农业收入, 一般为 30%。这里可以把工业工资看做是扣除补偿和引诱收入之后的净工资, 这样, 两模式假定就一致了。

当劳动力转移进行到第二个阶段时，平均农业剩余就低于制度工资，这意味着供工业消费的粮食不足以按制度工资满足工人的需要。结果，粮价上升，工资上涨。所以，劳动供给曲线在第二个阶段是上升的，如图 7.3 (a) 的  $p'X'$  所示。在这里，拉尼斯和费景汉把第一个阶段和第二个阶段的交界处 ( $D$  点) 叫做短缺点 (shortage point)，表明当平均农业剩余下降到制度工资以下时是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短缺的开始。

在农村剩余劳动即伪装失业全部被吸收到工业部门就业以后，劳动力转移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根据拉尼斯和费景汉的观点，伪装的失业消失标志着不发达经济已经进入了商业化阶段。所以，他们把第三个阶段的起点 [图 7.3 (c) 中的  $P$  点] 叫做商业化点 (commercialization point)，表明农业已开始资本主义化了。这时，两个部门的工资水平都由市场原则来决定，即由劳动边际生产率决定。由于伪装的失业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以上，工业部门要吸引更多的农民参加工业生产，就必须把工资提高到至少等于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因此，在第三个阶段，劳动供给曲线上升得比第二个阶段更快，如图 7.3 (a) 的  $X'S'$  所示。

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农村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第一阶段劳动力转移不会受到阻碍，因为农业总产出没有减少，粮食短缺情况不会发生。第二阶段的劳动力转移将受到影响，因为农业总产出减少了，从而粮食短缺将会引起粮价和工资上涨。在这一阶段，劳动力转移越多，粮价越高，工业贸易条件越是下降，工业劳动供给曲线变得越陡。结果，在伪装失业全部被转移到工业部门之前，在农业商业化阶段到来之前，工业部门的扩张过程就会停止下来。

由此可见，困难存在于第二个阶段。那么，能否找到一种方法来消除这个困难，使劳动力转移过程继续到第三个阶段呢？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是可能的。他们指出，上述关于增长停止的阴郁观点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的：即完全停滞的农业部门与蓬勃扩张的工业部门并行。其实，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农业劳动生产率也可以逐步增加。一旦农业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平衡进行，劳动力转移就会进入商业化的第三个阶段，伪装失业就会消除。下面将考察农业生产率增加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重要性。

## 二、农业生产率的增加与两部门平衡增长

农业生产率的增加可以用图 7.4 来描述。图 7.4 可以与图 7.3 联系起来看。在图 7.4 (b) 中，初始的总生产率曲线是  $OCX$  [图 7.3 (b) 中的  $ORCX$ ]。当农业生产率提高时，总产品曲线向外移到  $OC_1X_1$ 、 $OC_2X_2$ ，等等。在图 7.4 (c) 中，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相应地从最初的  $AS_1t_1'$  向上移到  $AS_1t_2'$ ， $AS_1t_3'$ ，等等，其中水平部分  $AS_1$  为所有劳动边际生产率共同的部分，表明农业的多余劳动在生产率提高时仍然不减少。

在这里，拉尼斯和费景汉保持了制度工资不变的假定<sup>①</sup>，因此，图 7.4 (c) 中的

<sup>①</sup> 费景汉和拉尼斯对此的解释是：“当农业生产率增加时，制度决定的农业工资将允许上升，这是可能的。但是，只要农业伪装失业劳动力存在，那就值得怀疑，这种上升的压力会有意义。”（《劳动剩余经济的发展》，英文版，1964，212）

AS 仍然等于图 7.4 (b) 中  $OX$  线的斜率。这样, 农业劳动供给价格曲线就从初始的  $AS_1t_1'$  [图 7.3 (c) 中的  $SUV$ ] 向左移到  $AS_2t_2'$ ,  $AS_3t_3'$ , 等等, 其中每一条曲线包含一个水平部分, 表明在存在剩余劳动时, 制度工资是不变的。与此同时, 商业化点也从初始的  $R_1$  [图 7.3 (c) 中的  $P$ ] 向左移到  $R_2$ 、 $R_3$ , 等等。另一方面, 由于农业总生产率增加了, 同时假定制度工资不变, 所以, 农业剩余更多了。于是, 平均农业剩余曲线随农业生产率提高而从原始的  $Sf_1O$  [图 7.3 (c) 中的  $SYO$ ] 向上移到  $Hf_2O$ 、 $Gf_3O$ , 等等。与此相适应, 短缺点也从最初的  $S_1$  [图 7.3 (c) 中的  $D$ ] 向右移到  $S_2$ 、 $S_3$ , 等等。

综上所述, 当农业生产率持续增加时, 商业化点逐渐向左移动, 而短缺点逐渐向右移动, 它们的距离越来越小, 最后, 短缺点与商业化点重合起来, 第二个阶段消失, 如图 7.4 (c) 中的  $S_3 = R_3$  所示。拉尼斯和费景汉称这个重合点为转折点 (turning point)。他们认为, 只要农业生产率增加, 总会存在一个生产率水平 [如图 7.4 (b) 中的  $OC_2X_2$ ], 使得转折点能够达到。

农业生产率的增加使农业剩余和边际生产率都增加了, 从而, 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相应地发生变动。一方面, 在商业化点之前, 平均农业剩余曲线向上移动, 使得工业劳动供给曲线向下移动。这是因为农业剩余的增加降低了粮食价格, 从而降低了按工业产品计算的工业工资。另一方面, 在商业化点之后, 农业边际生产率曲线的向上移动使得工业劳动供给曲线上升。这是因为, 在商业化点之后, 农业劳动者的收入随边际生产率上升而上升, 工业部门要想引诱更多农民参加工业生产, 就必须支付比原来更高的工资。

关于农业生产率变化与工业劳动供给曲线变化之间的关系可以从图 7.4 (a) 中看得很清楚。最初的劳动供给曲线为  $L_1L_1$  [图 7.3 (a) 中的  $Ss'$ ]。当农业总生产率曲线从  $OCX$  向上移到  $OC_1X_1$  [图 7.4 (b) 所示], 平均农业剩余曲线从  $Sf_1O$  向上移到  $Hf_2O$  [图 7.4 (c) 所示], 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曲线从  $AS_1t_1'$  向上移到  $AS_1t_2'$  [图 7.4 (c) 所示] 的时候, 工业劳动供给曲线  $L_1L_1$  移到  $L_2L_2$  [图 7.4 (a) 所示]。  $L_2L_2$  在商业化点  $R_1$  左边位于  $L_1L_1$  的下方, 在商业化点  $R_1$  右边位于  $L_1L_1$  的上方。在  $R_1$  上, 两条供给曲线相交于  $q_1$ , 表明贸易条件效应<sup>①</sup> (由于平均农业剩余上升) 被实际工资效应 (由于农业边际生产率上升) 所抵消。

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 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在一个停滞的农业中, 农业的剩余劳动是不可能完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的。但是, 仅仅农业生产率增长是不够的, 要使劳动力转移不至于受到阻碍, 还必须使农业生产率增长与工业生产率增长保持同步性, 也就是说, 两个部门必须平衡增长。

现在, 结合图 7.4 来说明平衡增长问题。在图 7.4 (a) 中, 把劳动供给曲线  $L_1L_1$  中的水平部分  $L_1P_1$  延长到转折点  $P_3$ , 便得到水平线  $L_1P_3$ 。拉尼斯和费景汉把它叫做

① 这里所说的贸易条件是指农产品与工业品的比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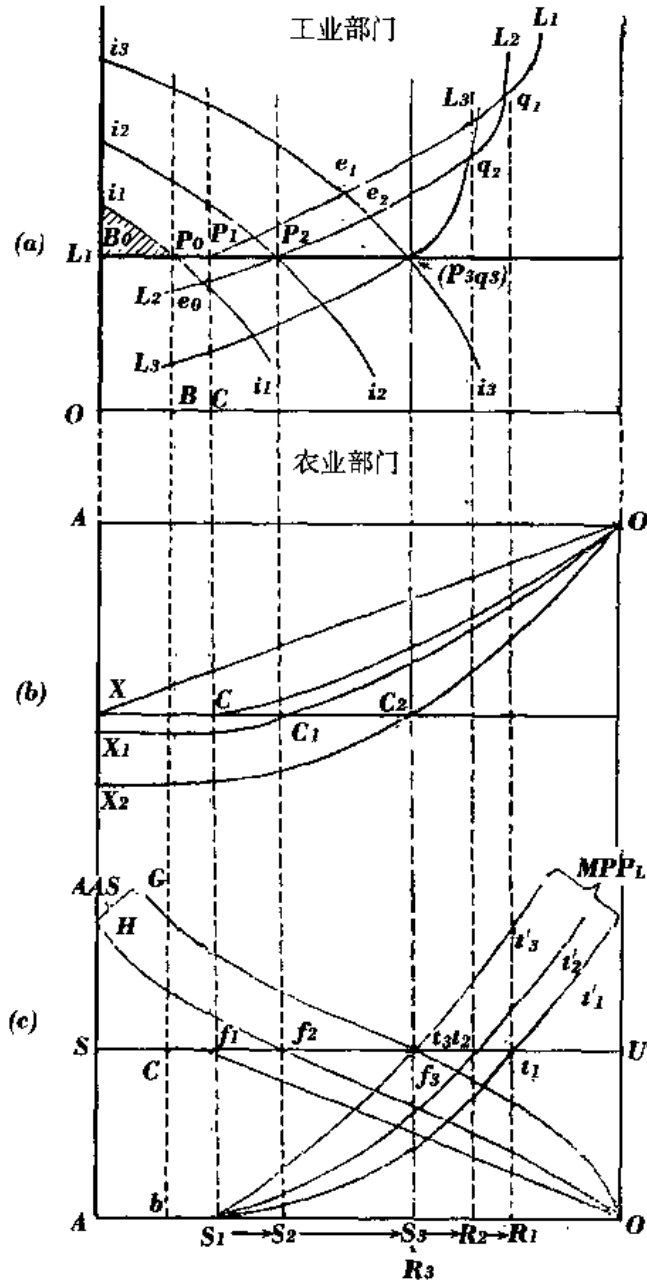


图 7.4 农业生产率的增加与两部门平衡增长

平衡增长路径 (balanced growth path), 其意义是, 在转折点之前, 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与需求必须沿着这条路径均衡地增长, 才能保证劳动力转移顺利地进行到转折点。如上所述, 农业生产率的增长使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 (这里只论述转折点之前的情况), 并且, 它们都必须各自的短缺点上通过平衡增长路径。例如,  $L_2L_2$  在  $P_2$  点与  $L_1P_3$  相交, 交点  $P_2$  与短缺点  $S_2$  [图 7.4 (c) 所示] 相对应。工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工业部门的劳动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例如, 在图 7.4 (a) 中, 随着工业生产率的提高, 劳动需求曲线从  $i_1i_1$  移到  $i_2i_2$ 、 $i_3i_3$ , 等等。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保证这两组向右移动的曲线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相交。换句话说，需要什么条件才能使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与需求保持同步增长。拉尼斯和费景汉提出了一个平衡增长原则，这就是：两个部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必须使得两个部门长期地保持增长刺激，即每个部门的贸易条件都不能恶化。这就需要农业部门提供的农业剩余刚好能满足工业部门对农产品的需求。若前者大于后者，农业贸易条件就会恶化，因为粮食供给相对过剩，这就伤害了农业部门。若前者小于后者，工业贸易条件就会恶化，因为粮食供给变得相对短缺，这就损害了工业部门。

拉尼斯和费景汉指出，如果这个平衡增长原则得到了满足，那么，两个部门生产率的增长就会使工业部门劳动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同步地沿着平衡增长路径向右移动，直到转折点为止。例如，在图 7.4 (a) 中，新的劳动需求曲线  $i_2i_2$  和新的劳动供给曲线  $L_2L_2$  在平衡增长路径上的  $P_2$  处相交。在  $P_2$  上，工业部门吸收  $P_0P_2$  个额外的劳动力，它刚好等于农业部门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数目 [如图 7.4 (c) 中的  $Cf_2$  与图 7.4 (a) 中的  $P_0P_2$  相等]。

当平衡增长原则持续得到满足时，劳动力转移过程就会沿着平衡增长路径  $L_1P_3$  成功地进行到转折点  $P_3$ 。这时，农业的剩余劳动消失了，农业部门进入了商业化阶段，二元经济的发展就告结束。但是，拉尼斯和费景汉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实际增长过程很少严格地遵循上述的平衡增长路径，而常常是偏离它。但是，这种偏离可以通过市场机制和政府政策回到平衡增长路径上来。结果，实际平衡增长路径可能是围绕着上述理想的平衡增长路径上下摆动。

### 三、人口增长与临界最小努力

在一个农业停滞的发展中国家，剩余劳动是不可能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的。因此，农业生产率必须增加，而且要与工业生产率均衡增长。但是，仅仅两部门经济均衡增长就能使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转移过程进行到转折点吗？或者说，两部门生产率同步增长能保证二元经济发展进入商业化阶段吗？拉尼斯和费景汉的回答是否定的。

以上论述的拉尼斯—费模式是以人口不变为假定前提的。例如，在图 7.4 中，一个国家的人口被假定等于  $OA$ 。实际上，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在发展中国家，人口必然伴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这就增加了剩余劳动的规模，从而加重了劳动力转移的负担。在人口增长的情况下，试图摆脱经济二元性，达到转折点，就不是简单地把一个固定的农村人口转到工业部门中去，而是要使劳动力转移速度快于人口增长速度。

关于人口增长条件下劳动力转移问题可以借助图 7.5 来说明。

在图 7.5 中，横轴  $OT$  表示时间，以年为单位，纵轴  $OP$  表示人口数量， $beP$  曲线为人口增长曲线，为简便起见，这里假定人口以不变年率增长。 $adI_R$  为必要的工业化曲线 (required industrialization curve)，它表明在  $T$  年的转折点上，工业部门必须吸收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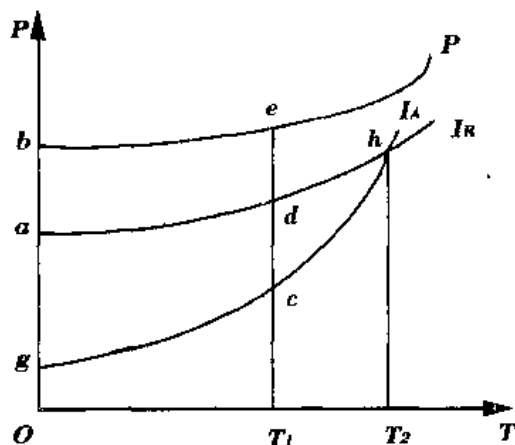


图 7.5 人口增长条件下的劳动力转移

人口数量<sup>①</sup>。假若在 0 年达到转折点，总人口  $Ob$  中的  $Oa$  数量必须被工业部门吸收；如果要在  $T_1$  年达到转折点，总人口为  $T_1e$ ，其中  $T_1d$  数量必须转移到工业部门。在这里，农业人口等于总人口与工业人口之差，即人口增长曲线与必要工业化曲线之间的距离，如  $T_1$  年的农业人口等于  $ed$ 。

人口增长必然使得达到转折点的工业就业量相应地增长，因为需要转移的剩余劳动增加了，而且，后者要比前者增长得更快，因为工业化程度越高，工业活动人口越多，农业活动人口越少。这一关系反映在图形上是，人口增长曲线与必要的工业化曲线都在

上升，而且后者上升得更快，越来越接近于前者。

必要的工业化曲线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意味着在人口增长条件下，如果要在某一个时期内达到转折点，进入商业化阶段，一个国家工业部门应该和必须吸收的劳动人口数量。那么，在现实中，一个国家在这个时期内能否达到这个要求呢？这就取决于它的努力程度。关于一个国家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实际努力程度可以用实际工业化曲线 (actual industrialization curve) 来描述，如图 7.5 中的  $gcI_A$  所示。实际工业化曲线表示在  $T$  年一个国家工业部门实际吸收的劳动人口，拉尼斯和费景汉把它作为衡量一个国家努力程度的一个综合性指标。在这里，假定在初期，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于是，实际工业化曲线从很低的  $g$  开始。随着这个国家努力的增加，这条曲线持续上升。

现在讨论实际工业化曲线与必要工业化曲线的关系。首先，如上所述，必要的工业化曲线依赖人口增长曲线，人口增长越快，工业部门必须吸收的劳动量就越大。但是，实际工业化曲线与人口增长曲线没有直接依存关系，从而与必要工业化曲线没有依存关系。前者只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实际努力程度，即工农业生产的增长速度和比例、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实际上，实际工业化曲线就是前面论述的拉尼斯—费模式的另一种表达形式。不过在这里，拉尼斯—费模式明确引入了时间变量。如果回过头来观察图 7.4，可以看出，在图 7.4 (a) 中，当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劳动需求曲线沿着平衡增长路径向右均衡移动时，工业劳动就业人口持续地增加。如果假定工业部门劳动供求均衡一年移动一次，那么，工业劳动人口的增加就可以用图 7.5 的实际工业化曲线来描述。因此，实际工业化曲线独立于人口增长曲线，后者被拉尼斯和费景汉看成是外生的变量，即是说，不把它看做是由经济增长决定的。

其次，从图 7.5 中可以看到，在两条曲线相交以前，实际工业化曲线始终位于必要

<sup>①</sup> 应该指出，在拉尼斯—费模式中，人口与劳动力被看成是同一个概念。在这里，我们遵从这个习惯，对这两个概念不加区分。

工业化曲线下方，表明一个国家在  $T_2$  年以前实际努力不足以使全部的剩余劳动转移到工业部门就业。例如，在  $T_1$  年，达到转折点时的必要工业就业量为  $T_1d$ ，而工业部门实际吸收的劳动量只有  $T_1c$ ，显然， $T_1c < T_1d$ ，其差为  $dc$ ，这个差额即表示应该被工业部门吸收而又未被吸收的农村剩余劳动。只有当实际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劳动者人数与达到转折点时的工业部门必须吸收的劳动人口相等时，这个国家的劳动力转移过程才告结束，进入商业化阶段。这一点在  $T_2$  年达到，在这一年中，实际工业化曲线与必要工业化曲线相交于  $h$ 。

第三，实际工业化曲线的位置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发展努力。如果资本积累大，多采用劳动偏向技术，工农业生产率平衡增长，那么，实际工业化曲线就较陡，从而在  $T_2$  年以前与必要工业化曲线相交，表明达到转折点的时间更短了。相反，如果资本积累不足，多采用资本偏向技术，两部门发展又不同步，那么，实际工业化曲线就较平，从而，在  $T_2$  年以后与必要工业化曲线相交，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达到转折点。

第四，当一个国家人口增长较快时，人口增长曲线变得更陡，从而，必要的工业化曲线相应地变得更陡。这时，假若实际努力程度不变，达到转折点的时间就要延长，因为需要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剩余劳动更大了。在图形上表现为实际工业化曲线与必要工业化曲线在  $T_2$  年以后的某一年相交。反之，当一个国家人口增长较慢时，人口增长曲线变得较平坦，从而必要工业化曲线也变得较平坦。在实际努力不变条件下，达到转折点的时间缩短了，在图 7.5 上，实际工业化曲线在  $T_2$  年之前的某一年中与必要工业化曲线相交。由此可见，人口增长与实际努力增加一样也是二元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不过，前者是一个抑制因素，后者是一个刺激因素。

拉尼斯和费景汉把实际工业化曲线与必要工业化曲线相交时的实际努力定义为临界最小努力。为简明起见，假设工业部门每年以一个不变比率吸收农业劳动力，于是，实际工业化曲线方程为：

$$L_{T_n} = N_0 (1 - V) e^{cT} \quad 1 > V > 0$$

在这里， $L_{T_n}$  表示  $T$  年工业部门的实际劳动人口， $N_0$  表示一国最初（0 年）的总人口数量， $V$  表示最初从事农业的活动人口占总人口的一个比例，于是， $1 - V$  为最初工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c$  表示工业劳动力的增长率，它被作为实际努力的一个综合指数。

再假设人口每年以不变比率增长，这样，人口增长曲线方程为：

$$N_T = N_0 e^{gT}$$

这里， $N_T$  表示  $T$  年的总人口， $g$  表示人口年增长率。因为达到转折点时的必要工业劳动人口与人口增长具有依存关系，所以， $T$  年的必要工业化曲线方程为：

$$L_{TR} = N_T [1 - V_i(T)] = N_0 e^{gT} [1 - V_i(T)]$$

在这个方程中， $L_{TR}$  表示  $T$  年达到转折点时必须达到的工业人口， $V_i(T)$  表示  $T$  年达到转折点时的农业人口占  $T$  年总人口  $N_T$  的比例，于是， $1 - V_i(T)$  就表示  $T$  年达到转折点时的工业人口的比例。

根据临界最小努力的定义， $T$  年的必要工业人口必须等于  $T$  年的实际工业人口，

即：

$$N_0 (1 - V) e^{cT} = N_0 [1 - V_i (T)] e^{gT}$$

于是，

$$c = g + \frac{\ln [1 / (1 - V)]}{T} + \frac{\ln [1 - V_i (T)]}{T}$$

这就是临界最小努力方程。在这个方程中，只要给定一个达到转折点的时期  $T_0$ ，临界最小努力值  $c_0$  就可以被确定。这就是说，在  $T_0$  年内，如果工业部门劳动力增长率低于  $c_0$ ，那么，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在  $T_0$  年内把剩余劳动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

从临界最小努力方程中还可以得到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即：一个国家的工业部门劳动力增长率必须大于人口增长率，即  $c > g$ ，这是因为方程右边第二项与第三项之和必定大于零。

#### 四、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

在拉尼斯—费模式中，人口增长与生产率增长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两个关键变量。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速度无疑是一项基本国策。但这一政策只具有长期效果。因此，在短期，增加生产率是发展中国家更重要的发展战略。按照拉尼斯和费景汉的观点，生产率的增加主要有两个途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

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提高生产率的途径在工农业部门中是有所侧重的。在农业部门，由于缺乏资金，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不明显的技术和耕作习惯的改进，而不是通过采用现代化的农业设备，如作物轮作、病虫害防治、种子改良和化肥使用等。工业部门生产率的增加主要取决于资本积累。拉尼斯和费景汉指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后来者，有大量的技术可供自由使用。只要有资金，投资机会总是存在的。这一点刚好与发达国家相反。在发达国家，资金相当丰富，缺乏的是投资机会，只有当新的创新边界和机会被发现时，新的投资活动才会发生。

但是，发展中国家在选择、引进外国技术时必须考虑自身的要素条件。发展中国家一般是资本稀缺而劳力充裕。因此，应选择那些资本节约型或劳动使用型技术，或者对国外先进技术根据本国特点进行改造使之能吸收更多劳动力就业是明智的、合理的。

#### 五、拉尼斯—费模式的贡献与缺陷

拉尼斯—费模式与刘易斯模式一样受了古典经济学传统的影响，因为它同样把农业剩余劳动作为分析的基础，并始终假定工资水平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是固定不变的且处于生存水平。但是，拉尼斯—费模式被认为是对刘易斯模式的重大发展。

第一，刘易斯模式忽视了农业的发展。在刘易斯看来，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就在于为工业部门的扩张提供所需的廉价劳动力，至于农业是否发展，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并非如此。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不仅为工业部门扩张提供所需的劳动力，而且还为工业部门提供农业剩余。如果农业剩余不能满

足工业部门扩张对农产品日益扩大的需求，劳动力转移就会受到阻碍。这一点被认为是拉尼斯—费模式对刘易斯模式最重要的发展，因为忽视农业的发展是刘易斯模式最易遭受攻击的弱点。

第二，在刘易斯模式中，资本积累被看做是工业部门扩张和经济发展的惟一源泉，而忽视了技术进步的作用。当然，刘易斯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技术进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但他把技术进步包含在资本积累之中，认为两者是不可分的。但是，在现实中，有些技术改进只需要增加劳动而不需要增加资本，或只需要很少的资本。例如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可以通过增加劳动来获得，如轮作、套种、深耕和良种等。拉尼斯和费景汉弥补了刘易斯这个缺陷，他们把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看做是提高生产率的两个途径，把技术变化或创新定义为不增加要素投入的产量增加。

第三，由于刘易斯没有把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区分开来，因此，创新的要素偏向被他忽视了。我们曾指出，刘易斯暗含地假定要素比例是固定的，资本积累与劳动吸收是同步进行的，即技术进步是中性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国家的技术具有很高的资本偏向，虽然资本积累不慢，但就业创造率很低。拉尼斯和费景汉认识到刘易斯模式这个缺陷。他们强调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的劳动偏向，并告诫说，发展中国家在选择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时一定要考虑本国劳动丰富这一特点。

第四，刘易斯在分析人口流动时也考虑到了人口增长问题，但他认为人口增长一般赶不上资本积累的增长（若利润都归于资本家），因此，人口增长对他的模式来说不是一个重要抑制因素。但是，拉尼斯和费景汉明确地指出了人口增长对劳动力转移的阻碍，并确定了临界最小努力准则。这就为发展中国家控制人口增长提供了一个理论依据。这也是对刘易斯模式的一个发展。

拉尼斯—费模式也存在着一些缺陷，有些是与刘易斯模式共有的。

第一，拉尼斯—费模式与刘易斯模式一样，假定农业部门存在剩余劳动，而工业部门不存在失业。这一假定与发展中国家实际情况不符。实际上，发展中国家城市存在着大量失业，这是拉尼斯和费景汉在分析中未考虑过的。而一旦把城市失业现象考虑进去，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就要作重大修改。

第二，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都把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看成是由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决定的。由于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农民收入是由制度决定的，并且是不变的，因此工业工资水平按照农产品计算也不变。但事实上，尽管农村还存在着剩余劳动，城市存在失业，城市工资水平还是上升的。

第三，拉尼斯和费景汉假定农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不会因农业生产率变化而变化，这一点也是不合理的。日本经济学家大岛（Oshima, H.T.）批评说：“从经验观点看，这个模式最难于接受的部分（对模式是关键的部分）是这样一个假定，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头两个阶段的农业工资仍然不变。”<sup>①</sup>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地方，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这是因为，如果土地是由农民自己所有，他们上缴

<sup>①</sup> 大岛·拉尼斯—费经济发展模式简评·美国经济评论，1963（6）：451

的税收低于他们的收入增加额；如果土地是由地主占有，农业产量的增加会在地主和佃农之间按一定比例分成。

### 第三节 乔根森模式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Jorgenson, D.W.）创立了一个新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sup>①</sup>。这个模式不同于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它不是建立在剩余劳动与不变工资假定上的。它不承认农业有边际生产率等于零的剩余劳动存在，也不认为农业与工业的工资水平是固定不变的。因此，乔根森认为他的模式属于新古典经济学。

#### 一、基本假定与结构

与刘易斯、费景汉和拉尼斯一样，乔根森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先进或现代部门和落后或传统部门。前者以工业部门为代表，后者以农业部门为代表。农业被假定没有资本积累，农业产出只需投入劳动和土地，而土地被假定是固定的，因而，农业产出惟一的是劳动的函数。在工业部门，土地不作为一个要素，工业产出只是资本与劳动的函数。此外，两个部门生产被假定随时间而自动增加，这种不增加要素而增加产出现象被叫做技术进步。乔根森假定技术进步是中性的。

在上述假定基础上，乔根森建立了他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这个模式的基本结构是：人口增长取决于人均粮食供给。如果粮食供给是充分的，人口增长率将达到生理最大量。当人均粮食供给增长率大于最大人口增长率时，农业剩余就产生了。农业剩余一出现，农业劳动力就开始向工业部门转移，于是，工业部门就开始增长。农业剩余越大，劳动力转移规模就越大。

#### 二、农业发展与人口增长

乔根森首先假定发展中国家经济没有工业，所有生产活动都集中在农业部门。设  $P$  为总人口， $Y$  为农业总产出， $L$  代表土地，于是，农业生产函数为：

$$Y = e^{\alpha t} L^{\beta} P^{1-\beta}$$

在这里， $\alpha$  表示农业部门技术进步率， $e^{\alpha t}$  表示  $t$  年与技术进步有关的增长因子， $\beta$  表示土地产出弹性或土地在农产品中的相对贡献， $1-\beta$  表示劳动的产出弹性或劳动在农产品中的相对贡献。 $\alpha$ 、 $\beta$  都是参数。由于土地供给被假定是固定的，上述生产函数也可以写为：

$$Y = e^{\alpha t} P^{1-\beta}$$

用总人口去除方程两边，即得：

<sup>①</sup> 乔根森：二元经济的发展，经济学杂志，1961（6）：309～334

$$y = \frac{Y}{P} = e^{\alpha} P^{-\beta}$$

在这里， $y$  表示人均农业产出。若对时间  $t$  求导，然后两边除以人均产出，生产函数就变成如下形式：

$$\frac{y'}{y} = \alpha - \beta \frac{P'}{P}$$

这个函数表明了人均农业产出增长率与人口增长率之间关系。在下面分析中将经常使用它。

乔根森继承了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认为人口增长依赖人均农业产出或人均粮食产出的增长<sup>①</sup>。于是，人口增长率公式为：

$$\frac{P'}{P} = \min \left\{ \begin{array}{l} \gamma y - \delta \\ \epsilon \end{array} \right.$$

在这个函数中， $\gamma$  表示与人均粮食产出有关的人口出生率增长率，它被假定是一个常数， $\gamma y$  即为人口出生率。例如，设  $\gamma = 0.01\%$ ，当  $y = 100$  时，人口出生率  $\gamma y = 1\%$ ；当  $y = 200$  时，人口出生率  $\gamma y = 2\%$ 。 $\delta$  代表人口死亡率，它也被假定为一个常数。 $\epsilon$  代表一个社会在现有制度和医学水平上能够达到的生理最大人口增长率，它也被假定是一个不变的量。 $\min$  表示两数之中取其小的符号。这个函数表明，在达到最大人口增长率之前，总人口增长率将随人均粮食产出增长而增长。

在建立了农业生产函数与人口函数之后，乔根森开始讨论农业发展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人口增长率低于生理最大量。在这种情况下，人口函数是：

$$\frac{P'}{P} = \gamma y - \delta$$

把它代入生产函数中，即得：

$$\frac{y'}{y} = \alpha - \beta (\gamma y - \delta) = \alpha + \beta\delta - \beta\gamma y$$

两边同乘以  $y$ ，即得农业发展理论的基本微分方程：

$$y' = (\alpha + \beta\delta) y - \beta\gamma y^2$$

设人均粮食产出增长率等于零，则有：

$$(\alpha + \beta\delta) y - \beta\gamma y^2 = 0$$

这个方程有两个根， $y_1 = 0$ ， $y_2 = (\alpha + \beta\delta) / \beta\gamma$ 。当人均粮食产出等于零时，人口增长率下降为负数，且等于人口死亡率  $\delta$ 。当人均粮食产出等于  $y_2$  时，则人口增长率为：

$$\frac{P'}{P} = \gamma \left[ (\alpha + \beta\delta) / \beta\gamma \right] - \delta = \frac{\alpha}{\beta} > 0$$

这意味着人口与粮食总产出以同一比率增长，而人均粮食产出不变，即  $y' = 0$ 。这种人均粮食产出不变而人口增长率为正数的情况，乔根森叫做低水平均衡陷阱。这与莱

<sup>①</sup> 在乔根森模式中，农业产出被假定都由粮食构成，因此，农业产出与粮食产出没有区别。



宾斯坦提出的低水平均衡陷阱概念是一致的。

按照乔根森的观点，如果一个经济处在低水平均衡陷阱中，它就不可能存在劳动力从农业到工业流动的问题，所有的人口都必须从事农业。这就否定了农业存在剩余劳动的可能性，因为人口增长将引起粮食生产同比例的增长，不存在劳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详谈。

农业发展的第二种情况是，人口增长率达到生理最大量。在这种情形下，人口函数就变成：

$$\frac{P'}{P} = \gamma y^+ - \delta = \epsilon$$

在这里， $y^+$  代表人口增长达到生理最大量时的最低人均粮食产出。解出  $y^+$ ，得：

$$y^+ = (\epsilon + \delta) / \gamma$$

当人均粮食产出达到  $y^+$  时，人口增长率达到生理最大量，于是，生产函数变为：

$$\frac{y'}{y} = \alpha - \beta \epsilon$$

这个生产函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是乔根森二元经济发展模式建立的前提。这是因为，如果  $y < y^+$ ，人口增长率低于生理最大量，粮食产出的增长将会被人口的增长所吞没，从而，生产非农产品的工业部门不会出现。只有当  $y = y^+$  时，人口增长率达到生理最大量，粮食产出的增长率才有可能超过人口增长率，产生农业剩余。对于乔根森来说，农业剩余是工业部门产生与扩张的必要与充分条件，也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必要与充分条件。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乔根森把  $y^+$  叫做临界人均收入水平。

### 三、农业剩余与工业扩张

按照乔根森的定义，当  $y > y^+$ ，即  $\alpha - \beta \epsilon > 0$  时，农业剩余便产生了。设  $S$  代表农业剩余，于是：

$$S = y - y^+$$

农业剩余的产生使得总人口中有一部分可以从土地上释放出来生产工业品，这样，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就开始了。设农业人口为  $A$ ，工业人口为  $M$ ，总人口为  $P$ ，于是：

$$P = A + M$$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的规模必须与农业剩余的规模相适应。这两者之间的平衡关系是：农业剩余在总农业产出中的比例等于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其推导过程可以表述如下：总农业产出即总粮食产出等于农业人均产出与农业人口的乘积，即  $y \cdot A$ ；总粮食消费等于临界最小人均收入与总人口的乘积，即  $y^+ \cdot P$ 。在这里，乔根森假定，当人均收入超过  $y^+$  时，人们也只消费  $y^+$  量的粮食，其超过的收入部分全部用于工业品的消费。根据乔根森的观点，所有粮食都被消费掉，于是便得到下列等式：

$$y \cdot A = y^+ \cdot P$$

这个等式可以写成：

$$\frac{y^+}{y} = \frac{A}{P}$$

由于  $S = y - y^+$ ， $P = M + A$ ，所以，上式可以写成：

$$\frac{S}{y} = \frac{M}{P}$$

在这个等式中，左边表示农业剩余占总农业产出的比率，右边表示工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这个等式明确地显示了农业剩余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意义。如果没有农业剩余，工业人口等于零，即所有人口从事农业。如果农业剩余在总农业产出中的比例很大，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部门去的比例也很大。

现在开始讨论工业部门的发展。乔根森首先分析工业劳动力的增长，然后考察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最后论述工资的变化。

从农业产出达到临界最低水平 ( $y = y^+$ ) 这一点开始，人口以生理最大比率增长。于是， $t$  年的总人口为：

$$P(t) = e^{at} P(0)$$

在这里， $t=0$  被作为  $y = y^+$  的时间点。按照乔根森的观点，农业总产出的增长与总人口的增长始终保持同步性，人均粮食消费是不变的，且等于临界水平  $y^+$ ，即：

$$\frac{Y}{P} = y^+ \quad (13)$$

或， $Y = P y^+ = P(0) e^{at} y^+$

由于农业总产出全部用于消费，于是，农业生产方程与粮食消费方程相等，即：

$$Y = e^{\alpha t} A^{1-\beta} = P(0) e^{at} y^+$$

上式经过整理，得到农业人口方程为：

$$A = [P(0) y^+]^{\frac{1}{1-\beta}} e^{\frac{(\epsilon-\alpha)t}{1-\beta}}$$

由于起点是从最大人口增长率开始的，所以，当  $t=0$  时， $y = y^+$ 。于是有：

$$y^+ = e^{\alpha \times 0} P(0)^{-\beta} = P(0)^{-\beta}$$

把此式代入农业人口方程，便有：

$$A = P(0) e^{\frac{(\epsilon-\alpha)t}{1-\beta}} = A(0) e^{\frac{(\epsilon-\alpha)t}{1-\beta}}$$

在这里， $P(0) = A(0)$ ，表示 0 年的全部人口都在农业部门就业。从农业人口函数中可知，生产农业产出  $Y$  所需的农业劳动力决定于两个参数变量，即最大人口增长率  $\epsilon$  和农业技术进步率  $\alpha$ 。若  $\epsilon > \alpha$ ，农业劳动力增加；若  $\epsilon < \alpha$ ，则农业劳动力减少。

工业人口等于总人口减去农业人口之差，即：

$$M = P(0) [e^{at} - e^{\frac{(\epsilon-\alpha)t}{1-\beta}}]$$

在这里， $M(0) = 0$ ，这与  $A(0) = P(0)$  相对应，意味着 0 年的工业人口为零。前已指出，农业剩余是工业劳动力产生的充要条件。农业剩余的条件是  $\alpha - \beta\epsilon > 0$ 。把这个不等式两边同加以  $\epsilon$ ，移项整理得：

$$\varepsilon - \alpha < \varepsilon (1 - \beta)$$

即：

$$\varepsilon > \frac{\varepsilon - \alpha}{1 - \beta}$$

由此可见，在农业剩余存在的条件下，总人口增长快于农业人口增长，从而，工业人口的增长快于总人口的增长。这意味着农业人口流入城市工业部门的速度快于人口的增长速度。从工业人口方程中还可以得到另一个结论：工业人口增长率持续下降，并且作为一个极限，等于最大人口增长率  $\varepsilon$  ①。

为了研究资本积累，需要建立工业生产函数。根据前面的假定，设  $X$  为总工业产出， $K$  为资本， $M$  为工业劳动力，于是：

$$X = e^{\lambda t} K^{\sigma} M^{1-\sigma}$$

在这里， $\lambda$  代表工业技术进步率， $\sigma$  代表资本产出弹性和资本在总产出中的份额， $1 - \sigma$  代表劳动产出弹性和劳动在总产出中的份额。 $\lambda$ 、 $\sigma$  都是参数。

与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一样，乔根森假定工业部门利润全部用于投资，于是有如下投资方程：

$$\dot{K} = \sigma X$$

在这里  $K$  代表资本增量， $\sigma X$  代表利润总额。使用工业生产方程与工业劳动力方程来消去  $X$  和  $M$ ，即得：

$$\dot{K} = \sigma K^{\sigma} P(0)^{1-\sigma} e^{\lambda t} [e^{\varepsilon t} - e^{(\frac{\varepsilon-\alpha}{1-\beta})t}]^{1-\sigma}$$

乔根森把这个投资方程叫做二元经济的基本微分方程。从这个投资方程中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结论。第一，只要存在一个正数且上升的农业剩余，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地进行下去，因为工业投资不断增加。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初始存量，即 0 年的人口规模  $P(0)$  和资本存量规模  $K$ 。由于资本不断地被折旧掉，因此，只有最初的人口规模对长期经济增长有影响。第二，不存在为达到持续经济增长所需的临界最小资本存量。只要有一个正数且上升的农业剩余，无论最初资本多么小，持续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进行下去。

① 以上两个结论推导如下：在工业人口函数中，对时间  $t$  求导，即得：

$$\dot{M} = P(0) [\varepsilon e^{\varepsilon t} - (\frac{\varepsilon - \alpha}{1 - \beta}) e^{(\frac{\varepsilon - \alpha}{1 - \beta})t}]$$

两边除以  $M$ ，即得工业人口增长率方程：

$$\begin{aligned} \frac{\dot{M}}{M} &= \frac{P(0) [\varepsilon e^{\varepsilon t} - (\frac{\varepsilon - \alpha}{1 - \beta}) e^{(\frac{\varepsilon - \alpha}{1 - \beta})t}]}{P(0) [e^{\varepsilon t} - e^{(\frac{\varepsilon - \alpha}{1 - \beta})t}]} \\ &= \frac{\varepsilon - (\frac{\varepsilon - \alpha}{1 - \beta}) e^{(\frac{\varepsilon - \alpha}{1 - \beta})t}}{1 - e^{(\frac{\varepsilon - \alpha}{1 - \beta})t}} \end{aligned}$$

由于  $\varepsilon - \beta > 0$ ，所以， $\beta\varepsilon - \alpha < 0$ 。于是有  $e^{(\frac{\varepsilon - \alpha}{1 - \beta})t} < 1$ 。当  $t$  最初增加时， $\frac{\dot{M}}{M} > \varepsilon$ ，即工业人口增长率大于最大人口增长率。当  $t \rightarrow \infty$  时， $\frac{\dot{M}}{M} \rightarrow \varepsilon$ ，即工业人口增长率趋向于最大人口增长率。

工业产出的增长可以从工业生产函数中直接导出，对时间  $t$  求导，然后除以  $X$ ，即得：

$$\frac{\dot{X}}{X} = \lambda + (1 - \sigma) \frac{\dot{M}}{M} + \sigma \frac{\dot{K}}{K}$$

这个方程表明工业产出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加上工业人口增长率和资本存量增长率的加权平均。

从以上投资方程分析中可知，资本存量始终以正数比率增长；从工业人口方程分析中可知，工业劳动力增长率开始很高，然后逐渐下降到接近最大人口增长率水平。因此，工业产出的增长趋势是，开始增长很快，然后逐渐地接近它的长期均衡值。这一事实表明，工业产出的最初迅速增长丝毫不意味着从体系外部注入大量的资本。如果一个正数且上升的农业剩余存在，工业部门就会自行蓬勃发展下去。

从乔根森模式中可以推导出，长期下来，工业部门产出增长率与资本积累率趋于相等。上述投资方程中，令  $t \rightarrow \infty$ ，于是，资本积累率趋向于一个常数，即：<sup>①</sup>

$$\frac{\dot{K}}{K} = \frac{\lambda}{1 - \sigma} + \epsilon$$

工业劳动力方程中令， $t \rightarrow \infty$ ，即得：

$$\frac{\dot{M}}{M} = \epsilon$$

于是，在工业生产函数中把这些极限值代入，便得：

$$\begin{aligned} \frac{\dot{X}}{X} &= \lambda + \sigma \frac{\dot{K}}{K} + (1 - \sigma) \frac{\dot{M}}{M} \\ &= \lambda + \sigma \left( \frac{\lambda}{1 - \sigma} + \epsilon \right) + (1 - \sigma) \epsilon \\ &= \frac{\lambda}{1 - \sigma} + \epsilon \end{aligned}$$

由此可见，工业资本增长率与工业产出增长率在长期都趋向于一个常数  $\frac{\lambda}{1 - \sigma} + \epsilon$ 。

关于工资水平，乔根森假定，工业工资率等于劳动边际生产率。对工业生产函数中的  $M$  求偏导，便得：

$$\frac{\partial X}{\partial M} = (1 - \sigma) x = w$$

这里， $1 - \sigma$  代表劳动在产出中的份额， $x$  为人均产出，它等于  $\frac{X}{M}$ ， $w$  为工业工资率。在上式中对  $w$  求导，然后除以  $w$ ，即得工资率增长率：

$$\frac{\dot{w}}{w} = \frac{\dot{x}}{x}$$

这意味着工资率增长率等于人均产出增长率。乔根森指出，人均产出增长率等于总

<sup>①</sup> 推导过程相当复杂，在此略而不论。对此有兴趣者，请参看：乔根森，二元经济的发展，经济学杂志，1961. 6: 330 - 333

产出增长率与工业劳动力增长率之差，于是，工资率增长率为：

$$\frac{\dot{w}}{w} = \frac{\dot{x}}{x} = \left[ \frac{\dot{X}}{X} - \frac{\dot{M}}{M} \right] = \left[ \frac{\lambda}{1-\sigma} + \epsilon \right] - \epsilon = \frac{\lambda}{1-\sigma}$$

从工资率增长率公式中可以看到，工资率增长取决于工业技术进步率。如果没有技术进步，即 $\lambda = 0$ ，那么，工人的实际工资就是不变的，这与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的观点是一致的。但是，当工业技术进步存在时，工人的实际工资就是上升的，技术进步越大，实际工资上升得越高。此外，工资率增长率还取决于资本积累率。因为 $1 - \sigma$ 表示劳动在总产出中的份额，劳动份额越大，资本份额即利润就越小，从而资本积累率就越低。反之，当劳动份额减少时，利润和资本积累就增加。因此，工资率增长率与劳动份额成反比，而与资本积累成正比。由于工业扩张总是伴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率的上升，所以，乔根森认为，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不是固定的，而是不断上升的。这显然是对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的不变工资假定的否定。

乔根森还认为，农业工资也不是固定的。为了引诱农业劳动者转移到工业部门，工业工资必须高于农业工资。但他假定这个工资差异在比率上是固定的。这样，由于工业工资是上升的，农业工资也将按同一比例上升。

#### 四、乔根森模式的特点与缺陷

乔根森把他的模式叫做新古典模式，而把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叫做古典模式。他对这两种模式的区别作了明确的表述。他指出：“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已经在古典和新古典结构中被探讨。对于二元经济发展的这两种研究方法的主要差别就在于支配工业部门劳动供给的条件。在古典理论方法中，实际工资率被假定是按农产品固定的。从工业观点来看，劳动以一个固定工资率可以无限地利用。在新古典方法中，如果不牺牲农业产出，劳动是决不能为工业部门所利用的。从工业部门观点来看，实际工资率在长期稳定地上升，主要取决于两个部门的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伪装的失业被假定是不存在的。”<sup>①</sup>

根据乔根森的论述，我们把乔根森模式与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作一比较，从中可以得到乔根森模式的一些特点。

(1) 乔根森模式是建立在农业剩余基础上的，这与建立在剩余劳动基础上的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完全不同。按照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发展中国家农村存在着边际生产率为零和低于实际收入的剩余劳动或伪装失业，这些剩余劳动是劳动力转移的必要条件，一旦这些劳动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以二元经济为特征的劳动力转移过程就告结束。乔根森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农业部门不存在边际生产率等于零和低于实际工资的剩余劳动。即使一个经济陷入低水平均衡状态中，人口增长也伴随着农业产出的增长。如果人口增长快于农业产出的增长，人口增长就会自动地放慢下来，最终与农业产出增长相适应。因此，劳动力转移不可能以剩余劳动为前提。

<sup>①</sup> 乔根森·剩余农业劳动与二元经济的发展·牛津经济文汇，1967（11）：209

对于乔根森模式来说，农业剩余是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充分和必要条件。没有农业剩余，所有人口都必须从事农业。当农业剩余出现时，农业部门就有一部分劳动力从土地上被释放出来，参加工业生产。农业剩余规模越大，劳动力转移规模也越大，两者同比例地增长。

这里需要指出，在拉尼斯—费模式中，农业剩余也是劳动力转移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但是，拉尼斯和费景汉所说的农业剩余是与剩余劳动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乔根森所说的农业剩余是以最大人口增长率为前提的，这两个概念完全代表不同的意思。

(2) 在乔根森模式中，工资水平不是固定的，而是上升的。这个观点也是直接与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的观点对立的。后者认为，由于剩余劳动的存在，劳动的供给始终大于需求，所以，工资水平被固定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在剩余劳动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去之前，这种生存工资水平是不会改变的。乔根森否定了剩余劳动的存在，因而也否定了赖以建立的不变工资说。他认为，两个部门的工资水平都决定于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由于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总是提高的，因此，工资水平是上升的。

(3) 在乔根森模式中，人口增长是由经济增长决定的。这是马尔萨斯人口论观点。正是这个观点使他否定了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的剩余劳动假说和固定工资观点。根据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的观点，人口增长是一个外生的变量，它不受经济增长因素的影响。外生因素如医学进步使人口死亡率下降导致人口增长快于经济增长，从而使得在有限的土地上容纳不下这么多的劳动人口，出现了边际生产率极低的伪装失业者。乔根森的观点刚好相反，他把人口增长看做是一个内生变量。因此，人口增长速度不会超过经济增长速度。这意味着一旦人口增长超过经济增长，人们将由于缺乏必要的粮食供给而自动降低生育率，使人口增长恢复到与经济增长相一致。既然人口增长不会超过经济增长，那么，剩余劳动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人口增长内生决定论是乔根森否定古典人口流动模式的理论基础，也是他建立新古典的人口流动模式的必要前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乔根森是一个新马尔萨斯人口论者，他对经济发展并不持悲观态度。他认为，经济增长虽然会引起人口增长，但人口增长有一个生理最大量限界。一旦经济发展使人口增长达到生理最大量，人口增长率就不会再增长了，这时，经济的继续增长就会超过人口增长，农业剩余也就随之产生和扩大。按照乔根森的观点，经济之所以能持续增长，关键在于技术总是不断进步的。

(4) 在乔根森模式中，劳动力转移的意义不在于生产率的增加，而在于消费结构的必然变化。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中，农业中存在着生产率极低的剩余劳动力，这些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高的工业部门将会增加整个经济总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发展。但是，乔根森不承认剩余劳动的存在。他认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劳动力之所以持续地转移到工业部门，是因为消费需求结构必然发生变化。人们对粮食的需求是有限的，而对工业品的需求是无限的。当人均粮食产出超过最大人口增长所需的临界水平，即  $y > y^+$  时，农业部门的进一步发展就受到限制。于是，农业人口就转向工业部门生产工业品，以满足对工业品的扩大需求。

乔根森模式与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相比，更强调农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更

着重市场机制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作用。此外，乔根森模式否定了固定工资假定，这一点也比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更接近现实些。但是，乔根森模式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有些是与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所共有的，如忽视了农业物质投资的重要性，城市的失业等。乔根森模式最明显的缺陷是有关粮食需求收入弹性的假定。在乔根森模式中，当人均粮食产出低于临界最低水平时，即  $y < y^+$  时，所有的收入都用于粮食的消费，即粮食需求的收入弹性是 1。一旦人均粮食产出达到和超过临界最低水平时，人们就把所有增加的收入用于工业品的消费，而没有增加粮食消费的欲望。这就是说，在存在农业剩余时，粮食需求收入弹性为零。这个假定遭到一些学者的指责。例如，速水佑次郎和拉坦批评说：“这些假定显然是与人口统计或粮食消费行为不一致的。一般地，当粮食需求收入弹性远高于零时，人口增长率就开始下降。而且，甚至在最高收入国家，粮食需求收入弹性也没有下降到零。”<sup>①</sup>

## 第四节 托达罗模式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托达罗发表了一系列论文，阐述了他的人口流动模式。这个模式是建立在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失业这一事实基础上的。因此，它与建立在充分就业假定上的刘易斯模式、拉尼斯—费模式和乔根森模式不同，后者旨在研究如何加速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转移，而前者旨在探讨怎样放慢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

### 一、迁移决策与就业概率

在前面论述的三个模式中，劳动者从农村迁入城市的决定被认为惟一地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高于乡村农业部门一般工资水平一个适当的比例，农民就愿意离开土地迁移到城市中去谋求新的职业。这个观点实际上包含了这样的假定：城市部门不存在失业，任何一个愿意迁移到城市去的劳动者都可以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找到工作。因此，迁移者不必担心因失业而遭到损失。当然，短期失业是可能存在的，但这会降低工资，从而减慢人口流入城市的规模和速度，使得城市劳动供给下降到与劳动需求相适应，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

但是，60 年代和 70 年代，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而与此同时，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的速度并没有放慢，反而持续地增长。这一事实使得建立在充分就业假定上的人口流动模式显然丧失了它的有效性。托达罗在 1970 年与另一位学者哈里斯 (Harris, J. R.) 合写的一篇论文中指出：“在世界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热带非洲的国家，一个奇怪的经济现象目前正在发生。虽然农业边际产品是正数，城市失业水平很高，但是，乡—城劳动迁移不仅存在，而且事实上在加速。由于常规经济模式仅仅依

<sup>①</sup> 速水佑次郎，拉坦·农业发展的国际分析·英文版，1985 (29)

赖通过适当工资和价格调整达到充分就业均衡，所以，在整个经济不存在绝对劳动过剩的条件下，它们很难用来为巨大的、日益增长的城市失业水平提供合理的行为解释”<sup>①</sup>。这里附带指出，托达罗不承认农村存在剩余劳动，认为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始终是正数。这一观点与刘易斯、拉尼斯和费景汉的观点是对立的，而与乔根森的观点是一致的。因此，托达罗模式可以说是新古典模式。

由于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的存在，托达罗认为，一个农业劳动者是否迁入城市不仅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而且还决定于城市就业率或失业率。这正是托达罗模式不同于传统人口流动模式的差别所在。托达罗指出，当城市失业率很高时，即使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很大，一个农业劳动者也不会简单地作出迁移到城市去的决定，他还必须考虑其他因素。

假设在未来某一个时期，一个农民在田间劳动可以获得 50 元实际收入，而与此同时，他如果迁入城市在现代工业部门工作就可以获得 100 元的实际收入。按照刘易斯、拉尼斯—费根森和乔根森模式的假定，这个农民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将会选择迁入城市。但是，在托达罗看来，在失业存在的情况下，潜在的迁移者决不只是考虑两种工作的实际收入差异，还必须考虑一定时期里在城市现代工业部门找到高报酬工作的就业机会或就业概率（employment probability）的大小。因此，在他作出迁移决策时，这个劳动者必须在一定时期内遭受失业风险和获得高收入之间进行权衡。如果这一时期城市失业率很高，他获得高收入工作的机会或概率只有 40%，那么，虽然这时城乡实际收入相差 50 元，但这个农民作出迁移到城市的决策就是不明智的，或如托达罗所说，是无理性的，因为他只能获得 40 元的城市预期收入，而与此同时，在农村劳动他可以得到 50 元收入。另一方面，如果这时的城市就业率高，他获得工作的概率达到 60%，那么，城市预期收入达到 60 元，比农业收入多 10 元，这个农民迁移到城市去碰碰运气就是合理的。

由此可见，就业概率在迁移决策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托达罗断言，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失业规模大且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如果不引入就业概率这个变量，要想解释持续的和常常是加速的人口流动现象，简直是不可能的。

## 二、人口流动行为模式

托达罗假定农业劳动者迁入城市的动机主要决定于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差异越大，流入城市的人口越多。这种关系可以表示如下：

$$M = f(d) \quad f' > 0$$

在这个公式中， $M$  表示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的数目， $d$  表示城乡预期收入差异， $f' > 0$  表示人口流动是预期收入差异的增函数。

按照托达罗的观点，农业部门预期收入即等于未来某年的实际收入，但现代工业部门的预期收入则等于未来某年的预期实际收入与就业概率的乘积。这样，城乡预期收入

<sup>①</sup> 哈里斯，托达罗：人口流动、失业和发展：两部门分析，美国经济评论，1970（3）：126



差异可以表示如下：

$$d = w \cdot \pi - r$$

在这里， $w$  表示城市实际工资率， $r$  表示农村平均实际收入， $\pi$  表示就业概率。假若城市不存在失业，迁移者一迁入城市就可以找到工作，就业概率  $\pi$  就等于 1。这时，劳动者迁移的动机就决定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这就与刘易斯、拉尼斯—费根森模式的假定一致了。

托达罗认为，任一时期，迁移者在城市现代部门找到工作的概率取决于两个因素，即现代部门新创造的就业机会和城市失业人数。就业概率与前一个因素成正比，与后一个因素成反比，用公式表示为：

$$\pi = \frac{\gamma N}{S - N}$$

在这个公式中， $\gamma$  表示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 $N$  表示现代部门总就业人数， $S$  表示城市地区总劳动力规模。于是， $\gamma$  和  $N$  的乘积表示现代部门在某一时期创造工作的机会， $S$  与  $N$  之差表示城市失业人数。

托达罗进一步指出，现代部门工作创造率等于工业产出增长率减去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即：

$$\gamma = \lambda - \rho$$

在这里， $\lambda$  表示工业产出增长率， $\rho$  表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

以上建立的人口流动行为模式是指一个阶段（譬如 1 年）而言的。由于绝大多数迁移者是 15 岁 ~ 24 岁的青少年，因此，事实上，迁移者往往要等好几年时间才能在现代部门找到工作。这样，为了更加接近现实，人口流动行为模式应该建立在较长的时间范围基础上。设  $V(0)$  代表迁移者计划期内预期城乡收入差异的净贴现值， $Y_u(t)$ 、 $Y_r(t)$  分别代表  $t$  期城市和乡村的实际工资率， $n$  表示计划范围内的时期数， $r$  表示贴现率，托达罗把它解释为反映迁移者的时间偏好程度。于是，一个迁移者在现代部门找到工作以前的  $n$  期净收入贴现值公式可以表示如下：

$$V(0) = \int_{t=0}^n [p(t) Y_u(t) - Y_r(t)] e^{-rt} dt - C(0)$$

在这个贴现值公式中， $C(0)$  表示迁移成本（如搬迁费等）， $p(t)$  表示一个迁移者  $t$  期中在现代部门获得工作的概率。这里必须注意， $p(t)$  与以上所说的  $\pi$  是不同的，但有联系。以上所说的  $\pi$  是指一个迁移者现有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在某一个特定时期被现代部门作为随机挑选而雇用的概率，而  $p(t)$  表示  $t$  期一个迁移者累加的就业概率。它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描述如下。

一个迁移者第一个时期获得工作的概率等于这个时期被现代部门选雇的概率，即：

$$p(1) = \pi(1)$$

第二个时期获得工作的概率等于第一个时期被现代部门雇用的概率加上第二个时期被雇用的概率与第一个时期未被选雇的概率之乘积，用公式表示为：

$$p(2) = \pi(1) + [1 - \pi(1)] \pi(2)$$

依此类推，这个迁移者在  $t$  期的就业概率为：

$$p(t) = p(t-1) + [1 - p(t-1)] \pi(t)$$

把等式右边都用一个时期被选聘的概率来表示，则有：

$$p(t) = \pi(1) + \sum_{i=2}^t \pi(i) \prod_{j=1}^{i-1} (1 - \pi(j))$$

在这里，

$$\prod_{i=1}^n a_i = a_1 \cdot a_2 \cdot a_3 \cdot a_4 \cdots a_{n-1} \cdot a_n$$

从以上就业概率公式中可知，假设实际收入  $Y_u(t)$  和  $Y_r(t)$  不变，那么，一个迁移者在城里待的时间越长，他获得工作的机会就越大，从而，他的预期收入也越高。这就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农村一些青少年虽然知道进城后不会很快在现代部门找到工作，但愿意流入城市甘当失业大军中的一员，因为他们预计在城里待长一点时间会找到工作的，因此，从长期观点来看，城市预期收入还是比农村预期收入高<sup>①</sup>。

按照托达罗的观点，乡—城人口流动规模是城乡收入贴现净值的函数，即：

$$M = f[V(0)] \quad f > 0$$

若  $V(0) > 0$ ，则迁移者愿意流入城市，城市净流入人口就增加；若  $V(0) < 0$ ，则迁移者不愿意流入城市甚或从城市倒流到乡村，于是，城市净流入人口就不会增加，甚至减少。托达罗认为，当前发展中国家城市移民人数猛增，这主要是城乡预期收入差异扩大的结果。

### 三、城市失业动态均衡模式

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决定了较大的城乡收入差异，而这又导致了农村人口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地区，造成了城市劳动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愈来愈严重。根据以上建立的人口流动行为模式，托达罗进一步建立了城市失业动态均衡模式。

设城市现代部门劳动需求方程为：

$$N(t) = N_0 e^{\gamma t}$$

在这里， $N(t)$  表示  $t$  期城市现代部门总就业量， $N_0$  表示 0 期的现代部门总就业量， $\gamma$  表示现代部门的工作创造率，它等于工业产出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差，即  $\gamma = \lambda - \rho$ 。对劳动需求方程中的时间  $t$  求导，然后除以  $N(t)$ ，便得到第  $t$  期的城市现代部门就业增长率公式：

$$\frac{N'}{N}(t) = \gamma$$

托达罗认为，城市劳动供给决定于城市劳动力自然增长率和乡—城人口流动规模。于是，城市劳动供给增长率方程可以用下式表示：

<sup>①</sup> 这里需要指出，托达罗把城市部门分为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凡是不在现代部门就业的劳动者都被假定在传统部门就业。他把在传统部门从事临时性的、收入低的工作的劳动者和完全处于闲置状态的劳动者都看做是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因此，必须记住，在托达罗模式中，所说的就业概率是特指在现代部门获得工作的概率。

$$\frac{S'}{S}(t) = \beta + \pi(t) F\left[\frac{Y_u(t) - Y_R(t)}{Y_R(t)}\right]$$

设,

$$\alpha(t) = \frac{Y_u(t) - Y_R(t)}{Y_R(t)}$$

于是, 劳动供给增长率方程为:

$$\frac{S'}{S}(t) = \beta + \pi(t) F(\alpha(t))$$

在这里,  $\frac{S'}{S}(t)$  表示第  $t$  期城市现代部门劳动供给增长率,  $\beta$  表示城市劳动力自然增长率,  $\alpha(t)$  表示城乡实际收入的相对差异, 以百分比计量,  $F(\alpha(t))$  表示城市迁入人口与收入差异之间的函数关系,  $\pi(t)$  即为第  $t$  期劳动者被招聘的概率, 这与上述的  $\pi$  具有同样意义。但必须注意, 这里之所以用  $\pi$  而不用  $p$  表示就业概率, 是因为这里要建立的失业均衡是指第  $t$  期的均衡, 而不是指  $t$  个时期的失业均衡。 $\pi(t) F(\alpha(t))$  表示城市净流入人口增长率<sup>①</sup>。在这里, 为分析简便, 托达罗假定城乡实际收入差异是固定的, 即  $\alpha(t) = \alpha$ 。根据上一节对  $\pi$  的定义可知:

$$\pi(t) = \frac{\gamma N(t)}{S(t) - N(t)}$$

于是, 劳动供给增长率方程变成如下形式:

$$\frac{S'}{S}(t) = \beta + \frac{\gamma N(t)}{S(t) - N(t)} (F\alpha(t))$$

设  $E(t)$  表示  $t$  期现代部门就业量对城市总劳动力的比率, 于是有:

$$E(t) = \frac{N(t)}{S(t)}$$

对  $t$  求导, 然后除以  $E(t)$ , 便得到现代部门第  $t$  期就业率增长率公式:

$$\frac{E'}{E}(t) = \frac{N'}{N}(t) - \frac{S'}{S}(t)$$

现在, 我们来描述一下城市劳动市场的调整过程。假设一个具有二元经济特点的发展中国家, 在工业化初期, 现代工业部门所占比重很小, 几乎所有的人口都生活在农村。这时, 城市收入水平很高, 工业部门迅速发展使得城市就业创造率大大地超过了城市人口增长率 ( $\gamma > \beta$ )。结果, 较大的城乡实际收入差异 ( $\alpha$ ) 和较高的就业概率 ( $\pi$ ) 诱使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这样, 城市劳动供给增长率就会逐渐地超过劳动需求增长率, 即  $\frac{S'}{S} > \frac{N'}{N}$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一个农村迁移者在城里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就不断变小, 即  $\pi(t+1) < \pi(t)$ 。假设  $\alpha$  和  $\gamma$  不变, 就业概率的下降必然

<sup>①</sup> 有必要指出, 在上一节论述的人口流动行为模式中, 托达罗把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表述为城市实际工资率与就业概率的乘积减去农村的平均实际收入, 即  $\pi w - r$ 。但在这里, 在建立动态失业均衡模式时, 托达罗实际上把城乡预期收入差异定义为就业概率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乘积, 即  $\pi(w - r)$ 。显然, 这两种表述方式是不一致的。这可能是为了分析上的方便。但这并不影响托达罗模式基本思想。

导致乡—城人口流动速度放慢，最终使得城市劳动供给增长率下降到等于城市劳动需求增长率即  $\frac{S'}{S} = \frac{N'}{N}$ 。这时，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就稳定在一个特定的水平上。假若由于某种原因，失业率下降或上升到这个水平以下或以上，那么，就业概率的上升或下降就使得它恢复到这个稳定的水平上。

综上所述，在城市劳动市场上，在  $\alpha$ 、 $\beta$ 、 $\gamma$  这些参数不变的条件下，就业概率充当了一个调节机制（如同商品市场上价格充当一个调节机制一样），使得城市失业率趋向一个稳定的水平。托达罗把这个水平的失业率叫做均衡失业率。设  $E^*$  代表均衡就业率， $1 - E^*$  代表均衡失业率。根据上述分析， $E^*$  的均衡条件为就业率增长率等于零，于是有：

$$\frac{E'}{E}(t) = \frac{N'}{N}(t) - \frac{S'}{S}(t) = 0$$

把上述劳动需求增长率公式与供给增长率公式代入，均衡方程就变为：

$$\frac{E'}{E}(t) = \gamma - \beta - \frac{\gamma F(\alpha) N(t)}{S(t) - N(t)} = 0$$

于是：

$$\gamma - \beta = \frac{\gamma F(\alpha) N(t)}{S(t) - N(t)}$$

由于就业率等于就业量与总劳动量之比，即  $E(t) = \frac{N(t)}{S(t)}$ ，所以，上式变为：

$$\gamma - \beta = \frac{\gamma F(\alpha) E^*}{1 - E^*}$$

解出均衡就业率，得：

$$E^* = \frac{\gamma - \beta}{\gamma F(\alpha) + \gamma - \beta}$$

这就是均衡就业率方程。设  $T^* = 1 - E^*$ ，于是，均衡失业率方程为：

$$T^* = 1 - \frac{\gamma - \beta}{\gamma F(\alpha) + \gamma - \beta}$$

均衡就业率和均衡失业率方程是参数方程， $\gamma$ 、 $\beta$ 、 $\alpha$  都是该方程参数。如果这些参数为常量，均衡就业率和失业率就不会变化。当这些参数变动时，均衡就业率和失业率就相应地发生变化。例如，假设现代部门就业增长率为 4% ( $\gamma = 0.04$ )，城市劳动力自然增长率为 2% ( $\beta = 0.02$ )，城乡实际收入差异为 100% ( $\alpha = 1.0$ )，为简便计，这里假设  $F(\alpha) = \alpha$ 。于是，根据均衡方程，解出均衡就业率为 33.3% ( $E^* = \frac{1}{3}$ )，均衡失业率为 66.7% ( $T^* = \frac{2}{3}$ )。这个数值表明，在城市劳动供给增长率等于劳动需求增长率这一均衡条件下，现代部门所能吸收城市劳动力就业的人数只占总劳动力的  $\frac{1}{3}$ ，而其余  $\frac{2}{3}$  劳动力都在传统部门，他们处在失业和半失业状态中。

关于在参数变动情况下如何保持均衡就业率和失业率不变这一问题，托达罗指出，

当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增加一个比率时，城市总劳动力供给就增加一个比率，因为更高的收入差异将引诱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要使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保持在均衡水平上，城市就业机会增长率必须相应地增加一个比率。设城乡实际收入差异  $\alpha$  增加一个比率，使得城市净流入人口增长率  $F(\alpha)$  增加一个比率，用  $dF(\alpha)$  表示；为使城市就业率和失业率保持在均衡水平上，就业创造率  $\gamma$  也必须相应增加一个比率，用  $d\gamma$  表示，于是便有如下公式：

$$E_1^* = \frac{(\gamma + d\gamma) - \beta}{[F(\alpha) + dF(\alpha)](\gamma + d\gamma) + (\gamma + d\gamma) - \beta}$$

$$= \frac{\gamma + d\gamma - \beta}{\gamma F(\alpha) + d\gamma F(\alpha) + \gamma dF(\alpha) + dF(\alpha) d\gamma + \gamma + d\gamma - \beta}$$

若使均衡就业率保持在原来水平上不变，即使  $dE^* = 0$ ，必须使  $E_1^* = E^*$ ，于是：

$$\frac{\gamma + d\gamma - \beta}{F(\alpha) \gamma + \gamma dF(\alpha) + F(\alpha) d\gamma + dF(\alpha) d\gamma + \gamma + d\gamma - \beta} = \frac{\gamma - \beta}{F(\alpha) \gamma + \gamma - \beta}$$

解出  $d\gamma$ ，即有：

$$d\gamma = \frac{-\gamma^2 dF(\alpha)}{\gamma F(\alpha) - \gamma\beta - F(\alpha)\beta - \beta dF(\alpha)}$$

这个方程表示在均衡就业率保持不变的条件下就业创造率增长率与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增长率之间的函数关系。例如，设城乡实际收入差异增加 20%，使得城市净流入人口增长率也增加 20%，即  $d\alpha = dF(\alpha) = 0.20$ ，若保持均衡就业率不变，即  $dE^* = 0$ ，现代部门就业创造率必须增长 1.9%，即  $d\gamma = 0.019$ 。由此，托达罗断言，增加城市就业机会必须与控制城市收入上升结合起来，否则，城市失业率就很难下降。

#### 四、政策含义

刘易斯模式、拉尼斯—费模式和乔根森模式的政策含义是加速城市工业部门的发展，控制人口增长，加快乡—城人口流动，尽快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先进的工业国。与这三种模式不同，托达罗模式的政策含义是如何阻止乡—城人口流动的规模和速度，以解决日益严重的城市失业问题。对于这个模式的政策含义可以进一步概述如下：

(1) 依靠工业扩张不能解决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严重失业问题。托达罗认为，资本积累的扩大必然伴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工业产出的增长必然高于劳动需求的增长。在托达罗模式中，工作创造率等于产出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差，即  $\gamma = \lambda - \rho$ 。随着工业部门的扩大，劳动就业增长率呈下降的趋势。

但是，托达罗模式的政策含义并不限于这一点，而且这不是它的主要之点。在托达罗看来，即使城市工业部门扩张与劳动需求扩张保持同步性，甚至通过更多地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来发展工业，使劳动需求增长快于工业部门产出的增长，这种工业化战略也不是解决城市失业的良策。从托达罗模式中可以知道，就业概率与现代部门的就业创造率成正比关系。现代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即  $\gamma$  越大，就业概率  $\pi$  就越大，在城乡实际收入差异不变的条件下，就业概率越大，城乡预期收入差异越大，从而将引诱越来越

越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而且流入的人口数目远大于工业部门创造的就业机会数目，据托达罗说，对于每个新创造的工作，将会有2个~3个农民迁入城市。这样就出现一个似乎难以理解的现象：城市现代部门扩张得越快，就业创造得越多，失业率就越高。因此，托达罗认为，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绝不能仅仅依靠工业部门的扩张。

(2) 一切人为地扩大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措施必须消除。在托达罗模式中，城乡实际收入差异是决定人口流动的重要因素。托达罗指出，在当今发展中国家，城市工资水平远不是市场力量决定的，而是由政府的最低工资法和工会垄断这些外在的力量决定的。这些由政治因素决定的工资水平远远高于农业平均收入，一般高达2倍~3倍，有的国家甚至高达4倍之多。这样高的收入差异无疑是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主要原因，即使城市失业率相当高。因此，托达罗认为，要降低城市失业率，就必须消除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法，限制工会的权力等，使城市工资水平下降，从而减少城乡实际收入差异。但是，托达罗又认为，由于政治原因，降低城市工资水平是困难的。因此，改善农村的生活条件也许是缩小城乡收入差异的切实可行的措施。

(3) 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城市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托达罗建议，政府应当改变重工业轻农业的发展战略，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改善农业的生产条件和农村的生活环境，使农业劳动者实际收入水平提高，生活环境更加舒适。这样，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刺激就会下降，从而城市就业压力就会减轻。

## 五、托达罗模式的特点与缺陷

托达罗模式是在传统人口流动模式不能解释人口流动与城市失业并存现象的条件下产生的，它能对这两个相互矛盾的现象作出合理的解释，因此，它受到经济学家的普遍赞扬。例如，美国经济学家威利斯（Willis, R.）在一篇评论文章中指出：“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迈克尔·托达罗那样对第三世界城市高失业率和农村迁移者向城市地区的大量流入的并存现象作出了如此令人信服的解释。这种包含在托达罗和哈里斯—托达罗模式中的解释已经导致了大多数经济学家观点的重大转变，这些经济学家原只信奉发展中国家一城人口流动的合理性，支持旨在促进城市就业机会增长的政策”<sup>①</sup>。

以下简要地概述一下托达罗模式的一些特点。

(1) 托达罗模式假定发展中国家农村部门不存在剩余劳动，而城市部门却有大量的失业。这个观点与刘易斯模式和拉尼斯—费模式的假定刚好相反，后两个模式假定农村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而城市不存在失业。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托达罗模式属于新古典传统。但是，它与乔根森新古典模式又有很大差异。在乔根森模式中，农村和城市都不存在失业。由于这个特点，托达罗模式不像其他人口流动模式强调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发展的积极意义，而是着重研究如何放慢人口流动速度，缓和城市的失业状况。

(2) 托达罗模式假定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由政治因素（政府和工会）决定的，因而不是固定的，而是上升的。这种不断上升的工资水平导致城乡实际收入差异拉

<sup>①</sup> 伊斯特林编，发展中国家人口与经济变化，英文版，1980，394~395

大，引起人口流动速度快于城市工业部门就业创造的速度，从而造成城市失业率上升。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假定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由农业部门的收入水平决定的。由于农业存在着剩余劳动，农业收入水平是由制度和习惯决定的，并且被固定在维持生存的水平上。因此，在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式中，不存在城乡收入差异扩大的问题，因而不存在城市失业问题，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速度与城市工业部门就业创造率是一致的。乔根森模式假定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由技术进步率和资本积累率决定的，并且随经济发展而不断上升。农业人均收入被假定与工业工资成一个固定的比例。因此，在乔根森模式中，城乡收入水平差异不会扩大，因而不会出现人口流动速度快于城市就业机会增长速度的问题。

(3) 由于把城市失业作为分析前提和目的，在托达罗模式中，就业概率被假定是人口流动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上所述，其他三个流动人口模式都把城市充分就业作为分析前提，因此，就业概率不作为人口流动的一个因素。在他们的模式中，影响人口流动的惟一因素是城乡实际收入差别。

(4) 托达罗模式特别强调农村和农业部门发展的重要性。这与其他流动人口模式明显不同。刘易斯模式只强调工业部门的扩张，而忽视了农业部门的发展。拉尼斯—费模式虽然没有忽视农业的发展，但是在强调工业扩张的基础上来强调农业发展的。由于农业不发展，农业剩余就出现短缺，从而工业部门扩张受到抑制。乔根森模式虽然强调农业发展，并且把农业剩余看做是工业部门扩张的充要条件。但是，在乔根森模式中，农业的发展仍然被作为工业发展的一个工具。与以上三个模式不同，托达罗模式不是把农业作为工业化的一个工具来强调它的发展的，而是把它本身作为一个发展目标。在托达罗模式中，农业与工业，农村与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消除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不是依靠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而是如何提高农业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使工农差别和城乡差别不断缩小，最终使二元性完全消失。托达罗的这一观点是与发展经济学在 60 年代中期以后的转变相一致的。从 60 年代中期开始，不仅经济增长，而且增加就业、消除贫困、缩小收入分配不均程度都成为经济发展的目标。而要达到这些目标，就必须大力发展农业，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和解决失业问题。

托达罗模式也受到一些批评。第一，有的学者认为，托达罗模式假定农村不存在剩余劳动，这是难以想象的。实际上，由于农村人口增长快于城市人口增长，在有限的土地上就必然存在一些劳动生产率很低的剩余劳动者。第二，托达罗模式假定流入城市的劳动者必定在城市里寻找工作，如果找不到工作，他们就宁愿在城里传统部门做些临时性工作或完全闲置着。但实际上，由于城市失业率太高，有些在城里找不到工作的迁移者将会感到失望，又返回到农村。此外，有些迁移者是临时性地在城里做工，一旦挣到一定数量的钱，他们就会回到农村，把这些收入用于农业投资，提高农业生产率。

## 第八章 经济发展中的优先次序

发展中国家不仅贫穷落后、资源（主要是资本）稀缺，而且面临着经济结构失衡、部门或地区之间发展不协调、资源配置不合理等问题。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资源？怎样合理地安排部门和地区发展的优先次序？选择什么样的发展模式？遵循什么样的发展路线？部门和地区发展的优先次序选择理论，就是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某种解答。

### 第一节 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

#### 一、平衡增长理论

平衡增长的基本思想可以追溯到 1844 年穆勒（Mill, J. S.）对“萨伊定律”的重新解释：如果没有计算错误，在所有产品之间按照私人利益指定的比例进行分配，那么，生产的每次增加都会创造出自己的需求。穆勒进一步补充说，生产创造出特定的供给，投资创造出特定的生产能力，特定的生产能力创造出收入，收入又创造出一般的需求。同理，为了使增加生产能力的结构适应增加需求的结构，首先必须在各种经济部门中按同一比例进行投资，使各部门同时平稳地增长，以达到供给与需求的一致。这意味着，对于它们的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大的部门和行业增长快，需求收入弹性小的部门和行业增长相对较慢，这就是平衡增长的含义。萨伊和穆勒的这一思想在 1945 年由诺伊曼（Neumann, J. V.）等人进一步发挥。诺伊曼在他的著名增长模式中，论证了所有产出都按同一比例增长，提出了一种最简单的平衡增长模式。

平衡增长理论在 20 世纪中叶重新突出出来是有其背景的：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独立的国家大多数贫穷和欠发达，迫切要求增长，以尽快赶上先进的工业国。由于在世界范围的增长体系中，单一的初级产品的生产将进一步扩大富国与穷国的增长率差距，因而它们迫切谋求一种工业品与初级产品平衡的生产体系。其次，凯恩斯革命强调的有效需求的重要性，对供给结构适应需求结构提供了新的理论解释。再次，在有效关税的保护下，德国和美国成功的工业化意味着比较劣势可以通过边干边学加以改善。最



后, 30年代的大萧条以及贸易保护主义的强化, 促使发展中国家减少对工业国贸易的依赖。所有这些, 促使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主张采取一国范围的平衡增长路线或发展中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平衡增长路线。平衡增长理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平衡增长”(balanced growth, 简称BG)这个术语有诸多不同的意义。最早的代表人物主张有必要以大规模的投资来克服发展过程中的供给和需求方面的不可分性。后来这一理论扩展为, 经济发展的道路以及投资的格局一定要使各经济部门保持平衡, 不要因某一个部门的停滞而阻碍其他部门的发展。这就意味着在整个工业或整个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同时进行大规模地投资, 使工业国或国民经济各部门按同一比率或不同比率全面地得到发展。斯特里顿(Streeten, P.)曾给包含不同含义和不同侧重点的平衡增长下了一个定义:“无论何时何地, 一些非无限小的投资决策的成功是相互依赖的, 因此, 根据消费者需求以及各产业对其他产业的产品相互需求格局, 同时在一系列产业中进行投资是必要的。”<sup>①</sup>满足上述要求的增长即为平衡增长。

平衡增长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①罗森斯坦-罗丹的平衡增长理论。强调投资规模的平衡增长理论, 其核心是要通过“大推进”式的投资来克服经济中存在的“不可分性”。主张对各个工业部门同时、按同一比率进行大规模投资, 以克服资本供给的“不可分性”, 使整个工业按同一速率全面增长, 实现工业化。这一派的主要代表是罗森斯坦-罗丹。②纳克斯的平衡增长理论。既强调投资规模即解决“不可分性”, 又强调国民经济总体都同时全面增长, 主张对工业、农业、外贸、消费品生产、资本品生产、基础设施等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同时、但按不同比率进行大规模投资, 以摆脱“贫困恶性循环”, 使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按不同比率全面增长, 实现经济发展。持这种观点的纳克斯和刘易斯<sup>②</sup>。

#### (一) 罗森斯坦-罗丹的平衡增长理论

1943年, 罗森斯坦-罗丹在他的著名论文中认为, 发展中国家要从根本上解决贫穷落后问题, 关键在于实现工业化。面要实现工业化, 首要的障碍是资本形成不足。但在增加资本形成的过程中, 由于资本的供给(尤其是社会分摊资本供给)、储蓄和市场需求的“不可分性”, 小规模、个别部门的投资是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的。必须实行“大推进”战略, 在各个工业部门全面地进行大量投资, 使各种工业部门都发展起来, 才能相互依赖, 互为市场, 克服“不可分性”, 实现工业的大发展。在他典型的“鞋厂”例子中, 他指出, 不仅要投资于鞋厂, 扩大鞋子生产规模, 而且要同时投资于服装厂、纺织厂、食品厂、钢铁厂等工业部门, 使其他工业全面发展起来, 以互相创造需求、提供市场, 最终使整个工业都得到增长。

罗森斯坦-罗丹指出, 在全面发展工业过程中, 为了避免一些工业发展过快, 产品过剩, 必须在投资时做到: 按同一投资率对各个工业部门进行投资。只有这样, 才能保证各工业部门之间发展协调、比例均衡, 按一同增长速度向前发展, 使产品的生产与需

① Streeten P. Unbalanced Growth.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59. 6

② Lewis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Allen & Unwin, 1955

求达到平衡。例如，如果鞋厂生产规模过大，生产出来的鞋子超过了本厂工人和其他厂工人的需要量，鞋子就会卖不出去，产生销路问题。假定是封闭型经济，结果不仅鞋厂的产品生产过剩，而且由于生产过剩使鞋厂生产减少、收入降低而产生对其他工厂的产品需求不足问题，进而影响整个工业的发展。所以，只有按同一投资率、同一增长率来全面发展工业，才能使整个工业迅速发展，并达到工业化的目标。罗森斯坦-罗丹明确指出：“各个工业的互补关系使得一切工业都变成‘基本的’了”，同时，由于“一切工业差不多都同等地具有外在经济，这意味着现有资源应当……均等地分配于一切工业，以便实现投资的最优格局”。<sup>①</sup>

应当指出的一点是，在罗森斯坦-罗丹看来，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同义语，因而农业是相对不重要的，这样，一切投资就理所当然地应全部投入工业部门。从这个意义上讲，上述理论是广义上的“不平衡增长”——先工业后农业的增长。

罗森斯坦-罗丹从主张走工业化道路入手，分析了资本稀缺对经济发展的障碍，强调了资本供给和投资的不可分性，指出了“大推进”式的投资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必然途径，并规定了“同比率”投资和“同比率”增长的条件，为发展中国家制定了一条条件严格、道路狭窄的经济增长路线。这一发展模式虽然缺乏现实意义，但在很多方面启发了人们的思维，并引发了一场长久的、意义深远的关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争论。

## （二）纳克斯的平衡增长理论

1953年，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理论，并提出了摆脱贫穷恶性循环的途径——全面地、大规模地在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投资，实行平衡增长战略。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穷是因为它穷，即收入太低，导致供给方面储蓄水平太低，需求方面市场容量太小、投资引诱不足，从而造成了贫困恶性循环。要打破这一困境，必须同时对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进行大量投资，纳克斯指出，“如果将资本同时投资于广泛不同的行业……其结果是市场的全面扩大。在若干个互补性行业中使用更多更好工具的人们相互成为客户。从他们互为对方提供市场并且互相支持这个意义上看，大部分迎合大众消费的行业是互补的。归根结底，这种基本的互补性起源于人类欲望的多样性。‘平衡增长’的论据是建立在对‘平衡饮食’（balanced diet）的需要基础上的”<sup>②</sup>。

纳克斯特别强调了市场容量狭小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和大幅度扩大市场容量对经济迅速增长的决定性作用。他认为，只有在一系列不同行业中进行资本投资的浪潮才能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相反，任何由单个企业家在任何一个特定行业大量地使用任何资本却可能因预先存在的市场限制而受挫。在一系列不同行业中进行资本投资使得各行业间能相互支持，能以更多的人均资本、更大的效率，为其他行业中的新企业的产品提供一个扩大的市场。从而，市场对单个投资刺激的障碍消除了，一般经济效率提高了，市场规模

<sup>①</sup> 罗森斯坦-罗丹：《东欧和东南欧国家的工业化问题》，《经济学杂志》，1943，6-9：204

<sup>②</sup> 纳克斯：《市场规模和投资引诱》，见：《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第2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

扩大了。纳克斯之所以选择平衡增长战略是因为：其一，各部门平衡增长可以产生扩大市场规模形式的外在经济，进而导致递增收益。如果工、农、外贸等各个产业部门都同时扩大生产规模，可以互相利用便利的生产、销售条件，降低自己的和全社会的生产成本，那么不仅获得内在经济效益，而且可以获得外在经济效益，提高社会获益能力，从而使投资更加有效率、生产的收益更高，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使用。其二，各部门的平衡增长可以帮助供给和需求保持平衡，使经济均衡而稳定地增长。纳克斯认为，平衡增长的理论依据来源于“萨伊定律”。萨伊定律“虽然就任何一种工业能够……创造它自己的需求这个意义上说绝不是正确的”，但它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来说是“正确的”。如果许多不同的、精心选择的生产部门都同时进行生产的话，那么，全部供给将创造出它自己的需求。这样一来，各部门之间互相购买产品，可以避免多余的生产能力，并加强投资的引诱。其三，各部门之间的相互依存性也要求各部门同时得到发展。例如，当农业生产率提高时，必将刺激农民扩大其市场剩余，要满足这个购买力，必须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发展消费品工业，并使二者保持平衡；另一方面，农业的发展需要资本品投入增加，这就要求资本品的生产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同步发展，以同农业的发展保持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纳克斯注意平衡增长和国际专业化的关系。市场规模不仅是刺激资本利用的一个基本决定因素，而且是国际贸易量的基本决定因素……从长期看，国际贸易量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市场规模”和生产率水平。平衡增长作为扩大市场和通过资本投资刺激来激发更高生产率的一种手段，贸易是易扩张的一个基本前提。纳克斯提醒人们，努力建立起为自己的市场而生产的工业部门，并不意味着向自给自足状态推进，实际上国际贸易对国内战线上的“平衡增长”不会有任何伤害。随着工业化的扩张，国际贸易已经穿越经济落后地区……平衡增长不仅是填满外围真空的一种方法，而且是国际贸易的坚实基础<sup>①</sup>。

纳克斯主张同时全面投资和发展一切部门，但他并不主张各部门都按同一比率发展，而是主张按不同的比率来投资和发展各部门的生产。那么应当按照什么比率发展？怎样确定这个比率呢？他认为，应当以各部门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的大小来确定不同的投资比率。价格与收入弹性大的部门理应投入比率较大的投资，因为价格与收入的弹性大意味着这个部门发展不足，是经济发展的中梗阻，但生产的扩张却有潜力，多投资于这些部门可以使其迅速发展起来，实现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发展，解决中梗阻问题，达到该部门产品的供求均衡。而价格与收入弹性小的部门理应投入比率较小的投资，因为其发展已相对过快，以较小的速度发展它，有利于使它的发展与其他部门保持平衡或协调。

上述两种形式的平衡增长理论，尽管侧重点、条件和方法有所不同，但都强调大规模投资的重要性和全面发展经济的必要性。那么，如何实现平衡增长呢？关于这个问题，无论是罗森斯坦-罗丹，还是纳克斯，都主张实行国家干预，由国家来制定统一的

<sup>①</sup> 纳克斯：《市场规模和投资引诱》，见：《欠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第2版，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

经济发展计划。实行计划化的原因是国内市场机制无法迅速筹集到大量的资本并按一定比例配置于各个部门。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不健全，市场机制作用十分有限，因而通常的价格刺激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起作用，并且这些作用因经济中的不可分性和技术的不连续性而很难产生实际效应。另一方面，即使市场机制作用较大，要在短期内起到集中大量投资、在全国范围内分配和配置资源并使各部门同时全面发展的作用，是不可能的。所以，只有依靠宏观经济的计划化，才能担负平衡增长的重担。

平衡增长理论为发展中国家迅速摆脱贫穷落后的困境、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式，指出了一条快速发展的路线，因而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对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践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一，这一理论强调了大规模投资的重要性和合理配置有限资源的必要性，为发展中国家寻找经济发展的突破口，合理而有效地安排投资项目，调整投资结构，迅速发展民族经济，从根本上消除贫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和发展路径。

第二，平衡增长理论强调了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作用的局限性和实行宏观经济计划化的必然性。这些分析，对于人们认识发展中国家经济机制的特点和作用，采用适当的机制来调节经济活动，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虽然发展中国家的计划化实施结果并不十分理想，但它毕竟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历史作用；同时，正是由于过分依赖计划化，才引起了人们对培育商品市场、健全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重视，并进而产生了“计划与市场结合”的新调节模式。

第三，纳克斯的平衡增长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片面强调工业化、忽视其他部门发展的倾向，重新重视并强调了农业的作用和同时发展农业的必要性。这对于发展中国家正确认识农业的作用，正确处理工、农、外贸等各部门的关系，制定出适宜的、合乎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很大启发。

第四，平衡增长理论是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一定程度上的批判和对旧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否定。传统经济理论认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各个国家应当按比较成本大小、要素丰裕程度、地理位置优越状况进行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并按照这个原则形成世界经济格局，实行世界范围的“平衡地增长”。按照这个理论，发达国家应主要从事资本品生产和技术创新，发展中国家应主要从事农业和初级产品的生产，并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生产应当保持一定比例“平衡地增长”。在这种格局下，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益恶化，显然处于不利地位，从而永远摆脱不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永远不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平衡增长理论强调发展中国家应独立自主地发展民族经济，通过平衡增长克服中梗阻问题，全面地发展起各种经济部门和产品，使其在不依赖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实现发展，并改善贸易条件，使自己在国际贸易中取得较为平等和有利的地位。这无疑是对传统理论的批判或否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但是也应当看到，由于平衡增长理论过分强调国内充分市场的形成和各部门平衡增长和计划化的必要性，存在着一些缺陷或不足。

第一，某些概念含义模糊。李普顿指出，什么是“增长”？是“收入”、“人均收入”

还是“产出”或“经济福利”？无论是平衡增长还是不平衡增长，都未对此明确，因而“‘增长’的提法是不够准确的”。另一些学者指出，所谓“国内市场”，是指最终产品市场呢还是中间产品市场？若只是指最终产品，那么平衡增长的范围就大大缩小了，即只是为了强调最终产品市场的互补性和投资引诱的扩大。这样，平衡增长就可能成为一种方法（或手段）而不是目的。

第二，平衡增长受到资源不足、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低下的限制。赫尔希曼等人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源稀缺、资本有限，因而平衡增长的计划难以实施；即使实施了，投资项目也难以建成或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率。因为，发展中国家最稀缺的资源不是资本，而是企业家和管理能力，最紧迫的问题不是资本形成大小，而是现有资源能不能得到合理而有效的配置。如果缺少企业家和较高水平的管理的配合，投入的资本就不能发挥应有的效益，资源配置就会出现巨大浪费。所以平衡增长是不可取的。

第三，平衡增长过分依赖于计划化和国家干预。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市场机制不能解决国内市场中的平衡问题（如一个部门发展过快，其收入超过市场供给时，就会产生部门间的供求失衡），无力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地分配资源，因而国家干预是必不可少，而计划化则是国家干预的主要手段之一。但由于发展中国家计划与决策人员都素质不高、资料缺乏、信息不灵等，计划的制定难免失误，一旦计划失误，大规模投资所造成的损失是难以想象的。同时，如果国家干预过强，价格刺激会愈发不灵，市场体系更难以建立。而且，国家干预下建立的国家经济效率不高，也会影响经济发展。

第四，经济发展的实践未能为平衡增长理论提供充足的验证。斯特里顿以 18 世纪英国纺织业和钢铁业为例，证明了不平衡增长的成效。俄林（Ohlin, B. G.）根据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证明了不平衡增长的有效性。而休斯（Hughes, J. R.）却得出了西方国家都沿着平衡增长路线发展的结论。在这些实证分析中，比较有影响的是钱纳里和泰勒（Taylor, G.）的研究，他们考虑了收入水平、人口数量、资源条件等因素，并将国家分为“低度初级的”、“正常的”、“高度初级的”三类，结果发现这三类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并无多大差别。因此他们认为：平衡增长“以中期快速发展，既不是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sup>①</sup> 这些结论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却反映出平衡增长是缺乏经验性的。因而尚不能盲目搬用。

## 二、不平衡增长理论

平衡增长理论在 50 年代形成一种很有影响的理论，并被当做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规律”或模式而推广应用于经济计划决策中去。但与此同时，它也受到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的批评，其中主要的批评者是赫尔希曼。赫尔希曼在 1958 年出版的《经济发展战略》一书中，着重从现有资源的稀缺和企业家的缺乏等方面，指出了平衡增长战略的不可行性。赫尔希曼进而认为：“经济发展与其说取决于既定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最优组合，不如说取决于制定经济发展目标，以充分利用隐蔽的、分散的和无效使用的资

<sup>①</sup> 谭崇台：《发展经济学》，人民出版社，1985.80~81

源和人力。”这种观点促使他去探究各种诱导和运行机制，提出了“不平衡增长”（unbalanced growth，简称UG）理论<sup>①</sup>。这种理论的主要观点是：发展中国家应当集中有限的资本和资源首先发展一部分产业，以此为动力逐步扩大对其他产业的投资，带动其他产业发展。

### （一）“引致投资最大化”原理

不平衡增长理论并不否认大规模投资和互补活动扩张对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它考察的中心问题不是分散于各部门的“全面投资”，而是如何集中投资于某些部门，使投资得到有效的利用。赫尔希曼作为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最初代表，他面临的问题是，假定一个国家的投资需要既定且有限时，如果存在着一系列投资项目，这些项目的总成本已超过了可得资源量，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选择投资项目？如何使投资项目的效率最高、对经济发展贡献最大？以及如何测量其贡献大小？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区分了两种形式的投资选择：替代选择（substitution choice）和延迟选择（postponement choice）。替代选择是关于应该选择投资项目A还是B的决策；延迟选择是关于如何排列投资项目A与B的次序的决策，即决定哪些项目应当在哪些项目之先的决策。赫尔希曼主要强调延迟选择及选择决定问题，他的基本思路是，优先次序必须建立在某一产业的进步对另一产业进步效力的“比较评估”（comparative appraisal）基础上，并进而决定一个项目是否应该优先投资、通过其能否带动其他产业发展。在赫尔希曼看来，发展中国家真正缺乏的不是资源本身，而是运用这些资源的手段和能力！因此他认为，投资项目序列中的偏好应当是“引致决策”最大化（maximizing “induced decision making”），即能通过自身发展“引致”其他项目最快发展的投资项目。

赫尔希曼用一个关于“社会分摊资本”（简称“社会资本”或SC）和“直接生产性活动”（directly productive activities，简称DPA）之间的关系模型来说明“引致决策最大化”原理。所谓“社会分摊资本”是指用于基础设施的投资，它的判定标准有三个：在某种意义上为许多经济活动提供服务；由公共机构或受公共机构控制的私人机构向全国提供；不能进口。它的特点是“不可分性”和高资本—产出比，这意味着，SC的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收益慢且低、投资效率低而受益面广。所谓“直接生产性活动”是指直接投资于工业、农业等产业部门中，并能迅速见效，直接增加产出和收益的投资行为。特点是投资集中、周期短、收益快、投资效率高。在讨论社会资本对直接生产活动的关系时假定：第一，在某一限度内，投资在SC和DPA中的分配比例是可变的；第二，如果出现短缺，不可能通过进口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如果SC优先于DPA，称做“超能力的发展”（development via excess capacity），如果DPA优先于SC，称做“短缺的发展”（development via shortage），这两种情况都会成为发展的诱因和压力。如果不能选择平衡增长，应作何选择呢？可以用图8.1作辅助说明。

图中纵轴代表DPA的产品的总成本（投资），横轴代表SC的可利用性与成本（投资）。a、b、c三条曲线是既定的DPA的投资所获得最大产出的生产成本曲线，它是

<sup>①</sup> Hirschman A.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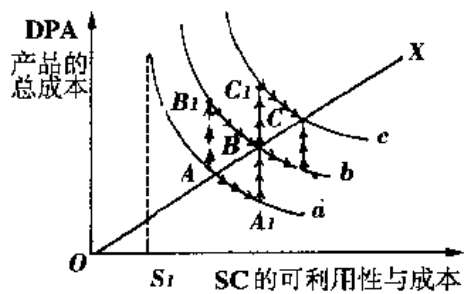


图 8.1 社会分摊资本

增加,那么,在 a、b、c 上,两坐标系数和最小的点为 DPA 与 SC 最佳组合点,将各最佳组合点连接起来,得到一条 OX 线,OX 线就代表 DPA 和 SC 的最有效扩张线或“平衡增长线”。但是,假如现有资源不足以保证 DPA 和 SC 的最小量平衡增长,应当将哪一个作为“延迟选择”呢?一种可能的顺序是  $AA_1BB_2C$ ,此时,SC 优先增长,称为“超能力的发展”。另一种可能的顺序是  $AB_1BC_1C$ ,此时,DPA 优先增长,称为“短缺的发展”。这两种顺序都能产生刺激和压力,最终选择哪种顺序,一方面取决于企业家动机的相对强度,另一方面取决于负责社会资本事务当局对于公共压力的反应。传统理论认为应当选择 SC 优先的扩张线,但赫尔希曼认为经由“超能力的发展”纯粹只是主观上的可能性,而追求平衡则更是危险,因为这样就没有刺激来引致投资或引致决策了。他认为经由“短缺的发展”,却能刺激进一步的投资,产生最有效的投资结果,也就是能使“引致决策”实现最大化。因此,应当选择 DPA 优先 SC。

DPA 优先选择的含义是:在投资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应当实行不平衡增长战略,即暂时延迟对铁路、公路、通讯、电力、学校等基础设施(SC)方面的投资,集中资本投资于直接生产性活动 DPA 部门,以尽快地获得投资效益,增加产出和收入,待直接生产性部门的生产发展起来并产生了较大收入后,再利用一部分收入投资于基础设施部门,带动其增长。在优先发展的直接生产性活动部门中,是否所有 DPA 部门都应当优先发展呢?赫尔希曼认为,不应全面发展 DPA 部门,而应当优先选择那些能产生最大引致投资的 DPA 部门,以其优先增长来带动其他部门增长。那么,怎样选择、按照什么标准选择引致投资最大的部门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赫尔希曼提出了有名的“联系效应”(linkage effects)理论。

## (二)“联系效应”理论

赫尔希曼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哈罗德—多马模式进行了批评,认为经济增长不完全决定于资本—产出比和资本形成的大小,而是取决于使用现有资源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效率的能力。对他而言,经济发展就是致力于探究经济增长的各种诱导和运行机制。在把“引致决策”应用于经由“短缺的发展”和经由“超能力的发展”的选择中,推导出两个诱导机制:一个是投入供应、派生需求或后向联系效应;一个是前向联系效应。这样一种“联系效应”就是新的经济增长的有效机制。所谓“联系效应”,是指在国民经济中,各个产业部门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了各产业部门之间互相联系、

SC 的函数,它表示 DPA 中较高投资所产生的不同水平的 DPA 产出。曲线斜率为负,并凸向原点,因为随着社会资本利用性的增高,DPA 的成本递减。但要维持任何水平的 DPA,必须有一个最小量的 SC。如当 DPA 为曲线 a 时,SC 为  $OS_1$ 。但随着 SC 的增加,SC 对 DPA 的产出成本的影响越来越小。

现在假定,经济增长的目标是要 DPA 和 SC 使用资源量最小的条件下获得 DPA 产出的

互相影响、互相依存。“后向联系”(backward linkage)是指一个产业同向它提供投入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如钢铁工业的后向联系是采矿业等。“前向联系”(forward linkage)是指一个产业同吸收它的产出(购买其产品)的部门之间的联系,如钢铁工业的前向联系是机械制造、汽车等工业。一般说来,一个产业的后向联系部门通常是农产品、初级产品、原材料、半成品或半成品加工品等生产部门;其前向联系部门,通常是制品、最终产品等生产部门(但有些产业既是后向联系部门,又是前向联系部门,如机械制造工业,它既可以为钢铁工业提供机器设备等资本品投入而成为后向联系部门,也可以成为吸收钢铁工业产品如钢材的前向联系部门。因此,后向与前向联系的区分是相对而言、有一定条件的)。

后向联系与前向联系可以借助里昂惕夫(Leontief, W.)投入—产出表中的矩阵来加以区分和表述。表中的投入—产出关系将各种产业部门明确地分为后向联系(投入)部门和前向联系(产出)部门。根据投入—产出表,就可以按照总联系效应(效应的强度)对各种经济活动进行排序。赫尔希曼指出,有效的发展战略便是鼓励那些具有最大总联系效应的活动。前向联系的总联系效应一般以一个行业诱导出的新行业的净产出来测度。如果行业 $W$ 的建立通过联系效应能够导致 $n$ 个其他行业的建立,其净产出等于 $x_i$  ( $i=1, 2, \dots, n$ );如果每一个行业作为行业 $W$ 建立的结果实际上出现的概率为 $p_i$  ( $i=1, 2, \dots, n$ ),那么,行业 $W$ 的总联系效应为 $\sum x_i p_i$ 。后向联系的总联系效应计算大致如下:设行业 $W$ 每年需要的投入品为 $(y_1, y_2, \dots, y_n)$ ,又设生产这些投入品的厂商的最小经济规模(按年生产能力)为 $(a_1, a_2, \dots, a_n)$ ,那么,行业 $W$ 的建立导致生产投入品的行业产生的刺激强度或概率等于 $y$ 项对 $a$ 项之比。

在发展中国家,产业的联系效应很微弱。一般而言,农业,尤其是生存农业,缺乏联系效应,初级产品生产都没有很大的后向联系,而前向联系在矿业部门也是薄弱的,反映在投入—产出表中,就是表中的许多填写产业部门的方格是空白的。如何使联系效应最大化?由于工业国的联系效应发挥得最充分,可以依靠对其联系效应的考察发现在发展计划中应予重视的部门。钱纳里和渡部经彦对意大利、日本和美国不同行业依存度的考察得出了有意义的数值<sup>①</sup>。

赫尔希曼认为,凡是有联系效应的产业,不论是后向联系还是前向联系,都能够通过这个产业的扩张而产生引致投资,引致投资不仅能促进前向、后向联系部门的发展,它反过来还可以推动该产业的进一步扩张,从而使整个产业部门都得到发展,实现经济增长。引致投资不仅可以为私人企业家提供获取新利润的机会,使私人投资和生产迅速发展,而且可以对政府产生压力,促使政府为实现“引致决策最大化”而采取行动。比如,私人投资者决定在一个没有适当的基础设施(如道路、新工人的住房等)的地方投资生产时,由于某个投资项目有较大的联系效应,因而这个项目会使政府出资修建房屋和道路,以使这个项目能顺利产生效益。据此,赫尔希曼认为:根据上述原则,一个国

<sup>①</sup> 钱纳里,渡部经彦. 生产结构的国际比较. 在经济计量学会克利夫兰会议上的论文. 1956



表 8.1 意大利、日本和美国的经济部门相互依存的平均程度

	通过向其他部门购买的相互依存 (后向联系) (a)	通过向其他部门销售的相互依存 (前向联系) (b)
1. “中间产品” (前向及后向联系均高)		
钢铁	66	78
有色金属	61	81
纸及其制品	57	78
石油产品	65	68
煤产品	63	67
化工产品	60	69
纺织品	67	57
橡胶制品	51	48
印刷及出版	49	46
2. “最终产品” (前向联系低, 后向联系高)		
谷类制成品	89	42
皮革及其产品	66	37
木材及木制品	61	38
服装	69	12
运输设备	60	20
机械	51	28
非金属矿产品	47	30
精制食品	61	15
造船	58	14
其他行业	43	20
3. “中间初级产品” (前向联系高, 后向联系低)		
金属矿产	21	93
石油天然气	15	97
煤矿	23	87
农林业	31	72
电力	27	59
非金属矿产	17	52
4. “最终初级产品” (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均低)		
捕鱼	24	36
运输	31	26
劳务	19	34
贸易	16	17

(a) 行业间购买占总产量的比重 (%)

(b) 行业间销售占总产量的比重 (%)

家在选择适当的投资项目优先发展时，应当选择具有联系效应的产业，而在具有联系效应的产业中，又应当选择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优先发展，这就是产业部门发展优先次序选择的技术标准，是不平衡增长理论的核心。

### （三）“联系效应”与进口替代工业

一般而言，产业部门发展的优先次序应当以联系效应的大小为标准，但据赫尔希曼的观察，发展中国的经济部门之间联系效应很微弱，这种情况是由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小决定的。但发展中国的制造业，尤其是加工业还是具有较大联系效应的。因此，即使是在各经济部门联系效应较小（相对而言）的情况下，仍然可以选择某些联系效应相对较大的部门优先发展，并通过这种不平衡发展来促进其他部门的成长。具体说来某些工业部门联系效应较大，因而可以优先发展，集中力量投资。由此可见，联系效应是与工业化有紧密联系的。

应当优先发展什么工业呢？赫尔希曼认为，应当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这是因为，发展中国的工业部门主要缺乏后向联系，即缺乏某些本国不能生产的资本品（机器、设备等）和原材料、半成品（如某些元器件）等投入。至于其前向联系，由于发展中国的经济部门和人民对制品、消费品有较大需求量，市场潜力很大，因而不成问题。由于国内工业投入稀缺，发展工业不得不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原材料、半成品甚至制成消费品等投入要素。而发展中国家的外汇又缺乏，因而工业投入的稀缺成为工业化的约束条件，形成主要的障碍。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赫尔希曼主张重点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他认为，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不仅可以解决工业投入的来源，减少进口，节约外汇，为工业的发展创造条件，而且，进口替代工业本身具有较大的前向和后向联系，从而可以在尽量减少进口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前提下尽量多使用本国原材料等投入，生产出国内工业发展急需、人民生活必需的产品。当进口替代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还可以逐步由生产工业消费品为主转向生产资本品为主，进而完全取代工业投入的进口，独立地发展起民族工业体系，实现工业化。赫尔希曼还认为，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对国内企业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为它可以使国内的企业家通过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获得较高利润。这样，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就可以产生较大的引致投资，实现“引致决策最大化”。所以，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优先投资和发展进口替代工业都是最佳的选择。

### （四）不平衡增长与平衡增长的关系

赫尔希曼理论的目的是要说明经济发展初期实行不平衡增长的必要性和意义，为发展中国家设计一条不同于平衡增长的路线。从表面上看，不平衡增长是针对平衡增长提出来的，两者水火不相容。但赫尔希曼却认为，这两者固然互相对立，却也是有一定联系的。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是从不同角度、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考虑问题的。不平衡增长是从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考虑经济发展的初期如何把有限的资源分配于最有生产潜力即联系效应最大的产业中，通过这些产业的优先发展，来解决经济发展的瓶颈（如工业投入缺乏）问题，并通过经济的发展来带动其他产业的发展。但是，当经济发展进入高级阶段时，从工业化和快速发展经济的角度来看，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需要作一

定的协调，使其保持一定的均衡，因而平衡增长就成为必然。所以赫尔希曼指出：“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引起平衡增长可能性正是过去不平衡增长的经历。”<sup>①</sup>由此可见，赫尔希曼强调不平衡增长，目的还是要实现更高层次和更高水平的增长，只不过平衡增长是目标，不平衡增长是手段。关于这一点，斯特里顿、辛格（Singer, H.）等人也持相同看法。斯特里顿认为：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之间的选择是“根据各种不同长度时期内的平衡之间进行的选择”，而辛格则明确指出：“当你从不平衡开始时，为了接近平衡就需要有进一步的不平衡。”<sup>②</sup>所以，不平衡与平衡之间主要是时间长短的区分。

关于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的关系，吉里斯、波金斯等人在赫尔希曼等人论述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分析。他们认为，由联系效应大小决定的“绝对的”不平衡增长将产生一种“压力”，这种压力将迫使一国在经济发展中退回到平衡增长的路线上去。因此，发展规划的最终目标是通过一定时期、一定程度的不平衡发展来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发展。这是发展计划制定的一种选择。他们还认为，虚线（dashed line）的发展路线呈现为一条曲线，“稳定的平衡发展路线”（steady balanced path）则呈现为一条直线且较短，但在一定条件下，遵循虚线的发展路线有可能比“稳定的平衡发展路线”更快地达到某一点。然而，无论是曲线发展还是直线发展，二者虽路线不同，却完全有可能殊途同归（如图 8.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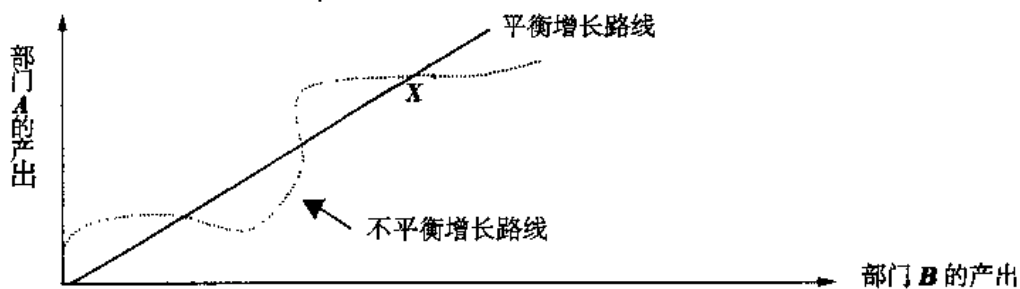


图 8.2 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的路线示意

由图 8.2 可知，无论是按照平衡增长线同时平衡地发展 A、B 两个部门，还是按照不平衡增长线先发展 A 部门后发展 B 部门，都可以达到 A、B 两个部门产出的最大点，如 X 点。而在 X 点上，A、B 两部门的产出是平衡增长的，表明不平衡增长线在经历了一定时期的不平衡增长之后，仍然达到了平衡增长。

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和资源稀缺的情况下，相对于平衡增长而言，也许不平衡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更具吸引力。这是因为：

第一，不平衡增长论强调了资源稀缺对经济发展的约束，说明了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地位，提出了资源应合理配置这一重大课题，这是比较符合发展中国家现状

① Hirschman A.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② 李普顿，发展中国家的平衡增长与不平衡增长，*经济学杂志*，1962（9）

的，可以说是抓住了经济发展初期各种问题的关键。因此，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若能妥善解决上述问题，克服资本、要素投入等资源约束的中梗阻，培育大批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家，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合理而有效地配置现有资源，提高投资效率，就有可能找到经济发展的突破口。

第二，不平衡增长既强调了经济计划的必要性，又特别强调了市场机制的重要性。平衡增长论以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作用极其有限为依据，过分依赖国家干预和计划化，这是很片面的，在实践中可能会产生某种危害性（如计划失误的后果）。不平衡增长也要求实行国家干预和经济计划，但更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比如，它提出应以产品的需求弹性大小、联系效应大小来选择优先发展的产业，强调“引致投资”的作用，提倡利用丰厚的利润（如进口替代工业）来吸引企业家投资等。这些主张对于逐步培育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健全市场机制，培养市场经济观念，学会利用经济手段来调节经济，具有重要意义；不仅如此，不平衡增长论所说的计划，实质上是建立在市场调节基础上的计划，它的实施，对于发展中国家处理好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利用“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两手”的结合来调节经济活动，是很具现实意义的。

第三，不平衡增长论提出的“引致决策最大化”原理、“联系效应”理论、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战略等，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人们从总体上和局部上认识一国的经济现状与特点，对于私人投资者和计划工作者制定正确的经济决策，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和有效的工具。

第四，不平衡增长论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路线或新的思路，其真正的作用不在于它是否可行，而在于它大大启发了人们。说明了：经济发展的道路、战略决策不只是一种，而是有多种。各个国家应当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发展道路或战略。

当然也应看到，不平衡增长论本身也存在着许多不足。比如：它低估了产业部门间不平衡增长可能造成的不良后果，如某些资源的进一步稀缺、产业间不平衡差距过大形成经济总体发展不协调或结构严重失衡；资源稀缺可能会产生垄断，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高估了发展中国家市场机制的作用，忽视了其市场残缺不全、价格刺激反应不够灵敏等问题。严重的是，不平衡增长可能是通货膨胀的源头：第一，如果实行价格控制，就会抑制生产，短缺部门的供给可能更坏；第二，由于在非瓶颈部门产生了闲置资源，总需求的收缩会造成浪费；第三，为了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可能必须货币贬值，但这提高了进口产品的国内价格，本身就是通货膨胀。还有的学者用实证材料证实了发展中国家产业部门不健全，各部门自给性很强，因而产业部门之间联系并不紧密，甚至很多部门自成体系，没有联系效应，这就为优先发展部门的选择增加了困难；休斯等人还根据史料分析，认为很少有哪个国家能提供不平衡增长成功的例证；等等。

## 第二节 部门发展优先次序

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体系和结构不够健全，突出表现在农业经济比重过大而且落后，工业基础薄弱而且生产方法陈旧，主要的产品是农产品和初级产品，整个经济自给性很强，外贸比重很小甚至有些国家根本没有外贸。这种情况决定了，要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必须从根本上彻底改造旧的国民经济体系和结构，全面发展工业、农业、外贸等各个部门。但发展中国家资源稀缺、技术与管理跟不上、市场的供求能力有限，不可能同时全面投资发展国民经济各部门，必须选择某部门优先发展，逐步建立和发展国民经济体系。

### 一、优先发展工业

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初期，大多数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出路在于工业化，因为工业的发展对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而农业的地位相对不重要。其理由是：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证明，不发达国家必须首先工业化，才能从不发达过渡到发达，成为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工业化国家；工业生产率高，尤其是边际生产率高，而农业生产率、尤其是劳动的边际生产率相对较低，优先发展工业可提高社会边际生产率，并且通过农村劳动力向工业的转移，既扩大了工业又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从而增加总产出量；工业化静态和动态的递增收益，静态收益与生产单位的大小和规模有关，而这是工业部门的特征，动态收益包括技术进步、边干边学和生产的外在经济带来的递增收益，而农业缺乏静态和动态的递增收益，难以起到带动全局发展的作用；工业的发展可以扩大城市规模，促进城市化，较快地提高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而农业则不然；农业的发展需要有工业投入，因而只有工业优先发展了，才能保证为农业提供足够的机械、工具、化肥等投入，使农业的发展成为可能；另外，工业部门的扩大可以吸收较大的就业，而农业中劳动力却相对过剩；等等。所以，发展中国家必须首先发展工业，实现工业化。辛格描绘说：“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生活及其经济史中，一个最重要的要素是‘一事情引起另一事情’的机制；一个工业最重要的贡献不是它的直接产品，甚至也不是它对其他工业和直接社会利益的影响，而是它对一般教育水平、技能、生活方式、创造性、习惯、技术存量和新需求产生的影响。这也许就是为什么欠发达国家如此普遍地渴望制造工业的确切原因；即是说，它们为增加技术知识、城市教育、伴随城市文明的顺应力，以及直接的马歇尔外在经济等提供了增长点。无疑，在不同的环境下，商业、农业和种植园农业已证明能够成为‘增长点’，但在我们的时代，制造业是没有一个其他部门能与之相比的最重要的增长点。”<sup>①</sup>

本书前几章已经证明，优先发展工业的观点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反映得十分

<sup>①</sup> 辛格，投资国与借贷国之间的收益分配，美国经济评论，1950（5）

明显、突出。1943年，罗森斯坦-罗丹在论述“大推进”理论时，就明确提出了工业化发展战略；1950年，普雷维什、辛格提出“中心—外围”理论时，也倡导实行工业化；1953年，纳克斯提出应通过大规模投资的工业化来打破“贫困恶性循环”；1954年，刘易斯断言经济发展就是工业化，只有工业化才能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改变二元经济结构；1958年，赫尔希曼提出不平衡增长理论，认为工业具有较大“联系效应”，应优先发展工业；此外，库兹涅茨、钱纳里、斯特里顿等人也都强调过应当实行工业化，工业化成了经济发展的同义语。

### （一）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

在优先发展工业的工业化战略中，还可分为优先发展一般工业（所有工业部门）的战略、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等。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战略是普雷维什和辛格于1945年~1950年最早提出的<sup>①</sup>。普雷维什和辛格认为，国际经济并不是由众多同质的各国经济组成的，而是由“中心”部分和“外围”部分这两种非对称性经济组成的。造成“中心—外围”格局的原因除殖民主义统治的历史外，主要是由技术发展在国际范围的传播及其成果分配以及贸易条件决定的。中心国家经济发达，是技术发明、技术扩散国，其劳动生产率高，主要以制成品、资本品等需求收入弹性高的产品出口为主，因而贸易条件有利；外围国家经济落后，是技术输入国，其劳动生产率低，产品和出口主要以农产品、矿产品等需求低的产品为主，因而贸易不利。这种技术水平、经济实力、资源结构和资源利用方式、产品生产与出口差别巨大的不同经济体系，使中心国处于有利的主动地位，外围国家处在不利的被动地位，在贸易条件不平等的条件下，产生了“中心剥削外围”的情况，加剧了中心与外围的贫富差别；与此同时，外围国家在“外向发展”（即主要发展农产品与初级产品出口，与发达国家的资本品交换）模式中，技术发展传播到外围国家的速度远远慢于这些国家为全部劳动力提供就业所要求的速度，从而使技术传播及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出口国家，这就使外围国家大部分人民处在发展边缘，受益甚小，拉大了国内的社会结构差别和收入分配不均。这种双重后果，使外围国家长期处在不发达、贫困和受剥削的困境之中。为此，普雷维什放弃了他早年信奉的新古典主义理论，批判了“外向发展模式”，他指出，“中心国家的技术主要输入到外围国家的原料出口及其有关部门，这同它们的需要是一致的”，但“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是提高整个劳动生产率。从这个观点出发，外围国家的出口部分受到很大的制约，因为增加产品出口的可能性受中心国家需求相对缓慢增长的限制，这是由于它们对原料的需求弹性很低和保护主义政策造成的”<sup>②</sup>。因此，他“建议外围国家采取一项新经济发展政策。这种新的发展模式的主要目标是工业化”。工业化在向生产力水平较低部门中的劳动群众以及出口部门和农业生产部门中失业劳动力提供就业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他又指出：外围国家的生产成本很高，“缺少相应的工业基础

<sup>①</sup> 普雷维什：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见：拉丁美洲经济评论，1950。

辛格：投资国与借贷国之间的收益分配。美国经济评论，1950（5）

<sup>②</sup> 普雷维什：我的经济思想发展的五个阶段。（墨西哥）经济学季刊，1983（4~6）

设施”，主要条件特别不利，因而不宜强调全面发展工业，尤其不应强调发展制成品工业及其出口。由此他得出结论：应当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即发展国内急需的制成品和消费品来取代原来对这些商品的进口。他说：“得到温和的、有选择的保护主义政策鼓励的进口替代，有助于改变外部制约发展的倾向，可以消除贸易条件恶化的趋势，促进提高有弹性的制成品生产的生产结构的改革。”<sup>①</sup> 除此之外，普雷维什还提倡改善拉美国家之间的制成品出口（包括原料），制定有利于本地区或小区域的优惠规定，逐步使之成为一个共同市场。

普雷维什等人提出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主张同他们的工业化理论一起，被称为“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这种战略引起了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的广泛重视，并从 50 年代初起在一些国家付诸实践。1958 年，赫尔希曼在论述“联系效应”理论时，认为进口替代工业的联系效应最大，因而也提出了优先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战略。之后，又有许多人提出了类似主张。

## （二）优先发展重工业

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思路体现在费尔德曼于 1928 年为前苏联计划委员会制定的发展计划之中，因称“费尔德曼模式”。当时，前苏联急于实现工业化，产生了优先发展重工业与优先发展轻工业的争论，为了迅速恢复前苏联经济，斯大林提出了“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部门”的原理，同“费尔德曼模式”基本思路一致，因而也有人合称之为“费尔德曼—斯大林模式”。

费尔德曼模式认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是资本品工业中各种投资的函数，因此，要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必须优先对资本品工业进行连续投资，发展重工业，通过发展重工业为轻工业、农业等提供资本品。这意味着不仅要牺牲当前的消费，而且要削减对消费品工业投资，以取得较高的资本品工业投资。但是高资本品工业投资虽然牺牲了短期的消费品工业增长能力，却获得了长期的高资本品生产能力和消费品生产能力，反之，低资本品工业投资或高消费品工业投资虽然使消费品工业在短期内增长较快，却相对降低了它们的长期增长率。所以费尔德曼主张应优先投资和发展资本品工业，实行工业内部的不平衡增长。

前苏联的实际投资和经济增长情况很接近费尔德曼模式。1928 年～1937 年，前苏联重工业生产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由 31% 增加到 63%，而轻工业所占比重却由 68% 下降到 36%。同期，资本品工业的总投资达到 13% 的年增长率，而居民消费品工业的总投资只有 0.8% 的年增长率，消费在 GNP 中的比重由 80% 下降到 53%。这种不平衡增长的模式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前苏联达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实现了工业化，但与此同时，也造成了消费品工业严重萎缩、居民消费的平均水平低、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等问题。

前苏联在费尔德曼模式方面的实践对不少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吸引力。1947 年，尼赫鲁就任印度第一任总理后，任命统计学家马哈兰诺比斯（Mahalanobis, P.C.）为印

<sup>①</sup> 普雷维什，我的经济思想发展的五个阶段。（墨西哥）经济学季刊，1983（4～6）

度计划委员会主任。为了解决当时资本缺乏问题，马哈兰诺比斯运用费尔德曼—斯大林模式的原理，制定了两个“五年计划”（1950/1951 ~ 1955/1956，1955/1956 ~ 1960/1961）。马哈兰诺比斯计划模式的中心是强调扩大钢铁和资本品工业的投资，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来解决资本品缺乏问题。这个计划还认为，只要资本品工业发展了，农业等其他产业也会从中受益，因为农用机械、化肥等工业的发展可以为农业提供充足的投入，支持农业等产业的发展。

但是，马哈兰诺比斯计划模式在实践中遇到了很大阻力。主要是：第一，这种计划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性公共机构来实施，尤其是分配资金，但印度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缺少一个像前苏联公有制经济那样的权威性国家机构，且印度的计划不像苏联的计划具有指令性，而只有指导性，从而对私人投资者没有约束力，难以真正实施计划。第二，要严格区分资本品工业和消费品工业是极其困难的，若要作区分，很可能忽略中间产品工业，而中间产品工业的比重与地位又是不容忽视的。例如汽车工业，生产的小汽车是消费品，而生产的卡车是资本品，生产的汽车零配件却是中间产品，汽车工业应归于什么工业呢？由于这些原因，马哈兰诺比斯计划模式未能全面实施，而且大多数私人企业因为缺少利润引诱而对它不感兴趣，结果印度的投资模式实际上与马哈兰诺比斯模式大相径庭。而且，由于缺乏技术、管理跟不上，以及国内对资本品的需求不足，印度的两个五年计划实施得很不成功，表现在重工业的投资率低于计划投资率，单位投资的产出（投资效率）低于计划指标，以及计划未正确考虑国内的入口、收入和需求弹性等因素，使资本品缺少充足的市场，并导致现有的资本品工业生产能力过剩和闲置。结果，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印度的GNP年增长率只有3.7%（计划年增长率为5.5%），到60年代初只达到3.5%。资本品工业和农业的过慢增长导致国内由于人口过快增长产生的食物和消费品稀缺，不得不增加食物和资本品的进口，从而引起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的危机。为此，从60年代末起，印度政府被迫放弃马哈兰诺比斯的计划理论。

印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实践为发展中国家实施这种战略提供了经验教训：①只有国内对资本品存在充足的需求时，大量投资于重工业的战略才有可能促进经济增长。②节制当前消费的不平衡投资模式的成功至少需要一整代人的时间。③走资本主义道路或存在着“混合经济”的发展中国家实施这种大规模的发展计划的能力十分有限，因为这些国家的计划部门不具权威性，无力控制整个投资，因而很难获得成功<sup>①</sup>。

### （三）优先发展“主导部门”工业

1960年，罗斯托在《经济增长阶段论》中提出了“起飞”理论，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种发展模式，这就是以“主导部门”（Leading Sectors）优先发展来带动整个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发展。罗斯托认为，任何阶段，即使在一个成熟合乎增长的经济中，前进的动力是靠少数主导部门迅速扩张而得以实现的。这些部门的扩张有巨大的外在经济和其他次级效应。从这个角度来说，起飞阶段的部门行为是增长进程的一种特殊形

① 纳夫齐格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英文版，1984，294 ~ 296



式，换句话说，增长是通过不同方式、不同主导部门不断重复起飞来完成的<sup>①</sup>。经济部门可以分成以下三种形式：

(1) 主要增长部门 (primary growth sector)。在这些部门，重新或那些最新发现有利可图的机会产生一个高增长率，并把这种扩张力量扩散到经济的其他部门。

(2) 互补性增长部门 (supplementary growth sector)。这些部门的迅速进步是对主要增长部门进步的直接反应或是为了满足其需求而出现的。

(3) 派生增长部门 (derived-growth sector)。这些部门的进步与实际总收入、人口、工业生产的增长或其他的一些变化变量保持稳定的关系。粮食产量与人口的关系、住房与组建家庭的关系就是这个次序中典型的派生关系。

经济增长的历史已证实了“主导部门”的重要作用和所起的作用。例如英国在产业革命时期建立了以纺织业为主的主导部门，纺织业的发展带动了棉花种植、畜牧（如养羊）、纺织机械、动力（如蒸汽机）、服装、交通运输、出口等部门的发展，进而促进了整个经济的增长。而在美国、法国、德国、前苏联、加拿大等国，以铁路业为主的主导部门的发展，带动了这些国家的“起飞”。他还认为，主导部门是由几个重要的产业组成的“主导部门体系”，这个“主导部门体系”又是随经济发展而不断发展、不断更替的，它的更替和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动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导部门体系可能是水泥、木材、建筑、种植、采掘等产业；其次可能是纺织、服装、加工等轻工业；随后可能是机械制造、机床、电力、出口等工业；再后是汽车工业综合体系；最后是服务业、城建等生活质量部门综合体系。显然，对于起飞，不是只有一种主导部门序列，也不是只有惟一的部门能起关键作用。一个增长的社会必须考虑四个基本要点<sup>②</sup>：

(1) 对于为产出迅速增长打基础的部门生产的产品，必须有扩大的有效需求。

(2) 必须把新的生产函数和生产能力的扩大引入这些部门。

(3) 社会必须能够产生在这些关键部门发动起飞最初所需要的资本。

(4) 主导部门必须是这样的部门，即它们的扩张和技术变革引起其他部门对增加生产能力的一系列要求，并诱导出新的生产函数的潜力。

罗斯托还指出，主导部门的建立，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主要是：要有足够的资本积累和投资，这就是要求一国的净投资率必须从5%左右提高到10%以上（即投资在国民生产净值中的比重占到10%以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鼓励和增加储蓄，减少消费，防止消费早熟，必要时就引进外资；要有技术充足的市场需求，来吸收主导部门的产出；要有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拥有大批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家，为主导部门的发展提供组织、管理和人力等条件；等等。

## 二、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唯工业化”论初露苗头时，有的学者指出，发展中国家应

<sup>①</sup>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英文版，1960

<sup>②</sup> 罗斯托，经济增长的阶段：英文版，1960

重视农业的发展<sup>①</sup>。此后，在发展中国家普遍推行工业化战略的过程中，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落后的传统农业的制约，从而引起人们重新认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重新评价农业与工业的关系，越来越重视农业的发展，连过去以强调工业化著称的刘易斯、纳克斯等人，也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承认农业的重要性，提出农业应与工业平衡增长的新主张。后来由于舒尔茨等人关于农业问题的权威性著作发表，农业的重要性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许多学者还纷纷提出一些迅速发展农业的计划与战略，强调工业和农业应协调发展。

农业地位的提高及工农业协调发展战略的提出，一方面是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国家的工业化战略实施得不很理想，尤其是受到了农业的阻碍；另一方面是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重要意义：①农业可以为工业化提供巨大帮助，对经济发展起着产品贡献（提供农业、原材料等）、要素贡献（提供工业投入要素，如劳动力、原材料等）、市场贡献（提供工业品销售市场）、外汇贡献（出口农产品换取外汇或减少粮食进口节约外汇）的作用。②农业发展本身就是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人口（尤其是农村人口）众多，粮食问题、就业问题、收入增长问题等是当务之急，大力发展农业，可以解决农村人口乃至城市人口（包括转移人口）的粮食供给，通过农业产品加工、农村教育、乡村服务设施等的发展，可以解决过剩农业劳动力就业，同时，也能提高农业人口的人均收入。这些重大问题的初步（或一定程度）解决，本身就意味着经济发展。③农业的发展使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提高，农业人口的储蓄能力提高，增加储蓄、促进资本形成，有助于克服工业发展所遇到的资本稀缺等问题。④农业机械的广泛使用，农产品加工业和村镇小型工业的产生与发展，农村教育的普及，以及农村中乡镇的形成，有助于农业向“农业工业化”发展，使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中转变，从而改变不发达国家的二元经济结构，促进农村的城市化（如小城镇化）。⑤农业生产的提高可以增加农产品的供求弹性，改善工农业和进出口的贸易条件，有助于改变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增强出口创汇能力，改善国际收支状况。⑥农业的发展可以推进农业技术的发明和应用，进而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等等。因此，发展经济学家和发展中国家越来越重视农业的地位与作用，并广泛推行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的战略。

### 第三节 地区发展优先次序

发展中国家一般人口众多、地域广袤，经济贫困不仅表现在人均收入低、生活水平低等方面，还表现在各个地区发展不平衡，普遍存在着地区性贫穷、落后的局面。为了

---

<sup>①</sup> 张培刚于1947年已提出了农业国（即发展中国家）应重视农业发展的观点，并指出农业与工业化密不可分，农业对工业化具有要素贡献、产品贡献、市场贡献、外汇贡献四种贡献。参见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1949年英文版，华中理工大学1982年中文译本。

改变这种局面，促进各地区的经济增长，一些发展经济学家研究了地区平衡增长和不平衡增长，并主要倡导实行地区不平衡增长战略。地区不平衡增长战略强调工业布局、生产力分布、外部经济效益、资本与技术聚集、城市化等问题，从而形成了“发展极”理论、“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和“城市化”等理论，并相应提出了一些政策主张和调节制度。

## 一、佩鲁的“增长极”理论

“增长极”（growth poles）的概念和理论是法国发展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Perroux, F.）于1955年提出的<sup>①</sup>。佩鲁认为：“增长并不是同时在任何地方出现；它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增长点’（growth points）或‘增长极’，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扩散，而且对整个经济具有不同的终极影响。”<sup>②</sup>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在经济增长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在一些地区或大城市的聚集，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邻近地区产生强大辐射作用的“增长极”，通过具有“增长极”的地区优先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

“增长极”理论是以“支配学说”或“不平等的动力学”为基础的。佩鲁认为，社会是一个异质的集合体，由于种种原因，社会内部的各个组织团体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相互联系，即“支配”与“被支配”关系。所谓“支配”，是指当存在着A、B两个经济单位时，若A对B施加一种影响，而B不能反过来影响A时或不能产生同等程度的影响时，则A为支配单位，B为被支配单位。支配作用有“无意识”和“有意识”两种形式：当A自身发生变化而无意识对B产生影响时，B受A变化的影响而随之发生的变化就是“无意识影响”；当A为了使自身变化而有意对B施加影响时，B迫于这种影响而发生的变化就是“有意识影响”。支配作用产生于历史的、偶然的原因，或产生于结构、制度方面的因素。如果一经济单位属于较重要的部门，处于较重要的地区，拥有较大的生产规模，能够影响商品交换的条件，就有可能成为支配单位。支配单位可以是企业、部门，也可以是地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支配作用是一个普遍现象：大企业对小企业、工业对农业、新兴产业对传统产业、城市对农村、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支配关系。因此，经济发展是一个支配单位起主导作用的不平等、不平衡的动态过程，支配、不平等和不平衡是这一过程的重要特征。

基于上述思路，佩鲁提出了他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一国经济是由各种“经济空间”构成的，这种“经济空间”不是“几何空间”或“地理空间”，而是社会经济中各种分子之间的经济关系，它表现为三种形式：一是作为“计划内容”的经济空间，即当一经济单位制定和执行计划时，或是作为某种产品或原料的提供者，或是作为其购买者，同其他有关单位建立起各种经济关系，构成一项计划内容，这就是它的“计划内容”经济空间；二是作为“势力范围”的经济空间，即某些经济单位具有向心力与离心

<sup>①</sup> 佩鲁·略论“增长极”的概念·应用经济学，1955·8

<sup>②</sup> 佩鲁·略论“增长极”的概念·应用经济学，1955·8

力，形成种种经济中心，每一中心都能发挥吸引力与扩散力，并形成特定的作用范围，从而构成其特定的经济空间。每个中心的作用范围互相交叉，不受地区和国界限制；三是作为同质整体的经济空间，即当采用收入水平、主要经济活动形式、人口状况等具体标准来衡量和分析各个经济单位时，相比而言，一个单位的经济空间表现为可比的结构元素和以这些结构元素之间的关系为特征的整体<sup>①</sup>。

从经济空间的第二种形式入手，佩鲁论述了他的“增长极”理论。他指出，应当以非总量的方法（即非国民收入增长总量指标）来安排发展计划，将国民经济按地理幅员分解为部门、行业和工程项目。佩鲁认为，按照这一分解，经济增长并不是在每个部门、行业或地区按同一速度（或比率）平衡增长的，相反，是在不同的部门、行业或地区按不同速度不平衡增长的。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集中于一些地区或大城市，以较快的速度优先得到发展，形成“增长极”，再通过其吸引力和扩散力不断地增大自身的规模并对所在部门和地区发生支配影响，从而不仅使所在部门和地区迅速壮大发展，而且带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发展。

那么什么是“增长极”呢？佩鲁认为，它是由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在某些地区或大城市的聚集发展而形成的经济活动中心，这些中心具有生产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信息中心、交通运输中心、服务中心、决策中心（如政府所在地）等多种功能，恰似一个“磁场极”，能够产生吸引或辐射作用，促进自身并推动其他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增长。“增长极”具有“支配单位”和“创新”的特征，即它能形成一定范围的“经济空间”，对周围的地区发生支配作用，或者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对其他经济单位施加影响，迫使其产生相应的变化。“增长极”具有吸引作用和扩散作用，一般表现在四个方面：①技术的创新与扩散。“增长极”中有创新能力的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推出新技术、新产品、新组织与新生产方法，并且，一方面从其他地区或部门吸引来最新技术或人才，另一方面又将自己的新技术推广或扩散出去，对其他地区产生技术影响。更为重要的是，经济活动的创新导致经济结构的创新。②资本的集中与输出。“增长极”中一般拥有大量的资本和生产能力，为了自身发展的需要，它可以从所在地区或其他地区和部门吸引、集中大量的资本，进行大规模投资；同时，也可以向其他地区和部门输出大量的资本，通过支持这些地区和部门的发展，来满足自己发展的需要（如原材料、农产品、半成品等方面的需要）。③产生规模经济效益。“增长极”的企业和行业集中，生产规模庞大，可以形成规模经济。这不仅可以产生内在经济效益，增加自身的获利能力，而且由于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贸易、金融、信息和服务部门的建立，人才的互相利用等，使各个部门、地区共同受益，从而降低社会生产成本，产生外在经济效益。④形成“凝聚经济效果”（*economics of agglomeration*）。“增长极”的产生，使人口、资本、生产、技术、贸易等高度聚集，产生“城市化趋向”，形成“经济区域”。这些大城市或经济区域往往是生产、贸易、金融、信息、交通运输等中心，可以产生“中心城市”的作用并形成经济、技术“网络”，从而起到吸引或扩散

<sup>①</sup> 黄田华，弗朗索瓦·佩鲁的经济发展理论评介，*经济学动态*，1986（4）

作用，推动整个地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

“增长极”概念的提出，导致了一种新的增长观念：“国民经济的增长不再简单地出现在人们生活其中的政治上有组织的疆域之内，也不是作为生产要素供给只限于在国内流动的结果。国民经济的增长现在是以相对积极的集团（推进型产业、地理上集中的产业和活动极）和相对消极的集团（依赖地理集中的增长极以及被推进型产业）的结合而出现的。”<sup>①</sup>

佩鲁利用熊彼得的“创新”理论来说明“增长极”形成的条件。他指出，“增长极”的形成至少需要三个条件：第一，必须存在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群体。因为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主体动力，他们具有创新精神，敢于冒险，能够进行技术和制度的创新，能通过其影响而产生一批追随、模仿创新企业的新企业，即“增长企业”。这些增长企业在“增长极”的影响和作用下，又可形成一种“增长中心”。比如，加拿大的蒙特利尔是一个“增长极”，由于它的影响，又产生了魁北克市等“增长中心”。第二，必须具有规模经济效益。这就要求“增长极”所在地区或城市不仅要聚集大量的部门，而且要集中相当规模的资本、投资、生产规模、技术、人才等，以形成规模经济。“地理上集中和正在增长的综合产业‘极’，促进人们相互接触，强化了经济活动间的联系……集体需要（住宿、交通、公共服务）出现了，而且自身联成一体……各种类型的生产者、企业家、技术工人、产业劳动者形成了，并且相互影响，创造他们的传统，最终分享共同的利益。”<sup>②</sup> 第三，需要适当的周围环境。“增长极”的建立需要大量的资金、技术、人力、机器设备、熟练劳动力等要素的供给及基础设施等，也就是需要有一个良好的投资和生产环境，才能吸引厂商、投资、人才与技术。从而，一个或几个产业的出现改变了该地区的“气氛”，产生了适合增长和进步的“气候”。

“增长极”理论提出后，引起了许多国家的发展经济学家的重视，一些英美学者将“增长极”作了补充和发展，并命名为“增长点”（growth points）。他们认为，厂商和行业之间的亲和力（proximity）将产生外部经济效益，它使厂商和行业在地理上聚集发展，从而出现增长点。增长点的出现，有利于厂商之间、行业之间在工业化中形成网络关系，进而扩大外部经济效益。因此，外部经济效益的产生是形成“增长点”的重要原因，同时又是“增长点”作用的主要后果<sup>③</sup>。

“增长极”理论的政策含义是十分明显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工业化的经济发展，必须建立“增长极”，通过“增长极”自身的发展和对其他地区或部门的影响，带动整个经济发展。“增长极”的形成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引导企业在这些大城市与发达地区聚集发展而自动产生“增长极”；一种由政府通过经济计划和重点投资来主动建立“增长极”。这些政策主张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和吸引力，不少国家依据这一理论来制定发展规划、安排投资布局 and 工业分布、建立经济区域等。

① 佩鲁·略论“增长极”的概念·应用经济学，1955（8）

② 佩鲁·略论“增长极”的概念·应用经济学，1955（8）

③ 哈根·发展经济学·英文版，1986.356

## 二、缪尔达尔的“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主要从正面论述了“增长极”对自身和其他地区经济发展的带动作用，但却忽视了“增长极”对其他地区发展的不利影响。1957年，缪尔达尔出版了《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一书，提出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geographical dual economy）理论<sup>①</sup>，利用“扩散效应”和“回波效应”概念，说明了经济发达地区优先发展对其他落后地区的促进作用和不利影响，提出了如何既充分发挥发达地区的带头作用，又采取适当的对策来刺激落后地区的发展，以缩小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异。

依据新古典主义理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将使不同地区（发达与落后地区）间的工资率、利润率、人均收入增长率趋于相等，进而使各个地区的经济得到均衡或平衡地发展。缪尔达尔批判了新古典主义这一静态均衡分析方法。缪尔达尔指出，发展过程是一个不平衡的过程，如果听其自然，由于“循环累积因果关系”的作用，落后地区的经济将相对恶化，发达与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差距将持续扩大。因此，应当采用动态的非均衡分析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地区发展问题。

运用动态的和结构分析的方法，缪尔达尔提出，不发达国家的经济中存在着一种“地理上的二元经济”，即经济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并存的二元结构。这种“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类似于刘易斯的“二元经济”，但也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即缪尔达尔没有把经济分为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业部门，也没有采纳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为零的假定，而是根据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别或不平衡来作经济划分的。

缪尔达尔用“循环累积因果关系”论说明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的形成。他认为，地理上的二元经济产生的原因在于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别性，主要是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和工资水平差距的存在。在经济发展初期，各地区的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和利润率都是大致相等的，且生产要素可以自由流动。这时，如果某些地区受到外部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和利润等产生差距，这种差距的产生会进而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使发展快的地区发展更快，发展慢的地区发展更慢，从而逐渐增大地区间的经济差距，形成地区性的二元经济结构。由于这种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各地区之间的劳动力的转移、资本的运动、贸易的发展不仅会阻碍某些落后地区的发展，而且还可能使整个经济增长放慢。我们以两个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中劳动力转移为例来说明这种情况。

假定有A、B两个地区，在发展开始时，其人均收入、劳动生产率、工资率都相等。现在，有一外力（政治的或经济的）推动，使A、B两个地区经济发展出现不平衡，一个发展得快，成为“受惠地区”（favoured region），另一个发展得慢，成为“落后地区”（backward region）。按照新古典的均衡理论，在这种情况下，通过生产要素的流动，可以重新实现均衡发展。如A地区发展快，出现了劳动力缺乏和资本丰裕，那么发展慢的B地区的劳动力就会流入A地区以降低工资率，A地区的资本就会流入B地

<sup>①</sup> 缪尔达尔，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英文版，1957.40

区以提高利润率。最终，两个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平衡。如图 8.3 (a)，A 地区的劳动供求曲线分别为  $S_0S_0$ 、 $D_0D_0$ ，均衡的工资水平为  $W_{A0}$ 。相比而言，B 地区的均衡工资水平为  $W_{B0}$ ，且  $W_{A0} = W_{B0}$ 。这时，如果 A 地区的发展突破了均衡状态，实现了快速增长，A 地区的劳动需求就会增大，如由  $D_0D_0$  增加到  $D_1D_1$ ，若 A 地区劳动供给尚未增加，则劳动工资水平就会由  $W_{A0}$  上升到  $W_{A1}$ 。A 地区工资的提高产生了 A、B 之间工资差别，B 地区的劳动力就会受高工资的吸引而流动到 A 地区，使 A 地区劳动供给增加，如由  $S_0S_0$  增加到  $S_1S_1$ 。这样， $D_1D_1$  与  $S_1S_1$  相交达到新的均衡，形成  $W_{A2}$  水平的均衡工资。与此同时，B 地区劳动供给从  $S_0S_0$  减少到  $S_1S_1$ ，此时 B 地区的均衡工资为  $W_{B1}$ ，且  $W_{B1} = W_{A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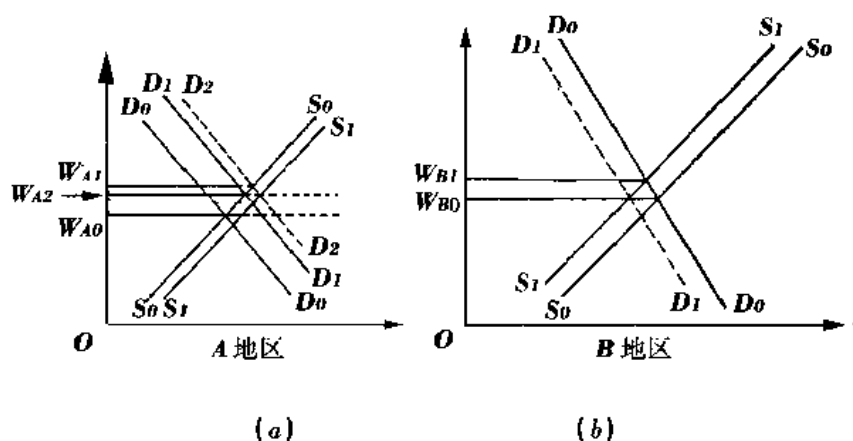


图 8.3 不同地区劳动力转移情况

根据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假说，缪尔达尔认为，上述新古典均衡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预期的供给变化可以以同样方式对需求起反作用，并抵消均衡的趋势。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地区对其他地区劳动力的吸收是有选择性的。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快，物质资本和技术的聚集量大，因而需要大量的技术和人才、熟练劳动力、企业家等质量较高的劳动力，而不是一般劳动；从不发达地区来看，通常也只有受过教育的人和熟练劳动力才能支付向其他地区迁移的费用。因此，移民中大多是质量较高的劳动力。这样，劳动力转移的结果，一方面，流入 A 地区的高质量劳动力促进企业的兴起、激发了对产品和生产要素的需求，促进了其经济进一步快速增长，这反过来又刺激了 A 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从  $D_1D_1$  增加到  $D_2D_2$ 。劳动力需求增加再次提高工资水平，并进而继续吸引 B 地区的劳动力流动；另一方面，从 B 地区流出的劳动力剥夺了该地区的人力资本和企业家，减少了对商品、劳务和生产要素的需求，如劳动需求由  $D_0D_0$  下降为  $D_1D_1$ 。 $D_1D_1$  与  $S_1S_1$  相交，决定了均衡工资水平为  $W_{B0}$ ，仍低于 A 地区，这样，B 地区的劳动力就会继续向外流动。缪尔达尔认为；这两方面的结果都会产生“累积性因果循环”：地区间的工资差别同劳动力流动互为因果，劳动力流动与经济发展水平互为因果，从而使发达地区越来越发达，落后地区越来越落后，使地区间的工资差别、人均收入差别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越来越趋于扩大。

缪尔达尔指出，相似地，资本的流动趋向于增加不平等，在经济扩张中，需求增加将会刺激投资，这又将增加收入与需求，从而引发第二轮投资，如此反复不已，这样贫困地区的资本就会被吸到资本收益高且稳定的发达地区；贸易也将给发达地区带来利益，而对落后地区造成发展障碍。缪尔达尔还意识到，“非经济因素”是导致不平等累积过程的一个重要要素，“在许多贫困的国家中，内在的封建性和其他不平等制度，以及通过剥夺穷人谋求致富的强权结构，会使导向不平等状态的自然过程不断持续和扩大”<sup>①</sup>。上述劳动力、资金、技术、资源以及“非经济因素”等要素产生有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落后地区的连续的累积性的扩张效应，缪尔达尔称之为“回波效应”（back-wash）。

但“回波效应”的作用并不是无节制的，地区间发展差距的扩大也是有限度的，因为与“回波效应”相对应，还有一个离心的“扩散效应”，它把扩张力从经济扩张的中心扩散到其他落后地区。从工业扩张中心向其他落后地区的扩散效应，通过对其产品的需求的增加和许多其他方式进行，以与回波效应相同的方式，通过因果循环与累积性社会过程交织在一起，对抗回波效应产生抵消性的变化。进而言之，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拥挤、污染严重、资本过剩、自然资源相对不足等原因，使发达地区生产成本上升，外部经济效益逐渐变小，反而减弱经济增长的势头。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发达地区再扩大生产规模快速增长已变得相对不经济，因而就会将资本、技术、劳动力等向其他地区扩散出去，或者为了自己的进一步发展而将资本、技术劳动力等有意向其他地区扩散出去，但无论怎样，这种扩散都带动或帮助了落后地区的发展。

根据二元空间结构理论，缪尔达尔提出了他对经济发展优先次序的看法：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当某些先起步的地区已累积起来发展的优势时，政府应当采用不平衡发展战略，通过发展计划和重点投资，优先发展这些有较强增长势头的地区，以求得较好的投资效率和较快的增长速度，并通过这些地区的发展及其“扩散效应”来带动其他地区的发展。缪尔达尔指出，在这时优先发展某些有优势的地区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资源、技术、熟练劳动力有限的情况下，若全面投资和发展各个地区，会降低资源利用效率，引起经济效益下降，使各地区都不能迅速发展起来，反而减弱了经济增长；但缪尔达尔也指出，各地区发展的差别也不宜拉得过大，当发达地区发展起来后，为了防止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贫富差距无限扩大，不应消极地等待发达地区产生“扩散效应”来消除这种差别，而应由政府采取一定的特殊措施来刺激不发达地区的发展，尤其是不发达地区的政府应制定相应的对策来发展自己的经济，缩小这种差别。还有一些学者补充指出，发展中国家应采用新的“社会经济综合发展战略”，把缩小贫富差距、开发人力资源、增加社会就业、扩大粮食生产、开发落后地区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为此，政府采取开辟新工业区、开发新矿产和能源、建设基础设施、提供优惠政策（如优惠贷款、减免税收等）、兴办合资企业（包括外资、与发达地区合资）、引进外资、开辟内地自由贸

<sup>①</sup> 缪尔达尔. 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 英文版. 1957. 40



易区（如巴西的马瑙斯、印度的坎德拉等落后地区的自由贸易区）等，来帮助不发达地区发展经济，增强“自我发展”的能力，为不发达地区将来的大发展做好准备。

### 三、地区发展与城市化

某些优势地区优先发展，必须促成一些大、中型城市的产生，从而出现经济发展中的城市化倾向。城市化是部门和地区经济发展、工业聚集、人口集中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地区不平衡增长的结果。城市的发展，反过来又促进了部门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为“增长极”的形成提供了地理空间。城市化的主要标志是工业生产高度聚集（反映为工业产值占绝大比重）、人口高度密集（按人口密集度可分为大、中、小型城市）、资本与技术高度集中、人的观念实现了现代化、经济与政治体制发生了根本改变，等等。

城市化的发展可以发挥中心城市的领导、带动作用，但过度的城市化也会产生人口过密、住房紧张、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犯罪增多等问题，以及成本上升、外部经济效益下降等情况，为此，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提倡限制大城市的过快发展，积极发展中、小城市。还有一些学者赞赏中国发展城市的经验，倡导多发展小城镇。

部门和地区发展的优先次序选择理论，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许多可供选择的发展模式，但发展中国家不应照搬这些理论，而应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借鉴这些理论，制定出适合自己的发展战略。

## 第九章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

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引擎”，这条由古典经济学所阐述、并为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实了的真理，对于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仍然具有适用性。这不仅是因为外贸可以扩大发展中国家的总产出和出口，而且因为外贸可以换回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及中间产品等，为发展中国家实行工业化、改变传统经济结构、提高产出与收入水平、实现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条件。但是，以比较成本学说为核心的自由贸易理论和现存的国际贸易格局对发展中国家是有不利之处的，突出表现在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处于不平等地位。为了改变这种格局，发展经济学家批评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新的国际贸易理论和进口替代、出口替代、外贸平衡等发展战略，以及一些适合于发展中国家的外贸策略和政策。这些新的理论、战略和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扩大外贸、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 第一节 新贸易理论与新贸易政策的发展

贸易政策在经济发展中置于何种地位？要考虑这个问题，还需从贸易政策的理论基础开始回顾。如从亚当·斯密 1776 年《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提出“绝对利益论”算起，国际贸易理论迄今已发展了 200 余年，其间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绝对利益论”后由李嘉图提出的“比较利益论”为代表。其精髓在于证明了，如果一国所有产品的劳动成本都比另一国高，但只要这些产品的劳动成本相对于贸易伙伴而言并不完全一样，那么该国就能通过专业化生产成本相对较低的产品从而在贸易中获益。这个立论成为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与基础。

第二阶段的代表是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逊模型。1919 年，赫克歇尔的论文与 1933 年俄林的《区间贸易与国际贸易》一书，探讨了各国比较利益产生之原因。他们认为，各国各种产品的相对生产成本之所以不同而产生贸易，是因为其资源禀赋以及不同产品的生产所要求的要素比例各不相同，因此，一国会集中生产和出口那些密集地使用其最丰裕生产要素的商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以简洁明了和逻辑性强的特点而被广

为接受。1949年，萨缪尔逊在《再论国际要素价格均等化》一文中对要素价格均等化问题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各国要素价格将通过贸易实现均等化，从而形成了完整的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逊模型。

第三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发展的各种贸易理论。由于战后国际贸易发展的现实使传统比较利益论和要素禀赋论日益软弱乏力，特别是它们对解释发达国家之间及相似产品之间的贸易显得一筹莫展，为此出现了不少新的贸易观念，诸如产品生命周期论、人力资本论、技术贸易论、收入偏好相似论、产业内贸易论等。它们从不同侧面揭示了战后贸易新现象，推动了贸易理论的发展，但是总体上还欠深入全面，也未形成一个统一体系。为了更好地阐释国际贸易新格局，同时更彻底地动摇传统贸易理论的统治地位，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大量利用产业组织和市场结构理论，用不完全竞争、规模收益递增、相异产品等概念和思想来构筑新贸易理论模型。通常被称为“新贸易理论”的一组观点，最初是由狄克西特（Dixit, A.）和诺曼（Norman, V.）、兰开斯特（Lancaster, K.）、克鲁格曼（Krugman, P.）、赫尔普曼（Helpman, E.）和艾瑟尔（Ethier, W.）在一系列论文中提出的，尤以克鲁格曼与赫尔普曼合著的《市场结构和对外贸易》一书为代表。新贸易理论证明了，各国不仅利用其差别而从事专业化贸易，而且还因为实际带来专业化优势的收益递增而从事贸易。贸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收益递增而不是由比较优势所驱动的，因此，各国生产什么是历史、偶发事件和过去政策的产物，而并非国家资源和能力根本差别的结果。

第一、二阶段传统贸易理论占据统治地位逾百年，主要是由于其一般均衡分析方法形成一个有力而优美的智力构造，对于当时的世界贸易体系提出了许多有用的见解。但是这个理论不能恰当地解释贸易量、贸易构成、公司内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的作用，也无法反映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由此新贸易理论摒弃传统，使得收益递增作用与不完全竞争成为贸易理论的核心。新贸易理论提出了三个重要创新：首先，在贸易理论中引入产业组织，脱离了完全竞争模式的束缚；其次，设法使贸易理论从“二维假定”中解放出来，即摆脱了耽于迎合要素比例理论却疏于考虑其他可选情形的模式；最后，突破了人为区分纯技术的与货币的外部经济的做法，证明可以不求助于技术扩散与纯粹外溢而将外部经济严密地加以模式化。当前，新贸易理论已经由异端走向了正统。

伴随理论上的创新，贸易政策也取得了重大发展。传统贸易理论集中于完美的理论建构，从不展开政策研究，或者说，其暗含的政策结论即是主张自由贸易，否认贸易政策。但是，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和收益递增条件下，公司必然扮演重要角色，同时贸易也不一定带来福利收益，甚至可能造成福利损失，因此，自由贸易不再是惟一的政策选择。尽管新贸易理论开始主要是为了更好地阐释贸易形式和填补传统贸易理论的逻辑空白，但是其突出的理论创新必然引申出富有创见的政策含义。现在，贸易政策至少涉及产业政策、反垄断政策、关税政策等一系列政策，贸易政策的实施由短期即时调节变为长期主动调整，贸易政策手段由单一的贸易保护转为把适度的进口保护与积极的出口促进互相结合的多样化措施。

## 第二节 关于贸易与经济发展的一般争论

贸易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贸易收益与增长收益之间是否存在冲突这个根本问题。贸易能够在一国经济发展中产生推动作用吗？或者，比较优势的界定与加速发展的要求相冲突吗？一种观点认为贸易对发展促进颇大，得自国际专业化的收益增进了贸易收益；另一种观点认为贸易收益片面优惠于发达国家，却阻碍其他国家产业发展，导致国际不平等加剧；还有一种折衷观点，认为贸易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进行出口导向的发展是有前提条件的。这些争论对各国贸易战略和贸易政策的选择产生了很大影响。

### 一、“自由贸易是增长的发动机”论

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阐述的正统观点认为自由贸易在发展中是个推动力量。亚当·斯密的贸易模型假定一国在对外开放前存在闲置土地和劳动力，剩余资源用于生产更多商品出口，由此为利用欠佳的剩余生产能力开辟了“出路”。这种“剩余的出路”观点认为，贸易可在不降低国内生产情况下扩大出口，结果提高了经济活动的水平。更一般地讲，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认为比较优势决定贸易形式，给一国带来收益的不是剩余资源的使用，而是更有效的国际资源配置。出口使得一国能够在较国内直接生产更为有利的条件下购买进口品，同时，通过专业化生产成本相对最低的商品。用李嘉图的话讲，贸易国会增加“商品与享受的总量”；用现代术语讲，即使没有资源增长或技术变化，贸易也促使了各国生产最优化。

尽管古典与新古典学派主要强调贸易的直接静态效应，但也考虑了贸易的动态影响，肯定在一国遵循比较优势与加速发展之间是不矛盾的。正如 J.S. 穆勒所指出的，贸易的直接经济优势在于促进了世界生产力更有效的使用，但除此之外，还有须从更高层次认识的间接效应，其中最显著的是市场的每一次扩张带来的增进生产进程的趋势。一个为大于其自身的更大市场生产的国家，可以引入更广泛的劳动分工，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其机器，并且更有可能在生产过程中进行发明与改造。穆勒还指出了另一个主要适合于产业发展早期的效应，即“通过使人们熟悉新事物，或者使人们更容易地获得以前无法取得的东西来诱导人们，对外开放有时可以在由于人们缺乏能量与热情而资源利用不足的国度带来了某种产业革命”。

古典学派认为贸易对发展的间接好处有三种：一种是扩大市场范围，诱致创新，并提高生产率；另一种是提高储蓄和资本积累；第三种是在灌输新需求和新偏好以及传递技术、技能和企业家精神方面具有教育效应。这里强调的是发展过程的供给方面，即贸易给穷国带来的消除国内短缺，克服国内市场狭小的非经济性以及加速其经济的“学习率”的机会。所以，传统的结论是贸易收益并非仅仅是资源配置的一次性变化，而是持续与发展收益相融合；国际贸易转变了既有的生产函数，提高了经济的长期生产率。贸

易量越大，则发展潜力也应该越大。显然，许多观点至今仍不乏启迪意义。

更晚一些，出现了各种出口导向增长模式，表明了发展中经济的增长取决于出口扩张的宏观动态观点。一种观点是“需求启动型”（demand-motored）。如纳克斯（Nurkse, R.）认为发展中国家国内储蓄和资本形成不足，生产率低下，因而发展外贸成为启动国内经济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跳板。刘易斯（Lewis, W.）也从需求方面入手，根据经验规律，提出了贸易是增长发动机的论点，他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演说词《增长引擎减缓》中指出：“在1873年~1913年期间，初级产品世界贸易的增长率是发达国家工业生产增长率的0.87倍；而且1973年前的20年中也大致保持了这个比率。初级产品的世界贸易量是一个比发展中国家出口量更为广泛的概念，但是，这两个概念关系密切，以致可以互相替代。我们无需详细的统计资料来证明，初级产品的贸易有赖于工业化国家的繁荣。”雷德尔（Riedel, J.）在《贸易作为增长发动机的重新考察》<sup>①</sup>中，验证了刘易斯关于发展中国家出口受外部需求驱动的观点及二者之间的经验关系。此外，芬德利（Findlay, R.）也提出一个十分精致的理论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商品的贸易条件恶化，使之将生产率上的利益输出给发达国家，并且在增长率上依赖发达国家<sup>②</sup>。由此从反而论证了贸易是增长的发动机。

另一种观点是“供给启动型”（supply-motored）。科登（Corden, W.）强调要素供给和生产率的增长率，就贸易对增长的作用展开了更全面的讨论。他指出一国经济对外开放可带来五种效应：一是“影响效应”，即与贸易的静态收益相对应，现期实际收入得到提高；二是“资本积累效应”，即贸易的静态收益部分地用于投资，把实际收入增长由现期转移到未来；三是“替代效应”，如果投资品是以进口为主的，那么由于投资品对消费品相对价格的下降，将导致投资与消费之比的上升和增长率的上升；四是“收入分配效应”，即会出现收入向生产中密集使用的要素转移，而这又可能给总储蓄倾向及资本积累带来影响；五是“要素加权效应”，即考虑到资本与劳动的相对生产率，加之产出增长率是资本与劳动增长率的加权平均数，假若出口增加且出口品使用增长较快的生产要素，那么出口品增长率会上升更快。所有这些效应都是累积的，并会深化由对外开放带来的实际收入增长<sup>③</sup>。

由此可见，“贸易是增长发动机”的观点有着十分深远的影响，经济学家们从不同角度论证了贸易不仅影响一国资源配置，由国际贸易得到直接收益，并且为其经济发展创造各种条件与机会，这成为各国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的重要理论基础。但是，如果各国都根据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从事自由贸易，那么发展中国家先天地在世界贸易中处于初级品出口国的不利位置，承受着贸易条件恶化、出口品需求弹性小等负面影响，通常笼罩在出口悲观主义的阴影下，贸易这个增长发动机对于发展中国家显得滞重乏力。所以，从理论上讲，贸易对增长的积极作用似乎十分充分，但在实践中，贸易的正效应被

① 经济学杂志，1984. 3

② 格罗斯曼，伦德伯格，世界经济秩序：过去与展望

③ 科登，贸易对增长的影响。见：巴格瓦蒂，贸易，国际收支和增长，英文版，1971

归结为自由贸易的结果，因而忽视了由自由贸易可能导致的负效应，也否认了适当的贸易政策的作用。

## 二、自由贸易危害经济发展论

尽管自由贸易的发动机效应影响颇大，但许多发展经济学家从发展中国家经济现实出发，批评了传统贸易理论的静态性、简单化倾向，指出自由贸易不利于经济发展，尤其是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其论点主要是：

(1) 自由贸易会加剧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传统贸易理论认为贸易双方的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不变，从而要素收益不变。但现实是，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快，生产率提高推动制造业收益递增，而发展中国家农业与初级品生产中技术进步慢，生产率停滞以至下降；同时发达国家对初级品需求弹性低，加之替代品的开发和贸易保护主义障碍，发展中国家出口极难扩张。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普雷维什 (Prebisch, R.) 和辛格 (Singer, H.) 就考察了发展中国家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指出要谋求发展，则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适当政策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

(2) 自由贸易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外贸与国际收支逆差。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出口比重小，外贸增长率低，并且对资本品、工业制成消费品的进口需求大大快于对初级品的出口需求，因此，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无疑会出现外贸逆差和国际收支不平衡，而这种状况使之难以承受外部冲击，经济发展进程受到不利影响。

(3) 自由贸易所依据的传统贸易理论只考虑了私人成本，却没有展开社会成本—收益分析。由于外部性的存在，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常常背离，许多情况下，生产和出口有利于个别企业，但不一定符合社会利益，就是说，如果按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个别比较成本优势生产，很可能会有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往往有必要采取保护措施，重新安排投资和配置资源。

(4) 自由贸易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利用。一方面，随着世界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可能改变要素供给的数量与质量，而对某种资源的需求或供给条件的变化会使资源发生短缺或过剩。这些变化也许对发展中国家有利，但在更大程度上，由于加剧了各国资源发展不平衡，会引起资源的初始条件和成本不均，从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例如，发展中国家通常劳动力十分丰富，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由于劳动力价格相对便宜，贸易条件不利，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持续扩大这种低层次的生产以维持经济增长，于是始终不能从国际贸易中获得平等的收益。另一方面，随着科技、交通、通讯的发展，各种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流动成为可能，资本输出、技术传播、人才流动已成为普遍现象，因而，发展中国家可能丧失某些优势（如资源较丰裕、劳动力价格低廉），而资本向发达国家大量倒流与人才外流还使发展中国家固有的资本短缺、人力资源欠缺等劣势积久日深。可见，贸易可能不仅不会改善发展中国家的资源配置，反而造成其资源配置扭曲和利用不足。

(5) 自由贸易所决定的生产专业化对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利。原因是：其一，若一国出口品市场短期价格波动频繁，出口年收入大幅度变化，从而影响了经济发展，那就难

免导致国内消费与投资发生改变，而这种抵消性的调整意味着某种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可能会时常改变而不稳定。其二，从动态观点来看，发展中国家出口品需求弹性不足，若追加投资，则边际收入低于实际价格，同时进口品需求弹性很大，这样，按照“平均比较利益”原则应扩大出口，而按“边际比较利益”原则应支持进口，于是生产的专业化遇到了外贸结构变化的阻碍<sup>①</sup>。其三，农产品、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呈不断下降趋势，从长远来看，这些产品的生产专业化是不利的。

(6) 自由贸易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发展。按照传统贸易理论，发达国家应生产具有资本和技术优势的制造品，发展中国家则应生产具有劳动力优势的初级产品。但是，初级产品的前、后向联系很小，并且有些国家的初级产品生产长期被外国企业把持，它们常将所得利润汇往国外。这样，初级产品生产部门无法产生联系效应，也不能为其他产业、尤其是工业部门提供资本积累，因此，无论它多么发达，也无法带动其他部门发展。

(7) 自由贸易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国际不平等。典型的论点是缪尔达尔 (Myrdal, G.) 提出的“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他认为，市场力量的运作不会导向生产要素、进而收入的均等，并且贸易的不利影响会与经济相对落后相互作用。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欠发展，社会流动性、公共教育、信仰与价值观念的共享等水平均很低，不可能形成国内经济一体化和机会均等化。国际贸易并不必然导向均等，相反，市场扩大一方面强化了发达国家既有的经济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却使发展中国家民族产业受到强烈的国外竞争，甚至被剥夺发展现代工业的机会。

由此可见，既然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奢望对外开放，借助自由贸易而自动地带来经济发展，那么调节市场力量效应的政府干预就不可缺少了。他们开出的处方通常是，发展中国家要通过推动国内自给自足，或者更一般地，通过采取关税同盟和其他形式的经济一体化来实现“集体的自力更生”，以摆脱发达国家的支配。这种观念和主张曾经风行发展中世界，成为它们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和进口替代战略的理论依据之一。关于这种贸易战略的得失，下而还将详尽讨论。

### 三、“贸易是增长的婢女”论

近年来日渐盛行的另一种带有折衷性的观点是，既承认贸易与经济增长的某种共生性，同时又提出了一些尖锐的现实问题。诸如，为什么尽管贸易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如日本，亚洲“四小龙”等）成功地推动了经济增长，但在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却未产生相似的刺激作用？为什么许多发展中国家出口部门的增长并未传递到其他部门，进而导致国内经济更广泛的发展？为此，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探讨了在何种条件下出口部门扩张才能带来出口导向的发展，怎样使出口扩张与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结合起来，怎样在取得贸易的资源配置效应的同时，避免其不利的经济与社会副作用等一系列问题。显然，这种讨论必然具有极强的政策导向。

<sup>①</sup> 赫立克，金德尔伯格，经济发展，英文第4版，1983，315~316

里特尔 (Little, I.) 考察了亚洲“四小龙”可观的经济实绩, 指出: “除了香港以外, 这些国家和地区仅仅从 60 年代才开始的迅速增长经历了从进口替代到出口促进的重大政策变化…… (它们的) 成功几乎完全是由于良好的政策和人民的能力——而不是由于有利的形势和良好的开端。”他尤其指出在韩国经济发展中, “主要的教训是, 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导向型的政策等于给出口商提供了近似于自由贸易的条件, 这是它的劳动密集型工业化极其迅速的原因, 它在 10 年时间里就使 5 000 多万人, 包括其中最贫穷的人的生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sup>①</sup> 约翰逊 (Johnson, H.)、巴格瓦蒂 (Bhagwati, J.) 和兰姆斯瓦米 (Ramaswami, V.) 等率先区分“自由贸易”与“自由放任”, 认为由于外部性、生产中的收益递减等因素, 自由放任可能造成种种非效率现象, 同时他们反对实行经济统制的保护主义, 而主张通过国内课税和补贴以纠正国内价格机制运作中的扭曲。许多经济学家还根据经验研究指出, 自由贸易仍是所有国家最好的政策, 但自由放任并不具备充足的理由。克拉维斯 (Kravis, I.) 认为经济增长主要应依赖国内因素, 在把国内资源转化为既能用于投资又能用于消费的商品或劳务的过程中, 国际贸易是这种国内机会的延伸。因此, “即使贸易在增长过程中发挥着有益的作用, …… ‘增长的发动机’ 一词也并不带有普遍的描述性, 它包含着仅仅通过贸易无法实现的愿望; 因此, ‘增长的婢女’ 一词可能更好地表达贸易可以发挥的作用。”<sup>②</sup>

由此可见, 这一思路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更客观地把握贸易的作用, 提出了外贸与开发利用国内资源相结合的观点; 二是把一些国家的经济成功归结于正确的贸易政策, 而不是自由放任或偶然机遇; 三是主张政府在贸易领域不能简单地施行保护主义, 而应采取多样化的政策。我们认为, 这个思路比较切合实际, 对于经济发展中制订和实施正确的贸易政策具有启示意义, 值得进一步拓展。

### 第三节 发展经济学家对传统的 对外贸易理论的评价

发展经济学家对传统的对外贸易理论持有不同看法: 有人认为它基本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有人认为它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有人还进而对它作了一般性的批评。现分述如下。

#### 一、认为传统的对外贸易理论基本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论证

在发展中国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国际贸易理论、但在实践中又急需用国际贸易理论作指导的情况下, 一些学者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用于分析和指导经济发展问题, 认为它基本上是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他们指出:

<sup>①</sup> 里特尔, 一个经济复兴, 见: 加伦森编, 台湾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 英文版, 1979

<sup>②</sup> 克拉维斯, 贸易作为增长的婢女, 经济学杂志, 1970, 12



(1) 比较成本学说的静态性质并不影响用它来分析动态的经济发展问题。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应用比较成本学说进行专业化生产,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与成本优势,有效而合理地配置资源,提高生产率,最大限度地扩大产出和取得实际收入。

(2) 生产专业化可能使发展中国家更依赖于国际市场,但它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效率,并有助于打破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积极利用有利的国际条件来发展民族经济,使本国经济迅速增长。

(3) 按比较成本原则发展对外贸易可以使发展中国家提高经济效益并获得最大的外贸收益。实行专业化,生产和出口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并将增加的资源单位投入到出口工业中,可以使投资效率、经济效益提高,并以既定的资源和出口,换回更多的进口产品,得到较多的外贸收益。

(4) 国际贸易的基础(比较利益)可以随时间与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比较成本学说认为国际贸易是按各国的比较优势进行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条件的变化,任何既定国家都可能丧失某一产品的比较优势。因为,虽然土地、自然资源在短期或中期内可能相对不变,而资本和劳动则通常以不同的速度持续增长,同时,各国生产要素的丰歉情况也会变化,因而一国有可能丧失某产品的比较优势。然而,旧的贸易基础或优势改变了,新的贸易基础即新的比较利益又会产生。这表明,无论情况怎样变化,由于比较利益可以随之变化,因而比较成本学说可以长期指导外贸实践<sup>①</sup>。

(5) 比较成本学说可以同时适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刘易斯认为,比较成本学说对劳动力过剩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同样正确。对发达国家来说,“它是拥护自由贸易的正确的的基础”,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是拥护保护贸易的正确的的基础”<sup>②</sup>。原因在于,发展中国家不应根据比较成本学说来安排应该生产什么和不应该生产什么,而应根据资源的丰歉情况,选择多使用劳动力而节约稀缺资本的产品进行生产,同时,为了克服贸易条件不利的影晌,还应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但这样一来,发展中国家也就获得了某些产品(如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上的比较优势。所以,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只不过条件有所不同。

(6) 发展中国家近30年经济和贸易发展的历史证明,比较成本理论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有效。尽管一些学者批评比较成本学说,有的甚至主张实行自给自足的经济发 展以示对抗,但这些批评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而大多数学者认为自给自足式的发展模式是不足取的。

## 二、认为传统的对外贸易理论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论证

与上述观点相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尤其是发展经济学中的激进派,认为以比较成本学说为核心的自由贸易理论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

### (一) 假定条件不现实

<sup>①</sup> 赫立克,金德尔伯格. 经济发展. 英文第4版. 1983. 313

<sup>②</sup> 刘易斯. 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经济发展. 见:阿加瓦拉,辛格编. 不发达经济学. 英文版. 1973. 443~446

在比较成本学说的 10 个假定条件中，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几乎没有一个条件是现实的。比如，关于外贸可以促使一国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和充分利用的假定，是违背现实的。在实际的国际贸易格局中，发展中国家以农产品、初级产品的专业化生产和出口为主，并往往将资源集中于少数几种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上，这种畸形的投资与资源配置导致了畸形的经济结构和外贸，历史已证明它是不合理的。而且，即使是这样的格局，发展中国家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失业人口和闲置生产能力，表明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再如，他们认为按比较成本优势进行生产，资源的价格可以反映其机会成本，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要素价格存在着严重的扭曲，尤其是其产品的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发生了扭曲。

**(二) 比较成本学说是静态的、短期的效应，而经济发展是动态的、长期的过程**

比较成本学说强调的是资源在国际间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这是一种静态的、短期的效应，而经济发展涉及到经济增长、人口增加、人均收入提高、经济与外贸结构变化、相对福利的提高、贸易条件的改善等动态的、长期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在方法、内容、目标、道路等问题上是不相容的。前者侧重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后者侧重于一国经济的长期发展；前者可以说明过去的外贸格局和经济发展道路，而后者则是为了提供未来的外贸格局和经济发展道路。

关于这一点，可以用“对外贸易的收益分析”来说明。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认为，发展国际贸易可以使贸易双方均受益，这种收益可以用一国外贸的产出价值和实际收入的增加来度量。对传统国际贸易理论的适用性持否定态度的发展经济学家则认为，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只看到了静态收益 (static gains)，而未能认识对外贸易所带来的动态收益 (dynamic gains)。

(1) 静态收益。静态收益是以比较成本学说为基础的，是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所产生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使贸易国的产出和福利（也是世界的产出和福利）在既定的要素供给条件下迅速增加。可用图 9.1 来说明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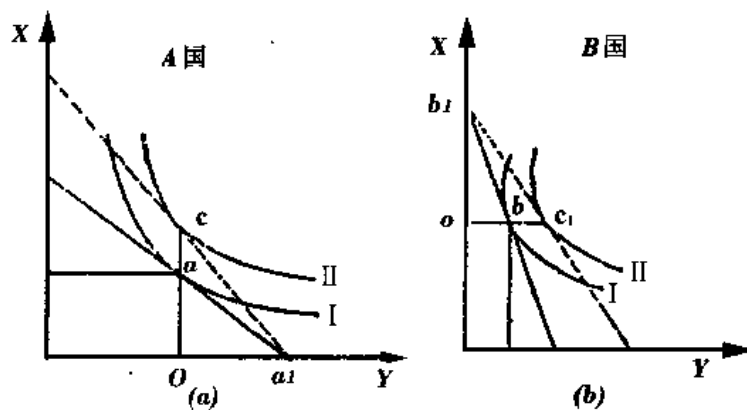


图 9.1 两国商品生产比较

假定有 A、B 两个国家，同时生产 X、Y 两种商品，而 A 国具有生产 Y 的优势，B

国有生产  $X$  的优势，根据比较成本学说，应当进行国际分工，由  $A$  国专业化生产  $Y$ ， $B$  国专业化生产  $X$ 。当  $X$ 、 $Y$  商品在满足了本国需要后有剩余的情况下， $A$ 、 $B$  两国可以进行贸易。其各自的比较成本可以用  $X$  与  $Y$  的生产可能性线斜率的边际转换率来度量。依照自由竞争原则，这时， $X$ 、 $Y$  两种商品的价格比率将等于其边际转换率，若其不等，就会发生一种商品生产向另一种商品生产的转换（如减少  $X$  增加  $Y$ ，或减少  $Y$  增加  $X$ ），直至二者比率相等。

在图 9.1 中， $A$ 、 $B$  两国按各自的成本或要素丰裕优势生产不同组合形式的  $X$ 、 $Y$  商品，假定各自的生产要素都得到了充分使用，生产率相等，那么生产可能性线就是线性的，即边际转换率为常数。曲线 I、II 是无差异曲线，表示一国的福利水平。现在假定， $A$  国的  $X$  和  $Y$  商品的边际转换率是  $10/8$ ， $B$  国则是  $10/2$ ，表明  $A$  国生产  $Y$  相对成本低， $B$  国生产  $X$  相对成本低，因而  $A$  国可以集中地进行  $Y$  的专业化生产， $B$  国集中地进行  $X$  的专业化生产。在发生贸易之前，每个国家都在无差异曲线 I 上生产  $X$ 、 $Y$  两种商品的组合，如  $A$  国在  $a$  点、 $B$  国在  $b$  点生产，两国产出水平和福利水平都相等。在贸易产生之后， $A$ 、 $B$  两国生产水平扩大，如  $A$  国将  $Y$  的产出扩大到  $a_1$ ， $B$  国将  $X$  的产出扩大到  $b_1$ ，这样， $A$  国将自己剩余的  $Y$  产品  $oa_1$  用来同  $B$  国交换  $X$  产品，可以使自己对  $X$  产品的消费由  $oa$  扩大到  $oc$ ， $B$  国将自己剩余的  $X$  产品  $ob_1$  用来交换  $A$  国的  $Y$  产品，可以使自己对  $Y$  产品的消费从  $ob$  扩大到  $oc_1$ 。这样，两国都扩大了自己的生产能力，使各自的无差异曲线由 I 提高到 II 位置，福利水平也由 I 提高到 II 上。由此可见，生产专业化将使贸易国双方都受益，使其在既定资源下产出量和福利都达到最大。

但是，上述分析是以一国的  $X$ 、 $Y$  产品的价格比率（price rates）一致即  $X$ 、 $Y$  产品的机会成本相等， $A$ 、 $B$  两国按同一汇率（即同一外汇价格）进行交换为假定的，并且要以闲置资源的存在为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一国多生产  $X$  产品必然少生产  $Y$  产品，多消费  $X$  产品必然少消费  $Y$  产品，生产  $X$  成本低意味着  $Y$  的生产成本高，因此，从一国国内来看，总会有一种产品的生产厂商受益，另一种产品的生产厂商受损。但比较成本学说认为，国际贸易的收益可以使受损厂商得到补偿，从而使国内的总福利水平增加。与此同时，在自由竞争条件下，高成本产品的生产部门的资源会自动转移向低成本产品的生产部门，以求得平均利润。这样，资本转移的结果，会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2) 动态收益。外贸的动态收益范围很广，主要有：

——规模收益。一国扩大了对外贸易，就会扩大国内生产者的总市场。市场需求的增加又刺激了外贸部门生产规模的扩大、资本的积累（包括从国外引进资本）、生产方法的改进以及资源的集中，从而形成了规模经济，产生内在或外在经济效益。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指出，外贸扩大所产生的规模收益可以扩大一国的资本积累，对穷国而言，这笔资本可以用于工业化，从而带动穷国的经济增长。外贸比重越大，市场越大，资本积累越多，从而工业化进程越快。这一点对大国尤为适用<sup>①</sup>。

——各种经济刺激。外贸的发展，可以产生许多经济刺激，如培养竞争意识、获得

<sup>①</sup> 明特，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和不发达国家。经济学杂志，1958. 6

新技术和新知识、树立新观念、增加获得流动资本的可能性、提高专业化程度并导致采用更成熟的生产方法、促进技术传播、引起制度（institutions）和态度（attitudes）方面的转变，等等。这些新的经济刺激，可以使一国的传统经济得到根本改造，从而增强一国潜在的生产能力。

——从剩余资源的充分利用中获得动态收益——“剩余的出路”（vent for surplus）。按照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发展对外贸易可以使贸易国双方产出与收入达到最大，并使资源得到充分利用。但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由于现有资源（包括人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生产能力存在着闲置甚至浪费（表现为国内市场有限、产品不能完全售出）。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扩大外贸出口来扩大生产量，充分利用剩余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出进行出口，换回更多的进口产品，从而提高该国的消费和福利水平，并且，这种动态的外贸收益不需花费多少实际成本就可以获得。这种观点由缅甸经济学家明特作了详细论证，称为“剩余的出路”的贸易理论。

——外贸部门的生产效率。外贸部门一般使用的资本品较多，技术水平较高，劳动生产率较高，因而能比国内其他产业更有效地充分利用资源，产生较好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进口资本品等可以解决国内某些要素投入的中梗阻问题，降低资本—产出比，比国内生产的资本品更有效率地发挥作用并对整个经济发生影响。此外，外贸扩大了国内和国外市场，增加了产品需求，从而使外贸带动了经济增长。这些都是从外贸中获得的潜在的或间接的收益。

### **（三）自由贸易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劳动生产率低、技术落后、价格低、收入弹性小的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用这些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高、技术先进、价格高、收入弹性大的制造品进行贸易，贸易条件极为不利，若实行自由贸易，则发展中国家不仅会受剥削、掠夺，而且还会形成对发达国家的永久性依附，成为新的殖民地。因此，发展中国家不应提倡自由贸易，而应实行保护贸易。

### **（四）自由贸易会促使贸易条件继续恶化**

比较成本学说认为贸易双方的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不变，从而要素的收益不变。但事实上，发达国家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使制造品的收益不断递增；而发展中国家技术进步缓慢、劳动生产率提高不快甚至有可能下降，使农产品、初级产品的收益（尤其是边际收益）呈递减趋势。再加上发达国家对初级产品的收入弹性低，以及它们对初级产品替代品的开发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实行，使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的出口受到需求不足的限制。这样，不仅贸易条件对发展中国家不利，而且贸易条件还会继续恶化。

### **（五）自由贸易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出现外贸和国际收支逆差**

在经济发展中，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的外贸出口比重小、外贸增长率低，而且进口增长比出口增长快，对资本品、工业制成消费品的进口需求比对初级产品的出口需求增长快，这样，如果实行自由贸易，无疑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外贸逆差和国际收支不平衡，而这些问题又会影响经济发展的进程。

### (六) 比较成本学说所强调的个别 (individual) 比较利益不一定符合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比较利益

比较成本学说是以个别成本的计算为基础的,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成本有可能与个别成本不一致。例如,由于外在经济效益的出现,社会成本会超过个别成本。而当个别成本优势超过社会成本优势时,生产和出口有利于个别企业,但不一定有利于社会或不一定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这时,国家就有必要采取保护主义措施,重新安排投资和配置资源。如果按自由贸易、自由竞争的个别比较成本优势生产,会有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综上所述,比较成本学说或自由贸易理论不适宜于在发展中国家运用。但又有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对它作一些修正或改造,其部分内容仍可用于发展中国家,只是不宜全部照搬;还有少数学者认为,这一理论虽不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原则,但在国内各地区间的贸易中仍可使用。

## 三、对传统的对外贸易理论的一般性批评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在指出了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之后,还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提出了一般性批评。

第一,各国的生产要素在质量上和数量上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的,并可以在国际间流动。而且,当资本、技术、人才发生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倒流情况时,会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产生副作用。

第二,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并未因存在国际贸易而得到了充分使用,相反,资源闲置、浪费、失业增多是普遍现象。明特用“剩余的出路”理论批判了比较成本学说关于外贸可以使一国资源充分利用的假定,并提出了充分运用现有资源的途径。

第三,生产技术、消费者嗜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时刻变化的。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传播使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技术、生产方式也发生了相应变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的机器设备后,一边运用,一边学习、消化、改造,这种“边干边学”(learning by doing)的效应,使他们从实践中学到了技术知识,提高了生产技术水平,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至于消费者嗜好,由于发达国家通过广告等新闻媒介来影响消费者,尤其是他们高水准消费的“示范效应”的作用,会迅速改变发展中国家群众的消费偏好和习惯。显然,比较成本学说的这些假定是失实的。

第四,自由竞争是不可能实现的。在国内,某些拥有产品和成本优势或规模经济的厂商有可能形成垄断,操纵生产和市场;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利用其资本、技术优势,可以控制、支配发展中国家,某些跨国公司更是利用经济垄断来影响国际市场。因此,并无竞争的自由可言。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出口初级产品,需求完全受制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存在着很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更无力进行自由竞争。

第五,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不利于工业化的发展。按比较成本优势进行专业化生产,如果生产率不断提高,产品价格将下降,从而厂商的收益递减。收益递减不利于为工业化积累资本,也就不利于工业化发展。

第六，按比较成本进行的生产专业化不可能充分实现。在不平等的条件下，专业化对发展中国家的弊大于利。

## 第四节 发展中国家的新国际贸易理论

发展经济学自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新国际贸易理论的探讨。几十年来，经过几代人、几十位发展经济学家的努力，新的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形成雏型，产生了一个包括基本理论、发展战略、政策策略、手段与机制在内的较完整的体系。尽管这些理论还不很完善、系统、准确，有些对发展中国家也不尽适用，但毕竟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起到了一定的指导作用，对国际贸易格局和贸易条件发生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转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 一、贸易条件问题

1950年，普雷维什在他的一篇著名论文中，首次提出了“中心—外围”学说，并集中论述了“贸易条件恶化论”。同年5月，辛格（Singer, H.）在《美国经济评论》5月号上发表了《论投资国和借贷国之间的收益分配》一文，提出了与普雷维什大致相同的理论，因而“贸易条件恶化论”被合称为“普雷维什—辛格假说”（Prebisch-Singer Hypothesis）。关于普雷维什的思路，在本书第三章第一节中已作了初步介绍，在这里将对他的贸易条件恶化理论作进一步的陈述，并结合这一问题介绍其他学者的看法。

#### （一）技术进步与贸易条件

普雷维什抨击了传统的对外贸易理论，指出了所谓国际分工和专业化原则的非现实性，并认为它不利于、也不适用于欠发达国家。接着他认为，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由于技术进步的发展程度不一样，使各个国家在生产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等方面产生了差异。一些国家技术发展快，劳动生产率高，善于进行创新，以制造品的生产为主，从而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而另一些国家技术发展慢，劳动生产率低，以农产品和初级产品的生产为主，从而逐渐成为世界经济的“外围”。中心是技术创新者、经济利益获得者和发展的动力，外围则是中心的附庸、原料提供者和技术模仿者。中心向外围出售制造品，外围用农产品和初级产品同中心交换，这就形成了国际贸易的中心—外围格局。由于中心的技术水平高、生产率高、制造品的价格高、需求收入弹性也高，而外围的技术水平和生产率低、初级产品价格低、收益递减，因而在双方的贸易中，产生了技术进步成果分配的不平等，即欠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低，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高，欠发达国家的出口产品价格与进口产品价格之比（ $P_X/P_M$  即贸易条件）不利，从而使经济剩余（economic surplus）转向发达国家，产生中心剥削外围的现实。

普雷维什认为，贸易条件主要是由技术进步状况决定的，可以用要素收入与生产率的关系以及工业品与初级产品的价格比率来说明。一般说来，相对于农业而言，工业部门容易吸收新技术，因而技术水平高。工业技术进步会提高工业生产率，使工业的要素

收入增加，并使工业品价格较高（因为资本投入多）。而农业部门技术落后，劳动生产率低，农业投入要素的边际收益递减，并使农产品价格较低。这样，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就有利于工业品而不利农产品。另一方面，欠发达国家如果从发达国家引进新技术，会提高它的劳动生产率并增加其要素投入的收入，但是，由于欠发达国家人口压力过大、劳动力过剩，使要素收入的提高慢于生产率的提高。这样，技术进步的利益就会被人口所抵消，使欠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工资率、产品价格都低于发达国家。所以，贸易条件的恶化（也可以用农产品、初级产品对工业品的购买力来度量）就不可避免。

除此之外，普雷维什还用“贸易周期”（trade cycle）的变化来进一步说明贸易条件的决定。他指出，在贸易周期上升阶段，初级产品的价格比工业品的价格上涨快，但在贸易周期下降阶段，初级产品价格比工业品价格跌落快。相比而言，初级产品的价格上升的少、下跌得多，因而贸易条件不利。而且，当初级产品的价格缺乏弹性并且不得不用降低价格来出清（clearing）外贸市场（以低价多出口初级产品来平衡进口逆差）时，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就会恶化。

### （二）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与贸易条件

贸易条件除主要决定于技术进步外，还与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有关。根据恩格尔定律在国际贸易中的应用，随着一国收入的增长，总收入中分配给初级产品生产部门的部分将下降，分配给工业品生产部门的部分将上升。假如初级产品和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一致，那么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生产、供求和贸易将会趋于平衡。但事实上，各国对工业品的需求相对较大，对初级产品的需求相对较小，因而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大，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这样，资源就不能顺利地由初级产品生产部门转到工业品生产部门，如按既定资源进行生产，就会出现初级产品的供给过剩，从而价格下跌，而工业品的需求过度，从而价格上升的局面。再有，初级产品的生产是竞争性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只会引起价格下降，而工业品的生产相对是垄断性的，生产率的提高会引起价格上升。所以，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不利，也就是说欠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在不断恶化。

### （三）商品贸易条件和收入贸易条件

普雷维什和辛格在1950年提出贸易条件的概念之后，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的普遍重视，他们纷纷从理论上、统计材料上来论证和验证这一理论，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观点来进一步补充和发展它。1969年，威尔逊（Wilson, T.）、辛哈（Sinha, R.R.）和卡斯特里（Castree, J.R.）又提出了“收入贸易条件”（income terms of trade）的概念来补充普雷维什的理论<sup>①</sup>。他们指出，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及其与经济的关系时，应当区分两种贸易条件，一种是“商品贸易条件”（barter terms of trade），另一种是“收入贸易条件”。商品贸易条件就是普雷维什所说的贸易条件，它是商品的出口价格指数与进口价格指数（百分率）之比，即  $T_b = P_x/P_m$ 。商品贸易条件在应用于国

<sup>①</sup> 威尔逊，辛哈，卡斯特里。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收入贸易条件。经济学杂志，1969. 12

内贸易时，还可以指工业品与农产品、工业品与初级产品、农产品与劳务等产品之间的价格指数之比，如工业品价格指数与农产品价格指数之比，就是工农产品的贸易条件。所谓“收入贸易条件”，则是指出口产品价格指数与进口产品价格指数之比乘以出口量，即商品贸易条件与出口量的乘积： $T_i = (P_x/P_m) \times Q_x = T_b \cdot Q_x$ <sup>①</sup>。威尔逊等人认为，上述区分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商品贸易条件衡量的是出口对进口的单位（或平均）购买力，而收入贸易条件衡量的是出口对进口的总购买力；商品贸易条件是从绝对意义上反映一国的贸易地位，而收入贸易条件是从相对意义上反映一国的贸易地位；商品贸易条件决定收入贸易条件，但两者在数量上、意义上是有所不同的：商品贸易条件恶化，收入贸易条件可能随之恶化，也可能随之改善（如果出口量  $Q_x$  增大的话）。如果后者恶化了，对经济发展不利，如果后者改善了，则对经济发展有利。反之则反是。因此，相比而言，收入贸易条件更为重要，对于分析一国经济发展问题更为有用，尤其是当用人均收入指标来衡量经济发展的时候。比如，一国由于出口部门提高了生产率，使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于进口产品价格降低，从而刺激了出口的增加，进而刺激了出口产品的生产。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出口产品价格下降，商品贸易条件恶化了，但收入贸易条件却改善了，从而促进了经济增长和人均收入的提高。用数字来说明，若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均有所上升，但出口价格上升了 10% 而进口价格上升了 21%，那么商品的贸易条件就会恶化，即： $T_b = (100 + 10)\% / (100 + 21)\% = 1.10/1.21 = 0.91$ 。然而，收入贸易条件却保持不变，即： $T_i = (100 + 10)\% / (100 + 21)\% \times (100 + 10)\% = 1.10/1.21 \times 1.10 = 1.00$ 。表明出口对进口的总购买力未变。但由于出口量增加了，该国的经济得到了增长，人均收入提高了，而且，因为出口增加了，使该国的出口购买力（export purchasing power）提高，从而有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所以，一些学者认为，关键的问题不在于商品贸易条件恶化使谁受益、谁受损，而在于其影响是有利于还是不利于一国收入贸易条件的改善，因为后者对经济发展更重要。

一些学者根据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来说明这一观点。1981 年《世界发展报告》的资料表明，1970 年～1980 年间，石油进口国（如巴基斯坦、泰国、加纳、印度、秘鲁、孟加拉、扎伊尔、法国、美国、菲律宾等）的商品贸易条件下降了，但由于这些国家出口量大、出口增长率高，因而它们的出口购买力提高了。这表明，如果一个国家的出口在国际市场上所占比重较大，那么它的出口价格就决定于出口量，出口量的大小可以比例地决定收入贸易条件<sup>②</sup>。所以，一国的商品贸易条件恶化的同时，它的收入贸易条件和出口购买力却会提高。

但值得注意的是，实际情况并不像理论分析那样乐观。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应当以发达国家为参照系数来比较贸易条件及其对谁有利。威尔逊等人研究了 1957 年～1967 年的贸易条件变化情况后发现，这期间发达国家的收入贸易条件以年均 8.1% 的比率得到改善，而发展中国家收入贸易条件改善的年均比率只有 5.1%。同期，发达国家的出

①  $(P_x/P_m) \times Q_m$  又可代表进口能力。

② 纳夫齐格尔，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英文版，1984，428



口年增长率达到 7.2%，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年增长率只有 5.6%。再加上这期间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快于发达国家，因而无论是商品贸易条件或收入贸易条件，还是经济增长情况，都发生了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变化。不仅如此，有的学者还指出，自 1965 年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商品贸易条件还在恶化，出口增长仍然慢于发达国家，因而与发达国家在出口、贸易条件、经济增长、人均收入方面的差距还在继续扩大。

#### (四) 贸易条件与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增长

普雷维什是深入考察贸易条件的重要意义以及它对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和作用的第一位发展经济学家。他指出，贸易条件、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是一国进出口贸易增长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调节一国进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以两个国家、两种商品的贸易为例：假定发达的中心国家生产和出口需求收入弹性高、贸易条件有利的制造品，欠发达的外围国家生产和出口需求收入弹性低、贸易条件不利的初级产品。在贸易之前，假定中心与外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相等，均为 3%，即  $g_c = g_p$  ( $g_c$  代表中心的收入增长率， $g_p$  代表外围的收入增长率)，如果中心的制造品需求收入弹性 ( $e_m$ ) 为 1.3，外围的初级产品需求收入弹性 ( $e_p$ ) 为 0.8，那么，中心的出口增长率 (用  $x_c$  表示) 和进口增长率 (用  $m_c$  表示) 就是：

$$x_c = g_p \cdot e_m = 3\% \cdot 1.3 = 3.9\%$$

$$m_c = g_c \cdot e_p = 3\% \cdot 0.8 = 2.4\%$$

同理，外围的出口增长率 (用  $x_p$  表示) 和进口增长率 (用  $m_p$  表示) 为：

$$x_p = g_c \cdot e_p = 3\% \cdot 0.8 = 2.4\%$$

$$m_p = g_p \cdot e_m = 3\% \cdot 1.3 = 3.9\%$$

可见，即使两国的经济增长率一致，由于各自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或贸易条件不一致，两国的进、出口贸易增长率和进出口结构会产生差别：中心国家的出口增长快于进口增长，从而国际收支出现顺差，外围国家的出口增长慢于进口增长，从而外贸和国际收支出现逆差。

欠发达国家国际收支逆差的产生，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的影响，如引起贸易条件恶化、增加进口支付的困难，从而影响到国内经济增长。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普雷维什提出了几种选择性的调节机制：

第一，采取通货贬值政策来弥补国际收支逆差。通货贬值可以起到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的作用，使进出口结构得到调整，由此进一步缓解外贸逆差和国际收支平衡问题。但通货贬值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副作用，即：使本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如果贸易条件恶化的效应大于通货贬值的效应，那么出口就会变得更为不利，即出口越多，受益越小，外贸逆差越大，国际收支越不平衡。

第二，放慢经济增长率来平衡外贸和国际收支。国际收支不平衡主要是外贸逆差引起的，外贸逆差又主要是进出口贸易不平衡，即进口大于出口引起的。因此，要平衡国际收支，可以通过减少进口、平衡外贸来实现，但这又意味着要牺牲经济增长率，使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如上例中，外围国家要平衡国际收支，必须使进口增长率等于出口增

长率，即： $m_p = x_p$ ，因为进口增长率等于经济增长率乘以需求收入弹性，即： $m_p = g_p \cdot e_m$ ，所以：

$$g_p \cdot e_m = x_p \text{ 或 } g_p = \frac{x_p}{e_m} \quad (1)$$

当  $x_p = 2.4$ ， $e_m = 1.3$  时：

$$g_p = \frac{x_p}{e_m} = \frac{2.4}{1.3} = 1.846$$

这就是说，外围的国民收入增长率必须由原来的 3% 降低为 1.846%，才能促使进出口贸易实现平衡，从而解决国际收支逆差。但若如此，外围与中心在经济增长、收入水平方面的差距就会出现并逐渐拉大。不仅如此，如果考虑到人口因素，当外围的人口增长快于中心时，外围的人均收入会显得更低，在人均收入方面与中心的差距就会更大。

第三，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改善贸易条件，改变外贸结构。普雷维什认为，上述两种机制的消极影响都很大，不宜长期采用。要从根本上解决国际收支问题，必须由国家出面，采取保护主义措施，以改善贸易条件，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改变外贸结构。那么，保护主义措施怎样起到这些作用呢？我们仍以上例说明。我们知道，在进出口相等的条件下，外围国家的出口增长率  $x_p = g_c \times e_p$ ，经济增长率  $g_p = x_p / e_m$ ，将  $x_p$  代入得：

$$g_p = \frac{g_c \times e_p}{e_m}$$

两边同除以  $g_c$  得：

$$\frac{g_p}{g_c} = \frac{e_p}{e_m} \quad (2)$$

这个公式表明，外围与中心的经济增长率之比等于其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之比。因此，要平衡国际收支，根本的办法是利用保护主义措施来改善贸易条件，也就是改变进、出口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即提高出口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降低进口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使  $e_p / e_m$  之比的值变大。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必须改变外贸结构，增加出口（利用出口补贴、减免关税等措施），减少进口（利用进口关税等措施），使出口价格与进口价格的比率（贸易条件）增大；另一方面，还要加快出口产品生产部门的技术进步，努力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和收益。

普雷维什认为，改善贸易条件、改变进出口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关键在于调整外贸结构，减少进口，增加出口。而要做到减少进口和增加出口，必须降低进口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提高出口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这就要求外围国家必须降低对进口产品的需求，提高对出口产品的需求。他认为，降低对进口产品的需求的最有效、最重要的途径是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用国产的产品来取代原来需要进口的部分产品。同时，外围国家应联合起来采取国际行动，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以迫使中心国家提高对初级产品的需求。

普雷维什提出上述理论后，1962年，西尔斯（Seers, D.）又提出了“进口函数”（import function）模式来进一步说明外围国家如何克服国际收支不平衡并缩小与中心国家的经济增长差距<sup>①</sup>。他认为，中心与外围的进口函数分别是：

$$M_c = A + BY_c \quad (3)$$

$$M_p = a + bY_p \quad (4)$$

式中  $M_c$ 、 $M_p$  分别代表中心和外围的进口， $A$ 、 $a$  为常数， $B$ 、 $b$  分别是中心和外围的边际进口倾向， $Y_c$ 、 $Y_p$  分别为中心与外围的国民收入水平。

西尔斯认为，要克服国际收支逆差，必须使中心与外围的进口（函数）相等，即：

$$M_c = M_p \quad (5)$$

$$a + bY_p = A + BY_c \quad (6)$$

整理后得：

$$\frac{Y_p}{Y_c} = \frac{A - a}{bY_c} + \frac{B}{b} \quad (7)$$

加入时间因素，假定  $Y_c$  在  $t$  时期内按同一比率增长，则  $Y_c$  可以写成  $Y_{ct} = Y_{c0}e^{rt}$ ，其中  $r$  是收入增长率（不变比率）， $Y_{c0}$  是收入的基础水平（base level of income）。据此可以将上式写成：

$$\frac{Y_{pt}}{Y_{ct}} = \frac{A - a}{bY_{c0}e^{rt}} + \frac{B}{b} \quad (8)$$

引入时间和收入增长率因素后得：

$$\frac{d}{dt} \frac{Y_{pt}}{Y_{ct}} = \frac{-r(A - a)}{bY_{c0}e^{rt}} \quad (9)$$

该式表明，一国的外贸和国际收支状况取决于其进口函数，而进口函数又决定于进口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对中心国家来说，若对外围的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小于1，当  $A$  为常数项时， $(A - a) > 0$ ，那么中心的进口需求函数值就是正值，表明进口对中心有利；对外围来说，若对中心的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大于1，当  $A$  为常数项时，那么外围的进口需求函数就为负值，表明进口对外围不利。这样，中心的收入增长就会快于外围，从而拉大收入差距。若考虑到人口增长因素，人均收入差距会更大。

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西尔斯认为，可以采取资本输入或进口替代的办法。但他又认为，资本流入会产生债务负担，而进口替代的任务太艰巨，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改变外围的进口函数，使其进口函数变成中心国家的那样（如进口函数值为正），换言之，就是降低外围对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同时提高出口的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即提高中心国家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彻底改变外贸结构。

##### 5. 关于贸易条件问题的争论和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的现实

70年代，由于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发展经济学家对贸易条件问题的认识也

<sup>①</sup> 西尔斯，一个比较世界经济增长率的模式，经济学杂志，1962，3

发生了新的变化，并在“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是否恶化”问题上产生了争论。

第一，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绝对恶化。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虽然世界经济的格局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仍处于不利地位，突出表现在贸易条件不利并继续恶化。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仍以农产品和初级产品为主，这些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很低（小于1）。据测算：食品、农业原料、石油及其他燃料、制造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分别为0.6、0.5、2.4、1.9，即发达国家的国民收入每增加1%，对上述产品的进口（需求）分别增长0.6%、0.5%、2.4%和1.9%。这表明，当发达国家的收入增长后，它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初级产品的需求量增长缓慢，而世界各国则对制造品的需求量增长比较快。因此，在发展中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农产品、初级产品，发达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制造品的外贸格局中，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利，并日趋恶化，而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有利，贸易条件不断改善。这样，在世界贸易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是以不平等交换来进行贸易的。这种不平等交换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每年数百亿美元的损失，并使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依赖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愈来愈畸形，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增长、外贸出口、收入水平等方面的差距越来越大。不仅如此，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指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还在不可遏止地恶化（见表9.1）。

表 9.1 1960年~1979年各国进出口增长和贸易条件变化年均增长率比较（%）

分类	出口		进口		贸易条件 (1975 = 100)	
	1960年~ 1970年	1970年~ 1979年	1960年~ 1970年	1970年~ 1979年	1960年~ 1970年	1970年~ 1979年
低收入国家	5.0	-1.0	5.2	3.3	113	97
中等收入国家	5.4	4.3	5.6	5.0	100	98
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 <sup>①</sup>	8.4	5.9	9.8	4.5	100	98
资本剩余的石油 输出国 <sup>②</sup>	8.2	-2.0	10.8	18.0	26	118

资料来源：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

①工业化市场经济国家，又称市场经济工业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瑞士、芬兰、澳大利亚等国。

②资本剩余的石油输出国指伊拉克、沙特、利比亚、科威特。

从表9.1中可以看出，平均而言，1960年~1979年这20年间，发展中国家（石油输出国除外）的贸易条件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工业国）的贸易条件只下降了2个百分点，其中美、日等国贸易条件还有所上升。这期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年均增长约4.5%，发达国家的出口年均增长约7%~8%；同时，发展中国家

年均进口增长却达到了5%~7%，进口大于出口。而且，从1960年~1970年、1970年~1979年两个时期对比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率在下降，进口增长率在上升，而发达国家的出口虽有所减慢，但进口却大幅度减少。可见，世界贸易的发展存在着越来越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趋势。

第二，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相对改善。对上述观点，也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不赞同，认为6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虽有所下降，但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下降更多。纳夫齐格尔引用《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的资料说明了这一反对意见(见表9.2)。

表 9.2 一些分组国家的贸易条件

国家分组	年 份		
	1960年	1970年	1978年
低收入国家	100	102	100
中等收入国家	100	108	97
高收入国家	100	101	96
资本剩余的石油输出国	100	93	367

从表9.2中可以看出，除资本剩余的石油输出国因油价上涨，贸易条件大幅度提高外，大部分国家的贸易条件都有所下降，但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下降更多、更快。所以，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有所改善。

如果说60年代~7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相对有所改善的话，那么进入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却在日益绝对恶化。表9.3提供了这方面的数据。

表9.3说明：1973年~1980年，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价格上升了14%，高于发达国家10.4%的上升比率；同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改善了1.6%，而发达国家的贸易条件下降了3%。但在80年代的前6年，发展中国家出口价格连年下降，发达国家的出口价格虽也有所下降，但在1986年却上升了15.3%；同期，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呈连年下降趋势，1986年竟下降了4.3%，尤其是石油输出国，由于油价下跌，贸易条件在1986年下降了56.2%，而发达国家这一时期的贸易条件缓慢改善，在1986年竟提高了8.3%。

这一事实说明：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出口价格有升有降，但升大于降，贸易条件逐年改善；而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价格连年下降，尤其是金属、矿产品、燃料等初级产品出口价格降幅巨大，贸易条件日益恶化。所以，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仍处在有利地位，而发展中国家处在越来越不利的地位。

产生上述变化的原因主要是：近年来发达国家科技发展迅猛，生产率提高很快，产品更新周期缩短，初级产品的替代品开发和利用增多，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采取了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使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更加难以进入发达国家的市场；从发展中国家

来说，外贸出口中农产品、初级产品的出口仍然占绝大比重，农产品的初级产品与工业制成品相比出口价格仍然偏低甚至连年下降（尤其是燃料、矿产品等）。这种情况说明，出口产品结构不合理，出口价格低，贸易条件恶化，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乃至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表 9.3 1965 年 ~ 1986 年出口价格和贸易条件的变化（年平均百分比变化）

国家组别	1965 年 ~ 1973 年	1973 年 ~ 1980 年	1981 年	1982 年	1983 年	1984 年	1985 年	1986 年
出口价格变化								
发展中国家	6.4	14.0	0.5	-6.7	-2.4	-1.0	-3.1	-1.2
制成品	7.2	8.1	0.3	-3.3	-2.6	-1.3	0.7	19.3
食品	5.3	9.1	-8.1	-8.5	5.3	1.9	-9.5	8.2
非食品	4.5	10.3	-13.5	-8.6	5.5	-1.0	-14.5	0.7
金属和矿产品	2.5	4.7	-10.1	-10.4	2.1	-3.0	-5.5	-4.6
燃料	8.0	27.1	12.5	-9.7	-9.0	-2.5	-3.0	-49.4
高收入石油输出国	7.6	26.9	12.0	-9.2	-8.8	-3.1	-3.1	-49.5
市场经济工业国	4.8	10.4	-4.9	-3.4	-3.0	-3.1	-1.6	15.3
制成品	4.6	10.8	-5.7	-1.5	-4.1	-3.3	-0.3	19.3
贸易条件变化								
发展中国家	0.7	1.6	-0.9	-1.8	0.0	0.7	-0.8	-4.3
中等收入国家	0.6	2.5	-0.8	-2.0	-0.1	0.6	-1.0	-5.0
高收入石油出口国	0.3	13.4	19.5	-5.4	-6.6	1.3	-1.3	-56.2
市场经济工业国	-1.0	-3.0	-1.8	3.0	0.1	0.3	1.0	8.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7 年世界发展报告，176

## 二、贸易保护问题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认为，自由贸易的理论和政策，不切合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相反，为了顺利地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工业化，必须实行贸易保护。实行贸易保护的原因或必要性主要是：①保护幼年工业的发展，使这些新生的工业在生产成本最小化的条件下逐步成熟，形成适度的生产规模。②发展进口替代工业，通过保护主义措施（如减免原材料、资本品的进口税）来减少制成品的进口，增加进口替代工业需要的资本品和原材料等的进口。③在社会生产成本低于个别生产成本时，通过保护措施形成外部经济。④调整国内劳动市场的价格，使劳动的社会成本低于个别成本。⑤调整国内产品价格与国际产品价格的扭曲。贸易保护的主要目标是改善贸易条件和平衡国际收支。

贸易保护理论的内容十分广泛，主要有保护幼年工业理论、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理论、次优 (second best) 理论、关税结构 (tariff structure) 理论等。

### (一) 保护幼年工业理论

幼年工业是指年轻的发展中国家新建立起来的工业生产部门，其目标是为了发展民族工业，为实现工业化打基础，以减少对外国的依赖。由于是新建工业，幼年工业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上都很脆弱，因而需要采取特殊措施加以保护。保护措施的作用是要增加幼年工业的规模收益、增加外部经济效益、增加技术引进等。保护措施的手段主要有：利用关税收入补贴幼年工业，补偿其损失，以增强其获利能力；政府利用出口收入或引进外资支持幼年工业的发展，帮助它形成规模经济，并获得外部经济效益；从国外引进先进技术，提高幼年工业的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使其降低生产成本；以及政府在信贷、税收、原料供给、产品销售等方面的特殊优惠等。

幼年工业的成长并成熟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建立起初步的工业基础，自己生产出本国需要的消费品，也有助于扩大幼年工业的出口创汇，促进外贸增长和经济发展。因此，许多国家都采取保护措施来发展幼年工业。

### (二) 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理论

为了减少进口、平衡国际收支、改善贸易条件、促进工业化，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实行了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过程中，国家也必须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一方面，利用关税、进口配额等限制有关的消费品、制造品的进口；另一方面，利用减、免税等增加进口替代工业必需的资本品、原材料的进口；同时，还应实行一些优惠的收入、产品定价等政策，来扶植进口替代工业的健康发展。

### (三) 次优理论

贸易保护的目标主要是改善贸易条件和平衡国际收支。一般说来，贸易条件的改善可以通过通货贬值、限制进口或出口、提高出口价格等手段来实现，而国际收支的平衡可以通过浮动汇率、增加出口或限制出口等手段来实现。但是，这两个目标有时是不能兼而达到的，上述调节机制也存在着作用和效应上的矛盾。比如，要平衡国际收支，可以利用通货贬值，但通货贬值却使出口价格降低，导致贸易条件恶化。此外，有些贸易保护措施可以在达到既定目标的同时使一国的外贸和生产发展更经济，而有些措施却会在达到既定目标的同时使生产和外贸的发展变得不经济，这就产生了矛盾。例如，利用提高国内产品价格来改善贸易条件，可以解决国内产品价格与国际产品价格的扭曲，但却减弱了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从而使出口减少，使经济活动变得不经济。所以，任何贸易保护机制都不能产生十全十美的效应，都不能使经济活动的各方面都达到“最优” (first best)，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应当强求最优，而应当寻求次优，即不是最好，也不是最差的情况。

次优理论的中心是寻求最有效的保护手段，可以用保护关税和出口补贴两种机制的作用和后果来说明。例如，为了消除国内价格与国际价格的扭曲，可以采取关税或补贴两种手段，两种手段的效应比较由图 9.2 说明。

图中  $SS$  为生产的社会成本曲线， $S'S'$  为个别成本曲线， $DD$  为需求曲线，国际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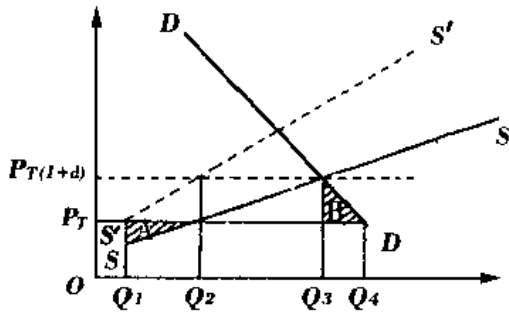


图 9.2 关税和补贴的效应 (A)

且，消费者剩余的损失大于替代进口的实际收益，使该国的总福利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关税与补贴的效应都是减少了进口、消除了价格扭曲，但却导致了总福利减少的“不经济”后果。一方面达到了预定目标，一方面又产生了不良后果，这就不是最优选择，而是次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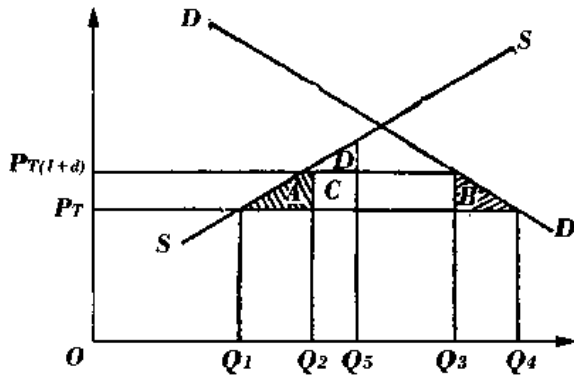


图 9.3 关税和补贴的效应 (B)

但是，如果贸易保护的目的是减少进口或增强自力更生能力，那么关税的代价就最小，而补贴则较为不利。原因在于关税能同时起到限制进口消费品和增加国内生产的双重作用，这比补贴仅能增加国内产出的单一作用更为有效。如图 9.3 中，征收关税  $d\%$  使进口减少到  $Q_2Q_3$ ，使国内生产在  $(A+B)$  成本的水平上扩大到  $OQ_2$ 。然而，若使用补贴政策，为了扩大国内产出，必须用  $d\%$  以上的补贴才能引致增加的  $Q_2Q_5$  产出量，而这需要  $(C+D)$  面积的追加成本。由于  $C > B$ ，即通过补贴扩大生产的成本大于通过关税扩大生产产生的福利损失，也就是说补贴政策的成本大于关税政策的成本，因而，在这种情况下，关税优于补贴。

上述分析说明，在寻求次优中，选择正确的贸易保护手段是至关重要的。若手段正确，会产生预期效果；若手段不当，则会产生不良后果。

有些学者还评价了关税与补贴机制的特点和实质，认为关税是一种“内向型”政策，即保护国内生产的发展；而补贴是一种“外向型”政策，它刺激出口生产的发展。



因此，发展中国家在运用这些机制时，应特别注意其特点，权衡利弊，根据自己的发展目标和要求来采用正确的保护手段。从上述关税与补贴的性质与特点的分析中，还引出了“内向发展战略”（进口替代）和“外向发展战略”（出口替代）的争论。

#### （四）关税结构理论

关税是最重要的贸易保护措施之一，它不仅能够增加政府的国库收入，而且能够起到限制非必需品进口、保护幼年工业、扶植进口替代工业、改善贸易条件、平衡国际收支等作用。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采用关税政策实行贸易保护。但是，应当对哪些商品征税，对哪些商品减税，关税税率是提高呢、还是降低，税率应定在多少才适宜？这些问题要解决，必须首先弄清关税的性质、作用、征税量、后果等问题。关税结构理论就是说明这些问题的一种理论。

关税结构理论主要是利用数量分析来说明关税的结构、作用、区分不同的税率、确定应征的适度税率并预测其作用的后果，而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提出适当的衡量关税实际保护效果的数量指标。

为了准确地衡量关税的保护效果，科登（Corden, W.M.）等经济学家们将关税税率分为两种：一种是“名义保护率”（nominal rate of protection），一种是“有效保护率”（effective rate of protection）<sup>①</sup>，名义保护率就是对进口商品征收的从价关税税率，表示征收关税后进口商品价格提高部分与征收关税前进口商品价格之比的百分率。设  $P$  代表某进口商品的税前价格， $P'$  为该商品的税后价格， $np$  为名义保护率，可得下述计算公式：

$$np = \frac{P' - P}{P} = \frac{P'}{P} - 1 \quad (10)$$

例如，一商品的进口到岸价格为 100 元，关税率为 10%，则税后商品价格为 110 元，那么名义保护率为：

$$np = \frac{P' - P}{P} = \frac{110 - 100}{100} = 10\%$$

从贸易保护的角度看，关税的作用是为了减少某种商品的进口，保护国内同种商品的生产。一般说来，关税税率越高，名义保护率越高，对国内同种商品生产行业的保护程度就越大。但是，名义保护率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被保护的商品生产者在不影响商品的竞争力和失去市场的情况下经济效率的好坏和成本的大小，即不能反映国内生产的商品价值增值的大小，而且，关税还会影响国内商品生产部门中提供增加值（value added）的各种生产要素的收入。比如，国内生产某种商品时需要进口某些原料，对这些原料征收关税，提高了其价格，从而使商品的投入成本加大，增加值减少或投入要素的收益减少。这表明，名义保护率标准存在着缺陷。为此，有必要提出有效保护率的标准。有效保护率反映的是商品的产出价值与投入价值的差额，它不仅可以较准确地衡量商品的受保护程度，而且可以衡量关税对投入要素价值与收益的影响。

有效保护率是用国内商品的增加值超过（按国际价格计算的）进口商品的增加价

<sup>①</sup> 科登，关税体系结构和有效保护率，政治经济学杂志，1966，6

值的余额的百分比来衡量的，其计算公式为：

$$ep = \frac{V' - V}{V} = \frac{V'}{V} - 1 \quad (11)$$

$ep$  代表有效保护率， $V'$  是关税保护下国内商品的增加价值（可以用国内商品价值减去生产成本和进口原料的关税额求得）， $V$  是按国际市场价格计算的进口商品的增加价值（可以用进口商品的国际价格减去其生产成本求得）。

有效保护率还可以用另一公式求得，即用名义保护率除以税前商品的增加价值在价格中的比率求得（ $P_x$  代表税前的  $X$  商品价格）：

$$ep = np \div \frac{V}{P_x} \quad (12)$$

例如，一商品的国际市场价格为 100 元，生产成本为 60 元，增加价值为 40 元。如果国内生产的同类商品的价格也是 100 元，成本也是 60 元，增加价值也是 40 元，这时，如对进口商品征收 20% 的关税，进口商品价格提高为 120 元。为了保护国内同类商品的生产，也将国产商品的价格提高到 120 元。从而使国产商品的增加价值提高为 80 元（60 + 20）。在这种情况下，对国产商品的名义保护率为 20%，而有效保护率却达到 33% [（80 - 60）÷ 60 = 20 ÷ 60 = 0.33]。可见，在同一关税税率下，由于商品的增加价值不同，名义保护率与有效保护率会出现很大差别，有时，后者会几倍、几十倍于前者。而有效保护率越大，保护程度越高，反映出商品的增加价值越多。

如果不仅是对进口的最终产品征税，还对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征税，那么有效保护率会受到影响。如上例中，如果国产商品的生产需要进口原材料，国家实行差别税率（difference rate of tariff），如对进口的最终产品征收 20% 关税，对进口的原材料征收 10% 关税，那么，国产商品的成本将提高到 66 元 [60 元 + （60 × 10%） = 66 元]。若仍按 120 元价格出售，则其增加价值实际为 74 元（80 - 6 = 74 元）。这样，国产商品的实际有效保护率为 23%  $\left( = \frac{74 - 60}{60} \right)$ 。可见，若其他条件不变，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征收的关税越高，国产商品的生产成本提高越多，其增加价值就越少，该商品生产受保护的程度就越低。反之，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征收的关税越低，国产商品的成本提高越少，增加价值就较大，受保护程度就越高。

将上述情况综合起来看，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国家要保护其国内某种商品的生产，对进口的最终产品的关税越高越有利，对进口的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关税越低越有利。正因为如此，发达国家才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征收较低的关税，对进口的最终产品征收较高关税，从表面上看名义保护率低，但实则是有效保护率很高。

有效保护率是衡量关税对本国的商品生产行业保护程度的一个较恰当的尺度，它能准确地显示采取关税限制进口（包括最终产品进口和原材料、中间产品的进口）的政策对国内有关行业发生的净效应（net effects），同时，可以反映该行业的增加价值变化，从而反映其投入—产出的变化情况以及经济效益如何。因此，有效保护率对发展中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一，发达国家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初级产品征收的关税名义保护率低但有效保护率很高，这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很不利。比如，发达国家对进口的椰干免税，而对进口的椰油征收 10% 关税，假定椰干加工为椰油的生产过程中增加价值在椰油总价值中所占的比率为 5%，则椰油加工生产的实际保护率达到 200%。这样，就很不利于发展中国家椰油的加工工业的发展，只会刺激发展中国家多生产和出口椰干，导致经济结构畸形化，阻碍工业化的进程。据世界银行统计，“东京回合”之后，世界贸易中原材料的有效保护率仅为 2%，而加工品和制造品的有效保护率则高达 15%~20%<sup>①</sup>。这种情况应引起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并应采取措施来改变出口和国内经济结构，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有效保护率。

第二，提醒发展中国家注意调整关税结构。许多发展中国家实行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因而关税保护的重点放在国内最终消费品的生产上，对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保护程度较低。人们希望通过保护和扶持进口替代的最终消费品的生产，来扩大生产规模，获得外在经济效益，并通过其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来带动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生产，以全面实现工业化。但实际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主要原因是：对最终消费品的高保护率和对资本品、中间产品等的低保护率，会促使资源从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生产部门流向最终消费品生产部门，而最终消费品（进口替代工业）的生产主要靠进口资本品和中间产品来维持，因而它的前向联系很大（即国内需求很大）而后向联系则很小甚至没有。这样，进口替代工业就会因过分依赖投入的进口而产生外汇短缺、生产效率低下、保护程度过高使产品缺乏竞争力等问题而不能取得成功，更有甚者，它还会影响国内的资本品、中间产品的生产部门的发展，从而使逐步实现全面工业化的发展计划失败。为此，发展中国家应当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及时地、适当地调整关税结构，避免上述不良后果的产生。

### 三、“剩余的出路”理论

在经济发展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采用了外向型的发展战略，以扩大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但是，古典的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在存在国际贸易的情况下，贸易国的现有资源都已得到充分利用，因而不可能再增加出口量；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应按比较成本的原则实行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一国的什么资源丰富或什么产品的成本上有优势，就应生产什么，而不应随意变更生产的种类和专业化。但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却与这种理论相悖：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的失业和剩余资源，资源并未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对发展中国家并不利，因而固守专业化会影响经济增长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主要根据国际市场的需求（而不是国内资源的供给优势或比较成本）来安排出口产品的生产，打破国际分工和专业化的限制，利用自己的剩余资源来发展出口部门，从而扩大本国的产出和总福利，实

<sup>①</sup> 世界银行，1981年世界发展报告，22~34

现迅速的经济增长。上述思想由明特用“剩余的出路”理论作了详细阐述<sup>①</sup>。我们用图 9.4 来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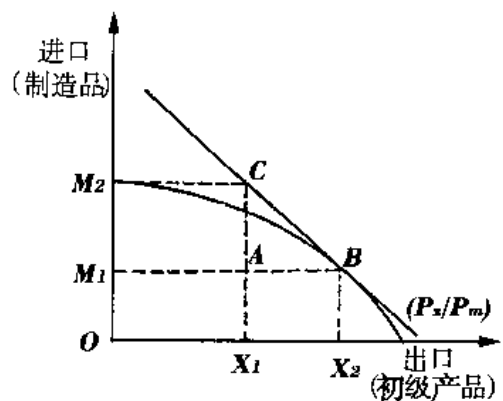


图 9.4 剩余的出路

图 9.4 中曲线代表某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缘曲线，直线表示贸易条件。在未产生贸易之前，生产配合点为 A，此时，该国生产  $OX_1$  初级产品和  $OM_1$  制造品，并按 A 点水平消费这两种产品。A 点的位置在生产可能性边缘曲线之下，表明资源未充分利用，并存在就业不足。这时，如果开展对外贸易，在既定的贸易条件下，将初级产品的产量由  $OX_1$  扩大到  $OX_2$ ，再以  $X_1X_2$  的剩余产品（即 AB）出口国外，换回  $M_1M_2$ （= AC）量的制造品，使制造品的消费水平由  $OM_1$  提高到  $OM_2$ ，从而扩大生产能力。这样，该国的生产水平就会

由 A 点扩大到生产可能性边缘曲线的 B 点，这不仅使其产出水平大大提高，而且使剩余的資源找到了出路，得到了充分利用，并增加了就业，提高了收入水平。

明特据此认为，“剩余的出路”理论比比较成本学说更能令人信服地解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出口生产的迅速发展。第一，外贸的扩大是因为有大量的剩余资源存在。如果没有剩余资源，外贸就不可能产生并扩大。第二，比较成本学说不能解释两个国家条件相近时为什么、什么时候一国发展一个主要的出口部门，而另一国则不发展这个出口部门。“剩余的出路”理论则可以用资源的优势、人口压力等原因来说明这一点（如 A 国劳动力富足，就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工业）。第三，“剩余的出路”理论能较为可信地说明一国在没有剩余产品、但存在剩余资源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发生的原因，而比较成本学说无法说明，当一个小规模的农业没有剩余产品，并处在高消费可能性线上时，怎样才能通过“专业化”来促使其发展外贸<sup>②</sup>。对于这些观点，瑟尔沃尔评论说：其实，“剩余的出路”理论说明的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原始基础，而比较成本学说说明的是国际贸易的形式（type），二者都可以解释国际贸易问题，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sup>③</sup>。

## 第五节 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发展战略和策略

一国贸易战略通常可以循着两个极端来定义，一极是内向型，或进口替代；另一极是外向型，或出口促进。两者的经济发展效应如何，各有何优劣之处？本节将比较分析这些问题。

① 明特. 经济落后的一种解释. 牛津经济论文汇, 1954. 6

② 明特. 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和不发达国家. 经济学杂志, 1958. 6

③ 瑟尔沃尔. 增长与发展. 英文版. 1984. 341

## 一、进口替代战略

进口替代战略是在 50 年代 ~ 60 年代提出并风行于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外贸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提出和迅速实施是基于以下考虑：削减进口，减少对国外的经济依附；节约外汇，平衡国际收支；发展本国幼稚产业，实现工业化；发展制造品的生产与出口；增加工业部门劳动就业，改变二元经济结构；等等。可见，该战略的立足点，一是为了消除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障碍，二是为了消除贸易条件不利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为实现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这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许多发展中国家寻求经济独立和平等发展的目标，也是迅速摆脱贫穷落后面貌的一条捷径。从内容和形式上看，这种发展战略还具有简单易行的特点。因此，当时，一些拉美国家，如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等率先实施了进口替代战略。随即，南亚及中、东欧一些国家也开始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到 60 年代，进口替代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发展战略。

从理论上讲，进口替代战略的提出也是经历了长期酝酿的，其依据主要是以下几个理论模式。其一，刘易斯无限劳动供给增长模式。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农村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弹性，而要想城市工业吸纳这些剩余劳动，只有通过政府计划和保护主义干预，促进城市民族工业的发展，替代以前需要进口的产品。其二，赫尔希曼 (Hirschman, A.) 连带效应产业发展模式。他认为各项产业之间具有前向或后向的连带效应，如果采用保护主义措施，在制造品和中间品产业实现进口替代，那么就可以带动其他一系列下游产业的发展。其三，普雷维什、辛格的“中心—外围”模式。他们分别通过实证考察，得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观点，这表明，如果实行自由贸易，发展中国家只会越来越丧失贸易所应带来的收益，并在经济上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为此政府必须采取措施实现进口替代，建立本国工业体系。

进口替代一般需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通过高关税与限制或甚至是排斥进口品竞争的措施，先建立和发展一批最终消费品工业以替代进口品。这个阶段主要替代服装、鞋、家电以及投入品，如纺织纤维、皮革和木材等，原因是这些商品适合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初期的条件，比如它们是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其产出的效益规模相对较小，生产不需使用复杂的技术与零部件供给网等。同时，由于这些商品的国内生产带来了劳动力培训、企业家精神培养与技术扩散等外部经济，这个阶段也为幼稚产业发展提供了适当的保护。但是一般地，这种高保护政策通过对出口活动明显或暗含的税收抑制了出口发展。第二阶段，当最终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工业发展到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时，进口替代就应升级换代，由最终消费品生产转向国内需要的资本品、中间品的生产。这些产业多为高资本密集型的，它们遵从规模经济，而有效的企业规模通常大于发展中国家的国内需求，其经营边际相对较小，且组织与技术的非效益还会加剧高成本。因此发展这些产业以满足狭窄的国内市场需求必定要求高保护主义，并且随着从事于越来越缺乏比较优势的产业，保护率也要求提高；反过来，高保护一般不利于制造品和初级品出口。

发展进口替代工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如国家出资建厂，引进外资建厂，国家与外资、私人企业与外资合作办厂，利用外援和外资办企业，建立经济特区等。进口替代战略中通常包括的保护措施有：一是实行关税保护，即对最终消费品的进口征收高关税，对国内生产必需的资本品、中间品的进口征收低关税或减免关税，以降低进口替代产品的生产成本；二是实行进口配额，以限制非必需品进口，增加必需品进口，并通过限制国内对进口商品的非生产性消费，防止“示范效应”导致消费早熟，为工业积累资本；三是实行外汇升值，以减轻生产投入品进口造成的外汇压力；四是国家在资本、劳动力、技术、价格、收益等方面给予特殊优惠，保护进口替代工业不被国外产品和国内其他行业的竞争排挤。其中前三项为外部保护政策，第四项为内部保护政策。

尽管各国进口替代战略的具体措施不尽相同，但基本特征大体一致。其一，“幼稚产业论”原义是要求在这些产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之前进行暂时的保护，可是许多实行该战略的国家却把保护变成了长期的，如拉美一些经济学家所说，它们采取的是“不惜代价的保护”。其二，在不同产业间，明的或暗的保护率差别很大，随着进口替代的推行，节省每单位外汇的国内生产成本不断上升，并且由于缺乏产业间联系，有效保护率也趋于提高。其三，实行进口替代战略的国家形成了广泛的卖方市场，因此有可能导致提高生产率和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刺激不足。其四，该战略趋于使厂商行为短期化，因为它注重短期目标且伴随着非确定的实际汇率波动。其五，该战略趋于产生利率扭曲，负实际利率挫伤了国内储蓄，引起偏向于进口替代投资的信贷配给。最后，该战略趋于低估公用事业，因为这些资本密集型活动中利率很低。

进口替代战略以其特殊的形式、诱人的目标曾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巨大的吸引力，也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实践中产生了较大推动作用。但是，正如上述进口替代战略的特征已经暗含的，它内在地存在不少缺陷，以下一些问题尤其引起人们的关注与批评。

第一，造成外汇短缺，使经济发展陷于外汇约束之下。随着进口替代的推行，初级品出口的增长减缓和制造品出口欠佳，难以提供发展所需的外汇，这种状况在进口原料、机器和技术诀窍等增加，以致净进口储蓄增加时，就更趋恶化。这样，进口替代规模越大，外汇短缺问题越严重，国际收支状况越恶化，同时进口量与外债的增多强化了对国外的依赖。结果，经济发展日益处于外汇约束下，一旦经济扩张超出外汇收益的许可，就会触发外汇储备危机。从这个角度上讲，进口替代战略与其说是减少进口和替代进口品，不如说是由进口最终消费品转向进口资本品、半成品。

第二，国内金融压制下的储蓄缺口约束了进口替代产业以至整个经济的发展。国内负实际利率造成储蓄不足、存货积累和资本外逃，随着进入第二阶段进口替代，高成本资本密集型生产提高了资本—产出比，储蓄约束越来越成为发展的掣肘，要想维持原有的经济增长率，只能不断提高储蓄率。同时，由于保护的高成本带来收入损失，可获得的储蓄量减少，更不用说资本外逃加剧了国内储蓄的短缺。

第三，高保护成本造成低经济效率。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保护成本估计达 GNP 的 6%~7%，同时第二阶段进口替代中的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明显低于发达

国家。这是因为进口替代保护措施下的产业或企业创新意识不强，经营管理水平低，产品价格高，在国际市场上不具有竞争力，为了维持其生产，必须继续实行保护，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第四，进口替代产业的经济带动作用不大。从供给方面看，进口替代工业多为最终消费品工业，在国内没有或很少有后向联系；从需求方面看，这些替代产品的高价格还造成国内市场需求萎缩，从而产业联系效应更趋微弱。因此，进口替代工业往往起不到带动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作用。

第五，不利于发挥国内资源优势。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劳动力充裕而资本缺乏，因此应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采用适宜技术，以缓和就业压力，发挥本国优势。但是进口替代产业大多从国外进口节省劳动型的机器、设备与技术，因此生产中资本密集程度不断提高，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在其比较劣势的产业中从事生产。这样既不利于扩大就业机会，尤其是难以缓解大量农村剩余劳动的吸收问题，也不利于节约资本，造成国内储蓄缺口越拉越大。

第六，造成利润使用不当，加剧收入分配不均。一方面，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往往为引进外资和国外技术提供许多优惠条件，结果外商从中大量获利，并且利润不是继续投资于东道国，而是大量汇往国外；另一方面，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使国内收入分配集中于城市和少数工业部门，会引起城乡、工农、部门之间劳动力收入更加不均，非但未消除，反面还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固有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此外，由于进口增多，外国商品和高消费的示范效应还会造成国内消费早熟，进一步提高了进口倾向，降低了国内储蓄和资本形成的能力。

第七，阻碍外贸出口，使经济越来越内向化。进口替代采取的某些保护主义措施不利于出口发展，如外汇高估，虽有利于投入品进口，却因本币与外币比价过高，降低了本国产品的竞争能力，从而阻碍了许多传统的初级产品的出口。这样必然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失衡，外汇缺口和储蓄缺口扩大，经济发展日益封闭和内向化。

关于进口替代战略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60年代已在拉美国家引起注意，里特尔（Little, I.）、西托夫斯基（Scitovsky, T.）和斯科特（Scott, M.）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和贸易》，巴拉萨在《工业发展过程和可供选择的发展战略》中，都作了论述，并依据一些国家的实例进行了验证。他们认为，尽管进口替代并非完美无缺，但只要注意节约外汇并尽可能地多利用国内资源和人力，这一战略还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的。正如巴拉萨所说，进口替代工业化是否行之有效，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和国产投入在整个投入中所占比重的大小。

## 二、出口促进战略

随着进口替代战略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缺陷或问题，自60年代后期始，亚洲“四小龙”以及一些拉美国家逐渐开始转向出口替代的外向型发展战略。理论界对新的贸易战略的探索也蔚然兴起。“出口替代”最初是拉尼斯（Ranis, G.）1973年在《工业部门

的劳动吸收》<sup>①</sup>中提出的，意思是以劳动密集型的制造品出口来代替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与初级品出口。此后许多经济学家主张对制造品的生产和出口予以政策支持，准确地讲是实行“出口促进”。

发展出口促进工业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利用本国自然条件优越或劳动力便宜等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的技术先进的产品，通过扩大出口带动整个经济增长；出口的扩大有助于增加就业机会，提高人均收入，促进工业基础的强化和工业化进程；出口的扩大有助于提高本国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使产业结构高级化；由于出口促进的多为加工业和制造品工业，因此出口扩大有利于改善贸易条件，实现国际收支平衡。就目标而言，出口促进战略的实施是为了实现全面工业化和迅速增长经济，并克服进口替代工业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出口促进战略一般也要经历两个发展阶段。在初级阶段，主要以发展加工业、一般消费品为主，如食品、服装、鞋帽、纺织品、洗衣机、电视机等家电以及本材加工品等。这些产品的生产方法相对简单，技术易于掌握，投入要素相对充裕，并且出口市场较大，产品的国外需求弹性较大，因而容易起步发展，风险也较小。这些出口促进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是当其中某些产品的市场容量日趋饱和或生产与外贸条件已变得不利时，就应当转向以机器设备、机床、电子仪器、机械工具、高技术产品生产为主的出口促进工业阶段了。

出口促进工业的发展一般可采用外商独资、合资、侨资办厂，补偿贸易，来料或来样加工，出口加工特区，在国外办企业（跨国公司），劳务出口（如建筑业）等多种形式。从类型上看，该战略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出口促进与国内生产并举，即在大力鼓励出口的同时，发展与出口替代相关的工业，以形成规模经济并满足国内市场的需要，其中以巴西、墨西哥等为代表；另一种是坚持出口扩张，即一切以扩大出口为主，如日本、亚洲“四小龙”等。至于具体应采用哪种类型（即前述世界银行划分的“适度型”还是“强烈型”），则要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决定，并主要以国家大小、资源丰富、生产与技术条件、人力资源状况、地理位置等为依据。比如，日本、韩国等地域较小且资源贫乏，因而宜于强烈的出口扩张；而巴西、墨西哥等幅员广阔的国家，就不能不在扩张出口的同时，也注重本国资源和本国市场的潜力，在出口产品的选择上，也突出本国相对比较优势。

发展出口促进工业也需要一定的贸易保护、政府补贴和适当的汇率等政策调节。出口替代工业一般需从国外进口必需的原料、中间品或资本品以及技术专利等，因此要求对这些投入的进口实行减免税，放宽进口配额。为了保持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通常还应在价格、关税、利润、留汇等方面给予优惠。所以，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提出，出口促进工业的有效保护率应高于或等于进口替代工业的有效保护率，而两类产业的利润率应大体一致。同时，由于出口促进工业往往在起步时生产规模小、风险大、竞争力不强，所以采取补贴政策并辅之以适当的降低利率、增加留利水平、采用现金支付等措施，有利

<sup>①</sup> 经济发展与文化变迁，第21卷，1973



于出口促进工业的顺利成长和成熟。此外，发展中国家通常还实行货币贬值，从而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有价格竞争力，这对于扩大出口起到了很大作用。

为什么出口促进战略比进口替代战略更能带动经济发展呢？从理论上探究，其原因可以从三个前提加以认识。第一，通过出口促进，技术经济要素蕴含着更有利于出口的优势，这些要素包括诸如最小企业规模、收益递增、生产过程的不可分性和竞争的必要性等。据此，如果不能把握贸易机会利用好这些要素，就会大大挫伤增长率。第二，增长率的差异不是源于贸易战略的选择本身，而是源于各项具体贸易政策的实施。第三，遵循出口促进战略所选择的政策往往比进口替代战略更接近最优目标。以上第一、二个前提都与发展中国家中非农业部门为“幼稚产业”，需要某种增长刺激的观点是一致的。第三个前提则正好持相反观点，认为市场会运行良好，只要没有政府的不当干预，就能提供令人满意的生长。下面对这几个前提逐个展开讨论。

第一个前提实质上断言贸易收益（尤其是对于发展中国家）十分可观，以至于与进口替代相关的损失很大，不利于要素积累。从负而看，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狭小，若要替代进口，就难免导致建成大量规模不经济的企业，并形成垄断或寡头控制的市场结构。随着进口替代的推进，生产活动日趋资本密集型，由于规模过小造成的非效益也日益严重。从正面看，出口促进使企业家能够超越国内市场的约束，确定规模经济的企业组织，并且通过国内、国际双重竞争的压力，可以有效地限制垄断。

在允许盈利的经济活动迅速扩张方面，出口促进也更为有效，因为它突破了进口替代下那种有效与无效的企业或部门均以同等速度扩张的不合理状况。据此，潜在出口品包括大量工业品，在选择应当快速发展的“正确产业”时，十分重要的是正确的企业家和正确的专业化产品。一般地，要素比例和比较优势可能导致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更为盈利，但更根本的却是，工业品千差万别，即使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真正以出口为导向的企业应当具有更好的管理和更有效地运用生产要素的能力。

还有一个与技术有关的出口促进战略的优势是要素比例。在发达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资本—劳动比极不相同的情况下，贸易机会代表一种更快地向外转移劳动需求的手段。假设在现行工资和利润水平下，资本—劳动比在出口部门为2:1，而在进口替代部门为6:1，那么，尽管资本积累率是城市部门就业扩张的重要约束，追加资本分配给相对劳动密集的出口活动就会比分配给进口替代活动多吸收3倍的劳动力。

第二个前提集中讨论进口替代实际运作的成本，结果是用于实现进口替代的各种手段可能适得其反。据此，进口替代的失败正是由于鼓励国内生产的特殊措施用之失度。例如，极端币值高估与数额限制几乎形成禁止进口的关税保护；国内企业同分配进口许可证阻碍竞争，使得企业不是从最优经济决策而是从寻租活动中获利等。这些政策的成本之一是出口收益难以迅速增长，“外汇瓶颈”又给经济结构与增长带来直接或间接影响。特别是，进口替代战略不是指向有利于出口的经济活动，而是越来越依靠不经济的方式进行“外汇储蓄”，这进一步加深了经济体系的扭曲，并使得进口替代目标得不到实现。然而出口促进战略正好相反，它通过适当的保护与激励措施促进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的扩张和发展，并有利于经济结构调整。

第三个前提否认需求偏向于出口，并且暗示着在无干预条件下的增长会是最优的，或者说，出口促进之所以比进口替代发展更快，是因为其政策扭曲较小。据此，出口导向战略限制了政策制定者的决策，并使之在相对较短时间内得到反馈，避免政策失误。首先，限制了政策的明显偏好，因为如果过于偏向于出口，则要么由出口补贴造成预算失衡，要么由通货大幅度贬值导致大量储蓄能力被经常账户盈余所吸收。其次，促使政府建立相当自由和高效的贸易体系，因为要想使出口品具有国际竞争力，就不能对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采取许可证或数量限制等保护措施，较为自由的贸易体系防止了拖延、推委、官僚管制和其他成本，并适当地放松了对资本账户的限制。最后，在出口促进战略下，企业家和政府行为都受制于国际市场这个大背景，国际竞争和出口实绩还为各项政策的成败提供了信息反馈。

不仅由于以上理论推证的逻辑，而且由于各国在实践中的探索，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促进制造业生产和出口而成为了新工业化国家或半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亚洲“四小龙”和巴西在开放二元经济下实现的结构转换已成为典范。大量论据表明，制造业产值占 GNP 比重和制造业出口收入占总出口收入的比重上升，并建立较为自由的贸易体系，是这些国家工业化与经济增长成功的关键。

当然，从出口促进战略的实证分析，我们还可以得出许多经验教训。在需求方面，出口促进战略相当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50年代、60年代至1973年前是国际环境最为有利的时期，发达国家持续高增长，世界贸易也增长迅猛，发达国家普遍削弱保护主义，采取了适度的贸易自由，同时其进口需求结构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或潜在比较优势和出口结构相适合，由此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极好的出口扩张机会。但是，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不容乐观，世界贸易增长缓慢，新保护主义抬头，这给发展中国家出口造成了困难，也是出口促进战略所必须面对的新问题。在供给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把握出口市场的能力各不相同，在很大程度上，出口和发展绩效的差异源自政府政策的差异，尤其是决定着外贸体制和贸易政策偏向性的总体政策的差异。要促进出口，政府政策必须完成向外向型政策的转化，因为只要存在进口替代偏向，出口就难免受到隐性税收和数量限制、高于自由贸易价格的投入成本和资源配置方式过于保护资本密集型进口替代产业等不利影响。新工业化国家出口促进战略的成功正是得益于彻底消除了阻碍出口部门发展的各种政策。

一般而言，一国贸易战略总是在内向型或外向型之间进行选择，但是在实践中，内向型与外向型战略措施是不是截然对立呢？贸易战略选择纯粹是主观愿望的产物吗？从前面理论与实践分析中，我们得出了以下几点认识。

(1) 关于内向型与外向型战略的具体划分。通常地，运用进口品与出口品有效汇率的比值来衡量贸易战略。进口品有效汇率 ( $EER_m$ ) 等于在考虑了进口关税、配额、预付金利息和其他影响进口品价格措施的情况下，支付给价值1美元进口品的本币数量；出口品有效汇率 ( $EER_x$ ) 则等于在考虑了出口关税、补贴、特殊汇率、与出口有关的投入补贴和其他影响出口品价格的政策的情况下，出口价值1美元的产品得到的外币收入。若  $EER_m/EER_x > 1$ ，则政策有利于进口替代而不利于出口，是“内向型”的；反

之,若  $EER_m/EER_x \leq 1$ , 则政策有利于出口,趋于“外向型”。由此可见,进口替代、出口促进或中性战略是就出口与进口的保护的相对强度而论的,但是在具体政策运作上,为了避免对进口替代或出口部分过分保护,政府往往在政策上谋求某种平衡,使各部门发展协调,并避免高保护下的非效益。

(2) 关于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的相续性。正如许多发展经济学家论证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面临着不利的国际经济地位、出口市场狭小、国内资源利用不足、工业部门尚处于“幼稚工业”水平,为此,通常在政府高保护下实现最终消费品的进口替代,即进口替代第一阶段。但是当这些产品的进口替代达到一定程度时,各国就必须进行一项根本抉择:是继续坚持进口替代战略,直至实现加工品、制品进口替代呢?还是转而实行出口促进战略,以本国资源比较优势为基础,大力促进进出口发展呢?实践证明,亚洲“四小龙”等正是抓住了 50 年代、60 年代有利的国际经济形势,适时地完成了向出口促进的转向,才取得了此后斐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实绩。而拉美国家继续把进口替代推行到第二阶段,不仅未能达到如期目标,而且陷入国际收支失衡、债务危机和经济停滞之中。

同时也要看到,出口促进战略常常受到发展中国家资源、技术、投资、人力资源等内部条件和国际市场景气、竞争强度等外部条件的制约,因此发展中国家要赢得出口促进的成功,还不得不依靠进口替代所提供的经济条件。一国经济必须在某些部门已实现进口替代,并积累了相当的生产能力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突破比较优势理论的传统,而根据本国长期发展的需要发展出口。比如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历了一段恢复与进口替代的发展之后,逐渐意识到如果继续走传统发展道路,则永远无法摆脱停滞与落后,为此它选择了发展资本、技术密集的钢铁、石化、汽车、工业机械、家电、计算机等新兴产业,并在一段时期进口替代后,成功地跻身国际市场。可以说,基础扎实的进口替代是日本出口促进顺利发展的跳板。

(3) 关于贸易战略抉择的条件性。各国成功与失败的实例都表明,贸易战略是依托于一定现实条件的。卡尔多(Kaldor, N.)在《英国增长缓慢的原因》一书中,运用弗多定律——即制造业生产的增长率是制造品需求增长率的函数,提出了估价贸易战略的一个框架。他认为一国制造业需求的增长进而是其国内市场增长率、出口市场增长率和在这些市场中所占份额的变化率的函数,其中市场增长是决定因素。由于所有国家都为大致相同的出口市场份额而竞争,因此国内市场的增长使得一国制造品需求增长明显地区别于它国。这意味着,采用各种为消除国际收支失衡所必须的措施,控制国内市场增长,是最有效的发展战略,或者说,包括贸易战略在内的经济发展战略必须以开发内源为基础。此外,一种贸易战略的效率还不能脱离世界经济背景,许多国家经济奇迹毫无疑问地是与某一时期世界贸易与经济高涨密切相关的。

总之,基本国情的根本差异和国际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都决定了我们不可能简单套用某种战略。但我们可以从各国进口替代或出口促进战略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并在充分认识现有发展条件的基础上,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新的贸易发展战略。

### 三、贸易政策的实证检验

自 60 年代以来，不断地有经济学家对若干国家实行不同的贸易和工业化政策后的效果进行详尽的经验和历史的研究，其中典型的有 IECD 的 I. 里特尔、T. 西托夫斯基和 M. 斯科特，B. 巴拉萨、J. 巴格瓦蒂和 A. 克鲁格、基尔大学的唐格斯集团以及世界银行的钱纳里等人。这些实证研究为贸易政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提供了有力论据。

克鲁格研究了 15 个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她检验了：实际 GNP 与出口的增长；有出口与无出口的实际 GNP；以及作为资本形成率、接受外援和出口增长之函数的 GNP 增长率，汇集了时间序列与横截面资料，凡是偏离趋势线的增长率则作为出口增长的函数加以估计。结论是出口增长率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变量，出口促进战略明显地比进口替代战略更能推动经济增长。除了众所周知的韩国、台湾和巴西的成功例证外，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论据还有象牙海岸、哥伦比亚和马来西亚的正面例证和印度、阿根廷和埃及的反面例证等。克鲁格还进一步指出，出口促进战略并非总是成功地推进出口增长，尤其是当影响国内市场的政策不适当时，因此出口绩效以及经济增长还取决于政府政策。

钱纳里 (Chenery, H.) 和塞尔奎因 (Syquin, M.) 把贸易战略规定为内向型、外向型与中间型，对 39 个准工业化国家 (地区) 加以分类，揭示了贸易政策与结构和发展实绩之间的联系：其一，贸易战略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即越开放的经济，其效率越高，全要素生产率对增长的贡献越大；其二，初始结构和贸易战略对工业化过程的时间选择和特定经济活动发生顺序的影响，超过其对总的结构转变类型的影响；其三，实行不同贸易战略的国家间，结构转变的时间、顺序不同，各部门、各要素对增长的贡献也不同。制成品出口导向国家，结构变化较快，国内外产业联系较多，制造业对增长的贡献也较大。

《1987 年世界发展报告》集中讨论贸易政策问题，其中将贸易战略分为内向型与外向型两大类，然后再分出“强烈的”与“适度的”两个亚类。“强烈内向型” (Strongly Inward - Looking) 指经济上完全自给自足，以农业经济为主、不与外国进行贸易的一种战略；“适度内向型” (Moderately Inward - Looking) 又称进口替代，指通过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发展国内消费品或制造品的生产，以取代原先需要进口的商品；“强烈外向型” (Strongly Outward - Looking) 指外贸中以农产品、初级产品的生产与出口为主，并换回发展这些产业所需的制成品、资本品；“适度外向型” (Moderately Outward - Looking) 又称出口促进，指采用鼓励或保护措施，发展以制造品为主的生产和出口。

由表 9.4 和表 9.5 可以看到：外向型经济增长率明显高于内向型经济，尤其是以“四小龙”为代表的“强烈外向型”经济发展速度最快，并且自 60 年代至 80 年代始终稳定地居于领先地位；同时，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内向型与外向型国家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呈负增长的内向型国家在 80 年代明显多于 60 年代，表明内向型战略持续越久，则经济发展越是滞缓，在世界竞争中也越是处于劣势。

表 9.4 1963 年 - 1973 年和 1973 年 - 1985 年间 41 个国家和地区按贸易性质的分类

时 期	强烈外向型	适度外向型	适度内向型	强烈内向型
1963 年 ~ 1973 年	香港 韩国 新加坡	巴西 喀麦隆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危地马拉 以色列 马来西亚 泰国	玻利维亚 萨尔瓦多 洪都拉斯 肯尼亚 马达加斯加 墨西哥 尼日利亚 菲律宾 塞内加尔 突尼斯 南斯拉夫	阿根廷 布隆迪 多米尼加 加纳 巴基斯坦 斯里兰卡 坦桑尼亚 乌拉圭 孟加拉国 智利 埃塞俄比亚 印度 秘鲁 苏丹 土耳其 赞比亚
1973 年 ~ 1985 年	香港 韩国 新加坡	巴西 智利 以色列 马来西亚 泰国 突尼斯 土耳其 乌拉圭	喀麦隆 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 科特迪瓦 萨尔瓦多 危地马拉 洪都拉斯 印度尼西亚 墨西哥 巴基斯坦 肯尼亚 尼加拉瓜 菲律宾 塞内加尔 斯里兰卡 南斯拉夫	阿根廷 玻利维亚 多米尼加 加纳 马达加斯加 尼日利亚 苏丹 赞比亚 孟加拉国 布隆迪 埃塞俄比亚 印度 秘鲁 坦桑尼亚

资料来源：1987 年世界发展报告，83

表 9.5 按贸易战略性质划分的 41 个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经济执行情况 (按组别加权平均)

指标及时期	强烈 外向型	适度 外向型	适度 内向型	强烈 内向型
1. 实际 GDP 年平均增长				
1963 年 ~ 1973 年	9.5%			4.1%
1973 年 ~ 1985 年	7.7%			2.5%
2. 实际人均 GNP 年增长				
1963 年 ~ 1973 年	6.9%			1.6%
1973 年 ~ 1985 年	5.9%			0.1%
3. 国内积累总额占 GNP 的百分比				
1963 年	13.0%	20.0%	22.0%	15.0%
1985 年	31.4%	20.5%	23.0%	16.5%
4. 通货膨胀率				
1963 年 ~ 1973 年	5.0%	5.0%	3.5%	6.0%
1973 年 ~ 1985 年	10%	47%	13%	15%
5. 资本—产出年平均增长率				
1963 年 ~ 1973 年	2.5%	3.3%	5.2%	2.5%
1973 年 ~ 1985 年	4.5%	5.0%	6.2%	8.7%
6. 制成品出口年均增长率				
1965 年 ~ 1973 年	14.8%	16.1%	10.3%	5.7%
1973 年 ~ 1985 年	14.2%	14.5%	8.5%	3.7%

资料来源：1987 年世界发展报告，84 ~ 86

#### 四、超越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一种新型贸易战略模式

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目前国际经济形势变幻莫测，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何种贸易战略可以有效地推进经济发展？如何在国内稳定增长的同时，跻身国际竞争，实现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互相促进？本节试图突破进口替代与出口促进的传统分类，在三个维度中界定五种互相排斥的贸易战略，并讨论其各自包含的部门导向和市场导向。经验表明，许多成功的东亚国家实际上遵循的是一种以幼稚产业为基础的、出口导向的综合性战略，而不仅仅是通常人们设想的那种静止的、以比较优势为基础的出口促进战略。我们认为，把保护主义政策融为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采取“保护性出口促进战略” (Protected Export Promotion) 是一种有意义的新型贸易战略。

(一) 新型贸易战略的提出

人们常用  $EER_m/EER_x$  来衡量贸易战略是内向还是外向，但是这种定义把进口替代和出口活动置于负相关关系中则不尽准确。从概念上讲，一个经济可以分成三个部门：出口 (X)、进口 (M) 和非外贸的国内 (H) 部门。既然贸易政策不仅影响两个外贸部门间的相对价格，而且影响外贸与国内部门之间的相对价格，因此在三部门框架里定义贸易战略也就更为恰当。

在三部门经济中，两种外贸品的生产函数为：

$$X = f(P_m/h, P_x/h); M = f(P_m/h, P_x/h)$$

其中  $X$  和  $M$  为可出口或可进口的生产， $P_m/h$  和  $P_x/h$  为可出口品和可进口品对国内商品的相对价格。图 9.5 说明了在三部门经济中，贸易刺激与可出口品和可进口品生产之间的关系。其中纵轴表示可出口品与国内品之间的相对价格 ( $P_x/h$ )，横轴表示可进口品与国内品之间的相对价格 ( $P_m/h$ )，图中任一点均代表两种相对价格的一种特定组合，如在  $E$  点， $P_m/h$  和  $P_x/h$  都等于 1，而在  $E'$  点， $P_m/h$  增长到  $(1+d)$  而  $P_x/h$  仍为 1。图中规定  $E$  点对应于自由贸易，此时  $P_m/h$  与  $P_x/h$  都为 1，可进口品与可出口品生产分别为  $M_0$  和  $X_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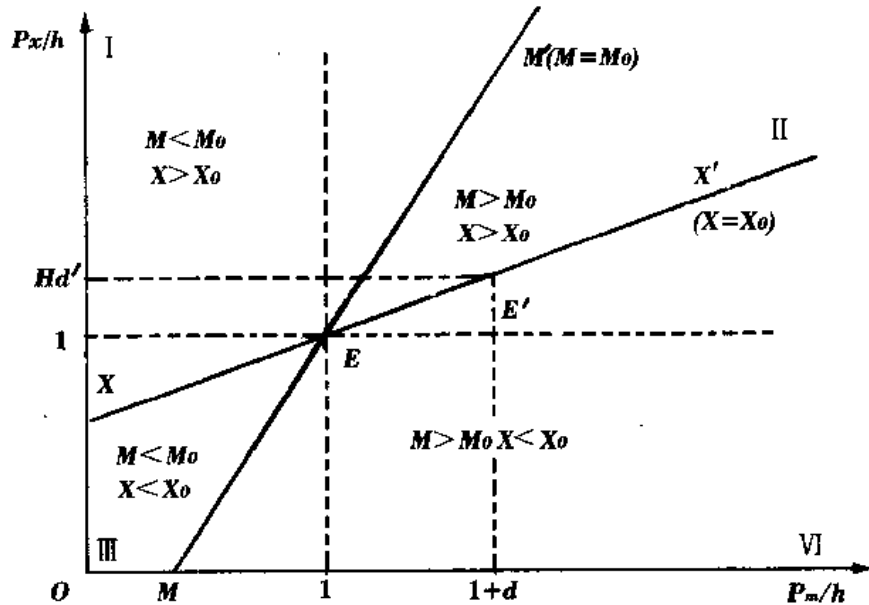


图 9.5 三部门贸易战略模型

图 9.5 中， $XX'$  表示使可出口品生产维持在  $X = X_0$  水平的相对价格组合。 $XX'$  向上倾斜是因为可进口品与可出口品交叉价格弹性必定为负值。比方说，如果关税  $d$  使得  $P_m/h$  由 1 增长到  $(1+d)$ ，则  $P_x/h$  也必会相应地由 1 增长到  $(1+d')$ ，才能保持  $X = X_0$ 。位于  $XX'$  之上的任何点的价格组合下， $X > X_0$ ；反之，位于  $XX'$  之下者， $X < X_0$ 。相似地， $MM'$  表示维持  $M = M_0$  的相对价格组合。 $MM'$  也是向上倾斜的，并且比  $XX'$  更

陡，因为其自身价格作用比交叉价格作用更大。在  $MM'$  之右的任何点上， $M > M_0$ ；在  $MM'$  之左，则  $M < M_0$ 。

运用图 9.5，可以比较清楚地考察贸易刺激与可贸易品生产之间的关系。在  $M'EX'$  区域，两种外贸品相对价格均大于 1，表示同时存在对进口替代和出口的激励；进口与出口均高于自由贸易时的水平（ $M > M_0$ ， $X > X_0$ ），而国内部门承受了进口保护和出口补贴的负担。在  $XEM$  区域则相反，两种外贸品相对价格均小于 1，表示对进口替代和出口都不激励，进口与出口生产也低于自由贸易水平（ $M < M_0$ ， $X < M_0$ ），国内部门得到较多好处。类似地，在  $XEM'$  区域，出口激励大于进口替代激励，出口上升，进口下降（ $X > X_0$ ， $M < M_0$ ）。在  $MEX'$  区域，进口替代激励大于出口激励，进口上升而出口下降（ $M > M_0$ ， $X < X_0$ ）。

由图 9.5 还可以看出，激励方式与生产方式并不对等。按照生产方式，该图可由  $MM'$  和  $XX'$  划分四个区域；按照激励方式，它又可由通过  $E$  点的垂直线和水平线分为四个象限。对出口（进口替代）的激励不一定就能导致出口（或进口替代）部门的发展。比如，在整个 II 象限，出口与进口替代都得到正面激励，但是仅在  $M'EX'$  区域中，出口与进口的生产才高于自由贸易水平。在象限 III 与  $XEM$  区域也有类似的关系。

系统的政策激励措施反映了贸易战略取向，而实际贸易形式是政策运作的结果。在此，我们根据政策激励结构而不是贸易形式，把激励结构划分为互相排斥的五种，相应地，也出现了五种贸易战略选择，一并列在图 9.6 中。

图 9.6 中，横轴代表对进口替代活动的激励（+）或非激励（-），纵轴代表对出口促进活动的激励（+）或非激励（-），中心正点实际上不存在任何激励。图中象限 I 代表“纯粹的”出口促进战略，即保护和促进出口活动，但不鼓励进口替代，这是正而的出口激励与自由进口政策的结合，也就是传统上定义的那种“出口促进”的含义。象限 IV 代表典型的进口替代战略，其中存在明显的进口限制和强烈的反出口倾向。中心点  $E$  则代表真正的自由贸易战略，即不论出口还是进口替代活动都得不到任何激励，亦即“外贸中性”。

图 9.6 中值得强调的是，现实生活中重要而传统分类又未反映的两种贸易战略。一种情形是象限 II 中，同时并存对进口替代或出口促进的正面激励，可称为“保护性出口促进”战略。该战略的关键是对出口和进口替代双管齐下地促进，国内厂商一方面在本国市场受到保护，另一方面更在政策激励下参与国际竞争。对此战略下文还将展开讨论。另一种情形是象限 III 中出现的既不鼓励进口替代又不主张出口，实际上推进进口且限制出口的情形。它寻求出口极小化和进口极大化，以提供国内吸收所需的资源，可称为“实际上的进口促进”战略。在国内仍有闲置资源的条件下，这种战略可能有助于短期增长，但许多国家由此而陷入国际收支失衡和债务危机的困境中。

## （二）贸易战略的部门导向与市场导向

贸易战略的划分总是以激励结构的偏向程度为基础的，因此，要理解每种战略的优劣及其内含的经济结构，就必须考察激励偏向形式。有些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已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如斯瑞尼·瓦桑（Srinivasan, T.）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实践中，“进口替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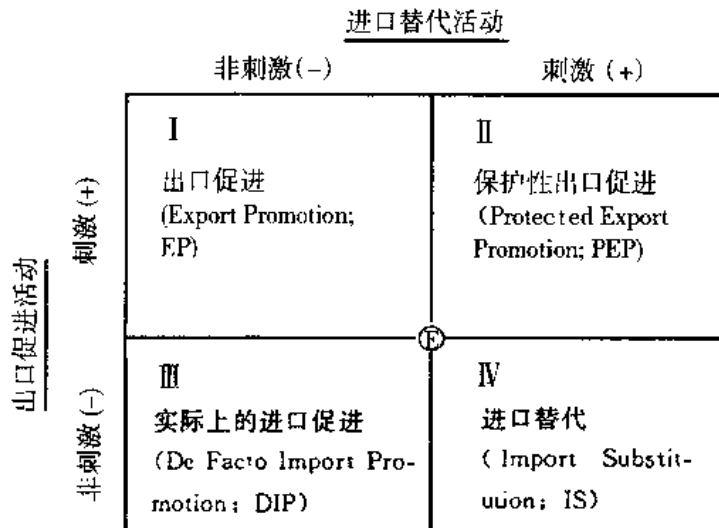


图 9.6 刺激结构与贸易战略的划分

不仅是非效率的，而且被推进到了过分的程度。”巴格瓦蒂 (Bhagwati, J.) 也指出，许多进口替代政策的失败可能并非由于进口保护程度过度，而是由于这种保护在不同进口替代产业间分配的“混乱的形式”。在此分别探讨一下贸易战略两个基本维度，即部门导向和市场导向。

(1) 部门导向。部门导向指一国对主导部门的选择，即哪个部门的生产得到保护或促进，而不论其销售市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这一选择对于增长和发展十分重要。

在供给方面，不同部门发展的资源成本各异。进口替代战略往往由于从事一国处于比较劣势的部门的生产，而引起持续上升的国内资源成本，陷入“空中楼阁”境地。相反，出口促进战略则通过增加该国具有比较优势的生产，国内资源成本相对较低，产业发展具备稳固的根基。在需求方面，不同部门的市场特征和增长潜力也不同。低成本部门可能是并非有增长潜力的部门。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其比较优势典型地集中于需求缺乏弹性且扩展乏力的初级品出口上，而在竞争中居于比较劣势的制造业部门恰好是需求的收入与价格弹性高、技术进步快、劳动生产率提高迅速的产业。

一个国家可以把主导部门选择为相对效率较高的初级品出口部门，以尽可能降低资源成本，也可以不顾较高的成本，选取生产潜力大、市场需求旺盛的产业。芬德利曾区分“瞬时的”与“长期的”比较优势，在某个给定时间，要素比例可能存在“瞬时的”比较优势，而在长期看来，要素比例不是固定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经济变量本身又受到贸易规模和形式的影响。具有瞬时的比较优势的部门不一定具有长期的比较优势。随着经济参数变化，目前的进口竞争部门可能成为未来的出口部门，而目前的出口部门也可能变成未来的进口部门。“保护性出口促进”战略的重要特点之一即是强调了片而扩张具有瞬时比较优势的传统部门并非总是最佳选择。

(2) 市场导向。市场导向指一国对目标市场的选择，即主导部门是谋求在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上发展。进口替代战略内向地立足于国内销售，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国内市场有限，通常导致企业生产低于效益规模和大量设备利用不足。出口促进战略则外向地针对国际市场，巨大的市场容量可能使企业得到规模经济之利。区分内向型与外向型的基本标准即为市场导向特征。

在理论上，如果一种战略以进口竞争产业为主导，则它是国内市场导向型的；反之，如果一种战略外向于世界市场，那它就是以出口部门为主导的。但实际上并非总是如此。具有相同部门导向的国家可能市场导向大不相同。比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以发展进口竞争部门为主导，但市场导向却截然相反，有一些旨在于在国内市场上替代进口以获取相对于国际市场的独立性，另一些则旨在于把进口竞争部门最终发展成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出口部门。

表 9.6 贸易战略的部门和市场导向

部 门 市 场	可进口品 部门导向	可出口品 部门导向	国内品 部门导向	中 性
国内市场 (内向)	1. IS	2. -	3. DIP	4. -
出口 (外向)	5. PEP	6. EP	7. -	8. -
中 性	9. -	10. -	11. -	12. FT

(3) 贸易战略中的导向特征。表 9.6 中归纳了五种贸易战略中基本的部门和市场导向特征。表中第 1 格表示以进口竞争部门作为主导部门并具有国内市场导向的战略，即进口替代战略。第 6 格显示了出口促进战略的核心，即在国外市场上扩张出口品部门。第 3 格表示实际上的进口促进战略，即给予国内部门的优惠超过给予出口或进口替代部门的，并且商品多在国内销售，极少出口。第 12 格具有中性的部门导向和市场导向，表示真正的自由贸易战略。

第 5 格所显示的是保护性出口促进战略，即以进口竞争部门为主导部门，但发展目标是培养出口能力。这种战略显然是外向型的，但适当的进口保护同时又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对于多数发展中国家，出口促进战略意味着扩张其具有典型比较优势的初级品业或低附加价值的半加工业；而进口替代战略却对技术较先进的加工业部门给予更大优惠。这里的保护性出口促进战略结合了进口替代战略的部门导向与出口促进战略的市场导向，努力在资源配置最优化与促进适意的结构变化和开发未来战略资源这两种需要之间达成平衡。

保护性出口促进战略之新意不在于采取了何种前所未有的刺激措施，而在于它在出口促进和进口替代两套刺激体系之间进行了协调，从而更大限度地推动了生产、出口和经济增长。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包括“四小龙”在内的“强烈外向型”国家的成功，与其说是单纯出口促进的结果，不如说是奉行保护进口竞争与推进出口完美结合的典

范。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新型战略决不是出口促进与进口替代版块式的拼接，这方面的教训也屡见不鲜。比如阿根廷政府也曾试图对鼓励进口替代和出口有所作为，但政策措施缺乏协调，结果经济停滞、实际有效汇率与国际收支状况不断恶化。直到1987年仍被世界银行列入“强烈内向型”国家。

我们认为，保护性出口促进尽管目前只在“四小龙”等经济中得到验证，但它采取的适应世界市场变化，以一体化贸易政策推进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指导思想却不乏普遍意义。我国是个发展中大国，传统的闭关主义内向型发展道路已为实践所摒弃。改革开放以来，促进出口逐渐引起理论界和实践界的重视。但是一方面，我国出口仍以初级品为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品不多；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新保护主义盛行，贸易大战频繁，如果单纯依赖市场潜力受限的出口，增长动力显然不足。同时，我国面临“复关”的挑战与机遇，既要消除各种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等保护措施，又必须顺应时势，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贸易政策。正确的贸易战略已成为经济发展总体战略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保护性出口促进战略关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兼顾进口替代和出口促进两个刺激体系，具有较强的灵活性，对于我国今后的贸易战略抉择应该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

## 五、发展对外贸易的策略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对外贸易，除了要有正确的理论和战略作指导外，还应采取正确的外贸策略，也就是将外贸理论和战略具体化。但外贸策略的实施必须依靠发展中国家的国际集体行动，即通过“压力集团”（pressure group）的作用来实施外贸战略和策略。

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策略主要有以下几种。

### （一）利用有效保护率实行贸易保护

为了更好地度量汇率、补贴、关税和配额升水（quota premiums）的综合效应，发展经济学家们区分了“名义汇率”（nominal exchange rate）和“有效汇率”（effective exchange rate，简称EER）。名义汇率是指官方汇率，用进口或出口商品的国内货币价格与国外货币价格之比来度量；有效汇率则用官方汇率、出口关税税率、补贴、配额升水的综合效应来度量，其公式是：

出口的有效汇率：

$$EER_x = r_0 (1 - t_x + S_x) \quad (13)$$

进口的有效汇率：

$$EER_m = r_0 (1 + t_m - S_m + q_m) \quad (14)$$

式中  $r_0$  为官方汇率， $t_x$  是出口的平均关税税率， $t_m$  是进口的平均关税税率， $S_x$  是出口补贴的平均水平， $S_m$  是进口补贴的平均水平， $q_m$  是配额升水。

有效汇率是一个非常有用的概念，它不仅可以反映汇率、补贴、关税等调节机制的综合效应，而且可以通过比较进口与出口的有效汇率来判断一国的经济是内向型的还是

外向型的。如 1964 年韩国的进口有效汇率是 247（本地货币对美元），出口有效汇率是 281（以 1960 年 EER = 100 为基数），因而韩国属于出口主导型外贸。而巴西的进口、出口有效汇率是 2253、1874，因而巴西属于进口替代型外贸战略。

## （二）建立贸易优惠制

从 1964 年的联合国第一届贸发会议直至 1982 年第六届贸发会议，讨论的主题都是如何扩大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其中，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策略之一，是建立贸易优惠制，即通过与发达国家的谈判，使发达国家消除关税壁垒，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商品实行关税减免、取消配额等优惠，同时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制造品、半制造品实行价格、关税、配额、高技术产品进口限制方面的优惠。

建立贸易优惠制的行动开始于 60 年代。1968 年联合国第二届贸发会议通过了关于建立关税普惠制的决议，1970 年第 25 届联大采纳了这一决议，使 18 个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了单方的普惠制。1975 年欧洲共同体同 45 个发展中国家（主要是非洲国家）签订了“洛美协定”，允许这些国家所有制造品和 90% 的农产品自由进入欧洲市场。协定还规定，由欧洲共同体提供保证金，以稳定可可、咖啡、棉花、木材、茶叶、香蕉、铁矿石等 12 种产品的价格和外汇收益。

## （三）开展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

发展中国家过去的出口主要集中于发达国家，由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利，进口大于出口，出口的制造品成本高且价格不具竞争力，出口过分依赖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变化等原因，因而经常出现贸易逆差，产生国际支付短缺等问题。为此，一些发展经济学家主张大力开展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斯图尔特（Stewart, M.）等人认为，通过扩大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贸易，可以克服上述问题。他还建议，为了解决贸易中支付手段不足问题，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的集团中设立一种类似于特别提款权的地区性货币（可称为 rocnabs）。这种货币只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集团内部流通，主要用于克服外汇短缺、进口购买力不足问题。如果出现支付不平衡，可以通过贸易平衡来解决<sup>①</sup>。

## （四）订立国际商品协定

为了稳定初级产品的国际市场价格、通过压力集团的力量来推动外贸发展，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指出：由某些生产初级产品的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订立国际商品协定，即在某些初级产品的生产、价格、销售等方面采取联合行动。他们认为，国际商品协定可以起到两大重要作用：其一，稳定商品价格，保持或改善初级产品的贸易条件。其二，保证出口收入维持其（以工业品表示的）购买力，并补偿因商品价格提高而产生的出口减少或因出口增多价格下跌所造成的出口收入短期下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已订立了咖啡、糖、小麦、锡、橄榄油 5 种国际商品协定。这些协定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预期效果。

## （五）制定缓冲储存计划

为了防止出口产品价格大起大落，稳定出口产品的价格和产量，一些发展中国家制

<sup>①</sup> 斯图尔特，发展中国家，贸易与流动性：一种新思路。银行家，1972. 3

订了缓冲储存计划，即生产者和出售者根据对出口产品价格的预期，在产品价格（相对于未来价格）较低时购进产品，储存起来，待价格（相对于未来价格）较高时售出存货。但在实行缓冲储存计划时应注意几个问题：一是对未来情况的变化预测要准确；二是储存量不宜过大，更不能把需用于马上出口的商品储存起来，一般只是储存相对生产过剩的部分货物；三是应储存易保存、保管的商品，且保管费用不能过高，否则会造成无谓损失或得不偿失。

#### (六) 实行生产和出口限制计划

缓冲储存主要是为了稳定出口产品价格，但即使价格稳定，贸易条件恶化仍会阻碍发展中国家的外贸发展。为此，普雷维什等人提出，实行生产和出口限制计划来改善贸易条件。具体做法是：一些生产同类初级产品的国家联合起来，通过协议采取集体行动，以减少或限制某些初级产品的生产量和出口量来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因为产量和出口量的减少会提高产品的需求弹性，起到提高价格、保持或增加出口收益的作用，从而使贸易条件得到改善。普雷维什还主张初级产品出口国联合起来，实行出口“垄断定价”（monopoly pricing），来强制性地提高初级产品售价，改善贸易条件。

#### (七) 建立生产者卡特尔

即生产同类商品的国家通过协定形成一个生产和销售的国际性垄断组织，以统一体的形式一致对外，如石油输出国组织。

#### (八) 实行价格补偿协定

为了防止出口产品价格下跌影响一国的出口和生产，一些发展中国家订立了双边贸易协定，规定一个价格补偿的“可调比例”（sliding scale）：若一国因出口产品价格下跌产生了出口收入下降，可以由贸易对方国提供一定比例的补偿，使受损国的价格保持在“正常价格”（normal price）水平。米德（Meade, J.）对这一问题作了详细论证<sup>①</sup>。如图 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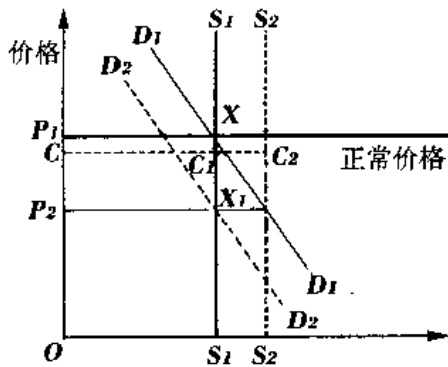


图 9.7 价格补偿效应

以供给方面的变化引起了价格波动为例。假定某商品的供、求曲线分别为  $S_1S_1$ 、 $D_1D_1$ ，二者的交点决定了其均衡价格为  $P_1$ 。现在，如果需求由  $D_1D_1$  下降到  $D_2D_2$ ，使价格由  $P_1$  降到  $P_2$ 。在  $P_1$  价格下，出口产品的收入为  $OP_1XS_1$ ，价格下降为  $P_2$  后，收入降为  $OP_2X_1S_1$ 。假定  $P_1$  为正常价格，那么， $P_2C$  就是价格补偿协定中应补偿的比例量，也就是说，在价格补偿协定中，出口的总收益应是  $OCC_1S_1$ ，它略少于正常价格  $P_1$  下的收益；但是，如果价格由  $P_1$  降为  $P_2$  的同时，供给（出口）由  $S_1S_1$  增加到  $S_2S_2$ ，那么，价格补偿协定中规定的总收益就是  $OCC_2S_2$ ，

<sup>①</sup> 米德. 国际商品协定. 劳埃德银行评论, 1964. 7

显然大于价格下降前的总收益  $OP_1XS_1$ 。相反，如果供给曲线下移，价格就会升到高于正常价格的水平，而总收益却低于价格上升前的水平（因为要补偿进口国的损失）。总之，不论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价格补偿都会保证出口或进口国的收益不受太大损失，这就有利于稳定和扩大协定国的生产和出口。

#### （九）实行收入补偿计划

价格补偿协定可以从出口产品价格稳定方面保证贸易国双方少受损失，但是，它不能对贸易国双方因进出口数量减少而产生的损失进行补偿，即只能补偿价格损失而不能补偿收益损失。为此，一些国家又采取了收入补偿计划，即通过保证贸易双方的总收益不低于“正常收益水平”，来同时补偿价格与收益方面的损失。

## 第十章 国外资源与经济发展

发展中国家国内资源不足，经济发展严重依赖外部资源，因此通过引进外资、利用外国援助等途径从外部获取资源是必要的。国外资源的流入，可以解决一国储蓄不足、外汇短缺、资本品稀缺等问题，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本章将介绍有关利用国外资源的一些基本知识和理论，探讨国外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利用国外资源进行利弊分析，并提出如何利用和控制跨国公司、如何解决债务偿还问题等利用外资的战略与策略。

###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利用国外资源的一般理论

#### 一、有关国外资源的基本认识

现代经济发展理论考察的是一个经济的持续转变过程，这一转变包括：人的技能的增加，投资与储蓄水平的提高，生产性技术的采用，产出与就业结构的变化，以及新制度的发展等。发展中国家在促成这些转变时面临严重的资源瓶颈，而通过利用外援可以解除这些约束，促进对国内资源更充分的利用，从而加速经济增长。因此外部资源的流入已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要素，它的生产率和配置方式成为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之一。

国外资源的利用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些有关的基本知识，如它的起源、定义、来源、形式、动机、目标等。

##### （一）国外资源的定义和性质

对外援助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瓦解。最早的援助计划是美国实施的欧洲复兴计划（即一般通称的马歇尔计划），这一计划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此后，国际复兴银行、国际开发协会以及相继建立的拉丁美洲、亚洲和非洲的地区性开发银行，构筑了一个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资源的框架。到了60年代，希腊、以色列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因有效地利用外援而取得了经济的持续发展。

国外资源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国外的援助 (foreign aid)，简称外援；一类是外国投资 (foreign investment)，简称外资。外援是指援助国政府对贫穷国家以发展为目的的资源转移。赫立克和金德尔伯格认为外援是指“通过让与条件（而不是市场条件）所形成的国际转让”<sup>①</sup>。所谓“让与条件” (concessional elements) 是指：这种转让是不需要偿还的赠予，或者具有优惠条件的贷款。比如，一些国家、慈善机构、国际组织对某些发展中国家的食品援助、医疗卫生援助、救灾物资等，是无偿援助；由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的无息贷款、低息贷款、长期贷款（有的长达 50 年）、官方发展援助等，是优惠贷款（软贷款），有的优惠贷款甚至可以全部或部分减免偿还额。因此，外援具有无息或低息（低于国际市场贷款利率）、偿还期长、非商业性或无偿性等特点。

外国投资又称为外国私人投资、国外直接投资，指“一国从国外获得资产 (assets) 的活动”<sup>②</sup>。这种“资产”可以是金融形式的，如股票、债券、银行存款、贷款等，也可以是实物形式的，如机器设备、中间产品、原材料等。外国投资的利率一般不是优惠利率，而是国际市场利率。

## （二）国外资源的形式

国外资源有多种存在形式，包括资本品、农产品、中间产品、医疗卫生用品、军事装备、贷款、股票、债券、存款、直接投资、技术转让、专利、人才与管理方法的出口等。从类型上看，上述形式可以分为物质资本形式和金融形式；从性质上看，它又可分为物质资本形式、人力资本形式和知识形式。比如，机器设备是物质资本形式，贷款、股票是金融形式，向外派出技术、管理、医疗卫生人员是人力资本形式，技术、专利属于知识形式。

外国投资的形式更多，除上述形式外，还有跨国公司投资、商业银行信贷（按市场条件即市场利率贷出）、证券投资、出口信贷等。

## （三）国外资源的来源

国外资源的来源很多，一般可分为“双边的” (bilateral) 和“多边的” (multilateral)。双边的是指一国对一国的资源转移，如美国向印度输入官方发展援助就是双边援助；多边的是指许多国家参加的国际性组织或机构对其成员国的资源转让，如世界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发展银行、非洲发展银行、欧洲发展基金、欧洲投资银行、援印俱乐部等机构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的就是多边的资源转让。

国外资源的形成，可以是某一发达国家的私人企业或财团的资本、政府外援基金、慈善机关的筹款，也可以是某些国家组织的会员国的捐款。

## （四）国外资源转让的形式

发达国家或国际金融组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国外资源的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

(1) 项目援助 (project aid)，即用于支付某一特定项目的贷款或赠予。如一国际机构对某一发展中国家提供一笔贷款，指定受援国必须用于计划生育方面等特定项目，或

① 赫立克，金德尔伯格，经济发展，英文版，1983，441

② 格鲁贝尔，外国投资，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 2 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432



用于修建一个水力发电站，以支持该国的经济发展，这就是项目援助。项目援助的特点是能够使债权国严密地控制援助资金的使用，使其有效地用于某一特定投资项目。但这种对援助资金施加影响的做法容易产生家长式的统治气氛，还有可能产生对受援国的不信任，甚至意味着侵犯受援国的主权。

(2) 计划援助 (program aid)，即用于某一整个部门或活动的广泛性的贷款或赠予。如一国际机构提供一笔农业贷款或教育贷款，帮助受援国发展农业或教育，而不问这笔贷款具体用来购买什么、发展哪个计划项目。计划援助的特点是范围广泛、控制权小、使用自由度较大，因而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3) 出口信贷，即发达国家或国际金融组织向某一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专门用于支持其出口部门的发展，以帮助其扩大出口生产、增强出口能力。出口信贷一般发生于贸易伙伴之间，如一发达国家需要从某发展中国家进口一种特殊原材料或加工品，或者为了帮助该国提高债务偿还能力、平衡国际收支，可以向该国提供出口信贷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它是商业性质的，所以出口信贷的利率一般是商业信贷利率。

(4) 跨国公司直接投资，即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利用母公司的资本、技术、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子公司、孙子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地皮、劳动力、原材料来生产产品，在当地出售或出口销售。

(5) 附带条件的援助，即援助国在向受援国提供赠予或贷款时，提出附加条件，要求受援国用这些款项（或一定比例的贷款）购买他们的产品，或接受他们国家的保险、使用他们国家的运输工具，而援助国的这些产品可能质次价高，或者技术性能不适宜于受援国，也可能购买这些产品后需要不断地从援助国进口原材料和零配件。因此，这种援助方式带有强迫性，让与条件不够优惠，一般不受发展中国家欢迎。

(6) 自动转让，即经过某些机构法律或制度规定，使某国或某些机构的资源自动向受援国转移，无须再作协商或乞求。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就是根据一定方案分配给各国的；一些富裕国家的征税、对侨民收入征税后的回扣等，通过立法手续自动生效实行税项转移（给穷国）；石油输出国组织从出售给富裕国家的石油收入中提取一定的规定金额，直接交给贫穷国家；等等。除上述形式外，还有合资、来料加工、引进技术与管理人才等利用国外资源的形式。

#### (五) 转让国外资源的目标和动机

从引进国外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或称资源输入国）来说，利用国外资源主要是为了解决国内资源的不足，促进本国经济更快地发展。在 60 年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尽快地摆脱贫困、实现经济起飞和快速增长，因而，这一时期利用国外资源的目标是为了“实现经济发展（实际上是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改造”。据此，钱纳里等人曾将“外援”定义为：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结构改造而从国外获得的资本（外国储蓄）<sup>①</sup>。但在后来，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发展的含义不仅指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还包括收入分配的改善、贫困的消除等，而且消除贫困是中心问题。为此，约翰逊

<sup>①</sup> 钱纳里，外国援助，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 2 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429

等人又提出：利用国外资源的目标应当主要是消除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均，即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发展。所以他们将外援重新定义为：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改善收入分配状况，通过金融或物质形式，把一部分资源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一切官方贷款和优惠贷款<sup>①</sup>。

从输出资源的发达国家来说，它们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源或进行援助，动机是复杂的：有的出于人道主义，如对发生火灾、水灾、地震、饥荒、战乱、疾病等自然和人为的灾害的救济，对动物保护、环境治理、文物保护的捐赠等；有的出于宗教信仰动机；有的出于真诚的帮助发展经济的愿望；有的出于维护友谊；还有的出于政治目的，如通过援助来加强政治上的联系，或者保持政治上的控制，追求国际政治利益；有的直接出于经济利益动机，即通过资本输出来获取高额利息和利润，或向对方销售产品、扩大自己的市场，或向对方实行军事援助，出售军火以控制对方军事力量，或使对方成为自己的军事基地。当然，如果军事援助用于对方的国防需要，那么它可以算作是外援。但如果军援用于军事扩张、侵略、不纯的政治目的，那么它就不能算作外援。

总的来说，凡是用于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消除贫困和收入不均的国外资源，就可以说是利用国外资源和外援。应当指出的一点是，对大多数资源输出国（或机构）来说，盈利是主要的动机，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的任务是要认识引进国外资源所起的作用，并学会巧妙地利用发达国家输出资源的各种动机，尽量利用有利的条件来引进外资，使之有效地用于经济发展的目标。

## 二、国外资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有许多学者就国外资源对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和作用从理论上作了分析。比如，早在1948年，哈罗德在阐述其经济增长模式时，就曾提出过：当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理想的经济增长率时，应当利用国外储蓄（即引进外资）来提高储蓄率；1960年，罗斯托在论述其“起飞”理论时，也提出过用引进外资来增加不发达国家的投资，使其净投资率达到10%以上，并认为这是实现经济起飞的必要条件之一。但比较系统和有影响的理论，是1966年由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提出的“两缺口”模式（two-gap model）<sup>②</sup>。这一模式的核心在于阐明：发展中国家在储蓄、技能和组织管理能力、进口商品和服务等方面的国内有效供给与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所必须的资源计划需求量之间存在着缺口，即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而利用外资是填补这些缺口的有效手段。

### （一）“两缺口”模式

钱纳里等人依据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均衡分析和哈罗德—多马经济增长模式，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实现均衡的经济增长，必须积累足够的资本，使资本形成率达到经济发展计划目标所要求的水平。而要做到这一点，应当首先估算出实现既定经济增长率所需要的追加投资量。从这个基点出发，他们认为，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有储蓄、投资、出口和

<sup>①</sup> 钱纳里，外国援助，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第2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429

<sup>②</sup> 钱纳里，斯特劳特，外援与经济发展，美国经济评论，1966，8

进口四个因素。他们在对 50 多个国家近代经济发展历史进行了考察之后指出：“大部分不发达国家都是主要依赖外部资源来提高他们的人均收入的”，这种“可称为‘外援’的外部资源流入，实际上已成为新的独立因素。”它“不仅加快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而且实际上大大加强了运用自己的资源以取得经济持续发展的能力”<sup>①</sup>。他们还认为，从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所走过的道路来看，经济发展主要受到三种形式的约束：一是“储蓄的约束”（或称投资约束），即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投资的扩大，影响了经济发展；二是“外汇的约束”（或称“贸易约束”），即出口收入小于进口支出，有限的外汇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需要的资本品等进口，阻碍了国内生产和出口的发展；三是“吸收能力的约束”（又称技术的约束），即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企业家和管理人才，无法更多地吸收外资和有效地运用各种资源，影响了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

钱纳里指出，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中都会遇到这些约束，并依次出现吸收能力限制的发展阶段、储蓄限制的发展阶段、外汇限制的发展阶段这三个经济发展阶段。钱纳里和斯特劳特重点考察的是储蓄约束和外汇约束。所谓储蓄约束，是指在国民收入核算中，投资超过了储蓄；所谓外汇约束，是指进口支出超过了出口收入。利用均衡方法进行分析，储蓄约束与外汇约束在量上相等，用总量公式表示就是：

$$Y = C + I + X - M \quad (1)$$

其中， $Y$  是国民收入， $C$  是消费， $I$  是投资， $X$  代表出口额， $M$  代表进口额。上式换项后变为：

$$Y - C = I + X - M \quad (2)$$

因为国民收入恒等式，有：

$$Y = C + S \quad (3)$$

代入上式得：

$$S = I + X - M \quad (4)$$

调整得：

$$I - S = M - X \quad (5)$$

上式左端 ( $I - S$ ) 是投资与储蓄之差，称为“储蓄缺口”，右端 ( $M - X$ ) 是进口与出口之差，称为“外汇缺口”。从均衡的观点来看，左、右两式必须相等，表示出国内出现储蓄缺口即投资大于储蓄时，必须用外汇缺口即进口大于出口（表示从国外获得储蓄）来平衡。

这一模式的基本含义是：

(1) 该模式把收入增长和储蓄、投资、出口和进口四个要素联系起来，所以这不是一个凯恩斯模式，而是一个开放模式。

(2) 模式强调储蓄和外汇是经济增长的两个约束条件。国内储蓄的短缺表现为投资大于储蓄，限制了资本形成；外汇短缺意味着出口小于进口，限制了进口能力；如果经济增长要依靠国内不能生产的资源，则外汇储备就多少是个重大约束。

<sup>①</sup> 钱纳里，斯特劳特，外援与经济发展，美国经济评论，1966，8

(3) 若需要的储蓄小于可获得的储蓄, 以及需要的外汇小于可获得的外汇, 则可以用国外借款或赠予(即外援)来解决。

## (二) 两个缺口的调整与平衡

正如国民收入均衡公式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发生在事后(ex post)一样, 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的平衡也是事后的平衡。这是因为, 在事前, 两缺口模式中的四个因素是独立变动的, 其各自的计划数量也是独立决定的。例如, 国内储蓄取决于国民收入水平、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储蓄倾向等因素; 投资既取决于既定的储蓄量或储蓄率, 又取决于计划的经济增长率、国内吸收和运用投资的能力(如技术、管理、企业家等因素); 进口量的大小取决于一国的收入水平、收入分配等状况, 需要进口的计划数额、国内产业与产品结构情况等因素; 出口量则主要取决于一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国际市场价格、国外的需求收入弹性等多种因素。因此, 在这些要素各自独立的情况下, 投资超过储蓄的数额不一定恰恰等于进口超过出口的数额。这样, 就需要对两个缺口进行适当的调整, 促成其达到平衡。

调整两个缺口的的方法有消极的(不用外资)和积极的(利用外援)两种。

其一, 不用外援条件下消极的调整。这种调整又可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当储蓄缺口大于外汇缺口, 即  $I - S > M - X$  时, 可以通过减少国内投资或者增加国内储蓄来实现两端的平衡, 前一种方法显然会降低经济增长率, 后一种方法则在短期内难以做到。这二种情况是当外汇缺口大于储蓄缺口, 即  $M - X > I - S$  时, 可以通过减少进口或者增加出口来实现两缺口的平衡, 但前一种方法也会降低经济增长率, 后一种方法一时也难以实现。

其二, 利用外资条件下积极的调整。如果两个缺口不具互补性, 那么就不宜采用压缩国内投资和削减进口的方法, 而应采用利用国外资源即引进外资的办法, 使两个缺口在促进经济增长率高的情况下实现平衡。引进外资来平衡两缺口具有双重的效应, 若一笔外资以机器设备的形式转移进发展中国家, 则一方面, 从供给来看, 它表示从国外进口了资源, 而这笔进口不需要用增加出口来支付, 这就减轻了外汇不足的压力; 另一方面, 从需求来看, 这笔进口又是投资品, 而这些进口的投资品不需要用国内储蓄来提供, 这就减轻了国内储蓄不足的压力。所以, 利用外资来平衡两个缺口, 既能解决国内资源不足问题、促进经济迅速增长, 又能减轻因加紧动员国内资源以满足投资需求和动员国内资源以冲销进口而出现的双重压力。

## (三) 两缺口模式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

两缺口模式的理论价值和意义在于:

第一, 它采用结构主义分析方法, 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存在着的国内资源不足、经济结构不平衡等问题, 揭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 积极地利用国外资源, 是克服储蓄和外汇约束、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第二, 它强调了利用国外资源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作用。两缺口模式指出: 当经济发展受到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的限制时,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 必须成功地利用国外资源, 而利用国外资源对经济增长可以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①利用外资可以

增加出口能力。若外资用于出口产品的生产项目，可以直接增加出口产品的生产和出口量；若外资用于降低出口成本的项目，如修建港口、公路等，或获得技术进步与规模经济效益，可以使出口产品成本降低，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从而间接地促进出口。由于外贸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因而出口增加直接带动了经济增长。②利用外资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投资率，促进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提高。比如，将外资用于投资，可以促进国民收入增长，收入的增长又可以提高国内储蓄率，增加资本形成；同时，收入的增长也使政府获得较多的财政收入，将财政收入用于投资，又可推动经济增长。③利用外资可以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由于国与国之间资本的转移，世界总资本存量增加了，世界总产出水平扩大了，资源得到了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对于资本进口来说，产出增加了，资源使用的效率提高了，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本国的福利水平大大提高（表现为总收入和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消费量增大）。

第三，它说明了经济发展中实施经济计划的必要性和政府调节的重要性。钱纳里等人的分析表明，国内资源（主要是资本）的稀缺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为了促进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必须积极地利用国外资源。但利用国外资源必须做到有计划性，即根据经济增长目标的要求事先计算好需要进口的资源量，使进口的资源量恰好等于国内需要的追加资源量，这样才能使国内的经济结构达到平衡，使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相等，实现均衡的经济发展。如果不做计划，盲目地引进外资，会造成或者因进口过少而储蓄缺口不能填补，或因进口过多而使储蓄过多形成浪费。这表明，在引进外资中，国家的调节是必不可少的。这种调节不仅表现在制订引进外资的计划上，而且反映在对外资的分配、管理、控制，对汇率的调整，对有关法规的制订，对税收政策的执行等方面。

第四，它揭示了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外资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从长远来看，一个国家不能永远依赖引进外资来发展经济。两缺口模式表明，发展中国家应当有效地利用外资来发展国内生产、增加出口，提高国内储蓄能力，充分利用国内资源，以使两个缺口自然而然地实现平衡，消除它们对经济发展的约束，最终实现逐步地减少直至取消国外援助，依靠自己经济内部的力量来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闭关自守、自给自足、不需要外援和外贸）。不言而喻，要达到这个目标应当进行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使经济体制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使经济结构能够形成自动调整、实现均衡的功能。如果不进行这些改革，那么，将有可能产生永久性的对外资的依赖，两个缺口也将继续存在，并进而产生债务偿还、国际收支不平衡等问题，使经济发展受到新的阻碍。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两缺口模式的政策含义：其一，应积极地利用国外资源。其二，国家应调节引进外资的活动，制订相应的引进外资计划。其三，国家应采取适当的措施来调节外资的流向、结构、有效使用，控制诸如跨国公司之类机构在本国的活动。其四，应当尽快进行经济改革，改变现存的经济结构。

#### **（四）两缺口模式不足**

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两缺口模式的理论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但它本身也存

在着一些问题：

(1) 它使用的总量分析方法，虽然可以说明需要从国外引进的资源总量，但由于缺乏对国外资源结构的具体分析，因而无法说明国内需要的特殊的资源量，也就是说无法确定到底需要进口什么样的资源，对特定资源的需要进口量到底是多少。

(2) 它强调了利用国外资源的必要性，却忽视了挖掘国内资源来填补两个缺口的潜在力量。

(3) 它没有说明一个国家的借债能力和偿债能力，如果发生理解上的错误，很容易产生对外资的依赖性，并产生借债过多、债务负担过重、债务偿还困难等一系列问题。

(4) 它过分强调了资本形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有可能导致人们忽视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开发、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结构与体制的改善等因素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5) 它只看到了引进外资、利用跨国公司等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忽视了外资、外援、跨国公司等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

(6) 它认为储蓄（投资）缺口、技术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阶段性的、继起性的，但事实表明，这些缺口常常是同时并存的。但大多数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总的来说，两缺口模式对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仍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

### 三、扩展的两缺口模式

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提出两缺口模式后，引起了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广泛兴趣，有人对它提出了批评，有人根据这些批评和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对它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并据此构建了一个外援在经济发展过渡时期作用的基本模式，来说明外援的作用和评价发展中国家的当前绩效。

#### (一) 基本假设

首先只考虑存在两种资源（技能和储蓄）限制的情形，这种情形被描述为投资限制的增长。然后研究国际收支存在时自我持续增长的可能性，这种情形被称为贸易限制的增长。

假设模式的主要内生变量（下标表示年份）为：

$V_t$  = 国民生产总值

$I_t$  = 总投资

$S_t$  = 国内总储蓄

$\bar{S}_t$  = 潜在的国内总储蓄

$M_t$  = 产品与服务的进口

$\bar{M}_t$  = 必要的产品与服务的进口

$E_t$  = 产品与服务的出口

$F_t$  = 外资的净流入

$C_t$  = 消费

假设模式的主要参数为:

$\bar{r}$  = GNP 的目标增长率

$r_t$  =  $t$  年 GNP 的增长率

$a'$  = 边际储蓄率 ( $\partial \bar{S} / \partial V$ )

$a_t$  =  $t$  年的平均储蓄率 ( $S_t / V_t$ )

$\beta$  = 最大投资增长率

$k$  = 增量总资本—产出比 ( $I / \partial V$ )

$\mu'$  = 边际进口率 ( $\partial \bar{M} / \partial V$ )

$\mu_t$  =  $t$  年的平均进口率 ( $M_t / V_t$ )

$\phi_t$  =  $t$  年的外资流入占 GNP 的比例 ( $F_t / V_t$ )

$\epsilon$  = 出口增长率

## (二) 投资限制的增长

假定国际收支一开始并不构成一个限制要素, 自我持续的增长能够通过利用外援填补投资能力和储蓄能力缺口而实现。其经济结构如下:

定义:

$$V_t = S_t + C_t \quad (6)$$

$$S_t = I_t - F_t \quad (7)$$

能力限制:

$$V_t \leq V_0 + \frac{1}{k} \sum_{\tau=0}^{t-1} I_\tau, \text{ 其中, } k = \frac{I_{t-1}}{V_t - V_{t-1}} \quad (8)$$

投资限制:

$$I_t \leq (1 + \beta) I_{t-1} \quad (9)$$

储蓄限制:

$$S_t \leq \bar{S} = S_0 + a' (V_t - V_0) \quad (10)$$

目标增长率:

$$V_t \leq (1 + \bar{r}) V_{t-1} \quad (11)$$

能力限制是以哈罗德—多马模式为基础的。投资能力的限制源于这样的考虑: 任一阶段额外投资的吸收能力是受到互补性投入的供给限制的, 而这些投入只能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增加。技能限制表示, 为了增加生产性投资, 管理者、熟练劳动者和公务员的技能形成是必不可少的。储蓄限制不仅包括边际储蓄倾向, 而且包括政府通过税收结构变化和其他政策增加总储蓄的能力。为此, 把储蓄限制作为国民生产总值(和时间)的函数, 而不是人均收入的函数。目标增长率反映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的把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定增长率作为主要目标的惯例, 而且目标增长率或投资不能无限期超过储蓄。

为了完成这一体系, 首先, 假设外援是相当有限, 或相当昂贵的, 使受援国不愿意或不可能仅仅为了增加消费而牺牲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定增长, 并进而增加外援; 其次, 假设在目标增长率达到之前, 努力使该国的消费最大。

投资限制的增长模式包含 6 个限定条件和 5 个变量。在上述假定下，缺乏通过减少储蓄来建立超额生产能力或增加外援的积极性，由此 (3) 和 (5) 式变成等式。如果投资率达到足够水平的話，则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首先受到投资能力的限制，然后受到目标增长率的限制。

在经济发展的前两个阶段，长期增长路径和外援的需求可通过解每个阶段  $V_t$  和  $F_t$ ，以及确定经济从第一阶段过渡到第二阶段的时点来描述。

第一阶段是以一个每年不变的投资增长率 ( $\beta$ ) 和 GNP 的加速增长率为特征的。根据方程 (8) 和 (9) 能够确定每时期投资的增量是 GNP 的增量的一个不变的比例 ( $\beta k$ )。从该体系解出流入的资本水平，可得：

$$F_t = F_0 + (\beta k - \alpha') (V_t - V_0) \quad (12)$$

其中， $F_0 = I_0 - S_0$ 。这个方程表明，国外资本 ( $F_t - F_0$ ) 按投资增量和储蓄增量之间的差额提供资金。没有资本流入的增加，具有  $k$  和  $\alpha'$  的中间值的国家年投资增长率大约是 5%。要达到 10% 的投资增长率则要求在第一阶段增加的投资的一半由国外资本提供。国外的援助填补投资与储蓄的缺口，促进了更高的增长率。

当投资达到足以维持目标增长率水平时，第一阶段就在  $m$  年结束了：

$$I_m = \bar{r} k V \quad (13)$$

用这个值代替第一阶段方程中的投资，得到最后一年 GNP 的值：

$$V_m = V_0 \frac{(\beta - r_0)}{(\beta - \bar{r}_m)} \quad (14)$$

假若投资每年以 10% 的速度增长，则为了在第 11 年维持 6% 的增长目标，具有  $k$  和  $\alpha'$  中间值国家无须外援就可以把投资率从 12% 增加到 21%。

$$\frac{I_m}{I_0} = (1 + \beta)^m = \frac{\bar{r} (\beta - r_0)}{r_0 (\beta - \bar{r})} \quad (15)$$

其中， $r_0 = I_0 / k V_0$ ， $\bar{r} = \bar{r}_m$ 。

GNP 和投资以不变比率增长，而外援是由  $k \bar{r}$  和  $\alpha_t$  之间的差额确定的。从该体系中求出增长率，得到一个修正的哈罗德—多马方程式：

$$r_t = \frac{\alpha_t + \phi}{k} \quad (16)$$

公式中，

$$\alpha_t = (\alpha_0 - \alpha') \frac{V_0}{V_t} + \alpha', \quad \phi_t = \frac{F_t}{V_t}$$

为了减少资本流入，边际储蓄率  $\alpha'$  必须超过增长目标所要求的投资  $k \bar{r}$ 。假若这一条件得到满足，则当储蓄率上升到足以消除资本流入时，就可以从这个体系中解出  $\rho$  年的 GNP 增长率：

$$V_\rho = \frac{(\alpha' - \alpha_m)}{(\alpha' - k \bar{r}')} V_m \quad (17)$$

### (三) 贸易限制的增长



资本流入变化的增长过程要求进口连续的调整,以使得贸易缺口与合意的投资和储蓄缺口相等。

贸易限制能够以类似于储蓄—投资限制的形式合并到上述模式中去。假设在  $t$  时期维持既定的 GNP 水平所需的最低进口水平为  $(\bar{M}_t)$ , 它类似于方程 (8) 的生产能力要求。这个进口要求源于对当前进口的大部分制造品的需求的无弹性。这个要求可表述如下:

$$\bar{M}_t \geq \bar{M}_0 = \mu' (V_t - V_0) \quad (18)$$

这里,最低的边际进口率  $\mu'$  可能是作为不同需求构成的增量比例的平均数而获得的。

任一时点上的现有经济结构限制了出口收入的增长。因为许多初级产品的出口收入主要取决于需求条件,因此,出口的迅速增加一般要求新的出口产品的开发,而这又受到生产能力以及组织和制度因素的限制。而政府增加出口政策的影响可在下面有关出口限制的表达式中用参数  $\epsilon$  来概括:

$$E_t = E_0 (1 + \epsilon)' \quad (19)$$

综合的贸易限制是由这个要求——资本流入至少要达到足以填补进口需要与出口收入之间的最低缺口  $F_t^m$ ——来表达的,其表达式如下:

$$F_t \geq F_t^m = \bar{M}_t - E_t \quad (20)$$

如果由方程 (7) 的储蓄—投资缺口决定的资本流入大于最低的贸易缺口,通过让进口超过特定的最低量或出口低于方程 (19) 假定的最大量,两个缺口就能够相等。但是,当最低贸易缺口更大时,它就会控制 GNP 的增长率和资本的流入。在这种情形下,不是储蓄跌到方程 (10) 规定的储蓄潜力以下,就是生产性的投资减少。在任何一种情形下,储蓄限制都没有约束力。

从理论上说,贸易限制无论在第一阶段还是在第二阶段,都可以代替储蓄限制作为资本流入的决定因素。从经验上看,这种情况在第二阶段发生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扩大的资本流入通常不要求出口与进口增长一样快。但是,一旦 GNP 的目标增长率达到了,由于外援减少,出口就必须比进口更快地增长。

在经济发展的第三阶段,不等式 (8)、(11) 和 (20) 变成等式,而限制 (9) 和 (10) 则是多余的了。对于既定的目标增长率,GNP 像在第二阶段一样是由方程 (11) 式决定的;资本流入是由 (20) 式决定,并且超过储蓄缺口所需的数量。为了减少资本流入,或者使出口增长超过 GNP 的目标增长率,或者使边际进口率大大少于最初的平均数,在经济发展的既定阶段 ( $q-j$ ) 内,求解方程 (18) 和 (19) 的结构参数,可导出贸易缺口消除的条件:

$$\frac{E_j}{M_j} (1 + \epsilon)^{q-j} - \frac{\mu'}{\mu_j} (1 + r)^{q-j} \geq (1 - \frac{\mu'}{\mu_j}) \quad (21)$$

在上述模式的假定下,一个给定的年份中填补较大缺口所需的外部资源数量要小于较小缺口的数量。与该经济的最低需要量相比,第二阶段有一个进口剩余 ( $M > \bar{M}$ ), 或者在第三阶段有一个潜在的储蓄损失 ( $S < \bar{S}$ )。一个更好的协调发展政策将致力于用

投资代替进口的办法来减少必需的资本流入，或者反之亦然，最终使两个缺口在长期达到事前相等。<sup>①</sup>

#### 四、“三缺口”和“四缺口”模式

钱纳里和斯特劳特在论述外援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曾经指出：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技术约束的发展阶段、储蓄（投资）约束的发展阶段和外汇（外贸）约束的发展阶段，并认为这三个阶段是先后继起的。但他们重点考察的是后两个阶段，因而称做“两缺口”模式。后来，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如赫尔希曼）认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资本稀缺固然重要，但这不是最关键的约束。最关键的约束条件是发展中国家技术的缺乏，主要表现在缺少必要的技术知识、管理和企业家的才能。为此他们指出，在经济发展中，除了储蓄和外汇这两个缺口外，还存在着第三个缺口，即技术、管理和企业家方面的缺口。从现实来看，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源尚无能力填补第三个缺口，因而也必须用引进国外资源来填补它。具体策略是：在引进外资中实行“一揽子”的资源进口计划，即在引进外资的同时，注重对国外的适宜技术、管理知识和人才等软件的配套引进，使进口的资源能得到有效而充分的利用。

在“三缺口”模式的基础上，有些发展经济学家又提出了“四缺口”模式，即增加一个“税收缺口”。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国家进行干预，表现为实行经济计划。而经济计划的实施主要靠政府的财政支出来推动。但对比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来说，现有的政府税收计划目标与实际税收之间存在着差距即“税收缺口”。因此，政府要顺利实现经济发展计划，必须向跨国公司等外资企业的利润征税，并在金融上积极参与外资企业在当地的生产经营活动，通过征税、入股经营、财政参与等形式，为政府筹集公共金融资源，填补税收缺口，支持政府在发展计划方面的投入。

### 第二节 利用国外资源的利弊分析

从理论上讲，利用国外资源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解除国内资源不足的约束，推动经济迅速发展。但在实践上，引进国外资源的作用是双重的，即一方面有利，一方面有弊。本节我们将从资源引进国的立场来分析这些问题。

在本章第一节中已经提到，发展中国家利用国外资源的形式或来源主要分为国际组织的援助、国外的官方发展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 ODA）和私人投资（private investment）三大类。前两大类都具有让与条件，它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一般是积极的，负作用较少。因而利用国外资源的利弊分析主要集中在后一种上。国外私人投资通常分为证券投资（portfolio investment）、直接投资（direct investment）和跨国公司投资

<sup>①</sup> 由于资本是耐久性的，在短期使两个缺口相等可能是无效的，特别是当一开始就有严重的不均衡时就更是如此。

(MNC<sub>s</sub> investment) 三种。从国外私人投资的来源上看, 证券投资和直接投资主要来源于国外的跨国公司(所占比重最大)。因此, 我们以跨国公司为例来说明利用外资的利弊。

## 一、利用外资的利益

(1) 引进外资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填补储蓄缺口, 解决由于进口大于出口造成的国际收支逆差问题。

(2) 从国外获得国内生产急需的特殊的商品和劳务(主要是资本品、中间产品、原材料等)。

(3) 从国外获得可以提高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技术、新的生产方法, 以增强国内提高产出水平的能力。

(4) 通过采用国外的生产方法、程序, 促进国内的技术创新, 创造出适用于国内的适宜技术。

(5) 弥补国内技术、管理、企业家才能方面的不足, 培养自己的企业家阶层。

(6) 通过将外资企业的辅助性产业(如零件加工厂、修配厂)转包给当地的企业, 培育国内企业家; 并通过这种转包活动为国内产业创造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

(7) 通过外资企业的活动, 建立国内同海外的银行、市场的联系, 并从海外获得新的资源供给。

(8) 利用外资企业的资金和条件来培训国内的劳动力、技术人员、管理工作。

(9) 通过外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扩大国内就业, 尤其是熟练工人的就业。

(10) 从跨国公司等外资企业的利润收入中征收税收, 增加国库收入。

(11) 通过消除国内在自由贸易、要素流动方面的障碍, 来促进要素的合理流动, 发展国内各地区之间、国内与国外之间的贸易,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12) 通过外资企业的发展, 促进国内生产的专业化, 形成规模经济, 提高社会获利能力, 以迅速增加国民收入。

## 二、利用外资的弊端

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根据发展中国家利用国外资源的实践认为, 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 既有利益也有代价, 尤其是一些激进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 利用外资的弊要大于利, 这些不利的方面对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副作用, 其主要表现是:

(1) 大量引进外资造成了对国外资源的技术依赖, 以致国内技术创新的势头减弱。

(2) 外资企业的技术专利制度、工业技术保密制度和禁止向附属企业(如地方企业)无偿转让技术的种种制度, 限制了科学技术向资本输入国国内的转移, 强化了国内企业之间、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封锁, 从而阻碍了国内技术进步与生产方法的变革, 并减弱了国内企业的竞争力。例如可口可乐公司宁愿在印度建厂生产可口可乐, 也不愿让给印度制造可口可乐的配方。

(3) 技术的畸形发展使先进的工业生产方法和技术集中于外资企业, 拉大了地方企

业与外资企业在这方面的差距。

(4) 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顾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引进了不适宜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产品和生产方式。比如，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子公司，往往引进资本密集型设备，生产资本密集、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不仅无助于增加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反而增加了其失业。

(5) 引进国外资源时，由于外国人士、外资企业工人、技术管理等人员的消费方式的示范效应，对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消费方式、消费结构发生了不利影响，使人们为模仿外国的消费方式而产生消费早熟现象。这不仅会导致发展中国家消费结构畸形发展，而且会影响其积累与消费的比例，进而影响资本形成率的提高。

(6) 跨国公司企业的就业和产品主要是为国内的某些富有阶层和特权阶层服务的，这就使引进外资的利益大部分为这些富有者获取，普通老百姓受惠极少，因而外资企业的发展加剧了国内收入分配不均。同时，外资企业一般建立在沿海地区或大城市，这种畸形的发展会引起城乡、地区发展的不平衡。

(7) 跨国公司不仅通过关税减免、土地租价低和劳动工资低廉等得到了投资优惠，而且还利用偷税漏税、贿赂当地政府官员、低报利润、虚报成本、高估（从附属企业购买的）投入价格、低估（卖给外国的）产出价格、转移作价（transfer pricing）等非法手段来获取不正当的收入，使外资企业所得利润超过东道国的社会收益。尤其是私人外资企业往往将很大一部分所得利润汇出国外，使这些资金无法用于进一步发展东道国的经济。

(8) 外资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不使用东道国的已有资源，而是从外国或母公司购进资本品、中间产品、原材料等投入，这些进口投入不仅价格高，而且需用外汇购买。这样，外资企业的发展使东道国的国内资源得不到开发，扩大了东道国的外汇缺口和国际收支逆差，并且还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东道国对国外资源的依赖。

(9) 跨国公司虽能提供一定的税收来增加东道国政府的税收，但东道国为跨国公司企业提供种种优惠，以及跨国公司的种种违法获利行为，却大大减少了东道国的国库收入，甚至还迫使东道国政府更多地支付财政支出。

(10) 过多的外国资本引进会减弱东道国的储蓄能力，加重其债务负担。跨国公司的投资虽然增加了东道国的储蓄和投资，但由于它抑制了东道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尤其是资本品和中间产品工业的发展，反而会降低东道国国内的收入水平和储蓄能力；另一方面，过多的债务加重了东道国的负担，使其每年不得不拿出相当部分的储蓄用于支付外债，这就会减少国内的储蓄与投资，阻碍经济进一步发展。

(11) 如果引进外资的结构不合理、外资在国内各部门的投资分布不适当，还会引起东道国经济结构、产品结构失衡，造成市场价格的扭曲。

(12) 某些跨国公司或国外的官方援助往往依据其强大力量或优惠条件，对东道国的经济、政治施加种种影响，干预、控制东道国的政策制订和实施，甚至进行颠覆政府的活动。

针对上述问题，一些激进的经济学家如阿明、海默（Hymer, S.H.）、乔苏道夫斯

基 (Chosoudovsky, M.) 等人, 尖锐地批判“两缺口”模式等理论, 认为引进外资的弊大于利, 不利于经济发展, 因而主张停止利用外资, 发出了“要外贸不要外援”的呼声, 甚至提出了切断“南北经济关系”的极端建议。但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认为, 只要采取适当的措施, 引进外资的利还是要大于弊, 因而不能因噎废食, 而应兴利除弊, 积极、稳妥地利用外资。缪勒等人还根据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实证分析指出, 拉美一些国家的国内总投资中, 外资所占比重达到 17% 左右, 这些外资对推动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 第三节 利用国外资源的战略与策略

#### 一、利用国外资源的规模和标准

利用国外资源可以解决国内资源的缺口, 促进经济发展。但是, 若引进的国外资源过少, 则不能填满这些缺口; 若引进的过多, 会超过国内经济所能承受的能力。那么引进多少资源才是适度的呢? 这就涉及一国引进外资的能力、规模和标准问题, 这也是进入 80 年代以来发展经济学关注的一个重大问题。

##### (一) 引进外资的能力和适度规模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 一国引进外资的能力和规模, 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 债务负担。债务负担是判定一个国家借债与还债能力、外债规模是否适当的重要指标, 通常用一国在一定时期的外债总额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根据定义, 除无偿赠予的国际援助外, 一切从国外借入的资本都必须到期还本付息, 也就是说债务国每年必须拿出一定的国民生产总值来支付到期的外债 (本金加利息)。这就在客观上为债务国规定了一个引进外资的限制额度, 要求它必须根据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小来确定引进外资的适度规模。如果引进外资的规模过大, 外债在 GNP 中所占比例太高, 表明借债的数量超过了国内经济的承受能力, 就需要作出调整。至于外债在 GNP 中所占比例多大为宜, 因涉及因素太多, 无法具体规定。但有一个基本原则应当遵从, 即到期的债务量应小于 GNP 增长后提供的国内储蓄量。只有 GNP 增加了并提供了足够的追加储蓄, 才能在偿还到期债务后有较过去多的储蓄来支持投资增加和经济增长, 否则就会减慢经济增长。

(2) 外资的利用效率。引进外资能否带动经济增长, 关键在于这笔外资能否得到有效、充分地使用。如果一国能够高效益地使用外资, 则外资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而且可以增强其偿债能力。关于外资利用效率, 通常用债务在 GNP 中比重的变化来衡量。在一定时期内, 如果债务在 GNP 中的比重逐渐变小, 表明外资利用效率高, 偿债能力增强了。反之, 如果这一比重上升了, 表明外资利用效率不高, 偿债能力减弱了, 经济增长是靠更多的外资来推动的, 外资的规模已偏大。因此, 外资在 GNP 中比重的变化, 也是决定引进外资规模的因素。

(3) 偿债比率 (debt - service ratio)。即到期还本付息的债务在债务总额中的比率。这也是衡量一国的偿债能力与债务规模的指标。一般认为这一比率保持在 15% ~ 20% 为宜。25% 是其“警戒线”。如果超过这一额度, 就被认为是外债规模过大, 债务负担过多, 借入的外债超过了偿还能力, 会由此影响经济增长的速度。

(4) 偿债能力。一般用当年还本付息的债务额与出口收入的比率来衡量。因为外债通常需要用外汇来偿付, 而外汇收入主要来源于出口。因此, 出口量和出口收入的大小就成为制约一国借债规模、决定一国偿债能力的主要因素。实践证明, 当年还本付息的债务与出口收入的比率保持在 20% (即占 20% 的比例) 为宜。超出这一比例, 将会产生债务偿还上的困难, 影响一国国际收支的平衡, 并进而引起外汇更加短缺, 经济增长依赖于更多的外债来推动等不良情况。

除上述因素和指标外, 还可以用一国的人均债务量 (债务总额除以人口总数) 等指标来衡量外债规模、债务负担和偿债能力。在经济统计中, 联合国等国际机构通常采用上述指标来反映一国的引进外资和外债情况。

瑟尔沃尔还提出了一个“警戒利息率”公式来判定一国的借债规模和能力<sup>①</sup>:

$$i = \frac{r (s_0 - s')}{s_0 - cr} \quad (22)$$

$i$  代表“临界利息率” (the critical rate of interest),  $r$  为合意的增长率 (the desired growth rate),  $s_0$  为初始的储蓄率 (the initial saving rate),  $s'$  是边际储蓄率,  $c$  是资本—产出比率。

这个公式表明: 如果临界利息率超过了偿债比率, 就是债务规模不适当, 说明借债过多, 超过了偿还能力, 不宜再借新债。

发展经济学家认为, 一国的借债能力不仅取决于现有的国内产出、出口水平和引进外资量, 而且还要考虑未来的外资流入以及为新增外债所支付的债务, 即对新的资本流入的偿付能力。他们指出, 在这种情况下, 外资的偿还率必须低于投资增长率, 如果前者高于后者, 就会产生偿还贷款量超过新流入的贷款量的不利情况。同时, 如果新的资本流入不能弥补因偿还债务而造成的国内储蓄的减少, 产出增长率就会下降。这一分析的政策含义是: 发展中国家要减轻债务偿还负担, 不应采用削减投资的方法, 而应尽量设法降低外债利息额, 或者选择用本国货币 (或商品) 来支付外债的办法。

## (二) 有效地利用外资的标准

在研究一国引进外资的规模时, 还应当确定正确的利用外资的标准。这个标准是根据经济发展的计划和引进外资的目标来确定的。

(1) 增值标准。评价外资作用, 测定外资适度规模的最简单的标准是看这笔外资所产生的价值增值量大小。如果引进的外资的使用直接或间接地导致了所有部门总产出的增值量增加大于外国投资者或母公司从该企业得到的利益, 即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 那么这种外资的使用就是有益的, 外资的规模也是适宜的。这一标准的好处是从总体

<sup>①</sup> 瑟尔沃尔. 增长与发展. 英文版. 1984. 299

的、动态的过程中来考察外资的实际效益，避开了收入分配等复杂问题。

(2) 外资企业所获利润在东道国的再投资率。对于外国私人投资者来说，他们在发展中国家投资的目的主要是获取利润，即希望这笔投资的总收益（本金加利息或利润）超过原始投资。因此，利用外资中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外国投资者获得的利润率多高、是否将利润汇出国外，而在于它们所获利润中有多少用于对东道国进行再投资，用追加投资来扩大生产。从事出口生产的外资企业从国外销售中得到的是外汇收入，如果它们将其中适当的比例用于对当地外资企业进行追加投资，并保持一定的利润再投资率，那么这种外资就可以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反之则会影响经济发展。与此同时，外资企业通常要把外汇收入的一部分卖给东道国政府，即将外汇兑换成当地货币来支付外资企业的工人工资、原材料等投入支出、纳税等。这样，只要东道国政府能够使外商卖给本国的外汇达到最佳水平，这笔外资就算是有益的。

(3) 国际收支平衡标准。如果外资企业生产的产品主要在国内销售，那么这笔外资的利用就应当充分考虑债务偿还问题，以解决国际收支方面可能出现的困难。这就要求，外资企业乃至整个经济必须要有足够的生产能力以增加出口，或者，设法使外资企业在生产中尽量多使用国内的劳动力、原材料和一部分设备，以逐步减少进口，使出口的收入能够抵偿外债或汇出的利润。

(4) 投入国产化标准。外资利用是否成功，很重要的一个标准是看外资企业在生产中使用国产的原材料、中间产品、劳动力等投入的比重。如果对国产投入使用的比重逐渐增大，可以帮助东道国开发国内资源，增加就业，并且可以逐渐减轻外汇压力和债务负担，直至最终还清外债，实现全部产品的国产化。

## 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及其对策

从国外引进资本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债务问题。进入 80 年代后，债务问题日益严重。高额债务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许多新的问题，甚至对经济发展起到了负效应，以致有人将 80 年代的债务问题形容为“债务危机”。可以用有关债务负担的一些指标来说明这个问题。

偿债比率：一般认为，这一比率应在 15% ~ 20%。但在 1980 年 ~ 1986 年，90 个发展中国家这一比率的平均数值分别为 16%、17.5%、20.6%、19.4%、19.5%、21.4%、22.3%<sup>①</sup>，不但超出了通常的数值范围，而且超过了 20%，接近 25% 的“警戒线”。

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1980 年 ~ 1986 年，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率分别为 20.6%、22.4%、26.3%、31.4%、33%、35.8%、35.4%。有些国家的这一比率甚至达到近 50%，如 1985 年，巴西为 43.8%、阿根廷为 56.9%、墨西哥为 52.8%、马来西亚为 62%<sup>②</sup>。

到期债务与出口的比率：一般认为这一指标应保持在 20% 以内为宜，超出 20% 就

① 世界银行，1987 年世界发展报告，18（1986 年为估计数）

② 世界银行，1987 年世界发展报告，237

是债务负担过重或超过了偿（借）债能力，会产生国际收支严重不平衡等问题。但在1980年～1986年7年间，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指标分别高达90%、98%、117.6%、134.8%、121.2%、143.7%、144.5%，大大超过了警戒指标。

偿债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1980年～1986年，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指标分别为3.7%、4%、4.6%、4.5%、4.9%、5.3%、5.5%<sup>①</sup>。

关于债务负担的大小和债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发展经济学家们持不同的看法。纳夫齐格尔等人认为，债务的多少并不能成为判断一国利用外资是有利还是有弊的标准，债务负担重并不见得就一定会阻碍经济发展。他根据统计资料说明：发展中国家总债务的78%分布在中等收入国家，而这些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却是很突出的，其中有许多已成为“半工业化国家（地区）”或“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如韩国，在1970年，它的债务额为18亿美元，到1979年，其债务已高达150亿美元。但在这期间，它的经济增长率很高，出口扩大异常迅速，这使韩国的偿债能力极大地提高了<sup>②</sup>。

但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坚持认为，从发展中国家总体来看，过重的债务负担已经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发展，成为一个有潜在隐患的“债务炸弹”（debt bomb）。债务负担阻碍经济发展主要表现在：引起了国际收支严重逆差；产生了更为严重的外汇短缺，外汇短缺影响了进口，阻碍了国内进口替代工业和出口的发展，出口增长缓慢又加重了外汇支付压力；造成了国内储蓄不足，投资减少，减低了经济增长速度；人均外债量急剧上升（有的国家人均债务高达上万美元），导致人均收入、经济福利水平下降；影响了进一步借债的信誉，使经济发展不能得到充足的国外资源流入；减少了政府收入和支出，降低了政府的投资率；等等。

为此，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建议，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各种措施来对付债务危机，扭转被动局面，以较好地利用外资来发展经济。这些建议主要有（其中很多已被实施）：

（1）大力发展出口产品生产，扩大出口，增加出口收入，以增强偿债能力，减轻外汇、国际支付的压力。

（2）调整引进外资的结构和数量，提高外资利用的效率。发展中国家应将引进外资主要用于出口创汇部门，减少其他部门的外资引进，并根据经济能力适当减少外资引进数量，以减轻债务负担。

（3）提高国内储蓄率，增加国内的资本形成，减少对外资的依赖，使储蓄缺口以国内储蓄填补为主。

（4）调整引进外资的来源，谋求外资来源多元化，增加有让与条件的国际援助，减少按市场利率计息的私人国外贷款。

（5）发展中国家联合起来采取国际行动，扩大向发达国家市场的出口，并采取一致行动提高农产品、初级产品的出口价格，以增加出口收入。

（6）敦促国际金融机构采取有力措施，帮助发展中国家解除债务负担。

① 世界银行，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18

② 纳夫齐格尔，发展中国的经济学，英文版，1984，411



(7) 与发达国家重新谈判债务偿还条件。如要求债权国(人)降低贷款利息、延长偿还期、增加用债务国货币支付的外债的比例、利用债务国的产品与劳务等实物来偿还债务等。在特殊情况下,还应要求债权国增加对债务国的(优惠)贷款,帮助债务国发展生产和出口,提高偿债能力。

(8) 征用一部分跨国公司的外资企业。如将一些大型的、重要的外资企业收归本国所有,或用股票收买下来,实行国有化。

(9) 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使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有利于发展中国家。

(10) 组建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多国公司、国际的或区域性的金融机构,通过“南南合作”、共同努力、一致行动来帮助自身克服债务危机等困难,促进自己总体的发展。

### 三、对跨国公司的利用与控制

发展中国家在利用国外资源中,有很大一部分外资来自跨国公司的投资。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建厂、经营等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当地的生产和出口发展,给东道国带来了一定的社会收益。但跨国公司的活动主要是出于盈利动机,甚至还有政治、军事动机,因而也会给东道国带来一些麻烦,产生不利影响。比如偷税漏税、货币投机、利润大部分汇出国外、转移作价、高报成本低报收入、贿赂官员、引用了不适宜技术、引起了收入分配不均等问题。更重要的是,有些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子公司规模过大,势力过强,不仅在生产、经营上形成了垄断,限制了当地企业的发展,而且对东道国的政府、政策、政治活动形成了巨大影响甚至有控制力。在一些小国,跨国公司的规模甚至超过了当地政府的规模,形成一种东道国无法控制的力量。为此,发展经济学家对跨国公司的作用从一开始就有异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1976年1月号发表的一篇文章用尖锐的笔触、辛辣的口吻描述了人们对跨国公司的矛盾看法:

“它伪造账目。它逃避税收。它操纵着所属公司间的转移作价。它由外国人经营,并由几千里外的中心做出决策。它引进了外国劳动习俗。它没有引进外国劳动习俗。它支付的工资太高了。它支付的工资太低了。它不公平地同当地公司竞争。它与当地公司合伙同谋。它从富裕国家外流就业机会。它是富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它带到第三世界的技术是过时的。不,是太现代化了。它干涉别国事务。它行贿。没有人能管得住它。它破坏了国际收支平衡。它无视经济政策。它在各国政府之间挑拨离间,以获取最大的投资利润。它不乐意前来投资吗?最好让它滚回去。”<sup>①</sup>

这种描述生动而形象地说明了跨国公司的活动,它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对跨国公司作用看法的矛盾,另一方面却反映了真实情况。如跨国公司企业支付给当地工人的工资,说它太高了,是因为它高于当地企业工人的工资水平,引起了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均;说它太低了,是因为它大大低于母公司企业和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在某种程度上获取了更多的工人剩余价值。说它采用的技术过时了,是因为一些跨国公司将本国的废、旧设备以进口投入的形式卖给东道国;说它采用的技术太现代化了,是因为一些跨国公司引

<sup>①</sup> 赫立克,金德尔伯格. 经济发展. 中译本. 1985. 362

进的资本密集型、高技术的设备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技术、管理跟不上或不配套，以及创造的就业机会过少等问题。这些问题和矛盾表明，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积极利用跨国公司的作用，同时也要严格控制其活动。

但是，对跨国公司的控制必须十分谨慎、细致，因为若控制措施不当，会起不到控制效果，或者吓跑了外国投资者。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对跨国公司的控制一般有四类措施。

(1) 履约情况监督：即根据跨国公司与东道国签订的协议，监督其经济活动的实际表现（实绩）。这些协议的内容通常包括：跨国公司的投资或子公司应当为当地创造较多的就业机会，吸收较多的劳动力就业；跨国公司的机器设备、生产方法较先进，要为东道国提供较高的技术水平，并且要能够对东道国有关劳动力、技术与管理人员提供技术培训条件；跨国公司的生产要以发展出口创汇产品为主，增强东道国的出口能力，提高出口收入水平；与此相联系，要能够增加东道国的外汇收入；等等。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允许跨国公司投资和建厂的初期，就应订立这样的协议，并在实践中不断检查和监督其执行情况。

(2) 控制跨国公司企业的利润汇出率。跨国公司的利润通常以外汇形式汇回母公司（母国），这不足为奇。但要适当控制其利润汇出率，使跨国公司的所得利润中有相当的比率用于在东道国进行再投资，以促进东道国经济进一步发展，并逐步消除外汇上的压力，缓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在协议中写明之外，还可以采取外汇管制措施，限制跨国公司利润汇出中的外汇比例，并要求跨国公司按东道国外汇价格（而不是国际市场价格）将国外销售中的外汇按一定比例卖给东道国的外汇管理当局（用于支付劳动力工资、税收、购买原材料等投入的费用等）。

(3) 制订“饱和法规”（Saturation Law）。即通过法律条文来控制跨国公司的产权、生产与经营活动。饱和法规规定，某些重要的跨国公司企业的产权必须有东道国入股，使东道国对这些企业拥有一定控制权，在必要的条件下，可以将这些企业收买下来收归国有。参股的形式有多种，如规定外资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如10年）将其产权交归东道国；或逐年向东道国交出一定比例的产权（如每年交出10%，10年交清）；或者由跨国公司企业每年将一部分股票卖给当地的政府或居民，到期卖完全部股票，由东道国收归国有。这种办法实质上是一种征用，实施中一定要谨慎小心，并且还应辅之以减免关税等措施，使外资企业不致感到损失太多。

在饱和法规中，还应包括劳工立法等。劳工立法应规定，外资企业应按大致合理的标准来支付工人的工资和津贴，并且应负责对招收的工人、技术与管理人员进行职业培训。防止外资企业过分压低工人工资等不正当行为。

在饱和法规中，东道国还应要求跨国公司在生产中多购买当地产品（原材料、中间产品、一般的设备等），并在协议中明确这一比例。这一方面有利于东道国控制跨国公司的活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减少外资企业生产中投入的进口，节约外汇，并起到开发本地资源的作用。

(4) 税收刺激（tax incentive）。即利用税收政策来控制跨国公司的活动。外资企业

一般都享有低税、减免税等优惠，为了控制外资企业的活动，使其有利于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可以通过调整税率、增减税种等手段来引导外资企业沿着东道国既定的方向发展。比如，对经营活动符合规定的企业给予减免税，对违法乱纪的企业课以重税；对出口创汇的企业给予税收优惠期（如某些企业3年内减免出口税）；对外资企业的汇出利润征收附加税；同时，对那些对东道国很有利的外资企业，东道国通过税收优惠，给予其在当地市场以一定的垄断权，如优先供给其原材料、能源，对其产品在当地销售中给予价格、销售量、营业税、所得税等方面的优惠等，鼓励其生产和经营（但也要适可而止）。

除上述主要措施外，还有其他一些控制手段。如利用进出口许可证制度来控制跨国公司的活动，对有利于东道国的进、出口发给许可证，对不利的进、出口不发给许可证；还有要求跨国公司企业提供有关经济活动的详细说明书、报告等办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制订一些法规，禁止外资企业利用行贿活动进行违法乱纪活动。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外资企业利润丰厚，出于追求高额利润的动机，它们可以用金钱或产品来贿赂、收买重要的政府官员，而当地的体制和文化水准又允许或默许这种收入的存在（即使不允许也实际存在受贿）。行贿受贿不仅使外资企业的违法行为有机可乘，而且腐蚀了当地官员和一些人的灵魂，使他们放纵跨国公司的活动，并通过不正常的渠道肥了一部分特权人物，损害了广大人民的利益。更严重的是，某些跨国公司还通过贿赂对东道国的选举、政治活动施加影响，在政府中培育自己的代言人。为了根除这种情况，一些国际机构已经制订了外国投资者的行动法规，禁止进行行贿等不道德的活动。但发展中国家也应制订相应的法规，禁止外国投资者从事违法的、不道德的活动，并采取严厉措施打击这类活动。同时，对内也应采取严厉措施，保持政府为政清廉和执政公道。

# 第十一章 财政政策、金融制度与 经济发展

如果说在发达国家中，市场机制不能保证国民经济顺畅地运行，那么在发展中国家里，市场机制更不能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地成长，因为后者的市场机制更不完善。这就需要发展中国家政府积极参与经济活动。

实际上，在前面分析中，我们经常提到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政府对经济的参与主要是通过中央计划和各种政策手段来进行的。在有些国家中，政府也直接创办和管理企业。关于计划问题将在第十二章中考察，本章主要讨论政策问题。在发达国家中，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是政府调节经济的主要手段。同样，它们也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工具。

## 第一节 税收政策

财政政策包括税收政策和支出政策两个部分。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税收政策是实现经济目标的有力工具之一。

### 一、税收水平与结构

要认识税收政策与经济目标的关系，首先必须了解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水平与税收结构的一些特点。

#### (一) 税收水平

总的来看较不发达国家的税收水平，比较发达国家要低。世界银行税收问题专家维托·坦齐（Tanzi, Vito）对 1978 年～1983 年这一阶段 86 个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水平作了统计比较<sup>①</sup>。人均收入在 350 美元以下的 22 个国家总税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是

---

<sup>①</sup> 坦齐，发展中国家税收制度的数量特征。见：纽贝里，斯特恩编，发展中国家税收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268～313

12.9%，350 美元 ~ 849 美元的 21 个国家为 12.5%，850 美元 ~ 1 699 美元的 22 个国家为 18.16%，1 700 美元以上的 21 个国家为 22.75%。86 个国家平均总税人比例是 17.17%。

从表 11.1 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无论是 1980 年还是 1996 年，较低收入国家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都要低一些，而较高收入国家相应数字都要高一些。例如，1996 年，低收入国家的税人占 GDP 的比重只有 15.5%，中下收入国家和中上收入国家的比重分别为 17.5% 和 18.1%，而高收入国家则接近 30%。高收入国家的平均税收水平差不多是低收入国家的 2 倍。从长期来看，1996 年与 1980 年相比，除了低收入国家之外，其他收入组的税收水平都有程度不同的提高。

表 11.1 不同收入组国家中央政府财政收支占 GDP 的比重 (%)

国家组别	国家数	总收入占 GDP 的比重				总支出占 GDP 的比重			
		税收收入		非税收收入		经常性支出		资本性支出	
		1980 年	1996 年	1980 年	1996 年	1980 年	1996 年	1980 年	1996 年
低收入国家	8	16.6	15.5	1.9	2.6	19.0	17.8	6.6	5.2
中下收入国家	12	16.8	17.5	3.5	4.1	17.9	18.4	6.1	4.2
中上收入国家	9	17.9	18.1	6.0	5.1	20.4	22.9	4.1	2.7
高收入国家	12	23.5	29.8	2.9	2.9	28.7	34.6	2.0	1.7

资料来源：1998/1999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216

从以上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到，人均收入与税收水平存在着正比关系。这是由于，第一，随着经济的发展，累进税制导致税收基础增长在比例上大于收入的增长，也就是说，税收弹性趋向大于 1。第二，当收入增长时，国家一般变得更加城市化了，城市化本身导致对公共服务的更大需求，而与此同时，也促进了征税的便利。这样，城市化提高了对税人的需求和征税能力。事实上，在大多数国家中，国内税收的很大比例来自首都和大城市，而公共支出的大部分也使用在这些地区。

应当指出，税收水平决不仅仅取决于收入水平，否则就难以解释具有同样收入水平的国家为什么有不同的税收水平，同样也不能解释具有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为什么有相近的税收水平。一些研究表明，总税人比例也受其他因素影响，诸如经济的货币化和开放性、矿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除矿产外的出口比例、识字率和城市化程度等。此外，公共支出水平也是影响税收水平的一个重要因素。

## (二) 税收结构

在 86 个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统计资料基础上，坦齐对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结构的特点作了研究。他把税收结构分为所得税、国内产品与服务税、外贸税和其他税。

(1) 所得税。86 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所得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 5.5%，对总税人的比例是 28.7%。所得税比例与人均收入水平存在一定的正向关系。所得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 350 美元以下的国家中平均是 2.66%，350 美元 ~ 849 美元的

国家是 5.5%，850 美元 ~ 1 699 美元的国家是 5.75%，1 700 美元以上的国家是 8.08%。所得税对总税人的比例，各组国家分别是 19.68%、29.55%、30.29%、35.62%。

表 11.2 不同收入国家组中央政府各项税收占经常性收入总额的百分比 (%)

国家组别	国家数	所得税		社会保障税		国内产品税		国际贸易税		其他税	
		1981 年 ~ 1990 年	1991 年 ~ 1995 年	1981 年 ~ 1990 年	1991 年 ~ 1995 年	1981 年 ~ 1990 年	1991 年 ~ 1995 年	1981 年 ~ 1990 年	1991 年 ~ 1995 年	1981 年 ~ 1990 年	1991 年 ~ 1995 年
		低收入国家	19	22.1	19.5	6.3	7.0	27.1	32.5	29.2	25.5
中下收入国家	27	24.8	24.0	12.2	15.8	26.8	29.7	18.9	16.6	3.9	2.9
中上收入国家	13	22.3	21.7	14.6	17.9	31.3	34.6	13.2	10.0	3.3	3.1
高收入国家	17	31.7	30.2	29.2	29.7	25.6	25.3	2.9	1.8	2.0	2.3

资料来源：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196

从表 11.2 中也可以看出，从 80 年代到 90 年代，高收入国家的所得税所占比重一直比低收入国家要高。可见，收入水平越高，所得税就越重要。

所得税由个人所得税和公司所得税组成。上述 86 个国家全体个人所得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 1.9%，占总税人的比例是 10.3%。只有 6 个国家，个人所得税占总税人的比例超过了 1/4，而一半以上的国家，这种税收比例不到 10%。而在 1981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个人所得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 12%，对总税人的比例是 32.8%，美国这个比例甚至高达 2/3。这说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个人所得税不那么重要。但是，需要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所得边际税率并不比发达国家的低。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所得税水平如此低的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逃税、避税和免税比发达国家要严重得多。

公司所得税比个人所得税重要一些。在所有 86 个国家中，公司所得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 3.1%，占总税人比例为 16.5%。与之相对照，在 1981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的公司所得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有 2.8%，占总税人的比例是 7.8%。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所得税之所以相对重要些，是因为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它们的开掘与经营主要由少数几家大公司（在有些国家是跨国公司）进行。这些企业获得的利润丰厚，从而为政府提供了容易征收的主要税源。其次，征收公司所得税比征收个人所得税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

(2) 国内商品与服务税。在 86 个国家中，国内商品与服务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平均为 4.8%，对总税人的比例为 28%，与所得税比例相当。但从表 11.2 中看，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商品与服务税要比所得税在比重上高一些，而且在低收入国家中 1991 年 ~ 1995 年这个税所占比重高达 32.5%，发达国家中这个税比重要低一些。与所得税不同，国内商品与服务税比例与人均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关系。有一份资料表明，在 1980 年，20 个工业国家国内产品与劳务税占总税人的比例是 26%，15 个半工业化国家的这

个比例是 30.6%，55 个中等收入国家是 23.1%，而 14 个最不发达国家为 21.7%<sup>①</sup>。从表 11.2 中我们也没有看到国内商品与服务税比例与收入水平有什么关系。

国内商品与服务税包括普通销售税与特别产品税。综括 86 个国家，普通销售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是 2.1%，对总税入的比例为 11.7%。这个税种比个人所得税稍为重要些。由于许多商品和服务是免税的，而有些商品又容易逃税，所以，对于很多国家来说，进口品构成了这种税的主要基础。特产税与普通税的重要性差不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2%，对总税入的比例为 12%。特产税的征收对象往往是几种特殊的商品，最主要有烟草、酒和汽油。最重要的是汽油税，其次是酒税和烟草税。从 50 个国家的统计数字中得到，特产税的 43% 来自汽油，27% 来自酒，23% 来自于烟草，这三种产品构成总特产税的 73%<sup>②</sup>。在 9 个国家中，这三种产品税占该税的 90% 以上。

(3) 外贸税。在所有 86 个国家中，外贸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5.02%，占总税入的比例为 30.63%。从表 11.2 中可以看到，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外贸税是最重要的税种。表 11.2 还显示外贸税在低收入国家所占比例最高，在高收入国家所占比例最低；而且，90 年代与 80 年代相比，各个收入组的外贸税比重都下降了，表明随着经济发展，外贸税的重要性在下降。外贸税包括进口税和出口税。

进口税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税源。从 86 个国家的统计资料看，进口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高达 4.2%，对总税入的比例达 25%。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1/4 的税收收入来自进口税。进口税比例在低收入国家中最高，在高收入国家中最低。大约收入在 350 美元以下的 22 个国家进口税占总税入的比例是 30.14%，350 美元 ~ 849 美元的 21 个国家是 32.87%，1 700 美元以上的 21 个国家只有 13.01%。这表明进口税的重要性随着经济发展而减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高收入国家的进口税没有低收入国家重要。实际上，进口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人均收入 1 700 美元以上的国家比在低于 350 美元的国家要高得多。

进口税比例的变化和经济开放程度、国内产品与服务税的高低有密切联系。一个国家越是开放，对外贸易越发达，进口税比例就越高。当然，这个因素不能惟一地说明进口税比例的变化，如上所述，高收入国家比低收入国家更为开放。其次，对国内贸易税的依赖程度也是决定进口税比例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统计资料看，8 个进口税比例高的国家，其国内贸易税比例较低，而 8 个进口税比例低的国家，其国内贸易税比例较高。这种关系表明，国内贸易税与进口税具有替代性。这是因为，第一，低收入国家国内税收基础低，只能依靠进口税来弥补政府税入的不足。为了促进国内幼小工业的发展，通过高进口税实行贸易保护。另一方面，高收入国家的国内税源丰富，可以通过所得税和国内销售税来补偿政府支出，从而不需要严重依赖进口税。而且，为了实行贸易自由，政府有意地降低进口税率。第二，低收入国家商品经济不发达，对税收的管理又较差，因面对国内收入和商品征税较为困难，而进口货物比较集中，因此对进口税的征收较为

① 古德·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财政·英文版·1984·91

② 由于有些国家的有些产品税资料缺乏，实际所占比例肯定要高于 73%。

容易。

出口税在发展中国家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没有进口税那样重要。综括 86 个国家，出口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1.1%，占总税入的比例是 7%。出口税的重要性随着人均收入的上升而趋于下降。在人均收入不到 350 美元的国家里，出口税产生 11% 的总税入，而人均收入达到或超过 1 700 美元的国家，这个比例不到 3%。

这里所说的出口税不涉及跨国公司经营的石油和其他矿产品的出口，这些出口产品是作为公司收入来征税的，它们包括在公司利润税项目中。由于这个原因，出口税对大量出口农产品的国家是最重要的。在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极为分散，而且自给率较高，因此对农产品征税比较困难。一旦这些农产品远销国外，经过口岸，对它征税就容易得多了。

(4) 其他税。在发展中国家，还有两种税收值得提及，即社会保险税和财产税。坦齐把它们归于其他税一类。社会保险税在发展中国家并不重要，在 86 个国家中，这种税收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只有 1.15%，对总税入比例只有 7%，比个人所得税比例还低。社会保险税与人均收入水平表现为明显的相关关系。人均收入高的国家，社会保险税比例也高，反之则低。1980 年，社会保险税占总税入的比例，在 20 个发达国家中高达 25%，在 15 个半工业化国家是 13%，在 55 个中等收入国家是 4.1%，而在 14 个最不发达国家则只有 1.6%<sup>①</sup>。表 11.2 也展现了这样一种关系：在 1991 年~1995 年间，低收入国家的社会保险税所占比重只有 7.0%，中低收入国家是 15.8%，中高收入国家为 17.9%，而高收入国家则高达 29.2%。这种关系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工薪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和社会福利水平远比发达国家要低，当然，除了人均收入水平影响了这种税收水平之外，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也不小。实际上，表 11.2 中所包括的 76 个国家中，以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其社会保险税是相当高的，甚至比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要高。例如，1991 年~1995 年期间，罗马尼亚的社会保险税比重为 29.6%，保加利亚是 25.4%，白俄罗斯是 32.2%，俄罗斯是 33.6%，波兰是 24.7%，捷克是 38%。这些国家的收入水平都要比发达国家低得多。

统计资料表明，在收入、消费和财产三个税种中，财产税是最不重要的。在 86 个国家中，财产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只有 0.4%，占总税入的比例只有 2.5%，是所有税收中比例最小的。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财产集中程度比发达国家更高。这样低的财产税比例只能由政治因素和税收管理的无效率来说明。

## 二、税收与经济增长

如果说经济增长受资本积累的约束，那么，税收将如何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用于储蓄和投资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呢？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税收在这个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为公共投资筹集充足的资金，即公共储蓄；二是刺激私人企业把更多的收入用于投资，即私人储蓄。

<sup>①</sup> 占德，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财政，英文版，1984，91



### (一) 扩大公共储蓄的税收措施

扩大公共储蓄的主要手段是增加税收收入。如上所述，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税收水平是较低的。当然，税收基础薄弱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也要认识到，由于许多原因，发展中国家的税收潜力还没有充分地开发出来。在发展中国家中，增加税人一般可以采用如下措施：①在现行税收结构下提高税率；②颁布新税法开辟新的税源；③改善税收管理，提高征税效率；④改革现行税收结构。

在不改变现行税收基础的条件下，提高税率当然能够增加财政收入。问题是税率的提高是否可行，对增加税人的重要性如何，对经济活动有何影响以及如何防止逃税 (e-vade tax) 和避税 (avoid tax) 的发生。

就所得税而言，提高个人所得税率不是增加税人的有效办法。这是因为，第一，税人增加的幅度很小。在低收入国家，甚至中等收入国家中，个人所得税的征税对象只占人口极小的一个部分。在 70 年代初期，除了缅甸、肯尼亚、土耳其等少数国家外，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只涉及到不超过 2% 的人口。与此相比，1980 年，美国大约有 50% 的人口缴纳个人所得税。所以，即使发展中国家能够把个人所得税率提高，所增加的税人也是十分有限的。前面提到，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占总税人的比例只有 10.3%，因此，个人所得税率平均提高 10%，总税人也不过只提高 1%。第二，前已指出，发展中国家虽然个人所得税比例低于发达国家，但个人所得税率却差不多与发达国家一样高，有些发展中国家甚至比发达国家要高得多。这就是说，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所得边际税率已经很高，再要提高税率的余地不大了。因为个人所得税率超过一定限界就会严重地引起逃税和避税的发生。第三，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对象都是城市的富有者，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这个阶层最有势力，在政治上影响很大。个人所得税率的提高将会招致这个阶层的巨大反抗，以至于陷入失败。由此可见，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率来增加税人的可能性是不大的。

在发展中国家，提高公司所得税率是较为可行的。如上所述，这种税的征收对象主要是外国经营的大型采掘企业。这些企业由于开采成本低廉而获得丰厚利润，这些利润大部分汇出国外，因此不能形成国内的私人投资。对这部分利润征以重税，使它的较大部分转为公共储蓄，将会有利于本国的经济增长。但是，提高公司所得税率是有限制的。显然，如果税率高到使外国公司的投资无利可图或者净利润低于他们本国和别的地方的利润，这些公司就会减少对所在国的资本投资，或者干脆撤出资本，这就会导致外资利用的下降，加剧本国资本短缺，降低经济增长率。因此对外国公司税率的提高要两面兼顾，既要尽可能多地把它们的收入转为国内投资，又不要挫伤它们的投资积极性。此外，对跨国公司企业征税过高会引起大量逃税。跨国公司可以运用转移作价方式把利润转到税率最低的国家的伙伴公司。前者把产品以很低的价格销售给后者，这样，跨国公司在高税率国家利润减少，在低税率国家利润增加。一增一减，公司总利润不变，而高税率国家获得的税人却大大减少。

销售税与特别产品税被认为是增加政府收入的一个较有希望的源泉，因为对产品征税较之对所得征税容易些。当今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采取不同的形式征收一定的销售税。

一般说来，发展中国家的零售商与批发商规模小，数目多，经营地位不稳定，记账程序又不健全，因此，发展中国家一般很少征收零售税和批发税，而采用周转税和增值税形式对制造品的生产和流通征税，因为生产阶段的厂商数目少，产品是同质的，征税比较容易。自从巴西于1967年首先在零售业全面实行增值税以来，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实行了增值税，其中有40多个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增值税率从10%~25%不等<sup>①</sup>。

发展中国家政府大多把提高一般销售税率作为增加收入的一个重要手段。与所得税相比，销售税率的提高不仅增加收入较多，而且不易遭到公众的不满和反抗。但是，销售税率提得过高最终必将导致纳税者的强烈的抵制。一旦这种税率超过20%~30%，逃税行为就会不可避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普通销售税是对除少数几种免税商品（如食品、农业投入、医药）之外的所有商品征收税的一种税收形式。特产税也是一种销售税，但它只对少数几种特殊的商品征税，如汽油、酒、烟、赌博等。大多数学者认为，特产税是增税的一个比较理想的源泉。

(1) 这种税的征收对象是一些限制性消费品，需求价格弹性很低。当税率提高时，被征税产品的销售量不会减少很多，从而销售收入和收入就会大幅度地增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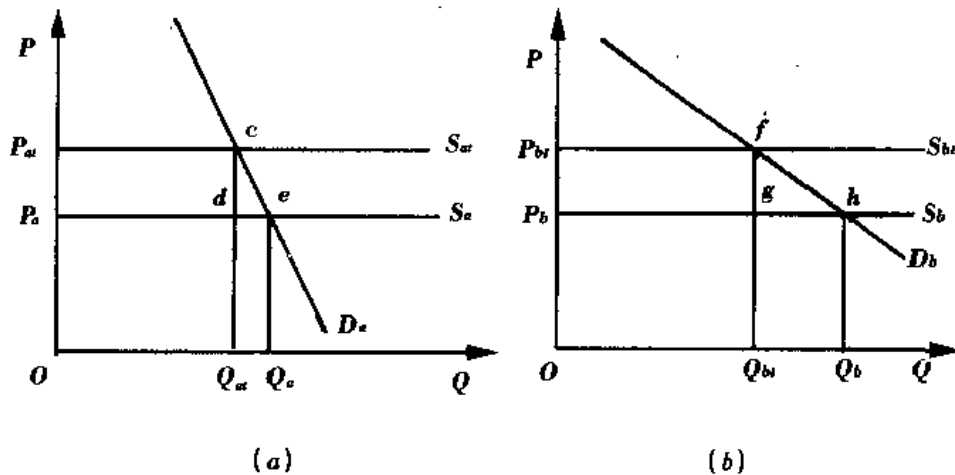


图 11.1 税收弹性与总福利损失

(2) 最优税收理论表明，价格弹性越低的商品，增税导致的经济效率损失就越小，或者说“额外负担”(excess burden)就越小。额外负担的涵义是总福利的损失超过政府获得税入的差数。这种关系可以用图 11.1 来说明，图中纵轴代表价格，横轴代表商品数量。图 11.1 (a) 表示一种无弹性商品 a；图 11.1 (b) 表示一种有弹性的商品 b。为分析简便，两种商品的边际成本假定不变，且处在同样水平上，分别用  $S_a$  和  $S_b$  代表两种商品的边际成本曲线。在征税前，均衡价格和数量分别为  $P_a$ 、 $Q_a$  和  $P_b$ 、 $Q_b$ 。现在对两种商品同时征税，于是，边际成本曲线  $S_a$  向上平行移到  $S_{a'}$ ， $S_b$  向上平行移到  $S_{b'}$ 。这样，新的均衡价格和数量分别是  $P_{a'}$ 、 $Q_{a'}$  和  $P_{b'}$ 、 $Q_{b'}$ 。对商品 a，政府收入总量为矩形面积  $P_a d c P_{a'}$ ，而消费者剩余的总损失是梯形面积  $P_a e c P_{a'}$ ，于是，商品 a 的额外负担

<sup>①</sup> 吉里斯，波金斯等．发展经济学．第 4 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22~323

为三角形  $cde$  所围成的面积，同样，商品  $b$  的额外负担为三角形  $fgh$  所围成的面积。显然， $\triangle cde < \triangle fgh$ 。这就证明了对无弹性的特别商品征税是损失最小的，或者说是效果最优的。

(3)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烟酒之类商品对人体是有害的，对这类商品加以限制有益于人民的健康。因此，提高这类商品的税率不仅有利于税人的增加，而且对整个社会也是有益的，这就不会引起公众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

从以上三个理由来看，提高特别产品税率的可行性是最大的。实际上，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自觉地运用特产税来增加政府收入，有的国家的特产税率甚至高达 100% 以上，并且还有上涨的趋势。

外贸税是发展中国家最重要的税源。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外贸税几乎占总税人的 1/3，其中进口税就占 1/4。在最贫穷的国家，这种税收所占比例甚至高达 50%。与此相比，发达国家的外贸税在总税人中所占比例低微，如美国的外贸税只占总税人的 1% 左右。由此可见，通过提高外贸税率特别是进口税率来增加政府收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且由于外国产品竞争的巨大优势，即使税率很高，进口外国产品仍然有利可图，所以，提高关税税率的余地是很大的。但是，有的学者认为，外贸税率特别是进口税率的提高也决不是无限的。首先，高关税虽然保护了国内的幼年工业，同时也保护了落后的、无效率的工业，从长远来看，这不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削弱了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其次，过高的进口税会促成走私与逃税，即使合法的进口品减少，又使进口税收人减少。例如，1969 年前的哥伦比亚，香烟的进口税率超过了 100%，结果，在市场上看不到征过税的外国香烟，而黑市市场上外国香烟到处都是，政府从进口香烟征收不到收入。第三，除了韩国、新加坡等少数国家和地区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进口税都采用严格等级制，对耐用消费品特别是奢侈品的关税最高，中间产品的关税较低一些，而关税最低的是资本品和生活必需品如粮食等。这是因为，对必需品征收过高的关税不利于穷人，对资本品和中间品征收过高的关税不利于工业部门的发展。但是，应该指出，对消费品尤其是奢侈品的高关税一般不会得到很高的税入。这是因为这些产品是有高价格弹性的。高关税必然导致高价格，从而使销售量和进口量大幅度减少，总税人增加不会很多，而且如果价格弹性非常高，高关税甚至会带来税人的绝对减少。最后，国际贸易是双边和多边交易。一国对进口商品征收过高的关税将会遭到出口国的贸易报复，而且关贸总协定和其他有关双边和多边贸易协定也限制了发展中国家提高关税的可能性。实际上，要求降低关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贸易的新趋势。

在发展中国家，可能最不重要的是财产税。其实，就分配不平均而言，很多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更严重，但是，就财产税比例而言，后者却比前者大。据一份资料表明，70 年代初，22 个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财产税对总税人的比例达到 10%，其中肯尼亚只有 0.7%，刚果最低只有 0.1%<sup>①</sup>。这也说明了在发展中国家提高财产和土地税率的潜力很大。而且，从征税效率角度来说，财产和土地容易估算，征税比较容易。但实际

<sup>①</sup> 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英文第 3 版·1985·509

做起来存在着许多困难，主要是财产所有者具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可以阻止财产税率的提高，或者采取各种手段逃税。

除了提高现行税收的税率外，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开辟新的税收来源。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种种原因，很多该征而未征的税源完全被忽视了，如机动车辆登记税、城市财产税等。此外，开辟税源的另一个渠道是对服务行业征税，实际上，对服务收入征收所得税不仅能获得较大的税入，还会有利于收入分配，因为高收入阶层购买服务的数量将大于低收入阶层。

与税率提高和开辟新的税源相比，税务管理的改善也许是增加税入的一个重要的措施。不需要提高税率，也不需要增加新的税种，只要政府的税务工作者提高工作效率，廉洁奉公，征收的税入就会大大增加。事实上，在所有发展中国家，还未认识到增税的潜力是很大的。训练有素的税务官员的缺乏、税法过于复杂、对逃税的惩罚过于轻微、受贿腐化以及税务管理技术的陈旧等，使得逃税现象极为严重，这已成为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中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以哥伦比亚为例。1975年，50%的小型企业未填报应缴所得税收入，在医生、律师等职业中，少报收入高达70%，而销售税的逃税比例在40%~50%之间。其次，腐化现象严重。70年代中期，有人估计，对税务员每支付1比索贿赂，国家就损失大约20比索的税入<sup>①</sup>。有人推算玻利维亚在1964年~1966年间，大约60%的财产收入未向税务当局申报。这些情况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同样存在，如阿根廷，纳税者成功地隐藏了50%的收入；在印度尼西亚，80%的应税收入未上报。相比之下，美国和加拿大在60年代大约只有13%~15%的总收入未申报。印度在80年代估计有40%~60%的潜在纳税收入没有纳税，70%的纳税人公开承认贿赂过税收官员，行贿的成本大约占应缴而未缴税收收入的20%<sup>②</sup>。

这些数字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征税效率是十分低下的。前面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个人所得税率与发达国家几乎一样高，但所得税比例前者比后者却要低得多。这种状况表明，即使仅在现有税收结构基础上稍作努力，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税入也能够增加一半左右，而无须提高税率。这个巨大的潜力是应该充分利用的。但是，在这方面作出努力而取得成功的还不多。韩国是一个较为成功的例子。在1966年，韩国当局试图通过有效的税务管理来增加40%的税入。虽然这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未达到，但在5年时间里，韩国把非农业个人所得中75%的隐匿不报收入减少到低于50%。在1974年，通过税务管理的迅速改变，哥伦比亚曾在短期内成功地阻止了大量的逃税，但到1976年，纳税人已发明一些新的逃税方法，使得早期的禁止逃税措施又失灵了。

增加税入的最后一个政策措施是改革现行的税收结构。这种措施最难实行，但一旦实行，效率是最大的。根本性的税收改革要求废弃旧的税收制度，代之以全新的税法和税收条例。但这种改革，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就技术和资料而言，实施起来困难很大。

① 吉里斯，麦克卢尔，税收与收入分配：哥伦比亚1974年税收改革，发展经济学杂志，1978，9

② 吉里斯，波金斯等，发展经济学，第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325

一般说来，不出现较严重的财政危机时，政府是不愿意为改革现行税收结构而作出巨大努力的。

但是，尽管有困难，有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还是在税收结构和管理上进行了重大改革。韩国在 60 年代早期实施了一个重要的税收改革纲领，智利在 70 年代，印度尼西亚在 1984 年也都推行了税收改革计划。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哥伦比亚在 1974 年推行的税收改革。哥伦比亚的经验表明，任何重大的税收改革努力都包含着潜在的利益和困难。在 1974 年下半年，哥伦比亚新一届政府进行了一场范围广泛的税收改革运动。改革的内容是全面的，几乎包括所有的税收来源。这项改革的主要特点是增加了税收的累进性，消除了助长私人部门浪费和无效率的税收制度中明显不合理的条款，在税收管理和执行中实行了变革。

哥伦比亚的这次税收改革在税人增长和收入分配方面取得了惊人的成绩。改革后的第一年，税人增加了 45%，比改革前一年税人增长率增加了 1 倍多。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也很显著，仅在第一年，从最高的收入阶层中就转移了占国内生产总值 1.5% 的收入。但是，改革的成效是短暂的，到 1976 年，受改革损害的高收入集团施加政治压力，使很多关键的措施被废弃了，纳税人开始发明保护机制来抵抗新的税法 and 利用新的税法未能堵塞的漏洞。此外，这次改革努力太不重视执行的实际问题和征税程序的强化。这是哥伦比亚税收改革不彻底的主要因素。

自 80 年代以来，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税收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了，并且改革措施出现了许多类似之处。80 年代出现的税收改革运动使税率趋同，征税程序趋向简化，课税基础更为广泛，并且逐渐更多地依赖消费税而不是所得税。80 年代税收改革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开始大幅度地降低最高边际税率，同时减少税收减免刺激、强化税收征管；二是采用增值税的国家在迅速增加，增值税的流行有两个重要原因是，它具有“造币机器”的称号，并且，相对于其他形式的营业税和所得税来说具有管理方面的优势。

## （二）税收在刺激私人储蓄与投资中的作用

税收政策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不仅是增加公共储蓄，而且还在于刺激和引导私人部门增加储蓄和投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在以私有经济为主的国家里，也许后一个目标更重要。因为一般说来，私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率更高，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这样一来，似乎有一个矛盾：为了增加更多的公共储蓄，税人应该是越大越好；但另一方面，为了刺激私人储蓄和投资，税人应该是越小越好。那么，一个国家是应该增加税收还是减少税收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能依赖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一个企业可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但一个国家却不能追求税收最大化，因为它必须考虑到对私人刺激的影响。

就私人储蓄能力而言，所得税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征收个人所得税导致私人储蓄的减少。但储蓄减少程度如何呢？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关于储蓄行为的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所得税的增加对储蓄没有或很少影响，因为发展中国家的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缴纳者）的消费倾向很高。另外一些关于储蓄行为的经验研究则表

明，发展中国家富有阶级具有很高的储蓄倾向，因此，个人所得税的增加对消费影响不大，而对储蓄产生十分不利的影响。也就是说，税收与私人储蓄具有很高的替代性。这两种相反的观点都可以找到经验证据。有的学者认为，在某些国家，特别是拉美一些国家，消费倾向是很高的，而在另一些国家，尤其是东南亚一些国家，储蓄倾向却相当高，可见征收个人所得税对私人储蓄产生多大抑制作用要依各国储蓄倾向或消费倾向的大小而定。

如果说个人所得税对储蓄的不利影响还有争论的话，那么，公司所得税对储蓄的抑制作用就几乎确定无疑的了。企业的利润扣除股利后，几乎无一例外地用于储蓄和投资。对这部分收入征税越大，公司储蓄和投资就越小。因此，发展中国家若要刺激私人储蓄和投资，减少公司所得税是一个有效的措施。但是，如果纳税的企业主要是跨国公司企业，公司税对国内私人储蓄就不会有很大负作用。当然，对外国公司也不能征税太高，否则就不可能吸引更多的外资。

就私人储蓄刺激而言，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消费税比所得税抑制效应要小得多。消费税包括普通销售税和特别产品税以及进出口税等这样一些间接税。人们的储蓄意愿最直接地受他们收入的影响，而只间接地受消费的影响，因此，直接税比间接税更加伤害家庭储蓄意愿。

由于以消费为基础的税收比以收入为基础的税收更能有利于私人储蓄的增长，所以，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主要依靠间接税来积累公共储蓄。但是，间接税对储蓄也有不利的影响，因为产品税最终要加到物价上去。若对所有商品征税，所有消费者实际收入和储蓄就会减少。若对高档消费品和特殊商品征税，对高收入家庭影响最大，收入中将有更大部分用于消费，更少部分用于储蓄。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学者设计了一种新的征税方案，即对消费直接征税。具体做法是，纳税人每年向税务当局申报总收入和总消费，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水平的消费免征消费税，而高于这个最低水平的消费就征收消费税，而且消费税率随着消费的增加而上升。显然，这种直接的累进的消费税如果能得到实行将会刺激储蓄，因为储蓄得越多，上缴的税收就越少。直接消费税的观点在几十年前就有人提出来过，在50年代，印度曾把这种税付诸实施，但很快就夭折了，其原因是征收直接消费税需要详尽的资料，而这是税务当局管理能力所不能胜任的。不过，就刺激私人储蓄而言，直接消费税还是政府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

资本所得税和社会保险税是抑制私人储蓄刺激的两个重要税种。由于国民储蓄率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资本税后报酬率的反应，因此，对资本收入（利息与红利）征税将会导致为投资使用的私人储蓄量的减少。同样，由于人们储蓄在一定程度上是为退休筹集资金，因此，社会保险税也能减少私人 and 国民储蓄率。当然，社会保险税不同于资本所得税和其他税，后者能使公共储蓄增加，而前者很少使公共储蓄增加。这是因为由尚在工作的那些人支付的社会保险税不是被储蓄起来用于投资，而是用于支付已经退休的那些人的保险金。

一个国家的税收制度除了影响私人储蓄能力和刺激从而影响私人投资以外，还能影响一国既定私人资本量的投资数额和配置。

首先，必须认识到一国的实际私人储蓄额（资本量）与国内实际私人投资数额是两个不同的量。如果资本净流出额大于零，国内实际投资额就会小于实际私人储蓄额。反之亦然。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表明，尽管对资本外流实行外汇控制和其他限制，资本仍然倾向于在国际范围内流动。如果国外的资本净收益大于某一个特定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净收益，那么，国内资本就会流向国外。而决定一个既定国家资本净收益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该国或该地区的资本所得税。例如，假设菲律宾的资本所有者平均能够获得15%的税前投资收益，再假定该国的资本所得税为50%。于是，资本所有者获得的税后投资报酬为7.5%。而在资本市场相当发达的香港，资本不太稀缺，税前投资收益率只有12%，低于资本稀缺的菲律宾。但是，香港的资本所得税远低于菲律宾，只有15%。这样，香港的税后资本报酬是10.2%。税后报酬中2.7%的差额就能大到足以引诱菲律宾的储蓄向香港移动。这个例子具有一般意义。实际上，试图对资本收入征收重税的国家的国内储蓄往往外流到资本税率较低的国家。

现在，大多数国家已认识到资本在国际上是相当流动的，并力求把资本所得税率限制在国际一般水平上。这一点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公司所得税率十分接近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到证实。在拉丁美洲，公司所得税率一般为25%~40%，而与此相对照，美国在1990年这个税率为34%。在东南亚地区，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公司所得税率变动范围更窄，在30%~40%之间，但香港的公司所得税率则仍然不到20%。

前已指出，发展中国家的应税企业中相当一部分是跨国公司的附属企业。在这种情况下，对公司所得税的减免不仅仅阻止国内资本外流，而且还有吸引外资的作用。此外，政府还可以采取优惠的税收政策引诱更多的外资企业的资本和利润留在国内。譬如，对不汇出国外而又愿意用做再投资的外国公司所有的资本和利润，政府可以免征所得税。

税收除了对私人资本国际流动有影响外，还对国内私人资本的配置影响很大。为了把私人投资引导到优先发展的工业，如基础工业、出口工业，或引导到经济落后的地区，很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有选择地对国内投资者提供巨大的税收刺激。税收刺激一般有两种主要方法。一是提供免税期（tax holiday）。所谓免税期是指企业在规定的时期内免交公司所得税。免税期的长短在各国不尽相同，但5年~10年似乎在发展中国家最为普遍。免税期方法的作用是为厂商在早期经营中提供更大的灵活性。此外，这种方法还可降低所含的风险因素，这样，企业对投资就被引诱增加。二是加速折旧或税收扣除（tax credit）。加速折旧是指政府允许一个企业以更快的速度折旧固定资产，使资产的正常折旧期缩短了。实际上，加速折旧是把一部分利润作为成本处理。这样，企业的应税利润额减少了，应缴的税款也相应地减少了。所谓税收扣除是指政府允许一个投资者从他的所得税负中减去最初投资的一个部分。显然，这两种方法具有类似的意义，即减少了应税收人和应纳税额。税收的减少自然促进了企业投资意愿的增强。

### 三、税收与收入分配

除了促进经济增长外，税收政策另一个目标是减轻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程度。在许多

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不平等颇为严重。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占总人口 10% 的高收入阶层拥有总收入的一半，与之相比，发达国家占人口 10% 的高收入阶层只占有总收入的 30% 左右。因此，在发展中国家，税收政策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将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就税收而言，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方法就是实行累进税制，即税收负担随收入增加而以更大比例增加。累进税制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它虽然本身不能帮助穷人变富，但却可以阻止富人变得更富，使贫富悬殊程度得到缓和。由于人们的富裕程度可以由收入、消费和财产三个方面来计量，累进税制一般包括三种形式，即个人所得税、消费税和财产税。

个人所得税是累进税中最重要的形式。这里所说的个人收入不仅仅指雇员的工薪和其他个人收入，而且还包括资本所有者的利息与红利收入。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个人所得税占国内生产总值和总收入的比例是相当低的。从这方面说，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一种手段，其作用是有限的。正如世界银行专家坦齐指出的那样：“个人所得税的相对不重要性是令人失望的，因为这些税收在传统上被认为是追求（通过财政工具）收入再分配目标的重要手段。”<sup>①</sup>但是，发展中国家的个人边际所得税率却是不低的。在一些国家，名义的或法定的边际所得税率达到很高的水平，甚至比发达国家的税率还高。例如，在印度尼西亚，1967 年 1 000 美元以上的所得税率达到 75%。在阿尔及利亚，60 年代超过 1 万美元收入应缴纳的所得税率几乎接近 100%。坦桑尼亚 1981 年的最高边际税率达到 95%。而美国在 1982 年以前最高边际税率只有 70%，1982 年以后下降到 50%。一般说来，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最高边际税率比上述国家低，但一般也达到 35% ~ 55%。可见，从这个方面来看，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分配的有效工具。

如果税务管理很有效率，如果资本不能流向国外，那么，由高收入纳税人缴纳的实际税收就会与理论的或法定的税人相一致。但实际上，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作为收入的一个百分比而征收的税人远低于理论上的税人，即有效税率低于名义税率。这是因为，面对高所得税率，纳税人一般在三个方面作出反应：①逃税。其办法是隐瞒收入特别是不受预扣安排的资本收入。②避税。主要通过改变经济行为以减少税收负担，其具体做法是，缩短劳动时间，减少劳动报酬，把资本转移到国外税收低的地方，或雇佣律师找出税法漏洞。③贿赂税务员以接受不真实的报酬。由于这些原因，在所有国家，通过累进所得税来达到实质性的收入再分配证明是困难的，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税法执行不严，对逃税罪犯缺乏严厉的惩罚，贿赂风行，这样，即使所得税率具有很高的累进性，但通过所得税来再分配收入的范围比发达国家更有限。

当然，累进所得税尽管存在许多问题，不能作为收入再分配的惟一手段，但应当承认，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社会上最富有的成员缴纳的税收占所得税人相当大的比重。实际上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全部个人所得税几乎都来自占人口 20% 的最高收入阶层。

<sup>①</sup> 坦齐，发展中国家的税收理论，英文版，世界银行，1987，225



这意味着个人所得税的存在，即使这种税是比例性的而不是累进性的，也具有减小收入分配不平等的作用。

从理论上说，消费税在调节收入分配上没有所得税那样更直接、更有效，但是，就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而言，消费税对收入分配目标似乎是一个更切合实际的手段。这是因为：第一，在发展中国家中，由于资本品基本上免税或征税很少，因此，所有的产品税几乎都是对消费品征税。如上所述，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产品税（包括普通销售税、特别产品税、进出口税等所有间接税）占总收入的比例达60%左右。这就表明这种间接税在数量上对收入调节是重要的。第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生活必需品如粮食一般是免税的，被征税的消费品主要是高档消费品和进口消费品。这些消费品绝大部分为高收入家庭购买。由此可见，发展中国家的消费税也具有较大的累进性，即收入高的人缴纳的税收多。第三，与所得税相比，消费税较容易征收。对消费品征税，特别是对烟、酒等特殊商品和进口高档奢侈品征税一般很少引起公众的不满和抵制。此外，消费品的生产、销售和进出口都有比较固定的地点，逃税相对来说困难一些，这就保证高收入者支付更大的税收。

虽然对非生活必需品征税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平等，但不是每种商品税对收入分配有同样的影响。著名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刘易斯对消费品征税效率提出了三个原则：①生产或准许进口的单位较少，以便能够控制逃税。②需求价格弹性很低，从而需求不被高税收所抑制。③需求收入弹性较大，随着收入的增加而税收累进性相应地增加<sup>①</sup>。根据这三个原则，显然对高档消费品与限制消费的特殊产品（烟、酒等）征税是最理想的，这些商品大体上符合以上三个原则。另一方面，对低档消费品征税是最有害的，这些必需品不符合以上三个原则。

需要指出，对高档消费品和限制消费的产品征收重税不仅有利于收入分配，而且也有利于经济增长。因为它可以增加公共储蓄，可以把消费基金引导到生产投资上来。如果是对进口高档消费品征收重税，它还会有利于促进国内工业的发展和国际收支平衡。当然，高关税的保护性质是否有利于经济增长现在还有争论。从实践来看，进口替代似乎并不是发展中国家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业化战略。这样，对进口奢侈品的高关税率虽然能从高收入阶层中获得更多的收入，但不一定能促进经济增长。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财产分配不平等比发达国家还要严重。因此，征收财产税在发展中国家对实现公平分配目标更为重要。此外，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财产税比例是很低的。增加财产特别是土地的累进税率对实现公平分配目标似乎是较好的措施，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大财产主和大地主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他们有能力足以阻止财产税的颁布和实施，因而发展中国家运用财产税来调节收入分配是很困难的。

---

① 刘易斯，发展计划：经济政策原理，英文版，1966，122

#### 四、税收与经济稳定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是一个难以消除的顽症。为此，这些国家的政府往往把经济稳定作为主要政策目标。自从 20 世纪 30 年代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产生以来，稳定经济的措施变得相当明确而简单了。就税收政策而言，当经济出现衰退时，政府通过减少税收来刺激私人消费与投资，增加总需求；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时，政府通过增加税收来抑制私人消费与投资，减少总需求。这种反周期性质的税收政策曾一度被认为是与经济不稳定作斗争的灵丹妙药。但近十几年来，这种药方也不十分灵验了，因而遭到猛烈的抨击。

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与发达国家不同。它们的问题主要不是经济周期，而是经济落后和分配不均。因此，发展中国家政府常常把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作为主要政策目标，西方国家的反周期政策在发展中国家从来就没有普遍实行过。但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普遍发生了巨大财政赤字和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增长和低收入阶层人民的生活水平。因此，稳定经济才逐渐成为发展中国家一个重要政策目标。但是，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稳定政策就是反通货膨胀政策。就税收政策来说，政府不是通过周期性调整税率来影响私人经济活动，而是尽可能地增加税人，为日益增长的政府支出筹集足够的资金，以免发生巨大的财政赤字。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需要巨大的日益增长的公共投资支出。公共税收的增长一般很难跟上公共支出的增长，因此，财政赤字不是一个周期性问题，而是一个长期的问题。这就表明，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更容易遭受通货膨胀。

反通货膨胀的税收政策不能总是求助于税率定期的提高，而是要建立一个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大反应的税收制度。也就是说，应该建立一个具有高度税人弹性的税收制度。税人弹性衡量税收制度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反应程度或敏感程度，它被定义为总税人的相对变动除以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对变动。用公式表示为：

$$E_R = \frac{\Delta T/T}{\Delta Y/Y}$$

在这里， $E_R$  表示税人弹性系数， $T$  表示基期税人， $\Delta T$  表示税人增量， $Y$  表示基期国内生产总值， $\Delta Y$  表示国内生产总值增量。

当  $E_R > 1$  时，税收制度就是有弹性的，即税收比国内生产总值以更大的比例增加。例如，设  $E_R = 1.2$ ，那么，国内生产总值每增长 10%，税人增长 12%。当  $E_R < 1$  时，税收制度就是无弹性的。例如，设  $E_R = 0.8$ ，于是对于国内生产总值 10% 的增长，税人只增加 8%。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为了弥补日益增大的政府支出，税人弹性当然是越大越好。在这里，税人弹性主要是指不改变税率和税基定义条件下的税人弹性，它被称为事前 (ex-ante) 的税人弹性，表示税收制度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内在反应。当今发展中国家很少有事前税人弹性等于或大于 1 的。由于发展中国家政府支出弹性一般大于 1，即政府支出的增长快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因此，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财政极为紧张。这就迫使政府不得不通过立法来改变税率和税基定义，增设新的税种。这样，税人弹性就变

成了事后 (ex-post) 的税入弹性, 它等于事前的税入弹性加上因税法改变而增加的税入弹性, 有些发展中国家的事后税入弹性大于 1。但是, 当事前的税入弹性很低时, 事后的税入弹性将会迅速减少, 因为非内在的税收增加在比例上总是小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由此可见, 事前的税入弹性的大小对税入的增加是至关重要的。

一国税收制度的事前的税入弹性取决于该国的税基弹性, 即课税基础对国内生产总值的反应程度。有的学者认为, 特别产品税的税基是无收入弹性的, 也就是说, 这种产品消费的增长在比例上小于国民收入的增长, 从而课税基础弹性小于 1。对把进口替代作为迅速工业化手段的国家来说, 关税基础的收入弹性也很低。这样, 严重依赖进出口税和特别产品税的国家将有很低税入弹性的税收制度。

最有收入弹性基础的税收被认为是所得税, 所得税之所以具有收入弹性基础, 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 城市现代部门在整个经济中所占比重将增大, 而对现代部门的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征税比对非现代部门要容易得多。奢侈品消费税课税基础也是具有较高收入弹性的。因为当收入水平提高时, 奢侈品的消费量将以更大的比例增长, 从而, 课税基础将比国民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销售税基础 (无收入弹性的食物一般是免税的) 被认为具有温和的收入弹性。即是说, 课税商品的增加在比例上稍微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

除了课税基础外, 税收的累进性也是影响税入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个人所得税被认为是最有累进性的税收, 个人所得税比例的提高将使税入弹性增大, 这是因为随着收入人的增加, 增加的部分将以更高的税率被征收。

应该指出, 所有用来提高税入弹性的措施反过来也促进这种制度的累进性。这就意味着一种手段 (提高事前的税入弹性) 能同时达到两个目标 (经济稳定与收入再分配)。

## 第二节 政府支出

### 一、政府支出水平与支出结构

政府支出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有直接的关系。从表 11.1 中可以看出,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较低, 而高收入国家政府支出所占比重较高。从表 11.1 中还可以看出, 1980 年~1996 年, 低收入国家政府支出所占比重下降了, 而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政府支出比重上升了, 尤以高收入国家上升幅度最大。这表明, 随着经济的发展, 政府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了。

政府支出由资本支出和消费支出两部分组成。政府资本支出也叫公共投资, 包括教育、科技、卫生、运输、通讯、金融、商业、国有生产企业、公用事业等支出。政府消费支出也叫经常性支出, 包括政府雇员工资和津贴、非生产性购买、军事开支、利息支付和各种补贴等支出。从表 11.1 中看到, 政府的经常性支出比重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 即较低收入国家的政府经常性支出比重比较高收入国家的低, 收

人水平越高，政府经常性支出比重也就越大。从长期来看，1980年~1996年，除了低收入国家之外，各个收入组的政府经常性支出比重都增加了。关于政府资本支出，则刚好相反，从低收入国家组移到高收入国家组，政府支出比重呈下降趋势。长期来看，每组国家的政府资本支出比重从1980年到1996年都下降了。

长期以来，政府的资本支出被认为是生产性的，它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而政府的经常性支出被认为是非生产性的，实际上，它被称做消费支出就意味着这种支出对生产能力的增加不起作用。有些学者认为，政府的资本支出与消费支出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即前者增加，则后者减少；反之，后者增加，则前者减少。因此，为了加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尽可能地减少政府的经常性支出，增加公共投资支出，是政府财政政策一项重要任务。但是，有些学者对此提出批评。他们指出，政府的资本支出不总是生产性的，公共投资也不总是有助于经济增长和发展。例如，政府直接投资于生产，但建立起来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无效率的，结果是浪费了发展的宝贵资源。实际上，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是世界各国实行经济改革和调整时期、私有化时期，无论是发达国家政府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削减了公共投资的比例。表11.1表明，1996年的政府资本支出比重比1980年下降了。可见，无论是政府消费的增加还是政府投资的增加，对经济增长都不一定有益。当然，如果政府的资本投资主要集中于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科技研究与教育，这种支出被认为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现在，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应该对这些具有“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负起更大的责任。

## 二、政府消费支出与军事支出

就经济增长而言，政府的支出政策目标是尽可能地削减非生产性支出，增加生产性投资。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中，大部分经常性支出项目是难以削减的。

表 11.3 不同收入组中央政府各项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 (%)

国家组别	国家数	商品与服务		工资与薪水		利息支付		补贴与其他转移支付		资本支出		其中：国防支出	
		1981	1991	1981	1991	1981	1991	1981	1991	1981	1991	1981	1991
		~	~	~	~	~	~	~	~	~	~	~	~
低收入国家	16	48.8	47.0	28.6	29.8	9.3	14.4	14.5	14.2	27.9	25.6	16.6	13.7
中低收入国家	21	44.4	42.6	28.0	28.1	9.9	12.8	23.2	23.2	22.4	21.1	12.0	10.3
中高收入国家	10	38.7	38.1	21.9	23.1	16.9	16.4	32.7	35.1	12.7	11.5	11.5	9.6
高收入国家	15	25.9	25.7	12.9	11.8	11.3	11.1	55.9	57.2	6.7	6.1	9.4	7.8

资料来源：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198

首先，除了商品和服务购买（其中包括了国防支出）之外，政府雇员工资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经常性支出中是一个最大的开支项目。从表11.3中可知，发展中国家

的工薪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都超过了 20%，其中，16 个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工薪支出比重在过去 15 年中接近 30%，而 15 个发达国家的工薪支出比重平均只有 12% 左右。

虽然发展中国家工薪支出比重较高，但削减这个项目支出是很困难的，这是因为，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雇员工资本来就不高，削减工资支出的余地是很有限的。当然，有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雇员工资相对较高，但这个阶层有强大的政治权力，其工资标准也是难以降低的。此外，减少政府雇员数目在发展中国家也是不易做到的。

其次，对于发展中国家，利息支付占其政府总支出比重并不是很大，但具有上升的趋势。从表 11.3 中看到，低收入国家从 80 年代的 9.3% 上升到 90 年代前半期的 14.4%，中低收入国家从 9.9% 上升到 12.8%；与之相对照，中高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的利息支出比重在过去 15 年中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

利息负担产生于过去的政府预算赤字，而这些赤字是通过国内和国外借款来筹集的。由于在 70 年代初至 80 年代期间，外债急剧增加和世界利率的普遍上升，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拉美一些国家，外债利息支付迅速地增长，已成为政府沉重的负担。从表 11.3 中看到，中高收入国家（其中包括一些债务最为严重的国家）的利息支付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高达 17%，是各收入组中最高的。因为政府债务利息是对过去的赤字财政或对外借款的反映，所以，这个支出项目很难减少，即使在近几年内不再发生赤字和借外债，这种支出在短期内也不容易缩减。

再次，发展中国家的各种补贴（这里不包括对国有企业亏损的补贴）和转移支付与高收入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从表 11.3 中可知，1990 年～1995 年间，低收入国家补贴与转移支付平均占政府总支出的 14.2%，中低收入国家平均为 23.2%，中高收入国家平均为 35.1%，高收入国家为 57.2%。显然，这项政府支出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密切的正相关关系。这是因为一个国家越是富裕，社会福利开支也就越大。

在发展中国家，经常性预算补贴采取了许多形式，最普遍的而又最重要的形式是对食品消费的补助，其他比较流行的补贴项目包括为乡村提供的电气设备、化肥、公共交通等。这些补贴常常被看做是收入再分配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因此，对这些补贴支出的削减也是困难的。它的削减不仅会影响农业的发展，还会导致收入分配更不平均，引起公众的不满和反抗。例如，在斯里兰卡、埃及和土耳其以及其他国家，食品补贴的削减曾引起了社会的骚乱。

由此看来，要削减非军事性的消费支出以增加公共储蓄和投资，在发展中国家是有限的。但是，有的学者认为，作为政府经常性支出中一个大的项目，军事支出的削减是有较大余地的。从表 11.3 中可以看到，发展中国家的国防支出比重平均超过了发达国家，1981 年～1990 年间，低收入国家的国防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高达 16.6%，比高收入国家 9.4% 要高 7.2 个百分点。1991 年～1995 年间，这个比重都有所下降，但低收入国家仍然是最高的。

发展中国家军事开支大，已经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家的广泛重视。虽然有的学者论证说，军事支出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因此，军事支出是不能削减的；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沉重的军事支出正在耗尽发展中国家的稀缺资源，从而严重地阻碍经济发展的进

程。如果不是国家主权受到真正的威胁，把大量资源用于军事是不明智之举。他们建议，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应该削减军事预算，释放出更多的资源用于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

### 三、公共投资与国有企业

如上所述，政府资本支出包括社会投资（科技、文化、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投资（运输、邮电通讯、大型水利工程、城市公用事业等）以及直接投资（创办国有企业）。这些公共投资增加一国的生产能力，因而有利于经济增长。一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市场制度不完善，公共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社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对每个国家都是重要的，因有些内容已在其他章节中作过论述，所以，在这里我们将集中讨论一下对发展中国家特别重要的一项政府投资形式——国有企业。

国有企业在一些发达国家（如英、法等）也存在，但在发展中国家最为普遍，它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一种特殊方式。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的规模和数目都在迅速扩大。过去，国有企业只在公用事业（煤气、供水、供电和城市交通）、运输（铁路、航空）和通讯（电话、电报和邮政服务）等行业较为普遍，现在，它们已扩展到大型制造业、建筑、金融、服务、自然资源、农业等关键性的经济部门。在某些国家有些行业，它们甚至占支配地位。例如，在塞内加尔、坦桑尼亚、孟加拉国、缅甸、印度、墨西哥、尼加拉瓜等国，国有企业在自然资源部门的总产量中占75%以上；在突尼斯、埃及、叙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制造业中60%的增加值是由国有企业创造的。进入90年代以来，私有化浪潮席卷全世界，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投资所占比重仍然比较大，国有企业投资占政府资本投资总额的1/4左右。

总的说来，国有企业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15%。在有些国家，所占比例更大。例如，在塞内加尔、圭亚那、突尼斯和委内瑞拉，国有企业生产20%~30%的国内总产出，而在加纳、赞比亚，这个比例高达40%。此外，在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的投资规模也很大，至少有25%的投资是由国有企业进行的。

虽然国有企业对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和资本形成作出了重大贡献，但它们也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在大多数情况下，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例如，在1976年~1979年，27个发展中国家对非金融国有企业的净预算支付平均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的3%，仅仅经常性开支就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此外，国有企业还是外汇的主要借款人，在1980年，所有第三世界的欧洲货币借款的28%是国有企业占用的。最后，国有企业还吸收了大量的国内信贷。例如，在贝宁、圭亚那、马里、塞内加尔，国内信贷的40%以上是被国有企业吸收的。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无论在产品生产方面还是在资源需求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因此，考察一下国有企业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和结果，对于提高政府公共投资效率，改善政府资本预算支出政策是必要的。

国有企业的产生和发展是由多种原因引起的，有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制度上的原

因，但主要是出自经济上的考虑。从经济上说，第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调动储蓄。在贫穷的国家，穷人无力储蓄，富人又沉湎于消费，即使他们愿意储蓄一部分，也常常倾向在国外投资，因而，国内私人储蓄水平是很低的。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公共储蓄水平也不太高，这是因为征税很困难；这样，很多发展中国家把希望寄托在国有企业上，国有企业直接由国家经营，所赚利润由国家所有，政府有权把这些剩余转化为物质和人力资本投资，从而增加了一国的资本形成能力。

创造就业机会是建立国有企业的第二个原因。我们在第五章中曾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伪装失业和公开失业都很严重。严重的失业不仅造成人力资源的大量浪费，而且还导致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强。发展经济学家和发展中国家政策制订者认为，创办国有企业是吸收剩余劳动和失业者就业的较好途径。一方面，新企业的建立能吸收新劳力就业；另一方面，把经营不善、濒于破产的私人企业接管过来，变为国有企业，防止新的失业产生。

第三，在发展中国家，货币和资本市场发育很差，国内私人厂商不可能筹集到为投资一个人型的、资本密集型的项目所需要的资本量，特别是矿业部门，这些部门中的每一个投资项目都需要巨额资本，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十亿。因此，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只有国家或外国私人企业才有能力承担这些大型项目的建设。如果外国投资者被禁止或不愿投资，那么，承担这些需要巨额资本又带有高度风险的大型项目的投资任务自然就落在国家头上，国家通过建立国有企业来完成它。

第四，在发展中国家，有些经济活动是有很大大社会利益的，但由于地方市场狭小，原料供给不可靠，缺乏技术和熟练劳动力，或利润太低，私人企业不愿意投资于这些行业；或者由于垄断权力的存在使消费者利益受到损害，国家不许私人企业经营，因此，这些行业必须由国家来经营。这些国有企业虽然在经济上不能盈利，或盈利很小，但从社会角度来看，利益还是很大的。

除了以上原因外，创办国有企业还有其他一些动机。例如，为了促进地区间平衡发展，国家必须在落后地区建立国有企业，因为这些地区对私人投资者没有刺激。为了实现进口替代发展战略，国家必须在国民经济关键部门中创办国有企业，因为这些部门的经济活动具有很大风险，对私人投资者没有吸引力。

虽然国有企业的产生与发展有许多充分的理由，但近几年来，国有企业已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国有企业花费了大量的政府资本支出，但没有达到国家预定的目标，造成资源的严重浪费，没有促进反而阻碍了经济发展。这可以从储蓄调动和就业创造两点来看。

关于储蓄调动。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不是一个净储蓄来源，而是一个储蓄的净使用者，就是说这些企业不但没有为国家创造利润，而且还发生大量的亏损。据统计，在几内亚、象牙海岸、坦桑尼亚、缅甸、阿根廷等 17 个发展中国家中，有 16 个国家的国有企业在 70 年代后期发生亏损，有的亏损额占国内生产总值 5% 以上，其中

几内亚高达 23.4%，缅甸达 10.6%<sup>①</sup>。从绝对亏损额来看，秘鲁的国有企业 1976 年亏损 400 亿索尔，墨西哥的国有企业 1982 年亏损 3 300 亿比索，委内瑞拉的国有企业 1983 年亏损 113 亿博利瓦，巴西的国有企业 1981 年亏损 90 亿美元<sup>②</sup>。这样，国有企业不仅在创建时花费国家大量的资本投资，而且在创建后还要吞掉国家大量的财政补贴。这就表明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投资是低效率的。

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第一，与私人企业不同，国有企业在相当程度上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而是代表国家意志，追求社会目标。为了保护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国有企业生产的一些产品必须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为了增加就业，国有企业必须雇佣比所需的还要多的劳动力。这些行为无疑阻碍了国有企业效率的提高和利润的增加。第二，国有企业直接受政府行政部门领导和控制，生产决策过分集中，使得企业管理在日常经营活动中不能施展手脚，不能根据市场行情灵活地决策。第三，企业管理者一般是由国家任命的，这就助长了企业管理的官僚化。国有企业的决策者并不对他们的行为负责，对改进决策提高效率没有刺激，也没有压力。

关于就业创造。建立国有企业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创造了比私人企业更多的就业机会。但几十年的实践证明这个目标并未达到。很少有发展中国家，在国有企业中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超过 10%，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个比例还不到 5%，而与此同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部门在总投资中的比例达到 25% - 30%，在有些国家，这个比例高达 50%。这就清楚地表明，国有企业在过去 20 多年中创造的新就业机会与投资规模是很不相称的，因此可以说，国有企业在创造就业方面没有取得成功。还值得一提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内部都存在着严重超员现象。

国有企业不能创造较大的就业机会，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投资比私人企业投资更倾向于资本集约化。这一趋势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第一，国有企业比私人企业具有更大的垄断性。一般说来，垄断权力越大，投资的资本集约化偏向越强。第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集中在采掘业和重工业部门，这些部门具有内在的资本集约性。第三，在发展中国家，要素价格的扭曲很普遍，本书在第五章和其他章节中曾说过，要素价格扭曲表现在低利息率、高工资率和定值过高的汇率。这些扭曲现象使得资本便宜，劳动昂贵。这就驱使企业更多地采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方法而较少采用劳动密集型技术。而且，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比私人企业更倾向于资本集约化经营。这是因为，国有企业一般都减免税收，包括进口资本设备的关税在内，而私人企业却很少享有这种特权。国有企业对贷款支付的利息也比私人企业低，因为它的债务担保人是政府，银行觉得风险较低。如果银行也是国有企业，那么，向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更低。此外，国有企业常常把产权资本看做是无成本的，因为国家并不坚持要企业支付股息。由于以上原因，国有企业被引诱采用资本密集型生产技术，从而阻碍了就业机会的增加。

---

① 吉里斯，波金斯等，发展经济学，英文第 2 版，1987，340

② 武桂馥，80 年代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体制调整，世界经济，1988（9）：26



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的发展已出现停滞的局面，并且，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趋势正在发展。大多数研究表明，特别是在中等收入国家，私有化企业在提高效率 and 增加产出方面是成功的<sup>①</sup>。但是，有的发展经济学家仍然坚持认为，国有企业对经济发展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只要改进国有企业的管理方式，把经营决策权完全交给企业，让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在同等地位上展开竞争，那么，国有企业是可以有效率的。例如托达罗就说：“只要公共企业的‘政治愿望’是最大限度地缩小对权力的滥用，‘经济愿望’是纠正不符合社会需要的市场和价格扭曲，公共企业就能在经济发展中起重要的作用。”<sup>②</sup>

#### 四、政府支出对收入分配和经济稳定的作用

就收入分配目标而言，政府支出政策比税收政策可能更有效，因为税收只使富人的收入减少，而政府支出可以使穷人收入增加。许多经验研究证实，在发展中国家，预算支出中很大一部分资源被转移给了低收入家庭。例如，马来西亚在 60 年代后期，税收和政府经常性支出结合在一起使国民收入的 5% 从两个最高收入组转移到两个最低收入组，其中 3/4 以上的转移支付为穷人获得。在印度尼西亚，1980 年的税制改革只有微小的累进性，但由于该国重视食品补贴和初级教育，政府预算支出显然有利于穷人。据估计，最穷的收入阶层全部收入的一半来自于政府支出的转移。智利在 60 年代税收对收入再分配无影响，但穷人从政府支出中获得较大的利益，最低收入组只占国民收入的 7.5% 的份额，但却获得政府支出 15% ~ 18% 的利益<sup>③</sup>。

当然，不是所有的政府支出都是减少收入不平等的，例如，政府债券的利息支付就不是有利于穷人，而是有利于富人，因为债券购买者大多数是高收入阶层。但是，要确定哪些政府支出有利于穷人是不难的。对初级教育而不是大学教育的公共支出具有明显的收入再分配效果。政府对卫生事业的公共支出也常常对穷人更有利。政府对农村地区的公共投资（如乡村教育、卫生、水利工程、乡村道路、农业实验站）也具有很强的收入再分配性质，因为在发展中国家，虽然城市也有不少穷人，但大多数穷人生活在穷乡僻壤的农村地区。假若对农产品的生产不实行价格管制，政府对基本食品消费的补贴对穷人的好处也是最大的，因为最低收入家庭食品开支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远比高收入家庭要高。此外，政府对贫困地区的公共投资和财政援助无疑有利于收入再分配目标的实现。

从理论上讲，在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是再分配收入的一个有效工具。累进税制能使富人的富裕程度降低，而对穷人的转移支付和财政补贴及援助有利于穷人生活的改善。但是，实际上，在调节社会各阶层收入这个问题上，由于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各种因素，发展中国家的财政政策的作用远没有想象的那样有效。因此，除了财政政策

① 托达罗. 经济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615

② 托达罗. 经济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615

③ 吉里斯, 波金斯等. 发展经济学. 英文第 2 版. 1987. 312 ~ 313

外，土地占有制度的改革、城乡产品贸易条件的改善、就业的扩大、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等措施也是实现收入分配目标的重要工具。

除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支出政策还有一个目标就是稳定经济。在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对经济稳定的作用是：当经济出现衰退时，增加公共支出来扩大总需求；当经济出现通货膨胀时，减少政府支出来抑制总需求。但是，在发展中国家，这种反周期性支出政策不大适用，因为发展中国家不存在发达国家的那种经济周期，发展中国家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迅速增长，尽快地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可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担负着更加重要的责任，公共投资支出和经常性消费支出常常大于政府的税收收入，因而容易产生财政赤字，而赤字的存在对通货膨胀产生巨大的压力。从这种意义上说，政府的支出政策在抑制和消除通货膨胀方面能够起到重要作用。

显然，政府支出的压缩有利于财政赤字的减少，从而有助于通货膨胀的缓和。但是，压缩政府支出必须在不损害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前提下进行，否则这种支出的减少就与其他目标相冲突。这就意味着每种支出同比例削减是不可取的。前面已经指出，政府支出包括资本支出和消费支出。政府的社会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一般是不能削减的，因为这些投资是经济增长和收入再分配所必需的。但政府的直接投资被认为是可以减少的。如上所述，发展中国家的国有企业大部分是无效率的，不仅需要大量资本，而且还要大量补贴。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大，因此，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能够减少政府巨大的财政负担，而且还有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就政府消费支出而言，有很多支出项目是不能减少的，这些项目或者是为维持政府工作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或者是为收入分配不可缺的。但是，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被认为可以大幅度削减，这些支出不仅不能促进反而有害于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在政府预算支出中所占比例相当大，因此，削减政府的经常性支出是很有潜力的。

### 第三节 金融制度与政策

#### 一、货币政策的局限性

在发展中国家，货币政策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就经济增长而言，货币政策的作用是动员国内私人储蓄，并有效地把它引导到生产性的使用中。但是，有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落后性，货币化比率（monetization ratio）——用货币交换的商品和服务对总量产品和服务的比例——很低，货币政策的作用受到很大的限制，至少没有像财政政策那样有效。

在西方经济学中，关于货币政策的作用有两种不同的观点。货币主义的观点强调货币供给量与经济活动水平的直接联系：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使人们能够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从而引诱经济活动的扩张；反之亦然。这派经济学家认为，通过控制货币供给的

增长，政府能够调节国民经济活动和控制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的观点着重于货币供给量与经济活动水平的间接联系：货币供给量的增加使利率降低，从而使投资增加，经济活动水平上升；反之亦然。这派经济学家认为，政府可以通过货币供给增长的控制来影响利率，从而间接地调节国民经济活动。

无论是直接调节还是间接调节，这种针对发达国家情况的货币政策工具都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这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缺乏这种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环境。

首先，在发达国家，金融机构是高度有组织的，经济上是独立的，货币和信贷市场的运行机制是有效率的，金融资产可以在各种金融机构中自由地流进流出，而且利率是由政府信贷控制和市场供求力量共同调节，从而，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区，利率基本上趋于一致。正由于有这样完善的金融市场，发达国家才能够通过货币供给量和利率的调节去影响经济活动。但是，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完全不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和金融机构在组织上缺乏严密性，经济上缺乏独立性，地区上缺乏统一性。许多商业银行只是发达国家大私人银行的分支银行，它们的方针是面向国外而不是国内的货币状况。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商业银行系统只愿意为现代制造业部门的大中型企业提供信贷，而不情愿把资金贷给小企业和小商人，小企业和小商人只得从无组织的高利贷者那里得到贷款。这样，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货币金融体系具有二元性质。一方面，存在着范围不大、受国外势力控制、为少数外国和本国的现代化企业服务的有组织的货币金融市场；另一方面，存在着范围较大、无组织、不受控制的、以低收入阶层为贷款对象的货币金融市场。这种二元的金融体系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二元结构的一种表现。在这种高度不发达的金融体制中，发展中国家政府很难通过货币供给量和利率的调节来促进经济发展和抑制通货膨胀。

其次，在发达国家，投资活动对利率和需求的变动比较敏感。因此，政府可以通过对货币和利率的调节来影响私人投资活动。但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私人的投资决策对利率和需求的变动反应灵敏度很差。当货币供给增加，利率下降，需求扩大时，生产者不会相应地扩大投资。这不是生产者缺乏理性，不愿意在有钱可赚的情况下无动于衷，而是因为发展中国家的供给缺乏弹性，各种供给瓶颈现象阻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这些供给瓶颈包括管理水平低下，官僚机构的惰性，中间产品供给不足，进口许可证限制，运输通讯设施的不完善，市场的分割造成信息不通，等等。这样，在发展中国家，货币的增加、利率的下降，非但不会增加投资和生产，反而会诱发或恶化通货膨胀。

总之，在发展中国家，以传统的西方经济理论为基础、以发达国家经济条件为背景的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到了社会经济结构的限制。结果，货币数量和利率水平不易灵活调节（上述第一个原因），即使可以调节，对生产和投资也无明显的积极影响（上述第二个原因）。

## 二、金融自由化理论

### （一）金融深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货币政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不起重要促进作用的观点，在 70 年代以前一直在

发展经济学中占支配地位。但是，70年代初，这个观点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驳斥。在1973年，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肖（Shaw, Edward）和罗纳德·麦金农（McKinnon, Ronald）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货币理论，现被冠以“金融自由化理论”（theory of financial liberalization）<sup>①</sup>。这一理论与上述货币政策无效论的观点针锋相对，认为适当的货币政策在发展中国家比财政政策更能促进经济增长。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之所以长期未能起到很大的作用，是因为政府奉行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政策所致。

金融自由化意味着解除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各种干预，使其自由地发展。金融自由化的目的是要促进金融的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即金融资产的增长在速度上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初级证券（primary security）的公开市场没有真正地形成，或者说还不发达，金融储蓄主要表现为银行系统的存款形式。因此，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的深化也就是指银行流动资产规模相对于国民收入的扩大。

金融自由化论者认为，金融深化既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又能积极地促进经济发展。正是从后一种意义上说，发展中国家的货币政策是相当重要的。

第一，银行系统规模的扩大增强了国民储蓄和投资能力。在一般情况下，储蓄基金不一定必然与投资机会相一致，那些具有最大储蓄能力的人通常不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同样，后者通常也不是前者。如果没有银行系统作为媒介，储蓄资金就不能被引导到生产性的使用。结果，富有的储蓄者采用非生产性储蓄形式，贮藏黄金和珠宝，或者购置地产和房屋等。这就减少了一国的生产性储蓄基金。另一方面，企业家因资金不足只好放弃获利性大的投资机会。这就必然减少一国的投资能力和生产效率，阻碍了经济的增长。反之，在银行系统相当发达的条件下，私人储蓄者将有可能把不生息的物质资产转向生息的金融资产。同时，私人投资者将可以通过外部资金的利用增加有利可图的投资。当然，发展中国家还可以在银行系统不发达时运用财政政策来增加储蓄和投资。但由于种种原因，财政政策的效果是很差的。

第二，银行流动资产规模的增长促进储蓄配置效率的提高。如果进入银行的储蓄占总储蓄的比例很低，那么，储蓄者所选择的投资范围很窄，或者购买非生产性资产，或者投资于小型项目。这样，他们就会丧失大量的最有利的投资机会，使储蓄资金效率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在金融发达的条件下，银行中介作用增强，储蓄大部分成了银行存款形式。于是，投资范围拓宽了，生产者为了获得银行贷款而相互竞争。结果，往往是最具生产性投资机会的借款者在竞争资金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因为他们能负担得起更高的利息成本。这就意味着储蓄得到最优的配置。另一方面，即使投资由企业内部储蓄而融资，发达的银行系统也能为决策者考虑资金的选择使用提供各种机会，刺激他们把再投资资金用于最有生产性的项目上，至少用于其利润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投资项目上。

第三，流动资产对国内生产总值比例的上升有利于就业和经济稳定<sup>②</sup>。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利率必须保持在较高的正利率水平上。而在金融浅化（financial shallow）——

<sup>①</sup> 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英文版，1973

<sup>②</sup> 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英文版，1973，14

流动资产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过程中，利率一般为负数。显然，当利率很低时，投资的机会成本很低；而劳动的机会成本相对较高，于是，生产者被引导到采用资本密集型技术上。这种技术将降低就业机会，增加资本所有者的利润收入，从而使失业问题和收入分配不均问题更加严重。相反，在金融深化过程中，利率较高，资本的机会成本相对于劳动的机会成本就较高，从而，生产者就被引导到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上来，这就提高了就业机会，从而缓和了失业和收入分配不均问题。

高利率也有利于缓和和消除通货膨胀。这是因为高利率将抑制一部分投资活动，使投资需求下降。另一方面，高利率能吸引更多的储蓄资金，从而对抑制消费需求有较大的促进作用。总需求的减少无疑对通货膨胀有相当大的抑制作用。但是，如果利率很低，甚至为负数，总需求就会大幅度增加，引发或恶化通货膨胀。

## （二）金融抑制政策

作为一种发展战略，金融深化的目标是：①调动更多的国内私人储蓄，增加金融储蓄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②提高国内各类投资者对储蓄的可得性，消除各种贷款歧视；③在整个经济中，保证投资更有效的配置；④通过更多的金融储蓄减少对财政储蓄、外援和通货膨胀的依赖。

为了达到这些目标，保持正值的较高的利率是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必须解除对金融市场施加的一切限制，使其自由地发展，即实行金融自由化。

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对金融的限制政策主要有：利息限制（interest ceiling）和准备金要求（reserve requirements）。此外，通货膨胀政策虽然不是有意地抑制金融的发展，但客观上阻碍了金融的深化。麦金农对这些政策的抑制性作了考察<sup>①</sup>。

### 1. 利息限制

利息限制是发展中国家为了刺激投资而对银行贷款利率规定的最高限。麦金农认为，公众一般只愿持有自己所需要的货币余额，超过这个余额，他们就会花费掉。要想刺激公众持有更多的流动资产，银行系统必须支付给公众一定的报酬。也就是说，只有当实际利息收入变得很有吸引力时，储蓄者才会扩大实际流动资产。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水平低，长期存款利率必须保持相当的水平才能刺激金融储蓄的大量增加。但是，作为一个经营单位，银行必须在不亏本的情况下经营。若要对存款人支付相当高的存款利息，银行就要获得更高的贷款收入，因为它们还必须弥补各项开支和取得一定的服务收入。然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政府对银行系统的贷款利率直接或间接地确定了一个最高限。这个利率限界一般都较低。这样一来，银行不得不对存款支付较低的利率。结果，公众愿意持有的流动资产减少，储蓄水平下降，金融发展受到了抑制。

由于被确定的贷款利率一般总是低于投资的边际收益率，对信贷资金的需求始终很旺盛，同时由于银行的贷款利率受到限制，存款利率也受到限制。这样，信贷资金的供给必然萎缩。结果，金融市场上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惟一的办法就是

<sup>①</sup> 麦金农，金融政策。见：科迪等编，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发展政策，英文版，世界银行，1980，93-120

实行信贷配给 (credit rationing)。信贷配给阻碍了创新, 因为可贷资金常常被分配给银行所熟悉的、贷款管理成本低的、拖欠概率最小的大中型企业, 而那些银行所不熟悉的、新创办的、采用新技术的、没有担保的、风险高的中小型企业往往得不到银行低息贷款。这显然不利于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高。信贷配给还抑制了经济的灵活性。银行机构在决定信贷分配时常常首先考虑的是人际关系, 而不是经济准则。在国家银行体系中, 政治影响往往决定投资资金的可得性。

利息限制所造成的金融抑制还会导致另一个不好的结果。在信贷需求大于供给的地方, 无组织的金融部门繁荣起来。这些非法的金融机构一般索要极高的贷款利率。结果是, 以降低信贷成本为目的的利息限制导致了一般信贷成本的提高, 造成了投机风盛行, 阻碍了生产性投资。

## 2. 准备金要求

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另一个限制是规定很高的准备金要求。准备金要求也称法定准备金, 它是指中央银行规定各商业银行必须把总存款额的一部分另行保管, 以充作对存款的准备金。在发达国家, 特别在美国, 规定一定数量的准备金的目的, 一是保护储蓄者的利益, 二是作为金融管理当局控制货币供给量的一种手段, 而后一目的被认为更重要。麦金农认为, 如果准备金要求适当, 不仅对发达国家, 而且对发展中国家, 这种准备金制度可以作为调节经济活动、稳定价格水平的一个重要工具。但是, 在当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准备金要求太高, 以至于抑制了金融的发展。在发达国家中, 中央银行规定的法定准备金对活期存款的比率是 10% ~ 15%, 对储蓄存款的比率为 5% ~ 6%, 对长期存款的比率只有 1% ~ 3%。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 法定准备金对活期和定期存款的比率已高达 50%。显然, 这样高的准备金比率已经使准备金要求从一个货币控制工具变成了一个金融抑制的工具。

假设对各种存款规定的准备金比例是 50%, 于是, 由储户得到的存款利率最多也只能是由借款人支付的贷款利率的一半, 如果扣除银行各种费用, 存款利率还不到贷款利率一半。如上所述, 政府对贷款利率规定一个最高限, 因此, 贷款利率不能上升。结果, 存款利率必然很低。这样低的存款利率抑制了储蓄者的储蓄意愿, 从而可贷资金必然减少。由此可见, 高额准备金要求与很低的利息限制结合在一起, 使得发展中国家金融制度的发展受到严重限制。

麦金农指出, 高准备金要求在发展中国家相当普遍, 其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出现严重的预算赤字。为了弥补预算赤字, 而又要避免通货膨胀, 政府可以采取两种措施, 一是向公众发行债券, 二是直接向商业银行借款。如果发行国债券, 国家需要支付一笔较大的利息, 从而增加了财政负担; 而向银行直接借款则无须支付利率。于是, 政府常常采取第二种措施。向商业银行借款可以通过提高法定准备金比例来实现。然而, 由于政府借款不支付利息, 商业银行利益受到很大损失, 降低了吸收存款的能力。由此可见, 政府预算赤字常常是金融抑制的重要原因。

## 3. 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是抑制银行规模增长的又一个因素。即使没有其他金融限制, 通货膨胀也

有阻止金融发展的作用。这是因为，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实际利率降低了，甚至变为负数，通货膨胀与实际利率的关系可以用下式表示：

$$r = (1 + i) / (1 + p) - 1$$

在这个公式中， $r$  = 实际利率， $p$  = 通货膨胀率， $i$  = 名义利率。

自 70 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普遍很高，平均为 20% 左右，最高达到三位数，而名义利率一般不超过 20%。结果，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利率为负数。此外，在许多国家里，利息收入还要纳税，这就使实际利率更低了。这样低的实际利率使储蓄者的流动资产大幅度地贬值，作为一种理性反应，公众将减少流动资产需求，从而，银行的可贷资金不断萎缩。

更有甚者，在利息限制和准备金要求较高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加剧了金融的抑制作用。若政府对贷款利率规定一个很低的限界，存款利率也会很低。当通货膨胀发生时，由于贷款利率不能提高，则存款利率的实际价值更低，一般低到零以下。这自然加速了流动资产的贬值过程，恶化了已经存在的金融抑制问题。

即使利息限制不存在，高准备金要求与通货膨胀结合在一起也会大大地降低银行可贷资金规模。假设最初没有通货膨胀，储蓄银行有 50% 的准备金要求，平均贷款利率为 10%，平均存款利率为 5%。在这种情况下，可贷资金供求达到平衡（这里假设银行支出与净收入为零）。现在，假设预期一年后的通货膨胀率为 20%。为了补偿存款者的损失，维持资金供求平衡，利率必须上升 20 个百分点，即存款利率上升到 25%，而贷款利率上升到 30%。但是，由于 50% 的准备金要求吸走了一半的贷款收入，储蓄银行就担负不起这样高的存款利率。实际上，在 30% 的贷款利率水平上，银行所能支付的最大存款利率将是 15%。于是，在 20% 的通货膨胀情况下，实际存款利率为 -5%。显然，存款者在负利率下将不愿意储蓄，可贷资金实际供给与最初情况相比就急剧地下降了。其实，通货膨胀相当于政府对银行系统的无息准备金收入的比例税。准备金要求使贷款实际利率上升，存款实际利率下降，结果通货膨胀由借款人和贷款人双方共同负担，从而金融的发展受到双重抑制。

以上关于金融政策的抑制作用是就封闭经济而言的。但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都是开放性的。在开放经济中，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政策对金融制度扩大的抑制影响更加严重。

发展中国家一般都存在着资本不足问题，因此，吸引外资内流和防止内资外流应该是发展中国家遵循的正确原则。但是，在利率受到限制的国家，国内利率水平通常低于国际平均利率水平，于是国内储蓄者被引诱把资金存入外国银行，或贷给外国投资者。尽管发展中国家对资金外流有许多限制，但这种资本净外流倾向是不可能完全被制止的。结果，低利率导致国内可贷资金的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国内利率水平低，发展中国家的外资企业将被引诱向国内金融机构借款，同时所获利润也不愿存人所在国银行机构，而是汇出国外。这样，外资流入倾向降低，外资流出倾向提高。

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通货膨胀政策与固定汇率制结合在一起，将使国内货币升值，从而，出口减少，进口增加，国际贸易赤字扩大，外汇缺口相应地扩大。这将导致国内通

货膨胀加剧，从而实际利率下降得更迅速，结果是金融系统的规模进一步萎缩。

从以上对发展中国家金融政策的抑制作用的论述中，金融自由化论者得出结论是，要促进金融深化，发展中国家必须取消利息限制，降低准备金要求，制止通货膨胀。

取消利息限制将会使存款利率上升。它从两个方面增加可贷资金规模：一方面，储蓄者愿意持有更多的流动资产，减少消费；另一方面，资本外流倾向受到遏止。当然，利率上升对生产投资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这种抑制作用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它可以减少那些效率低下的资本投资，增强整个可贷资金的有效使用和配置效率。

由于高准备金要求主要是由政府的预算赤字引起的，缩减政府预算赤字将是降低高准备金要求的前提条件。这就要求财政政策予以配合。因此，财政政策的改革也是金融自由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支出来讲，政府应尽量削减那些非生产性的、效率差的支出，特别是军事支出和各项补贴。就税收而言，政府必须实行税制改革，提高税入弹性和征税管理效率。

通货膨胀也往往是由财政赤字和外贸赤字所引起的，因此，制止通货膨胀也要求减少政府预算赤字，但同时还要求放弃固定汇率制，使外汇比价能够根据行情自由地调节。

### 三、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批判与东亚金融危机的启示

金融自由化理论是 70 年代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的复兴在金融领域里的表现，它反对政府对金融市场和银行部门的干预，相信信贷市场的自由调节能够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和促进经济增长。金融自由化理论自 70 年代初麦金农和肖提出以来，在学术界迅速流行起来，而且，基于这一理论的政策建议被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所采纳，甚至一些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把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作为对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但是，由于经验研究结果是混合的，并没有对金融自由化论者的观点给予一致的有力支持，相反，有些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推行产生了事与愿违的效果，因此，这一理论观点遭到多方批判<sup>①</sup>。

#### (一) 对金融自由化理论的批判

##### 1. 金融自由化对储蓄的影响

金融自由化论者认为，放弃对利率上限的限制使存款利率上升，从而促进储蓄的增加。这个观点受到一些学者的批评。他们通过经验研究，特别是对亚洲一些国家的经验研究发现，决定储蓄的最重要因素是实际收入，而利率对储蓄没有明显的影响。就连强烈拥护金融自由化的学者最近也承认解除利率限制对储蓄的影响不像预计的那么大。例如，马克斯韦尔·弗赖伊（Fry, Maxwell）是研究金融发展理论的权威，他在 1997 年也承认，“即使利率的储蓄效应是存在的，它也是相当小的；在过去 20 年中，正的利率效应在亚洲比世界其他地方较显著些，但甚至在亚洲，这种效应也显示出递减的趋势”<sup>②</sup>。

<sup>①</sup> 瑟尔沃尔. 增长与发展. 第 6 版. 1999. 342 ~ 346

<sup>②</sup> 瑟尔沃尔. 增长与发展. 第 6 版. 1999. 343



## 2. 金融自由化对投资的影响

按照金融自由化理论，对利率限制的取消有利于投资，因为利率的提高增加了储蓄，相应地投资也会增加。金融自由化论者实际上把银行只看做是储蓄的托管人，并且假定银行体系的贷款供给取决于银行所拥有的存款数量，即存款多，贷款就多，存款少，贷款也就少。简言之，信贷的供给量是外生决定的。这个假定遭到了凯恩斯主义者的批评。他们认为，如果银行具有创造信用的能力（事实上有这种能力），那么，由于有中央银行作为最后借款人的支持，贷款的供给将决定于贷款的需求，而不是存款的供给。也就是说，贷款的供给是内生决定的。在这种情形下，重要的不是去鼓励储蓄，而是去鼓励投资。而鼓励投资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降低利率。这个观点与金融自由化论者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有些学者对利率与投资的关系进行过经验研究。例如，迪米特里亚兹（Demetriades, P.O.）和德弗雷奥（Devereux, P.）对 63 个发展中国家 1961 年～1990 年间的有关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的高成本（高利率）对投资的负面影响超过了可投资资金更大供给的正面影响；格林（Greene, J.）和维拉鲁瓦（Villanueva, D.）利用 23 个发展中国家 1975 年～1987 年的资料，也得出了实际利率对投资的负面影响的结论<sup>①</sup>。

## 3. 金融自由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金融抑制论者认为，金融自由化有利于投资的增加，特别是有利于投资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金融自由化理论忽视了提高实际利率对成本和需求水平的负面影响。因此，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行有可能导致经济停滞膨胀。具体地说，高利率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使成本加成的价格上升，抑制了投资；此外，由于高利率吸引外资流入，造成本币价值高估，导致出口减少，以及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引起政府支出减少。这样，实际利率的提高一方面可能引发通货膨胀，另一方面造成投资、出口及政府支出下降，从而导致经济衰退。这种情况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发生过。在这些国家，因为政府债务负担加重，宏观经济的不稳定，以及极高的实际利率，金融自由化政策推行的结果是企业破产，银行体系运转失灵以及长期的经济衰退。结果，这些国家只好放弃金融自由化政策的实施，恢复了对金融部门的控制。有些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混合的。

## 4. 金融自由化与市场失灵

美国经济学家、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斯蒂格利茨（stiglitz, J. E.）从市场失灵的角度论证了政府对金融市场干预的必要性，反对完全的金融自由化。他说：“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明显不同于其他市场；在这些市场中，市场失灵很可能更为普遍……金融市场自由化的大多数原理既不是建立在对这些市场如何运行的健全的经济知识的基础之上，也不是建立在政府干预的潜在范围的基础之上。”<sup>②</sup>他以信息不完全和收集信息的成

<sup>①</sup> 瑟尔沃尔. 增长与发展. 第 6 版. 1999. 343

<sup>②</sup> 斯蒂格利茨. 国家在金融市场中的作用. 见: 世界银行发展经济学年度讨论会论文集. 世界银行, 1993.

本高昂为理论根据，指出了好几种市场失灵的情况。首先，对金融机构的监督是一个公共产品。每个人都想了解银行的偿付能力情况，但每个人都不愿意为了解这一信息付出成本。在这种情况下，对银行系统必然缺乏有效的监督，存款人的利益有可能被银行侵占，结果是每个人因为害怕自己的存款收不回来而不愿意把钱都存入银行，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的金融储蓄水平很低。其次，高昂的信息成本还能产生外部性。例如，当有一家或几家银行破产了，存款人由于缺乏信息可能假定其他本来有偿付能力的银行也将会破产，于是便纷纷挤提存款，导致更多的银行破产，使整个金融系统处在混乱之中。第三，由于信息不完全和保险费用高昂，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缺乏对各种金融风险（银行破产）和实物风险（公司破产）的保险市场。这样，如果没有政府充当保险人角色和强迫金融机构和公司公开他们的资产、负债和资信程度，一般公众在把钱用于储蓄和投资时就非常谨慎。

市场失灵的存在证明政府干预是合理的。政府或明确地或隐含地作为金融系统的保险人。政府可以使用一些刺激和限制措施来减少道德风险问题，最简单的做法是提高资本要求。此外，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斯蒂格利茨认为，金融抑制能够改进资本的配置效率：①降低利率，改进贷款申请者的平均质量；②金融抑制由于降低了资本成本而增加了厂商资本财产；③金融抑制与其他配置机制（如出口实绩）一起使用，能够加速经济增长；④指导性的信贷项目能够鼓励向具有高技术溢出效应的部门进行贷款。

关于金融抑制是否阻碍经济增长，世界银行通过考察东亚经济发展经验得出如下结论：严重的金融抑制肯定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因为它导致长期的负实际利率；但较为温和的金融抑制，保持正值实际利率却能够促进投资总量和经济增长。“这是通过把存款人，主要是家庭收入转移到主要是企业借款人来实现的；如果家庭储蓄利率弹性很低，企业又比个人有更高的边际投资倾向，这时资金转移就有可能增加投资总量。进一步说，居民对企业的实际利率补贴通过降低筹资成本而增加了企业投资的利润。这种高收益又促进了企业自有资金的增加，使它们得以向风险更大的项目投资，并可能借到更多的钱用于这些项目。”<sup>①</sup>

## （二）东亚金融危机及其启示

1997年以来，以泰国为始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东亚经济造成了持续两年多的严重的经济衰退，使世界为之震惊。就在两年以前，东亚经济的高速增长一直被称为是“经济奇迹”，作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样板，为什么突然间出现这样严重的经济混乱呢？人们都在思索这个问题。东亚金融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学术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但一致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自由化速度太快。

东亚各国推行金融自由化的主要措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①银行业务的自由化，如允许银行自由决定利率，废除信贷最高限额，减少中央银行在信贷分配中的干预。②对国外消除银行业的进入壁垒，提高外资在国内银行的持股比例，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金融机构。③以开放证券市场为中心，开放境内金融市场。④鼓励国内金融机构对外扩

<sup>①</sup> 世界银行. 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5. 161~162

张，开设分支机构，进行存贷业务。⑤采取各种措施吸引外国直接投资。

放松金融管制不能说是错误的，也不能反过来说，实行严厉的金融控制政策是正确的。这里的关键问题是看环境和条件是否具备。东亚各国的金融自由化问题主要是没有遵循渐进式的发展战略，在宏观经济体系尚不稳定、对金融系统缺乏有效监管、汇率还没有放开时，仓促推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使金融体系变得极为脆弱，经不起外部冲击，最终必然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酿成金融和经济危机。

根据东亚和其他发展中地区金融危机的教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启示：①在实行金融自由化之前，必须有一个健全的宏观经济环境，物价稳定、存款利率保持在正的水平上，以尽可能多地调动国内储蓄，减少对外资的过分依赖，并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东亚国家在放松金融控制时，外贸逆差很大，不得不靠吸引外资来填补缺口。②在放松金融管制的同时，要强化对金融系统的监督和检查制度，以提高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和公众对金融系统的信任度。东亚各国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缺乏对银行的监管或监管不力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③在健全国内金融系统之前，应该审慎对外开放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东亚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对外过早地开放金融市场，准许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开设分支机构，对金融业务不加限制。这些外国金融机构与它们的欧美母体贯通，调用资金极为便捷，资金实力雄厚，而国内金融机构势单力薄，竞争力很差。这样，外国金融机构便可以在国内金融市场上为所欲为，使银行系统、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极易遭受打击，一遇适当气候，便使金融系统陷于混乱，导致金融危机。

## 第四节 通货膨胀

### 一、发展中国家通货膨胀状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通货膨胀已成为全世界一个普遍的经济现象。70年代以前，作为一个整体，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低于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进入70年代后，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虽然发达国家的通货膨胀率也在上升，但前者大大高于后者。据《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统计资料，1985年~1995年期间，41个有统计资料的低收入国家中，有25个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其中有11个超过了50%；32个有统计资料的中低收入国家中，有25个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其中有7个超过50%；15个中高收入国家中，有9个通货膨胀率超过了10%，其中有3个超过了50%；而在24个高收入国家中，没有一个通货膨胀率超过了20%，通货膨胀率高于10%的也只有2个国家，它们是葡萄牙和以色列。可见，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比发达国家要严重得多，有的国家甚至长期处于奔腾式的通货膨胀之中。在上述21个通货膨胀率超过50%的国家，其中有8个国家通货膨胀率超过了三位数。这些高通货膨胀的国家主要在拉丁美洲和前苏联国家。

通货膨胀被定义为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升。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愈来愈严

重，发展经济学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的作用和原因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 二、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通货膨胀是有利于还是有害于经济增长，这个问题在经济学家中间一直争论不休。一派观点认为，通货膨胀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其理由来自两方面：一方面，通货膨胀能够刺激私人投资；另一方面，通货膨胀能够使公共储蓄扩大。另一派观点对通货膨胀的作用则完全持否定的态度。

### （一）通货膨胀与私人投资

通货膨胀有利论者是从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来论证通货膨胀与私人投资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他们认为，就一般发展中国家情况而言，工人和农民的边际储蓄倾向低，而资本家的边际储蓄倾向高。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工人和农民实际收入减少，而资本家的利润和红利增加。结果，整个社会的储蓄倾向提高了，可贷资金规模扩大了。另一方面，在通货膨胀过程中，实际利率下降了。这就使储蓄者实际收入减少，投资者实际收入增加，从而，投资引诱变得更加强烈。

上述观点遭到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些论点是建立在这个假定基础上的，即只有企业家认识到了通货膨胀在发生，而其他成员都没有或没有充分地意识到通货膨胀的存在。显然，这个假定是不符合事实的。企业家能认识到通货膨胀使他们受益，同样，其他利益集团也会认识到通货膨胀使他们受损。这样，受到损失的集团将会采取相应的对策来保护自己的利益。例如，实际工资的下降将会导致工人们要求增加名义工资；实际利率的下降将会导致储蓄者要求提高名义利率水平。结果，收入再分配结构不会发生很大变化，从而储蓄倾向和投资引诱不会有明显的提高。

不过，批评者认为，通货膨胀刺激私人投资的观点在以下两个条件下是有效的。第一，在通货膨胀发生的初期，工人和储蓄者预期通货膨胀是短暂的，对货币余额价值的稳定保持着信心。第二，在通货膨胀过程中，政府采取相应的政策限制名义工资和名义利率的上升。但是，这种政策将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下降，从而抵消了通货膨胀产生的利益。此外，限制工资上升会招致工人的反抗，限制利率将阻止储蓄的供给，从而导致金融抑制和金融浅化。

批评者还指出，通货膨胀过程并不是以稳定的、可预测的方式进行，而是以不规则的方式进行。这就造成了投资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加强。为了规避风险，投资者宁愿进行短期投资，而不愿进行长期投资；宁愿投资于传统技术的生产，不愿投资于新技术的生产；宁愿投资于现有存货以投机取利，而不愿投资于生产性企业以生产新产品。结果，经济增长受到抑制。

### （二）通货膨胀与公共储蓄

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即使通货膨胀不能把收入从工人和储蓄者手里再分配给资本家和投资者，它也能把收入从货币余额持有者手里再分配给政府。这就是说，通货膨胀纵然不能刺激私人投资，也能增加公共储蓄，从而增加公共投资。这种观点在五六十年代相当流行。

实际上，通货膨胀是对货币余额征税。它是公众持有实际货币余额不变为假定前提的。通货膨胀与通货膨胀税的关系可以用公式来表示。设年初的货币余额的名义价值为  $M_n$ ，它与实际价值  $M_r$  相等；设年末价格水平上涨率为  $P$ 。于是，一年后，货币余额的实际价值  $M'_r$  为：

$$M'_r = M_r / (1 + P)$$

由于通货膨胀税 ( $T$ ) 等于货币贬值额，即：

$$T = M_r - M'_r$$

而税率 ( $t$ ) 等于税收与年初货币余额实际价值之比，即：

$$t = T / M_r$$

所以，通货膨胀税率公式为：

$$t = (M_r - M'_r) / M_r = P / (1 + P)$$

这个公式明确地表示了通货膨胀的收益。在这个公式中，设通货膨胀率为 15%，则政府收入增加 13%；若通货膨胀率为 40%，则政府收入增加 29%。可见，按照通货膨胀支持者的观点，通货膨胀是一个有效的税收工具。由这种税收而增加的政府收入至少有一部分用于公共储蓄和投资，从而促进了一国资本形成能力的提高和经济增长。

上述观点也遭到很多非难。

第一，通货膨胀税收模型关于货币余额不变的假定是不现实的。即使在适度的而非恶性的通货膨胀时期，货币贬值现象也能被公众认识到。为了逃避货币贬值和利率下降，公众将会减少他们的货币持有额，缩短支付时间，提前购买物质产品。这样一来，流动资产趋于减少，从而逐渐侵蚀了通货膨胀税收基础。在奔腾式通货膨胀的条件下，公众将会把货币余额减少到接近于零，这时通货膨胀税基和税收也下降到零。此外，利率下降将会导致储蓄资金减少，投资活动受到限制。

第二，通货膨胀税收模型是建立在一个封闭经济或浮动汇率基础上的。实际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开放经济，受世界经济形势影响，而且它们大都倾向于维护固定汇率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内通货膨胀高于世界通货膨胀，那么，国内货币将会升值，结果国际贸易赤字扩大，发生外汇短缺。外汇短缺使得国内急需的资本品和中间产品进口减少，这就阻碍了经济增长。此外，外汇短缺也会导致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这些工业的生产成本高，效率低，造成了整个经济效率下降。

第三，通货膨胀融资战略是一种强制储蓄战略。显然，这种战略的实行将会削减私人储蓄和投资，因为通货膨胀税来自于货币持有者的收入，这部分收入将会有一部分用做私人储蓄和投资。现在的问题是，把私人收入转移给政府是否会减少总投资。

按照通货膨胀支持者的假定，来自通货膨胀税的政府边际投资倾向超过了私人部门的边际投资倾向，因此，强制储蓄战略不会减少总投资。对于这个假定，批评者也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政府边际投资倾向大于私人边际投资倾向意味着政府的边际消费倾向小于私人边际消费倾向。但是，如表 11.1 所显示的，在发展中国家，随着经济发展，政府经常性支出的增长常常大于国民收入和税收的增长，即政府支出弹性一般总是大于

1. 这里有多种原因, 首先是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支出较大, 各种补贴和福利支出在逐年增加。此外, 通货膨胀也增加了政府的购买支出, 这种支出的增加完全是由物价上升而引起的, 而不是实际消费的增长。可见, 发展中国家来自通货膨胀税的政府边际投资倾向很可能小于私人企业的边际投资倾向, 从而总投资不是增加而可能减少。

### (三) 最优通货膨胀

以上概述了关于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关系的两种相反的观点。看起来, 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于是, 有的学者试图把这两种观点调和起来。通货膨胀有利论者认为通货膨胀能促进经济增长, 实际上是以低度通货膨胀为前提的; 通货膨胀有害论者认为通货膨胀阻碍经济增长, 实际上是以高度通货膨胀为背景的。那么, 如果在现实中存在一个不高不低的通货膨胀, 两派观点不就是一致的吗? 于是, 有的学者提出了最优通货膨胀这个概念<sup>①</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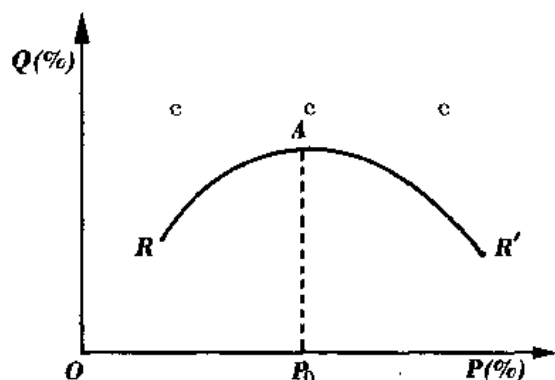


图 11.2 最优通货膨胀

最优通货膨胀率可以用图 11.2 来表示。横轴表示通货膨胀率, 纵轴表示国民收入增长率。RAR' 即为通货膨胀曲线。当通货膨胀低于  $OP_0$  时, 通货膨胀上升促进经济增长; 当通货膨胀超过了  $OP_0$  时, 价格水平的上升阻碍了经济增长。只有当通货膨胀为  $OP_0$  时, 经济增长率达到最大值  $P_0A$ 。

在现实中是否存在一个最优通货膨胀率呢? 如果存在, 最优值又是多少呢? 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需要作细致的统计和计量分析。有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作过经验研究, 但这些研究没有得到一般的重要结论。例如, 英国经济学家瑟尔沃尔在 70 年代初对 51 个国家在 1958 年 ~ 1967 年间通货膨胀与增长的关系作了经验考察。他发现, 对于全体样本, 通货膨胀与增长没有重要联系。但是, 如果把这些样本按照人均收入水平与通货膨胀率进行分组, 一些有意义的结果出现了。对于人均收入超过 800 美元而通货膨胀在 3% ~ 8% 之间的 17 个高收入国家, 存在如下关系:  $g = 2.79 + 0.61P$ 。这里,  $g$  为经济增长率,  $P$  为通货膨胀率。对于通货膨胀率超过 10% 的低收入国家, 通货膨胀率与增长之间表现出相反关系。对于所有样本国家, 温和的通货膨胀是与最高的投资—收入比率相一致的。唐·韦 (Wei, Tun) 在 1959 年对 31 个国家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在达到一个临界通货膨胀率之前, 通货膨胀与增长正相关, 在这个临界点之后, 通货膨胀与增长负相关。在唐·韦模式中, 使增长率达到最大的通货膨胀率是 12.8%。哈伯格 (Harberger, A.) 证明这个最优通货膨胀率在 5% ~ 10% 之间<sup>②</sup>。最近的经验研究支持了早期的研究结果。例如, 世界银行专家布鲁诺 (Bruno, M.) 研究了 1960 年 ~ 1992 年期

究, 但这些研究没有得到一般的重要结论。例如, 英国经济学家瑟尔沃尔在 70 年代初对 51 个国家在 1958 年 ~ 1967 年间通货膨胀与增长的关系作了经验考察。他发现, 对于全体样本, 通货膨胀与增长没有重要联系。但是, 如果把这些样本按照人均收入水平与通货膨胀率进行分组, 一些有意义的结果出现了。对于人均收入超过 800 美元而通货膨胀在 3% ~ 8% 之间的 17 个高收入国家, 存在如下关系:  $g = 2.79 + 0.61P$ 。这里,  $g$  为经济增长率,  $P$  为通货膨胀率。对于通货膨胀率超过 10% 的低收入国家, 通货膨胀率与增长之间表现出相反关系。对于所有样本国家, 温和的通货膨胀是与最高的投资—收入比率相一致的。唐·韦 (Wei, Tun) 在 1959 年对 31 个国家的一项研究中发现, 在达到一个临界通货膨胀率之前, 通货膨胀与增长正相关, 在这个临界点之后, 通货膨胀与增长负相关。在唐·韦模式中, 使增长率达到最大的通货膨胀率是 12.8%。哈伯格 (Harberger, A.) 证明这个最优通货膨胀率在 5% ~ 10% 之间<sup>②</sup>。最近的经验研究支持了早期的研究结果。例如, 世界银行专家布鲁诺 (Bruno, M.) 研究了 1960 年 ~ 1992 年期

① 基利克. 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 见: 迈耶编. 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 英文第 4 版. 1984. 274 ~ 279

② 瑟尔沃尔. 增长与发展. 英文第 3 版. 1984. 284

间 127 个国家年度观察值，得出的结论是：在通货膨胀达到 5% 之前，人均收入增长是上升的；超过了 5%，增长率开始趋于下降，但仍然保持正数；当通货膨胀上升到超过 30% 时，人均收入增长降到零以下，而且通货膨胀率越高，人均收入增长率负值越大<sup>①</sup>。

关于最优通货膨胀率是否存在，现在仍然没有得到意见一致的结论。这是因为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很多，而且相互作用，这就模糊了价格水平与增长之间的确定关系。由于这个原因，有些经济学家支持适度的通货膨胀，有些经济学家反对任何程度的通货膨胀。但是，有一点意见是一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如超过 30%）对经济增长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 三、通货膨胀的原因

假设有一个最优通货膨胀率存在，那么，一个国家的政府就必须把实际通货膨胀率控制在这个最优水平上。但是，要控制通货膨胀，就必须弄清楚通货膨胀的原因。

在 60 年代初，拉美一些国家发生了恶性通货膨胀，这一现象导致了一场有关通货膨胀原因的激烈争论。争论被分成两派，一派被称为货币学派，另一派被叫做结构学派。虽然这些争论是以拉美国家的环境为背景的，但对整个发展中国家具有普遍意义。实际上，这两派在通货膨胀原因上的分歧是发达国家的需求拉上通货膨胀与成本推进通货膨胀的理论分歧在发展中国家的变种。

货币学派主要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和学者组成。这一派坚持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发行过多造成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常常发生财政赤字，于是，它们向中央银行借款来弥补赤字支出，中央银行通过印发钞票来满足政府的需要。由于这些货币存量的增加没有相应的物质产品作基础，较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产品，结果是一般物价水平的上升。价格水平的上升使实际利率下降，从而刺激投资需求的扩张。另一方面，利率下降使储蓄下降，从而刺激了消费需求的增加。结果总需求增长快于总供给增长，进一步加剧物价水平的上涨过程。因此，这派经济学家主张，只要中央银行紧缩银根，或者政府减少预算赤字，通货膨胀就会停止。

结构学派由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学者组成。他们不同意货币学派的观点，而认为，货币扩张只是通货膨胀的征兆，并不是原因。政府预算赤字和中央银行印发钞票只是对结构刚性的反应。发展中国家的供给无弹性才是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

首先是粮食供给缺乏弹性。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和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运用传统技术耕作的农业不能提供足够的粮食来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求。结果是食品价格上涨。在发展中国家，食物消费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相当大；这样，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就会下降，这就迫使城市劳动者要求增加工资。如果劳动者要求提高实际生活水平或预期未来通货膨胀率更高，甚至要求工资提高的幅度大于食品价格的上涨幅度。名义工资的增加使生产成本增加，企业家将会通过提高产品销售价格来转嫁成本负担。结

<sup>①</sup> 布鲁诺·通货膨胀真的降低增长率吗。金融与发展，1995. 9

果，工业品价格水平上升。由于农业供给瓶颈问题未解决，粮食供给的增长始终赶不上需求增长，食品价格将持续上升，从而工资和物价螺旋式上升。工业部门由于工资上升而流动资金增加；此外，物价上升引诱企业家扩大投资，于是银行发放贷款剧增。另一方面，在物价上升过程中，政府支出将急剧增加（雇员工资上升，补贴增加和其他支出扩大等），使得税收收入增加赶不上支出的增加，结果是政府预算赤字愈来愈大，政府被迫向银行透支。综上所述，结构学派认为，工业借款和政府赤字是对粮食供给无弹性所引起的价格上升的被动反应。通货膨胀不是由政府积极扩大货币供给的结果，而是结构刚性的结果。

以上是在封闭环境中描述通货膨胀过程的。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都是与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在开放经济中，国内粮食供给不足可以通过进口食物来满足。但是，结构学派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是无弹性的。由于工业不发达，发展中国家主要出口产品是农产品和矿产品，这些初级产品的收入弹性低，贸易条件常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出口增长和外汇收入增长缓慢，远远不能满足发展中国家对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的需要。国内粮食供给不足几乎不可能通过进口来补充。此外，出口结构的刚性和对外贸易的不平衡导致发展中国家采取进口替代工业发展战略。而进口替代工业的发展受到各种供给瓶颈的限制，成本高，效率低，造成工业品物价水平不断上升。

根据上述观点，结构学派提出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建议，不是控制和降低中央银行的货币供给量，而是要打破结构刚性。粮食供给不足是农业生产落后的结果。要增加粮食生产，政府必须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农业技术革新和提高生产率，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减少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放慢乡村人口流入城市的速度和规模。同时，发展中国家还必须采取严厉措施控制人口增长。

结构学派的观点和主张遭到货币学派的指责。货币学派批评说，供给无弹性完全不是结构性的，而是由政府的错误政策造成的。粮食补贴导致了粮食需求增加，利息限制引起了投资的膨胀，固定汇率制造成了外贸赤字扩大。所以，减少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的干预是提高供给弹性的关键。

虽然货币学派与结构学派在通货膨胀问题上争论激烈，但有的学者认为，这两派的实质分歧并不很大。实际上，结构学派是从长期观点来看待通货膨胀根源的。在长期，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只有通过增加生产和供给才能彻底得到根治。货币学派是从短期观点来看待通货膨胀起因的。在短期，发展中国家惟有控制货币供给增长率才能制止恶性通货膨胀。这两种观点是不矛盾的。其实，货币主义者并不否定供给对通货膨胀的影响；结构主义者也不否定需求对通货膨胀的作用。正如一位学者指出：“事实是，在短期，所有结构主义者，当他们负有制定政策的责任时，都是货币主义者；而在长期，所有的货币主义者都是结构主义者。因此，我们可以诙谐地把货币主义者解释为一个性急的结构主义者，把结构主义者解释为一个不负制定政策责任的货币主义者。”<sup>①</sup>

---

<sup>①</sup> 坎普斯，关于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见：迈耶编，经济发展中的主要问题，英文第4版，1984，268



#### 四、通货膨胀为什么不易控制

如前所述，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20%，有些国家通货膨胀率甚至达到三位数。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已大大超过了最优通货膨胀率水平，显然有害于而不是有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假设通货膨胀率能够通过关住货币水龙头来控制（事实上是可以的），那么，长期遭受恶性通货膨胀之苦的发展中国家为什么不这样做呢？有的学者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

首先，控制货币扩张的有效措施像通货膨胀一样不受欢迎，有时前者可能更令人难以忍受。减少货币供给就必须削减政府支出、限制信贷规模、提高利率、增加税收。这些措施必然导致投资下降、生产停滞、失业增加和生活水平下降。

其次，从通货膨胀中获益或从降低通货膨胀中受损的人大都是在政治上有势力的成员。企业界从需求膨胀中预期利润将会扩大，从需求抑制中预期利润会缩减，因此资本家不愿意制止通货膨胀。政府本身也是通货膨胀的受益者之一。虽然政府支出在通货膨胀时期会增加，但它可以从偿还公债的较低成本中和通货膨胀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这样，政府对反通货膨胀往往不是心甘情愿的。另一方面，通货膨胀的福利损失趋向于扩散到社会每个消费者，这样，损失负担对每个人来说都不太重，这就不易引起特别的反抗。此外，在通货膨胀中受损失最大的人往往是没有政治权利的人，如城市的穷人和退休金领受者。

综上所述，发展中国家的通货膨胀之所以长期得不到完全控制，不是因为政府没有办法控制通货膨胀，而是因为政府不愿意控制它。货币学派和结构学派的分歧，实质上不在于通货膨胀是否能控制得住，而在于控制它的措施是否可行。货币学派认为可行，因为通货膨胀造成的危害比控制通货膨胀带来的损失更大。结构主义者认为不可行，是因为如果不打破供给瓶颈，控制通货膨胀的代价比通货膨胀的成本更大。

## 第十二章 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 干预与市场调节

在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中，我们曾回顾了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发展理论。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出现的重商主义，强烈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早期重商主义者力图在国内把货币以贮藏货币的形式积累起来，达到积累货币财富的目的；晚期重商主义者为了鼓励输出，实现出超，主张国家实行保护关税的政策并采取扶植和鼓励生产出口商品的工场手工业的政策。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者的亚当·斯密，强烈反对重商主义，反对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把“自由放任”视为他所主张的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认为在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之下，生产者的“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程度”，从而“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sup>①</sup>。德国的历史学派反对古典学派的自由放任思想，强调国家对经济发展的特殊作用，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和实行保护贸易，用国家的力量来保护和促进德国经济的发展。可见，对国家干预的作用和市场调节的机能，过去的西方经济学家，曾经从所处国家经济发展的利益出发，各自从一个方面加以强调。

在当代西方经济发展理论中，这种只从一个方面——国家干预或市场调节——的作用去规定经济政策的主导思想的情况，也明显地存在过。一般而言，在60年代初期以前的第一阶段，当时的发展经济学家以计划管理或规划的必要性为中心，突出国家干预的作用，具有代表性的是罗森斯坦-罗丹的论证，而其他的发展经济学家则不只限于计划管理的范围去强调国家干预；60年代中期以后的第二阶段中，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在新古典主义的基础上，去批评国家干预、特别是高度集中计划管理的不足之处，具有代表性的是拉尔（Lal, Deepak）的论证。也有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注意到市场机制不仅有利于资源配置，还有利于经济发展，提出了市场机制是经济发展工具的看法，具有代表性的是约翰逊（Johnson, Harry G.）的论证。现在，西方发展经济学家通过对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两方面更深层次的分析，逐渐认识到，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都是重要的，都不可偏废。就是说，在经济不发达的现实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的经

<sup>①</sup>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下册. 商务印书馆, 1974. 27

济政策应当具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大力发展商品经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另一方面恰当地发挥国家的职能，通过必要的计划管理或调节以及财政金融政策等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而合理的干预。也就是说，应当“两手”并举，把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和国家干预这只“看得见的手”<sup>①</sup>的作用，很好地结合起来。

## 第一节 罗森斯坦-罗丹、拉尔和约翰逊的论证

### 一、罗森斯坦-罗丹对市场机制缺陷的论证

罗森斯坦-罗丹说，按照新古典主义的理论，自由的、畅通无阻的市场机制将导致国民收入的最大化和最优化，而任何蓄意影响投资数量和投资构成的经济政策将不可能长期地提高国民收入。在竞争条件和单位时间微小变化的假设之下，新古典主义者认为，供求机制的运行，通过四个阶段或四种“均衡”，将实现国民收入的最大化和最优化：①既定消费品存量的配置；②在既定装备、土地和劳动存量的条件下生产的配置；③在既定劳动、土地和资本存量的条件下投资的配置；④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供给与需求相等。

罗森斯坦-罗丹认为，在新古典主义假设的条件下，价格机制在第一阶段或第一种均衡中，可能充分发挥作用。如果把消费品存量的假设转换为在既定设备、原料和劳动存量条件下消费品供给流量的假设，则价格机制虽不能充分发挥作用，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然而，在第二阶段或第二种均衡中，如果丢掉既定固定资本的假设，而代之以投资的数量和构成决定于众多的单个投资决策的假设，则价格机制将不可能发挥使国民收入最大化的作用。由于下述的一些理由，众多的单个决策势必导致资源配置的非最优化：

(1) 单个投资者最大化的是自己的净边际产品，而不是社会的净边际产品，也不能充分开发外在经济效益。而行业的互补性是巨大的，它要求投资的同时并举，而不是投资的自发巧合。

(2) 生产装备的生命周期是较长的（一般是10年），从而比起买者、卖者或生产者来，投资者的预见能力可能是较不充分的。单个投资者的风险也比全面投资规划的风险更大，错误的投资决策的代价很高，以资本损失为惩罚的受害者，不仅是投资者本身，而且是整个国民经济。

(3) 由于资本的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增减投资引起的是较大的变化，不是较小的变化。而价格机制只在微小变化的假设条件下，发挥其微调的作用。

---

<sup>①</sup> 此词最先由伯林纳（Berliner, J. S.）于1957年提出，1960年又由纽伯格（Neuberger, E.）把它作为论文标题的一个部分，论文标题是《利伯曼主义计算眼光与看得见的手》，载《美国经济评论》，1966年5月号。

(4) 资本市场虽然一般有完善的组织，却是有名的不完全市场，它不仅受到价格的制约，还受到制度的或传统的配给限额 (rationing quotas) 的制约。

因此，罗森斯坦-罗丹说，在新古典主义理论中，投资论是最薄弱的环节。

此外，罗森斯坦-罗丹还指出，新古典主义主张的自由放任经济不可能保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对于这一点甚至最坚定的自由经济鼓吹者也不能不承认。平衡总供给与总需求的任务只有依靠深思熟虑的政策去完成。如果总供给与总需求处于失衡状态，价格就不再是经济选择的可靠参数，而整个价格机制就会瓦解。市场经济的各种自发反应也不保证四种市场中两种市场的最优化配置，它们可以保证消费品存量和在一定装备存量基础上消费品的供给，但在投资和货币均衡的领域中却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对比之下，规划起着市场机制所不能起的作用。罗森斯坦-罗丹说，规划不啻是理性的、深思熟虑的、前后一致的、协调的经济政策的另一种说法。它明显地表达出任何货币的（财政的和商业的）政策经常暗含地要达到的目的，货币的（财政的和商业的）政策，是一种利用间接手段以完成其目的和指标的规划形式。货币政策在它的第一阶段——可称为前威克塞尔阶段（Pre-Wicksellian Stage）——的目的，仅仅是求得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而未能清楚地区别投资与消费的关系。进入第二阶段——可称为后威克塞尔阶段（Post-Wicksellian Stage）——的目的比较明确，既对不同部门的国民收入加以区分，又考虑政策对它们的冲击效应。货币政策的第三阶段——可称为后凯恩斯阶段（Post-Keynesian Stage）——不仅旨在达到货币的均衡，还以充分就业的实现、更进而以最佳增长率的保证为目的。规划所关切的不只是投资的数量，还包括投资的构成。它所利用的手段可能是间接的（如货币的、财政的和商业的政策），也可能是直接的（如公共投资）。即使不能利用直接的信息，规划也有必要对投资者提供短期和长期趋势的信息，特别是有关行业互补性和投资对国内、进口以及出口未来需求的间接影响所造成的跨部门需求的信息。这些信息将指引和影响投资构成。

罗森斯坦-罗丹结论说，即使只采用间接手段，经济政策的积极作用也是不能被否认的。但是承认这一点，也必须注意不要把两种不同的观点混淆起来：一种是新古典主义“自由派”的观点，认为国家干预仅仅是偶然的应急措施，而一般情况是单个的或私人的投资决策将正常地导致最佳状况；另一种是主张国家积极干预的观点，认为必须采取超越于保证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措施之上的积极的、不中断的经济政策，因为众多的分散个人决策将不会导致国民收入的最大化。真正的问题是：规划应当有多大范围，应当包括哪些东西，应当在各个经济部门之间和各个经济部门之内保留多大程度的“自由”<sup>①</sup>。

作为西方发展经济学先驱人物之一的罗森斯坦-罗丹的上述分析，可以概括为两点：

- (1) 即使竞争条件下的市场机制也是有缺陷的。
- (2) 为了国民收入的最大化和最优化，国家必须以规划为中心对经济进行干预。

可以推论，当一国经济处于发展阶段时，市场机制更难促成国民收入的最大化和最

---

<sup>①</sup> 罗森斯坦-罗丹，规划理论及其在意大利的实践。见：投资标准与经济增长。英文版，1961，19~22

优化，国家更必须以规划为中心对国民经济进行干预。

## 二、拉尔为新古典主义辩护，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的论证

拉尔说，那些强调国家干预和计划管理的发展经济学家批评新古典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政策建议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所举理由似有两点：①新古典主义关于行为的、技术的和制度的假设，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现实的。②新古典主义主要关心的是既定资源的有效配置，它既不能解决所谓的增长动态变化问题，又不能解决减轻贫困或收入分配不均之类的伦理问题，从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切合的。拉尔认为，上述两点对新古典主义的批评都远非正确。

拉尔说，首先，大量经验证明，发展中国家人民的行为方式并不与发达国家人民的行为方式在本质上存在着差异。尽管文化、气候不同，发展中国家未受过教育的农民还是一样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而经济地采取行动，并按照新古典主义的预言对相对价格的变化作出灵敏的反应。新古典主义的这种“经济原则”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并无经验证明，新古典主义关于生产中不同投入替代的可能性之类的技术假设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在国民产品的生产中，不同要素和商品在投入结构中互相替代的灵活程度，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并无很大差异。也不能假定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具有一种特殊的偏好：当他收入提高时（无论在多么低的基数上提高多么小的数额），他们竟毫不考虑增加他们的“闲暇”，反过来说，他们和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一样，会意识到工作时间越长、工作越辛苦，“汗水”的代价越高。他们和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一样，不可能处于任何经济意义的“剩余”状态。发展中国家的所谓制度上的特点，诸如它们特殊的社会和农业结构，高利贷的、非正规的信用市场等，并不必然成为经济增长的障碍。相反，这些结构和体制也许可以促进效率。它们并不如主张计划管理者所说那样，是无理性的、非经济的，而可能对所处经济环境中存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具有有效率、次优的适应力。在没有其他手段消除或减轻那些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破坏传统体制可能害多而利少。

其次，拉尔说，诚然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未能对发展过程，或所谓的动态变化问题作出严谨细密的说明，但主张集中管理的经济学家也并未提出另一套足以研究和影响动态过程的理论框架。他们以所谓的“动态过程”为基点的集中管理的论证，通常缺少连贯性，或者仅仅是做做姿态而已。例如，赫尔希曼提出了两种似乎是动态的效应：一是所谓投资的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一是把经济上陷入困境的投资项目转化为成功的“躲藏之手”（hiding hand）。然而，后向联系和前向联系实际上不过是任何略为复杂的经济中广泛存在的生产相互依存关系，而且即使存在着这两种联系，也不能成为集中管理的特殊理由。“躲藏之手”的说法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求助于这一概念，势必排除在好坏投资项目之间事前作出鉴别的可能性。更为重要的是，那种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特别不适合于分析发展中国家的动态过程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持这种说法的理由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对经济中可供选择的均衡状态进行比较，和完全竞争一样，均衡是观念中的状态，从而无助于了解实际经济的运行。拉尔反驳了上述说法，他认为，正

是由于它只对不同的均衡状态进行比较而不注意两种均衡之间的调节过程，正是由于它强调商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的韧性，新古典经济学可能在发展中国家更为适合。因为，和富国的情况不同，穷国的经济主体很少有“储备”可以依赖，从而会根据经济环境的变化，通过改变他们愿意交换经济商品的条件，迅速地作出反应。对比起来，在发达国家中，经济主体由于拥有相当大量的储备（或者具有过去储蓄的形式，或者具有福利国家给与的权利的形式），反而对经济环境的变化反应缓慢，迟迟不去调整应当调整的价格。因此，那些据称因市场价格出现刚性而要求修正新古典主义理论的说法，在发展中国家更是不可能被接受的。

最后，在拉尔看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表明，价格机制对促进增长、促进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把价格理顺”（get the prices right）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另一方面，正确而合理地进行集中管理，实行干预政策，是极其艰巨而复杂的组织与监督工作，发展中国家的低效能政府很难作好它。在这一点，拉尔要求人们不要忘记亚当·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研究》中的告诫，“因为18世纪低效能国家的当代翻版，甚至对经济进步所要求的最低限度政府职能都常常难以完成。”<sup>①</sup>

作为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尖锐批评者的拉尔的上述分析，可以概括为两点：

（1）从根本上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运行机制应当是市场—价格机制，而不是计划管理机制。

（2）新古典经济学的原理不仅适合发达国家，也适合发展中国家。

### 三、约翰逊关于市场机制是经济发展工具的论证

约翰逊从国家计划和价格机制的对比，陈述了必须重视市场机制、但市场机制又只是较可取的经济发展工具（instrument of economic development）的观点。他认为理由有二：第一，鉴于不发达国家的特别困难和缺乏效率，集中控制和管理所预期的结果不易实现。在这一点，约翰逊也提到了亚当·斯密对当时政府腐败无能的剖析和主张自由放任的观点。第二，市场机制会引起不可取的社会效应，如果任其发展，代价是昂贵的，特别是快速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均的矛盾如何解决是必须注意的。

基于上述基本认识，约翰逊从两个方面作出分析。

一方面，他充分肯定市场机制的作用。他指出：市场在消费者之间定量分配了消费品的供给，定量分配受制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如果收入分配状况不恶化，这种定量分配方式对社会而言是一种高效率的方式；市场按照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在商品之间配置生产，如果收入状况不恶化，这种配置方式也对社会有益；市场按照各个生产要素取得最大报酬的原则，在各种用途中配置生产要素；市场制约着可供使用的劳动和资本装备的相对数量；市场在生产要素、从而在个人之间分配收入。总之，市场可以解决稀缺资源在不同目的之间进行配置的一切经济问题。

约翰逊强调说，上述的五种功能只是市场的静态的功能，除此之外，市场还以各种

<sup>①</sup> 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英文版，1965，103～109

方式为经济增长提供刺激。商品通过市场供消费者使用来刺激消费者去谋求如何增加收入。市场的扩大为发明者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以取得利润提供机会。此外，市场还为各种资本和累积提供刺激。首先对表现为受过训练的高技能劳动形式的人力资本积累提供刺激，因为受过训练的高技能劳动在市场中可以获得较高的报酬；其次对物质资本的积累提供刺激，因为累积起来的物质资本在市场中可以赚得收益。总之，正常发挥作用的市场体系既会刺激经济效率，又会刺激经济增长。而且市场是自动地达到这双重目的的，它不需要庞大的管理体制，不需要中央决策，所要求的只是保证履行合同的法律体系。

另一方面，约翰逊认为，必须认真分析对市场机制的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反对意见可分两类：一类是批评市场机制不能正常地完成它的功能；另一类是批评市场机制自我运行会产生不令人满意的结果。

就第一类反对意见而言，可能指两种情况：一是市场不完全地运行，一是完全运行的市场不发挥它应有的功能。约翰逊说，发展中国家市场之所以不完全地运行，可能归因于无知，如对市场机制不熟悉，或对有关信息不了解，也可能归因于和报酬最大化理性原则不同的行为模式的影响。如原因是前者，政府不必代替市场作出配置决策，而可以传播使市场有效运转的知识和信息，并提供利用市场所必需的教育和训练。如原因是后者，则不仅阻碍市场机制的运转，还阻碍经济发展的本身，需要的是社会心理的变革。但是，约翰逊认为不应当过分夸大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社会心理的差异。他不同意那种认为发展中国家人民完全不懂收益最大化的原则以及供给和需求都缺少弹性的说法。

就第二类反对意见而言，也可能指两种情况：一是市场造成的收入分配是不公正的，一是市场不能使经济增长达到令人满意的高度。约翰逊说，市场对收入的分配决定于各个人的才能和财富，决定于他利用他的劳动和金钱以寻求有利可图的机会的才干，只要他们作出了明智的或幸运的选择，他们就可得到较高的收入。如果认为这种决定收入分配的方式有欠公平而进行干涉，就会使市场体系失去效率。如果人民不被允许去享受由他们自己的决策而得来的收入，就会影响他们的决策，损害市场体系的效率，因此，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的矛盾是存在的，但这种矛盾的范围和程度将随着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国家越发达，人民对收入分配问题越关心，越乐于承受纠正分配不均的高额税率而不会不正常地改变他们的行为，另一方面，收入水平越高，由重分配政策而引起的增长率放慢的程度就越小。发达国家能够为了社会公平而经受得起牺牲一定程度的增长，而低发展水平的国家为了使收入分配均等一些，所付出的代价可能较大，一个急于要得到快速增长的国家坚持实行保证经济平等和分配公正，可能是不明智的。至于认为市场不能使经济增长达到令人满意的高度的说法，其真正的含义是只有国家才能完成促成高速经济增长的任务。提出这种说法的理由是，社会未来的需要，自由市场一般难以判断，因此，尽管人们对当前投资与储蓄如何安排，比政府认识得更清楚些，但未来的投资需要，则从不断变动、不断前进的社会的角度去观察，情况就会明确些，从而政府可能对经济增长的促成发挥较大的作用。约翰逊认为，上述的推论不一定切合

实际，也不能简单归结到一点：政府自己应当从事发展投资和储蓄。在他看来，个人可能比政府更有效率地建立企业并运营企业，最好的政策是用租税减免、补贴和信用放宽去刺激个人企业。政府也宜于用高利率去刺激私人储蓄，而不宜用租税或通货膨胀去进行强迫储蓄。政府自己从事投资，而管理者对投资目标又不明确，其结果将形成不愿进一步发展、不愿意技术平衡的既得利益产业。

在上述的分析之后，约翰逊又强调说，他并不主张完全的自由放任政策，并不认为市场机制可以完全代替政府集中规划去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而认为应当利用市场机制作为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工具。他说：“我曾关心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也曾着重指出市场在自动决策各种资源配置中的经济功能，以及经济发展增进规划在市场组织和方法中的位置。但是，我所主张的并非自由放任政策，而是承认市场是一种管理工具，它可以比较低耗费地操作，从而是富有效率的工具，虽然市场在运行中有可以反对的缺点。我所论辩的一般假设是：经济发展是国家和私人企业之间的一种合作过程，问题是如何找出可能的最佳配合。”<sup>①</sup>

作为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sup>②</sup>之一的约翰逊的上述分析，可以概括为两点：

(1) 与一些反对意见所说相反，市场机制可以对经济进步发挥重大作用，它既可提高经济效率，又可促进经济增长。

(2) 配合政府的干预，市场机制可以作为经济发展的工具而起作用。

## 第二节 60年代中期以后大多数发展经济学家对国家干预和市场调节关系的基本观点和更深层次的分析

### 一、基本观点

他们一般地把商品经济不发达和市场不完全看成是经济落后的重要表现，也是阻滞经济发展的重大障碍。商品经济不发达和市场不完全的具体表现是：产品不能按照消费者的偏好安排生产，投入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价格具有刚性，市场信息闭塞，专业分工粗疏，社会结构僵化，从而资源得不到最佳配置，生产效率低下而难以提高；与之相反，商品经济发达和市场完全的具体表现是：产品能够按照消费者的偏好安排生产，投

<sup>①</sup> 约翰逊. 货币、贸易和经济增长. 英文版. 1962. 152~153, 156~159, 160~163

<sup>②</sup> “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指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的经济学家们，按照华尔（Wall, David）的说法，这些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一般地反对两种观点：第一，发展是一个自动的过程，它偶尔受到一些易于辨认的约束条件的障碍；第二，发展过程可以采用机械模式模拟，而机械模式可以用作政策处方的基点。他们也一般地坚持三种论点：第一，理论是最重要的；第二，理论和特定的实际经验相联系，否则是不中肯的；第三，在没有相反论据的条件下，市场是起作用的。华尔的这种说法，见他主编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发展论文集》的《序言》，1972年英文版，第7页。



人要素能自由流动，价格具有弹性，市场信息灵通，专业分工精细，社会结构灵活易变，从而资源能得到最佳配置，生产效率可以不断提高。

他们说，发展中国家资源得不到合理配置有一种常见形式，即相当大量的农业劳动者的边际生产率接近于零，但由于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不能移到生产率较高的非农业部门以取得较高的报酬。阻碍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风俗习惯、社会态度，特别是法令规章约束了人们难以离乡背井、另谋职业。其次，劳动者自身的贫困，使他们缺少资金外出求职和维持取得新工作机会之前一段时间的生活，而只好安于现状。还有，劳动力的供求双方对市场情况互不了解，也使劳动力无法在更好的条件下就业。和劳动力一样，作为另一投入要素的资本，也不能自由流动，不能得到最佳配置，不能得到更高的生产效率。得不到最佳配置的投入要素的生产率既然是低下的，它们的收入或价格（表现为工资率和利息率）也必然是低下的，和社会机会成本或影子价格远远背离。在这种情况下，投入要素之间，更不可能做到灵活的替代和恰当的配合，从而产出量无法达到生产边界所能容许的高度，社会产出和收入只能维持在低下的水平。

不仅如此，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还从他们的微观经济基础理论出发，把充分发达的商品经济所形成的所谓完全竞争市场看成是企业生产的最优的理想的境界。按照微观经济学的论证，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市场价格和边际成本相等，也和最低平均成本相等，从而价格最低，产量最大，生产资源和生产能力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在有充分竞争的市场上，降低成本、增加产量、改进质量、提高效益、注意产品的更新换代、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等等锐意改革并努力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得到发扬。

总之，在他们看来，完全的或完善的市场机制是具有灵活的刺激—反馈作用的经济机制，在这种机制的顺利运行中，国民经济可以从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在自我调节中求得均衡，求得增长。因此，发展中国家为了摆脱贫困，谋求富裕，就必须大力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确立市场机制，发展市场机制，利用市场机制。

另一方面，现在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又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大力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的同时，也必须由政府经济进行干预，实行宏观管理甚至计划管理。其主要论点可归纳如下：

首先，今日的发展中国家，和十八九世纪的西欧和北美的情况毕竟有所不同，市场机制较难充分发挥作用。阻碍投入要素自由流动的并不只是市场的原因，而且为了谋求发展，也不能只限于如何促进投入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应当有适当的宏观调节和计划安排，这样才能有效地避免浪费和重复；使企业和个人的短期利益不与国家的长远利益相冲突，才能有效地减少失业，缩短收入差距，在保证大多数人的基本需要的条件下，取得快速的经济增长。

其次，只有政府才能通过宏观控制以及计划管理，发挥稳定经济的作用。市场机制固然可以使生产者根据不同产出的需求配置各自的投入，却不能保证配置的总量恰恰等于投入的供给总量。出现这种情况时，市场的配置作用将受损害，因为此时的价格不能结清供求，市场赖以决定资源配置的价格均衡机制已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如果投入的

供给总量超过其需求总量，则一部分资源将得不到配置而闲置起来，价格机制无法有效地改变这一状况。以“充分就业”为目标的宏观管理政策，可能对这种有损资源合理配置的现象作出补救，虽然这些政策并不能代替市场体系。

再次，经济上的互相依存和外在效益（或负效益）需要政府的干预。市场机制无论运行得多么完美，市场价格总难以衡量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因为有些成本和收益不出现在市场之中，而发生在市场之外。消费者或生产者只是按照市场情况计算其“收益”和“成本”，以谋求最大的满足或最大的利润，而非市场的经济关系的存在使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计算与社会的计算并不一致。消费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表现在：一个的消费满足可能使其邻人感到舒适（如收听优美的乐曲），也可以使邻人受到干扰（如发出吵闹的声音）。消费者与生产者的相互依存关系表现在：工厂修建的道路便利了居民的交通，但放出的废气又影响了居民健康。生产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一般称为外在经济（external economies）或外在不经济（external diseconomies）。当一个生产者无代价地分享了另一个生产者所创造的资源时，他就得到了外在经济效益。例如，一个企业培训的工人受到了另一个企业的雇佣。后一企业无异于不付出培训费而得到了一位熟练工人。前一企业为它提供了外在经济效果。不能获得专利权的基础研究成果，也会产生外在经济效果。当新的生产者进入公共资源（如渔区、森林、油田等）的开发，由于资源开发的扩大，平均产量将有所减少，成本将有所提高，从而使原有的生产者受到外在经济负效果之害。所以，非市场的外在经济效果（或负效果）是真正的外在经济（或不经济），它体现了非市场的相互依存关系。非市场的相互依存关系会使市场决策不完善甚至失误，而这种不完善或失误只有依靠政府的适当干预才能有所弥补。而一般的外在经济（或不经济）是市场内的现象，它反映了市场的相互依存关系<sup>①</sup>。市场的相互依存关系也会使市场决策不完善或发生偏差，但这种不完善或偏差的原因是信息和预见的不足，只要有较好的信息条件，就可以得到纠正或弥补，而并不需政府计划管理的干预。

再次，为了加速积累资金，提高储蓄率，发展中国家要依靠计划管理。就个人而言，每人大致根据现在收入的情况和未来收入的估计，以最大限度满足为原则，安排现在的消费额和未来的消费额，由此而决定个人的储蓄率。然而，个人行为可能是缺乏理性的，他们也许会根据不合理的计算，在早年多消费而少储蓄，把储蓄的收益率估计过低，而实际上，储蓄的收益率也许比个人自己估计的要高。而且，储蓄给社会带来的利益，个人一般不予计算，也无从计算。对此，政府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从宏观的、长远的利益出发，要求人民在早年多储蓄，少消费，从而提高社会的储蓄率，更多地积累经济发展所需的资金。

还有，国民经济中有些产品（包括劳务）是不经过市场渠道、不在市场中买卖的，但又是与社会和人民的安适幸福密切相关的，这类产品称为非市场产品或公共产品。它

---

<sup>①</sup> 例如，当某一企业（或行业）有所发展，会扩大另一企业（或行业）的市场，从而促进后者的发展，而后者的发展，反过来会扩大前者的市场，从而又促进前者的发展。这是市场内的外在经济。西托夫斯基在一篇名为《外在经济的两种概念》论文中有详细论证，该文载《政治经济学杂志》，1954年4月。

们只能由政府“经营”和提供。例如，公园、道路、防洪、环境卫生、航道管理等，都不能不依靠政府的力量。

最后，市场机制本身并非十全十美，它存在若干缺陷和问题，政府对市场干预进行宏观管理也是必要的。对这一点，还有更深层次的分析。

总之，照许多发展经济学家看来，由于下述情况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对经济作出干预，进行宏观管理，甚至计划管理。

第一，非市场产品（包括劳务）为社会所需要，国民经济有非市场的相互依存和外在经济的关系。

第二，单个决策者对信息反馈的无理性导致其社会效益低于最佳决策所能达到的社会效益。

第三，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和失误可能导致市场价格成为不正确的讯号。

因此，有一位经济学家说：计划化就是“考虑分散的决策者所不考虑的社会成本和社会效益而实行的资源配置集中管理”<sup>①</sup>。

## 二、对市场机制更深层次的分析

不少发展经济学家在强调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和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时，又进一步分析了市场机制的内在弱点，指出市场机制并非完美无缺，市场机制会出现失误。所持理由如下：

第一，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可能促成企业走向联合和集中，从而形成垄断力量，这是市场经济演进的一般趋势。发展中国家的市场相对狭小，联合和集中的企业更易于凭借其规模经济的优势去垄断市场。它们会由价格承受者的地位转变到价格决定者的地位，限制产量，提高价格，谋求超正常利润。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当注意这种趋势的发展，进行必要的干预，防止企业过分集中，规模过于庞大，必要时对其价格加以限制，并通过税收吸收其超额利润。

第二，基础设施或社会分摊资本需要庞大的投资，一般企业难于承担。基础设施产生的巨大外在经济效益，一般企业不可能向受益者索取报酬。基础设施的效益须经过较长时间之后才会产生，一般企业难以久待。因此，政府应从宏观考虑，对基础设施投资作出全面的计划安排。

第三，企业造成的外在经济负效益需要政府的控制和管理。如污染源的企业虽然对减轻污染扩散不得不付出一定的费用，但在整个污染区中，它不过是许许多多污染减轻的受益者中的普通一员，从而缺少控制污染的持久的积极性。对此，政府不能不出面干预，用必要的手段（如税收）迫使企业付出的成本接近或等于社会成本，把污染控制在最低水平。

第四，市场的自由发展，必然会出现投机。尽管从某种意义上说，投机并非完全是有害的经济活动，因为投机可以增加市场的交易量，有利于商品的买卖，社会由此出现

<sup>①</sup> 瑟尔金·看得见的手：经济计划化基本原理。英文版。1968。45

一种承担期货买卖风险的专业人员，从而减轻其他经济活动者的风险，而且，投机可以产生稳定价格的效应，因为当投机者认为价格过低（相对于期货价格而言）时，他将买进，认为价格过高（相对于期货价格而言）时，他将卖出。但是，必须指出，投机显然具有使经济不稳定的性质，因为，在总量上，投机者可能作出错误的预测，虽然价格已过高于未来价格，他们仍然大量购进，虽然价格已过低于未来价格，他们仍然大量卖出，从而引起市场的巨大的不正常波动，造成社会经济的损失。在外汇市场上，投机者的不稳定作用更大。因此，国家对市场投机活动加以控制和管理是完全必要的。

第五，在市场中，企业往往担心风险过大而不敢对新的项目投资，或者因财力有限而不能扩大本来应该扩大的生产规模，风险是成本的一个部分，企业经营中必须核算。如果收益足以抵付包括风险成本在内的成本，企业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如果收益不足抵付包括风险成本在内的成本，企业的资源配置是缺乏效率的。企业如果对风险估计过高，或者胆识不足，即使一种新的项目颇有前途，又有利于国计民生，它们也不会去投资。扩大生产规模或建设较大生产规模的项目，需要较大的资金，企业从市场上接受资金的能力是有限的。对企业所受的风险和大规模投资的障碍，政府可以协助和干预。

第六，在市场中，成本渐减企业的价格和产量的决定，往往背离最佳的原则。由于技术上的原因，企业的某种投入不可能零零碎碎地逐渐增加，企业一开始就不能不把这种不可细分的投入一次性地引入生产。这种企业具有一种特点：在达到相当大的生产规模之前，一直处于成本渐减的状态，而且由于市场容量的限制，生产规模一般控制在成本渐减阶段之内。在微观经济学中，称这类企业为成本渐减企业，在成本渐减的情况下，平均成本随产量的增加而渐减，边际成本下降的速度快于平均成本下降的速度。此时，会出现一种矛盾：如果把价格定在相当于平均成本的水平，总收入固然可以抵付总成本，但价格却高于边际成本，这就意味着产量未达到最优规模；如果把价格定在边际成本水平，消费者得益，生产规模优化，但总收入不足抵付总成本，企业将蒙受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干预是必要的，政府可以规定企业按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原则确定生产规模，产品总收益低于总成本所造成的亏损由政府补贴。

第七，市场价格不能反映发展的动态效果，所谓的“幼年工业”即是一例。这种工业在建立初期，一般生产率较低而成本较高，此时，需要关税保护或补贴；随着生产的发展，生产率将逐渐提高，成本将逐渐降低，此时，需要减少关税保护或补贴。显然，在幼年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其实际成本与市场价格往往背离，如果听任市场机制去自然调节，这类工业就无法生存，更无法壮大。为了取得国民经济动态发展的效果，政府不能不采取必要的保护、管理措施。

第八，发展中国家的市场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有赖政府去推动和改进。发展中国家的广大人民生活在穷乡僻壤，他们贫困、缺少文化，尚未进入商品—货币市场，即使开始进入商品—货币市场，对市场信息也很不灵通，既不能从商品得到好处，更不能积极促进市场的发展。因此，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对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的发展，不能抱听之任之的态度，而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去推动和促进。

第九，市场无论多么完善，市场机制无论运行得多么灵活，总不能保证国家目标的

实现。例如，普遍富裕一般是发展中国家的奋斗目标，而市场机制带动下的经济增长，一般是少数企业或个人领先的，只有在相当长时间持续增长之后，经济增长的利益才能渐渐地普及广大人民，收入分配的差距才能渐渐缩小。但是，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减轻，是人民企望的目标，它的实现不能旷日持久，为此，政府不能不有所干预。

### 三、对国家干预更深层次的分析

以上对市场机制更深层次的分析中，不少发展经济学家对国家干预、宏观控制、甚至计划管理都有肯定的一面。例如，他们说：“不管喜欢不喜欢，为了国家的未来幸福，第三世界的政府不可避免地要比发达国家的政府承担更大的责任。”<sup>①</sup>甚至说：“计划与独立的愿望相一致，与独立所要求的自制、自治和自决相一致。”<sup>②</sup>他们当中也有人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采用前苏联计划管理模式的结果，取得了成效：动员了闲置的资源，解除了需求的约束，实现了资本的积累，促进了人力资本的形成<sup>③</sup>。

但另一方面，他们对集中性强的宏观控制、特别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批评，又是比较尖锐的。其主要论点可归纳如下：

第一，计划管理，特别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之下，经济行为的准则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头的。产品的质量是一条准则，产品的数量是一条准则，产品的比例又是一条准则，等等。如何把这一条一条的准则一体化地结合起来，同时得到兼顾，往往是一个难题。而享有完全自主权的企业或私营企业的行为准则是单一的利润准则。利润准则可以把多头的准则同时结合起来，有效地达到较好的经济目标。而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下的企业，当注意到数量时，往往顾不了成本；当注意到成本时，往往顾不了数量；当注意到数量时，往往顾不了质量；当注意到质量时，往往顾不了数量；等等。至于多品种、多规格，那就更难以做到了。高度集中计划管理体制下的企业，也不能简单地模仿私营企业那样以利润为单一准则，因为除非企业经理人员容许有充分独立自主的权力，而又有真正的竞争环境，否则利润准则也会变质。

第二，在集中计划管理体制之下，政府总有一种倾向，不给企业经理人员以独立自主权。官僚等级制形成的观念是，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制定的规则，必须接受上级的监督。在这样的束缚之下，企业缺少竞争能力，产品种类和规格不能多样化，无意于创新和大胆试验。那种组织十分庞大的私营企业，如跨国公司当然也存在着官僚主义，但体系中的每一单位都有不同程度的独立性，上层控制下层有一简单的规则和明确的判断标准，即“利润测试”，企业只要通过这种“测试”，就可放手经营。

第三，集中计划管理体制并不能消除风险和不确定性。认为集中决策可以消除“次级不确定性”（secondary uncertainty）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次级不确定性”指分散体制下一个单位对其他单位的行为捉摸不定，那么，除非存在着完全的、绝对的

① 托达罗. 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 英文版. 1981. 467

② 赫立克, 金德尔伯格. 经济发展. 英文第4版. 1983. 301

③ 雷诸兹. 经济发展的理想与现实. 英文第4版. 1984. 392 - 400

集中管理，“次级不确定性”是消除不了的。事实上，计划管理的集中程度总不会是百分之百的，计划管理单位总得把经济决策权或多或少地分一点给下属单位，从而“次级不确定性”在集中管理体制中并未消除。在市场体系中，企业的经营目的和决策原则是人们一般比较熟悉的，彼此的行为有较大的可预见性。而在集中管理体制下，企业的经营目的和决策原则的透明度不高，反而确定性较小，它们的行为也因此较难预测。这种不确定性的一种反映就是：在集中计划管理体制下，企业常常过多地保持存货数量，因为它们总在担心进货供给不易保证。

第四，集中计划管理体制并不能消除决策的无理性、随意性和专断性，因为企业的经营决策是由上级作出的，而上级的决策往往缺乏民主的基础。例如，为了提高威望而不顾国力和代价去发展钢厂，为了意识形态的原因而拒绝提高利息率，从教条而不是从实际出发去决定经济组织形式和产业结构，由于怕人冒尖而限制生产上和职业上的竞争，等等。

第五，集中计划管理体制之下，管理者由于掌握权力而易于贪污腐化。权力掌握者可以定规划，批执照，调拨物资，安排人事等。即是说，在他们手中有种种“资产”，这些“资产”的转手，在市场经济中，或者是免费的，或者是在公开的竞争中按照等价原则交换的。而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下的管理人员难免把权力看成自己的“私产”，在不公开的市场中“出售”它而自己得到私利。“或者是权力在腐化，或者是权力在为腐化开辟道路，事实是权力和腐化在同时出现。”<sup>①</sup>

第六，计划在收集信息、作出决策、传达、监督、评估、校正等方面的工作中，都有不少困难。当然，这些困难在市场机制中也或多或少存在，但价格讯号和利润准则大大简化了管理工作。而如前所述，集中计划管理体制下经营准则不单一，经济讯号又欠灵通，管理工作就增加了困难，困难的程度将随着管理集中程度的提高而提高。

第七，计划管理机制在运行中不易灵活调节。基层单位一般是不允许根据其他单位情况的变化而互相调节和调整的。数据和资料只能逐级上报，由中央计划机构汇总，等中央计划机构作出新的决策后，调整变动的指令再逐级下达。可见，在短期之内，计划要作出灵活的必要调节是不可能的。

第八，计划管理最需要准确而及时的信息，但信息渠道不畅通又是计划管理体制的弱点。这就是计划管理的“信息缺口”——集中决策的信息需求大于信息供给。信息来源于基层，消费者各自有其偏好，经理和技术人员了解企业的生产可能性，研究机构、科学家、地方政府机构也各自有其信息，这种种信息都由中央计划机构收集、整理和分析，从而需要大量的费用或成本，这些费用或成本不只表现在经费的支出，还表现在信息的延误和随之而来的决策的迟缓。大量的信息是“不可再生的”，如不迅速反馈，很快就会过时无用。由于费用的昂贵和时间的限制，基层的许多信息永远不能反映在中央计划之内。这样，分散决策体制可以充分使用的信息，在集中决策体制之下，或者由于得不到使用，或者因使用不当而浪费掉了。虽然技术进步可以加快收集信息的速度，但

<sup>①</sup> 瑟尔金，看得见的手：计划化的基本原理，英文版，1968，66

随着经济现象越来越复杂，信息量将越来越多，信息差距不会缩小，反而会扩大。

第九，计划管理体制并不能增强经济预测的能力。如前所述，计划管理体制并未消除不确定性，而且往往无视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而作出决策，加上信息缺口还在不断扩大，经济预测能力是难以增强的。

综上所述，30多年来，发展经济学家逐渐拓宽和加深了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家作用和市场作用的认识，形成了比较统一的看法，这种看法在一本发展经济学著作中得到了相当明确的表述：

“没有一个政府完全依赖集中计划，也没有一个政府完全依赖市场。大多数欠发达国家选择了集中计划和市场两者之间广泛密切的配合。因此，社会主义计划化可以利用竞争价格，政府可以调节市场经济，通过租税与福利计划对收入重新分配，生产集体产品，对外在经济或不经济作出调整，分配技术和信息并部署与社会目标相一致的各种政策。”<sup>①</sup>

作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中心的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也明确地表示了同一看法。他们认为，市场机制适应经济发展进程中日趋复杂的经济生活而不断扩展，但市场机制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因而有必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去适度地干预经济生活。政府应在下述三个方面发挥作用：

第一，应该为经济发展提供必要的服务。诸如：发展教育，开发人力资源，提高现代化生产和劳务部门劳动者者的文化知识水平；提供有形的基础设施，如交通运输、通讯和电力系统；提供信息和有关标准决定；购买和引进技术；为提供前五项服务面建立国有企业。

第二，制定规章制度，明确经济活动中必须遵守的“比赛规则”，如确定自然资源、金融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使用、占有和转移条件。这些规章制度对经济活动产生很大影响，持久不变、确切而又易于理解的规章制度往往成为经济顺利运行的润滑剂，不应朝令夕改，随意变动。

第三，政府应该减少对经济生活的直接干预，应该采取如贸易政策、财政政策、价格控制、投资规定等间接干预措施<sup>②</sup>。

### 第三节 90年代以来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进一步思考

#### 一、世界银行的想法

如上节所述，在80年代，作为经济发展问题研究中心之一的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

① 纳夫齐格尔，发展中国的经济学，英文版，1984，454

② 1987年世界发展报告，英文版，7

们已明确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扩展市场机制，但市场失灵总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有必要发挥政府的作用，对经济进行适度的干预。90年代以来，他们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进一步加以思考。

他们指出，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从世界范围看，政府的规模和职责范围都在扩大。就发达国家而言，扩大福利的要求和指导思想促进了政府的作用，而许多发展中国家更纷纷采纳了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从而也扩大了政府的作用。一个重要指标是，发达国家中的政府支出目前几乎占其总收入的1/2，发展中国家大约占1/4。由这一指标可以从数量上看出政府作用在迅速扩大，而正由于这一点，关心经济发展的人们不能不由关注政府作用数量性的增加转向重视政府作用质量性的提高，即是说，从政府的规模及其干预措施的范围转向满足人民需求的有效性。

一些发达国家已陷人难以承受的福利制约泥淖之中而难以自拔，而提高政府有效性的呼声在不少发展中国家非常强烈，因为这些国家尽管在市场经济中已作出了多方干预，但是政府却不能保证为人民提供基础性的公共物品，如产权、道路、基本医疗保健和教育，而人民又十分渴望获得这些公共物品，因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社会对政府的需求与政府满足这些要求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差距，而且如果不采取适当的战略，这种差距将会越来越扩大。世界银行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战略思想有两个基本点：

其一，使政府的作用与其能力相符，这是战略的首要因素。当政府能力很脆弱时，政府如何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以及在何处进行干预就需要认真地加以研究。不少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在缺乏资源和能力的条件下试图办太多的事，结果往往得不偿失。正确的方针是，政府应当将精力集中于基础性工作，以提高其有效性。

其二，通过重振公共机构活力以提高政府能力，这是战略的第二因素。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制订有效的规则和限制措施，以制约武断专横的政府行为，与贪污腐败现象作斗争。这意味着应当将政府机构置于竞争性的体制中，以提高其效率；意味着应当增进政府机构的业绩，完善收入分配和激励机制；还意味着国家要对社会的需求作出较为灵敏的反应，通过更广泛的参与和权力下放，使政府与人民保持更密切的关系。

使政府的作用与其能力相符，并不是说要缩小政府的能力，相反，在一定的情况下，在一些地区，政府还亟需集中力量以提高其有效性，在这里还有一个职责的选择问题：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先做什么和后做什么。

政府的第一职责应当是做好基础性工作：第一，建立法律基础；第二，保持正常的而非扭曲的政策环境，特别是宏观经济的稳定；第三，对基本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进行投资；第四，保护承受力差的阶层；第五，保护环境。

他们指出，虽然上述基础性任务的重要性早已被广泛认可，但在履行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市场和政府活动应如何配合，已出现一些新的看法，其中最重要的是，市场与政府是相辅相成的，在为市场建立适宜的结构基础性中，政府是必不可少的，而政府的“可信程度”（credibility）即政府的规则和政策的可预见性及其在实施中的一致性，对于吸引民间投资而言，是与规则和政策的内容同等重要的。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在发展中国家中，政府可信程度最低的是撒哈拉南地区，而且许多非洲国家陷入了可信程度恶性



循环之中，居民对政府的信心下降，引起犯罪率上升和不安全感增加，从而给投资和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于是进一步动摇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如此循环往复<sup>①</sup>。

## 二、英国发展经济学家瑟尔沃尔（Thirlwall, A.P.）的看法

瑟尔沃尔在1999年出版的他的名著《增长和发展》（Growth and Development）第6版中，对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作用有下述看法。

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挥四种关键性的作用：提供公共品；纠正市场不完全性；保护贫弱，保证收入分配公平；为市场繁荣提供制度环境，并保持宏观经济的稳定性。

瑟尔沃尔重点地分析了市场不完全性表现的三种情况。第一，由于市场价格不反映社会使用生产要素的机会成本，因此不能完全地把资源配置引向社会的最优化，例如，劳动的价格会因高于机会成本而使用过少，资本和外汇的价格会因低于机会成本而使用过多。同时，市场经济中还自然产生垄断，加上关税、补贴和其他不完全现象的存在。商品价格不反映其边际生产成本，从而有害于投资。第二，由于正负两种外在性的存在而它们又不反映在价格之中，从社会观点看，一些商品供给过剩，一些商品又供给不足。诸如运输设施、电站、灌溉系统等基础设施以及教育、卫生设施等社会资本的社会报酬要高于私人报酬，因此，除非对有关民营事业给予补偿或补贴，从社会观点看这些项目在市场中的供给不足。而别的项目由于不为强加的成本付出报偿以致造成负外在性，从社会观点看，这些项目在市场中的供给过剩。针对这两种情况，政府可以通过管理或征税以抑制负外在性，通过补贴或自己提供产出以促进正外在性。第三，市场会是不完整的，甚至会消失。在公共品的提供者无法拒绝“搭便车者”享用公共品的情况下，市场即无形消失。市场不完全甚至消失的情况还表现在：高交易成本可能阻碍市场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因为在发展中国家，交通的落后提高了信息成本，期货市场的缺乏使不确定性的风险得不到补偿，提供货物或劳务的实际成本也许低于人们愿意支付的价格，但消费者由于信息不完全而低估它们的价值，以致限制其供给。瑟尔沃尔进一步指出，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也可能导致市场失效。不对称信息指在市场中买卖双方的知识是不匹配的或不平衡的。例如，银行贷款市场中，借入者比借出者更了解自己的情况，从而银行会出现坏账（逆向选择的一种表现），使它们小心翼翼而实行信贷配合。银行如果想获得高风险客户的全部信息，成本不免很高，非正规的货币市场则可以提高利率以求补偿。又例如，医疗保险市场中，投保者比保险公司更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当他们知道自己可能疾病缠身时，就急于投保，但往往受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得保险而引发违背保险原则的行为，就出现道德风险，以致浪费资源，提高成本，对此政府可以采取步骤管理民间保险公司或自己以较低成本提供服务。

关于公平问题，瑟尔沃尔认为国家起着重要作用。国家要保护贫弱，保证各个阶层之间、地区之间和世代之间收入公平分配。对绝对贫困人民的扶持更是发展中国家政府

<sup>①</sup> 以上论述参见以《变革世界中的政府》为副标题的《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

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不仅仅出于经济上的考虑，而且关系到社会安宁和政治稳定；如果社会不宁，政局动荡，则投资和增长必受阻碍。为了下一代的利益，有必要在消费和投资之间作出平衡，政府可以用提高利率和进行公共投资的办法达到这一目标。

最后，瑟尔沃尔强调了政府在为市场提供适当制度环境中的作用，为此，他重申了《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三个论点：第一，没有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经济的、社会的和可持续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但政府不是代替市场，而是补充它。第二，大量证据表明，良好的经济政策、有效开发的人力资本、广泛的对外开放、可持续的增长以及逐渐改善的贫困状态是极其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良好的政府，它们是不可能实现的。第三，历史证明，市场、政府和社会三方面力量的良好配合，可以促进政府的效率，这意味着政府的作用与其能力要相称，然后才能提高其能力。

### 三、从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情况考察政府作用的论点

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两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波金斯（Perkins, D.H.）等人认为东亚国家的政府对市场干预失误之处在于权力进入市场，出现了经济极其有害的寻租行为，他们说：“目标化的干预要求官员遵纪守法，以出口业绩和其他透明的标准给予特权和别的优惠条件，而不是利用权力牟取个人私利。如果政府在执行增长政策的过程中缺乏决心和纪律，那么，值得推荐的是以市场为基础、广泛依靠激励和减少政府日常干预的战略。”<sup>①</sup>以韩国为例，可以证实这一论点。韩国政府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对出口企业和行业实行相当倾斜的照顾政策，如进口免税、出口退税和信贷优惠等，从而在这些企业或行业中形成具有垄断性质的“租金”。其结果，虽然激励这些企业或行业竭力谋求产出和出口量的增长，却往往忽视经济效益的提高，更严重的是促使它们采取贿赂、欺骗等手段来提取更多的“租金”。于是，出口企业或行业出现低效益的膨胀，不顾高额负债，进而降低银行信贷资产的质量，造成银行坏账堆集，为金融危机种下祸根。另一方面，诱致政府官员贪污腐败，力图分沾“租金”，不能公正地、规范地执行政策，更难以适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及时地调整政策。可以说，韩国的大企业集团是在政府产业政策和银行贷款无限制的支持下发展起来的，尽管它们在国家市场中的比重日益增大，自身的负债率却日益上升。1996年，在韩国前30位大企业集团中，自有资本的比重在总资产中大约只有18%，平均资本负债率为180%，有的甚至高达300%，仅利息支付就占营业额的5%。前40位企业的营业总额为4400亿美元，而总利润额只有6500万美元，利润率仅为0.015%。1997年初，韩国名列第14位的韩宝集团宣布破产，其中政治丑闻涉及总统金泳三的次子和他的高级助手。至1997年11月初，韩国前30位大企业集团中有7家申请破产保护或倒闭，在其影响之下，韩国银行的经营状况迅速恶化，从1996年至1997年7月底，坏账比率由4.1%上升到6.8%，这就导致基础薄弱的韩国银行业和众多信贷机构陷入困境。这些问题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即已存在，其根源在于韩国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甚至达到政企不分，又由于韩国主要银行几乎

<sup>①</sup> 吉里斯，波金斯等，发展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507

完全为政府所控制，更形成银企，以致企业的预算约束软化，导致企业盲目扩张，步入虚假增长的误区。加上权钱交易，官员贪污腐败，使韩国的经济的真实基础非常脆弱，金融危机爆发后，韩国经济受到很大的损害。

一贯强调市场经济中政府应发挥适当作用的斯蒂格利茨 (Stiglitz, J.E.) 认为东亚金融危机的酿成不应简单归结为政府过度干预。他说：“近来发生的亚洲经济凋敝又使人们对政府在金融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发出质疑，并且将这种疑惑进一步扩大到标志亚洲经济发展战略的特征——政府与民间部门的关系上。对所谓‘亲情资本主义’、政府主导型投资，以及缺乏透明度的责难，无疑表明了人们对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的不信任。对于这一系列批评和苛责，我觉得有点过火了。”<sup>①</sup>

斯蒂格利茨特别注意到金融市场的特点，他说：“金融市场与其他市场差别甚巨，由此它的市场失败就更加普遍。关于有效竞争市场的传统理论是以完全信息为前提的，这样，认定每一个竞争性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福利经济学定理就对衡量金融市场是否具有效率没有指导意义，因为金融市场与生产、流通、传播和信息的使用紧密相关。相反，不完全信息或不完全市场的经济一般来说就不具有帕累托最优效率，在那里有限的政府干预就能使单个经济体制效率变得更高。”<sup>②</sup>

斯蒂格利茨认为，对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政府必须进行必要的监管。他指出：“东亚危机的根源不在于政府的恣意放纵，而在于民间部门的决策使得经济体制特别易受突然的信心失落的打击。最大的失误是投资的错误分配（流入投机性房地产领域）和冒险的融资形式（从国际市场大量借入短期债务，至少在韩国债务对股权比率过高）。”<sup>③</sup> 他还说：“东亚金融监管弱化的一个明显例证是商业不动产的过分膨胀……比如泰国过去就限制银行不动产贷款，这既有认识到不动产贷款高风险的考虑，又有将资本导向更有效的促进增长的投资上去的目的。但后来部分地由于受到‘此种限制会妨碍经济效率’之类说法的压力，这些限制被撤销了。”<sup>④</sup>

斯蒂格利茨指出不要片面理解金融自由化的含义，他说：“最近一些讨论强调把自由化作为改进金融体系的一个策略。人们创造了多种自由化形式，包括国内存款利率自由化，国内贷款利率自由化，取消国内银行限制，并允许资本账项的自由兑换。我的观点是，他们太过于追求自由化以致使自由化本身成为追求的目的。我们并没有系统地评估它怎么来帮助达到我们的最终目标——促进稳定与增长，促进竞争，保护消费者和保证没有受到服务的群体能得到资本。自由化是达到这些目标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不应是我们制定政策的指南……主要的问题不应是放弃管制的自由化，而是建立一个可保证金融体系有效运作的监管框架。”<sup>⑤</sup> 为此，他说：“即使〔金融〕存在脆弱性，如果没有资本账项自由化，危机也不大可能发生。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也相当脆

① 斯蒂格利茨. 论金融稳健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998 (3)

② 斯蒂格利茨. 论金融稳健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998 (3)

③ 斯蒂格利茨. 论金融稳健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998 (3)

④ 斯蒂格利茨. 论金融稳健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998 (3)

⑤ 斯蒂格利茨. 论金融稳健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998 (3)

弱，透明度也很缺乏，却没有受到东亚危机的‘传染’，这就与那些国家资本账项封闭或较为封闭有关。”<sup>①</sup>

---

<sup>①</sup> 斯蒂格利茨. 论金融稳健与亚洲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1998 (3)

## 第十三章 社会项目评估

所有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都面临一个基本的经济问题，即如何合理地配置有限的资源（如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于各种不同的用途（如劳务、消费品生产、资本品生产等），以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的福利（如增加国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提高生活质量等）。

在传统的西方经济学中，上述基本的经济问题是交给市场去解决的。但是，大量的实践证明，单纯的市场机制并不能够求得最大的社会福利，反而有可能导致资源耗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引起两极分化，带来种种社会问题。

西方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则强调有必要发挥政府的积极主动作用，用政府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辅助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政府有三个主要的方法来指导和评价资源的配置：国民经济计划，投入产出计划，社会项目评估（social project appraisal）或成本—收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CBA）。社会项目评估不同于其他两个方法的地方在于，它的分析对象既不是国民经济的宏观全局，也不是国民经济的部门结构，而是具体的单个的“项目”。

社会项目评估首先通过全面系统地分析项目的“投入”和“产出”来估计其“成本”和“收益”，从而求出其“净收益”。然后对不同时期和不同个人的净收益用“贴现因子”和“分配权数”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加总，求出项目的“净社会现值”。最后根据净社会现值的大小来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该项目：如果项目的净社会现值大于零，则意味着该项目能够增加社会福利，因而应当接受；否则就应当拒绝。

### 第一节 社会项目评估的历史发展

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发展来考察社会项目评估或成本—收益分析的历史。这两个方面的发展在一开始时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直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逐渐融合到一起来。

项目评估的理论可以追溯到 1844 年法国工程师杜庇（Dupuit, J.）发表的《论公共

工程效用的度量》。杜庇最重要的贡献是他首先提出了消费者剩余的思想并作出了关于消费者剩余的几何解释。他指出，项目的产出乘上其价格等于消费者的实际支付量，这是项目的最低社会收益；项目的全部社会收益则等于消费者的意愿支付（willingness to pay, WTP）。意愿支付和实际支付之差可以用来衡量所谓的消费者剩余。这一理论直接导致了作为成本—收益分析基础的社会净收益概念。

社会项目评估的实践则迟至 20 世纪 30 年代才开始。美国政府 1936 年通过的《洪水控制法案》开创了运用成本—收益方法来分析和评估项目的历史。该法案宣称，控制洪水事关全民的福利，控制洪水项目的收益应当包括所有个人得到的收益，联邦政府决定是否实施控制洪水项目的一般原则是项目的收益必须超过其成本。该法案的局限性在于：第一，收益的概念尽管定义得很宽，但不够具体，不够清楚；第二，与收益相比，成本的概念又定义得过于狭隘，它实际上被局限于只是建筑成本，而不是任何的社会福利的损失；第三，没有进一步阐明“收益大于成本”的原则。总之，该法案没有提出一套前后一致的方法来比较项目的成本和收益。实际上，不同的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使用的是各自不同的方法。

随着许多不同的社会项目评估方法的纷纷问世，美国政府试图进一步使评估程序标准化。在这方面的一个主要发展是 1950 年美国联邦河谷委员会成本和收益分委会发表的《绿皮书》：《对河谷项目进行经济分析的建议》。《绿皮书》试图总结出一套大家一致同意的比较成本和收益的规则，并试图在项目评估中使用福利经济学的语言。

1952 年，美国预算局发表的《A-47 号预算周期文件》正式提出了指导预算局评价预算的各种考虑。在整个 50 年代，甚至 60 年代，该文件一直是项目评估的官方指南。文件的缺点是：它只强调了项目引起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变化，而忽略了项目的收入分配效应。

经济分析的技术逐渐被引入美国政府预算支出的各个领域，甚至军事领域。例如，著名的兰德公司致力于发展军事支出方面的资源分配规则。在兰德公司的军事支出分析中，是用“国防安全”或“摧毁能力”来表示收益的。与此同时，一种以既定经济活动水平的货币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的所谓“成本—效果分析”（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也发展起来。在该分析中，成本用货币单位表示，但收益则以某些实物单位来衡量，或简单地用政策目标来表述。这一分析通过计算成本对效果的比率大小来比较为同一目的而采用的不同手段的优劣。实际上，成本—效果分析是成本—收益分析的一种特殊形式。其区别在于，前者只是成本以货币表示，而后者无论成本还是收益均以货币来表示。因此，在成本—收益分析中，成本和收益可以相互比较，从而更具有一般性。

1958 年，美国同时出版了三本重要著作：埃克斯坦（Eckstein, O.）的《水利资源的发展》、麦克基恩（McKean, R.）的《系统分析中的政府效率》以及克鲁提纳（Krutilla, J.）和埃克斯坦合编的一本案例研究。与前述联邦政府机构的努力方向不同，这三本书都试图把项目评估的实践与福利经济学的理论紧密联系起来。这种联系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把收益看成是福利（效用）的任何增加，把成本看成是福利的任何减少；第二，把成本看成是机会成本，从而成本—收益分析的原则变成“使项目收益与

由于选择该项目而放弃的收益之差达到最大”；第三，不但按照帕累托标准（Pareto rule），而且按照潜在帕累托标准（potential Pareto rule）确定净收益的最大化。

60年代早期的工作主要是反映在马斯（Maass, A.）所做的《哈佛水利资源规划》中。在该规划中，项目评估的实践和福利经济学的理论之间的联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60年代在公共支出分析上作出贡献的其他学者有：赫尔希利弗（Hirshleifer, J.）、德哈文（DeHaven, J.）、米里曼（Milliman, J.）、希契（Hitch, C.）以及多夫曼（ Dorfman, R.）等。

进入60年代以后，除美国以外，其他国家也开始采用成本—收益分析。例如，英国在1960年把项目评估技术应用于伦敦—伯明翰公路的建设；1967年英国政府白皮书正式承认成本—收益分析和它在评估国有化企业方面的一定作用。

在60年代后期，成本—收益分析被推广到欠发达国家。1969年，里特尔（Little, I.）和米尔利斯（Mirrless, J.）发表了为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准备的《工业项目分析指南》。1972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出版了自己的《项目评估指南》。后一本指南在细节方面与前一本指南有所不同，但在实质上则完全一样。1975年，以李特尔和米尔利斯工作为基础的世界银行指导书《项目的经济分析》问世。从此以后，项目评估技术得到了广泛的运用，项目评估理论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

## 第二节 社会项目评估的理论基础

社会项目评估是西方福利经济学的实际运用，西方福利经济学是社会项目评估的理论基础。本节讨论与社会项目评估有关的一些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社会项目评估的基本思想是：任何一个项目的实施通常都会改变初始的经济状态和社会的福利水平。经济状态、社会福利水平或者是朝着“好”的方向变化，或者是朝着“坏”的方向变化。如果一个项目实施的结果可以改善经济状态、增进社会福利，则该项目就值得实施，否则就不值得。

现在的问题是，根据什么标准来确定经济状态的好与坏呢？好坏问题属于价值判断范畴。在局限于描述、解释和预测实际经济现象的实证经济学中，不存在价值判断的余地，它只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规范经济学即福利经济学则明确引入价值判断，试图回答“应当是什么”的问题。福利经济学的目的是评价各种不同经济状态的优劣。因此，它有两个相互联系的任务：第一，提出一个或几个能够判断经济状态好坏的标准；第二，运用这个或这些标准去分析不同的经济状态。这就是说，需要找到既合理又可行的判断标准。所谓合理，是指所提标准能够正确反映社会福利或经济状态的变化；所谓可行，是指所提标准能够实际运用到经济状态的分析上去。

从合理的观点出发，西方一些福利经济学家提出制定判断标准的指导原则是，在评价不同的经济状态时，必须考虑到每一个人的偏好。这一原则的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它体现了经济上的民主性，否定了以个别入或个别利益集团的好恶来判断经济状态好坏

的做法。隐藏在该原则背后的基本假设是：社会是所有单个人的总和，社会福利是所有单个人的福利的总和。因此，社会福利是否改善要看所有这些个人的福利是否得到了改善。根据这一原则，可以得到四个合理的判断标准：全体一致（unanimity）标准、帕累托优越性（Pareto superiority）标准、大多数人（majority）标准和潜在帕累托优越性（potential Pareto superiority）标准。但是，这四个标准虽然都合理，却并非都是可行的。详细分析如下。

## 一、全体一致标准

如果社会上每一个单个成员都认为经济状态 A 优于状态 B，则认为从社会的观点看，状态 A 优于状态 B。

这一标准似乎很难引起不同意见，似乎很难有理由指责它不道德或不公正。可是，这一标准在实践上却没有用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永远不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全体社会成员一致赞成一项把经济从一个状态改变到另一个状态的政策。由于缺乏全体一致的意见，这一标准实际上并未对判断经济状态的优劣提供任何帮助。因此，作为制定政策的指南，它实际上没有任何价值。

## 二、帕累托优越性标准

如果至少有一个人认为经济状态 A 优于状态 B，而没有任何人认为状态 B 优于状态 A，则认为从社会的观点看，状态 A 优于状态 B。或者说，如果有人赞成 A，不赞成 B，而其他人都“无所谓”，则认为从社会的观点看，状态 A 优于状态 B。

这一标准所要求的比全体一致标准“宽松”一些。全体一致标准是“无人反对，全体赞成”；帕累托优越性标准则是“无人反对，有人赞成”，它不要求全体赞成，而只要求有人（一部分人）赞成即可，它容许一部分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处于“无差异状态”。但是，尽管帕累托优越性标准比全体一致标准更容易满足一些，它仍然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只要有一个人赞成状态 B 而非 A，便无法判断经济状态的优劣，该标准便告失败。而在不同状态的实际政策选择中，赞成和反对这两种偏好是必然会同时出现的。因此，尽管帕累托优越性标准在理论研究中得到了许多经济学家的偏爱，但在实际的政策选择中却永远无法应用。

## 三、大多数人标准

如果社会上大多数成员认为经济状态 A 优于状态 B，则认为从社会的观点看，状态 A 优于状态 B。

这一标准的要求比前两个更加“弱”。无论是全体一致标准还是帕累托优越性标准，都要求“无人反对”，但大多数人标准却容许“有人反对”，只要反对的人数少于赞成的



人数。但事实上这一标准很少被采用。以西方选举制度为例，尽管可以投票选举并由大多数选票来产生在政府中的代表，但选民通常并不是直接投票决定政府的政策和项目，而是由政府官员们代表选民制定政策。

#### 四、潜在帕累托优性标准

设经济从状态 B 转变到状态 A，一部分人得益，一部分人受损。如果得益的人能够补偿受损的人，从而在补偿之后，没有一个人会比在状态 B 中更坏，则认为从社会的观点看，状态 A 优于状态 B。

这条标准之所以如此定名，是因为如果得益者对受损者的实际补偿伴随经济状态的改变而发生，则潜在帕累托优性标准就转变为帕累托优性标准。但是，该标准本身并不要求进行实际的补偿，而只假设能够补偿，因而它是潜在的帕累托优性标准。潜在的帕累托优性标准是 1939 年由卡尔多和希克斯从帕累托那里发展而来的，因而又被称为卡尔多—希克斯标准 (Kaldor-Hicks rule)。与前几个标准相比，它更加复杂。它不再是以受益和受损的人数的多少来判断项目的优劣，而是转而采用受益和受损本身的数量大小。不管赞成和反对的人有多少，只要赞成者的得益能够补偿反对者的损失且有余即可。

潜在帕累托优性标准的优越性在于，它总是可以运用的。在比较任意两个经济状态时，运用潜在的帕累托优性标准总能够发现一个状态比另一个状态优越，或者两个状态没有差异。

潜在帕累托优性标准的不足之处在于，它是以得益者对受损者的潜在的而非实际的补偿为基础的。有人为这一缺陷提出了两条辩护的理由：第一，现存的累进税结构就是倾向于强迫得益者补偿受损者的实例；第二，如果同时存在许多政策，则某一政策的得益者可能是另一政策的受损者，从而总的来说，差别将相互抵消。然而这两条辩护理由似乎都难以成立。

由于补偿是潜在的而非实际的，潜在帕累托优性标准实际上忽略了收入分配问题。对于这一标准而言，只要求经济状态变化的收益数量超过损失数量，而不管这些收益或损失是由谁得到或承担的。举例来说，如果一项政策给一个富人带来 5 元的收益，同时给一个穷人带来 4 元的损失，那么根据潜在帕累托优性标准，仍然可以认为该政策值得实施，尽管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导致了收入分配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此外，在纯理论分析上，潜在帕累托优性标准也遇到了困难。这就是西托斯基提出的“反向悖论” (reversal paradox)：假设根据潜在帕累托优性标准，从状态 B 变化到状态 A，表示社会福利的改善，则反过来，根据同一标准，从状态 A 再变回到状态 B，也是社会福利的改善。参见图 13.1。假定社会由 X 和 Y 两个人组成，X 和 Y 的效用 (福利)  $U_x$  和  $U_y$  分别用横轴和纵轴衡量， $UPC_1$  和  $UPC_2$  是两条效用可能性曲线 (utility possibility curve)，曲线上任意一点表示 X 和 Y 的效用组合。假定在一开始时，X 和 Y 的效用组合为 A 点。某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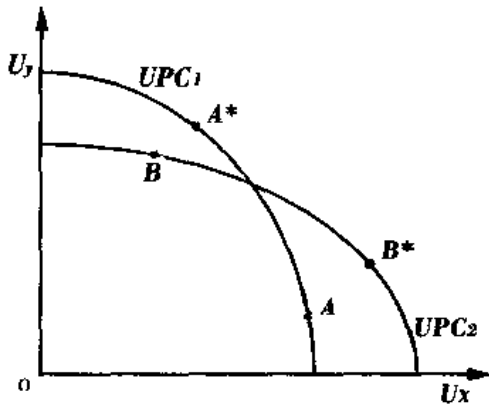


图 13.1 反向悖论 1

政策实行的结果使“社会”从  $A$  移到了  $B$ 。表面上看无法比较状态  $A$  与状态  $B$  的优劣，因为在新的点上，尽管  $Y$  的效用增加了，但  $X$  的效用却减少了。但是，如果能够改变收入的分配，即能够使社会从  $B$  点沿着  $UPC_2$  移到  $B^*$  点，则  $B^*$  与初始状态  $A$  相比， $X$  和  $Y$  的效用都提高了，因而可以（根据潜在帕累托优性标准）判定，使状态  $A$  移到状态  $B$  的政策是增进社会福利的。现在考虑一项与上述政策相反的“逆政策”，它把社会从状态  $B$  又变回到状态  $A$ 。由于可以通过收入分配的改变使社会从状态

$A$  沿着  $UPC_1$  移到状态  $A^*$ ，因而可以（同样根据潜在帕累托优性标准）判定，使状态  $B$  变回到状态  $A$  的逆政策也是增进社会福利的。这就是西托斯基的反向悖论。

### 第三节 社会项目评估的基本结构

根据潜在帕累托优性标准，如果一项改变所带来的净收益大于零，则这一改变就是对社会福利的改善。这个标准可以直接移植到社会项目评估中来：如果一个项目所带来的净收益大于零，则该项目就是对社会福利的改善，就值得实施。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什么是项目的净收益？它具体包括哪些内容？第二，项目净收益能不能准确地反映社会净福利的变化？如果不能，应当如何加以修正？本节将回答这些问题，并且在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揭示社会项目评估的基本结构。

什么是项目的净收益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说明。

第一，项目净收益等于项目收益减去项目成本，即  $V = B - C$ ，其中， $V$  是项目净收益， $B$  和  $C$  分别代表项目的收益和成本；

第二，项目净收益等于项目对所有个人的净收益的总和，即  $V = \sum_j V_j$ ，其中， $V_j$  代表项目对第  $j$  个人的净收益；

第三，项目净收益等于项目在所有时期净收益的总和，即  $V = \sum_t V_t$ ，其中， $V_t$  代表项目在  $t$  时期中的净收益。

如果综合考虑上述三个方面，项目净收益可以定义为项目在所有时期对所有个人的收益减去它在所有时期对所有个人的成本，即  $V = \sum_j \sum_t (B_{jt} - C_{jt})$ 。

其中， $B_{jt}$ 、 $C_{jt}$  分别代表项目在  $t$  时期对第  $j$  个人的收益和成本。

公式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化。假定项目的规模相对于整个市场很小，其实施不会影响现存的价格体系；假定项目发挥作用的期限相对短暂，在该期限内，现存价格体系不会变化。在这两个假定的基础上，第  $j$  个人在  $t$  时期得到的收益等于他在该时期得到的项

目产出增量与产出价格的乘积，即  $B_{jt} = P_x \cdot \Delta X_{jt}$ ，损失的成本等于他在该时期对项目的投入增量与投入价格的乘积，即  $C_{jt} = P_y \cdot \Delta Y_{jt}$ ，其中， $\Delta X_{jt}$ 、 $\Delta Y_{jt}$  分别为第  $j$  个人在  $t$  时期的产出增量和投入增量； $P_x$ 、 $P_y$  分别为该产出和投入的价格。于是，净收益公式可以写成：

$$V = \sum_j \sum_t (P_x \Delta X_{jt} - P_y \Delta Y_{jt})$$

可以看出，上述净收益公式含有两个不合理之处：第一，它对所有时期的收益进行了简单的加总；第二，它对所有个人的收益进行了简单的加总。这两种加总实际上毫无意义，甚至相当错误。从社会的观点看，同一笔收益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价值。例如，在较近时期的收益比在较远时期的收益更有价值；同样，同一笔收益在不同的人手里也具有不同的价值，例如在穷人手里比在富人手里更有价值。简单加总显然歪曲了收益的真实价值。因此，以简单加总为基础的净收益概念不能真正反映项目的社会价值，不能真正反映社会福利的变化，有必要对它进行调整和修正。

首先，考虑对不同时期的净收益进行调整。方法如下：先对每一时期净收益进行“贴现”，使其转化为当前时期的收益，然后将所得结果相加，于是得到比上述净收益更加准确的净现值（net present values, NPV）概念。设  $t$  时期的贴现因子（discount factor）为  $b_t$ ，则  $t$  时期净收益  $\sum_j (P_x \cdot \Delta X_{jt} - P_y \cdot \Delta Y_{jt})$  的现值就是  $\sum_j b_t (P_x \cdot \Delta X_{jt} - P_y \cdot \Delta Y_{jt})$ ；从而全部时期净收益的现值（即净现值）为：

$$NPV = \sum_j \sum_t b_t (P_x \cdot \Delta X_{jt} - P_y \cdot \Delta Y_{jt})$$

其次，考虑对不同个人的净收益进行调整。方法如下：先对每一个人的净收益进行“加权”，使其反映真正的社会价值，然后将所得结果相加，于是得到比上述净收益更加准确的净社会收益（net social benefit, NSB）。设第  $j$  个人的分配权数（distributional weights）为  $a_j$ ，则第  $j$  个人的净收益  $\sum_t (P_x \cdot \Delta X_{jt} - P_y \cdot \Delta Y_{jt})$  的真正社会价值就是  $\sum_t a_j (P_x \cdot \Delta X_{jt} - P_y \cdot \Delta Y_{jt})$ ；从而全部个人净收益的真正社会价值（即净社会收益）为：

$$NSB = \sum_j \sum_t a_j (P_x \cdot \Delta X_{jt} - P_y \cdot \Delta Y_{jt})$$

最后，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调整结果，就得到精确反映社会福利变化的、反映项目全部社会价值的公式：

$$\text{项目社会价值} = \sum_j \sum_t a_j b_t (P_x \cdot \Delta X_{jt} - P_y \cdot \Delta Y_{jt})$$

如果它大于零，则项目就值得实施；否则就不值得。上述公式不仅全面揭示了项目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还给出了评估项目的合理方法。

计算项目社会价值的公式包括四项基本要素：

- 第一，项目所增加的产出和投入，即  $\Delta X_{jt}$ 、 $\Delta Y_{jt}$ ；
- 第二，评估产出和投入的价格，即  $P_x$ 、 $P_y$ ；
- 第三，从不同时期方面调整收益的贴现因子  $b_t$ ；
- 第四，从不同个人方面调整收益的加权因子  $a_j$ 。

如果已知所有这四项目素，则按照公式给出的程序，能够计算出项目的社会价值，从而确定项目的“盈利性”。但是，困难恰恰在于四项要素本身：如何具体地确定它们

的内容以及如何定量地计算它们的大小。本章以后各节将逐一讨论这些问题。

## 第四节 项目的投入和产出

为了确定项目的经济的（即实际的）成本和收益，可以先分析项目的货币的成本和收益，然后再对货币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两个方面的修正和补充。首先，货币成本和收益可能不适当地排除或包括了某些投入和产出。这些投入和产出应当在经济成本和收益中包括进来或排除出去。其次，某些投入和产出的市场价格可能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却不能正确反映投入和产出的社会价值。这些投入和产出的价格必须重新“设计”成重新估计出来。本节讨论第一项修正，下节讨论第二项修正。

任何项目的贯彻执行，一方面会使用掉投入，另一方面会生产出产出。这意味着对整个经济来说，项目的贯彻执行，要减少某些投入的供给而增加某些产出的供给。因此，在存在项目和不存在项目这两种情况下，整个经济的投入和产出状况是不一样的。通过比较这两种状况下的投入和产出，就可以得到项目的投入和产出。

项目的投入和产出应当被理解为由于项目实施而发生的对任何人的任何形式的福利损失和增进。在这个定义中，有两点需要进一步明确：第一，“任何人”包括哪些人；第二，“任何形式”究竟是哪些形式。

第二节中曾经指出过，在确定价值判断标准时应当考虑到社会上每一个人的偏好。把这个原则运用到社会项目评估中来就是：在进行项目评估时，应当考虑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福利变化。在这里，“任何人”被限定为“社会的每一个人”。从表面上看，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但仔细分析起来，“社会”的范围仍然难以确定。对于某些具体的项目，可以凭经验确定社会的范围。但对另一些项目，则可能相当困难。有人建议用“国界”来代替“社会”。毫无疑问，国界比社会更为具体、更为明确。但是，它在如下场合中又显得不够合理：例如，在国内修建公路和飞机场，结果这些公路和飞机场同时也在为来自其他国家的人员服务；又例如，在国内竖立高烟囱以控制硫化物污染，结果这些硫化物通过大气流动飘浮到其他国家去了。在这两种场合，“国界”里每一个人的福利变化并不等于“社会”上每一个人的福利变化。

正如难以精确确定“任何人”的含义一样，也难以精确确定“任何形式”的内容。项目的成本和收益（或合称为项目效应）的形式多种多样。“任何形式”意味着它不仅应当包括内部的、可测的、直接的效应，而且应当包括外部的、不可测的、间接的效应。

### 一、内部效应（internal effects）和外部效应（external effects）

内部效应（包括内部成本和内部收益）是直接或间接由研究对象所得到的效应。最简单的例子是：私人的投资收益就是该投资者所得到的收益。具体到项目方面，项目的内部收益就是那些由项目本身所得到的收益。

外部效应（包括外部成本和外部收益）的特点则在于：它由项目的实施而产生，但却并非由项目本身得到，而是落到了“别人”的手中。具体来说，项目的外部收益是未为此进行过任何支付的局外人得到的收益；项目的外部成本是未由此得到过任何补偿的局外人承担的成本。

外部效应可以划分为两类：技术的外部效应（technological externalities）和货币的外部效应（pecuniary externalities）。技术的外部效应涉及到局外人实际消费或生产机会的变化，它代表了社会福利的变化。例如，建造一个水电站大坝同时也增加了其他人的娱乐机会和加强了对洪水的控制。这里的外部效应就是技术上的外部效应。货币的外部效应涉及到局外人投入或产出价格的变化，它不一定反映社会福利的变化。例如，对某产品来说，其本身价格下降、其补充品价格上升、其替代品价格下降、其联合产品价格下降或其生产要素价格上升等，都属于货币的外部效应。

显然，在社会项目评估中应当包括技术的外部效应，因为它们是实际的，能增加或减少社会福利；不应当包括货币的外部效应，因为它们通常只代表收入分配的变化。把货币的外部效应包括进来，就可能犯重复计算的错误。例如，建设快车车站可以提高附近居民的流动性，结果大大节省了居民的时间，同时也增加了其住房的价值。其中，时间的节省是真实的，应当计算；房屋价值的提高是货币的，不应当计算，因为它本身产生于实际的时间节省。

## 二、不可比较效应（incommensurables）和不可捉摸效应（intangibles）

对这两种效应有不同的区分方法。

第一种区分法：不可比较效应是无法用公共尺度衡量的效应，它可以（或不可以）用自身尺度来衡量；不可捉摸效应是用自身尺度也无法衡量的效应，它当然更不可能用公共尺度来衡量。

第二种区分法：不可比较效应指所有的“超市场”效应，包括经济性质的和非经济性质的效应；不可捉摸效应指超市场效应中的非经济效应。例如，提供娱乐设施和活动是经济的，因为它使公众得到了额外的商品和劳务；而保护人类生命和促进民主进程的活动则显然是非经济的。无论根据哪种区分方法，不可捉摸效应都可以看成是不可比较效应的特殊形式。

不可比较效应包括许多方面，其中主要的有：人类生命、大气污染、噪音、国防、自然和人文景观、公共娱乐设施、声誉等。

不可比较效应和其他效应一样重要。尽管对于不可比较效应还不存在一个一般的量化加总程序，但在选择项目时，仍然必须“考虑”和“评估”它们。例如，比较两个航天飞机项目。一个较为昂贵，但拥有减少生命损失的备用及修复系统；另一个较为便宜，但缺乏减少生命损失的备用及修复系统。很难定量地把生命损失化为货币单位，但毫无疑问，必须考虑和评估它的重要程度，否则无法判断这两个项目的优劣。

在社会项目评估中，有各种不同的处理不可比较效应的办法。最简单的是干脆忽略它的存在。如上所述，这种办法是很危险的，也是错误的。另一种办法是以物质或其他单位来衡量它。例如，对公共物品，其收益不能像成本一样以共同的货币单位衡量，从而无法计算其净收益；这时可以用成本—效果分析来代替成本—收益分析。在成本—效果分析中，分析的目标不再是最大净收益，而转化为在既定成本的约束下，使物质收益达到最大，或者对于给定的物质收益，使成本最小。

也可以通过别的项目来估计不可比较效应的价值。假定项目 A 是一个拱顶运动场，它可以容纳许多大规模团体运动，从而给城市带来巨大声誉。这是所谓不可比较效应。项目 B 是一个公园及其附属娱乐设施，它给城市居民带来娱乐收益。如果其他条件相同，该市居民选择了运动场而不是公园，则最低限度可以把运动场带来的声誉近似地看成是项目 A 与项目 B 的成本之差。

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估计不可比较效应的价值。例如，私人市场中同类或相似商品的价格可以用来代表不可比较效应的“价格”。

### 三、直接效应 (direct effects) 和间接效应 (indirect effects)

项目的直接收益（直接成本可同样分析）可以被定义为与项目有关的实际产出价值的净增加。实际产出价值的增加包括两个主要方面。第一，产出本身的增加。例如，由于灌溉工程带来的谷物增产，由于水电工程带来的电力增加。第二，产出价值的提高。其原因可以是：①质量的变化，如产品的更新换代；②时间价值的变化，如储备设施的加强；③空间价值的变化，如运输设施的加强；④形式的变化，如对不同水果的分类整理，等等。无论是产出本身的增加还是产出价值的增加，都将导致消费者剩余从而社会福利的增加。

间接收益又叫做次级收益 (secondary benefits)，它反映了项目对经济的其余部分的影响。次级收益是一种外部收益，它包括两个方面：项目“引致”的收益和项目“产生”的收益。前者与“前向联系”的概念相似，代表使用项目产出的经济单位的收益；后者与“后向联系”的概念相似，代表提供项目投入的经济单位的收益。项目的所有前向与后向联系构成了整个经济的乘数效应。因此，可以用乘数来估计次级效应的大小。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完全的乘数效应需要如下的条件：①项目所花费的支出不是来自私人的税收；②项目所使用的要素在现行价格上完全弹性；③项目所使用要素的机会成本等于零；④项目产出不只是简单地代替市场的其他产品，不会导致其他生产要素的失业。显然，在社会项目评估中，这些条件很少能够完全得到满足。

## 第五节 成本和收益的度量

上节讨论成本和收益的内容，即项目的投入和产出；本节将讨论成本和收益的度量，即投入和产出的价值。

如何衡量成本和收益的大小呢？我们知道，项目的价值是项目对所有社会成员的价值总和。如果有完全的信息，则项目对每一社会成员的价值就等于该成员对项目的愿意支付量。无论是项目收益还是项目成本都可以用这种愿意支付量来表示。就收益而言，如果项目给某个人带来收益，则该收益的大小显然等于他为此所愿意支付的数量的大小。收益不可能小于愿意支付量，否则他将不愿意支付；收益也不可能大于愿意支付量，否则他将愿意支付更多。设项目为  $i$ ，某个人对  $i$  的愿意支付量可以表示为  $WTP_i$ 。就成本而言，在成本—收益分析中，成本是所谓机会成本，即由于实施该项目而放弃了别的的项目可能带来的收益。设别的项目为  $j$ ，则项目  $i$  的成本等于项目  $j$  的收益。项目  $j$  的收益的大小同样可以用对  $j$  的愿意支付量，即用  $WTP_j$  表示。因此，对单个人来说，有如下公式：

$$\text{项目 } i \text{ 的净收益} = WTP_i - WTP_j$$

那么又如何来衡量愿意支付量的大小呢？在一定的条件下，市场价格可以作为愿意支付量的极好代表。参见图 13.2。纵轴表示价格  $P$ ，横轴表示需求量  $Q$ ， $dd'$  曲线是某人对某商品的需求曲线。需求曲线表示他在每一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数量。对于每一单位的购买量，有理性的个人必须确定其收益是否超过成本。如果收益小于成本，就减少购买量，否则就增加购买量。最佳购买量的条件是：在该购买量上，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但是，边际收益可以用愿意支付量表示，而在一定的条件下，边际成本就等于价格。于是，最佳购买量的条件在一定的条件下就可以看成是：愿意支付量等于价格。假定商品价格为  $P'$ ，购买量为  $Q'$ ，则单个人对第  $Q'$  个单位商品的愿意支付量就等于  $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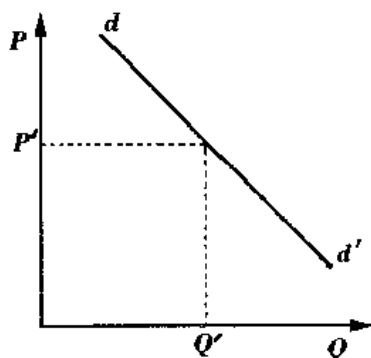


图 13.2 愿意支付量的确定

如果项目效应只是产量的少量变化，或者说项目引起的产量变化不会影响市场价格，则项目的价值就可以看成是产量增量与市场价格的乘积。假定项目对第  $j$  个人的惟一效应是使商品  $X$  生产增加  $\Delta X_j$ ，使商品  $Y$  的产量减少  $\Delta Y_j$ ， $X$  和  $Y$  的价格  $P_x$ 、 $P_y$  保持不变，则项目对第  $j$  个人的价值就是：

$$V_j = P_x \cdot \Delta X_j - P_y \cdot \Delta Y_j$$

应当注意，这里没有考虑成本和收益在时间上的分配问题。如果考虑的是项目在  $t$  时期中对第  $j$  个人的价值，则公式就变成：

$$V_{jt} = P_x \cdot \Delta X_{jt} - P_y \cdot \Delta Y_{jt}$$

以上讨论表明，市场价格是解决项目成本和收益计算的一个方法。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该方法只有在有限的范围内才可行。其条件是：第一，存在有投入和产出的市场，从而存在它们的市场价格；第二，这些市场价格真正反映了投入和产出的社会价值，从而没有歪曲它们在改变社会净福利中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条件在许多场合都无法同时得到满足。

于是，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当不存在市场，或者市场存在，但市场价格歪曲了社

会价值时，如何来衡量项目的成本和收益？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设计”一种新的能反映产品实际社会价值的“价格”。这就是所谓的“影子价格”（shadow price）。可以给影子价格下各种定义，从最一般的定义到最特殊的定义。在这里可以简单地表述为：项目评估中的影子价格是项目所创造的和所使用的产品的社会价值，它衡量边际单位的产品对社会的贡献。影子价格并不必然等于市场价格。在项目评估中，影子价格比市场价格更具有普遍性。市场价格只在有限范围内，即它恰好反映社会价值，或者说它恰好等于影子价格时，才适用于计算成本和收益。因此，有必要重新解释上述关于  $t$  时期第  $j$  个人的净收益的公式：公式中的  $P_x$  和  $P_y$  不应当理解成  $X$  和  $Y$  的市场价格，而应当理解为它们的影子价格。

研究影子价格有两个主要的办法，一是线性规划法，一是经济理论法。线性规划方法可以归结为：求一组非负变量，使其满足约束条件，且使某个目标函数取得极值（极大或极小）。其中，约束条件和目标函数均是线性的。具体举例如下：求一组最终产品的数量，使其满足各种生产资源有限的条件，并使总产品价值达到最大。非常明显的是，总产品价值与资源的约束条件有关。增加某种资源的供给，总产品价值的最大值可能随之增加。总产品价值最大值相对于该资源的变化率就是该资源的影子价格。线性规划方法有很多优点，它抓住了现实经济的许多重要方面。但是，现实经济过于复杂，存在成百上千个制度的和其他非经济的约束条件，成千上万个技术关系，而且这些制约和关系通常是非线性的，甚至是非凸性的。所有这些都给线性规划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使得难以构造出一个足够好的、足够详细的模型。

用经济理论方法来确定影子价格可以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分析所谓的“理想的”经济状态，即完全竞争经济中的市场价格和影子价格。完全竞争市场要满足很多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存在许多厂商、生产同质产品、资源充分流动、信息迅速而又完整等。经济理论表明，如果满足上述条件，则所有的投入和产出都具有市场价格，而且其价格都恰好等于相应的社会价值，即等于影子价格。其次，用完全竞争理想经济中的市场价格与影子价格作为比较的基础，进一步分析非完全竞争现实经济中的市场价格与影子价格。现实经济在许多方面不满足完全竞争条件。对完全竞争条件的偏离，意味着实际市场价格偏离影子价格。仔细逐项地分析这些偏离的类型，有助于估计市场价格对影子价格的偏离方向甚至偏离程度，从而有助于估计非完全竞争经济中的影子价格本身。

下面举例说明利用经济理论确定影子价格的方法。假定存在一个“理想的”厂商，它是价格的承受者；不存在任何的外部经济或不经济。该厂商的特点可用图 13.3 表示。图中，市场价格为  $OB$ 。由于企业是价格的承受者，它可以在  $OB$  的价格水平上出售所有它愿意出售的商品量，因此，它所面临的需求曲线是  $BC$ 。不变的销售价格意味着  $BC$  也是厂商的边际收益曲线。由于需求曲线反映愿意支付量，即反映项目的收益， $BC$  又代表边际私人收益曲线。由于不存在任何外部效应， $BC$  还代表边际社会收益曲线。该厂商的边际成本为  $DE$ 。由于不存在外部效应， $DE$  同时也是边际社会成本。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产量为  $OA$ 。在  $OA$  上，厂商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同时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社会收益，都等于  $OB$ 。于是  $OB$  既是产出的市场价格和影子价格（对消费者



的真实价值)，又是投入的市场价格和影子价格（对使用资源的社会成本的真实度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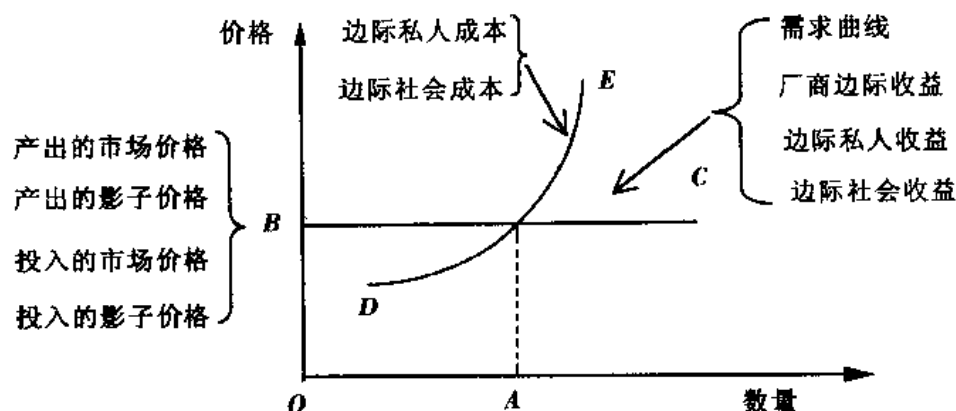


图 13.3 影子价格的确定：“理想的”厂商

现在考察一个“现实的”厂商。假定该厂商是个垄断者；存在外部经济和外部不经济。图 13.4 表明了该厂商的特点。就收益方面而言，由于垄断，它所面临的是向右下方倾斜的市场需求曲线。设它为  $AB$ 。 $AB$  同时也是边际私人收益曲线。由于存在外部经济，边际社会收益曲线  $CD$  要高于  $AB$ 。企业的边际收益曲线  $AE$  可由需求曲线  $AB$  推出。就成本方面而言，厂商的边际私人成本曲线  $FG$  仍像通常一样向右上方倾斜。由于存在着外部不经济，边际社会成本曲线  $HJ$  要高于  $FG$ 。最后来看市场价格和影子价格。根据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厂商的最佳产量为  $OK$ 。在该产量上有一系列相应的“价格”： $OL$  是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代表投入的市场价格； $OM$  是社会的单位生产成本，代表投入的影子价格； $ON$  是企业的单位生产收益，代表产出的市场价格； $OP$  是社会的单位生产收益，代表产出的影子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价格中，市场价格比较容易求得： $ON$  可以直接观察到， $OL$  也能够合理估计到。但是如果要求出对于项目评估至关重要的影子价格  $OM$  和  $OP$ ，则必须要知道  $HJ$  和  $CD$  两条曲线在  $K$  点附近的位置特点。

由此可见，在完全竞争经济中，不仅投入的价格等于产出的价格，而且投入和产出的市场价格等于其各自的影子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项目评估的任务就非常简单；在非完全竞争中，情况就复杂得多，不仅投入的价格可以不等于产出的价格，而且投入和产出的市场价格可以不等于其各自的影子价格。

为了更好地理解市场价格和影子价格的关系，可以分别就各种不完全竞争的情况来考察。

### （一）垄断

如果对完全竞争模型的惟一偏离只是市场卖方拥有某种程度的垄断力量，则有如下两个结果：第一，其产出的市场价格等于愿意支付量，从而反映了产出的社会价值即影子价格。参见图 13.4。由于不存在外部经济，边际社会收益曲线  $CD$  就等于边际私人收益曲线（亦即需求曲线） $AB$ ，从而产出的影子价格  $OP$  就等于产出的市场价格  $ON$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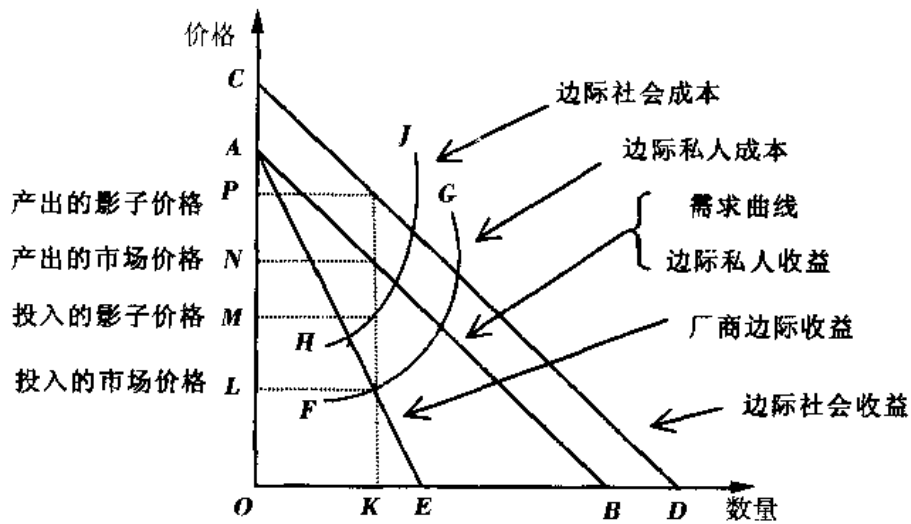


图 13.4 影子价格的确定：“现实的”厂商

二，其投入的市场价格低估了投入的影子价格。这是因为，在垄断条件下，垄断利润的存在意味着投入的市场价格低于产出的市场价格。例如，投入价格为 9，产出价格为 10。投入的影子价格是多少呢？它等于 9 还是等于 10？它应当等于 10！因为如果没有该投入，社会就要减少 10 个单位的价值。因此，投入的市场价格 9 低于其影子价格 10，即市场价格低估了影子价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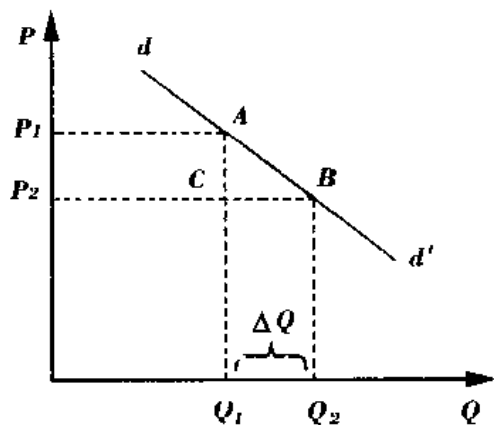
### (二) 资源闲置

当生产要素能够得到但却未被充分使用时，就意味着资源闲置。在完全竞争经济中，任何资源闲置都是暂时的现象：它表示当前价格过高，从而供给量超过了需求量。市场竞争将迫使价格下降，恢复供求的均衡。在非完全竞争经济中，价格和产量通常不是由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闲置不再只是暂时的现象，市场价格也不再反映社会价值，而是“有偏向的”。例如，在资源闲置条件下，项目使用的生产要素仍然有价格，即成本大于零，但他们的社会成本却等于零；如果这些生产要素不被利用，它们就仍然闲置在那里，毫无用处。

### (三) 非边际价格变化

前面说过，如果市场价格反映社会价值，则计算成本和收益的公式就是：投入或产出的数量与相应的价格的乘积。但是进一步讨论将会发现，即使价格反映社会价值，如果项目规模相对于市场来说很大，其实施会影响市场价格，或者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市场价格由于别的原因而发生了变化，则上述公式不再成立。参见图 13.5。

假定项目使产出从  $Q_1$  增加到  $Q_2$ ，从而使价格从  $P_1$  下降到  $P_2$ 。全部项目产出的价值由  $Q_1$  和  $Q_2$  之间、需求曲线  $dd'$  以下的区域来衡量，即它等于面积  $Q_1ABQ_2$ 。简单计算表明：



$$\begin{aligned} \text{面积 } Q_1ABQ_2 &= \text{面积 } Q_1CBQ_2 + \text{面积 } CBA \\ &= P_2 \times \Delta Q + \frac{P_1 - P_2}{2} \times \Delta Q \\ &= \frac{P_2 + P_1}{2} \times \Delta Q \end{aligned}$$

这就是说，无论  $P_1$  还是  $P_2$  都不能用来衡量项目产出  $\Delta Q$  的价值；项目产出价值处于大于  $P_2$  而小于  $P_1$  的中间水平上。对项目投入的成本亦可进行与上述同样的分析。

#### (四) 规模收益递增

在完全竞争经济中，企业按边际成本定价将获得最大利润。而在规模收益递增条件下，企业按边际成本定价就会亏损：因为规模收益递增意味着平均成本曲线的向右下方倾斜部分，而当平均成本曲线向下降时，它一定高于边际成本曲线。因此，企业为避免亏损，就必须把价格定在高于边际成本的水平上（至少在平均成本水平上）。但是，如果价格过高，需求从而产量就会不足。为了保护消费者免受高价及短缺的痛苦，政府常常以平均成本定价的政策来调节。参见图 13.6。其中， $D$ 、 $AC$ 、 $MC$  分别为需求、平均成本、边际成本曲线。边际成本定价意味着价格为  $OC$ ，低于平均成本  $OB$ ，从而亏损。平均成本定价意味着价格为  $OA$ ，该价格可以弥补所有成本，同时生产  $OH$  的产量满足所有需求。但是，平均成本定价的政策却使边际社会收益和边际社会成本不再相等；在  $OH$  上，边际社会收益为  $OA$ ，边际社会成本却为  $HJ$ ，低于  $O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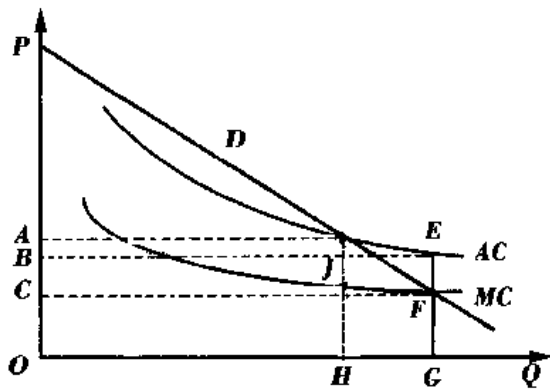


图 13.6 平均成本定价的效率影响

#### (五) 政府税收和补贴

在计算边际愿意支付量，即边际社会收益时，应当包括税收或补贴；但在计算边际社会成本时，却不应当包括它们。这样，税收和补贴就造成了市场价格偏离影子价格。

#### (六) 价格控制

价格控制分两类：最高限价——不允许价格高于某特定水平；最低限价——不允许价格低于某特定水平。无论哪种价格控制，其结果都是使均衡价格和产量的组合偏离需求曲线，从而使市场价格偏离社会价值。

以上讨论了各种“市场价格存在但偏离社会价值”的情况。在所有这些情况中，可以通过经济理论方法来确定影子价格，即以实际观察到的市场价格为基础来推断影子价格。如果出现“市场价格不存在”的情况，影子价格应如何估算呢？这里要区分两种市场价格不存在的情况，一是外部效应，一是公共物品。分别说明如下。

(1) 外部效应。项目可以通过投入和产出两条途径引起外部效应。

首先,考察经由投入而产生的外部效应。假设项目所需要的投入量为 $\bar{Q}$ ,生产每单位 $Q$ 所产生的外部成本(external cost)为 $e$ 。在这里,外部成本是由实施项目带来的,但实施项目者并不为此而支付任何补偿的、由社会承担的成本。项目的全部外部成本的大小取决于投入的供给条件。如果投入的供给完全无弹性,则由于项目实施而增加的对投入的需求只会引起投入价格上升,不会引起投入量本身的增加。因此,外部成本并不因为项目而增加,也就是说,项目的外部成本为零。如果投入的供给完全弹性,则投入需求的增加将引起投入供给量的等量增加,而不会改变投入的价格。因此,项目的外部成本为 $e \cdot \bar{Q}$ 。如果投入的供给既非完全弹性又非完全无弹性,则投入需求的增加既引起价格上升又引起投入量增加,但投入量的增加将小于 $\bar{Q}$ 。因此,项目的外部成本处于零到 $e \cdot \bar{Q}$ 之间。

其次,考察经由产出而产生的外部效应。判断通过产出产生的外部成本是否存在比较容易,但确定该外部成本的大小则相当困难。通过市场价格来确定社会价值的方法不再可行,因为此时不存在市场价格。但是,通过为避免外部成本的愿意支付量来确定价值的原则仍然适用。问题在于如何在实际计算中运用这一原则。对这一问题有各种处理办法,如调查“避免外部成本的愿意支付量”、计算“避免外部成本的成本”、或者干脆对外部成本进行定性描述等。

(2) 公共物品。完全竞争市场导致资源最优配置有两个条件。一是“消费的竞争性”:某个人消费了某商品,其他人就不能再消费该商品;二是“排外原则”:某个人能否消费某商品取决于他是否支付其价格。所谓公共物品就是不具备“消费竞争性”的物品:某人从该物品的消费上得到享受不会减少其他人从该物品消费上得到的享受。相当一部分公共物品,例如国防,甚至无法运用“排外原则”,因为一旦它们被提供出来,就无法排除任何人对它们的消费。

公共物品的社会价值等于所有个人愿意支付量的总和。个人的愿意支付量又由个人对公共物品的需求曲线所表示。至于个人需求曲线,可以通过对消费者的调查而得到。当然,消费者也许不愿意告诉调查者他们的真实想法。在这种情况下,计算公共物品的社会价值就很困难。

综上所述,可以作出如下概括,计算项目在 $t$ 时期对第 $j$ 个人的净收益的公式是:

$$V_{jt} = P_x \cdot \Delta X_{jt} - P_y \cdot \Delta Y_{jt}$$

当市场价格存在并反映社会价值时, $P_x$ 和 $P_y$ 就是市场价格;当市场价格存在但不反映社会价值或市场价格不存在时, $P_x$ 和 $P_y$ 应理解为影子价格。如果市场价格存在但不反映社会价值,可以通过市场价格来估计影子价格;如果市场价格不存在,则需要通过其他方法确定影子价格。

## 第六节 社会贴现率

第四节讨论了项目在 $t$ 时期对第 $j$ 个人的投入和产出: $\Delta Y_{jt}$ 和 $\Delta X_{jt}$ ;第五节讨论了

这些投入和产出的价格： $P_y$  和  $P_x$ 。两节讨论的结果给出了计算第  $j$  个人在  $t$  时期的净收益公式为：

$$V_{jt} = P_x \Delta X_{jt} - P_y \Delta Y_{jt}$$

全部项目的净收益可以看成是所有时期、所有个人净收益的总和，即：

$$V = \sum_j \sum_t V_{jt} = \sum_j \sum_t (P_x \Delta X_{jt} - P_y \Delta Y_{jt})$$

如果  $V > 0$ ，则项目就值得实施，否则便不值得实施。

现在必须指出，上述项目净收益概念并没有真正反映项目的实际社会价值。它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因为它忽略了至关重要的净收益分配问题。分配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时间上的分配，即净收益产生于不同的时期；一是空间上的分配，即净收益归属于不同的个人。净收益在时间上或空间上的不同分配将影响它们的实际社会价值。例如，从社会的观点来看，同样一笔钱在现在比在将来更有价值，在穷人手中比在富人手中更有价值。这就是说，同样一笔收益的实际价值随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分配的不同而不同，并不一定等于它的“表面价值”（例如一定的货币数额）。

因此，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不同时期、不同个人的净收益从“表面价值”还原为“实际社会价值”，从而得到所有时期、所有个人净收益的实际社会价值。显而易见，所有时期、所有个人净收益的实际社会价值这一概念比净收益本身要更加准确地反映了项目的社会价值。

本节研究不同时间上净收益的还原。下节研究不同个人净收益的还原。

如果暂时忽略净收益在个人中的分配，而只考虑它在时间上的分配，则项目净收益公式可以写成  $V = \sum_t V_t$ ，其中  $V_t$  是项目在  $t$  时期的净收益，它等于该时期中所有个人净收益的总和，即  $V_t = \sum_j V_{jt}$ 。

上述计算  $V$  的公式是否能够成立并是否能够作为判断项目盈利程度的标准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公式只有在下述假定基础上才成立：或者，所有收益都发生在同一时期，该假定避免了不同时期相加的困难；或者，收益发生在不同时期，但不同时期的收益之间不存在任何区别，该假定使不同时期相加变得完全合理。但是，这两个假定都是不现实的。

首先，项目的净收益不能不分布在不同的时期中。拿项目的成本来说，它不仅包括初始的成本支付，而且包括操作的成本支付。操作成本（operating cost）涉及项目的整个生命周期，因而发生于不同的时期；即使是初始成本，其初始阶段也可能包括若干个不同的时期，尤其是较大的项目更是如此。至于项目收益，则毫无疑问是逐期收到的：它在项目开始时可能几乎没有，随后渐渐增加，也许持续几十年，最后又减少甚至消失。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发生在不同时期中的净收益不能不具有不同的价值。这里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与资本生产率有关。由于资本具有生产力，推迟现在的消费而将资源用于投资，可以在将来得到更多的消费。例如，假定资本生产率为 10%，则今年 1 元钱不用于消费而用于投资，明年就增值到 1 元 1 角。这意味着今年的

1 元钱比明年的 1 元钱更加值钱。第二个原因与“正时间偏好”(positive time preference)有关。不管客观上资本是否具有生产力,人们主观上都具有正的时间偏好,即他们都更加看重近期而非远期的利益。这或者是由于他们缺乏耐心,不愿意等待;或者是由于他们认为将来会比现在更加富裕,从而将来收益的价值要比现在低——收益的边际效用递减。

由于不同时期的净收益具有不同的价值,各个时期净收益之间缺乏直接比较的基础,因此,将它们简单相加而求出所谓项目在所有时期的净收益就变得毫无意义。实际上,它们根本就无法简单相加。取代项目净收益概念而更加精确地反映项目社会价值的是项目的净现值。项目净现值是所有不同时期净收益的实际价值的总和。如何计算项目的净现值呢?第一步必须把所有不同时期的净收益都转化为同一时期的,亦即求出它们各自的实际价值,从而使它们之间可以相互比较,然后把这些已经转化为同一时期的净收益加总求和。第二步“加总”很简单,但是它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即如何选择“同一时期”和如何“转化”为同一时期。在项目评估中,通常以当前时期为同一时期,转化方法是用不同的适当的因子去乘不同时期的净收益,把它们变换为当前时期的实际价值。这个过程叫做“贴现”(discounting),变换因子叫做“贴现因子”。

假定当前时期、第一年、第二年……第  $T$  年的净收益分别为  $V_0$ 、 $V_1$ 、 $V_2$ …… $V_T$ ,各个时期净收益的贴现因子分别为  $b_0$ 、 $b_1$ 、 $b_2$ …… $b_T$ ,且假定以当前时期为比较基础,当前时期的贴现因子  $b_0 = 1$ ,其他贴现因子随时间而递减,即有  $b_0 = 1 > b_1 > b_2 > \dots > b_T$ ,于是,各个时期净收益的实际价值分别为  $b_0 V_0 = V_0$ 、 $b_1 V_1$ 、 $b_2 V_2$ …… $b_T V_T$ 。现在这些实际价值之间可以直接相互比较。例如,由于当前时期的贴现因子  $b_0 = 1$ ,当前时期 1 元钱的实际价值为  $1 \times 1 = 1$ 。如果第  $T$  年的贴现因子  $b_T = 0.5$ ,则  $T$  年 2 元钱的实际价值为  $2 \times 0.5 = 1$ 。这表明, $T$  年的 2 元钱等于当前时期的 1 元钱。于是可以对所有时期净收益的现值相加得到项目的净现值:

$$NPV = V_0 + b_1 V_1 + b_2 V_2 + \dots + b_T V_T$$

由计算项目净现值的公式可以看到贴现因子的重要性。一方面,贴现因子本身将不同时期的净收益转化为同一时期的,从而使它们可以相互比较,可以相加求和;另一方面,贴现因子的大小可以影响项目净现值的大小,从而影响对项目的评估。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如何确定贴现因子。为简单起见,假定贴现因子随时间递减的比率是固定不变的,即:

$$\frac{b_{t-1} - b_t}{b_t} = r \quad (t = 1, 2, \dots, T)$$

其中,  $r$  为常数。由上式可得:

$$\frac{b_{t-1}}{b_t} = 1 + r$$

或,

$$\frac{b_t}{b_{t-1}} = \frac{1}{1 + r}$$

于是可以重写项目净收益的现值如下：

$$\begin{aligned}
 NPV &= b_0 V_0 + b_1 V_1 + b_2 V_2 + \cdots + b_T V_T \\
 &= V_0 + \frac{b_1}{b_0} V_1 + \frac{b_2}{b_1} b_1 V_2 + \cdots + \left( \frac{b_T}{b_{T-1}} \times \frac{b_{T-1}}{b_{T-2}} \times \cdots \times \frac{b_2}{b_1} \times b_1 \right) V_T \\
 &= V_0 + \frac{b_1}{b_0} V_1 + \frac{b_2}{b_1} \times \frac{b_1}{b_0} V_2 + \cdots + \left( \frac{b_T}{b_{T-1}} \times \frac{b_{T-1}}{b_{T-2}} \times \cdots \times \frac{b_2}{b_1} \times \frac{b_1}{b_0} \right) V_T \quad (1) \\
 &= V_0 + \frac{1}{1+r} V_1 + \frac{1}{(1+r)^2} V_2 + \cdots + \frac{1}{(1+r)^T} V_T \\
 &= \sum_{t=0}^T \frac{V_t}{(1+r)^t}
 \end{aligned}$$

上述公式揭示了贴现因子的结构：

$$b_t = \frac{1}{(1+r)^t}$$

但并没有确定贴现因子本身的大小。确定贴现因子的问题现在转化为确定贴现因子随时间的递减率  $r$ 。我们把这个递减率  $r$  叫做社会贴现率 (social discount rate)，它表示社会对不同时期的净收益所赋予的不同重要性。

社会贴现率很容易与私人投资分析中的一般贴现率或市场利息率混同起来。假设市场利息率为  $i$ ，则今年投资 (储蓄) 的 1 元钱在 1 年后会增值到  $1 \times (1+i) = 1+i$  (元)，两年后增值到  $(1+i) + (1+i)i = (1+i)^2$  (元)…… $T$  年后增值到  $(1+i)^T$  (元)。若今年的钱为  $x$  元，则它在  $t$  ( $t=0, 1, \cdots, T$ ) 年后就等于  $x(1+i)^t$  元。反过来， $t$  年后的 1 元钱等于今年的  $1/(1+i)^t$  元，因为今年的  $1/(1+i)^t$  元恰好为  $t$  年后的 1 元：

$$\frac{1}{(1+i)^t} \times (1+i)^t = 1$$

$t$  年后的  $y$  元钱则等于今年的  $y/(1+i)^t$ 。于是，如果用市场利息率来贴现私人投资在不同时期产生的一连串收益  $R_0, R_1, \cdots, R_T$ ，则该私人投资收益的现值为：

$$\begin{aligned}
 NPV_i &= R_0 + \frac{R_1}{(1+i)} + \cdots + \frac{R_T}{(1+i)^T} \\
 &= \sum_{t=0}^T \frac{R_t}{(1+i)^t}
 \end{aligned} \quad (2)$$

其中， $NPV_i$  表示用市场利息率  $i$  贴现各期收益所得到的结果。比较公式 (1) 和公式 (2) 就可以发现，它们的数学结构是完全一样的。除了收益的含义不同之外，区别只在于所采用的贴现率不同，一个用的是市场利息率  $i$ ，一个用的是社会贴现率  $r$ 。

社会贴现率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即使在理论分析上也难以确定。市场利息率则可以直接观察到。因此，人们希望能够在项目评估中，用市场利息率来代替社会贴现率。作为这种替代的基本根据仍然是愿意支付原则：正如一般商品的市场价格表明了消费者对该商品的边际愿意支付量，从而反映了该商品的社会价值一样，市场利息率也应当表明他们对未来收益的愿意支付量，从而反映未来收益的社会价值。然而，这种类比推论

并不成立。在普通的市场价格和利率之间存在着一个重要的差别：市场价格可以看成只涉及无时间性的选择，例如，在同一时间内是选择小麦还是选择白糖；利率则涉及所谓“时际”（intertemporal）选择，即在不同时期之间的选择，例如选择现在消费还是选择未来消费。在同一时期内选择不同的商品时，人们可以通过不断地试错选择学到经验，通过不断地调整其选择使市场价格充分接近愿意支付量。这种试错方法很难运用于时际选择。由于时间是一维的，逝去的不会再来，人们没有可能在不同时期的消费之间不断地进行试错选择。因此，市场利率并不一定反映不同时期的收益的真实价值。

市场利息率不等于、也不能代替社会贴现率，但它却可以用来作为比较的基础来确定社会贴现率的高低。社会贴现率应当高于还是低于市场利息率呢？在这个问题上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主张社会贴现率低于市场利息率。其理由是基于所谓的社会时间偏好。他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单个人的行为：他单独行动（他采取某一行动，但别人并不采取同一行动）和他作为集体成员行动（他采取某一行动，别人也都采取同样的行动）。研究表明，在前一场合，单个人通常不愿意为将来而投资，即他低估未来的收益，从而要求较高的贴现率。这正是市场利息率反映的情况。在后一种场合，单个人则相反，通常乐意为将来而投资，即他高估未来的收益，从而要求较低的贴现率。因此，社会贴现率应当低于市场的利息率。

主张社会贴现率高于市场利息率的人们则以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概念为依据。公共项目的机会成本可以看成是私人部门的收益率。假定市场利息率为  $i$ ，风险补贴（risk premium）为  $\bar{i}$ ，税率为  $t'$ ，则私人部门收益率必须有： $(i + \bar{i}) / (1 - t') > i$ （因为  $t' < 1$ ）。因此，社会贴现率应当高于市场利息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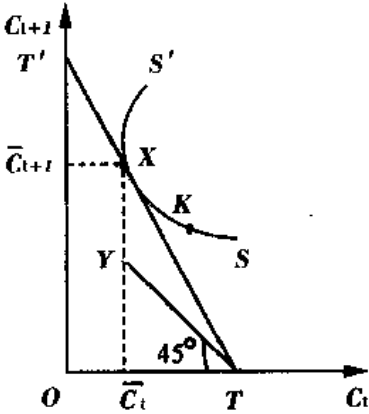


图 13.7 基于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的社会贴现率和基于社会的时间偏好的社会贴现率

基于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和基于社会的时间偏好的两种社会贴现率可由图 13.7 说明。横轴和纵轴分别表示  $t$  和  $t+1$  年的消费。 $TT$  为生产可能性曲线。不过与通常代表两种商品生产的不同组合的生产可能性曲线不同， $TT$  表现的是两个不同年份的生产（消费）的各种组合。如果资源全部用于  $t$  年，产出就是  $OT$ ；如果全部用于  $t+1$  年，产出就是  $OT'$ 。 $OT'$  大于  $OT$ ，这是因为资源全部用于  $t+1$  年意味着资源在  $t$  年全部用于投资而不是用于消费，即在  $t$  年的投资为  $OT$ ，从而在  $t+1$  年能够生产出更多的东西用于消费。 $S'S$  为社会无差异曲线，表示从社会角度同等看待  $t$  及  $t+1$  两个不同年份的生产（消费）的各种组合。社会在  $X$  点处达到最优状态，这时，社会在生产可能性曲线限制条件下达到了可能的最高社会无差异曲线。在最优状态，社会在  $t$  年的消费为  $\bar{C}_t$ ，在  $t+1$  年为  $\bar{C}_{t+1}$ 。这意味着在  $t$  年的投资  $I_t = T - \bar{C}_t$ ，利用这个简单模型，容易对两类社会贴现率下定义。

首先考察生产可能性曲线  $TT$ 。资本总生产率可以写成：

首先考察生产可能性曲线  $TT$ 。资本总生产率可以写成：



$$\frac{\bar{C}_{t+1}}{I_t} = \frac{Y\bar{C}_t + YX}{I_t} = \frac{Y\bar{C}_t}{I_t} + \frac{YX}{I_t} = 1 + \frac{YX}{I_t} = 1 + r_1$$

其中  $YX/I_t = r_1$  是资本净生产率。因此，资本总生产率等于 1 加上资本净生产率，即  $1 + r_1$ 。另一方面， $\bar{C}_{t+1}/I_t$  恰为  $TT$  曲线的斜率，因此又有  $TT$  的斜率  $= 1 + r_1$ ，或者  $r_1 = TT$  的斜率  $- 1$ 。

$r_1$  实际上就是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因而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贴现率。

其次，考察社会无差异曲线  $S'S$ 。假定从  $K$  点移动到  $X$  点，因此而损失的效用为  $\Delta C_t MU_t$ ，即等于  $C_t$  的增量  $\Delta C_t$  与其边际效用  $MU_t$  的乘积；增加的效用为  $\Delta C_{t+1} MU_{t+1}$ ，即等于  $C_{t+1}$  的增量与其边际效用  $MU_{t+1}$  的乘积。因为  $K$  与  $X$  处于同一无差异曲线上，故有：

$$\Delta C_t MU_t = \Delta C_{t+1} MU_{t+1}$$

即：

$$\frac{\Delta C_{t+1}}{\Delta C_t} = \frac{MU_t}{MU_{t+1}}$$

设：

$$\frac{MU_t}{MU_{t+1}} - 1 = r_2$$

则：

$$\frac{MU_t}{MU_{t+1}} = 1 + r_2$$

由于  $\Delta C_{t+1}/\Delta C_t$  表示  $S'S$  曲线的斜率，故有：

$$S'S \text{ 的斜率} = 1 + r_2$$

或者：

$$r_2 = S'S \text{ 的斜率} - 1$$

$r_2$  可以定义为社会的时间偏好，也代表一种社会贴现率。

现在我们拥有两种社会贴现率：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  $r_1$  和社会的时间偏好率  $r_2$ 。它们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相等：当  $TT$  的斜率等于  $S'S$  的斜率，从而经济处于  $X$  点时。在这种情况下，选择社会贴现率就比较容易。当经济偏离  $X$  点时， $r_1$  和  $r_2$  不再相等，社会处于较低的社会无差异曲线上，处于“次优”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对社会贴现率有三种选择：选择  $r_1$ ；选择  $r_2$ ；选择  $r_1$  与  $r_2$  的某种组合。

## 第七节 分配权数

项目净收益具有时间上的分布，它在现在和未来的不同时期中具有不同的社会价值。同样地，净收益也具有空间上的分布，它在贫穷和富裕的不同人手中也具有不同的社会价值。如果社会福利目标中含有“平等”的内容，则从增加社会福利的角度看，增

加穷人的收入就比增加富人的收入更有意义。因此,在进行项目评估时,可以有意识地扩大每单位穷人收入增量的重要性,缩小每单位富人收入增量的重要性。这就是说,我们有意识地给予贫富不同的人的收入以不同的权数。在下面的讨论中,暂时不考虑时间分配从而不考虑贴现问题。

假定社会由  $A$ 、 $B$ 、 $C$  三个人组成。其中,  $A$  属于高收入阶层,  $B$  和  $C$  属于低收入阶层。项目给他们带来的净收益分别为  $V_A$ 、 $V_B$  和  $V_C$ 。这些净收益可正可负,如果为负,就表示“净损失”。社会现在按照贫富程度的不同重新评价每个人净收益的社会价值。设社会给予每一个人净收益的分配权数分别为  $a_A$ 、 $a_B$  和  $a_C$ 。于是,  $A$ 、 $B$ 、 $C$  三人的净收益的社会价值分别为  $a_A V_A$ 、 $a_B V_B$  和  $a_C V_C$ , 三人净收益的社会价值的总和为  $a_A V_A + a_B V_B + a_C V_C$ 。

一般来说,由于  $A$  比  $B$ 、 $C$  要富裕,增加  $A$  的收益的重要性就比增加  $B$  和  $C$  的要小。也就是说,  $A$  每单位净收益的社会价值要比  $B$  和  $C$  的小。因此,社会赋予  $A$  的分配权数应当比赋予  $B$  和  $C$  的要小,即  $a_A < a_B$ 、 $a_A < a_C$ 。例如,如果确定  $a_A = 1$ ,  $a_B = a_C = 4$ , 则这意味着,从社会的角度看,穷人  $B$  或  $C$  的 1 元钱收入增量比富人  $A$  的 1 元钱收入增量要重要 3 倍。

由于加权因子的大小反映了被加权收益的社会价值,因此它直接影响了项目评估的结果。例如,设某项目结果如下:  $A$  的净收益为 100, 而  $B$ 、 $C$  的净收益均为 -40。如果社会同等程度地看待这三项收益的重要性,给予三人收益完全一样的加权因子,例如,  $a_A = a_B = a_C = 1$ , 由该项目就值得实施:

$$1 \times 100 + 1 \times (-40) + 1 \times (-40) = 20 > 0$$

但是,如果社会更加重视提高穷人的收入,改善收入分配,从而给予三人不同的加权因子,例如  $a_A = 1$ ,  $a_B = a_C = 4$ , 则该项目就不值得实施:

$$1 \times 100 + 4 \times (-40) + 4 \times (-40) = -220 < 0$$

三人社会的简单例子可以推广到一般情况。假定社会由  $n$  个人组成,其中第  $j$  个人得到的净收益为  $V_j$ , 其分配权数为  $a_j$ , 于是第  $j$  个人的净收益的社会价值为  $a_j V_j$ 。全部个人净收益的社会价值的总和为:

$$\sum_{j=1}^n a_j V_j = a_1 V_1 + a_2 V_2 + \cdots + a_n V_n$$

我们把这个总和定义为净社会收益 (NSB); 亦即:

$$NSB = \sum_{j=1}^n a_j V_j$$

如果  $NSB > 0$ , 则该项目就值得实施, 否则不值得实施。

传统的成本—收益分析忽略了在不同人之间的分配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作为传统成本—收益分析理论基础的潜在帕累托优性标准假定一笔既定收益对社会的价值与得到它的单个人的特点没有关系;更进一步说,收益在不同个人之间的转移不会影响社会的福利。实际上,这个假定只有在下述前提条件下才成立:社会认为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是合理的、可以接受的,并且项目实施的结果不会严重地改变这种现存的分配格局。在这种分配制度中,可以近似地认为收益究竟由社会上哪部分人得到无关紧要,于

是可以给予不同人的收益以相同的单位权数,即令所有的  $a_j$  都等于 1。这样,计算净社会收益的公式便成为传统的净收益公式:

$$\text{净社会收益} = \text{净收益} = \sum_{j=1}^n V_j$$

但是,当前社会的现存收入分配制度远不是令人满意的。无论是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在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收入分配方面都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现象。而且,在许多国家,这种不平等的程度还在日益加剧。分配的不平等及其程度的恶化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福利的提高。因此,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潜在帕累托优性标准并不适用。现在各国政府和人民都对收入分配问题表示深切的关注。在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中,不仅包括提高国民收入总量,而且包括改善收入分配和提高生活质量等。所谓改善收入分配,主要就是努力创造条件,增加贫困阶层的收入,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具体到项目选择上来说,选择的目的是:在其他条件相同时,选择那些最能够提高低收入阶层净收益的项目。为此,在项目评估中,应当赋予不同个人的收益以不同的分配权数,特别是赋予低收入阶层以较大的权数,从而使得那些有利于穷人的项目容易被接受。

尽管分配权数的思想很简单,理由也很明显,但确定分配权数的大小却很不容易。确定分配权数甚至比确定社会贴现率还要困难。无论如何,在社会贴现率场合,还有市场利息率可以作为某种比较的基础;而在分配权数场合,不存在任何市场信息可以提供帮助。研究社会项目评估的学者认为,分配权数涉及社会的政治目标,因而只能通过政治过程中的某种方式加以确定。有些人建议从关于较早项目的决策中来推断分配权数;另一些人则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所得税计划上。一些人假定分配权数为既定的、已知的;另一些人则主张把它们看成是未知数,而试图以某种方式把它们推导出来。

那么,如何从理论上确定分配权数呢?许多项目评估学者认为,首先可以比较政治选票与“经济选票”之间的区别。政治选票通常并不以个人的偏好程度来“加权”,即政治选票的原则是“一人一票”;即使一个选民特别赞成或特别反对某位被选举人,他也只能投一张赞成票或反对票。“经济选票”则可以由收入(以及财富)来加权:即它可以“一人一票”。如果一个人有优厚的收入或巨额的财产,则他就可以对他特别偏好的商品支出较多的货币(即“经济选票”),较多地购买和消费这种商品。政治选举的一人一票原则体现了民主的精神。项目评估可以按照政治民主的精神来设计自己的分配加权程序。这种加权程序的公式可以为:

$$a_j = \frac{\bar{Y}}{Y_j}$$

其中,  $\bar{Y}$  是社会的平均收入,  $Y_j$  是第  $j$  个人的收入,  $a_j$  仍和过去一样,代表第  $j$  个人的分配权数。

表 13.1 是用上述加权程序来计算净社会收益的一个简单例子。根据表中所给数据,容易算得,社会平均收入  $\bar{Y}$  为 150。因此,根据公式  $a_j = \bar{Y}/Y_j$  容易得到每个人的分配权数。

第六节研究了净收益在时间上的分配及其对项目评估的影响,本节研究了净收益在空间上(即单个人之间)的分配及其对项目评估的影响。现在则可以把净收益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两种分配效应综合起来。

表 13.1 用加权程序计算净收益

我们知道,项目在  $t$  时期对第  $j$  个人的净收益是:

$$V_{jt} = P_x \cdot \Delta X_{jt} - P_y \cdot \Delta Y_{jt}$$

项目对所有人在所有时期的净收益是:

$$V = \sum_j \sum_t V_{jt}$$

个人	A	B	C	D
$Y_j$	200	250	100	50
$a_j$	0.75	0.60	1.50	3.00

其中:  $\bar{Y} = (1/4) \times (200 + 250 + 100 + 50) = 150$   
 $a_A = 150/200 = 0.75$ ,  $a_B = 150/250 = 0.60$ ,  
 $a_C = 150/100 = 1.50$ ,  $a_D = 150/50 = 3.00$

但是,项目净收益并不真正反映项目的社会价值。因此,必须考虑时间和空间方面的分配效应对项目净收益进行修正和调整。如果只考虑时间上的分配,则项目净收益经过调整后就成为项目净现值,其公式为:

$$NPV = \sum_j \sum_t \frac{V_{jt}}{(1+r)^t}$$

其中,  $r$  为社会贴现率。如果只考虑空间上的分配,则项目净收益经过调整后就成为项目的净社会收益,其公式为:

$$NSB = \sum_j \sum_t \left( \frac{\bar{Y}}{Y_j} \right) V_{jt}$$

其中,  $\bar{Y}/Y_j$  是社会给予第  $j$  个人的分配权数。如果同时考虑时间和空间上的分配,则所得结果就全面反映了项目的社会价值,其公式为:

$$\text{项目社会价值} = \sum_j \sum_t \left( \frac{\bar{Y}}{Y_j} \right) \frac{V_{jt}}{(1+r)^t}$$

将  $V_{jt} = P_x \Delta X_{jt} - P_y \Delta Y_{jt}$  代入得:

$$\text{项目社会价值} = \sum_j \sum_t \left( \frac{\bar{Y}}{Y_j} \right) \frac{P_x \Delta X_{jt} - P_y \Delta Y_{jt}}{(1+r)^t}$$

这是项目评估的一般公式。根据这个一般公式来决定是接受还是拒绝某个项目:如果项目的社会价值大于零,则该项目就值得实施;否则就不值得实施。

## 第八节 项目评估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应用

项目评估的一般原理和方法适用于任何国家,但更加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例如,以影子定价问题而言,在发达国家中,由于市场相对来说比较完善,影子定价实际上只局限于一些“例外”情况;而在发展中国家,它却被系统和广泛地使用于项目评估之中,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很大一部分经济是处于“自然经济”状态,要素投入和产出的市场价格根本就不存在,或者即使存在市场价格,由于各种经济的、政治的原因,它们多半

也是受到严重扭曲的。实际上，影子定价本身也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花费很大的成本，而且所得结果还不能保证非常精确，因此，只有在存在大量严重歪曲的经济中，才值得去分析和应用影子定价。

发展中国家面临着特殊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特殊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带来了特殊的经济问题。这些问题包括：迅速的通货膨胀、严重的汇率高估、过低的利息率、不完全的要素市场、低水平的储蓄和投资以及不平等的财富和收入分配。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更加有必要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计划中运用项目评估方法。

### **(一) 严重的通货膨胀**

项目评估中所使用的是实际价格。对它来说，重要的是相对价格而非一般价格水平的运动。那么，为什么通货膨胀会给项目评估带来问题呢？原因在于，高速的通货膨胀会通过时滞效应以及政府的控制行为来扭曲相对价格体系。在不存在任何摩擦的理想模型中，价格可以从一个均衡位置迅速（速度可以无限大）运动到另一个均衡位置。但是，在实际生活中，情况却并非如此。有一些价格是在市场上逐日决定的，而另一些则由政府的周期性干预而得到修正；有些价格为政府所控制，而另一些则可以自由浮动并达到或接近自己的均衡水平。换句话说，相对价格的运动可以完全脱离市场的供求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不存在其他扭曲的原因，也很难确定究竟哪一套相对价格适合于项目评估的目的。此外，通货膨胀还可以通过影响汇率等来影响项目评估。

### **(二) 汇率高估**

如果面临严重的汇率高估问题，则在项目评估中就应当用影子汇率来代替官方汇率。许多发展中国家都要依靠出口需求弹性很小的初级产品来进口自己无法生产的工业品。在这种情况下，要消除国际收支赤字就必须大幅度地贬值国内货币。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意味着实际国民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因此，发展中国家通常是通过特定的关税、控制和补贴来管理国家的对外贸易。

在这种情况下，项目评估的通常做法是：估计来自出口或进口替代增加部分的外汇收入；估计进口增加部分的外汇成本；然后按照影子价格把它们变换为国内货币价值；最后再加上由于对这些出口和进口商品的关税、税收和补贴带来的税收收入的变化。

另一种做法是，估价所有在世界价格上进行国际贸易的商品。这是因为它代表了通过向国外销售这些商品而得到的或者通过减少这些商品进口而节约的外汇。无论是增加出口还是减少进口，两种场合所得到的数字都是对收益（或者国内消费的机会成本）的一个合适的量度。它既可以用外汇来表示，也可以按照官方汇率变换为国内货币价值。当然，这个方法只适用于如下情况，即所研究的商品存在有实际进行国际贸易的可能性。

### **(三) 过低的利率**

发展中国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市场利息率过低。过低的利息率意味着低估未来的收益，低估资本的社会机会成本。它的直接影响就是使发展中国家由于收入水平低下导致不足的储蓄和投资进一步不足。如果利用这种过低的利息率来评估项目，则结果将不利

于那些可以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注重基础建设的项目。因此，必须用“影子利率”来代替市场利率，从而能正确评价发展中国家稀缺资本的实际价格，正确评价投资和再投资的重要性。这种“影子利率”实际上可以看成是一种社会贴现率。

#### **(四) 劳动市场不完全**

发展中国家同时并存着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在传统部门（主要是农业）中，劳动和产品分配均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单个人所得到的是劳动的平均产品。由于缺乏其他的就业机会，劳动的边际产品非常低，甚至等于零。而在现代部门，由于劳动缺乏流动性，而且存在工会和政府的干预等，工资则相对较高。

因此，当新的项目把传统部门中的劳动力吸引到现代部门中时，现代部门中的工资并不能真正地反映劳动转移的机会成本。而在给定的农业收益递减的条件下，农业部门的平均收入本身就高估了由于劳动转移而损失的产出。

而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的失业现象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存在失业的条件下，城市项目中使用的非技术劳动力的影子价格似乎应当等于零。但是，这只能是在假定该项目并不吸收额外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区域中时才是如此。然而，一般来说，每创造一个额外的城市就业机会，常常会吸引不止一个的农村劳动力移居城市。在这种情况下，额外增加的城市工作机会实际上进一步恶化了城市的失业状况，从而转移劳动力的影子价格可以超过劳动力的边际产品价值。

#### **(五) 储蓄和投资不足**

在发展中国家，提高生活标准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够增加储蓄和投资。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口都非常贫困，自愿储蓄的水平不可能很高。另一方面，实行强迫储蓄在政治上又不得人心，在实施上也会遇到抵制。此外，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为征收累进所得税所必须的一套行政管理机器很可能根本就不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机会成本和社会的时间偏好率就有很大差距。因此，应当根据项目对投资和再投资机会的影响来计算其成本和收益的影子价格。例如，不同项目的收益在工资和利润中的分配比率可能不同，从而会影响社会总的储蓄和投资水平。即使是工资在不同工人之间的分配、利润在不同企业之间的分配也会影响总储蓄和投资。就工资部分来说，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的工人的边际消费倾向很可能不同，从而其工资中用于储蓄的部分会有差别。

储蓄和投资制约的存在也使我们有必要仔细分析项目资金的来源。一般来说，项目的机会成本通常是用所放弃的其他项目的收益来衡量的，即使用的是代表所有项目的资本机会成本。但是，在资金来自国外的情况下，项目的机会成本则是未来必须偿还贷款的外汇支付数量。

#### **(六) 收入分配不均**

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两极分化情况很严重。少数人极端富裕，多数人极端贫困。如果政府能够通过其他方法，例如税收和补贴政策等，改变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使之趋向于社会认可的最佳状态，则在项目评估中就可以简单利用消费者的愿意支付量来估计项目的成本和收益。但是，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治的和体制的障碍使得收入的这种再

分配成为不可能。政府并不愿意对经济中的富裕部门和富裕阶层征税；即使政府愿意，这种企图也会由于强有力的利益集团的反对而化为泡影。

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某种形式的分配权数。例如，可以给予那些转移到发达国家中去的利润等于零的权数，给予在国内消费掉的利润以较低的权数（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的利润权数较低，因为整个利润中有很很大一部分是用于储蓄和投资的），给予传统部门劳动者的额外消费较高的权数等。

## 第十四章 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问题一直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20世纪以来,随着科技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加速推进了经济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自然资源的急剧耗损和环境质量的不断下降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六七十年代,以《增长的极限》为代表的限制增长论的问世标志着人们对传统发展方式理论上的全面怀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现实则深刻地、明确地印证了这些怀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人口爆炸、南北经济差距扩大、不可再生资源的过度消耗、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等问题丛生,极大地干扰了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的提高,甚至危及到人民的生存,使人类的经济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人们为寻求一种建立在环境和自然资源可承受基础上的长期发展的模式,进行了不懈探索。自80年代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模式后,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战略得到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普遍认同。如今,“可持续发展”这一词语也许是大众媒介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可持续发展理论也成为世界各国竞相研究的一大热点问题。

### 第一节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

可持续发展涵盖了生态、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内容,内涵较广,于是形成了从不同角度考察所得出的多种多样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已达百种以上。比较普遍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有:在连续的基础上保持或提高生活质量;在保持能够从自然资源中不断得到服务的情况下,使经济增长的净利益最大化<sup>①</sup>;在生存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sup>②</sup>;当发展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

---

<sup>①</sup> Munasinghe M, Meade J. Key Concept and Terminolo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fining And Measuring Sustainability. The Biogeophysical Foundations, 1996. 19 ~ 56

<sup>②</sup> IUCN, UNEP, WWF. 保护地球——可持续性生存战略.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2



利增加时，也不应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sup>①</sup>；等等。目前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得到广泛接受和认可的是 WECD 于 1987 年发表的《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即“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sup>②</sup>，本节将在此定义的基础上探讨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

## 一、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含义

我们认为，可持续发展的本质含义是：健康的经济发展应建立在生态可持续能力、社会公正和人民积极参与自身发展决策的基础之上；可持续发展所追求的目标是既要使人类的各种需要得到满足，个人得到充分发展，又要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不对后代人的生存和发展构成威胁；衡量可持续发展主要有经济、环境和社会三方面的指标，缺一不可。

可持续发展并不否定经济增长，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毕竟经济增长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日趋丰富、人类文化和技能提高，从而扩大个人和社会的选择范围的原动力。但是，需要重新审视实现经济增长的实现方式和目的，可持续发展反对以追求最大利润或利益为取向、以贫富悬殊和资源掠夺性开发为特征的经济增长。它所鼓励的经济增长应是适度的、注重人类生活质量提高的，它以无损于生态环境为前提，以可持续性为特征，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目的。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单纯追求产值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弊端，通过资源替代、技术进步、结构变革和制度创新等手段，从总体成本收益分析的角度出发，使有限的资源得到公平、合理、有效、综合和循环地利用，从而使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逐步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化。

可持续发展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同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要运用资源保育原理，增强资源的再生能力，引导技术变革使再生资源替代非再生资源成为可能，并运用经济手段和制定行之有效的政策，限制非再生资源的利用，使其利用趋于合理化。发展的同时必须保护环境，包括改变不适当的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保护生命支持系统、保持地球生态的完整性，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承载力之内。

可持续发展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同社会进步相适应。这一点是与经济发展的内涵及目的相同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同已成为共识，经济发展意味着贫困、失业、收入不均等社会经济结构的改善，可持续发展追求的正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因为贫困与不发达正是造成资源与环境恶化的基本原因之一。只有消除穷困，才能形成保护和建设环境的能力。世界各国的发展阶段不同，发展的具体目标也各不相同，但发展的内涵均应包括改善人类生活质量，保障人类基本需求，并创造一个自由、平等及和谐的社会。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及自然环境等的综合性概念。分析

① 皮尔斯等，世界无末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② WECD：我们共同的未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52

可持续发展，不能把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因素割裂开来，因为与物质资料增长相关的定量因素同确保长期经济活动和结构活动以及结构变化的生态、社会与文化等定性因素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同时，可持续发展又是动态的，它并不是要求某一种经济活动永远运行下去，而是要求不断地进行内部和外部的变革，在一定的经济波动幅度内，寻求最优的发展速度以达到持续稳定发展经济的目标。

## 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1) 可持续性原则。即使人类社会发展具有一种长久维持的过程和状态，它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原则，也是与以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的传统发展观相区别的关键所在。这一原则一般被描述为生态持续性、经济持续性和社会持续性三个方面。生态持续性指生态系统受到某种干扰时能保持其生产率的能力，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首要条件。经济持续性指不超越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的可以延续的经济增长过程，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导。社会持续性是使社会形成正确的发展伦理，促进知识和技术效率的增进，提高生活质量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是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目标。三者是统一的整体，相互联系，相互适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2) 公平性。当前许多可持续发展强调人类欲望的满足是发展的重要目标，应给所有人平等的机会实现他们过较好生活的愿望。这里的公平性是指人类在分配资源和占有财富上的“时空公平”，具有三层含义：①国家范围之内同代人的公平。当今世界的现实是一部分人富足而约有占世界人口 1/5 的人口处于穷困状态，这种贫困悬殊、两极分化的世界，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要给世界以公平的分配和发展权，把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进程特别优先的问题来考虑。②公平分配有限资源。目前的现实是占世界人口 26% 的发达国家在利用地球资源上有优势，取代了发展中国家利用地球资源的合理一部分，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经济增长，其消耗的能源、钢铁和纸张等，都占全球的 80%。《里约宣言》已把这一公平原则上升为国家间的主权原则。③代际间的公平。即世代间的纵向公平，要认识到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当代人不能因自己的发展与需求而忽视后代对资源、环境要求的权利。而且，上一代利用各种机会和世界资源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也应对当代的资源环境问题承担更多的责任，为解决当代的不公平尽更多的义务。公平性，尤其是代际公平性，是以前的发展模式所不曾考虑或很少涉及的。

(3) 共同性原则。尽管各国由于历史、文化和发展水平的差异，可持续发展的具体目标、政策和实施步骤不可能完全相同，但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整体资源有限性和相互依存性要求我们必须采取共同的联合行动，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一总目标。从广义上讲，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整个人类之间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如果每个人在考虑和安排自己的行动时，都能考虑到这一行动对其他人（包括后代人）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并能真诚地按共同性原则办事，那么人类内部及人类与自然之间就能保持一种互惠互生的关系，也只有这样，可持续发展才能够实现。

(4) 学习原则。即通过知识的增进促使人们建立新的生产与消费方式,提高经济效率。目前,知识经济作为一种崭新的经济形态已在世界出现,知识已成为发展经济的资本,是比原材料、物质资本、劳动力、汇率更重要的经济因素。知识经济的出现,标志着以物质资源的高消耗为基础的传统工业经济的衰落。从本质上来看,知识经济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因为知识作为经济资源不仅是无穷无尽的而且很少存在外部不经济性,并由于其效益递增的特征,将使经济发展长期、稳定、持续地进行。而知识的增进和知识经济的运行发展,必须通过教育、培训等学习手段才能进行,因此学习原则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 三、可持续发展的测度

如何准确、完整地衡量可持续发展也是可持续发展理论的重要内容。只有建立了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才有可能对一个项目、一个地区或一国在某个时期的经济活动是否符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作出大致定量的判断,从而引致经济发展战略及发展目标的确定。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可持续发展测度方面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

(1) 运用现代经济增长模型构造指标。可持续发展理论认为,在传统的 GNP 核算中,并未将由于经济增长而带来的对环境资源的消耗和破坏所造成的影响及其对生态功能、环境状况的损害考虑在内。环境影响通常没有相应的市场表现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经济价值。80 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在许多国家对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的人体健康损失、农业产量减少和质量降低、自然资源的破坏等经济损失进行了估算后发现,不少发展中国家环境损失占 GNP 的 10% 以上。由此得出了考虑自然资源和环境因素在内的国民生产净值 (NNP) 概念。具体公式为:国民生产净值 = 消费 + 在物质资本上的净投资 + 人力资本变化的净价值 + 自然资本存量变化的净价值 - 当前环境退化的损失<sup>①</sup>。

(2) 从财富的角度衡量。世界银行 1995 年提出了以“国家财富”或“国家人均资本”为依据度量可持续发展,认为一国的财富除了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以外,还应包括社会资本,即社会赖以正常运转的制度、组织和文化凝聚力等。只要我们留给后代人的以上四种资本的总和不少于我们这一代人所拥有的资本的总和,或人均资本拥有量不变或增加,那么经济发展就是可持续的。世界银行给出了计算前三种资本的方法。自然资本可根据水、国土、森林和深地层(石油、煤等矿藏)等四种资本进行估算;人力资本以现在的人口能继续生产出目前的国民收入的潜力来估算,但没有对社会资本进行具体的计算。在上述概念框架的基础上,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还进一步将可持续性划分为对人均资本保有程度要求不同的三个层次,即弱可持续性、适中可持续性和强可持续性。弱可持续性只要求资本总量不减少而不考虑资本的结构,这实际上意味着假定各种资本之间存在完全可替代性,如对自然资源利用的收益进行投资,使之转换为物质资本;适中可持续性除了要求资本总量不减少外,还要求资本的构成合理,即各种

<sup>①</sup> Goldin, Ian, Alan L. ed.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5

资本都不能低于既定限度，它肯定了各种资本之间的部分可替代关系；强可持续性不允许各种资本之间的替代，要求各种资本都不能减少，如对于自然资本而言，消耗石油所得到的收益必须全部用于可持续的能源生产。

(3) 综合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由于可持续发展涵盖的范围很广，从经济增长和效率的实现、自然资源的有效配置和永续利用以及环境质量的改善到社会公平与适宜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实现等，因此必须建立综合的反映可持续发展诸内容的指标体系。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开发署（UNSTAT）等机构在 1996 年提出了一个初步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核心指标框架，这个框架是在驱动力、状态、响应概念模型基础上形成的，其中驱动力指标用以表征那些造成发展不可持续的人类的活动和消费模式或经济系统的一些因素，如失业率、人均 GDP、在人均 GDP 中净投资所占的份额、国内人均耗水量、土地利用的变化、森林砍伐强度、温室气体的排放等；状态指标用以表征可持续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各系统的状态，如贫困差距指数、基尼系数、经环境调整的 GDP、地下水储量、土地及森林状况的变化、大气污染的程度等；响应指标则用以表征人类为促进可持续经济发展所采取的对策。我国学者张世秋也提出了类似的指标体系。联合国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UNSCOPE）认为 UNCSD 的指标数目过多影响可操作性和信息的可获得性，提出了一套包含 25 个指标的高度精练的指标体系，其中包括 GNP、储蓄率、收支平衡、国家债务、失业指数、贫困指数、居住指数、人力资本投资、资源净消耗、混合污染、生态系统风险、对人类福利的影响等。

纵观以上可持续经济发展测度的方法，由于存在着资源定价难题、信息不足及诸多技术上的问题，目前的研究仍基本停留在指标或指标体系的建立上，很少应用所建立的指标或指标体系对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进程进行评价。但是，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人们对可持续经济发展理论及实践认识的深化，可持续经济发展的测度将进一步全面和准确。

#### 四、制度安定与人力资本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基本保证

可持续发展涉及到人类社会的多个领域，是生态—经济—社会复合系统的均衡和和谐的进步。其中，经济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处于主导地位，对生态和社会系统的可持续性起着主导性的调节作用，它不仅有必要而且有可能为实现和保持生态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创造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从而促进整个复合系统的发展。没有经济的发展，良好生态环境的维持与改善会遇到极大的困难，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自身的全面发展就是一句空话。而且，人口爆炸、资源短缺和工业酸雨及温室效应等环境污染问题，已经不是经济发展的外在性问题，它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大前提。研究经济发展必须同时研究生态环境的影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其经济发展必将受到严重的阻碍。尤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经济发展是第一需要，“贫困是最大的污染者”<sup>①</sup>，消除穷困是首要目标。因此，结合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因素了解贫困的

<sup>①</sup> 潘家华. 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210

原因、探索相应的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道路，不仅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内容。

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分析理论和新增长理论悄然兴起，引起了现代经济发展理论的重大突破，其代表人物诺斯（North, C.）和卢卡斯（Lucas, R.）分别获得了1993年、1995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理论所提出的制度安排和制度创新思想、人力资本和收益递增的思想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证。

许多发展经济学家吸收并利用了新制度主义的分析方法，认识到若要有效地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必须关注经济发展中的有关制度性因素。有效的经济组织与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起着无可替代的促进作用，而且还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首先，产权的界定是建立有效率的市场的基础。产权明晰较好地解决了“公用地的悲剧”等滥用资源的难题，保证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其次，一定的制度安排能矫正市场扭曲的现象。实行强制制度变迁或非强制制度变迁将减少交易成本，使资源稀缺性得到正确的反映，并且可以规范相应的经济交易行为，提高市场的效率。如政府通过制定环境政策使环境污染得到控制，使环境质量得到改善。第三，制度结构影响了人类选择及其自身的发展。制度结构通过不同的制度安排为人们提供不同的信息和激励，从而制约人们对各种偏好的选择。如不同的伦理观念和经济环境影响着生育观。第四，制度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历史和现实都已表明了这一点。制度创新通过形成效率更高的制度安排，能减少交易成本，减小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激励个人和组织更有效益地进行活动，使资本、技术、劳动等因素得以充分发挥其功能，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实现经济增长。第五，制度还包括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当人们的经验与其思想不相符时他们就会改变其观点。实际上，他们试图去发展一套更适合于其经验的新的理性”<sup>①</sup>。可持续发展思想与理论的形成正是如此，生态环境问题促使人类反思自己的发展方式并通过环境教育等措施试图建立对经济增长、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新的价值观念。

新增长理论则不但较好地解决了保证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问题，而且它所强调的人力资本和收益递增思想还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证。原因在于：

第一，人力资本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罗默（Rome, P.）的模式中，收益递增是解释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它们不仅能自身形成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劳动等其他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是递增的，递增的收益保证着长期的经济增长<sup>②</sup>。卢卡斯在探讨经济增长时，把人力资本作为增长的引擎<sup>③</sup>。他认为人力资本有内在效应及外在效应，前者指人力资本收益对个人或家庭带来的增值，这是舒尔茨（Schultz, T. W.）所强调的；后者表现为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收益递增，特殊的专业化的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产出的真正源泉，人力资本所导致的收益递增规律意味着自然资源、物质资

① 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三联书店,1994.54

② Rome P M.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 - 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94

③ Lucas R E.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9, 22

本、劳动等投入在既定条件下，社会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扩展，或者在既定产出条件下，自然资源、物质资本等投入的减少，这无疑节约了资源，有利于资源的永续利用，有利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保证。

第二，人力资本对收入分配平等有重要影响。舒尔茨、贝克尔（Becker, G.）等人的实证分析都表明了人力资本积累与个人收入之间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sup>①</sup>。而且，人力资本积累将最终导致社会范围的收入分配趋于平等。

第三，人力资本积累能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并在不可再生资源匮乏时促使人们寻找替代品和提供知识技能上的保证。

第四，人力资本还具有配置能力，即针对改变了的环境正确地把握和采取行动重新配置资源以获取更多经济成果的能力。对改变了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作出有效的适应，一方面取决于周围经济环境对配置能力发挥的激励，这是人力资本投资的制度约束；另一方面取决于这种配置能力的增进或培养。大量的研究表明，教育能提高人们应付变化的能力<sup>②</sup>。人力资本的配置能力给可持续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保证和实践的可能性。面对污染、资源耗竭等难题，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提高人们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和能力。

第五，人力资本积累与人口数量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负相关关系。贝克尔认为，不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总量低、收入低、时间价值也低，导致了人们对儿童“质”的需求下降，不愿意进行提高人力资本的投资而愿意增加孩子的数量<sup>③</sup>。实证分析也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微观层次上，人力资本积累与人口数量的矛盾十分明显。因此，解决人口过快增长的问题还必须积累地发展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形式，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

## 第二节 资源利用和环境问题的经济分析

如前所述，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多要素的、全方位的、综合的发展，涉及到人口、自然资源、技术进步、生态环境、制度等要素。其中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环境问题的解决是以往的发展理论较少探讨的。本节将主要对此进行分析。

### 一、自然资源利用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自然资源指一切能为人类提供生存、发展、享受的自然物质与自然条件，如土地资

① 舒尔茨. 论人力资本投资. 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 1990

贝克尔. 人力资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② 林毅夫. 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 三联书店, 1994. 221 ~ 241

③ Becker G, Murphy K, Tamura R. Human Capital, 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等。它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人类的经济活动就是生产和消费资源的过程，但资源又是有限的，这就构成了资源与经济发展间的矛盾冲突。可持续发展提出要反思人类过去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改善人类利用资源的效率，关注资源的代际分配和利用，指明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新道路。

首先，自然资源的永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物质基础和基本条件，可持续发展的本质是人类社会自身的永续生存和发展，资源利用不能只顾及到当代人的利益，还必须关注后代人发展的需要，自然资源支持着自身及人类的持续发展，其承载力预示着人类和种群数量的规模，也制约着人类经济社会结构的规模，没有自然资源系统的持续发展，人类的持续发展将是一句空话。

其次，资源的利用与经济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不能盲目地坚持限制或停止资源的利用。经济发展一方面保证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另一方面也不断积累了资金和技术实力，提高了人类抵御自然灾害和保护、改造大自然的能力，不发展经济就不能消除穷困和落后，就会因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资金财力和技术条件而无法更好地保护资源。

第三，如何实现资源的持续利用是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资源的持续利用是指在不断努力获得更多资源的同时，在人类社会有意义的时间和空间尺度上，就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的总体水平而言，人类社会利用自然资源的选择空间不被缩小。这就要求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①科学开发、合理利用和节约的原则。为此要改变目前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高效利用资源。②不超过生态供给阈值利用原则，生态供给阈值是维持生态功能持续性的最低存量水平，它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和投资增加而扩大，因此要增进技术的开发和使自然资本的出售收入用于教育或改善环境。③开发产品原则，即使不可再生资源的耗竭速率不超过寻求作为替代用品资源的速率。④福利原则，即使自然资源的总存量基本保持不变，以保证下一代的自然资源的经济水平不至降低。如果一种资源减少，必须进行经济补偿，这是帕累托准则在资源经济中的应用。

## 二、自然资源利用的经济分析

对自然资源的经济分析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从动态过程考虑如何保证资源的最佳利用；二是制度特别是产权结构对资源沿时间配置的影响，如“公用地的悲剧”的产生及解决等。

### （一）资源的最佳利用

自然资源的经济分析主要源于福利经济学的效率配置论。美国数理经济学家霍特林（Hotelling, R.）于1931年发表了“可枯竭资源经济学”一文，开始了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经济理论分析<sup>①</sup>。70年代后资源经济学飞速发展，主要探讨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资源的相互作用及影响、自然资源价格理论及应用等。

自然资源可分为可再生资源 and 不可再生资源或可枯竭资源两种。

<sup>①</sup> Hotelling R. The Economics of Exhaustible Resourc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31. 39: 137~175

可耗竭资源的利用开发，可以设想一个初始量给定的，只能流出不能流进的水池，问题是怎样放水才能使总的利润最大化<sup>①</sup>。由于资源的总量固定，当前的开采量会影响未来的可能开采量，资源的开采成本不仅取决于当前的开采所使用的要素投入量（劳动、能源等）及其价格，还取决于过去开采所使用的要素投入量、当前开采对未来资源开采收益的影响等因素。如果把资源的市场价格和开采成本之差称为租，那么资源占有者——地主的目标就是给定时间偏好和对矿藏的需求函数，使各时期租的总和最大。这可以表达为一个简单的模型，约束条件为：①资源存量随开采过程而减少；②资源初始存量给定；③开采成本随资源存量的减少而上升；④资源价格不能超过由替代品价格决定的一个价格上限。在资源被地主垄断的情况下，上述模型可以数学式表达成：

$$\begin{aligned}
 & \text{目标: } \max \int_0^T [P(y(t), x(t)) - C(x(t))] y(t) e^{-rt} dt \\
 & \quad \{T, y(t)\} \\
 & \text{约束条件: } \dot{x} = -y(t) \\
 & \quad x(0) = x_0 \\
 & \quad dc(x) / dx < 0 \\
 & \quad P(y(t), x(t)) \leq \bar{P}, \forall t \in [0, T] \quad (1)
 \end{aligned}$$

式中， $x(t)$ 、 $y(t)$  为  $t$  时刻资源存量和开采量， $P$ 、 $C$  分别为价格和单位成本， $\bar{P}$  为替代品价格，两个控制变量为：中止开采时间  $T$  和时间  $0$  到  $T$  之间的开采量  $y(t)$ 。这个模型的解可应用现代优化过程理论中的庞特里亚金极大值原理来获得，其他的理论模型虽然在复杂程度和目的方面与此模型有所不同，但总的思路与结果是一致的。模型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表明，利率在资源使用量上有决定作用，其消耗的最优路线要遵循以下定律：开采资源的价格的增长率等于贴现率。当存在替代性资源时，还需要考察两种以上互相替代的消耗过程。其中一个著名的结果是所谓“优先开采成本较低资源”准则<sup>②</sup>。

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则可设想为水池不仅有流出而且还有流进，但是，由于可再生资源（森林、海洋、土地等）的产权往往是社会占有，许多国家的政府都直接干预可再生资源的使用与开发，因此，模型的优化目标一般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时间偏好或贴现率需变成社会贴现率，同时，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通常假定无终止时间的限制，由社会效用函数导出社会需求曲线，用社会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围成的面积（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表示社会利益。而且可再生资源有一个由自然生成条件决定的自然增长率，这样的数学模型为：

$$\begin{aligned}
 & \text{目标: } \max_{y(t)} \int_0^{\infty} \left[ \int_0^{y(t)} P(q) dq - C(x(t)) y(t) \right] e^{(-r)t} dt \\
 & \text{约束条件为: } \dot{x}(t) = g(x(t)) - y(t)
 \end{aligned}$$

① 汪丁丁. 资源经济学若干前沿课题. 见: 汤敏, 茅于軾主编. 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 第二集. 商务印书馆, 1996. 66

② Dasgupta P S, Heal G M. *Economic Theory and Exhaustible Resour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begin{aligned}
 x(0) &= x_0 \\
 dc'(x)/dx &\leq 0 \\
 P(y(t)) &\leq \bar{P}
 \end{aligned}
 \tag{2}$$

式中,  $r$  为社会贴现率,  $P(y)$  是社会需求曲线,  $\int_0^{y(t)} P(q) dq$  是需求曲线到  $y(t)$  为止下方的面积, 它与总成本  $C(x(t))y(t)$  之差为  $t$  时刻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  $g(x)$  为资源存量的净增长速度, 对此模型的完整解目前还没有找到, 但较

一般的稳定解为:  $dg(x^*)/dx - \frac{y^* \frac{dc(x^*)}{dx}}{P - C(x^*)} = r, y^* = g(x^*)$

这表明最优开采量和总存量应停留在一个由自然增长率决定的固定水平上。许多经济学家指出, 在可耗竭资源与可再生资源的理论之间没有实质的差别, 可再生资源也是可能耗尽的, 大致上说, 如果一种资源的最优消耗使得该资源的市场价格在达到稳态时仍然小于替代品的价格  $\bar{P}$ , 则该资源在该种最优开采计划及由市场结构决定的定价机制之下是“可再生资源”。这里, 资源的可再生性不仅依赖于资源的技术特性, 还取决于产权制度与所考虑的定价机制等因素。如果在达到稳态之前, 资源价格已上升到替代品的价格, 该资源在该开采计划中则是“可替代资源”(replaceable resource)。可替代资源的一个特例为可耗竭资源(达到稳定时的资源开采量为 0)。

## (二) “公用地的悲剧”及其解决

1968 年, 哈丁(Hardin, G.) 发表了题为《公用地的悲剧》的著名论文<sup>①</sup>。他在文中描述了这样一种情形: 有一个对所有人开放的公共牧场, 每一个理性的放牧者都想在公共牧场放养尽可能多的牲畜, 因为他可以大大增加他的牲畜获得直接利益, 而过度放牧所造成的后果是由全体放牧者承担的。所以, 放牧者所采取的惟一明智的行动是增加更多的牲畜, 然而, 如果每个放牧者都那么做时, 牧场由于过度的放牧而造成退化的悲剧就会发生。哈丁把这种理论扩展到对人口增长、环境污染等问题的解释上。目前, “公用地的悲剧”已被广泛地应用于描述污染问题、资源管理、国际合作等问题的分析, 在面对全球性的“公用地”开发问题上, 前面提到的放牧人可以是一个企业、跨国公司或国家, 局部的利己行为和短期利益, 有可能导致全球性的生态灾难, 以至于削弱人类长期的持续发展能力。

“公用地的悲剧”及解决方法可以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理论来解释。“公用地的悲剧”实际上是外部性问题, 是由于“公用地”的公共物品性质、资源的稀缺性和对他人行为预测的不确定性引起的。避免“公用地的悲剧”的方法就是明晰产权。科斯、张五常等人从外部性问题探讨产权的起源。科斯强调外部性问题的相互性质, 认为产权明晰能避免较严重的负外部性<sup>②</sup>。在他们看来, 产权形成史实质上是一个外在性内在化的过程。新的产权的形成是相互作用的人们对新的收益—成本的可能预期进行调整的回应,

① 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968, 162

② 科斯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 1994

产权形成的内在机制在于：当内在化的所得高于内在化的成本时，产权的形成（或发展）是为了使外部性内在化。诺思（North, D.C.）则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探讨产权形式与发展。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产权及制度的演变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是建立排他性的产权制度，“解决史前人类所面临的公有财产的两难困境的方法就是建立排他性的公有产权……首先是不准外来者享有资源，然后是制定规则限制内部人员开发资源的程度”<sup>①</sup>。这是人类经济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第二是建立可转让性的产权制度。产权的交易、转让与社会分工、市场经济制度的发展联系在一起。近代英国与荷兰的崛起就是由于明确了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而法国和西班牙则因王权的强大窒息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产权的确立而日渐衰落。第三是与各种组织形式创新联系在一起。如股份公司制度的建立使产权的分割、转让、交易等更加容易，从而使产权制度效率不断提高。

### 三、环境问题的经济原因

环境是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的、自然的或人类作用下形成的物质和能量及相互作用的总和，主要包括生态系统以及人们对其作用产生的各种依存关系。环境一方面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空间条件，另一方面又承受着人类活动产生的废弃物质和各种作用的结果。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用手工劳动进行生产、人口和社会生产力都处于一种非常缓慢的增长状态，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环境的需求和作用相对狭小，因此环境与发展基本是和谐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经济活动的需求以及对环境作用的程度和强度日益扩大。人们在处理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时，又往往片面强调发展而忽视生态环境问题，使发展与环境的互馈关系趋于恶化，环境问题已成为目前威胁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严重问题。这些环境问题主要有“三废”物质污染、噪音污染、水资源枯竭、土地沙漠化、温室效应、核污染、大气臭氧层破坏、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的生态灾难、生物多样性的丧失等。1972年联合国的“人类环境会议”标志着人类环境意识的觉醒，并开始以实际行动致力于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思想及理论的形成显示，环境问题与经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保护和改善环境。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环境恶化和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并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基于某些社会的经济的原因，产生于经济过程中的决策机制以及经济过程中的各种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运作使环境和自然资源不能得到有效配置。市场和政府干预是资源配置的两大手段，而正是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构成了导致环境退化和资源耗竭的主要原因。

#### （一）市场失灵

“在一个国家中，正确运行（有效率）的市场是促进资源有效利用、减少环境退化和刺激可持续发展最有效的机制”<sup>②</sup>。但是，市场价格机制也不是万能的，不可能调节

<sup>①</sup> 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上海三联书店, 1991. 95

<sup>②</sup> 吉里斯, 波金斯等. 发展经济学.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149

人们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领域。市场价格机制在某些领域不能起作用或不能有效作用的情况下，市场就不能保证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不能提供符合社会效率条件的商品和服务，这时市场就会出现失灵现象。在环境问题上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

(1) 环境资源产权不安全、不存在或难以界定。市场机制正常作用的基本条件是明确定义的、专一的、可转移的和可实行的涵盖所有资源、产品和服务的产权。产权不明晰，所有权不确定或不安全，就会打击人们对资源投资、保存和管理的积极性。例如农村土地、森林的产权如果不明确，就可能引起农民的短期行为，过度使用资源，从而影响环境。环境资源往往是公共物品，或者具有一定的公共性，如清洁的空气、环境质量、物种多样性等。由于其不可分性也导致产权难以界定或界定成本很高，容易发生“公有地的悲剧”。

(2) 无市场和市场竞争不足。这一点在发展中国家表现得更为明显。很多环境资源的市场还没有发育起来或根本不存在，这些资源的价格为零，因而可能被过度使用，日益稀缺，如我国一些地区的地下水和灌溉用水是无价的，因而被大量浪费。即使存在市场，市场失灵还可以表现为市场竞争不足。由于垄断、各种进入障碍、市场规模狭小等原因，市场上竞争者太少，就可能导致环境保护动力不足。

(3) 外部效应。外部效应是企业或个人的行为对活动以外的影响，它造成了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不一致，导致实际价格不同于最优价格，环境污染具有很强的负外部效应，使得安全竞争厂商按利润最大化原则确定的产量与按社会福利最大化原则确定的产量严重偏离。造成资源的过度利用与污染物的过度排放。环境保护则有正外部效应，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使环境保护这种公共产品的生产严重不足。消除外部效应的影响需要采用不同的战略或手段使外部成本内在化。

(4) 环境信息的稀缺性与不对称性。由于人们对生态系统的了解很少，环境信息是十分稀缺的，而且，由于信息的公共性和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又容易导致信息的不对称，使得市场机制在环境问题上往往不能有效配置资源，很难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 (二) 环境问题的政府失灵

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上的失灵为政府干预提供了机会和理由。然而，由于信息不足与扭曲、政策实施的时滞、公共决策的局限性以及寻租活动等原因，政府干预往往不能改正市场失灵，反而会把市场进一步扭曲，最终造成实际价格偏离社会最优价格，这时就会发生政府失灵。政府失灵可以分为四种类型：①扭曲正常工作的市场机制；②针对特定目标的政府干预是成功的，但对其他目标产生外部效应；③政府干预的结果比市场失灵的结果更坏；④当市场失灵需要政府干预时，政府却没有干预。具体在环境问题上政府失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1) 环境政策失灵。环境政策失灵是指那些扭曲了环境资源使用或配置的私人成本，使得这些成本对个人而言是合理的，但对社会而言却是不合理的，甚至会损害社会财产的规章制度、财政、汇率、金融、价格、收入和其他政策等。它集中表现为现行部门政策和宏观经济政策在制定过程中由于没有给予生态和环境以足够重视而导致的价格扭曲。如对伐木和开发牧场实行补贴加重了由市场缺陷引起的环境破坏，使巴西亚马逊

河流域热带雨林大面积减少，导致许多生物物种遭受毁灭性的威胁，以及生态系统平衡功能的破坏<sup>①</sup>。

(2) 环境管理失灵。环境管理失灵是指在各级政府组织中存在着一系列管理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有关政策无法有效实施。环境管理失灵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各种政策在部门之间的协调不足，缺乏足够强的手段和强制措施以达到政策目标，缺乏确保在经济运作过程中实施有关政策的手段或力量等。另一方面是环境管理中的寻租行为。环境问题加剧，政府就会加强环境管理，政府的介入会导致环境污染者、受污染者和环境保护当局之间的博弈。污染者为了维护有污染时的既得利益，会进行寻租行为，从而面导致环境管理的失灵。

## 四、解决环境问题的思路

在世界各国控制污染、解决环境问题的实践操作上主要存在两种思路：环境管制、经济激励手段或环境经济手段。

### (一) 环境管制

环境管制是政府设定环境质量指标通过立法、规定等非市场途径对环境资源利用的直接干预。它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明令禁止某些污染经营活动或资源利用与排污；要求某些污染生产工艺必须淘汰；规定只有非市场转让性的许可证持有者才可以生产或排污。实行环境管制的理论基础是基于市场的失灵。尼斯 (Kneese, A.V.) 等人认为市场具有非对称性。对于基础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市场运作具有效率，能产生足够的激励，而对于污染废弃物的处置，市场动作则失灵，几乎完全不具效率<sup>②</sup>。

环境管制最大的特点是能迅速地控制污染。企业必须依从政府的环境标准，从而改变生产技术、调整生产投入组合或直接投资于污染控制。一些经济学家声称环境管制会降低一个国家的生产率，如丹尼斯 (Denison, D.) 对美国私人部门 1972 年 ~ 1975 年间的研究发现，环境管制导致生产率的增长下降 16%，但是，雷彼托 (Repetto, R.)、罗什曼 (Rothman, D) 等人构建了一个模型来量度环境管制通过降低环境污染造成的成本对生产率的影响。由于环境污染将会强行增加实际经济成本，如电力工业中产生硫的工厂烟囱所排放的硫，比可出售的作为工业原材料的原硫每吨对经济产生更高的成本，他们发现，环境管制实际上能提高生产率<sup>③</sup>。

排污标准是目前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污染管制方法，它是由管制部门制定并依法强制实施的每一污染源特定污染物排放的最高限度，如日化工厂每日污水排放量。排污标准往往基于一定的健康指标设定，并与惩罚联系。超过标准者将受到惩罚。

然而，包括排污标准在内的环境管制手段在通常情况下难以得到效率配置：第一，只有满足排污标准为最优排污量、超过标准的罚款等于最优排污量对应的罚款、罚款的

① 世界银行，1992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② Kneese A.V. Economics and the Environment Penguin Books, Harmondsworth, 1977. 29

③ 罗伯特，雷彼托等。环境保护真的会抑制生产率的增长吗。经济译文，1997 (4)

实施是完全确定的这三个条件，排污标准才能达到最优水平。否则，管制会造成企业和社会的效率损失。第二，由于各污染者的污染控制成本不同，而管制是一刀切的（界定每个污染者的污染控制成本从而确定不同的标准，交易费用和管理费用太大而无法实施），导致污染控制得不到最优分配。另外，由于信息不足与扭曲以及寻租活动的危害等问题，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管理失灵的情况从而影响环境问题的解决。

## （二）环境经济手段

环境经济手段可定义为，从影响成本—效益入手，引导经济当事人进行选择，以便最终有利于环境的一种手段。这种手段明显的表现是，要么在污染者和公众之间出现财政支付转移，如各种税收和收费、财政补贴、服务使用收费和产品税等；要么产生一个新的实际市场，如许可证交易。环境经济手段能使经济主体以他们认为最有利的方式对某种刺激作出自由反应，它是向污染者自发的和非强制的行为提供经济刺激的手段<sup>①</sup>。相比环境管制手段，它更容易达到资源和环境污染的效率配置。

环境经济手段可以大体上分为两大类，一类侧重于政府干预来解决环境问题，可称之为庇古手段，另一类则侧重通过市场机制本身来解决环境问题，可称之为产权管理。

庇古手段，源于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所表达的政策措施。庇古建议，应当根据污染的负外部性所造成的危害对排污者征税，用税收来弥补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之间的差距。同样地，对产生正外部性的单位应进行补贴。庇古手段主要是利用税收手段、财政手段、收费制度和责任制度进行的，包括排污收费、使用者收费、产品收费、财政补贴、利率优惠、押金—退款制度等。

庇古手段，可以刺激那些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为政府创造一个保护环境和资源的资金来源渠道，较多地消除了外部效应的影响，但是也有政府管理成本较高，不能完全使外部成本内在化等缺点。

产权管理主要包括产权途径和排污权交易。产权途径的主要特征是将产权同外部性联系起来，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认为可能在不需要政府干预的情况下，通过产权明晰和协调各方的利益或讨价还价过程而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科斯 1960 年提出，当存在外部性时，只要交易成本为零，而且产权是明确的，那么不论谁拥有产权，通过市场都可以使资源得到同样有效的配置。我们可用一个例子来说明，首先假定污染者有权排污，那么他就会加大排污量，使受害者的经济损失越来越严重，这样，受害者为减少损失就会与污染者谈判，要求污染者减少排污量并愿意补偿因排污量减少而遭受的损失。补偿金的款额至少相当于污染者因减少排污量而减少的边际纯收益（否则污染者将因得不偿失而拒绝减少排放），至少相当于受害者因相应的排污量而支付的边际损失（否则受害者也将因得不偿失而不愿意忍受排污带来的损失），这样就达到了一个均衡点，即污染给受害者造成的边际损失等于污染者的边际收益。反之，假定污染者能否排污决定于受害者，那么通过谈判，仍会达到同一均衡点。这样外部成本就通过产权协商而内部化了，双方都达到了帕累托最优状态。

<sup>①</sup> 沈满红. 论环境经济手段. 经济研究, 1997 (10)

产权途径在实践上同样存在许多问题,使其优化机理难以运行。第一,产权难以界定。产权明确是进行交易和形成市场的必要前提,而许多环境与生态资源如臭氧层、公海利用属于公共财产,根本不可能做到明确产权,即使名义上明确了产权,实际上仍无法消除外部性。第二,交易成本过高。如上面的例子中,如果受害者数以千计,且受害程度不一,即使明确产权关系,也可能使污染者与受害者之间的交易成本很高,以至于对全社会福利没有好处而无法实施产权的优化管理。第三,环境信息的不对称和讨价还价过程中的非合作博弈,也可能导致产权途径达不到帕累托最优。

相比之下,排污权交易更易于实行,实际上也已被许多国家所采用。排污权交易,是指政府制定总排污量上限,按此上限发放许可证,排污许可证可以在市场上买卖。

60年代末,戴尔斯(Dales, J. H.)首先提出了将满足环境标准的允许污染物排放量作为许可份额,准予排污者之间的相互有偿交易<sup>①</sup>。随后涌现了大量的有关理论与应用的研究。但这一体系为政府环境决策机构所采纳,则始于80年代。1986年,美国环境保护局正式颁布了排污许可贸易政策;随后在有些地区对污水和废气的排放实施了许可贸易制度。近年来,欧美的许多学者又在探讨建立国家排污许可贸易体系,以控制温室效应和臭氧层的破坏。中国环境保护局也于1988年制定了排污许可登记制度,但尚未涉及许可贸易问题<sup>②</sup>。

排污权交易,首先要明确排污许可额,然后才是这些许可额的市场交易。在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一定的自然环境特点可以有一定的污染物稀释净化能力。污染物对人们身体健康的影响及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一般也有一定的阈值浓度。根据自然净化能力和阈值浓度,环境保护当局便可计算出该国或该地区可能允许的污染物排放总量。政府在制定排污许可总额后,将其分解,分配给各个排污单位;政府在进行许可额初始分配后,便允许各个排污单位进行许可额的自由贸易。每个单位可以将所分配的许可额留着自用,也可以在市场上卖掉;如果排放污染的公司买许可额比自己控制合算,它也可能去买而不是自己减少排污。排污权交易有很多优点:第一,成本最小,厂商在排污许可市场贸易的情况下,自己所应采取的污染控制的优化战略是,污染控制的边际成本与单位排污许可额的市场价格相等。此时,全社会的污染控制总成本达到最低。第二,政府可以根据污染的状况通过发放或购买排污权来控制排污权价格,以反映政府对环境的意愿。第三,节约了管理成本。第四,它避免了过多的政府干预且简单易行。

尽管排污权交易有许多优点,但它并不能完全替代庇古手段或产权途径。因为它同样有不利之处:由于排污许可总量的确定不是基于污染的边际收益或边际损失,很可能不是最优污染排放量。政府或环境保护当局在受到环境压力集团或其他利益团体的压力时,决策中所确定的许可总量可能既不反映环境质量保障,又背离优化排放水平。可交易的污染权可能只适用于防污染物,而不适用所有对环境有关的污染物。而且,许可额的市场贸易,还有一个交易成本问题。这一体系的实际应用,也有一些操作性问题需要

① Dales. Land, water and ownership.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 1: 791 ~ 804

② 潘家华. 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137

进一步分析。

### (三) 环境经济手段的选择

表 14.1 一些国家采用的环境经济手段

国家	排污费	使用者收费	产品收费	行政收费 (执照等)	税收区别	补贴	预付金 返还	排污权 交易	市场 干预
澳大利亚	×	×		×					
比利时	×	×		×					
加拿大		×				×	×		
丹麦		×			×	×	×		
芬兰		×	×	×		×	×		×
法国	×	×	×	×		×			
联邦德国	×	×	×	×	×	×			
意大利	×	×	×	×					
日本	×	×							
荷兰	×	×		×	×	×	×		×
挪威		×		×	×	×	×		
瑞典		×	×	×	×	×	×		
瑞士	×	×			×				
英国	×	×		×	×				
美国	×	×	×			×		×	

资料来源: Opschoor J B, Vos J. Economic Instrument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ECD, 1989

目前世界各国都已经开发应用多种环境经济手段, 如表 14.1 所示。如前所述, 各种经济手段都有其各自不同的优势点, 因此, 如何选择这些手段, 通过开发和实施能够达到政策目标的手段, 便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我们认为可以用以下三种思路进行环境经济手段的选择。

第一, 在现有的经济手段中选择一种最佳手段。按照这一种思路, 就应该在既定的环境目标下, 努力寻求执行成本的最小化。在这一基本前提下, 还要考虑每个国家的体制背景和文化传统。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 一般来说只能选择管制手段。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才有经济手段的用武之地。同样在市场经济国家中, 有的市场化程度高, 各种手段都可以采用; 有的市场化程度还比较低, 主要还只能采用庇古方法。同样的手段在同一国家对不同的治污目标的适用范围也是不同的, 如水污染收费就比大气污染收费的适用性要大。

第二,在现有的经济手段中进行优化组合,包括与环境管制手段配合使用。罗伯茨(Roberts, P.)和斯藩基(Spence, B.)就设计了有关排污权交易、排污费和补贴的混合控制系统<sup>①</sup>。实际上,经济手段单独应用的例子极少,多数情况下,具体的经济手段总是与其他手段或不同经济手段之间组合应用的。这主要表现为三种情况:①经济手段与管制手段的组合使用。从定义上看,一些经济手段本身就是这类组合中的一个部分,如排污许可证交易本身就是建立在管制手段的基础上,根据环境标准,确定排污总量,排污总量转换为排污许可证分配或拍卖给各企业。排污收费也常常与管制手段相结合,要么用于加强这种管制,要么用于取得必要的资金。②经济手段可优先于现有管制手段的调整或新管制规则的制定。制定或调整重大的管制措施需要时间,尤其是涉及到国际机构时更为如此。带有财政色彩的经济手段往往可以在执行之前,这样就可促进有关管制的有效执行。③两种不同的经济手段的组合。这往往是一种更有效的组合。例如税收差异手段其实是对传统产品征税而对清洁产品实行补贴的一种手段。

第三,进行环境经济手段的制度创新以寻求最佳方案。这种思路有两种含义:一是为经济手段的应用创立新的制度环境,二是设计一种新的经济手段。如建立环境权益代理公司<sup>②</sup>,公司受当事人委托,代为办理环境权益诉讼所需的一切手续,依法进行辩护,既要求对方停止环境权益侵害,又索取因侵权而造成的赔偿费;建立“控污银行”<sup>③</sup>，“控污银行”是专门发行、经营排污指标,充当排污权交易中介调节者的经济组织,因而排污指标的流转是其一切经济活动的主体和基础。上述两种制度创新的共同特点是,可促使政府职能转变,提高环保部门的工作效率;中介机构又可以利用信息优势,更好地完成环境保护的历史使命。

### 第三节 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路

可持续发展是80年代以来人类认真总结自己的历史进程、重新审视自己的经济社会活动与发展行为而提出的一种新的发展思想和战略。它不仅是发达国家的正确选择,而且更是发展中国家生存与发展的自然需要与必要选择。目前发达国家由于环境意识、技术、资金投入、法规制度等方面的有利条件已使其曾十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开始得到基本控制,而发展中国家则因缺乏足够的认识、技术水平低、资金匮乏等使得人口、资源与环境等问题愈加严重,因此,可持续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有更加重要的意义。本节将分析阻碍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因素,探讨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并提出建立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① Baumol W J, Oates W R.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② 夏光. 论环境权益的市场化代理制度. *中国工业经济研究*, 1993 (8)

③ 彭璧玉. 控污银行: 环境经济市场的组织创新. *生态经济*, 1994 (3)



## 一、影响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因素

不发达既是发展中国家的特征，又是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障碍。较早正式提出不发达造成的环境问题并较全面研究的巴尼（Barney, G. O.）认为，不发达情形下的人口增长经常是世界上增长速度最快的，如果不加以控制，很快就会超过他们所依存的局部环境的承受能力，使环境恶化，侵蚀和降低以前享有的生活质量<sup>①</sup>。在斯德哥尔摩大会及布伦特兰报告中，贫困都被看做是环境恶化及其他灾难的根源。发展水平越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难度越大，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总体来看，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困难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 （一）生产力水平的相对低下

在发展中国家，通常传统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较大比重，人口主体的生计依靠简单劳动、传统技术和小片土地的结合，工业生产主要是资源利用型或劳动密集型生产，技术和资本极度缺乏，人口增长较快。因人口增长而扩张的需求压力迫使人们以传统方式利用自然资源，于是过度放牧、毁林、水土流失、工业污染等生态退化现象和环境污染问题随之而来，从而导致生态危机，这种危机的性质与发达国家的环境危机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环境问题是人口增长、贫困和生态退化问题的恶性循环，惯性极大，治理极难；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又意味着严重缺乏治理所需的资金和技术，使治理极可能成为空谈。

可持续发展着眼于未来的发展，要求实现当前与未来之间的资源优化配置。对于贫困人口来说，这种要求往往成为奢望。贫困的人们知道，一旦树木消失、土地减少，他们及后代的粮食、燃料、工业原料等也会减少，但他们为了现实的生存而不能顾及未来。即使已经摆脱贫困的发展中国家，人们追求较高物质消耗的强烈愿望以及较快的人口增长规模，对可持续发展也会产生负作用。

### （二）人口数量与人口质量的矛盾

发展中国家由于传统观念以及养育孩子的成本低廉等原因，人口往往过快增长。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数量与质量的矛盾，使教育条件低劣、辍学率高。人力资本积累过低，不但阻碍了经济的增长，而且不利于公共意识、环境意识的形成。

### （三）环境保护资金投入的不足

环境治理、防止环境破坏以及发展环境产业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本。发达国家的环境投资通常占到 GNP 的 1.5% 以上，而发展中国家则几乎没有环境投资或者投资很少。如果发展中国家挪出极为稀缺的国内资金存量投入到环境保护中，就会放慢经济增长的速度，由此可能引发失业、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等问题。利用资金增量的途径可能有两条，但每一条似乎都障碍重重：一是发挥资源优势以输出能源和原材料换取资金，但这样可能加剧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资源消耗速度从而加剧环境恶化问题；二是举债和大规模吸引外资，但事实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已为债务问题所困，吸引的外资也是大部分从事从发达国家转移出的高污染、高能耗工业。

<sup>①</sup> 巴尼. 公元 2000 年环境. 科学出版社, 1986

#### (四) 缺乏适宜技术

发达国家拥有的科技实力使它们在面临问题时在技术上有较为广阔的选择回旋余地,如1973年的石油危机就使发达国家很快涌现了大量节能的工艺和产品;污染问题严重时又很快出现了清洁生产技术和迅猛发展的环境产业。而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资源极为贫乏,“研究与开发”(R&D)的能力不足,不具有面对危机的技术应变能力。

#### (五) 市场发育程度不足

只有在较完善的市场机制中,价格才会较真实地反映供求关系的变化,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效率利用,并导致替代资源的出现。但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市场发育是不充分的,价格的扭曲阻碍着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流动,造成资源的浪费和滥用以及环境保护的动力或激励不足。

#### (六) 制度安排的不足

发展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常常是不完整或落后的,各种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盛行。在环境的治理方面,据米克塞尔(Mikesell, R. F.)介绍,许多非洲国家如加纳完全没有与环境有关的法律、机构和监督机制;像土耳其这样情况较好的发展中国家,虽然“谁污染、谁治理”早已形成法律,但无人实施、无人管理;或者如巴基斯坦那样,有法律也有执行机构,但无法有效运转<sup>①</sup>。

## 二、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坚持经济发展优先的原则是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从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生命线。发展中国家如果不能发展,仍停留在穷困和不发达状态,其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就不能消除,贫困条件下人口与生态退化之间的恶性循环就不能制止。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够积累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才能够提高环境治理和环境保护的能力。“环境不可能在贫困的条件下得到改善,发展本身应当是对此的部分答案”<sup>②</sup>。再者,如果发展中国家不强调发展,不尽快摆脱贫困,世界经济将永远是贫富悬殊的二元经济格局,由此可能阻碍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有效解决。

在坚持发展优先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还必须遵循效益原则,即经济发展是效益型的而不是速度型的。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提高发展的经济效益。经济效益低,则资源利用的效率低,浪费了资源。反之经济效益愈高,则资源利用的效率高,节约了资源。其次必须提高发展的社会效益。发展所获得的利益必须得到较为平等的收入分配,使公众的生活质量得到相应的提高,使教育、科技、文化和其他方面得到相应的改善,以消除技术资源薄弱、法制滞后、公众观念和生活方式上的传统性等各种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最后必须提高发展的环境效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具有相互推动及相互制约的关系,根据现实的条件,发展中国家目前环境保护追求的目标主要应是尽可能合理利用好本国的自然资源基础,尽可能减少发展过程中的环境损失,避免难

<sup>①</sup> Mikesell R 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Mansell Publishing, Ltd. 1992

<sup>②</sup> 拉尔夫·我们的家园——地球.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3. 184

以逆转的环境恶化。美国西奥尔多·罗斯福时期的口号“明智的利用就是保护”对今日之发展中国家颇为适用。以适度的环境损失换取高效的经济增长，意味着以较小的环境损失换取较高的环境治理能力<sup>①</sup>。实际上，经济、社会及环境效益是统一的、相互促进的。只有三者的完美结合，才有可能打破穷困与环境恶化间的恶性循环，并随着发展进程的不断加快，逐步增强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形成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良性循环。

分析工业社会发展的历史，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环境破坏之间存在着倒 U 形关系，或者称之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环境破坏随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发达国家如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经历以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韩国、新加坡、台湾等的发展都符合这样一种倒 U 形关系。一些学者还建立了数学模型来验证这种关系<sup>②</sup>，然而，在概念上接受这一关系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恶化只是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一个暂时的现象，可以听之任之。这是因为：首先，如果发展初期环境退化超过一定的生态阈值就可能成为不可逆的。许多重要资源如森林、渔产、土壤等都存在生态阈值，一旦它们在经济发展的起飞阶段就严重枯竭或退化，那么就可能不会形成一个完整的倒 U 形态或者将需要很长的时间和很高的成本才能使之恢复。其次，某些形式的环境恶化，如含毒成分污染物的大量排放使水、空气质量下降，会损害人们的健康，影响人们的生产能力；而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土地生产力下降等则不可避免地影响生产，从而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第三，发达国家可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型企业以转嫁污染，这样可能使发展中国家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越过曲线中的环境恶化上升阶段。第四，及早防治和治理某种形式的环境退化可能比将来再治理更节省费用。因此，发展中国家必须采取适当的政策措施，把经济发展同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经济发展中保护环境，在环境保护中促进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要将环境治理纳入到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尽量减轻经济发展对环境的破坏作用，有效地防止经济发展中对环境的不可逆破坏，并通过促进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以及资源定价等推动经济发展，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峰值降低，环境恶化上升阶段平缓且缩短。

应当指出，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还有赖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和发达国家的帮助。第一，要制止和扭转贸易保护主义，促进世界贸易进一步自由化，逐步改变以少数国家垄断力量为基础的国际生产、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体系，使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第二，大力实施新的国际债务战略，减轻发展中国家的债务负担。“环境抵债”是一项值得考虑的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发达国家取消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同时与债务国签订强制性协议来保护债务国中环境易受破坏的地区。第三，既然发达国家要对其造成的环境问题负责，那么他们就应承担环境的治理费用。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大会规定工业发达国家每年应拿出占 GNP 0.7% 的资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治理环境，但真正

① 周毅，跨世纪的战略：人口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师，1996（10），（11）

② 潘家华，持续发展途径的经济学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落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需要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关注和发达国家的进一步努力。此外,由于南北经济的互补性和全球国家的伙伴关系,发达国家还需在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环境意识的培养、教育、培训、信息获得与处理等方面提供援助。第四,开发和分享有利于环境的适当技术。“有利于环境的适当新技术的推广仍可能是成功地拯救环境的关键”<sup>①</sup>。发展中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现有的环境保护知识、研究成果和技术,借鉴国外的环境管理经验,是实现产业进步,发挥“后发优势”从而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关键。因此发达国家应尽可能多地和尽可能优惠地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和知识,特别是关于农业、林业、能源、废物削减和循环利用的适用技术。

### 三、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国情各异,因此它们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具体模式不是惟一的。但是,总的看来,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途径有如下几个方面:

#### (一)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促进人力资本积累

人力资源是以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源,是积累和创造物质资本、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最活跃最积极的主动性的生产力要素,是推动和促进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其中人力资源的质量即人力资本是实现经济发展、增加环境意识、促进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关键所在。因此,大力开发人力资源、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就成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首要选择。为此,要做到:第一,控制人口的增长,实现适度人口目标。如前所述,人口数量与质量之间存在着矛盾,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因此发展中国家应采取多种措施控制人口的增长,尽快实现适度人口目标。这些措施包括实施计划生育并建立一整套计划生育奖惩制度、提高结婚年龄并使避孕方法更方便、扩大妇女受教育和就业机会、改善公共医疗卫生条件和儿童营养状况、建立和完善老年保险制度、破除片面鼓励生育的传统观念等。第二,努力增加就业机会,减轻人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状况。发展中国家应建立完善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力的合理流动;积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广拓就业途径;全面发展农村经济、支持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第三,最重要的是增加人力资本投资,提高人力资本投资的效益。发展中国家首先完全有必要大幅度提高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强度。其次要调整教育结构,提高教育投资的效率。发展中国家应该重点发展基础教育;同时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另外,由于农民是发展中国家的人口主体,对农民教育及科技意识的投资更不能忽视。

#### (二)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

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式是针对过去的资源浪费模式而言的,是依靠科技进步,以较少的资源消耗和能源耗费取得较多的产出效果和经济效果的发展方式。其主旨是通过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和单位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经济持续发展。它并不否定开发新的资源、创造不可再生资源的替代资源等。提倡建立资源节约型的发展模

<sup>①</sup> 戈尔、《濒临失衡的地球》,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

式,是发展中国家长期的战略性措施。为此,发展中国家首先要依靠科技进步,通过引进国外的适用技术和增强自身的“研究与开发”的能力来杜绝资源的浪费、减少废弃物排放、促进废弃物质的循环利用。其次是尽量使经济发展和生活消费建立在可再生资源和能源基础上,如利用太阳能、水能等取代矿物能源,反对超越经济发展阶段的高消费等。还有,要建立生态农业,它对农村人口众多、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生态农业就是依靠农业生态系统来维持土壤肥力、促使农业稳定持续生产的农业,能够导致生态的良性循环,使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利用,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想道路。

### (三)促进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

首先,应将环境保护纳入到经济发展的体系之中,将政府干预和市场作用相结合,使环境与发展相统一。其次,要大力推广清洁生产,实施污染控制的全过程管理,并优先发展环保产业。推行清洁生产及扶持环保产业同资源节约型发展模式也是相通的,都是通过技术进步来提高经济效率、节约资源消耗、减少废料以及污染物的生产与排放。在这方面,政府的经济激励政策以及有关环保法规的建设应发挥较大作用,如征收“庇古税”、实施排污许可证制度等。再次,促进国际合作,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国外资金和技术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环境保护事业。最后,加强全民环境教育,提高环境意识和环境需求。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实现环境保护是不可想象的。

### (四)充分发挥政府调控的作用

发展中国家是不可能自然而然地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必须在战略与政策上进行革新和诱导,以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改变传统的工业化产业结构与方式,尽快促使自己的国家向可持续发展模式过渡。其中,政府起着关键的作用,它在立法、规划、土地利用、污染控制、环境保护、普及教育等诸多方面有举足轻重的政策性影响。此外,政府还对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的宏观调控、各方利益的协调发挥主要作用。因此,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在以下几方面充分发挥作用:第一,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发育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利用价格参数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它使各种稀缺资源得到优化配置、生产者得到最大的经济收益。发展中国家应培育和完善的劳动力市场、商品市场,特别是要建立资源价格体系,对自然资源与环境资源进行计价,使资源费用在产品成本和价格中得到合理反映,使公共资源使用的外部性内部成本化,以利于有效地保护资源、节约资源。第二,进行资源核算,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资源存量增减、环境污染与治理等,都要与国民生产总值紧密地联系起来,为生态资源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准确有效的信息。第三,加快人口与环境立法进程,适时制定和修订各项有关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和规章,并加强执法队伍建设。第四,实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投资、信贷政策,在财政预算、投资渠道和信贷方面对教育、生态农业和环保产业给予扶持。第五,在环境保护与污染控制方面,要制定与国情相适应的环境保护标准,并积极从事成资助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技术开发、引进和推广。更重要的是强化征收环境费制度、环境税收制度、排污权交易制度以及环境损害责任保险制度,以实现污染的最优控制。

## 第十五章 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现实

### 第一节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进步与成就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发展中国家纷纷出现以来，它们作为一个整体取得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增长又是不平衡的。少数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也存在着结构性弱点；多数进步较慢，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遭遇着最为严重的困难。

#### 一、经济增长的总体速度和水平

1950年~1997年，全世界的生产总值在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不断困扰下，仍得到了长足的进展，虽然人口由初期的24亿增加到现在接近60亿，人均收入水平却翻了近两番。在此期间，全部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1965年~1996年，发达国家的年均GNP增长率为2.4%，而发展中国家中的中等收入国家与低收入国家的年均增长率各为5.3%和2.9%。按1997年美元价格计算，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NP，已由1955年的340元增加到1997年的1250元。由于发展中国家还处于人口转变的初期阶段，人口增长迅速，人均产值的水平不免压低，而发展中国家还处于极其不利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因此，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不说是快速的和前所未有的。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可以分为四个阶段：1950年~1965年为第一阶段，在该阶段里，发展中国家的GNP总值增长率略高于发达国家，人均值的的增长却相对低一些，这是发达国家利用廉价原料高速发展的时期；1965年~1980年为第二阶段，发展中国家的GNP总量和人均值的的增长率都超过了发达国家，特别是1965年~1973年，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6.5%和3.9%，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1980年~1990年为第三阶段，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和发展中国家本身的一些失误，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呈现出急剧下降的状况，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不到2%；1990年至今为第四阶段，虽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频

频发金融危机，但由于发展中国家调整了宏观经济政策，发展市场经济，致力于生活质量的改善，投资于教育、卫生等，使得发展中国家逐渐从 80 年代的噩梦中苏醒过来，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加快。各阶段的详细情况见表 15.1。

表 15.1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 GDP 增长率 (%)  
(1950 年 ~ 1997 年)

国家与地区	国内生产总值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950 年 ~ 1965 年	1965 年 ~ 1973 年	1973 年 ~ 1980 年	1980 年 ~ 1990 年	1990 年 ~ 1997 年	1950 年 ~ 1965 年	1965 年 ~ 1973 年	1973 年 ~ 1980 年	1980 年 ~ 1990 年	1990 年 ~ 1997 年
市场经济工业国	4.8	4.7	3.0	3.2	2.1	3.5	3.7	2.3	2.3	2.4
发展中国家	4.9	6.5	4.7	3.1	2.8	2.5	3.9	2.5	1.6	3.0
撒哈拉以南非洲	4.4	4.8	3.2	1.7	2.1	2.0	2.1	0.4	-1.2	-0.7
东亚与太平洋	5.5	8.1	6.6	7.8	9.9	2.9	5.3	4.9	6.2	7.8
南亚	4.1	3.6	4.2	5.7	5.7	2.0	1.2	1.7	3.0	3.2
欧洲与中亚、中东	4.1	7.7	3.9	2.9	-5.4	1.6	5.8	1.9	0.4	1.2
拉美与加勒比地区	4.9	6.5	5.0	1.8	3.3	2.0	3.8	2.5	-0.4	1.7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 (1991 ~ 1998)

但是，进入 80 年代以后，发展中国家不仅整体的人均 GNP 的增长放慢，低于发达国家，而且出现差别，非洲经济下降，拉丁美洲经济因债务危机而停滞，通货膨胀高涨，只有东亚经济持续高增长。1980 年 ~ 1991 年间，全世界的人均 GNP 年增长率为 1.2%，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仅有 1.0%，而高收入国家为 2.3%。不过，发展中国家中低收入国家达到 3.9%，而其中中国 7.8% 的年增长率起到了关键作用，印度为 3.2%，若扣除中国和印度，则其他低收入国家的增长率仅为 1.0%。以地区而论，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增长最快，为 6.1%，其次为南亚 3.1%，均高于高收入国家的 2.3%；但欧洲和中亚地区只有 0.9%；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下降了 1.2%，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下降了 0.3%。在这一阶段，非洲经济出现混乱陷入困境，拉丁美洲经济为债务危机所困，因而经济均陷入停滞。

如果考察 1985 年 ~ 1994 年间的人均 GNP 年均增长情况，则低收入国家为 3.4%，中等收入国家为 -0.1%，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合在一起也仅为 0.7%，而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则为 1.9%，全世界为 0.9%。在低收入国家中，若扣除中国和印度，其他低收入国家的人均 GNP 年均增长率为 1.1%。这表明，除中国和印度以外的低收入国家的经济增长 90 年代在恶化。以地区而论，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中，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的增长率为 6.9%，南亚为 6.7%，拉丁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为 0.6%，撒哈拉以南非洲

为-1.2%，欧洲与中亚地区为-3.2%，中东与北非为-0.4%。这表明，在90年代，非洲经济仍然处于停滞之中，而拉丁美洲经济则开始复苏和增长，欧洲与中亚的经济则因为处于转轨的过渡阶段而大幅度下滑，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是快速的。1996年~1997年，人均GNP的增长率全世界平均为1.8%，低收入经济为2.8%，中等收入经济为3.8%，高收入经济为2.2%，低收入经济与中等收入经济合在一起也有3.3%。但是，撒哈拉以南非洲仍然是最低的，为1.2%。

以国别而论，在90年代增长最快的仍然是那些新兴工业化经济。但是，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经济增长虽然快，其内在的结构性弱点在90年代中叶后开始暴露，出现了金融危机并带动经济危机；另一方面，拉丁美洲经济则从80年代的停滞中走出，但在1994年~1995年爆发了墨西哥比索危机，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序曲。以人均GNP年平均增长率来看，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1985年~1994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香港、新加坡、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分别为5.3%、6.1%、8.6%、7.8%、5.6%、6.0%。拉丁美洲各国经济已逐渐摆脱了80年代债务危机的影响而开始强劲复苏，虽然爆发了墨西哥比索危机，但影响面极窄，只使得墨西哥、阿根廷和乌拉圭经济滑坡。到1996年，这三个国家都开始复苏。

在1997年~1998年金融危机之后，到1999年，亚洲的经济看起来在恢复。例如韩国、新加坡和菲律宾的国内生产总值在1999年第一季度已经开始回升，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的经济收缩则放慢了速度，亚洲地区的主要股价指数全面上扬，除港币和新加坡币外的主要货币汇率普遍攀升，经常账户的余额正在向正的方向滑动。如果这一趋势能够持续下去，再佐以官方的金融支持和美国经济继续强劲增长、日本经济的迅速好转、中国经济的稳定，则能够改善投资者的信心。但是，由于外资的大幅度减少、国内金融体系的虚弱、投资支出急剧减少，这对经济前景是不利的。因此，这种复苏仍然充满了变数。实际上，这一复苏是政府刺激支出造成的，而私人信心则并没有完全恢复。例如韩国1999年的预算赤字预计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6%，且大部分开支集中在上半年，如果政府支出逐渐减少，则经济增长速度在下半年会放慢。另一方面，危机前的投资已经留下大量的工厂和企业，这些生产能力在危机中开工严重不足，因此很难在短期再形成新的投资热点，问题是，如果不在国内出现私人投资和消费的大幅度回升，就很难赶上危机前的增长速度。从外部环境看，对东亚国家至关重要的美国经济已经增长了相当长一段时期，很难说它有没有耗尽刺激增长的可利因素而走到增长的尽头，日本经济前景如何也很难准确预料。这表明，要在受危机影响的国家恢复正常的增长，仍然任重而道远。这些国家应该从内部着手进行结构性改革，改善公司和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增强投资者的信心，并需要日本的经济复苏、欧洲和美国的开放以及中国的汇率稳定和经济增长。

## 二、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投入结构、产出结构及消费模式等方面的良性变化，是比经济增长更为重要的发展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发展中国家



的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65年~1997年,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其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个部门的年平均增长率各为2.95%、5.6%和5.4%,在GDP中所占的比率也由31%、31%和38%改变至16%、36%和48%。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的变动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在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比重趋于下降,而且收入越高的国家农业比重下降得越快。第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比重提高得很快。工业生产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农业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工业生产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仍任重而道远。第三,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也有所提高,1997年中等收入国家服务业的增加值已占GDP的50%。而由于出现信息革命的新趋势,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地优化产业结构,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农业劳动力的比重没有明显的变动。1950年发展中国家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农业劳动力,分别占总劳动力的78%和65%,到1990年两者的比例分别为69%和32%,平均值为58%。低收入国家的变动不大。1980年~1996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每个农业劳动力所创造的农业产值只略有增加,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则由1980年的458美元下降至392美元(以1987年美元不变价格计算)。

发展中国家的消费、投资、储蓄等经济指标也有巨大的变化。1965年~1997年,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消费水平几乎增加了1倍。1997年的私人消费总额占GDP的比例为63%,与发达国家持平;国内投资占GDP的比重为25%,比发达国家高4%;国内储蓄比重为24%,比发达国家高3%。特别在9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投资总额年平均增长率已由80年代的1.8%上升至7.2%(1990年~1997年),而同期发达国家同项指标几乎为零,表明发展中国家已逐渐从80年代的发展危机中走出。

### 三、外贸结构的变化

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外贸产品的构成及流向上。1980年~1997年,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总额占GDP的比例已由40%增加到52%,商品与劳务出口也增加了近1倍。其中,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发展中国家与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出口商品的结构也有很大变化。农矿原料等初级产品所占比重已由1965年的83%下降至1996年的37%,制成品所占比重持续上升。到80年代末期,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制成品如成衣、纺织、皮革、木器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量不断增多,不仅打进了发达国家市场,而且所占市场份额也不断提高,东南亚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已经从出口简单制成品转向出口技术产品,如家用电器、半导体元件及电脑软、硬件等,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变化见表15.2。

初级产品本身的构成也有很大的变化。1965年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中,食品、原料等再生产品约占出口总额的一半,燃料、矿产和金属等不可再生产品占出口总额的30%。到1991年,前者的比例已下降至20%,后者则升至32%。这反映出,发展中国家农产品出口显著下降及其资源出口,特别是石油出口日益重要。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进口也经历着相似的变化。在进口总量中,初级产品的份额由1965年的35%

下降到 1991 年的 28%，制成品的比例由 65% 增加到 71%，而在初级产品进口的变动中，燃料的比重反而由占总进口额的 7% 上升至 10%。

表 15.2 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制成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 (%)

国家	1980	1996
阿尔及利亚	0	4
玻利维亚	3	16
智利	9	15
多米尼加	24	77
埃及	11	32
洪都拉斯	12	31
印度	59	74
印度尼西亚	2	51
马来西亚	19	76
墨西哥	72	78
摩洛哥	24	50
巴基斯坦	48	84
菲律宾	21	84
塞内加尔	15	50
新加坡	47	84
南非	18	49
泰国	25	73
突尼斯	36	80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98 年世界发展报告，英文版，228 ~ 229

#### 四、生活质量的改善

物质生产和人均收入的提高，为发展中国家人均生活质量的改善打下了基础。1950 年 ~ 1996 年，全部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由 43 岁增加到 65 岁，婴儿死亡率由 158‰ 降为 80‰，成人识字率由 33% 增加到 70%。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从 24% 上升至 40%。投资于教育的公共支出占 GNP 的比率由 1980 年的 3.9% 增加到 4.5%。实际生活质量指数则增加了近 3 倍。

与发达国家过去的经历相比，发展中国家在基本生活质量方面改善的速度要大得多。经过 100 多年的努力，发达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只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左右才达到 60 岁，而发展中国家用了不到 40 年的时间就突破了 60 岁大关。1975 年，发达国家的

小学净入学率只有 88%，而发展中国家在 1988 年就达到 89%，1995 年两者的这一指标各为 99%、98%。因此，尽管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基本生活质量方面曾有很大的差距，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这一差距已明显缩小。

能源常被称为现代社会的血液，它的产销变动既反映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进程，也显示出人们生活的便利程度。根据世界粮农组织的报告，传统的生物燃料如干柴、作物残余等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重要能源，但是，与过去相比，发展中国家商业能源生产和消费正迅速发展。商业能源主要是指煤、石油、天然气、水电、核电等一次性能源的商业形式。1965 年~1995 年，发展中国家商业能源消费的年平均增长率为 6.4%，是同期发达国家的 2.7 倍左右。人均能源消费量也由 1965 年的 2.53 千克石油当量增加至 1995 年的 7.51 千克石油当量。1980 年~1995 年，由使用商业能源而排放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也增加了 1 倍多。

## 五、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发展比较迅速

在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一小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较快。有些国家连续几十年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1965 年~1997 年，非洲的博茨瓦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8%。自 1960 年以来，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的增长速度比东亚其他国家快 1 倍多，比拉美和南亚将近快 2 倍，比撒哈拉以南非洲快 5 倍，同样，增长速度也高于工业化国家和中东北非的石油输出国。即使在 80 年代，当发达国家转嫁危机，发展中国家普遍遇到极大困难时，新兴工业化经济仍独树一帜，其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 7.9%，人均收入增长率为 6.3%。更引人注目的是，伴随着快速经济增长，人民福利大大改善，人均寿命从 1960 年的 56 岁提高到 1996 年的 71 岁，绝对贫困人口（缺乏清洁水、食品、住房等生存基本条件的人口）的比例大幅度下降，其他一些社会和经济指标，从教育到家电占有率也都迅速增进，有的甚至已超过发达国家。在拉美地区，智利在经历 80 年代初的金融风暴和社会动乱后，开始加速经济增长，1985 年~1997 年，智利的人均 GNP 年增长率为 6.4%，1997 年达到 7.6%，在拉美诸国中走在前列。

纵观发展中国家 50 年来取得的上述经济成果，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和发展速度远远快于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中所经历的转变；第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基本生活质量方面的差距明显缩小，特别是医疗卫生及教育状况有了相当大的改善。分析发展中国家取得辉煌经济成就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有效的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结合。发展中国家取得独立后都在寻求经济的快速进步，在经过一定阶段后逐渐认识了市场机制的重要性。然而，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里，市场机制及相关制度都是不健全的，这就需要有效的政府干预，促进市场发展，纠正市场失灵。世界银行《1997 年世界发展报告》指出，政府可以以多种方式来改善发展成果，如提供一种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环境，这种环境为有效的经济活动设定正确的刺激机制；提供能促进长期投资的机构性基础设施；确保提供基础教育、医疗保健以

及经济活动所必需的物质基础设施，并保护自然环境等<sup>①</sup>。五六十年代充满活力的国家计划和快速的资本积累曾使发展中国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当时东亚地区当局对自身消费的扩大进行了限制，实行稳健的政策并且有效地提供服务，成为东亚经济奇迹的一个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它们市场化的进程也得到了较为迅速的发展，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了相当充分的发挥。

第二，在维护国家主权的的同时，积极推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为了维护民族尊严，捍卫经济主权，发展中国家在建国初期一般都不同程度地采取没收、征收和国有化的形式，扫除了某些外国企业和种植园对国民经济的障碍，从而减少了对外国的依赖，增强了本国的经济实力。然而，过分强调独立自主，完全割断与外国资本的联系并不是明智的选择。60年代到70年代初，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拓宽了与世界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往来，积极引进外国资本和技术，多方位地发展。如1950年~1965年，印度尼西亚的GNP年均增长率只有1.4%；1966年以后，印尼政府调整战略，对外开放，把没收的企业除原属于荷兰资本的以外都归还原主，并积极引进外资，促进外贸。1965年~1989年，其GDP的年均增长率就达到6.4%。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马来西亚政府欢迎外国投资，特别是用于出口的直接投资。1988年外国直接投资就达20亿美元，是80年代初的7倍。外国直接投资给马来西亚带来了许多益处，特别是在增加外汇收入和就业方面，并且带来了用于出口的技术，极大地推动了马来西亚的经济发展。东亚四小龙在60年代就根据国内资源匮乏、市场狭小等特点，抓住发达国家产业升级、世界经济异常活跃的机会，开始加速发展。其制造业产品的出口长期稳定不变。而当国际经济自1973年进入困难阶段，发达国家开始加强保护主义措施，这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工资上涨时，它们又适时地修改出口战略，将制造业的出口从劳动密集型转为技术密集型，使出口浪潮高涨，增长的步伐加快。韩国于1973年~1979年实行了推动重化工业发展战略，采取了税收减免、优惠性质教导措施，但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财政负担和造成了金融市场的紧缺并危及到宏观经济的稳定。面对这些问题，韩国政府1979年迅速削减和扭转了对战略性产业的支持，政变信贷政策，取消了对重化工业部门的大规模优惠。马来西亚70年代以前主要依赖资源的出口，1957年锡和天然橡胶的出口就占其GDP的1/3。自1980年以来，马来西亚开始转向促进制成品的出口鼓励战略：政府向出口商提供了更多的税收优惠并使进口自由化，使马来西亚迅速步入新兴工业化国家行列。1985年~1995年人均GNP年平均增长5.7%，而同时期的拉美国家则由于资源出口仍占主要地位，低水平的制成品出口以及国际收支的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人均GNP年平均增长率只有0.7%。

---

<sup>①</sup> 世界银行. 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1

## 第二节 典型地区经济发展状况

### 一、非洲地区的经济发展

#### (一) 早期的经济发展

非洲撒哈拉以南各国于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相继独立，但它们走过的发展道路与东亚截然不同。非洲的情况比较复杂，在殖民统治时期，非洲人仍然从事传统的农业、牧业，欧洲殖民者则掌握着商业、基础设施、小型工业。欧洲殖民者瓜分非洲，按照管理的需要划分疆界，却没有考虑到文化、种族、信仰的矛盾，在同一个国家中弥漫着种族间的敌意、信仰间的冲突、不同族群间的互不信任，非洲人也没有机会学得管理国家和经济、工业的能力，这些都为独立后的经济发展埋下了困难的种子。

应该说，在刚独立的 60 年代，非洲还是呈现出较好的发展势头的。在这一起步阶段，非洲各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什么不同。例如和东亚各国相比，在这一阶段两个地区的年均人口增长都是 2.4%，实际 GDP 的增长则分别为非洲 3.8% 和东亚 4.0%，人均收入的增长分别为 1.4% 和 1.6%，投资在 GDP 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 1.4% 和 1.6%。不少非洲国家在刚独立时雄心勃勃，希望能够迅速地发展国民经济，因此，在这一时期，政府启动了大规模的建设项目，主要是进行基础设施如道路、电力的建设和教育、医疗的投资。政府的投资推动了产出和就业的增长。与此同时，60 年代的国际经济环境也有利于非洲：初级产品的价格相对较高而且稳定。于是，当时的非洲诸国纷纷鼓励初级品的出口，国民经济的中心也落在初级产品加工行业。例如布隆迪、肯尼亚、坦桑尼亚和埃塞俄比亚大量种植咖啡，科特迪瓦种植咖啡和可可，马拉维生产糖，等等。

#### (二) 发展战略的失误与糟糕的发展环境

但是，这些非洲国家经济的发展一开始就在其策略中留下了日后停滞的伏笔。它们在 60 年代经济体制的选择上采取了政府主导型的集中经济，经济发展由政府投资推动，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是国有企业，政府控制着国民经济，城市化成为发展的特征，人们偏向于在城市政府部门就业。这种发展策略即所谓的“非洲社会主义”。其弊端慢慢显露出来：国有企业效率低下，政府官员贪污腐化，私人企业的发展被抑制，为维持统治所需要的军事开支庞大，价格控制尤其是食物价格的控制产生了不好的影响，政府对投入要素供给的控制导致了要素价格的扭曲。

政治体制方面的问题也是日后经济困难的原因之一，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并不懂经济，也不太关心经济，而是专心于争夺和维持对国家的控制和对财富的掠夺。非洲各国低效率与专制的政府在推动地区发展方面没有起促进作用，反而破坏了其发展。有人说道：“非洲的问题在于那些掠夺性的强权政府，它们从不关心自己的人民。”<sup>①</sup>在独立前，

<sup>①</sup> 里奇伯格，崩溃的小世界，华盛顿邮报国民周刊版，1994，9（12）～（18）：6

殖民地政府掠夺当地资源到自己的国家，独立后，当地政府又为了统治者的贪婪和少数特权集团的利益而驾御全国经济，其中最典型的例子是扎伊尔的统治者蒙布托。他自1965年执政以来，把出口的收入用于军事支出和增加个人财富，极大地破坏了该国经济，以至于扎伊尔于1995年被驱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些国家腐败成风，破坏了政府职能的正常发挥作用；庞大的军事支出、政府官员的高薪挤占了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金；片面重视城市使广大的乡村持续处于落后之中；政府无力制止暴力冲突和犯罪，破坏了市场功能的发挥，破坏了投资环境，导致私人投资的减少，引起资本外逃。非洲的种族冲突经常发生，1994年卢旺达图西族和胡图族间的种族残杀是最严重的一次。

对这样一些国家进行援助显然是作用不大的，但很多国家出于政治目的这样做了。例如美国，尽管明知扎伊尔的蒙布托专断腐败，却还是予以大力支持，因为蒙布托强烈地反对共产主义。另外一些非洲国家在实施一些明显对经济发展没有贡献的项目时也还是得到了西方国家的援助，因为考虑到地缘政治。问题是这些援助很多是以贷款进行的，结果可想而知：项目失败了，贷款难以按时偿还，债务负担日益加重。到1993年，非洲国家的外债占GDP的比例达到47%，从而该年出口收入的17%要用于偿还外债。

种族间的敌意、仇视，不同文化和信仰间的冲突，各个团体间的互不信任，导致了经济与政治的不稳定，大大地阻碍了经济发展。在这个问题上，西方殖民者瓜分非洲大陆时对疆界的划分和对行政区域的设置明显地留下了后遗症。

人力投资战略也出现重大失误，教育不切实际地向西方国家看齐，过多地偏向高等教育，忽视基础教育，学校也都建立在大城市，因而未能做到普及全民教育、提高整体素质。同时，非洲各国并没有关注国民营养，没有控制人口，死亡率虽然下降了，但这是通过控制疾病达到的；人口增长在70年代达到年递增近3%的高速度。

在经济结构的设计上，非洲各国因为专门化生产出口产品，经济重心集中在附加值低的出口初级品加工工业、当地粮食生产、低附加值的商业和政府活动上，工业和金融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经济结构过于单一，在制造业上没有优势，不能抗御国际经济变化引起的风险。

### （三）70年代以来的经济停滞

无效率的政府、不适当的发展策略、不稳定的政局和不同族群之间的仇视、敌意、冲突和相互残杀以及自然灾害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经济问题。于是，到了70年代，非洲经济开始出现停滞，实际GDP的增长速度降低到3.2%，人口增长率却上升到2.8%，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仅有0.4%。相反，南亚各国则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实际GDP继续高速增长，为3.9%的年增长率；而人口增长率下降为2.2%，因而人均GDP的年增长率为1.7%。事实上，非洲各国的投资规模仍然是很大的，占GDP比例达到21.8%，但是这些投资都是政府进行的，并投入到国有企业，效率极为低下。到了80年代，非洲各国的人均收入更是开始下降，1980年~1993年，平均每年下降0.8%。

非洲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是人口增长过快。由于当地文化的影响，计划生育难于在当地开展。人们以多生小孩为骄傲，因而非洲地区的出生率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1965年，非洲的人口出生毛率为48‰，而到了1993年仍然有44‰。与此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在这一段时间，所有的其他低收入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从平均 42‰ 降到 28‰。另一方面，由于收入的增长和医疗保健的改善，毛死亡率从 22‰ 降到 15‰。这导致了非洲地区的高人口增长率。在 1965 年 ~ 1980 年间，非洲地区的年人口增长率达到 2.7%。而从 1980 年 ~ 1993 年，非洲人口仍然高速增长，达到年增长率为 2.9%。1990 年 ~ 1994 年间，人口增长年率也高达 2.7%。据估计，非洲现在的人口已超过 7 亿，到 2050 年将超过 12 亿。过多的人口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人口消费占用了较多的资源并阻碍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抑制了总产量的增长；另一方面，人口增长也对人均收入起到了抑制的作用。

在非洲经济的发展中，农业问题起了雪上加霜的作用。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在还处于低收入的经济起步阶段时，农业产值占国民经济较大的比例，相当大比例的人口在农村，因此成功的发展有赖于农业的发展。对非洲经济同样如此，例如，在 1993 年，农业产值占非洲地区 GDP 的比例约 20%，有 70% 的人口生活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但问题是，非洲的农业由于种种原因发展极其不成功，农业产出的增长远远地低于人口的增长。例如，1980 年 ~ 1993 年，非洲地区的人口年增长率上升到 2.9%，而农业产出的年增长率下降到 1.7%。这表明人均农业产量降低了。人均农业产量逐年降低的后果是严重的，这意味着需要进口粮食，而不管粮食是用外汇进口，还是来自外援，都挤占了宝贵的资源。

导致非洲农业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原因是，1975 年 ~ 1985 年间的连年干旱导致粮食短缺，迫使人们卖掉家畜，减少农村收入，接踵而来的粮食援助又主要集中在城市，从而增加城市的预期收入，致使农民离开农村迁往城市，但城市就业的增加远远赶不上人口增加的程度。天灾固然不可抗拒，但隐藏在天灾之后的终极原因却是人祸。人口增长过快增大对土地的压力，于是滥伐森林，剥夺地力，导致土地退化乃至沙漠化。

第二个原因是农业发展政策方面的问题。在殖民地时期，非洲农业就比较单一，主要生产出口作物用于换汇，而本地所需的粮食则进口，到独立后也还是如此。问题是，非洲生产的用于出口的农作物一方面遇到其他国家的竞争，例如拉丁美洲也生产咖啡和非洲竞争，而非洲国家在七八十年代的汇率是高估的，因而其产品的竞争力进一步降低。另一方面，农产品的生产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供给波动很大，价格不稳定，而且 1970 年 ~ 1995 年，农产品价格总的变化趋势是不利于非洲国家的。农产品价格在波动，但对进口粮食的需求却是缺乏弹性的，因而所换回的外汇又要将很大一部分用于进口。其次，政府对农业的不重视和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打击了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这主要体现在农产品的低价格上。政府为出口产品定的收购价格很低，同时也压低供应城市居民的农产品的价格。此外，政府没有在农业中采用绿色革命的技术，以至于在农业生产上远远落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

第三个原因是制度性因素。种地的农户并不拥有土地，因而也就没有动力去增加对土地的投资，保持地力，反而是过分地掠夺地力。

第四个原因是经济结构单一、缺乏多样化。在非洲经济中，农业、非正式的服务业

和政府部门是主力，而现代工业、金融保险业等则少之又少。他们甚至没有建立起初级的工业部门如服装、制鞋、食品加工等，这和非洲的特殊历史地位有关。非洲刚独立时缺乏人才、技术、资本和经验，要举办现代工业必须依赖国外，在他们看来，这会使他们再次受到国外的控制，导致新的殖民主义。由于曾有过被殖民统治的切肤之痛，他们不愿意引进外资。而到了 80 年代，当他们认识到外资的重要性从而愿意引进外资，并通过立法鼓励外资的进入时，却又缺乏好的投资环境：政局不稳使外资和内资都望而却步；地区市场发育不完善降低了投资的赢利性；经济增长不稳定限制了投资的赢利前景；最低工资法增加了生产成本；糟糕的基础设施减少了对投资的吸引力；教育不发达、识字率低而那些受过高等教育者又集中在政府部门，这使投资者找不到称职的熟练工人；汇率高估降低了出口行业的竞争力。工业既不能得到发展，则金融保险业也没有必要建立起来。

#### （四）走出困境的方案

为了帮助非洲走出发展困境，国际社会为非洲的经济发展制定了一套叫做结构性调整的方案，核心是进行体制和政策改革，并由国际社会资助。体制改革要求引进市场机制，取消国家定价，让市场定价；提供对经济活动尤其是农业生产的激励；减少国家和政治力量对经济的干预，改革国有企业或减少公共企业的比重，进行私有化。在政策改革上，主要是削减赤字，尤其是通过减少政府开支来做到；审慎地执行货币政策或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避免通货膨胀；取消高估本国货币汇率的做法，让汇率由市场决定，以便使得本国出口更具有竞争力。对这些结构性调整，国际社会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予以资助，而这些资助不再用于具体的项目。

结构性调整启动于 80 年代中期的非洲经济危机时期，大约有 30 多个国家参与了这一计划。它是否成功呢？世界银行的一项报告对其中的政策改革评论到：

“不同部门和不同国家在政策改革上是不平衡的。这里所研究的国家在宏观经济、贸易和农业政策上得到的改进要比在公共部门和金融部门上的改进更为成功。到 80 年代末期，几乎 2/3 的国家设法将更好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农业政策执行到位。宏观经济结构的改善也使得这些国家得以在外汇配置上采用更多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体制和更少地对进口进行行政控制。但是，改革还不完全。还没有哪个非洲国家达到已经实现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的程度——这在广义上意味着通货膨胀率低于 10%，预算赤字低，汇率确定是竞争性的……社会支出虽然还没有显示出在调整期总体下降的迹象，但在医疗卫生和教育部门内部却是配置失当的。而且对公共企业和金融部门进行的在政治上有困难的改革远远地滞后。”

制度改革也不是十分成功。尤其是在减少公共企业、进行分权和私有化上，做得还远远不够。

另一方面，也有人不满结构性调整，提出了其他方法。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主张应该让工人参与政府政策的制定以保护他们的利益，政府应该较多地干预经济，尤其是政府支出不能减少，应该加强对穷人的关注，注重对基本需要的关注，加倍重视农业的发展和粮食的自给自足，应该使用多重汇率体制而不是单一地鼓吹市场确定汇率，以便



既能增强本国产品的竞争力和进口所需的投资品和原材料，又能抑制奢侈品的进口。

非洲的经济发展和进步能否取得突破从某种意义上说关键在其领导人的作用。由于政治不稳定，腐败横生，官僚主义盛行，效率低下，丧失了很多发展机会。政府所需要做的是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深化经济改革，重新塑造国家的作用以使它有能力利用和管理资源、提供基础设施服务、创造良好的企业经营环境。

#### （五）经济发展现状

目前非洲地区的发展状况是，在经济方面，非洲国家的贸易数量还嫌太低并且缺乏多样化，其出口的60%为农产品、矿产品和金属，只有19%为制造品。流向非洲的长期私人资本仍然有待增加。1997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私人长期资本为2560亿美元，而其中流向非洲的只有8亿美元。为了发展，非洲必须吸引更多的外资，不仅是从外国人那里获得，而且还要从非洲地区自身获得，这是因为非洲资产中有37%是放在国外的，这一比例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都高。当然，要做到将自己的资产吸收回来，必须改善政治环境，确保社会稳定。在金融部门进行改革是发展的关键，这一改革已经在着手进行，例如加纳、乌干达在1998年进行金融部门的改革和私有化，世界银行已在资助西非和中非经济与货币联盟发展共同的支付体系、改善银行业的监管。少数改革在农业生产中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促成了更多的农业延伸服务体系的产生并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例如在1997年，农业生产率比上年提高了3.5%。

在人力资源和知识教育信息方面，非洲的情况仍然严峻。非洲地区的人学率在全球是最低的，其成人中只有53%的人识字。为改变这一现状，世界银行于1998年增加了对非洲地区教育项目的资助，金额达3.72亿美元，用以改善喀麦隆、科特迪瓦、埃塞俄比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教育质量与数量。世界银行对该地区9个国家的卫生、营养和人口方面的贷款也达到2.27亿美元。

在通讯方面，非洲地区也远远落后于全球的发展。为此，世界银行也帮助该地区开展了一系列项目。

## 二、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的经济发展

拉丁美洲国家有着非常相似的经历和环境，都曾经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于19世纪初独立。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都是以初级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为主，主要生产热带农产品、温带农产品和矿产品，农业和矿业成为该地区的国民经济命脉，且以出口为导向，对世界市场极为依赖。另一方面，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都掌握在国外资本手中，民族工业力量薄弱。30年代的大危机对拉丁美洲的打击与影响极大，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减少了对拉美国家的初级产品的需求，致使拉美国家也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中。痛定思痛，拉丁美洲国家从此决定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促进经济发展。从3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国家所采取的发展策略大概有三种：进口替代、出口鼓励和两者同时并重，其指导思想则是发展主义和货币主义。大致说来，从30年代到50年代，拉美各国采取的是进口替代的发展策略，最初是发展民族工业，大量生产工业消费品以替代消费品的进口。通过一系列鼓励措施，到60年代，一般消费品都能够

自己生产，民族轻工业得以建立。但是，进口替代的弊端也在暴露：保护政策不利于提高本国工业的效率，机器设备和原材料的进口增加了，进口替代所建立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为主工业造成大量的失业。于是，从6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国家开始将进口替代和出口鼓励两种策略同时实施，并促进产业多样化。

在这段时间，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结合。一方面，各国强调民族工业的发展，强调改变已形成的国际经济利益体系，改革不合理的国际分工格局。一些拉美经济学家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就是为此进行论证的。为此，很多国家采取对外资进行适当管制的措施，有选择性地引进外资，以既能利用外资又能防止外国资本垄断本国经济命脉，保护民族工业的利益和维护本国在经济上的自主权。他们还主张进行工业化和在拉丁美洲地区实现地区经济一体化，而在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贸易时采取保护政策。另一方面，在90年代以前，他们在设计发展策略时，尤其重视国家的作用。国家在拉丁美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是直接参加生产，从30年代开始，拉丁美洲国家就没收国外资本收归国有，在各行各业成立了国营公司；二是积极地干预经济，通过编制经济计划、通过财政货币政策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在拉丁美洲，也有少数国家采取了相反的发展战略，如智利、阿根廷和乌拉圭等国在70年代采取了货币主义的政策主张，推行自由放任主义、反对国家干预、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等。但是，这一战略只在不长时间中影响到少数国家。

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发展策略使得拉丁美洲地区经济持续发展到了70年代。但到了80年代，拉美地区的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始终困扰着拉丁美洲各国。

触发危机的是发展中国家第二大债务国墨西哥在1982年8月采取的行动。当时，墨西哥宣布它无力偿付1982年~1983年间到期的1400家商业银行的外债本息195亿美元。这一行动引起了连锁反应，在不到两年时间内，陆续宣布无力偿付债务的发展中国家达41个。世界银行1988年发表的《全球债务报告》指出，到现在为止，债务国的困境并未好转。那些自1982年起参加延缓债务安排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减少了外债与出口收入的比例。原来希望重债国人均收入状况和贷款信誉会随着世界经济的增长而好转，但至今未能实现。发展中国家的债务总额已从1986年底的11200亿美元增至1987年的11900亿美元，到1988年底升至12450亿美元。该报告还说，重债发展中国家的人均收入在80年代以来下降了1/7，而低收入非洲债务国的人均收入则猛跌了1/4。债务负担严重影响到这些国家的国内建设，许多国家的投资已降到70年代水平。一些非洲国家的情况更为严重，投资额已降到60年代独立时的低水平，而投资下降受害最深的是贫困国家的贫困阶层。总之，债务问题还远未解决，不是好转而是恶化了。

拉美重债国家也在寻求解决债务困难的新途径。墨西哥在债权银行支持下，准备以打折扣的方式还债，该国财政部门于1988年3月宣布：墨西哥政府和美国摩根信托银行已经签署了一项文件，确定由墨西哥发放25.57亿美元的新债券，债权银行同意用这批为期20年的债券偿还墨西哥所欠的36.65亿美元的债务，即享受30%的折扣，这样墨西哥可以节省债务本金11亿美元和20年内需付的利息15亿多美元，共节省26亿多

美元。墨西哥发行的这批债券还得到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零点息票”债券的支持。它只拿出 5.32 亿美元外汇现款购买美国的“零点息票”债券，20 年后兑现，就可以用来支持 25.57 亿美元债券。这就意味着墨西哥用 5.32 亿美元就可偿还 36.65 亿美元的外债。但是，这种办法是否能继续用下去，还是一个疑问。1988 年三四月间，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的证券交易所首次通过拍卖债券的形式，把巴西到期的一部分债务转换成风险投资，两次拍卖成交额达 3 亿多美元。此外，一些债权银行还要求通过巴西中央银行直接办理转换手续，把自己持有的债券转换为投资。到 1988 年 5 月份为止，登记转换的数额已达 30 亿美元。据巴西中央银行预计，1988 年内巴西外债转为投资的总额可达到 43 亿美元。外债转为投资，也就是债务资本化。外国债权银行将自己账面债额以债权形式折价出售，债券购买者买下债权之后，通过当地银行转换成为债务国的货币再进行投资。这种债券买卖、贴现和确定投资项目，通常是一次完成的。折价多少，与债务国的经济形势、当时的股票行情，特别是为债券购买者提供选择的投资项目有密切关系。例如 1988 年 4 月底在圣保罗交易所拍卖的债券，折价标准大致分为两类：在鼓励性地区和部门投资，折价 15%，即 1 美元债券可卖 85 美分；在其他生产领域或自由市场投资，折价 32%，即 1 美元债券可卖 68 美分。据宣布，通过巴西中央银行办理的债券出售折扣大致与此相仿。巴西还提出要在出口产品的生产领域吸收外债转换的投资，吸收限额初步定为 90 亿美元。债务资本化的利弊究竟如何？看法还不一致。不少人认为，在当前债务危机的情况下，把一部分到期债务转换成风险投资，既可以减轻偿债压力，又可以缓解某些经济部门资金短缺的困难，刺激经济发展，对巴西是有利的。但持不同意见者也大有人在，他们指出，债务资本化不过是一种货币转换形式，对国家来说并不意味着注入了新的外部资金，而中央银行为了贴现就必须在金融市场相应增加货币的投放量，这很可能加剧通货膨胀，对稳定经济和社会局势不利。还有人担心，外债资金转入某些部门后，外资所占的股份过多，使国家资本或民族资本重新受到外国跨国公司的排挤和控制。至于把外债转换的资金投入外贸领域，情况就更复杂，因为进出口贸易涉及国家的兑换政策。此外，有人说，每年获取 100 多亿美元的外贸顺差是国家用做对外支付的主要手段，如果由于实行债务资本化而影响到外汇积累，就不啻杀鸡取卵，造成很大的弊端。为了兴利除弊，巴西政府对债务资本化采取了比较谨慎的作法，财政部、中央银行以及外贸局等机构开始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为政府制定有关政策法规提出建议。它们已提出一些限制性的具体规定，作为当前的临时措施。例如，交易所拍卖债券大致每月举行一次，每次限额不超过 2 亿美元，加上其他形式的外债转为投资数额，每月不超过 4 亿美元；把开发农业、发展旅游业和非战略性部门的工业作为外债转换资金的投资项目；在外贸领域，外债转换的投资只限于非传统出口产品的生产和经营等。

进入 90 年代后，拉丁美洲地区的经济又重新开始增长。1991 年~1997 年，投资增长迅速，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在 90 年代初为 16%，到 1997 年达到 21%；对外贸易也迅速增长，1990 年~1996 年间，拉丁美洲地区出口增长了 76%，进口增长了 127%。与此相应，年经济增长率达到 3.5%（按国内生产总值计算）。另一方面，这种

增长是健康的，宏观经济形势越来越稳定，尤其是90年代的通货膨胀得到遏止。例如，以整个拉美地区而言，进入90年代后，各年通货膨胀率分别为：1990年185%，1991年198%，1993年882%，1994年335%，1995年26%，1997年10.5%。在1997年，很多拉美国家的通货膨胀率只有一位数，最高的委内瑞拉也只有38%。80年代困扰着拉丁美洲各国的债务危机看来也在解决，1991年拉美各国的资本因债务危机而外流的趋势得到扭转，开始出现净资本流入，金额达到42亿美元，1993年更飙升至313亿美元。1994年因墨西哥金融危机而减至76亿美元，但1997年又恢复到263亿美元。90年代的问题是出现过1994年~1995年墨西哥比索危机，但只有墨西哥、阿根廷和乌拉圭三国受到影响，1995年三国GDP分别下降了6.9%、4.4%和2.5%，而除这三国以外的整个地区GDP增长达到4.3%。危机过后，受到重创的三国经济又恢复了强有力的增长，墨西哥、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增长率分别达到5.1%、4.4%和4.9%。

拉丁美洲地区能够取得这些成绩，得益于他们所采取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一是以私有化改革国有企业，使得企业总体效率得以提高，政府增加了一笔可观的收入，私人投资大幅度增加并日趋活跃。二是进行了一揽子制度改革措施如税收改革、金融自由化、劳动用工制度的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三是当地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使得各国从地区贸易中获得比较利益。

但是，90年代的发展并没有惠及所有的阶层，贫富分化依然严重，贫困问题没有缓解。例如1990年~1994年间，拉丁美洲的贫困人口虽然从41%降低到39%，这一比例仍然是比较大的，按此计算，则拉丁美洲地区有2亿穷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一方面，拉丁美洲地区长期存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并没有得到改善；另一方面，由于私有化、经济结构的调整、新技术产业的涌现，大量的工人失业，而且这些失业人员以没有技术的蓝领工人为主，这就加剧了贫困问题。

为了维持持续、强劲的发展，这些国家还面临着艰巨的任务。第一，改善人力资源和加快社会发展。在这些国家，教育质量很低，获得受教育和医疗服务的机会也不公平。第二，强化公共财政，以增加国内储蓄，并投资于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源开发。第三，改革金融市场。这些国家所缺乏的是对银行的外在监管和调控，规范资本市场运行的法律规范。发展中国家金融业的脆弱使得国内经济很容易受到外在干扰的攻击。第四，建立高效的现代化的政府部门，改进管理系统，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杜绝腐败现象。第五，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使得经济发展的好处惠及所有阶层，并采取切实措施消除贫困。

### 第三节 亚洲经济奇迹与金融危机及其启示

#### 一、东亚经济奇迹及其经验

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东亚各国——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这东亚四

小虎和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三个新兴工业经济区——在经济发展上先后取得令世人瞩目令发展中国家艳羡的成就。在这段时间，贫困从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大规模减低。在过去20年里，贫困人口减少了一半。以每天1美元消费的国际贫困线为判断标准，贫困人口从7.2亿减少到3.6亿。而且这一减少还是加速进行的：在1975年~1985年间，贫困人口减少了27%；在1985年~1995年间，贫困人口又减少了34%。这一速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快。从国别看，在1975年，东亚10个国家中有6个国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到了1995年，则只剩下2个国家。持续的高增长促成了人民福利的改善，出生时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期望寿命和识字率等指标显著提高。

亚洲经济增长的特征是外向型经济、高储蓄高投资、低通货膨胀和保守稳健的财政政策。增长不仅来自资本的积累，更重要的是生产率的提高。奠定这一经济增长的基础是这些国家在政治上的高度集中和在经济上的高度开放。

亚洲“四小”与“三新”的经济发展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是最快的，在前面的第一节中已经有数字说明了它们的增长速度。世界银行于1993年发表了一篇名为《东亚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的研究报告，对这些国家取得快速发展的经验进行了总结。该报告指出，东亚诸国取得的成功有赖于各国在如下一些方面的努力：

一是东亚国家采取的正确的人力投资政策。东亚诸国普遍重视教育，政府对教育的公共支出多，更为重要的是，投资的重点切合国家经济发展所处具体阶段这一特殊国情，是非常务实的。早在经济高速增长的60年代，东亚“四小”的人力资本形成水平就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是，东亚“四小”并没有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过于偏好高等教育。在早期它们把重点放在基础教育的普及上，随后虽然也加强了高等教育，但并没有过度。教育和人力投资对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是重要的，对人力资本偏低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高等教育虽然也重要，但在基础教育尚未健全普及时，其作用要大打折扣，而且，高等教育费用太昂贵。因此，东亚国家重视基础教育的做法是合适的。基础教育的普及和人力资本的增加，其好处是巨大的，它降低了生育率，从而又促进了人力资本的深化；它提高了识字率，造就了熟练工人，促进了对先进技术知识的吸收和引进设备的利用；它还促进了收入增长的公平性。

二是政府在管理经济和制定与推行经济计划时能干而富有效率。东亚各国在经济上都采取了以市场为导向、鼓励竞争和私人企业的亲市场的发展策略。但与此同时，政府的作用又随时可见。事实上，东亚各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基本上可描述为经济上高度自由开放而政治上高度集中。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集中的政治体制又是以精英统治和专家治国和权威为特点的，决策与计划比较能够反映长远需要，而且一旦发布，能够得到贯彻执行。例如，它们普遍能够协调公私部门的投资计划，抑制工会的发展，寻求外资与技术转让，重视农业并采用了绿色革命的技术、投资农业基础设施。精英政治是建立在儒家文化传统上的，在这种文化下，人们遵从权威并希望政治稳定。

三是通过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保持宏观经济稳定性。要想让私人经济有序、有效地运行，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必要的，应该说东亚诸国做到了这一点。它们的财政、货币政策是成功的，财政方面一直没有过多的赤字负担，这得益于出生率的降低和收入的

快速增长减轻了政府的社会福利支出负担，而良好的税收体制又增加了财政收入。良好的财政状况有助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减轻了增发货币的压力，因而这些国家通货膨胀率较低。通货膨胀率低使得实际利率为正值，加上它们采取了保护储蓄的政策，私人储蓄得到鼓励，使这些国家成为少有的储蓄超过投资从而输出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同时良好的货币环境使得汇率具有竞争性，鼓励了出口——这些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发动机。

四是把出口作为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虽然都倚重于出口，但各国采取的策略又各有不同：香港和新加坡基本采取自由贸易政策；韩国和中国台湾则采取贸易保护政策，限制进口，同时通过税收刺激、外汇和信贷优惠、技术和市场援助促进出口；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这三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则采取了折中的策略，渐进地进行进口自由化、支持出口、将外资引向出口部门。在这一过程中，东亚各国表现出对国际经济环境极好的适应能力，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扩大出口，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中吸收国外的现代技术，提升出口品的加工程度，审慎地管理外债。

## 二、亚洲金融危机

但是，高速增长的东亚经济在 1997 年受到严重的考验。从泰国开始，一场影响深远、波及面广的金融危机爆发。1997 年，有两个导火线点燃了泰国的金融、经济危机。一个是资产价格泡沫的爆炸。泰国的不动产早在 1992 年就开始下滑，股市在 1994 年下滑。在这个过程中，墨西哥金融危机产生的传染效应使泰国成为受害国之一，使投资者或投机者在墨西哥出现问题时也怀疑泰国的金融安全，并于 1994 年开始多次投机性地攻击泰国货币铢，1996 年~1997 年攻击更加强化。同时，泰国的反击措施却不那么可信，因为人们认为泰铢迟早要贬值，从而又加强了对泰铢的攻击。这样就加剧了金融机构的经营困难。为此泰国政府不得不扩大对这些银行的贷款，致使信贷扩张。另一个是出口的持续下降。由于日本经济的衰退和世界经济问题减少了对泰国产品的需求，泰国出口在经历了 1995 年增长 20% 后，于 1996 年下降了 1%，出现经常账户的赤字；与此同时，不动产的价格停止上涨。于是到 1997 年早期，金融公司开始遇到严重的问题，政府不得不向他们提供帮助，结果增加了市场中的资金供给。在这种情况下，股票投资者首先发难，开始从股市中撤资。结果引起股价的巨幅下跌，于 1996 年下跌了 30%。1997 年初，私人资本开始减少，外资外撤，对泰国铢造成贬值的压力。在遇到危机后，泰国政府初期的政策反应又不合适，从而未能制止危机的加深和蔓延。为维持钉住汇率的政策，维持泰铢币值的稳定，泰国政府开始强力干预，大量抛售外汇，但不奏效，反而损失了大量的外汇储备，最后不得不于 1998 年 7 月放弃钉紧汇率的政策，于是泰国铢贬值。

泰国的危机具有灾难性的影响，并立即蔓延到东亚其他国家。之所以迅速地从一国危机演变成地区危机，原因有三：其一是国外投资者由泰国推及其他东亚国家，开始考虑以前不曾注意到的东亚金融体系的脆弱和不稳定，丧失了对这一地区的信心，开始纷纷从东亚国家撤走资金——这是传染效应 (contagion effect)。其二是由于东亚国家相互之间的贸易占据非常大的比例，1996 年总出口的 40% 为相互间的贸易，若算上日本，

则达到 50%；同时东亚地区的金融体系也是相互开放的。因此，一旦一个国家出现危机，马上就蔓延到其他国家——这是扩散效应（spread-over effect）。其三是这些国家本来就采取相似的发展模式，有共同的结构缺陷，面临着相同的外在冲击。就这样，在 1998 年东亚各国相继陷入金融危机进而陷入经济危机中。在金融危机中，各国汇率巨幅贬值，出现通货膨胀，产量减少，失业增加，公司和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受害最烈的是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中国香港和马来西亚也受到影响。

那么东亚各国为什么在 1998 年纷纷遭遇金融危机而落马呢？早在危机之前就一直存在着的内部结构性问题埋下了危机的种子，主要是金融市场过于对外开放而缺乏政府适当的管制，致使金融结构脆弱而经不起外在的冲击；地区内经济的迅速增长和政府的财政货币政策鼓励了国外私人资本的流入，国内信贷膨胀，对外负债过多。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出现投资者的冲击，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产生金融危机。

就引发东亚金融危机的外因而言，是短期外资的大量流入使得亚洲金融体系变得不稳定。资本输出国国内市场高度竞争而利润率低，一般发展中国家增长缓慢而不具有吸引力，东亚“四小”和新兴工业国家经济增长强劲，市场潜力大，国内经济政策稳健，这些使得国外私人资本大量流入。以货币政策为例，东亚的货币政策相对而言从紧，国内利率较高，刺激了外资的流入。与此同时，东亚各国汇率政策相对固定，大多和美元挂钩，因而排除了波动引起的风险，从国外借债的公司也就没有在意去套期保值。在 1994 年～1997 年间，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净私人资本流入都大大增加了。这段时间，东亚吸收了流向发展中国家所有短期资本的 60%。资本的流入扩张了国内信贷，到 1996 年和 1997 年，上文提到的东亚五国的广义货币每年增加 20%。结果资产价格上涨，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富裕了，于是消费增加，需求扩大，又进一步吸引了外资的流入。但是，这些外资基本上是通过国内的银行体系和公司直接借款流入到国内的，属于短期债务，增加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这可从两个角度看到，一方面，短期债务对外汇储备的比率在 1994 年～1997 年间大幅度上升，到 1997 年 6 月，韩国、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这一比率上升到 150%。另一方面，广义货币对外汇储备的比率也提高了。对公司而言，债务—资本比大大增加了。例如，到 1996 年底，韩国公司的债务—资本比达到 317%，这是美国的 2 倍、中国台湾的 4 倍。利息负担也因此面加重。

但是，危机的根源则在于各国经济内部的结构弱点尤其是金融体系中的弱点。首先，东亚各国的债券市场和长期资本市场弱小狭窄，不能满足国内的融资与投资的需要，因此国内的资金配置主要通过银行体系完成，而且，国内的高储蓄又对国内银行体系构成压力。但是，对于由资产价格波动导致的风险，银行体系却不具备管理能力。其次，银行体系内部和公司内部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存在问题，政府的监管和外部的监督也跟不上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对信贷的评估、财务报告的公开、通货风险的审慎管理、审计的力度、信息披露的完整性和可信度、各部门的相互制约、董事与经理人员的个人责任规定、来自金融机构和公众的监督、资本充实率都是远远不够的，金融机构和公司的运作缺乏透明度，金融机构和公司同国家之间存在着过于密切的联系。例如，在



韩国，一个财团可以同时拥有金融机构和公司；在印度尼西亚，银行数目增长太快，而监管机构没有花多少时间监督；在泰国，金融公司的活动急剧增加而监管却没有相应的改善。在这些国家，对外国投资者的资本流动是放开了的，而国内的投资者却不是常常有机会到外国投资，因而不能将风险分散。对金融体系监管不力放任了信贷和短期债务的扩张，促成资本利用的低效率，导致风险投资的增加，从而进一步加强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再次，东亚各国倾向于对银行体系的债务进行或明或暗的担保，鼓励了信贷的扩张、外资的流入、过度投资和风险投资的增加。最后，在危机之前，各国采取了金融自由化的措施，这也从供给方面促成了外资的流入。

此外，东亚各国所采取的钉紧美元的固定汇率政策容易招致外在的投机性攻击，并且在攻击面前显得束手无策。

这样，当大量的国外短期资本涌入到金融管制缺乏、金融机构和公司结构存在缺陷的金融体系中时，就形成了不稳定的因素，很容易产生问题。一旦外在的冲击产生，外资流入的势头转向，就会引起危机。90年代中期诱发危机的外在冲击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中国和拉美国家的竞争使世界市场对东亚各国的需求减少，产生经常账户的赤字；二是90年代日元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就后者而言，由于东亚各国都采取了与美元挂钩的汇率政策，一旦日元贬值，则东亚各国的市场竞争力就下降。

### 三、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

亚洲金融危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训具有普遍意义。在发展中，要避免危机，应该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规模普遍较小，而且缺乏管理与应付金融问题的经验，所以很容易受到国际金融资本流动逆转的影响，并且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内部组织、运作方式、外部的制约和监督方面有问题。因此，一旦受到冲击，则代价极大。与此同时，发生危机后，采取迅速合适的政策往往受到政治的约束。所以，从长远看，应该进行结构改革，建立适当的制度体系规范公司和金融机构的活动。只有经济体系、公司结构健全完善，才能有效地防范外在的冲击。第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尤其是在国际资本流动的自由化上不能盲目进行，应该循序渐进，在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完善和健全之后进行，并加强对外资的观察；如果国内公司、金融机构结构不健全，金融市场不完善，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不足，则应适当地限制资本的流入。第三，糟糕的宏观经济政策一方面容易诱发外来的金融冲击，同时在受到冲击时不能及时采取合适的政策反应。因此，采取审慎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第四，由政府出面，加强对经济运行的观测和监视，收集有关宏观经济运行的数据和信息并加以评估，将数据、信息和评估报告及时公布出去，增加经济运行的透明度。例如，经常账户、实际有效汇率、总资本流量中的国外直接投资所占比率、短期债务对总债务的比例、未偿付债务对GDP的比率等指标都是应该随时观察并定期发布分析报告。第五，加强与国际社会的合作，在金融问题上相互协调，尤其是取得国际金融机构或多边金融机构的支持，建立健康、有序、安全的国际金融体系。这是因为，随着国际经济越来越一体化，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出现问题，马上会影响到其他国家，或者是通



过连锁反应，或是通过引起金融恐慌，或是这些国家经济中本来就有着共同的引发危机的缺陷。第六，应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切实保障低收入阶层的利益。在危机中，低收入阶层缺乏防护措施，受到的影响最大。

到1999年，受到影响的东亚各国所采取的措施已经奏效，开始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经济开始恢复增长，尽管前景还扑朔迷离。在克鲁格曼看来，复苏的速度太快了，导致许多基本的问题还无法得到完整解决，导致亚洲蒙受经济危机的弱点仍旧存在，亚洲国家的经济结构仍然脆弱。大部分的亚洲市场还没得到全面的发展，亚洲企业仍过于依赖债务融资，公司结构和企业结构还没有完全改善，许多亚洲国家的大规模企业还是以传统家族式公司为主。他以拉丁美洲的经验为比较说，这些国家在80年代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到了1990年才好不容易得到解决。当时人们都认为同样的危机不可能再度发生，但1994年底又发生了“特奎拉”（tequila，墨西哥著名烈酒）震荡，这又成为不到3年后暴发的亚洲危机的“彩排”。于是克鲁格曼甚至说：“我倒希望另一场危机再次出现，以让这些问题得到解决。”

综观东亚各国的发展历程，应该说，亚洲模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也暴露出极大的缺陷。其教训是深刻的，但经验仍然是值得借鉴的。所需要的不是全部改变，而是进行补充和改革，尤其是在基础结构方面。因此，东亚模式，尤其是在对基础结构进行改革从而得到加强的东亚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仍然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 第十六章 论有关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重要问题

前面各章系统地介绍了发展经济学的思想渊源和它所包含的学说理论与政策建议，并概述了 50 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现实。本章将就有关发展经济学的几个重要问题，表明我们的看法。

### 第一节 怎样对待西方发展经济学

怎样对待西方发展经济学？我们认为：应当全面地去考察，既不宜全盘肯定而主张无所取舍地、无所鉴别地学习它、接受它，也不宜全盘否定而给它贴上“庸俗经济学”的标签，对它不屑一顾。

由于下述的理由，全盘肯定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张是不恰当的。

#### （一）西方发展经济学若明若暗地显现出殖民经济学的痕迹

当发展中国家仍处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时期，对殖民政府来说，如果要发展殖民地经济，那不过是为了攫取更大的利润，或如一个英国学者所说：“在 19 世纪，发展是作为利润的副产品面出现的。”以后，发展不能不具有一点点新的内容，即“肯定〔殖民地〕最起码标准的营养、健康和教育的重要”<sup>①</sup>。这种观点在当时作为最大宗主国的英国的大学经济学课程中有充分的反映。显然，这种发展观念的转变也不过是为了巩固和维护宗主国的利益，是为了谋求殖民地的经济稳定，以期获得稳定的商品市场和稳定的原料供给地。但是，当殖民地出现发展缓慢，甚至发展失败的情况时，宗主国的人士往往把它归咎于热带气候的恶劣条件，人口的压力，资源的匮乏或过于僵硬的、不合理的制度和社会规则。正如缪尔达尔所说，殖民理论常常是辩护性的，企图开脱殖民体制对

---

<sup>①</sup> 汉科克，英联邦事务调查，第 2 卷，1918 年～1939 年的经济政策问题，英文版，1942，267

不发达情况所承担的责任<sup>①</sup>。在发展中国家获得独立后的初期，发达国家出于冷战的观点，又担心昔日的殖民地如果没有一点社会进步，就会脱离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转向另一个社会阵营，从而投资机会和进入市场与原料来源地将从此丧失。这又成为 50 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得到较大规模财政和技术援助的政治基础，并由此而产生西欧和北美的一些经济学家开始准备从理论上分析“不发展”问题的动机。

由此可见，西方发展经济学在形成初期，就不免带有几分殖民经济学的色彩，对这一点，一位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说得很清楚：“发展经济学的家谱读起来就是出自政治权力的殖民经济学。”<sup>②</sup>

殖民经济学的痕迹在一些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所写的论文、专著和教科书中依然存在。他们或者比较明显地，或者比较隐晦地粉饰发展中国家继续处于不平等地位和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为国际经济旧秩序作辩护或解释。例如，贸易条件波动幅度较大而又长期继续恶化，这是许多发展中国家遭遇的重大困难之一，也是不少西方发展经济学家承认的事实，但是，还是有人力图淡化这一事实，他们力图用一些统计数字表明：除 50 年代后期和 60 年代间初级产品价格略有下跌外，其他阶段或稳定少变，或一般上涨，70 年代中期大幅度上涨。又如初级产品价格下跌，给发展中国家打击很大，但是，有人认为，个别发展中国家可能因出口商品价格不稳定而经济蒙受损失，但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某些出口商品价格下跌或某一时期出口商品价格下跌造成的损失，可能为另外一些出口商品价格上升或另一时期出口商品价格上升带来的收益所弥补。还有人认为，出口收入不稳定并不只是因为价格不稳定，还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缺少弹性，以致出口商品数量不稳定，而且，出口商品价格不稳定这一情况在发达国家也存在。又例如，通过跨国公司以获得国外资金并引进先进技术，对发展中国家是有利的，但是，无论从理论上或是从实践上看，跨国公司的利益是利润最大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两种利益是有矛盾的。而有些发展经济学家却过于强调前一方面而回避后一方面。

## （二）西方发展经济学受到新古典主义的强大影响，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是有它内在缺陷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发展成为一个普遍问题以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从未停止发表过他们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见解，即使在 50 年代和 60 年代前期也是如此。在那一阶段，尽管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处于优势，一些著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还是不断对流行的学说提出质疑<sup>③</sup>，或者从有关发展的某一领域内（如国际

---

① 缪尔达尔。不发达国家的改革要求。见：格拉斯曼，隆德堡主编。世界经济秩序：回顾和展望。英文版。1981。502~506

② 迈耶，西尔斯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英文版。1984。8

③ 如瓦伊纳对“伪装失业”概念的评论。见：迈耶主编。经济发展的主要争论。英文第 4 版。1984。155 - 159

贸易)坚持论述新古典主义的基本观点<sup>①</sup>。特别是鲍尔曾就对外贸易的作用、非正式部门的地位、经济作物对发展的影响、经济进步与职业分布的关系、价格和收入稳定的理论与实际等问题,以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对当时流行的贫困恶性循环、国内和国家间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发展计划的重要性等理论,系统地进行了批评。6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发展不能令人满意的结果使前期的发展理论受到怀疑,新古典主义恢复并扩大了它对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于是,新古典学派“思想形成了正统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贯串这门学科基本体系的一条红线”<sup>②</sup>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尽管在西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内,新古典主义已卷土重来,但是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某些内在缺陷并未得到合理的修补,至少在两个问题上是如此。

第一,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中心思想是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行使资源得到最佳配置,从而使经济得到最高效率。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还进一步认为,只要市场—价格体系正常地、畅通无阻地发挥其作用,则不仅会合理配置资源、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还会促进经济增长。在作这种理论演绎时,新古典主义始终未能圆满答辩凯恩斯在60年前提出的诘难:在宏观失衡的条件下,微观如何能达到合理的、最佳的均衡?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始终未能积极论证自由放任的市场—价格运行机制如何保证社会总供给与社会总需求的平衡。如果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处于失衡状态,价格往往难以成为人们作出合乎理性的经济选择的正确信号,从而市场—价格机制的运转将告失灵。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当中大多数的经济属于资源约束型,跨国公司的宣传所刺激起来的往往是脱离发展中国家经济水平的、不适宜的消费欲望,以致酿成消费超前、消费过热的不良后果。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高速增长既是主观的愿望,又是客观的要求,以致过分热衷于投资往往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现象。投资过热加上消费超前促使社会总需求持续地超过社会总供给,导致通货膨胀,引起一般物价水平的提高。在落后的经济条件下谋求快速增长,一些关键性产品又一般地出现需求大于供给的缺口,这种结构性的供求失衡又必然使这类产品的价格上涨。总量的供求失衡加上结构性的供求失衡,更加剧一般物价水平的上涨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不易在收入的使用上作出合理的计算,生产者也难以在资源的使用上作出合理的安排。市场—价格体系将失去(至少在一定期间失去)其合理调节经济运行的作用。

第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发展观,不仅受到理论上的抨击,而且也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不相符合。本书第三章第二节中,曾概述了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发展观,归结起来是三点:①发展是渐进、连续和累积的过程,它的进展是以边际调节来实现的。均衡状态是稳定的。价格机制是一切调节的原动力,从而也是经济发展的中心杠杆。因此,用静态的局部均衡方法就足以分析经济发展问题。②发展是和谐的、平稳的过程,它是以自动的均衡机制为基础的。在发展过程中,冲突之间会出现秩序,私利角

① 如哈伯勒在50和60年代发表的一些重要论文:《对经济发展理论中某些流行概念的评论》(1957年),《贸易条件和经济发展》(1961年)等。

② 纽金特,《发展经济学中当前争论的主要问题》,80年代的经济论争,英文版,1979,268

逐中会出现协调。“在一个和谐的世界里，穷人和富人、资本家和劳动者都会为了相互利益而一起工作以增加产出。”<sup>①</sup> ③经济发展是可能的，其前景是令人乐观的。经济增长的利益会自动地、逐步地分润到社会全体。从国际看，也是这种情况。通过专业化与分工，自由贸易会把经济发展的利益普及到整个世界。从这点出发，必然的结论是，经济发展是一个无冲突、无飞跃、无质变的自然发展过程，它所要求的仅仅是创造适当的刺激，完善市场的机制和起会自行运转的增长机器而已。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经济发展观，不仅受到激进学派或新马克思主义者的坚决反对，也受到结构主义者的尖锐批评，它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更是不相容的。在50年来发展中国家走过的道路和取得的经验教训中，新古典主义的发展观也得不到充分的验证。与之相反，发展过程中充满着冲突和曲折，经济失衡、分配不均、社会冲突等是许许多多发展中国家的常见现象。

### （三）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往日的发展经验来规范发展中国家

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主张“单一经济学”，自然认为他们的一般的、统一的理论不仅限于解释发达国家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各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共同的途径，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达国家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并无不同。西方发展经济学第一阶段中曾居于主要地位的结构主义者突破了新古典主义的束缚，注意到不发达国家的特殊结构，提出了一些特殊理论，建立了一些特殊发展模式，但有时又认为所建立的发展模式（如刘易斯—费—拉尼斯二元结构发展模式）不仅适用于当前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也适用于发达国家（如日本）过去的发展情况。曾以《非共产党宣言》作为自己著作《经济增长阶段论》副标题的罗斯托，自认为是从经济史的角度，以非总量分析方法研究增长问题的发展经济学家，他把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统一划分为传统社会、为起飞创造前提、起飞、向成熟前进、大规模高消费和追求生活质量等六个阶段。

经济变动和经济进步有一般的规律性，发展中国家由于历史条件、社会状况和国际环境有其类似之处，经济发展必有其共同之点，因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作出一般性的理论概括，提出一般的政策建议，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把一切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模式看成铁板一块甚至和18世纪的西欧、19世纪的北美的发展经验并非两样，或者如罗斯托那样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统一规定为六个阶段，则不仅不符合客观的历史与现实，而且理论上也是值得推敲的。例如，三十几年前在一次讨论经济增长阶段的会议结束时，一位著名的西方经济学家就曾对罗斯托整个体系的分析表示过怀疑<sup>②</sup>，他问道：经济史学家的任务难道只是对实现了的经济发展阶段简单地做转述性的描述吗？阶段论难道就是一番文字工夫吗？他指出，为了使阶段论成为有用的理论，它必须在行为关系、参数和初始条件等方面有确切的而非抽象的认识。

从以上三点看，对西方发展经济学不能全盘肯定，不能无所取舍地、无所鉴别地学习它，接受它。但是，由于下述的理由，对西方发展经济学又不能全盘否定，而简单地

① 约托波洛斯，纽金特，发展经济学，英文版，1976，9

② 索罗，迈耶，西尔斯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英文版，1984，269~230

把它视为“庸俗经济学。”

(1) 尽管分析、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有其缺陷，但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是很丰富的，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一切发展中国家是有参考价值的。

50年发展的结果，就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甚至使人失望的。虽然某些小国和地区的情况似乎较好，但广大的亚非拉美国家则或因人口压力过重而贫困如昔，或因二元结构触动不大而经济状况落后如旧，或因社会经济体制的原因而造成分配不均、贫富悬殊、社会问题激化。以这些国家的情况与我国50多年的发展现实相比，我们可以较深刻地了解我们何以在某些方面发生失误，也可以较明确地看到我们何以在某些方面取得成绩，从而是其所是面非其所非。

在长期发展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有很多失败的教训，也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无论经验也好，教训也好，都值得我们学习和汲取。如发展中国家要谋求增长和发展，不应当只注意物质资本的扩大，而忽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只强调工业化，而轻视农业发展，只突出计划管理，而贬低市场—价格机制；如确定工业化战略时，不要把进口替代和出口鼓励对立起来，而宜于把两者在同一阶段作统一的安排；如引进外国技术时，不应当只重视尖端技术，而轻视中间技术或适宜技术等。

(2) 论证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路不是单一的，从几种不同思路的各自论证和相互评论中，可以发现其所长而洞察其所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切切实实地做到洋为中用。

如前所述，在一些基本问题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受到了持结构主义思路和持激进主义思路学者的批评，但新古典主义对经济发展的各个侧面，如人口、工业、农业、贸易、财政、金融、教育等，作了大量的、细致的实证性研究和分析，得到了既具有学术价值又具有实际意义的结论。例如投资项目评估的分析，把成本和利益联系起来，利用机会成本的概念，使人们认识到，利用资源时应当把眼光从项目本身的经济效益扩大到社会经济利益；有效保护率和实际保护率的研究，有助于在采取保护措施时研究如何根据一些有关因素决定关税税率，对各个层次学校教育的成本—收益分析，有利于发展中国家在开发人力资源、进行教育投资方面作出较为正确的抉择；对市场—价格机制的系统不厌其详的论证，尽管有脱离实际之弊，但对深化商品经济变动规律的认识大有裨益。

伴随着新古典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兴起，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发展经济学家运用制度分析的方法来重新解释经济发展问题，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这些理论毕竟是在西方国家的社会经济制度下形成的，许多模式是以发达国家为背景来构建的，就其理论的规范性、完整性而言，还有许多不足之处。

结构主义的经济发展理论过分地贬低了市场—价格机制的作用，过高地估计了国家干预的威力和经济效果，是其缺点，但是，它们以动态的观点从互相联系的因果关系中去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提出发展中国家一般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必须进行结构改革、社会改革的主张，指出发展过程具有失衡的特点，不能任其自然。这些看法是比较正确的。

作为主流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激进主义经济发展理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持有

与新古典主义，甚至与结构主义完全不同的观点。例如，关于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性质，主流派的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不发达是所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也是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阶段。激进学派的发展经济学家则认为，不发达决不是一种自然现象，今天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和发达国家在“传统社会”阶段的落后状况性质上完全不同，今天发展中国家的不发达并非一种自然存在，而是殖民主义长期统治造成的，是一种历史现象。“不发达国家的过去和现在，在任何重要方面都不同于当代发达国家的过去。当代的发达国家从来都不是不发达的（under-developed），尽管它们可能曾处于未开化状态（undeveloped）。”<sup>①</sup>关于不发达的根源，主流派发展经济学家认为，不发达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内在因素。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则认为，不发达主要由外在因素所决定，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支配关系和经 济的不平等交换关系是发展中国家不发达的根源。激进主义经济发展理论，虽然立论过于偏激，分析失之粗糙，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能一反主流派对国际经济旧秩序的维护和颂扬，指出在现实的国际环境中发展中国家还是处于受控制、受剥削的不平等地位，抨击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弊害，这无疑是正确的。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打破了主流派发展经济学家的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抽象的统一模式，用历史观点和比较接近实际的分析去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这无疑也是比较正确的。

## 第二节 是否存在着 1945 年以前的发展经济学

我们已经知道，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并非诞生于 1945 年之后，而是与资本主义同步出现的。如果自早期重商主义算起，在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兴起之前，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早在 15 世纪就初现端倪，以后的西方经济学家就陆陆续续地在不同广度和深度上观察过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但是，这些思想汇总起来，是否意味着发展经济学早已形成？或者是否如有人所说，存在着“1945 年以前的发展经济学”（Development Economics Before 1945）<sup>②</sup>？我们认为是不存在的。

(1) 1945 年前一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的视野是狭窄的，观察是肤浅的。重商主义者非常关心国家财富的增长，把金银即货币看成是财富的惟一形态，并把对外贸易看成是增加财富的惟一泉源。重农学派对经济增长的认识虽比重商主义者大大前进一步，但还是把国家财富的形态划在较小的范围，而限定只有农产品才是国民财富，只有农业部门才能真正增加国民财富。这些看法虽然符合所处历史环境的需要，但都失之浅薄，并各有谬误，多年来已受到了批评。李嘉图从经济增长的过程观察了分配的变化，并对经济增长的前景勾画出一幅悲观的图像。马尔萨斯侧重分析经济停滞，把人口

<sup>①</sup> 弗兰克·不发达的发展。见：威尔伯编。发达和不发达的政治经济学。英文版。1979。136

<sup>②</sup> 阿恩特。1945 年以前的发展经济学。见：载巴格瓦蒂，埃考斯编。发展和计划：纪念罗森斯坦-罗丹论文集。英文版。1972

膨胀视为经济增长的重大约束条件。他们两者的经济增长模式都含有一定的合理成分，但又存在着共同的缺点：没有考虑技术的进步或可变要素替代固定要素的可能性。马歇尔在他的以微观分析为主的巨著中，提出了对经济发展过程的基本看法，但他的看法在理论上有其内在缺陷，在实践上得不到证明。

(2) 1945年以前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缺少实证分析。例如，作为英国古典经济学创造人的威廉·配第在300多年前就提出了产业逐步“软化”的命题，但他的论点却长期没有受到西方经济学界后来人的重视，更没有人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情况联系实际作具体的分析，一直到了20世纪40年代，作为西方发展经济学先驱人物之一的柯林·克拉克根据统计材料证明了配第的论点确属真理，才出现“配第—克拉克命题”这个词汇。又例如，贸易条件的变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1945年以前的西方经济学家曾经广泛地注意到它，但也缺少实证分析，只是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后，作为第一代发展经济学家的普雷维什与辛格和作为第二代发展经济学家而意见相左的巴拉沙，从大量的数据资料中作出对比分析，才使人们从不同的结论中对这个问题有了较全面、较深刻的认识。

(3) 1945年前的西方经济学家在阐述他们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时，很少使用数学工具，很少利用数学的形式分析使理论得到更清晰明确的说明。诚然，数学不能代替理论，过分数学化已使西方经济学越来越脱离实际而为世所诟病。但是，在正确理论指导之下，适当通过数学手段以表述理论、阐释理论，从方法论说，则是正确的，效果也是较好的。例如，利用国外资源以促进国内经济增长和发展，可以说是古已有之的论点，然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提出了“两缺口”模式，用数学公式证明这一论点，国内储蓄不足国外补的思想方得到确切而鲜明的说明。又例如，西方经济学家早已认识到经济增长率和储蓄率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然而，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哈罗德和多马分别提出了各自的形式略异而内容相同的经济增长模式，用数学公式把增长率、储蓄率和资本系数之间的确切关系清晰地表明出来，人们才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反映技术水平的资本—产出比例既定的条件下，要提高经济增长率，必须提高储蓄率。

(4) 1945年以前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一般地说，都缺少系统性，都很不全面。它们或者只涉及增长的含义，或者只考察影响增长的某一方面的因素，或者只抽象地表示发展观，或者只侧重物质资本的分析，等等。尽管几个世纪以来，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问题的认识，有所扩展，有所深化，但作为一门学科的发展经济学并未形成。

(5) 1945年以前，个别的西方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虽然比较全面，比较系统，但还远远不是发展经济学。如亚当·斯密，在本书第一章的第二节中，已就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关于增长和发展的论证作了介绍。对比起来，斯密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的确较其他前人丰富得多，完整得多，系统得多。但也可看出，200年前的历史条件毕竟限制了他。他所提出的经济理论和政策非常适合于18世纪中叶正在发展中的英国，但还未形成、也不可能形成具有当



代意义的发展经济学。例如，他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简单地归因于专业分工，而看不见技术进步对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巨大作用。他冲破了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对增长认识的束缚，却看不见服务部门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和三种产业在经济比重上的相对变化。在关于经济增长前景的分析中，他从资本主义经济条件出发，先作抽象的推理，推论出三种状态的可能出现，后又不加区别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的差异，以三个国家和地区——北美、孟加拉和中国——作为实例，证明进步状态、退步状态和静止状态的存在。斯密主张自由放任政策，从一方面说，是为了扫除障碍生产力发展的前资本主义因素和势力，从而适合当时英国国内环境的需要，从另一方面说，是为了让当时在国际上处于优势的英国经济力量压倒竞争对手，从而适合英国国际环境的需要。斯密倡导的无所限制的自由竞争、自由放任政策所具有的这种历史特点，与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外情况是有很大差异的。

综上所述，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个世纪中，随着资本主义成长引起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逐渐加速，不少西方经济学家已各有侧重点不同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思想，但是，总起来说，这些思想还不具备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应有条件和必要条件：系统、全面、有概括性、能利用现代分析工具并反映时代的特点。因此，我们认为，“1945年以前的发展经济学”并不存在。

### 第三节 凯恩斯理论在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 中居于什么地位

关于发展经济学的演变，在本书第一章的第三节中已经说明，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60年代初期为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第一阶段，60年代中期以后为西方发展经济学的第二阶段。

对于凯恩斯理论在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中居于什么地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是，凯恩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没有适用性，因而与第一阶段西方发展经济学无关；另一种是，凯恩斯理论是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对这两种对立的看法，我们都不赞同。我们认为，凯恩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并非毫无适用性，但它决不是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现分述如下。

#### 一、凯恩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并非毫无适用性

认为凯恩斯理论对发展中国家毫无适用性的人所举的理由一般是三点：

(1) 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过程，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以下简称《一般理论》）中，明确指出，他的分析是以“三不变”（生产技术不变、资源条件不变和成本不变）为前提的，而经济发展则意味着若干因素（如人口、生产技术、资本量、生产组织、消费嗜好等）在变化中影响经济体系的运动发展。尽管凯恩斯的“移动均衡”概念不同于传统的新古典学派的静态均衡分析，但至多也只能称为比较静态分

析。

(2) 经济发展不是一个短期现象，而是一个长期过程。凯恩斯采用的是短期分析，他有一句口头禅：“长期之后，我们都死去了。”以《一般理论》为代表的凯恩斯学说所要解释和解决的是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有效需求的变动而引起的经济周期波动问题，这当然不是长期分析。

(3) 凯恩斯所考察的是出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种种特点，从这些特点去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并提出如何使其稳定的对策，而那些制度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特点却是发展中国家所不具有的。因此，凯恩斯理论是不切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的。对这一点，一位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说得很明白：“当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理论应用在发展中世界的经济生活的实际时，它就和微观理论一样，显露出很多不足之处。对那些产品、资源以及金融等市场都不完全的经济而言，情况特别是如此，这种市场不完全性典型地来源于农业和工业中并存着现代的和传统的行事方法，并由信用制度发展不充分和功能失调以及一般发展中国家对强大的外国经济势力所处的脆弱地位而形成。传统的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对第三世界的发展缺少一般的适用性，这是不足为奇的。《一般理论》事实上是根据 30 年代大萧条中西方的特定经济与制度条件而形成的。确确实实，凯恩斯宏观理论的许多部分已被认为对今天的发达国家都不切合，因为这些国家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失业或通货膨胀而是‘滞胀’（即失业既伴随着需求的通货膨胀，又伴随着结构的通货膨胀），靠政府一般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去操纵总供给和总需求曲线的办法看来已大大失去效力。结果，凯恩斯经济学家受到了甚至发达国家中往昔最热心支持者的与日俱增的批评。如果工业国中宏观理论与经济现实之间存在着这样的差距，那么，宏观理论对制度和经济体系无论现在或过去与发达国家都不相似的不发达国家必然是多么不切贴！”<sup>①</sup>

上述意见总起来说就是：凯恩斯理论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它是以消除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周期为己任的，它采用的是短期的、静态的分析。因此，凯恩斯理论和经济发展问题无关，它已不切合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当前实际，更不适用于正在谋求经济发展的不发达国家。这种说法并非毫无道理。但我们认为，这对凯恩斯理论的认识并不完全。一方面，没有看到凯恩斯宏观分析模式在宏观分析史中的特殊地位，它把宏观分析法大跨度地推向前进，并已成为分析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有效工具；另一方面，凯恩斯提出的国家必须干预经济的主张，虽然是针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但市场不完全的发展中国家，在必须大力培育市场和发挥市场作用的同时，更不能取消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从而，凯恩斯理论包含的政策建议，也是发展中国家必须借鉴的。下面就这两个方面进一步作出分析。

### （一）凯恩斯宏观分析模式的特殊意义和一般意义

凯恩斯在《一般理论》中，一反相当长时期中在西方国家整个经济学体系中居于主流派地位的新古典主义习用的个量分析，从国民经济的总和变量去观察现代资本经济的

<sup>①</sup> 托达罗：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英文第 2 版，1981，15。末句着重点是引者加上的。

运行特点，找出失业、危机反复出现的原因，并提出解决这些困难问题的对策。这种分析方法，称为宏观经济分析。

从西方经济学说史回顾，凯恩斯并非采用宏观分析的第一人。自17世纪后半叶至19世纪前半叶的200年中，不少有影响的西方经济学家的著作中都运用过宏观分析，特别是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和魁奈的《经济表》，前者从社会总体探讨了国民财富的形成和增长的问题，后者从社会生产两大部类之间产品的交换分析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和流通过程。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30年代的70年中，宏观经济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间，以“创新”概念为核心的熊彼得经济发展理论和以威克塞尔（Wicksell, K.）为代表的瑞典学派理论，都曾采用动态宏观分析。但是，应当承认，现代的、完整的宏观经济分析却是由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一般理论》开始。

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模式具有五个特点：

其一，收入决定。凯恩斯注意的中心点是总就业水平的高低，而与总就业水平有独特关联的是本期总产出价值或国民收入水平，可以说，凯恩斯宏观分析模式的焦点是国民收入水平的变动。国民收入水平的高低决定于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交叉点或均衡点的位置。国民收入（ $Y$ ）等于本期产出的价值，本期投资（ $I$ ）等于本期产出中未作消费（ $C$ ）的那部分产出的价值，而储蓄（ $S$ ）等于收入减去消费，于是投资与储蓄自然相等。由此，得出已为人们广泛应用的公式：

$$\text{因 } Y = C + I \quad \text{而 } S = Y - C \quad \text{故 } S = I$$

国民收入是因变数，决定它的是作为自变数的前期消费和投资或进一步分解为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利率三个因变数。在国民收入水平既定之后，它对现期其他总体经济变量起着制约的作用。

因此，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常被称为收入决定分析或收入决定论。

其二，有效需求为惟一的均衡值。凯恩斯认为，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交叉时，总需求函数在这个交叉点上的值叫做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为惟一的均衡值。基于“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的思想的传统理论则认为在就业水平或收入水平的一切值上，总供给函数和总需求函数都是相等的，也就是说，有效需求并非惟一的均衡值，而是具有同等可能的无穷数值，就业量会自然地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凯恩斯认为，传统理论所谓的充分就业的自然形成基于特殊的假设：随着就业量的增加，总有一种力量使投资的增加足以填满总供给与总消费之间逐渐扩大的缺口。但是，现实经济中不存在这种假设的情况。现代资本主义条件下，有效需求的不足使就业量尚未达到充分就业水平，而经济体系已达到稳定的均衡状态。

其三，经济结构和社会心理决定了有效需求的不足。有效需求由两个部分构成，即消费和投资。消费决定于作为“心理法则”的消费倾向。投资决定于资本边际效率和市场利率，资本边际效率不是资本的现实收益而是体现人们对投资收益的预期。利率既是一种货币现象，又是一种心理现象，人们之所以对货币付出利息，是因为对货币有所谓的“灵活偏好”，灵活偏好自然也是一种心理状态。

在三种心理因素——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灵活偏好——影响之下，有效需求是不足的，就业量在没有达到充分就业之前就停止下来而不再增加，社会出现“丰裕中的贫困”这种矛盾现象。

其四，需求约束而非资源约束。凯恩斯认为他所研究的宏观经济运行机制不能顺利运行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的不足钳制了经济不能自动调节到充分就业的境地，总供给函数与总需求函数交叉点所决定的国民收入水平低于充分就业下的国民收入水平，社会上存在着非自愿失业和闲置的、不得其用的资源。这种经济是需求约束型的经济，而不是资源约束型的经济。这种经济需要的是刺激，是鼓励消费，特别是扩大投资。

其五，货币不是模式以外的附加成分，而是统一体系中不可分离的因素。凯恩斯批评传统理论把价值论和分配论与货币论分离开来是错误的，他说这是“双重生活”(double life)<sup>①</sup>。他指出，也许在考察一个厂商或一个行业的行为而进行微观分析时可以这样作，一旦把视野扩大到社会经济总量而进行宏观分析时，就决不能把货币作为外加的、分离的因素。同时，他又指出，尽管货币是货币经济宏观运行机制不可或缺的因素，但由于种种障碍，货币的作用又是有限的。

如上所述，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模式具有与过去宏观经济分析明显不同之点。这些特点既规定了凯恩斯宏观模式的特殊性质，又显示了它的一般意义。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的历史背景，是处于大危机后萧条时期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在凯恩斯看来，在这种经济体系中，存在着“怕货物”、爱货币、感到前途有很大风险而不敢扩大投资的空头心理，加上收入愈高，消费部分相对愈低的消费倾向的作用，投资量和消费量都感不足，从而造成国民经济达不到充分就业的均衡，使经济无法稳定。解救之道是采用鼓励消费、刺激投资的政策。这种从总需求方而为国民经济的病灶开刀，不失为一种有针对性的医疗方案，而且会收效一时。但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体系中的主要矛盾逐渐转化，经济失调的原因，不只来自需求，也来自供给。于是，单方面地采取需求管理，不去刺激生产，增加供给，就会加剧滞胀现象。70年代以后，凯恩斯理论的影响逐渐减弱，代之而起的是强调生产、强调供给、强调货币政策的新的经济思潮，这是不足为奇的。至于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经济现实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状有很大差异，与30年代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更是迥然不同。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是需求约束型，而是资源约束型的。资源约束型经济的要害，不是有效需求的不足，而是生产结构不合理、供给不足和储蓄不足。社会上不存在“怕货物”的空头心理状态，而存在“爱货物”的多头心理状态。如果把凯恩斯理论及其政策建议，在发展中国家盲目引进，生搬硬套，那是很错误的。例如，受凯恩斯理论的影响，在我国片面鼓吹高消费，贬低节约，那不啻对已患“投资饥饿症”的经济火上加油，造成超前消费和需求过度，使总供给与总需求严重失衡。提出这种主张的人，既不了解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经济的特点，又不了解凯恩斯宏观模式的特点。

<sup>①</sup> 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的一般理论. 英文版. 1936. 293

但是，在注意到凯恩斯宏观模式的特殊意义的同时，不应当看不见它的一般意义。模式中有关收入决定、总供给与总需求对应、投资与储蓄恒等、货币是宏观经济不可分离的要素等思想，无疑是可贵的。尽管凯恩斯理论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但其宏观分析模式，由于含有上述可贵思想，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和一定程度上成为一般经济体系的分析工具，可以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

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制订宏观经济计划时就采用了凯恩斯模式的理论框架。由于缺少可靠统计资料和必要的资金和技术，发展中国家难于像发达国家那样，建立极为复杂的、含有数以百计的变量和方程式的宏观经济模式，而只能建立简单模式。这种简单模式，一般把经济分为四个部门：家计（或消费）部门、融资部门、生产部门和国外部门。前三个部门各用1个方程式，后一部门用3个方程式表示各部门流入和流出的平衡。以  $Y$  表示总产出（或总收入）， $C$  表示消费， $I$  表示投资， $X$  表示出口， $M$  表示进口， $M_c$  表示进口消费品， $M_i$  表示进口投资品， $S_d$  表示国内储蓄， $S_i$  表示国外储蓄， $d$  表示进出口差，于是

$$\begin{aligned} \text{家计（或消费）部门：} & Y = C + S_d \\ \text{生产部门：} & C + I + X = Y + M \\ \text{融资部门：} & I = S_i + S_d \\ \text{国外部门：} & M = M_i + M_c \\ & M_c = X + d \\ & M_i + d = S_i \end{aligned}$$

在上列6个方程中，第六个不是独立方程式，它的平衡是由前5个方程式决定的，而10个变量需要10个独立方程式，为此，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编制者可以根据本国历史情况另外列出5个方程式：

$$\begin{aligned} Y &= Y_0 \\ C &= f(Y) \\ I &= k(Y) \\ X &= X_0 \\ M_c &= f(Y) \end{aligned}$$

上列5个新加的方程式中，第一和第四个分别说明产出和输出是外生变量，它们是由计划当局决定的目标。其余3个都表明消费、消费品进口和投资及收入有函数关系，每个函数关系的性质由较长阶段的历史资料决定。

目标收入水平既定，模式可以说明收入将如何分为消费和投资，有多少投资须由国外储蓄融资，如果由国外储蓄得到资金数额不如预期，则计划当局将不得不考虑降低经济增长速度的指标或者提高出口指标。

这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计划模式，可由图16.1表示。

从上述宏观经济计划模式可以看出，它完全是以凯恩斯宏观分析的理论框架为基础的，并充分体现了它的基本思想：收入决定，投资与储蓄恒等，总供给与总需求对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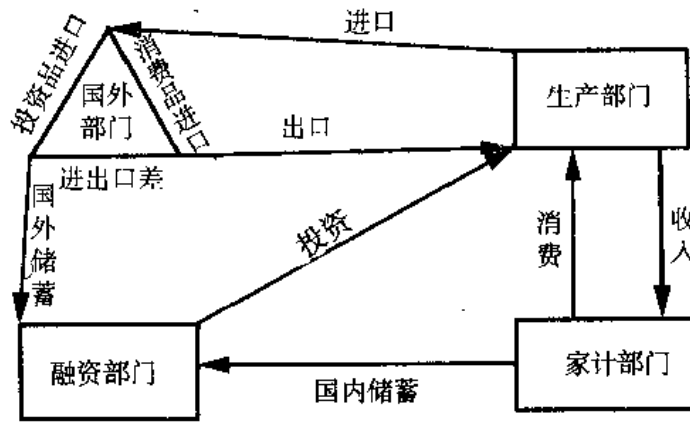


图 16.1 简单宏观经济计划模式

货币作为宏观经济不可分离的要素等等。所不同者，凯恩斯模式是封闭的模式，而这个模式是开放的模式，把国外储蓄以及进出口纳入模式之内。

在西方发展经济学中广泛引用的“两缺口模式”，是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可以用来研究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又一例证。“两缺口模式”设立的目的在于说明发展中国家利用国外资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本书第 10 章中已对这个模式作了详细介绍，其数学式为

$$I (\text{投资}) - S (\text{储蓄}) = M (\text{进口}) - X (\text{出口})$$

方程式左端表示投资与储蓄之差，右端表示进口与出口之差，如果  $I > S$ ，则出现储蓄缺口；如果  $M > X$ ，则出现外汇缺口。如果储蓄缺口大于外汇缺口，就不得不削减投资或增加储蓄；相反，如果外汇缺口大于储蓄缺口，就不得不削减进口或增加出口。但是，这种调节是从缺口本身的修补来考虑的，还只是一种消极的调节，如果从缺口之外开辟财源，利用外资，则对两个缺口都会产生影响。

显然，论证利用外资必要性的两缺口模式也是以凯恩斯宏观模式的理论框架为基础的，所不同者也是把封闭型模式发展为开放型模式而已。

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是一切经济体系都必须重视的问题，发达国家是这样，发展中国家也是这样，经济处于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需求不足，供给也不足。从需求方面看，低下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不高的消费水平，落后的经济状况不可能有多样的投资机会；从供给方面看，储蓄无论从绝对量或相对量说都是不高的，不发达的经济结构不可能提供量丰质优的产出。“贫困恶性循环论”的提出者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存在着两个恶性循环，一个循环反映着供给方面的情况，一个循环反映着需求方面的情况。两个恶性循环互相影响，使经济陷于低水平而不能自拔。“贫困恶性循环论”虽因其片面性而受到批评，但是，观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变动从总供给和总需求的角度出发，则是无可厚非的，同时，可以看出，它是利用了凯恩斯的宏观模式作为分析工具的。

处于低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必要在国民经济中重视总供给与总需求的恰

当关系，在控制消费基金过度膨胀和防止投资规模过度扩大的同时，要注意解决国民经济中存在着部门结构、行业结构、产品结构、规模结构、技术结构以及地区结构中的种种问题，并改善资源配置的不合理现象和社会经济效益不高的状况。要从资源约束型经济的基本性质出发，在宏观经济的控制中，既重视管理需求，又重视改善供给。而且，由于这种类型的经济不存在自行收缩的内在机制，就应当特别警惕扩张冲动、投资饥饿和消费过度所形成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不平衡。金融制度在发展中国家远不如在发达国家那样发达，因而货币的作用是相对有限的，但是，只要商品经济在发展，货币经济就在发展，货币的作用就必然日益扩大和加强。宏观地考察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并制定政策，就应当像凯恩斯模式那样，把货币视为经济运行机制的不可分离的因素，对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和收缩，应当根据生产和流通的实际情况，作出适宜的决定。

## （二）凯恩斯理论包含的政策建议中的合理部分，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

早在 20 年代中期，凯恩斯就开始从自由放任主义的传统观点转向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发表于 1926 年的《自由放任主义的结束》一文中，他提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明智管理的必要性。发表于 1933 年的小册子《取得繁荣的方法》中，他进一步强调财政政策对国民经济的作用。但是，系统的国家干预国民经济的思想，是在《一般理论》中才提出来的。在该书中（凯恩斯以有效需求的不足为依据，提出要扩大国家干预经济的权力，采取财政金融措施，增加公共支出，降低利息率，刺激消费，扩大投资，以提高有效需求，力争总供给和总需求在充分就业水平下实现均衡）

人所熟知，凯恩斯这套主张适应了 20 世纪 30 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需要，其中的具体措施是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困境而提出的。事过境迁，决不能在今天一一照样推行，在新的条件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既得利益的维护者转而要求削减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权力，几个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派一齐唱起自由放任、自由经营的老调。然而，我们认为，尽管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新的变化，使凯恩斯的全套宏观管理方案已难以奏效，但资本主义经济宏观上不能取消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中心调节力量的客观要求则必将持续久远。

至于发展中国家，无论走什么道路，由于下述原因，国家必然而且应当对宏观经济进行调节、干预和管理。

第一，今天的发展中国家，一般而言，市场具有很大的不完全性，其程度远比十八九世纪中的西欧和北美的国家为高，因此，市场的作用是有限的，从理论上说，达不到倡导自由经营的新古典主义所谓的完全市场的作用可以把经济推向最优境界的理想，实际上更远远做不到这一点。社会结构缺少弹性，教育不发达限制了职业的流动性，落后的运输系统障碍了地区的流动性，缺乏或根本不存在资本市场使储蓄得不到通向生产性投资的渠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家把经济运行完全委之于市场而袖手旁观，必然既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又往往有害于大多数人的利益。为了消除市场的不完全性并发挥市场的适宜作用，需要在基础设施、结构改革、金融体系、文化教育等方面，作出全面的努力，而这是私人很难做到的，国家应当而且可能永远担起这些任务。

第二，发展中国家为了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固然要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但

宏观经济计划是十分重要的，制定它是国家责无旁贷的责任。宏观计划考虑的是短期利益结合长远利益，而不只是短期利益；是个人利益结合社会利益，而不只是个人利益。计划还必须考虑如何减轻营养不良和失业现象，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如何满足人民的基本需要，这些事，私人是难于作到的。

第三，经济发展过程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和冲突的过程，政府必须多方面对宏观经济进行干涉和管理。

总之，尽管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不是以发展中国家为对象的，作为一个体系，它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但是，既然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经济要受到国家的干预，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模式的某些思维方式和具体工具，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 二、凯恩斯学说对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有一定的影响，但决非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

应当承认，凯恩斯学说对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有三方面的影响：一是凯恩斯在基本理论体系上打破了传统经济学的框架，给发展经济学作出了榜样；二是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模式成为分析经济发展的有利工具；三是凯恩斯把就业问题作为研究的中心点，启发了发展经济学家特别注意发展中国家大量劳动力过剩和劳动力不得其用的问题。但是，决不能把凯恩斯理论看成是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在这一点，我们不能同意拉尔的说法。

拉尔说：“凯恩斯在经济思想中的‘革命’和30年代发达国家大萧条的经验，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分析和验证的基础。”<sup>①</sup>

凯恩斯提出他的学说，有非常明确的针对性，即针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弊病，针对传统理论——新古典主义无力对反复出现并日益严重的危机和萧条作出自圆其说的解释。因此，《一般理论》一问世，就受到当时西方经济学界年轻一代的欢迎。正如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所说那样：“大规模失业年复一年地持续下去。如果不得不继续告诉青年们，这不过是充分就业准则的暂时背离，所需要是削减工资，那就太不够格了。当时年轻凯恩斯社团的公认领袖保罗·萨缪尔逊曾把青年经济学家初读凯恩斯著作时的激动，和英国诗人济慈初读史诗《荷马》时的心情相比……凯恩斯著作不推翻这个制度而是挽救了它，对于不革命的人来说，它似乎好得难以置信。对偶尔革命的人来说，它确是好得难以置信。白天，仍然教旧经济学。而在晚上，从1936年起差不多每个晚上，几乎人人都在讨论凯恩斯学说。”<sup>②</sup>30年代的发达国家的情况与当代的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根本不同，存在的主要问题根本不同，解决问题的着重点也根本不同。如果把凯恩斯理论笼统地说是论证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主要理论基础（事实上没有哪一个西方发展经

<sup>①</sup> 拉尔. 发展经济学的贫困. 英文版. 1985. 7. 原书把“developed countries”误排为“developing countries”。

<sup>②</sup> 加尔布雷恩. 凯恩斯学说怎样传播到美国. 纽约时报书评, 1965. 5



济学家这样说过和做过), 竟然把需求不足作为问题的焦点而去片面刺激有效需求, 造成的结果将是本来已经短缺的原料、能源、运输能力的供应更趋紧张, 本来已经不够满足消费者的愿望的商品在市场上更趋紧俏, 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缺口更为扩大, 物价上涨必将成为不可避免的趋势。

在发展中国家, 为了发展国民经济, 除了努力消除市场的不完全性并发挥市场的适宜作用外, 还需要在基础设施、结构转变、金融机制等方面开展全面的工作, 而这是个人无法做到的, 政府应当承担这种任务。同时, 为了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实现经济发展目标, 政府对国民经济作计划指导、实行产业政策、进行宏观管理也是必要的。然而, 十分清楚, 如果一位发展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时, 采用了宏观模式的分析方法, 提出了宏观管理的政策建议, 就说他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凯恩斯学说, 则是不恰当的, 也是不确切的。

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说明, 西方发展经济学兴起以来, 一直包含着三种思路: 激进主义思路、新古典主义思路和结构主义思路。激进主义思路的基本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新古典主义思路的基本理论基础是新古典主义。这两种思路一开始就不同程度地影响着对经济发展问题的考虑, 讨论西方发展经济学而置这两种思路于不顾, 只把属于结构主义思路的经济发展理论等同为发展经济学, 未免是以偏概全。即使就属于结构主义思路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而言, 也不能认为他们各家之言的共同理论基础是凯恩斯学说。虽然钱纳里的“两缺口”模式、结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理论”、“罗森斯坦-罗丹的“大推进”理论等, 与凯恩斯的宏观分析模式有不同程度的关联, 但很难说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和贸易条件恶化分析是以凯恩斯学说为理论基础的。刘易斯的“无限剩余劳动供给”模式强调的是劳动在部门之间的转移, 从劳动边际生产力差异决定了两部门的工资差异找到了劳动转移的动因、工业资本积累的泉源以及二元结构改造的机制, 不少人都认为刘易斯的这种论证是古典主义的流传, 甚至是新古典主义的产物。缪尔达尔关于循环累积因果关系和回荡效应的分析, 显然与凯恩斯学说没有多大的关系。库兹涅茨(Kuznets, S.) 利用国民经济产值及结构的大量统计资料, 通过数量分析方法研究各国经济增长, 是一种自成体系的实证分析。罗斯托自己声称, 他的经济增长阶段论采用的决不是总量分析, 而是跨部门研究。

从 40 年代末期到 60 年代初期, 即发展经济学的第一阶段, 持结构主义思路的发展经济学家的理论居于上风, 他们的论证各有特点, 但在资本积累、工业化和计划化三个问题上一般有共同的想法。形成共同看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可能是出自发展中国家的实际, 如资本是最稀缺的因素, 迅速工业化体现了经济摆脱依附、实现独立的民族感情以及社会经济结构的特殊性使价格机制和市场调节的均衡作用不可能顺利实现; 可能是受到传统理论的影响, 如古典学派一贯重视资本积累对促进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 可能是国际经验的反馈, 如西欧经济复兴的成果和前苏联计划经济的某些成就。凯恩斯学说对第一阶段的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思想的确曾不同程度地触动过、影响过, 但无论如何, 它决不是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拉尔把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笼统地说成是国家干预论, 并贴上“直接控制教条”(dirigiste dogma) 的标签, 是不符合事实

的，也是带有偏见的。如果把拉尔的看法再向前推进，甚至说凯恩斯学说是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那更是不恰当的、不正确的。

## 第四节 怎样看待“新古典主义的复兴”

在本书第一章的第三节中已经说明，第二阶段的发展经济学与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相比较，在基本思路、观察重点、问题论证以及政策建议等方面，都有显著不同之处。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更为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特点，突破了新古典主义“单一经济学”的束缚，提出了一些特殊理论，把单一经济学分解为“双经济学”。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在许多问题的分析中，恢复了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并扩大了新古典主义的应用，大有新古典主义卷土重来，把发展经济学纳入“单一经济学”，一统天下之势。这种情况的出现被人们称为发展经济学中“新古典主义的复兴”。

发展经济学的这种演变，是否意味着新古典主义成为普遍真理，意味着新古典主义在西方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和特殊理论中重奏凯歌，不仅成为发展经济学的主流而且完全代替并否定了结构主义和激进主义的思路呢？对这一问题，我们持否定看法。

(1) 发展经济学在60年代中期以后向新古典主义转变，并不表明前一阶段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纯属谬误，完全未起积极作用，相反，当时的理论和政策的确有其正确之处，在某些方面，的确对经济发展发挥了有益的作用。从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地位争取到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贫困是普遍现象，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最感稀缺的必然是建设资金，最需要发展的是工业，因而扩大储蓄，加速资本形成，建立民族工业以谋求经济上早日取得独立，不仅反映了民族的主观愿望，也符合国民经济起步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情况和国际条件，决定了它们不能走发达国家往日走过的一段老路，对经济完全自由放任，单纯依靠市场—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去引导国民经济的发展。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不能对普遍贫困的早日解决、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及时改善等重大社会经济问题，袖手无所作为，任其自然发展，而应当在计划管理、政策干预上有所作为。对此，一些在第一阶段极力强调市场—价格机制的发展经济学家也声明他们并非主张政府必须接受自由放任的原则，而是主张政府应当利用、增进和加强市场—价格机制，政府不必完全依赖全面的、细节的管理控制，而可以通过价格变动来执行政策，可以为发展私人生产、增加输出和扩大国内市场提供价格和收入刺激<sup>①</sup>。也就是说，发展中国家在实行非细节的宏观管理的同时，可以主动而积极地利用市场—价格机制，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也就是说，“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应当同时并举。

(2) 新古典主义在西方发展经济学的“复兴”，并不表明它已成为西方发展经济学的惟一体系。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依旧坚持说，应当以动态的观点从互相联系的因果

<sup>①</sup> 约翰逊，货币、贸易和经济增长，英文版，1962，152~153，156~159，160~163

关系中去研究经济发展问题，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是进行结构改革、社会改革。激进主义发展经济学家仍然断言，穷国是海外势力的牺牲品，是国际体系中“晚到的发展者”，障碍穷国发展的力量不是来自内部，而来自国际体系的活动，国际体系的格局是穷国对富国的依附关系或富国对穷国的支配关系，而市场—价格机制将累积地强化国际不平等关系。

当然也应指出，第二阶段发展经济学中对旧学说的批评和一些新观点的提出，是对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和政策的纠偏和修正。然而，这正表明人们对经济发展问题有了比过去较为全面、较为深刻的了解和认识，表明了发展经济学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的自我完善。不能把这种演变简单地说成是第一阶段的发展经济学走入了死胡同，也不能把这种演变简单地归结为新古典主义在发展经济学，甚至在整个西方经济学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正确的、合乎事实的认识应当是，一门新的经济学科正在发展，正在向纵深发展，新古典政治经济学思路在发展经济学中的出现就说明了这一点。

## 第五节 发展经济学是否已陷入贫困、 停滞甚至走向衰亡

如果说，60年代初期以前，特别在50年代，发展经济学家们一般地对他们的学说的现状和前景，抱积极乐观的态度并满怀信心，那么，60年代中期，特别是70年代以后，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转变了态度，对这门学科的现状作出悲观的估计，并为它的前景感到担心，纷纷撰文，用停滞、贫困、衰亡、死亡等词来表述他们对这门学科的看法。

态度转变的原因，首先是发展的现实和理论与政策的预期远不一致。初生的发展经济学描绘的发展前景是美妙的，但发展的客观情况却是令人沮丧的，在本书第十五章第二节中已就此作了考察。

另一方面，一些发展经济学家改变了研究方法，从全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研究，转变为对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作国别研究。他们认为，客观的情况已经表明，很难找到能为全部发展中国家所共有的制度的、非经济的因素，并把它们纳入统一的理论和模式之内。而且，许多发展中国家关心的是采取什么特定的行动和办法来使它们增长中的人口丰衣足食并提高教育文化水平，而不愿再墨守发展经济学家们提出的条条框框。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统计资料日益丰富起来，使人们对某一国家的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成为可能。总之，发展经济学的统一的、“宏大的”理论似乎解体了，发展经济学这门学科似乎将要渐渐消亡而归属为比较经济研究的范畴之中了。

面对上述情况，有的发展经济学家不免怀念50年代中经济发展理论蓬勃向上、汇为一体的盛况，面对发展经济学以后的演变则有江河日下之叹。例如，曾提出有名的不平衡发展理论、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者之一的赫尔希曼，就以《发展经济学的兴衰》为题撰文说：“发展经济学是一个比较年轻的研究领域。在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这一领域里的各种基本思想和模式像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并引起争论，使这一分

科充满了活力。在那沸腾的年代里，发展经济学家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它们的研究对象——亚非拉美最穷地区的经济发展。最近，这种独特的差距消失了。不幸，这不是因为经济发展飞速加快，而是因为我们这一分科的发展停滞了。”<sup>①</sup>但从全文的基调，我们可以体会到，赫尔希曼的这种式微之叹，不过是出自一种怀旧的情绪，而并不反映他对发展经济学已经感到幻灭和绝望。相反，他对发展经济学的成就是肯定的，对它的变异也是肯定的。在后来不久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他说：“在差不多 25 年之后，去回顾一部作品，说哪些思想仍然正确，哪些思想已经站不住脚，哪些思想曾经有益，哪些思想曾经有害，恐怕是徒劳的……作者自己是难以判断的，他们能够做到的是使读者相信，在那些旧的写出来和描绘出来的思想中，仍然栩栩有生气，而且以令人感兴趣的方式在继续演变……新学说和新思想的效应，比我们通常想象的要迂回曲折得多……由于（前人的）贡献，这一领域因论辩和争吵而突然活跃起来，并吸引一代人中一些更为聪明、更具有活力和奉献精神的人员。这就是新思想的间接的征募效应（recruitment effect），它和人们通常考虑的直接的劝说效应（persuasion effect）是相对应的。而恰恰是征募效应比劝说效应更加重要，更加持久。”<sup>②</sup>可见赫尔希曼在前一篇文章所说的发展经济学已陷于停滞，不过是一时愤激之言。

对发展经济学的过去彻底加以否定，对发展经济学的未来，认为必因贫困而走向灭亡的代表人物是前面提到过的拉尔。他说：“在这意识形态影响很深的时代，要在自由放任主义和直接控制教条之间走中间道路，也许是空想。然而，就我而言，根据前述的对发展经济学的反复抨击，我不能和赫尔希曼一起去悲叹它的衰落。本书的主要结论是：发展经济学的死亡，可能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的共同兴旺。”<sup>③</sup>

拉尔对发展经济学的判决，立足于他对第一阶段发展经济学的基本看法，如认为凯恩斯学说是它的主要理论基础，直接控制是它的中心教条。而如前所述，这种基本看法是不正确的，从而他的“反复抨击”并未打中要害。他的判决看来不是出自误解，就是出自偏见。

我们认为，发展经济学是一门具有生命力的年轻科学，因为它的研究对象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展中国家是客观存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还在发展，这是不能闭目不视的事实，这种事实不断要求经济学家们从复杂现象中找出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而发展中国的历史条件、社会经济基础和传统文化各不相同，所走的道路也不一致，因此，又会累积多样的经验教训。这些都是发展经济学的取之不尽的泉源。

发展经济学尽管有其内在的缺陷，但其中含有不少的合理的、正确的成分，并对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在今天，还在自我完善，成为西方经济学体系中一门论证日益丰富、日益系统化的分支学科。

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采用科学的分析方法，对西方经济发展理论鉴别比较，去粗

① 赫尔希曼，发展经济学的兴衰，经济学季刊，1980（4）

② 迈耶，西尔斯主编，发展经济学的先驱，英文版，1984，110~111

③ 拉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英文版，1985，109

取精，并不断从各种类型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的发展历史和发展现实总结经验教训，以建立起一门新的发展经济学，这一工作是具有重大意义和广阔前景的。

发展经济学在今天并未陷于贫困和停滞，在未来也不会衰落和死亡。

## 主要英汉人名对照表

Aghion, P.	阿格辛, P.	Brooks, M.	布鲁克斯, M.
Akalof, G.	阿克洛, G.	Brundtland, G. H.	布伦特兰, G. H.
Alchain, A.	阿尔钦, A.	Bruton, A.	布鲁顿, A.
Anant, T.	安南特, T.	Cass, D.	卡斯, D.
Anderson, G.	安德森, G.	Cairncross, A.	克尔恩クロス, A.
Anderson, T. L.	安德森, T. L.	Chamberlin, E. H.	张伯伦, E. H.
Arrow, K. J.	阿罗, K. J.	Chenery, Hollis, B.	钱纳里, 霍利斯, B.
Atkinson, A.	阿金森, A.	Clark, Colin	克拉克, 柯林
Axelrod, R.	阿克希路德, R.	Clark, J. B.	克拉克, J. B.
Bardhan, P.	巴丹, P.	Coase, R.	科斯, R.
Barney, G. O.	巴尼, G. O.	Commons, J.	康蒙斯, J.
Barro, R.	巴罗, R.	Crafts, N.	克拉夫茨, N.
Bates, R.	贝茨, R.	Daly, H. E.	戴利, H. E.
Baul, P.	鲍尔, P.	Davis, L.	戴维斯, L.
Baumgardner, J.	鲍姆加勒, J.	Darman, K.	达尔曼, K.
Baumol, W.	鲍莫尔, W.	Debreu, G.	德布鲁, G.
Becker, Gary, S.	贝克尔, 加里·S.	Deluke, P.	德鲁克, P.
Benson, B.	本森, B.	Demsetz, H.	德姆塞茨, H.
Berle, A.	伯利, A.	Denison, E.	丹尼森, E.
Bhagwati, J.	巴格瓦蒂	De Soto, H.	迪索托, H.
Binswanger, H.	宾斯旺格, H.	Dinopoulos, E.	迪诺波洛斯
Bishop, R. C.	比谢普, R. C.	Dixit, A.	狄克西特, A.
Blaug, M.	布劳格, M.	Domar, E. D.	多马, E. D.
Boldrin, M.	鲍尔金, M.	Duesenberry, J.	杜森贝里, J.
Borland, J.	博兰德, J.	Dundee, E.	邓迪, E.
Boulding, K.	博尔丁, K.	Eggertson, R.	埃格特森, R.
Brezis, E.	布雷兹斯, E.	Ekelund, R.	艾克伦德, R.
Brock, W.	布洛克, W.	Elton, G.	埃尔顿, G.

Elster, J.	埃尔斯特, J.	Jones, L.	琼斯, L.
Engerman, S.	恩格尔曼, S.	Jorgenson, Dale, W.	乔根森, 戴尔·W.
Ethier, W.	艾瑟尔, W.	Kahan, H.	卡恩, H.
Fama, E.	法马, E.	Kaldor, N.	卡尔多, N.
Farell, J.	法瑞尔, J.	Kaysen, C.	凯森, C.
Fei, John C. H.	费景汉	Kendrick, J. W.	肯德里克, J. W.
Fenn, D.	芬尼, D.	Keynes, J. M.	凯恩斯, J. M.
Findlay, R.	芬德利, R.	Kindleberger, Charles, P.	金德尔伯格, 查尔斯·P.
Fisher, I.	费雪, I.	Kim, S.	基姆, S.
Fleming, M.	弗莱明, M.	King, R.	金, R.
Fogel, R.	福格尔, R.	Klitgaard, R.	克利特加德, R.
Friedman, Milton	弗里德曼, 米尔顿	Kneese, A. V.	尼斯, A. V.
Furubotn, A.	弗鲁博腾, A.	Knight, F.	奈特, F.
Galbreith, K.	加尔布雷斯, K.	Koford, K.	柯福特, K.
Gills, Melcolm	吉里斯, 马尔科姆	Koopmans, T.	库普曼斯, T.
Gore, S. A.	戈尔, S. A.	Krueger, A. O.	克鲁格, A. O.
Gordon, H.	戈登, H.	Krugman, Paul R.	克鲁格曼, 保罗·R.
Griffin, K.	格里芬, K.	Krutilla, J. V.	克鲁蒂拉, J. V.
Grossman, G.	格罗斯曼, G.	Kuznets, S.	库兹涅茨, S.
Haberler, Gottfried	哈伯勒, 戈特弗雷德	La Croix, S.	拉克洛克, S.
Harberger, A.	哈伯格, A.	Lal, Deepak K.	拉尔, 迪帕克·K.
Hardin, G.	哈丁, G.	Lancaster, K.	兰开斯特, K.
Harris, J. R.	哈里斯, J. R.	Lamer, S.	纳勒, S.
Harrod, Roy F.	哈罗德, 罗伊·F.	Leal, D. R.	利尔, D. R.
Hayami, Y.	速水	Leibenstein, Harvey	莱宾斯坦, 哈维
Hayek, F.	哈耶克, F.	Leontief, W.	里昂惕夫, W.
Heckscher, E. F.	赫克歇尔, E. F.	Leopold, A.	利奥波德, A.
Heijdra, B.	黑吉特拉, B.	Lewis, W. A.	刘易斯, W. A.
Helpman, E.	赫尔普曼, E.	Lindbeck, A.	林德贝克, A.
Hessen, R.	赫赫, R.	Lipsey, R. E.	利普西, R. E.
Heston, A.	赫斯顿, A.	Lipton, M.	李普顿, M.
Hicks, J. R.	希克斯, J. R.	Little, I.	里特尔, I.
Higgins, R.	希金斯, R.	Locay, L.	洛凯, L.
Hirschman, Albert O.	赫尔希曼, 阿伯特·O.	Lucas, R.	卢卡斯, R.
Hodgeson, G.	霍奇逊, G.	Maddison, Angus	麦迪逊, 安格斯
Hotelling, R.	霍特林, R.	Magee, S.	马基, S.
Howarth, R. C.	霍瓦思, R. C.	Manuelli, R.	曼纽里, R.
Howitt, P.	霍维特, P.	Marris, R.	马里斯, R.
Hunter, D.	亨特, D.	Marsh, G.	马什, G.
Jagannathan, N.	贾甘纳什, N.	Mathews, R.	马修斯, R.
Johnson, H. G.	约翰逊, H. G.	Mochesney, F.	麦克切斯内, F.

Mc Closkey, D.	麦克罗斯基, D.	Rosenberg, N.	罗森伯格, N.
Mckenzie, R.	麦肯齐, R.	Rosenstein-Rodan, P. N.	罗森斯坦-罗丹, P. N.
Mckinnon, R. I.	麦金农, R. I.	Rostow, Walt, W.	罗斯托, 沃尔特·W.
Meade, J.	米德, J.	Ruttan, V. W.	拉坦, V. W.
Meadows, D. L.	梅多斯, D. L.	Sala-I-Martin, X.	萨拉-伊-马丁, X.
Means, G.	米恩斯, G.	Salter, A.	萨尔特, A.
Meier, G. M.	迈耶, G. M.	Samuelson, P. A.	萨缪尔逊, P. A.
Metzler, L.	麦茨勒, L.	Saury, Alfred.	索维, 阿尔弗雷德.
Mikesell, R. F.	米克塞尔, R. F.	Scheinman, J.	谢恩曼, J.
Mill, J. S.	穆勒, J. S.	Schultz, Theodore W.	舒尔茨, 西奥多·W.
Mishan, E. J.	米香, E. J.	Schwartz, P.	施瓦茨, P.
Murphy, K.	墨菲, K.	Schumpeter, Joseph A.	熊彼特, 约瑟夫·A.
Myint, H.	明特, H.	Scitovsky, T.	西托夫斯基, T.
Myrdal, Gunnar, K.	缪尔达尔, 冈纳·K.	Scott, M.	斯科特, M.
Nelson, R.	纳尔逊, R.	Seers, Dudley	西尔斯, 达德利
Norman, V.	诺曼, V.	Seg erstrom, P.	史格斯罗姆, P.
North, D.	诺思, D.	Sen, A. K.	森, A. K.
Nugent, J.	纽金特, J.	Shaw, Edward, S.	肖, 爱德华·S.
Nurkse, R.	纳克斯, R.	Sheleifer, A.	夏雷福, A.
Ohlin, B. G.	俄林, B. G.	Sheshin ski, E.	谢辛斯基, E.
Olson, M.	奥尔森, M.	Simon, L.	西蒙, L.
Opie, R.	奥佩, R.	Singer, H. N.	辛格, H. N.
Ostrom, S.	奥斯特罗姆, S.	Solow, Robert	索罗, 罗伯特
Page, T.	佩基, T.	Sraffa, P.	斯拉法, P.
Parente, S.	帕伦特, S.	Srinivasan, T.	斯瑞尼瓦桑, T.
Pearce, D.	皮尔斯, D.	Stern, N.	斯特恩, N.
Pejovich, S.	配乔维奇, S.	Stigler, G.	斯蒂格勒, G.
Perroux, F.	佩鲁, F.	Stiglitz, J. E.	斯蒂格利茨, J. E.
Pigou, A. C.	庇古, A. C.	Stokey, N.	斯多克, N.
Prebisch, R.	普雷维什, R.	Streeten, P.	斯特里顿, P.
Prescott, E.	普莱斯科特, E.	Strout, A. M.	斯特劳特, A. M.
Putnam, R.	普特那姆, R.	Summers, L.	萨默斯, L.
Ramsey, F.	拉姆塞, F.	Swan, T.	斯旺, T.
Ranis, G.	拉尼斯, G.	Tamura, R.	塔莫拉, R.
Rausser, G.	劳塞尔, G.	Taylor, G.	泰勒, G.
Rebelo, S.	赖贝罗, S.	Thomas, R.	托马斯, R.
Richter, R.	瑞希特, R.	Todaro, M. P.	托达罗, M. P.
Rivera-Batiz, L.	里维拉-巴蒂兹, L.	Tollison, R.	托里森, R.
Robbins, L.	罗宾斯, L.	Tsiddon, D.	齐登, D.
Rome, P.	罗默, P.	Tullock, G.	塔洛克, G.
Rorussaset, J.	罗马塞特, J.	Uzawa, H.	宇泽弘文



Vernon, R.  
Viner, J.  
Vishny, N.  
Wantrup, C.  
Weirgast, B.  
Weitzman, M.

弗农, R.  
瓦伊纳, J.  
维希里, N.  
旺特拉普, C.  
韦尔根斯特, B.  
魏兹曼, M.

Wellisz, S.  
Williamson, O.  
Winter, S.  
Wright, T.  
Young, Allyn  
Young, Alwyn

威利兹, S.  
威廉姆森, O.  
温特, S.  
怀特, T.  
杨, 艾林  
杨, 阿温

## 参 考 文 献

- ① Adelman I. Theorie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1974
- ② Adelman I, Morris C T. Economic Growth and Social Equalit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③ Adelman I, Morris C T. Society, Politic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A Quantitative Approach. [s. l.]: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67
- ④ Agarwala A N, Singh S P. The Economics of Under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⑤ Aghion P, Howitt P.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Creative Destruction. *Econometrica*, March 1992. 3: 323 ~ 352
- ⑥ Aghion P, Howitt P.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in the Growth Process. *Journal of Economic Growth*, 1996. 3
- ⑦ Amin S.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 A Critique of the Theory of Underdevelopment. [s. l.]: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 ⑧ Amin S. Unequal Development: An Essay on the Social Formation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 1976
- ⑨ Arndt H W. Development Economics Before 1945. In: Bhagwati J N, Eckaus R S, eds.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Essays in Honor of Rosenstein-Rodan*. [s. l.]: Allen & Unwin, 1972
- ⑩ Arrow K.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 6: 155 ~ 173
- ⑪ Balassa B J. Capital Import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Paradox of Orthodoxy-Kyklos, 1972 (3)
- ⑫ Ball B. "The Progres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in *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 ⑬ Ball B.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⑭ Barro R.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 Economy, 1990. 10
- ⑮ Barro R. Economic Growth in a Cross Section of Countri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5
  - ⑯ Ball B. Converge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a. 4
  - ⑰ Ball B. Public Finance in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Review of American Economic Studies*, 1992b. 10
  - ⑱ Ball B.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McGraw-Hill, 1995
  - ⑲ Baumol W. Production Growth, Convergence and Welfare: What the Long-Run Data Sh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6. 12
  - ⑳ Baumgardner J. The Division of Labor, Local Markets, and Worker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6
  - ㉑ Baumol W J, Oates W E. *The Theory of Environment Policy*. 2nd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㉒ Borland J, Yang Xiaokai. Microeconomic Mechanism for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1991. 6
  - ㉓ Baran P.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Growth*. [s. l.]: Monthly Review Press, 1957
  - ㉔ Becker G. *Human Capital*.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5
  - ㉕ Becker G, Murphy K, Tamura R. Human Capital, Fertility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2. 11
  - ㉖ Benoit E. Growth and Defens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78. 1
  - ㉗ Bruno M. Does Inflation Really Lower Growth? *Finance and Development*, 1995. 9
  - ㉘ Bryce M.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 Guide for Accelerating Economic Growth*. [s. l.]: McGraw-HILL, 1960
  - ㉙ Caballe J, Manuel S. On Endogenous Growth with Physical and Human Capita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12
  - ㉚ Cass D. Optimum Growth in a Aggregative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Review of American Economic Studies*, 1965. 7
  - ㉛ Chamley C. Externalities and Dynamics in Models of Learning by Do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93. 8
  - ㉜ Chenery H, Strout A M. 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6. 8
  - ㉝ Chenery H. Patterns of Industrial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0. 9
  - ㉞ Chenery H, Taylor L. Development Patterns among Countries and over Tim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68. 11
  - ㉟ Chenery H, Aluwalia M S. *Redistribution with Grow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③ Clower H, Aluwalia M S. *Growth Without Development: An Economic Survey of Liberia*. Chicago: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66
- ④ Coase R.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960. 10
- ⑤ Cody J, Hughes H, Wall D, eds. *Policies for Industrial Progr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⑥ Corden W M. The Structural of Tariff System and Effective Rat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66. 6
- ⑦ Currie L. *Obstacles to Development*.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⑧ Currie Classic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1958. 6
- ⑨ Dales, Land. Water and Ownership.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8
- ⑩ Dan Yang Xie. Increasing Returns and Increasing Rates of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9, 1991
- ⑪ Dan Yang Xie. Divergence in Economic Performance: Transitional Dynamic with Multiple Equilibria. *J. Econ. Theory*, 1994. 6
- ⑫ Dasgupta P, Marglin S, Sen A. *Guidelines for Project Evaluation*. UNIDO, 1972
- ⑬ Dasgupta P S, etc. *Economic Theory and Exhaustible Resourc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 ⑭ Delong B, Summers L. Equipmen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5
- ⑮ Denison E. *Why Growth Rate Differ: Postwar Experience in Nine Western Countries*.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67
- ⑯ Domar E D. *Essays of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⑰ Edgeworth F Y. *Papers Relating to Political Economy*. [s. 1.]: Macmillan, 1925
- ⑱ Edwards E, ed. *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Nations*. Columb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 ⑲ Eicher C K, Staatz J M, ed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s. 1.]: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 ⑳ Ethier W.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turns to Scale in the Moder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2. 6
- ㉑ Fei C H, Ranis G. A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9
- ㉒ Forrester J W. *World Dynamics*. Cambridge: MIT Press, 1971
- ㉓ Frank G. *Capitalism and Under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 [s. 1.]: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7
- ㉔ Gemmell N, ed. *Survey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s. 1.]: Basil Blackwell, 1987

- ⑤⑧ Ghatak S.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Gemmell N, ed. Survey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s. 1.]; Basil Blackwell, 1987
- ⑤⑨ Ghatak S. An Introduction to Development Economics. [s. 1.]; Allen & Unwin, 1978, 1986
- ⑥⑩ Ghatak S, Ingersent K. Agri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 1.]; Wheatsheaf Books, 1984
- ⑥⑪ Gillis M, Perkins D H, Roemer M, et.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s. 1.]; Norton & Company, 1983, 1987
- ⑥⑫ Gillis M, McClure C F Jr. Taxation an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Columbian Tax Reform of 1974.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78. 9
- ⑥⑬ Goldin I, Winters A, ed.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 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 ⑥⑭ Goode R. Government Financ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4
- ⑥⑮ Griffin 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Change. [s. 1.]; Macmillan, 1974, 1979
- ⑥⑯ Grossman G, Helpman E. Produc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12
- ⑥⑰ Grossman G, Helpman E.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12
- ⑥⑱ Grossman G, Helpman E.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Long Run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⑥⑲ Griffin 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grarian Change. [s. 1.]; Macmillan, 1974, 1979
- ⑦① Haberler 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50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on Lectures. [s. 1.]; National Bank of Egypt, 1959
- ⑦② Hagen E E. Theory of Social Change. [s. 1.]; Dorsey, 1962
- ⑦③ Harbison H. Human Resources as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⑦④ Harris J R, Todaro M P. Migration Unemployment and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3
- ⑦⑤ Hardin G.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968. vol62
- ⑦⑥ Harrod R. Economic Dynamics. [s. 1.]; Macmillan Press, 1973
- ⑦⑦ Hayami Y, Ruttan V W.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s. 1.];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1985
- ⑦⑧ Helpman E. Innovation Imitation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Econometrica, 1993. 11
- ⑦⑨ Herrick B, Kindleberger C P. Economic Development. [s. 1.]; McGraw-Hill, 1983
- ⑦⑩ Higgins B, Higgins J D.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a Small Planet. [s. 1.]; Norton & Company, 1979
- ⑧① Hirschman O. The Strateg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8

- ⑧ Hirschman O.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0 (2)
- ⑨ Hoffman W C.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Economies*. [s. l.]: Modern University Press, 1958
- ⑩ Hayami Y, Ruttan V W.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s. l.]: Johns Hopkins Press, 1971, 1985
- ⑪ Inada K. On a Two-Sector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Comments and Generalization. *Review of American Economic Studies*, 1963. 6
- ⑫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Employment, Growth and Basic Needs: A One-World [s. l.]: Problem*. Praeger Publishers, 1977
- ⑬ Jones C. Time Series Tests of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5. 5
- ⑭ Jones C. R& D-Based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5
- ⑮ Jones L, Manuelli R. Convex Model Equilibrium Growth: Theory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10
- ⑯ Johnson Harry G. *Money, Trade and Economic Growth*. [s. l.]: Allen and Unwin, 1962
- ⑰ Jorgenson D W.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 1961. 11
- ⑱ Jorgenson D, Griliches Z. The Explanation of Productivity Chang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7. 7
- ⑲ Judd K. On the Performance of Patents. *Econometrica*, 1985. 7
- ⑳ Kim S. Labor Specialization and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6
- ㉑ King R, Rebelo S. Public and Economic Growth: Developing Neoclassical Implic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8, 1990
- ㉒ King R, Rebelo S. Public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classical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9
- ㉓ Knight F. Diminishing Returns from Investment.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4. 3
- ㉔ Kmeese A V. *Economics and the Environment*. [s. l.]: Penguin Books, 1977
- ㉕ Kahn H.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1979 and Beyond*. [s. l.]: Morrow Quill Paperbacks, 1979
- ㉖ Kendrick J W. *Productivity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 ㉗ Keynes J M.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36
- ㉘ Koopmans T. On the Concept of Optim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conometric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lanning*. Amsterdam: North Holland, 1965
- ㉙ Kravis I, Heston A, Summers R. Real GDP Per Capita for More Than One Hundred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1978. 5

- ⑩③ Krishna R. Unemployment in India.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1973. 3
- ⑩④ Krugman P. *Rethinking International Trade*. Cambridge: MIT Press, 1990
- ⑩⑤ Kuznets S. *Six Le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 [s. 1.]: The Free Press of Glenocoe, 1959
- ⑩⑥ Kuznets S. *Economic Growth: Finding and Reflection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3. 6
- ⑩⑦ Lal D. *The Pover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⑩⑧ Lall S. Is Dependence a Useful Concept in Analysing Under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1975, 2 (11)
- ⑩⑨ Leibenstein H. *Economic Backwardness and Economic Growth*. [s. 1.]: Wiley, 1957
- ⑪① Leibenstein H. *Beyond Economic M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⑪② Leibenstein H. X-Efficiency Intrafirm Behavior and Growth. In: Maitalss, Meltzss, eds. *Lagging Productivity Growth: Causes and Remedies*. [s. 1.]: Ballinger Press, 1980
- ⑪③ Lewis W A.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s. 1.]: Allen & Unwin, 1955
- ⑪④ Lewis W A. *Development Planning: The Essentials of Economic Policy*. [s. 1.]: Allen & Unwin, 1966
- ⑪⑤ Lewis W A.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y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4. 5
- ⑪⑥ Lewis W A. *Unlimited Labor: Further Notes*.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58. 1
- ⑪⑦ Lewis W A. *Reflections on Unlimited Labor*. In: DiMarco L E, ed. *Essays in Honor of Raul Prebisch*. [s. 1.]: Academic Press, 1972
- ⑪⑧ Lewis W A. *The Dual Economy Revisited*. The Manchester School, 1979. 9
- ⑪⑨ Lewis W A.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a Limping World Economy*. The Elmhurst Lecture,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Bariff, 1979. 9
- ⑪⑩ Levhari D. *Extension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6. 4
- ⑪⑪ Levhari D. *Further Implication of Learning by Doing*.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6. 1
- ⑪⑫ Lim D. *Another Look to Growth and Defense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83. 1
- ⑪⑬ Lipton M. *Balanced and Unbalance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1962. 9
- ⑪⑭ Little I, Scitovsky T, Scott M. *Industry and Trade in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⑪⑮ Little I M 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Polic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c Books, 1982
- ⑪⑯ Locay 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Division of Production Between Household and Market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10
- ⑪⑰ Lucas 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

- ⑫ Lucas R. Making a Miracle. *Econometrica*, 1993. 3
- ⑬ Maddison A. Phase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⑭ Maddison A. Economic Progress and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s. l.]: Allen & Unwin, 1970
- ⑮ Mandelbaum K. Industrialization of Backward Areas. [s. l.]: Basil Blackwell, 1947
- ⑯ Mankiv G, Romer D, Weil D. Contribution to the Empirics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5
- ⑰ Marshall A. Industry and Trade. [s. l.]: Macmillan, 1919
- ⑱ Massell B F. Export, Capital Imports and Economic Growth. *Kyklos*, 1964 (4)
- ⑲ Mckinnon R I.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 l.]: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3
- ⑳ Mckinnon R I. Financial Policies. In: Cody J, Hughes H, Wall D, eds. Policies for Industrial Progres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㉑ Meade J E. A Neo-classical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s. l.]: Allen & Unwin, 1960
- ㉒ Meadows H, etc. The Limits to Growth.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Books, 1972
- ㉓ Meier G M. Emerging from Poverty: The Economics That Really Matt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㉔ Meier G M, ed. 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95
- ㉕ Meier G M, ed.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Second Se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㉖ Meier G M, Seers D, eds. Pioneers in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㉗ Meier G M, Baldwin R 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ory, History, Policy. [s. l.]: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1976
- ㉘ Mikesell 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London: Mansell Publishing, Ltd, 1992
- ㉙ Moggridge D, ed.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John Maynard Keynes. Vol. 2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㉚ Singhe M M, Meneely J. Key Concept and Terminolog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efining and Measuring Sustainability. New York: The Biogeophysical Foundations, 1996
- ㉛ Myint H. An Analysis to Economic Backwardness.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54. 6
- ㉜ Myint H. Classic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1958. 6
- ㉝ Myint H. The Economic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s. l.]: Hutchinson & Co. Ltd, 1973
- ㉞ Myrdal G. Asian Drama: An Inquiry into the Poverty of Nations. [s. l.]: Pantheon Books, 1968. 500



- ⑩ Myrdal G. *Development and underdevelopment*. [s. 1.]: National Bank of Egypt, 1956
- ⑪ Myrdal G. *Rich Lands and Poor*. [s. 1.]: Harper, 1957
- ⑫ Myrdal G. *Need for Reforms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In: Grassman S, Lundberg E, eds. *The World Economic Order: Past and Prospects*. [s. 1.]: Macmillan, 1981
- ⑬ Nadiri M.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Factor Inputs and Total Productivity: A Brief Survey*, 12th General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Income and Wealth. [s. 1.]: Ronneby, Sweden, 1971
- ⑭ Nafziger E W. *The Economics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s. 1.]: Wadsworth Inc, 1984
- ⑮ Nelson R R.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Medium Range Growth Proje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4. 9
- ⑯ Nelson R R. *A Theory of Low Level Equilibrium Trap in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6. 12
- ⑰ Newbery D, Stern N, eds. *The Theory of Taxation for Developing Countries*. Washinton World Bank, 1987
- ⑱ Nurkse R. *The Problem of Capital Formation in Less-developed Countr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 ⑲ Eckstein O. *Investment criteria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Theory of Intertemporal Welfare Economic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7
- ⑳ Oshima H T. *The Ranis-Fei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3. 6
- ㉑ Pack H. *Endogenous Growth Theory: Intellectual Appeal and Empirical Shortcoming*.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4
- ㉒ Pearce D. *Cost-Benefit Analysis*. [s. 1.]: Macmillan, 1983
- ㉓ Pearce D, Nash C. *The Social Appraisal of Projects*. [s. 1.]: Macmillan, 1981
- ㉔ Perroux F. *Note Sur la Notion de Pole de Croissance*. *Economic Applique*, 1955. 8
- ㉕ Phelps E. *The New View of Investment: A Neoclassical Analysi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62. 11
- ㉖ Pigou A C, ed. *Memorials of Alfred Marshall*. [s. 1.]: Macmillan, 1925
- ㉗ Prebisch R.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in Problems in Latin America*. *Economic Review of Latin America*, 1950
- ㉘ Prebisch R. *The Five Stag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My Economic Thought*. Mexico: Economic Quarterly. 1983. 4 ~ 6
- ㉙ Ramsey F. *Mathematical Theory of Saving*. *Economic Journal*, 1928. 12
- ㉚ Ray A. *Cost-Benefit Analysis*. [s. 1.]: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 ㉛ Rebelo S. *Long-Run Policy Analysi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6

- ①72 Renolds L G. *Image and Reality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①73 River-Batiz L, Romer P.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Endogenous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5
- ①74 Robbins L.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s. l.): Macmillan, 1968
- ①75 Romer P.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6. 10
- ①76 Romer P. *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7. 5
- ①77 Romer P. *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0. 10
- ①78 Romer P. *Two Strategies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Using Ideas and Producing Ideas*.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2
- ①79 Rosen S. *Substitution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Economica*, 1978. 8
- ①80 Rosenstein-Rodan P N. *Problems of Industrialization of Eastern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Economic Journal*, 1943. 6~9
- ①81 Rostow W 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1974
- ①82 Saint-Paul G. *Fiscal Policy in an Endogenous Growth Model*.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2. 11
- ①83 Santos D. *The Structure of Dependen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5
- ①84 Sassone P, Schaffer W. *Cost-Benefit Analysis*, (s. l.): Academic Press, 1978
- ①85 Schmitz J. *Imitat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9
- ①86 Schultz T W.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Agriculture*. 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4
- ①87 Schultz T W. *Investing in People: The Economics of Population Qualit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 ①88 Schultz T W.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1. 3
- ①89 Schwartz H, Berney R, eds. *Social and Economic Dimension of Project Evaluation*. (s. l.): 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1977
- ①90 Schumpeter J.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 ①91 Seers D. *A Model of Comparative Rates of Growth of the World Economy*. *Economic Journal*, 1962. 3
- ①92 Segerstrom P. *Innovation, Imit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1. 8
- ①93 Segerstrom P, Anant T, Dinopoulos E. *Shumpeterian Model of the Product-Life Cycle*, E. R, 1990. 12

- ①94 Sen A. *Employment,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 ①95 Serageldin I. *Sustainability and Wealth of Nations-First Step in an Ongoing Journey*, 1995. 3
- ①96 Sheshinki E. *Optimal Accumulation with Learning by Doing*. In: Shell K, ed. *Essays on the Theory of Optimal Economic Growth*. Cambridge: MIT Press, 1967
- ①97 Shaw E.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①98 Singer H W. *The Distribution of Gains between Investing and Borrowing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50. 5
- ①99 Solow R.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Quart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2
- ②00 Solow R. *Technical Change and the Aggregate Production Func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1957. 8
- ②01 Solow R. *Perspectives on Growth Theory*.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4
- ②02 Stokey N. *Learning by Doing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New Good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88. 8
- ②03 Stokey N. *The Penn World Table (Mark5): An Expand Set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1950-198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5
- ②04 Summers R, Heston A. *New Set of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Real Product and Price Levels Estimates*, R. and Heston, A. *New Set of Income and Wealth*, 1988. 3
- ②05 Squire L, Tak H. *Economic Analysis of Projects*. [s. l.]; Johns Hopking University Press, 1975
- ②06 Staley E. *World Economic Development*. Roman: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1944
- ②07 Stewart M. *Developing Countries, Trade and Liquidity: A New Approach*. *Banker*, 1972. 3
- ②08 Stiglitz, Joseph E. *The Role of the State in Financial Markets*. In: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Band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 1993
- ②09 Streeton P. *Unbalanced Growth*.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59. 6
- ②10 Sunkel O. *Transnational Capitalism and National Disintegration in Latin America*. *Social and Economic Studies*, 1973. 3
- ②11 Sunkel O.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y and External Dependence in Latin Americ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1969. 10
- ②12 Swan T W. *Economic Growth and Capital Accumulation*. *Economic Record*, 1956. 11
- ②13 Thakur S Y. *Industri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Appropriate Strategy for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s. l.]; Popular Prakashan, Bombay, 1985
- ②14 Thirlwall A P.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Developing Economies*. [s. l.]; Macmillan, 1983
- ②15 Thirlwall A P. *Growth and Development*. 6th edition. [s. l.]; Macmillan, 1999
- ②16 Todaro M P.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Longman, 1977, 1981,

1985

- ②17 Todaro M P. A Model of Labor Migration and Urban Unemployment i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9. 3
- ②18 Todaro M P. Internal Migr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 Survey. In: Easterlin R A, ed. *Population and Economic Change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0
- ②19 Tordaro M P.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Longman, 1994
- ②20 Uzawa H. Optimal Growth in a Two-Sector Model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4. 1
- ②21 Uzawa H. Optimal Technical Change in a Aggregative Model of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1965. 1
- ②22 Viner J.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s. l.]: Clarendon Press, 1953
- ②23 Viner J. The Concept of "Disguised Unemployment". In: Meier G M, ed. *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55 ~ 159
- ②24 Waelbroek, Jean. Half Centur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A Review Based on the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es.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1998 (2)
- ②25 Weitzman M. Hybridizing Growth Theor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5
- ②26 Wilson T, Sinha R P, Castree J R. The Income Terms of Trade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Economic Journal*, 1969. 12
- ②27 Young Allyn. 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Progress. *Economic Journal*, 1928. 12
- ②28 Young Alwyn. Learning by Doing and the Dynamic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5
- ②29 Young Alwyn. Invention and Bounded Learning by Do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3. 6
- ②30 Young Alwyn. Substitution and Complementary in Endogenous Innov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3. 8
- ②31 Young Alwyn.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NICs: a Contrarian View. I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ight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s. l.]: Helsinki, 1993
- ②32 Yotopolous P A, Nugent J B. *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s. l.]: Harper & Row, 1976
- ②33 吉里斯, 波金斯等. *发展经济学*. 第4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8
- ②34 1998年世界发展报告.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
- ②35 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 ②36 钱纳里 H, 鲁宾逊 S, 赛尔奎因 M. *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 上海: 三联书店, 1989
- ②37 郭熙保. *发展经济学经典论著选*. 北京: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8
- ②38 郭熙保. *农业发展论*.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5
- ②39 加塔克, 英格森特. *农业与经济发展*.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②⑩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 ②⑪ 纽贝里, 斯特恩编. 发展中国家税收理论. 北京: 中国财政出版社, 1992
- ②⑫ 世界银行. 东亚奇迹: 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5
- ②⑬ IUCN, UNEP, WWF. 保护地球——可持续性生存战略.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2
- ②⑭ 皮尔斯等. 世界无末日.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6
- ②⑮ WECD. 我们共同的未来. 吉林: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7
- ②⑯ 诺思. 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上海: 三联书店, 1994
- ②⑰ 汤敏, 茅于軾主编. 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 第二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②⑱ 科斯等.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上海: 三联书店, 1994
- ②⑲ 罗伯特, 雷彼托等. 环境保护真的会抑制生产率增长吗? 经济译文, 1999 (4)
- ②⑳ 拉尔夫. 我们的家园——地球. 北京: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1993
- ㉑ 龙尔. 濒临失衡的地球.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1997
- ㉒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3卷, 第26卷. 人民出版社, 1962, 1973
- ㉓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2
- ㉔ 李嘉图. 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2
- ㉕ 李斯特. 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㉖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㉗ 舒尔茨. 改造传统农业.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 ㉘ 哈罗德. 动态经济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㉙ 多马. 经济增长理论.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3
- ㉚ 贝克尔. 人力资本.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
- ㉛ 赫立克, 金德尔伯格. 经济发展.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 ㉜ 明特.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 ㉝ 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编. 发展经济学的新格局.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1987
- ㉞ 张培刚. 农业与工业化. 上卷. 武汉: 华中工学院出版社, 1984
- ㉟ 杨叔进. 经济发展的理论与策略.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3
- ㊱ 谭崇台. 发展经济学.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 ㊲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2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 ㊳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 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 第8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4